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

[英] 保罗·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主编　郭小凌　张　俊　叶梅斌　郭　强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致　谢

编者希望以个人及全体撰稿人的名义向帕特·伊斯特林（Pat Easterling）教授（剑桥大学）和迈克·詹姆士（Mike Jameson）教授（斯坦福大学）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激他们无私地通读了书稿并担当本书最睿智的学术顾问。另外，还要感谢目光敏锐且不知疲倦的绘画研究人员卡里·肯德尔（Callie Kendall）以及多才多艺的现代珀涅罗珀[1]，丛书编辑保莱恩·格雷厄姆（Pauline Graham）。

平装重印本致谢

本书编者希望感谢所有善意指出原版精装本中种种错误和不足的读者，包括书评家们，特别是马克·格林斯多克（Mark Greenstock）和艾伦·格里菲斯（Alan Griffiths）。这些错误已经在这部平装重印本中最大限度地得到了纠正。另外，编者愿代表全体撰稿人向保莱恩·格雷厄姆的继任者，丛书编辑凯文·泰勒（Kevin Taylor）致谢，以感谢他如此高效地负责了重印到出版的全过程。

① 奥德修斯忠实的妻子，丈夫出外远征20年，她在此间拒绝了无数的求婚者。——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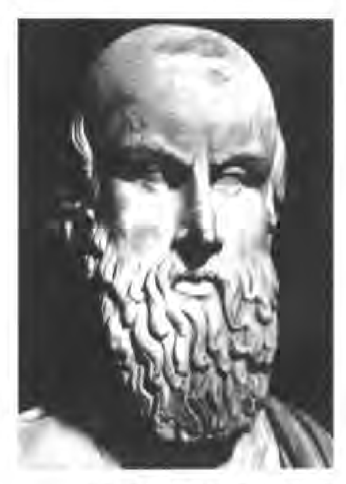

爱琴海
地
中
伊利里亚
西西里
拉提乌姆
埃特鲁里亚
凯莱
迦太基
雅典
斯巴达
科林斯
底比斯
德尔斐
奥林匹亚
克诺索斯
特洛伊(希萨尔里克)
以弗所
米利都
萨摩斯
那不勒斯湾
叙拉古
0 300公里
0 200英里



奥尔比亚
法那哥里亚
克里米亚
伊斯特罗斯
黑海
法塞斯
科尔奇斯
伊斯特河（多瑙河）
西诺普
阿波罗尼亚
特拉里佐斯
赫拉克利亚
哈尔斯登
小亚细亚
米利泰尼
马其顿尼亚
色雷斯
卡帕多客亚
哈尔基斯
弗里吉亚
安纳托利亚
亚述
伊庇鲁斯
帖撒利
吕底亚
伊苏斯
塔索斯
安条克
安布拉吉亚
伊奥尼亚
叙利亚
埃陀利亚
彼奥提亚
阿提卡
伯罗奔尼撒
阿卡狄亚
吕吉亚
萨拉米斯
拉科尼亚
阿哥利德
塞浦路斯
罗德斯
克里特
巴勒斯坦
海
尼罗河三角洲
亚历山大里亚
塞勒尼
诺克拉提斯
塞勒奈卡
萨卡拉
西瓦赫
法雍
卡尔纳克

目 录

导 言



三大"古典"悲剧作家中的最年长者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456年卒于西西里的盖拉（Gela），享年七十岁左右。他的墓碣文仅仅浓缩了其作为爱国的雅典战士抗击波斯人的伟绩，还专门提到"马拉松小树林"的事迹。不过，埃斯库罗斯是因其悲剧作品，特别是创作于公元前458年的《奥瑞斯特斯》三联剧而名垂后世。

"光荣属于希腊？"

"实际上，我们现代生活中的一切都受惠于希腊人，而所有不合时宜的东西都应归咎于中世纪。"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假设你能坐上一架时间机器回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99～前400年）的古希腊，在雅典广场（市中心），你可能会遇到以下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埃斯库罗斯、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①、阿纳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②、阿里斯托芬、阿斯帕希亚（Aspasia）③、卡里阿斯（Callias）④、克里昂（Cleon）⑤、克里奥丰（Cleophon）⑥、克拉提努斯（Cratinus）⑦、克莱希拉斯（Cresilas）⑧、厄菲阿尔

① 阿尔基比亚德斯（约公元前450～前404年），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擅长演说，精于政治谋算，生活放浪形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力主远征西西里，并被公民大会任命为率军远征的三将军之一。远征中遭遇政敌指控，自觉凶多吉少而逃奔雅典的敌国斯巴达，为斯巴达出谋划策，对雅典造成巨大伤害。后叛逃波斯，继而助雅典海军粉碎寡头政变，并指挥雅典舰队痛击斯巴达海军，重获雅典公民拥戴，成为军队统帅。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小有失利。他失去公民大会信任，再次流亡，死于亡命途中。——译者注。

② 阿纳克萨哥拉斯（约公元前500～前423年），古希腊哲学家，智者学派的带头人。小亚细亚殖民城邦克拉佐迈尼人，生在贵族之家，但立志研究学问，将家产赠与亲属后，移居当时希腊的文化中心雅典，既是杰出的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老师又是他的挚友。公元前431年以后，伯里克利政敌控告他对雅典国家供奉的神祇不敬，被逐出雅典。他的代表作是《论自然》，目前仅存残片。他是朴素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世界的最小单位是"种子"。——译者注

③ 阿斯帕希亚，伯里克利的情妇，在伯里克利与其妻离婚后便同他生活在一起，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著名妇女。——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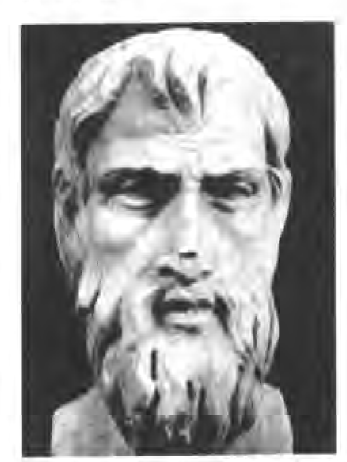
④ 卡里阿斯（公元前5世纪人，生卒年不详），雅典政治家，出身贵族与富豪家庭，在马拉松战役初露头角，后作为雅典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与波斯签订合约，历史上叫做"卡里阿斯合约"。——译者注

⑤ 克里昂（公元前？～前422年），雅典政治家，民主派的代表。在雅典与斯巴达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争霸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主战派，曾率军大败斯巴达军，后在争夺北方军事要地时作战身亡。

⑥ 克里奥丰（公元前？～前404年），雅典政治家，曾是十将军之一（公元前429年），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激进的平民政治家，对政敌不遗余力地攻击，阻止了本已谈成的合约的签订。公元前405年被控有罪，次年遭处决。——译者注

⑦ 克拉提努斯（公元前520～前423年），同优波里斯、阿里斯托芬并列的雅典喜剧家，共作有21部喜剧，获得了9次戏剧比赛大奖。最后一次获奖的竞争对手是阿里斯托芬，可见其写作能力之强。但其作品均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目前只有个别残片。据说他的戏词（诗文）机智刻薄要强于幽默，常把伯里克利当做挖苦对象，可以看做是政治戏剧的奠基人。——译者注

⑧ 克莱希拉斯（约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希腊杰出的雕刻家，本是克里特岛西多尼亚城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雅典从事艺术活动。目前发现有他签名的雕像作品共五座，三座在雅典，一座在德尔斐，一座在阿哥斯。另有一座雕像的基座也刻有他的名字，但雕像已遗失。其最有名的作品是伯里克利的雕像，目前存有一些罗马时代的复制品。——译者注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头像。他于公元前455年左右生于雅典，一生创作了40多部喜剧，在公元前427年到公元前4世纪80年代中期得以上演，其中11部流传至今。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一样，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最初是在为庆祝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雅典的两个主要宗教戏剧节上演出的。

特（Ephialtes）[1]、优波里斯（Eupolis）[2]、欧里庇得斯（Euripides）[3]、哥尔吉亚斯（Gorgias）[4]、希罗多德（Herodotus）[5]、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6]、伊克提努斯（Ictinus）[7]、伊索克拉特（Isocrates）[8]、米尔提亚德斯（Miltiades）[9]、帕尔哈希乌斯（Parrhasius）[10]、伯里克利（Pericles）[11]、菲迪亚斯（Phidias）[12]、柏

① 厄菲阿尔特（公元前？～前462年），雅典民主政治家，致力于扩大平民的权利，削弱贵族势力，促进了雅典民主政体的完善，因此受到贵族反对派的仇恨，遇刺身亡。——译者注

② 优波里斯（约公元前446～前403年），雅典著名喜剧家，17岁时因剧本上演而崭露头角，一生获7次戏剧奖。传说他因在自己的作品中讽刺阿尔基比亚德斯而被后者溺死在海中。目前仅知他的16部作品的名称与个别片断。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剧本情节曲折，语言优雅，但与阿里斯托芬文人相轻，互相攻击，为希腊戏剧史留下了趣事。——译者注

③ 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年），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出身于商人家庭。他的父母在他出生时听信神托，认为他将来是能拿冠军的运动员，因此从小对他注重体育训练。但他酷爱戏剧和学问，同著名哲学家阿纳克萨哥拉斯、普罗塔哥拉斯、苏格拉底十分要好。这给他的创作准备了知识的底蕴。他一生共创作93部悲剧，43岁时首次获奖，其后又获奖3次。虽得奖有限，但他的许多作品堪称艺术精品。最动人的作品是《美狄亚》，描写女主人公深爱自己的丈夫，但丈夫却有了新欢，抛弃了她和孩子。于是美狄亚由极爱转为极恨，不仅杀死丈夫的情人，并且杀死了她同丈夫所生的子女。——译者注

④ 哥尔吉亚斯（公元前？～前399年），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家，西西里岛人，于公元前427年作为使臣到雅典赴任，在公众面前的演说颇受欢迎。返回西西里述职又很快以个人身份移居雅典，遂以雅典为立脚点四处云游，成为名噪一时的智者学派的代表，学生甚众。他奉行虚无主义哲学，要点有三：1. 一切皆无。2. 假若有任何事物的话，也不可能知晓。3. 假若有任何事物存在，也能被人知晓，它也不可能交流。——译者注

⑤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希腊杰出的史学家，里程碑式的人物。原是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哈利卡纳苏人，后迁居雅典，可能在雅典在意大利的殖民地图里伊去世。他的史作《历史》是基本完整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古希腊历史著作，早在古代就被人称做"历史之父"。——译者注

⑥ 希波达姆斯（约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人），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米利都人，长期在雅典生活，是按几何原则建造城市的提出者，并在雅典海港派里厄斯与殖民城市图里伊的建造中得到实行。——译者注

⑦ 伊克提努斯（约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人），希腊最杰出的建筑家之一，是伯里克利的同代人。他的代表作是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至今仍是希腊建筑艺术的象征。——译者注

⑧ 伊索克拉特（约公元前436～前338年），希腊伟大的演说家之一，雅典公民，曾是普罗塔哥拉斯、哥尔吉亚斯等著名学者的学生。公元前392年在雅典开办演说学校，学生来自希腊各地，总数达百人。90岁高龄时，他致书马其顿国王腓力，促其远征东方，以便拯救希腊城邦危机。对国内政治问题，他支持恢复梭伦时代创立的温和的民主制，反对激进民主。——译者注

⑨ 米尔提亚德斯（约公元前550～前489年），雅典著名政治家，在希波战争中力主抗击波斯，促成马拉松会战，并对该战役的胜利出力甚大。因远征帕罗斯岛失利，并身受重伤，被公民大会以欺骗人民罪处罚，终因伤重去世。——译者注

⑩ 帕尔哈希乌斯（生卒年代在公元前400年前后），希腊著名画家，以弗所人，后迁居雅典，成为雅典公民。根据古代作家记载，他是人体比例理论的第一个提出者。——译者注

⑪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希腊最著名的政治家，雅典平民领袖。出身贵族，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成人后积极参与政治，很快成为民主派领袖。提出多项民主改革措施，将雅典民主进一步推向完善。由于他严于律己，公而忘私，能力超群，政治明智，精于演说，具有极大的人望，因此自公元前443年至前429年，连续当选为首席将军，事实上把握了雅典国家的政治方向，将雅典的霸权推到顶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他因雅典瘟疫流行而受到公民质疑，一度被免职并处罚金。但是，雅典人认识到他的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又选他为将军，但不久罹病辞世。——译者注

⑫ 菲迪亚斯（约公元前490～前430年），雅典公民，古希腊最杰出的雕刻艺术家之一，早期代表作是雅典广场上矗立的雅典娜女神青铜像。后担任雅典卫城重建事业的主持人，负责为帕特农神庙制作各种雕像、浮雕装饰带，问世了一大批不朽之作。他晚年在奥林匹亚为宙斯大庙造像，该作品是古典时代最出色的雕塑之一。他的艺术特点在于自然雅致，高贵感人。——译者注

拉图（Plato）[①]、波里格诺图斯（Polygnotus）[②]、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③]、苏格拉底（Socrates）[④]、索福克勒斯（Sophocles）[⑤]、修昔底德(Thucydides)[⑥]、色诺芬(Xenophon)[⑦]以及宙克西斯（Zeuxis）[⑧]。他们并不全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却都在这个文化与政治的小温床中受到无形的激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些名字现在并非个个脍炙人口，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试图降低古希腊和罗马古典学在教育中的地位，缩减学习经典的课程，上述人物之中仍有许多人至今还妇孺皆知。

正是这些人铺设了政治、艺术、文化、教育、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石，以至于随后的西方文明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令人略感惊奇的是，生于公元前5世纪末期的雅典人柏拉图将光辉的、幼年时期的雅典称为“智慧（Sophia）的家园”（sophia既指理论上的也指实践中的智慧）。同样使人略感惊奇的是，雅典人都喜欢在诸如底比斯人品达（Pindar）、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等赞颂者的作品中，听到对“戴着紫罗兰王冠”的雅典的赞美，甚至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那些受过古典学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自然而然地对希腊顶礼膜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48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贵族出身，20岁时受教于苏格拉底，获益至深，终生对老师怀有高度的敬意。后游学四方，公元前386年在雅典开办学校，传授个人思想，倾心著述。现存对话录25篇，其中《理想国》和《法律篇》是其有关社会认识的长篇代表作。此外，他传留到今天的作品还有书信13封以及1篇对老师苏格拉底的辩护词。柏拉图是唯心主义哲学大师，强调理念的根本作用，对唯心主义哲学影响深远。——译者注

② 波里格诺图斯（约公元前5世纪前期人），古希腊杰出的画家，塔索斯岛人，长期在雅典作画，代表作有《攻占特洛伊》与《马拉松之战》等。——译者注

③ 普罗塔哥拉斯（约公元前480～前410年），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原籍殖民城邦阿布德拉人，大半生（四十余年）在希腊各地，尤其是在雅典讲学，教授修辞学和处事知识，是智者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基本哲学思想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其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在此思想基础上，他不信神，也因此受到指控，在仓促出走中溺水身亡。——译者注

④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思想家，希腊哲学由自然哲学转向社会人生哲学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出身平民家庭，起初从父学雕刻，后致力于探讨认识人类自身的问题，如正义、道德、勇敢、节制等重要概念的问题。基本方法是提出问题和展开论辩或证伪、证实的过程，常常将辩论对象逼人理屈词穷的窘境。他批评民主制但不根本反对民主制，提倡专家治国，是位不媚俗、不媚众、坚持独立思考的智者，并因此被雅典公民法庭以宗教罪判处死刑。——译者注

⑤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雅典人，写有130部悲剧，流传下来7部。代表作为《俄狄浦斯王》。写主人公俄狄浦斯与命运的抗争，最终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译者注

⑥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396年），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雅典贵族子弟，后从政，官至雅典将军职。这是公元前5世纪后中后期雅典的最高行政与军事职务。其惟一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作者亲历的希腊城邦之间的争霸战争，秉持客观主义的治史原则，是古代西方史学的顶峰之作。——译者注

⑦ 色诺芬（公元前430～前354年），古希腊三大史学家之一，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学生，青年时闯荡江湖，曾在波斯小亚细亚总督麾下充当雇佣兵指挥。这段经历成为他的史学名作之一《长征记》的内容。他的史著还有《希腊史》，续写修昔底德未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注

⑧ 宙克西斯（约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至前4世纪初叶人），古希腊杰出的画家，原籍意大利赫拉克里亚。后在希腊各地作画，在雅典逗留了很长时间，最后定居在以弗所。他的作品注意到光线和阴影，雅致迷人，在古代享有盛誉。代表作是赫拉神庙中有关海伦的绘画。据说他画的葡萄栩栩如生，小鸟都误落到了画上。——译者注

拜——用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①]的《海伦之歌》中的名句来表述，就是“光荣属于希腊”。

“我们都是希腊人……”

雪莱的这句话符合事实吗？或者说，我们真的都是希腊人吗？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这本插图史旨在描述古希腊的多样性和伟大之处，同时把对这段毋庸置疑的辉煌历史的诠释，牢牢地置于适当的历史视域和最广阔的背景之中，甚至要付出使它的光环微微褪色的代价。在某些方面，比如在希腊人对待妇女和奴隶的问题上，原有的光辉将不只褪去一小点儿。在这里，我们是否敢于公平地断言，在希腊先驱的成就基础之上，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进步呢？

我们还将力求公正地叙述不太引人注目的、相对停滞的乡村的历史。因为在这些地区，成千上万默默无闻的农民和奴隶在辛勤劳作，他们使得灿烂的城市文明——今天，古希腊人首先是因为这个文明才被世人所认识——成为可能。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②]曾把英国的煤矿工人比做支撑英国人生活中所有不肮脏龌龊事物的肮脏龌龊的支柱。我们希望按照这一思路，尽可能从最底层，从那些使得丰功伟绩成为可能的无名英雄们的视角出发，来审视希腊人的成就。

希腊字母

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和文化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由于建筑师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杰出的业余探索工作以及约翰·柴德里克（John Chadwick）（见第一章）和其他一些学者在语言学方面的潜心研究，我们现在知道那个被称为“线形文字B”的平淡无奇的音节文字构成了希腊语的一种早期形式（见第三章）。通过这种文字，我们了解到“希腊”文明与文化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期。在伯罗奔尼撒的派罗斯（Pylos）、提林斯（Tiryns）、迈锡尼、中希腊的底比斯以及克里特岛的卡尼亚（Chania）和克诺索斯（Cnossus），都发现了记录着关于中央集权的宫廷经济的收入与支出情况的线形文字B泥板档案。在其他遗址上还出土了标有线形文字B符号的用来盛油的陶罐。

另外，凭借各国考古学家的出色工作，我们现在不仅认识了现代希腊本身，也了解到了有关青铜时代后半叶或“迈锡尼”（Mycenaen）时代（约公元前1600～前1100年）的早期希腊文明的许多信息。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正是这个文明为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及其代表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伟绩提供了背景和原初的创作灵感。

不过，考古学也告诉我们，在文学人物阿伽门农、阿基琉斯所在的迈锡尼宫殿以及创造并保存了荷马史诗的成文史上的希腊城邦或城市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和编年上的裂缝。比如，口头相传的荷马史诗最后并非记录在线形文字

① 艾德加·埃伦·坡（1809～1849年），美国诗人与小说家，代表作有诗歌《乌鸦》（1845年）和短篇小说《厄舍大宅的倒塌》（1839年）等。——译者注

②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英国现代作家，特别关注社会平等问题。——译者注

拜伦、雪莱和王尔德

这三位19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诗人，也是狂热的希腊迷。其中，拜伦[①]不仅为希腊的独立事业捐款并进行口头宣传，还在1826年于米索伦吉为这一事业而死。拜伦的年轻朋友雪莱[②]是杰出的古典学家，也许他过多地把现代西方文化与希腊的最终源头连接在一起，但他也的确凭借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重新诠释，以及对柏拉图《对话篇》所进行的开创性翻译——并不避讳引人争议的赞美男性同性恋的段落——丰富了西方文化的传统。王尔德[③]曾在都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古典学，他从未与古希腊世界失去过联系，古希腊为他的生活和写作提供了灵感。尽管王尔德最好的诗作和他的一本小说《多利安之灰的描述》完全是对其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风貌的描述，但它们与希腊源头的联系也始终是显而易见的。

拜伦



王尔德

① 拜伦（1788～1824年），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长诗《唐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曾在希腊居住，致力于希腊脱离土耳其而独立的事业。——译者注

② 雪莱（1797～1851年），英国作家与浪漫诗人，代表作有《西风颂》、抒情剧《解放的普罗米修斯》等。

③ 王尔德（1854～1900年），爱尔兰裔的作家与诗人，在伦敦文学圈内以天才著称。代表作有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剧本《认真的重要》和诗歌《雷丁狱之歌》。——译者注

B的手稿上，而是不恰当地用希腊语转记下来，以至于这些记录必须用表意符号和图画符号来补充才行。而且，其中使用的每个字母及其含义，是由生活在当今黎巴嫩地区的属于塞姆语（或闪米特语，Semitic）的腓尼基人那里借用来的，尽管对它们进行了出色的改编，使之可以表达包括元音在内的所有希腊语的发音。虽然线形文字B是仅仅用来记录档案的书面文字，但这一字母体系有着被几乎所有人应用的潜在可能，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上等人还是下等人，穷人还是富人，自由民还是奴隶。同样，虽然线形文字B的抄写员都是宫廷里的官员，但这一字母体系可以用来作各种书面表述，适用于诸如荷马史诗之类的文学作品、公共法律和条约协定，乃至个人书信。

大概在公元前8世纪（前799～前700年）的某个时间里，希腊字母发生了一些局部的改变。最后，它们经罗马人之手传给了我们。罗马人从下述两个意大利源头获得并改编了这些字母：一个是来自曾经在现代托斯卡纳（Tuscany）地区居住



米利都人赫卡泰奥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00年）被认为是绘制出古希腊人的第一张“世界地图”的人，但他的地图一点都不像这张罗马帝国的地图。实际上，现代的地图设计只追溯到“墨卡托”（16世纪的佛兰德地图编制者弗哈德·克莱默）。赫卡泰奥斯和其他古代希腊人所了解的“世界”并没有远远超出地中海和黑海的沿岸地区[1]。

(1) 此处不确，古希腊人的视野远及中亚和印度。——译者注

过的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他们甚至在公元前6世纪就可能统治过罗马。另一个来自人称“大希腊”的希腊城市，它们坐落在那不勒斯海湾周围以及沿意大利之“脚”的南部海岸。实际上，我们所谓“希腊人”（“Greeks”）的称呼，是一个罗马人的版本——“Graeci”，这个词起初具有贬义。据我们所知，希腊人向来都称自己为“海勒尼斯”（“Hellenes”），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词曾在公元前7世纪帕罗斯的阿吉罗库斯（Archilochus of Paros，后来迁居塔索斯）[2]诗歌之前出现过。

希　腊

在19世纪早期现代希腊国家建立之前，与其说“希腊”（Hellas）是一个严格的政治实体，不如说她是一个文化范畴，有点像中世纪所谓的“基督教区”，或现在我们说的“阿拉伯世界”。这个文化范畴是被共同的血统（有些地方是真正的，有些是杜撰的）、共同的语言（所有不说希腊语的人都被称做野蛮人，因为他们的语言听起来都像是叽里咕噜的胡言乱语）以及共同的风俗习惯（不仅仅是那些相同的宗教仪式）所界定的。

至公元前500年，文化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希腊从西边的“赫拉克勒斯石柱”（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东边（见第6页地图）的科尔奇斯（黑海的尽

② 阿吉罗库斯，古希腊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的抒情诗人，为爱琴海岛屿帕罗斯人，后因贫穷而移居塔索斯岛，擅长于用哀诗与抑扬格诗表达个人的思想情感。——译者注

头[①]，位于格鲁吉亚境内）。正如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所说，希腊人“像青蛙或蚂蚁那样环绕着一个池塘生活”，也就是说环绕着地中海，并且东北部一直延伸到黑海。但是在这片广袤的世界中，只有很有限的地区在很有限的时间段内达到了，或者说被强制地达到了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这样的例子有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由希腊人居住的爱琴海大部分地区（也包括现代土耳其的西海岸）——不过这要归功于雅典领导的抗击波斯帝国的联盟，还有公元前4世纪之后处于腓力、亚历山大及其希腊继任者统治之下的希腊大陆和邻近岛屿。但到了罗马人统治时，希腊人接受了罗马人惯常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把这片地区划分成亚该亚和马其顿两个行省。罗马也把其余的说希腊语的地区囊括其版图之内，使之在东部构成他们巨大的世界帝国的半壁江山，并且最终发展为以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为基础的独立的拜占庭帝国——尽管拜占庭人仍然管他们自己叫罗马人。先前的拜占庭城，最初是由希腊大陆的麦加拉在公元前7世纪建立的，而“君士坦丁堡”则是按其第二个建立者君士坦丁大帝（卒于337年）的名字重新命名的。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后又进行了一次更名，但即使是土耳其语的“伊斯坦布尔”，也依然带有一个希腊语的词源(Istanbul中的“－bul”来源于希腊语“城邦”“polis”)。

亚里士多德是北希腊斯塔吉拉人，他成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以外邦人的身份生活在雅典，并与马其顿王室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前4世纪30年代中期，亚里士多德模仿他的老师并为了同他的老师柏拉图竞争，在神圣的阿波罗神的吕克奥斯小树林建立了他的哲学书园，并因此把它取名为吕克昂。1997年早些时候，希腊考古署兴奋地宣称，他们发现并挖掘了该学校的遗址。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涵盖了当时认识到的所有学科，并且在实践中把它们系统化了。传统告诉我们，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图书馆构成了公元前3世纪埃及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的著名图书馆的基础。

希腊的遗产

政 治

一些现代的古希腊研究人员，尤其是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兴起以来的研究人员，为古希腊人没有能凭借其共同的文化基础形成城市间长期的团结关系而感到气馁。他们指出，这种政治上的不团结导致希腊人更容易被外界力量所征服。不过反过来说，正因为古希腊的城市在政治上不统一，以下论点才变得更为可信，即恰恰是由于这些城市互相嫉妒对方的独立地位，各城邦在公民自治方面才有可能进行极其富有成果的实验——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他们发明的民主政体。

人们估计，希腊世界分散着超过一千个彼此独立、互不相同的社会。在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这些社会的绝大部分都以某些方式实行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这就是说，在上述两种公民自治的形式中，权力要么归于大多数穷人所有，要么把持在少数成年男性公民手中。然而，随着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的去世，在整个希腊世界，民主政体实际上消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被镇压下去了。只是到了16世纪，它才在一个迥然不同的外表下再次出现。尽管如此，当人民自治的观点作为一种严肃的、起初是革命性的政治体系被再次拿出来讨论的时候，人们仍然给了它一个具有希腊词源的名称“民主”。

① 应指黑海东岸。古希腊殖民地遍布地中海、黑海沿岸，甚至超出直布罗陀海峡，远及大西洋沿岸。——译者注

语 言

“民主”一词只是我们从古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语言遗产的一个例子。人们估计，约有至少三分之一的英语词汇源自古希腊语。根据希腊人亚历山德拉·菲亚达（Alexandra Fiada）有意自谦的作品《仇外者的希腊入门》，如果缺了希腊人，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会是“欧洲的”、“神秘的”、“超凡超俗的”、“爱国的”、“冷漠的”、“悲剧性的”、“外交的”、“自动的”、“怀旧的”、“有磁性的”、“热情的”、“芳香的”、“歇斯里底的”、“讽刺的”、“同义的”……更不用说“民主的”、“寡头的”以及“暴君的”这几个词了。同样，这个世界上也就不会有“战略”、“策略”、“政治家”、“伦理学”、“贵族”、“女色情狂”、“无政府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精神分裂症”、“英雄”、“历史”、“学校”、“组织”、“符号”、“海盗”、“天气”、“纸张”、“热水瓶”和“饮食”；艺术中将不会有“诗人”、“剧作家”、“景观”、“剧场”、“喜剧”、“电影院”、“杂技演员”、“旋律”、“吉他”、“和弦”、“交响曲”、“管弦乐团”、“节目”、“批评家”、“照片”；科学技术中将缺乏“观点”、“建筑师”、“内科医生”、“金属”、“唱片”、“水力学”、“电学”、“电灯”、“聚亚胺酯”和“原子”。

在耶稣（“耶稣”一词来自希腊语“涂油的人”）诞生之后，基督教在欧洲和西方成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宗教。我们在上面故意不提具有希腊语词源并和基督教联系在一起的大量词汇，它们当中有 “圣诞节”、“圣经”、“预言”、“天使”、“天堂”（该词是希腊人从古波斯语借用而来）、“使徒”、“殉教者”、“赞美诗”、“公墓”、“偶像”、“伏魔者”、“异端”、“无神论者”、“亵渎者”、“恶魔”和“教义”。不过，有一份遗产我们没有从基督教之前的希腊人（本书讨论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那里继承下来，那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时间记录

在本书中，我们没有采用公元5世纪由希腊人狄奥尼修斯设计的更为人们熟知的“公元前、公元”的纪年系统，而应用了BCE（共同时代以前）和CE（共同时代）的系统，其主要原因是：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我们这里想要探求和理解的希腊人绝对是多神崇拜者和异教徒，那么“公元前”、“公元后”这样的基督教词语就显得很不合适了（除非特别指出，本书中所有的日期都指共同时代以前）[①]。

“古希腊”时代

基督教在公元头两三个世纪的兴起是我们研究古希腊人的分界线。作为出发点，我们已经证明，是迈锡尼人第一次确定无疑地使用了希腊语，而这恰恰是在公元前8世纪首次被发现的希腊方言的祖先。

在长达约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跨度中，如果想要评判希腊人在许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之类的工作，现已幸存下来的证据表明，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约公元前500～前300年）。这是本书开头列举的那些文化英雄所处的时期，也是他们在公元前4世纪的继承者们

① 为使我国读者阅读的方便起见，本书中的时间表示仍沿用我们熟知的公元纪年法。——译者注

（包括亚里士多德、尤多克苏斯（Eudoxus）[①]和亚历山大大王所处的时期。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工作的学者们认为，这些人的作品应该保存、复制并通过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传递给后代。公元1世纪和2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修辞家和作家也正是以这些作品为基础，发起了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人称“第二次诡辩”运动（见术语表）。即使是像普鲁塔克（46～120年）这样的杰出作家都感到自己处在伟大前辈的阴影之下。不过，后人最嫉妒的，其实是希腊先驱们享有的政治自由及由此产生的对创造性的激励作用。



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狄奥格尼斯来自北希腊的殖民城邦，即黑海南岸的西诺普。不过，他主要是在雅典获得了名望，或者说是获得了骂名更确切一些。他的追随者们在雅典建立了故意摈弃社会道德规范的犬儒学派，教授相应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狄奥格尼斯本人的言行被认为是惊世骇俗的：人们说他曾经在公共场合行手淫，还命令亚历山大大王从储物大缸边走开，因为这个大缸是他的床和卧室，而亚历山大挡住了他的视线。

雅典与雅典之外

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古典主义的文化中心当然非雅典莫属。许多诞生和成长在其他地方的最具才华的希腊人，像是被磁力吸引一样来到这里。这些人中有来自小亚细亚哈利卡纳苏的希罗多德，来自北希腊斯塔吉拉的亚里士多德，来自黑海边西诺普的愤世嫉俗者狄奥格尼斯，来自西普里奥特·希提乌姆的芝诺（Zeno[②]，他可能是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混血儿），还有来自于东方的希腊殖民城邦米利都的阿斯帕西亚——这里仅仅提到五个人。

尽管如此，雅典决不能代表整个希腊。在这本书中，我们希望把雅典人的成就置于更广阔的希腊背景中加以考察，同时将众多不同种类的、源远流长的希腊文化特色呈现给读者。这种多样性的例证包括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文化形态，毕达格拉斯学派的贵族政治哲学在南意大利的试验，西西里的希腊人所实行的非希腊风格的暴政，与雅典模式背道而驰的斯巴达文化与政治制度，底比斯

① 尤多克苏斯（约公元前390～前340年），古希腊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译者注

② 芝诺（约公元前336～前264年），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学派的创立者。原籍塞浦路斯岛上的希提乌姆，后对雅典经商，转而学习苏格拉底哲学，从此专事哲学研究与教学。其教学场所位于雅典广场的柱廊（Stoa），斯多葛学派因此得名。芝诺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世界万物由物质构成。在社会伦理方面，他提倡修身养德。他从教58年，在雅典享有极高的声望。——译者注

正像古希腊公共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方面一样，具有高度文化是典型的男性特权。不过，活跃于公元前600年左右，来自列斯波斯岛的萨福是这条法则的一个最大例外。她用方言创作的个性化诗歌在许多个世纪中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风行程度，即使在今天，其作品仍然激起人们强烈的兴趣，并获得深入的研究。柏拉图称她是第十位缪斯女神[(1)]——这是他较少引起争议的评价之一。甚至到了罗马帝国鼎盛的时代，斯巴达人仍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品达和埃帕米浓达(Epaminondos[①]的故乡）在音乐、军事、政治上体现出的与雅典、斯巴达都显著不同的创造力。还有克里特艺术和宗教的独特性，列斯波斯岛人阿尔凯乌斯（Alcaeus）[②]和萨福（Sappho）[③]的卓越的乡土抒情诗，

(1) 在古希腊神话中，缪斯是宙斯与穆尼莫西尼所生的九个神女的统称，分别负责历史、诗歌、音乐、戏剧、舞蹈、天文等古代知识部门，其中大女儿克丽奥（Clio）是历史女神。——译者注

① 埃帕米浓达（约公元前418～前362年），古希腊军事家和政治家，底比斯公民。早年师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莱西斯，后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佩洛皮达共同执政，使底比斯迅速崛起，成为希腊一霸。公元前371年，率军挑战斯巴达霸主地位，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巧妙布阵，以斜楔阵法大败敌军。随后四次突入斯巴达的根据地南希腊，致使斯巴达的希洛制（耕奴制）解体。——译者注

② 阿尔凯乌斯（约公元前620～？），古希腊抒情诗人，列斯波斯岛密提林邦人。——译者注

③ 萨福（约公元前630～前570年），古代西方最伟大的女性抒情诗人，据说作品有九卷之多，绝大多数失传。现存残句显示出诗人极其细腻深刻的感情与心理，尤其体现在爱情题材上。——译者注

互相竞争的医学中心科斯[1]和克尼德斯[2]。这些都是古希腊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不应被雅典的光辉所遮蔽。

非常规的方法

自下而上地审视历史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方法（自荷马始），在没有忽视这种方法的前提下，我们在本书中也试图从那些平庸的小人物——贫困的自由民、外邦人、妇女或奴隶——的视角，或者从可能属于他们的某种视角或若干视角，自下而上地来加以观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为上述默默无闻的人们正名，并把希腊的民主、戏剧、哲学、医学、建筑、雕塑等成就置于一个更新、更真实的历史视野中。同时，我们对希腊人留给后代的遗产给予特别的关注。不过，我们不会过多地讨论希腊人可能遗赠给了后世文明什么，而将着重谈论包括当代文明在内的后世文明如何有选择地继承希腊的遗产，并且是如何对它们加以利用的。

当然，完全不使用"国王与战争"的处理方法既是困难的，也是不完全合乎需要的。在许多情况下，希腊城邦是在战争的舞台上缓步前行的，希腊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也被特定的战争，特别是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80～前479年）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所深深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虽然战争以及与之伴随的政治发展，比如雅典在公元前508年至前507年引入民主制，可以为叙述史提供一个线索，但在本书中，作者会像对待战略战术这些纯粹的技术细节一样，强调陆战和海战对希腊世界带来的社会意义与后果。例如，正是战争为特有的男性奋斗和成就的空间划定了范围，并以之构成希腊人性别观的一个基本元素。

战争还为希腊众多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从荷马、修昔底德及其以后的作家的作品——提供灵感。战争还是许多古希腊视觉艺术的主题。例如德尔斐神庙[3]中那些散乱弃置、朝圣用的艺术品和纪念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一个巨大的战争纪念馆。在我们看来，它们不仅在"凄凉地"纪念着希腊人对异族人战争的胜利，也同样纪念着希罗多德充满感情地称之为"（希腊人）内讧"造成的后果。

本书不会将文学、视觉艺术和哲学简单地看做希腊人美学和智慧上非物质成就的范例，而会把它们放在社会和政治背景（其表现与之被接受的状态）中去考察。同样，民主制与其被认为是一种正式的宪政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大多数（较贫困的）希腊公民集体统治的生动体现。

大多数希腊人是贫穷的，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整日劳作，富有的有闲阶级只是极少数。但是如果缺了少量可供支配的闲暇，我们所研究和欣赏的希腊文明与文化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些关键的闲暇时光是从被压迫的劳动者，特别是在田地或手工作坊里劳作的依附农民或外来奴隶那里获得的。注意这里说的是"手

与亚里士多德和狄奥格尼斯相似的是，芝诺(Zeno)也不是雅典人。他留下了由一批追随者构成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中心是雅典。出自塞浦路斯的芝诺可能不是血统纯粹的希腊人，他把自己的学校建在雅典的最中心——广场上。"斯多葛学派"(Stoics)的名称是从波伊吉勒柱廊（Stoa Poikile）或画廊（Painted Stoa）得名的。这个柱廊建于公元前5世纪，上边装饰着描述雅典神话以及历史伟绩的爱国主义壁画。

① 爱琴海上的一座岛屿。——译者注

② 位于小亚细亚西南的希腊殖民城市。——译者注

③ 位于中希腊高山中的阿波罗神庙，是古希腊的圣地之一，也是现代希腊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遗址上建有博物馆，收藏着大量珍贵的出土文物。——译者注



工作坊”而不是“工厂”，因为当时希腊完全处于技术发展相对低下的前工业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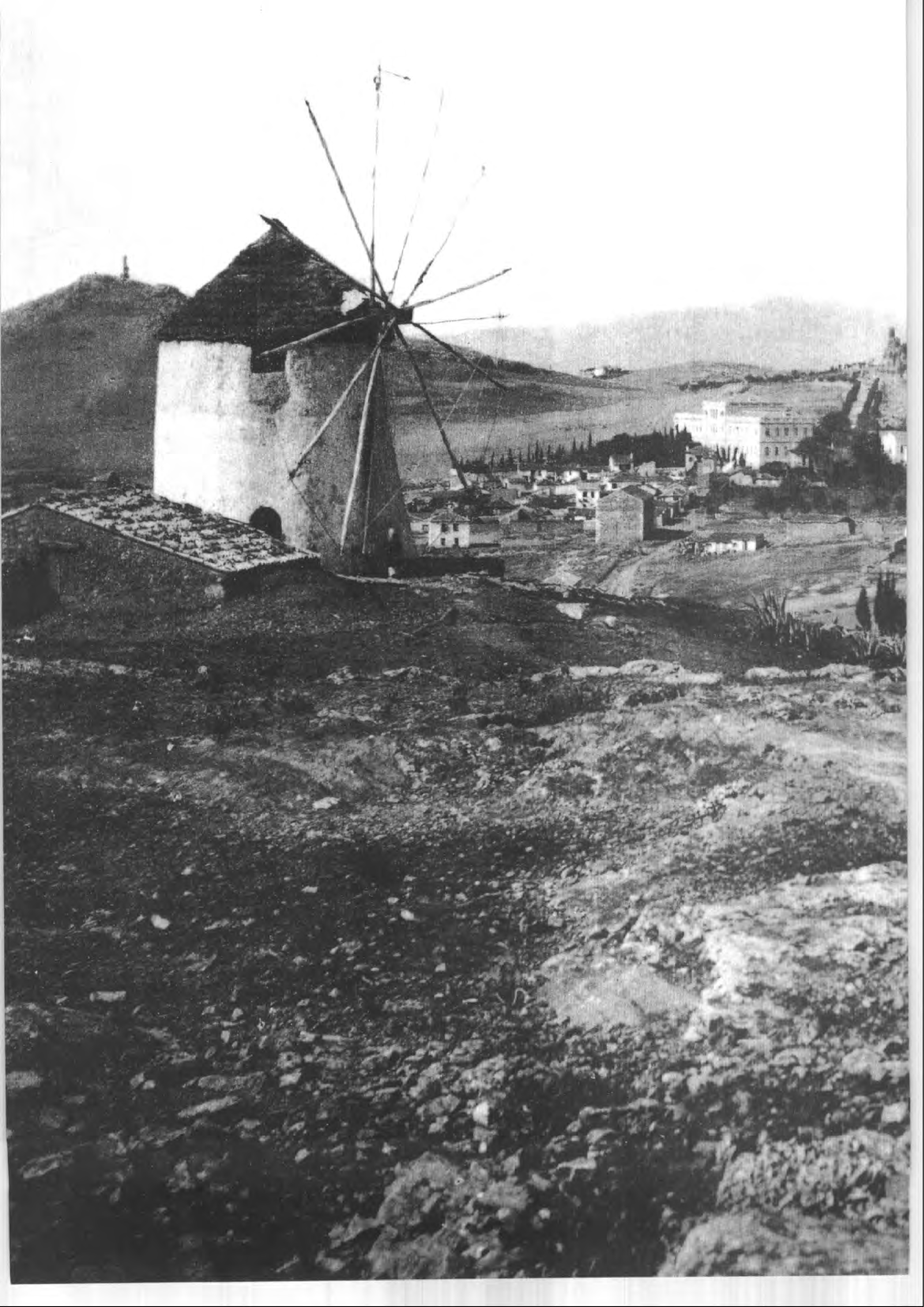
英语“辩证法”一词无疑也具有希腊词源，在词源上与之相关的“对话”一词也是如此。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在此，我要向我们的拉丁语遗产鞠躬——引起并促进与读者的对话。

从希罗多德《历史》的第一卷借用而来的一段虚构的对话，说明了本书想要讨论的许多主题。在公元前6世纪前半叶的某个戏剧性的时间里，雅典的梭伦（传统认为他是希腊最睿智的人之一）旅行到小亚细亚，遇上了众人皆知的、富有的东方统治者——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当克洛伊索斯问他谁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时，梭伦却给了克洛伊索斯一大段费解的回答，这个完全出乎意料且不太令人愉快的回答包含以下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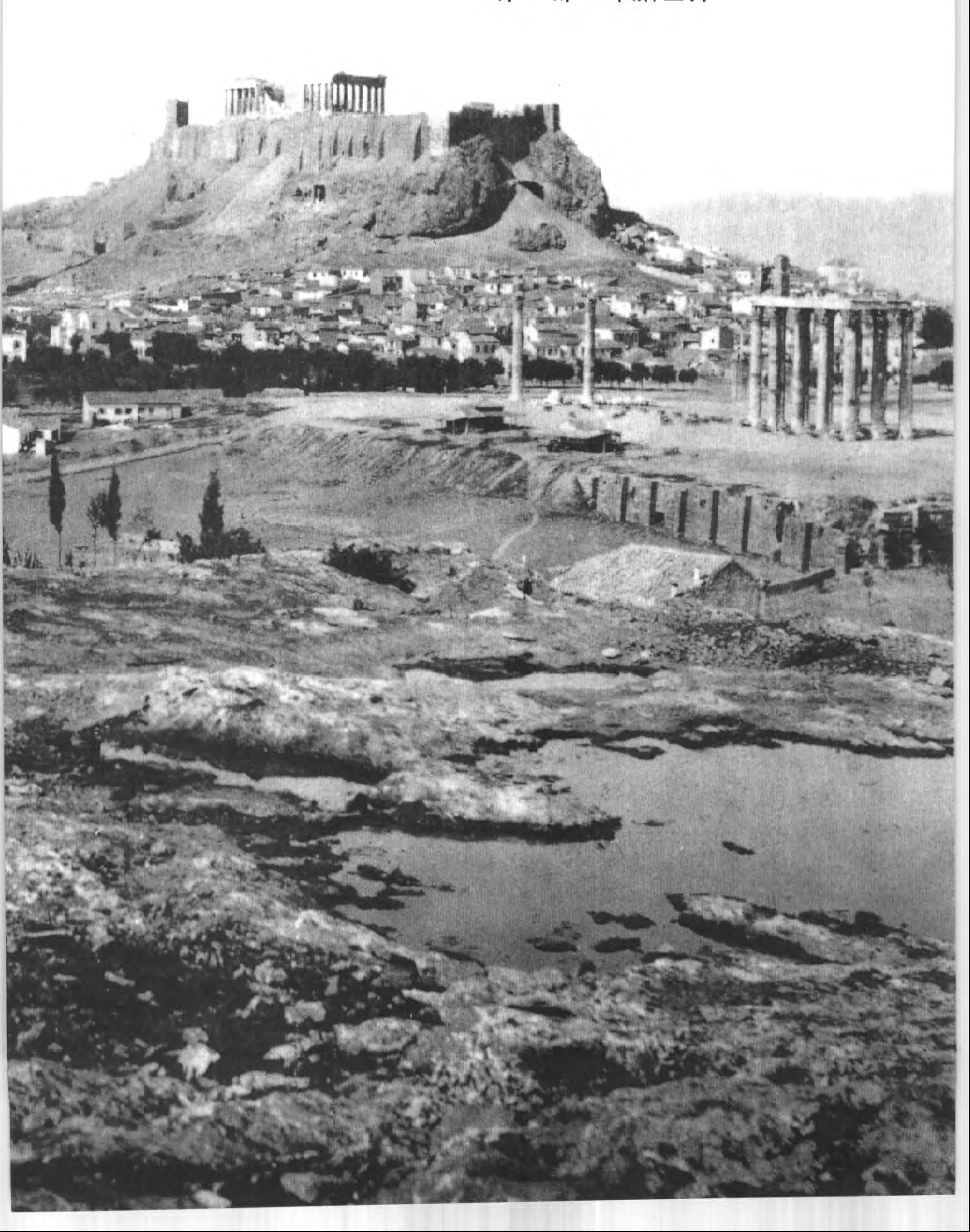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把世间所有的好处都占全了，就像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它自身提供所有好东西一样。不过，那些拥有它们并不断拥有它们，然后平静安祥地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我的大王，才可以获得您所寻求的名号。至少在我看来如此。但是，人们必须始终注意事情的结尾，因为许多曾受过神灵片刻眷顾的人终了却被他毁灭了。

这段清醒的告白谈及希腊人思想中的一种悲观情调，它强调人类生命和成就的短暂，也体现出古希腊人思想中的一股悲观压抑的情绪，但是它也许很值得我们思考。

小亨德里克·封·斯特恩维克（Hendrick van Steenwyck the Younger，1580～约1650年）所作“克洛伊索斯与梭伦”。部分因为梭伦的一些政治诗作流传至今，他成了第一个为我们所了解的古希腊政治人物。梭伦被委任为公共仲裁者，以解决在其故乡雅典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有效。梭伦被雅典以外的人誉为“古希腊七贤”之一，这种说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普罗塔哥拉斯》中第一次出现。



第一部　希腊世界



第一章 历史与传统

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古代手稿时而称他是“哈利卡纳苏的希罗多德”，时而称他为“图里伊”的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是现代土耳其西部的波德鲁姆，希罗多德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在那里出生。图里伊位于意大利南部，希罗多德在该城于公元前5世纪40年代中期建立之后的某个时间获得了公民权。雅典处于哈利卡纳苏和图里伊之间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希罗多德在雅典既找到了灵感又发现了现成的听众，在他把自己的作品在公元前5世纪20年代笔之于书以前，他口头向听众们传递自己作品的内容。这些“人像”或多或少是一种自由创作的产物（下图与下页图）。这尊那不勒斯半身像或双面头像方碑刻画着背连背的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它出土于提沃里，现在收藏在那不勒斯博物馆。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具有古希腊词源的英文词之一，它的原生义是“问询”。比如，在“自然史”的说法中就保存了这个含义。后来它引申为讲述有关过去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西塞罗（Cicero）[①]授予希罗多德“历史之父”的称号。但希罗多德的直接承继者与对手修昔底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不勒斯发现的他的半身像或头像方碑，把他同希罗多德永远连在了一起）却完全避开了这个词，把他自己的活动归诸于“记述”，似乎他是在撰写一份充分客观的、几乎是文献式的记录。

遍及整个古希腊罗马世界，在有关“历史”的词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议。希罗多德在其作品开头的句子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一种非神话的、非宗教的、“科学”的问询方法的继承人，要查清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这种传统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人泰勒斯（Thales）[②]。希罗多德的意向是不只转述对希腊过去的传统记述，而且还想考察有关过去的任何记述的证据基础。他以这种方式试图解释“希腊人与蛮族人（波斯帝国的非希腊人）彼此发生战争的原因”。

修昔底德选择了一个很不同的题目：一场希腊人之间而不是希腊与非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但他继续或者确切地说是发展了希罗多德对证据的批判态度。他明白无误地强调指出，由于人们的记忆容易出错，也由于信息提供者的偏见，即他们在采用关于过去事件的一种说法而不是另一种说法上存在利害关系，所以要得到过去的确切事实是十分困难的。他还优先注意因果关系，目的在于解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为何陷入彼此的战争，为什么整整一代人，时断时续地经历了一场空前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之后，斯巴达一方最终赢得了胜利。不幸的是，保存下来的修昔底德的著作突然中止，连最后一句也是不完整的，没有实现原来的编年目标，而希罗多德的著作却完整无损地幸存下来。



我们现代人所持的“历史”概念，是指对过去的一些重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演说家，曾在雅典学习，后进入政治舞台，一度当选为执政官和行省总督。他拥护共和制，被仇恨他的军阀安东尼处死。——译者注

② 泰勒斯（约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前6世纪前半叶），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出身贵族，热衷于对自然的研究，提出万物的本源是水的论断，在哲学史上被看做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首次表述，被称为“哲学之父”。——译者注

大史实所提出的批判性的、无偏无私的询问，是对史实所进行的理性的、客观的诠释，因此现代历史的概念，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留下的遗产，经文艺复兴（因佛罗伦萨人吉西阿尔迪尼把修昔底德视为史家典范）和欧洲的启蒙运动（吉本[①]偏爱希罗多德）传给了我们。但是，现代史学的主体与它的古希腊母体分离开来的界线在于对古希腊人钟爱的史料性质有不同的认识。

在19世纪，史学研究成为大学的一个专业科目，具备了一些必要的设置，如历史系、研究所、学术期刊等等。它把自身看做是“科学的”一个部门，如同“硬”科学部门（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一样，包括史学在内的艺术或人文学科也处处值得知识界的敬重。这种认识的基础在于历史学处理证据的专业方法：史学研究与写作的理想材料被认为是同时代的文献记录，具有可以验证的精确性和真实性。由此出发，过去的真实就能或多或少地被直接解读出来。人们认为，可供历史学家们使用的证据恐怕不能使他们像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阐释自然规律一样，以一种客观的确定性来明确表达人类行为的规律，但最细心谨慎的史学家若全力以赴（考据和重新考据文献史实，并根据客观与理性的原则解释它们），应当说至少能够对过去做出充分真实与精确的描述，以满足这一学科宣称的科学方法与科学地位的要求。

然而，事情并不像这样简单。历史——相对于过去实际发生的一切的成文史，始终是一种故事，没有两位讲述者能够准确地说出同一个故事，或者没有两位讲述者能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说出同一个故事。成文史或多或少总是一门修辞术，一种说服性的文学作品。它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是有选择的。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用话语再现人类过去的任何事件、进程或制度的全部。这不仅在实践中多半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做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如同在作为整体的建筑物的较为广泛的背景下，尚未区分出一个房间的目的或功能，便去描述那个房间中的每一件物品一样，是毫无意义的。

简言之，历史永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由于识别出第6夸克，可以对我们已知的宇宙世界的整个物质构成进行描述性的陈述，历史不可能是同等意义上的科学。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理由，历史不可能是以下意义上的科学，如在发现以往的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意义上，或对任何单一的或一组人类事件（对过去的任何一个社会造成了影响的事件）加以充分解释的意义上。无论史学家收集的史料多么全面，也无论他们在诠释史料时是多么谨小慎微，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

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包括4世纪的基督教历史

修昔底德同希罗多德一样，可能也具有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混合血统。他父亲名叫奥洛罗斯(Olorus)，是色雷斯王族。正如修昔底德本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在银矿储量丰富的哈尔基斯的潘盖昂山，拥有承袭下来的开采权。也如希罗多德那样，修昔底德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成了政治流亡者，度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但希罗多德是因为试图推翻亲波斯的僭主才被迫流亡的；修昔底德的亡命则是因在公元前424年受命驰援、当时他担任将军（实际上是海军指挥官），率舰在爱琴海北部游弋，结果遭受了一次致命的军事失败。



① 吉本（Gibbon，1737~1794年），启蒙时代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出身于富裕的资产者家庭，10岁时母亲亡故。继母的刻薄与父亲的严厉塑造了他内向默思、坚韧守恒的性格。15岁入牛津大学，中途辍学，从瑞士名师学习古典文献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后决心撰写罗马史，20年磨一剑，写出不朽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译者注

学家之前的所有撰写成文史的古典史学家们在内)，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与理解必然是不确定的、主观的，因为他们掌握的主要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书面文件，而是同代人的口头证词[1]。希腊人的确发明了一套字母符号(见第4页)，把它们应用于法律文献与其他公共文献的抄写。我们所知的最早的这类文献是出自克里特岛德莱洛斯的一项法律，时间属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但是，希腊文化在活字印刷的发明以及印刷文本的广泛流行前的年代里，基本上是一种口头文化。例如，他们用于“阅读”的词意味着“重新认识”，即认识文本中的词语，这些词语首先是用来听的。他们用于“读者”的词汇当中，有一个词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听众”。大多数希腊人是在听而不是读他们的文学作品或其他书面文本。总的说来，他们与书面词汇最紧密的接触是通过大声朗读。在这种前印刷文化当中，口头证据始终是探究以往的事实与意义的问询者获取材料的主要途径。

希罗多德

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文本传给我们，当然仅仅是因为它先是由作者撰写，继而由他加以传布，再由其他人认为值得复制的缘故。后来，在15世纪西方发现印刷术之前[2]，《历史》的抄本以某种方式收藏在王室、皇室或修道院的图书馆中。但正如这本书的文学形式和内里的证据所显示的那样，《历史》被设计成、也被人接受为一种口头述说。它的结构由长度不等、复杂多样的故事或logoi组成，它的布局和语言旨在让一个听众即刻就能理解，远比我们更适于一种社会性的而非个人的故事讲授的经验。同样，《历史》就形式而言是荷马式的。在题材方面，表面上看也类似于荷马史诗，因为它也描述希腊人和非希腊人之间的一场大战。希罗多德的一位名叫帕尼阿西斯的亲戚恐怕与此有关，他是著名的史诗作者，也许是从荷马本人（倘若真有荷马的话）开始的最初一批口头诗人中的最后一位。

帕尼阿西斯(Panyassis)是荷马风格的史诗作者中的最后一位。他是希罗多德的亲戚，可能是他的叔叔。他的名字的尾部assis不是希腊文，这表明他同居住在他出生的城市哈利卡纳苏里或该城附近的卡里亚人有某种密切联系，可能是由婚姻而形成的联系。

[1] 本书作者持相对主义史学的观点，否认史学认识的客观性。译者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后人尽管不能认识过去的全部的真，但可以认识部分的真，任何学科部门也不能认识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全部的真，物理学亦如此。此外古代典籍中也包含着档案文献式的史料或一手史料，经过后代史学家的去伪存真的证伪或证实过程，是能够求得真实的过去的，尽管不是过去的全部。——译者注

[2] 作者认为西方发现(discovery)而不是发明(invention)了印刷术。——译者注



一些希腊城市宣称它们是荷马的出生地，都自诩为荷马诗歌的家园，因为他是所有希腊人的“诗人”。当“被征服的希腊将凶猛的征服者变为俘虏”（贺拉西[1]的诗句）之后，荷马的“家”从希腊很自然地迁到罗马。这件著名的浮雕作品人称“尊奉荷马为圣”，是在罗马古道阿庇安大道上发现的，作者是希腊雕刻家阿尔凯劳斯(Archelaus)。他是普里恩(Priene)人，其创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在作品底部，荷马被刻画为坐者，两部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则被刻画成他的孩子，屈膝在他的两侧。他的身后是克罗诺斯（“时间”），一位带翼的男子。他的头部令人想起埃及国王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1～前203年），还有奥库米尼（人们居住的世界），她用一个象征着不朽的花环给诗人加冕。在荷马的前方有位年轻人穆托斯（神话）以及一位女子伊斯多里亚（历史）。

希罗多德还吸收了大量史诗以外的口头传统，主要是散文传统，尽管书写的散文形式属于相对较为晚后的希腊成就，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之前尚未出现。例如，希罗多德知道后来与假定的奴隶伊索相关的道德寓言。希罗多德确实提到过这个人，似乎伊索是一位与波斯大王薛西斯同样可信的历史人物。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也采用了大战的题材——他认为那是一场比荷马史诗描写的战争规模还要大的战争。但他的风格却很特别，足以表明希腊思想文化仅仅在大约一代

[1] 贺拉西（Horace，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著名诗人。希腊被罗马征服后，罗马贵族高度欣赏并模仿被征服者的文化。贺拉西的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译者注



人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这一点在雅典表现尤甚。希罗多德的风格是荷马式的，而修昔底德的风格是论辩式的。这是由于修辞学的发展而造就的一种风格，而修辞学的发展则有赖于法庭和公民大会正式辩论的需要或在非正式场合因哲学争辩与讨论的需要。这是一种适应阅读和一再阅读而非仅仅为听的风格。希罗多德谦虚并且不很明确地提出他的任务只是"讲述听到的事情"，转述流行的故事和传说。修昔底德则庄严宣布，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参赛获奖和直接取悦听众而写，而是为了垂诸久远的永恒目标而作，完全不考虑一时的读诵。

修昔底德基本上依靠口头证据，把口头证据当做他的主要史料，这一点与希罗多德没有多少不同。的确，正是由于他如此依赖口头证据，才把自己的写作严格限制在同时代的历史范围之内。这是一种他本人能够记忆和理解的那些年代的历史，或者说是他能够获悉近似的、一手的（或多或少是可信的）证据的历史。但这并不是他自设的惟一的限制。希罗多德在时间、空间中自由穿行，既谈非希腊人也谈希腊人的事务，对社会和宗教习俗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修昔底德却是仅仅着眼于政治势力的历史学家，主要体现在他对处于战争中的希腊各国冲突的表述上。但如果说他的视野比较狭窄的话，那么他的眼力也相应地比较敏锐深邃。他对可怕的内战条件或一个强权国家与一个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洞察，至今很少有人可以比肩而立。

色诺芬（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早期生于雅典）在日益激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长大成人。富有的家庭背景以及他的思想倾向使他加入了苏格拉底的圈子，但苏格拉底这派人的观点显然并不是拥护民主的。作为雅典骑士等级的成员，色诺芬在公元前404年至前403年发现自己参与了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斯领导的亲斯巴达寡头小集团的肮脏活动。更糟糕的是，他在小亚细亚充当雇佣兵一事致使他站在斯巴达一边与雅典作战。因为这个缘故，他自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开始流亡，至少到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才结束流亡状态。在亡命期间，他开始撰写一系列哲学、技术、教谕、自传类的作品，这是他被人铭记不忘的主要原因。

色诺芬

在修昔底德的直接承继者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另一位雅典人色诺芬。他成年后的生活有大量时间处在放逐之中。在自己的史著中，他也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他同时代的事件上，尽管他在评价所用的史料时缺少严格批判的目光，无论同修昔底德还是希罗多德相比都远为逊色。他的研究放在个人化的、道德说教的、派别的（反民主与亲斯巴达）生平行止上。他的作品虽冠以《希腊史》之名，但实际上主要涉及色诺芬本人熟识的伯罗奔尼撒事务。他是四位试图续写修昔底德因某种原因所迫而未完成的著作的史学家之一。如果说他的著作幸存下来，那不是因为它的历史敏锐性，而主要是因为后来的文学批评家正确地欣赏色诺芬那清丽自然的阿提卡（雅典）散文风格。他们期望近代学校的老师也能具有相同的鉴赏目光。

从一种观点来看，他在评论方面获得的成功导致他的竞争对手作品的失传，这又是一个不幸。他的竞争者之一，至少是一位堪与修昔底德相比的很有品位的史学家。幸运的是，埃及干燥的沙子保存了他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的某些重要残片（写在纸草纸上）。但他的身份还不能确定，学术界在其作品残片于法雍出土之后，只知他是"奥克斯里库斯的历史学家"[①]。

另一方面，色诺芬绝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叙述性的编年史写作，他还撰写了一部旅行见闻录、一些技术性的手册和关于其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论文集。大概其

① 佚名历史学家的史作残片共计约九百行，1906年发现于埃及法雍地区的奥克斯里库斯，所记内容属公元前396年至前395年的一些事件。——译者注

伊　索

《伊索寓言》故事集是一部编写作品，编写时间是在古希腊史上的罗马人统治时期。其中有些故事无疑是口传故事，甚至有可能是远古的故事。但是，没有一个故事能够有把握地说是出自伊索之手——假如真有这个人的话。关于动物的寓言可以追溯到近东，时间上当然要早得多。希罗多德最早提到有关伊索的生平故事，相信他是来自色雷斯（大约和今天保加利亚的位置相当）的非希腊人奴隶，被一个萨摩斯岛的希腊人伊德蒙斯拥有，当时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伊德蒙斯还拥有一位著名的妓女罗多琵丝，她在埃及的国际港口诺克拉提斯经营自己的商业，直到有个叫卡拉克苏斯的客户深爱上她，为她赎身成为自由人。这世界真小，因为据说卡拉克苏斯恰好是萨福的兄弟。这就有点儿太离奇了。

但即使真的没有奴隶伊索这个人创作或整理在他名下的寓言，在传统中也可能有一个把寓言同奴隶们联系在一起的真实的根源。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天然的弱者或文化上的弱者从来就不需要天然的强者或文化上的强者的启发。弱者利用自己的聪明机智至少能够把他们的痛苦减低到可以容忍的程度，甚至用寓言使他们的压迫者愉悦而改善他们的境遇。希腊世界成千上万的奴隶也许欢迎这样的信息，无论如何，希腊籍奴隶和能够很好理解希腊语的奴隶也许会欢迎这样的信息。

伊索的形象是残疾人，他属于另一个非常低下的社会团体的成员，这与寓言内包含的受压迫者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在这个现存于梵蒂冈博物馆的红陶酒杯的彩绘中，伊索看上去是一个瘸子，头部很大，正在同他笔下最有名的动物之一——狐狸交谈。

《伊索寓言》是与我们所了解的古希腊上流文学相对应的最著名的大众文学范本，但无论如何不是惟一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智慧、谚语和寓言等多种形式的大众文学作品也传给了我们。赫希俄德早期的教谕诗（约公元前700年）《田功农时》中，有关于鹰和夜莺的寓言——对强者的警告——就是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对于这类寓言，尤其是类似伊索寓言这样的以文学形式保存下来的寓言汇编，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它们不单具有文学、哲学或教育学的意义，还可能是贫苦卑微的自由居民提出的最大诉求。



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红陶[①]酒杯内里的绘画，所描绘的这个具有硕大头颅的人物无疑是伊索。与他对坐且似乎正在与他愉快交谈的是伊索最喜爱的主角之一——狐狸。它在寓言中被当做英雄——或者确切些说被当做无英雄气质的主角，比如在“狐狸与乌鸦”的故事中。

① 阿提卡是雅典统治的所有城区与农村的统称，位于中希腊南部。古代阿提卡的代表性陶器有红陶与黑陶，前者以黑底红色形象为表现形式，后者则以红底黑色形象为表现形式。——译者注

我们的博物馆(Museum)一词，源自亚历山大里亚的缪斯（Muses）神殿。该城有一个由托勒密一世建立的高级文献研究中心。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与中心分开的但又与之有关联的机构，也是由托勒密一世创办的。来自希腊化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和作家，被吸引到这个知识的圣地，其中包括北非塞勒尼人、博学家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他的绰号叫拜塔（Beta），因为他虽然学识广博，兼通众多不同的领域，但他无论如何超不过排名老二的位置[1]。在这两所机构当中，学者们确立了文本的规则，一份不大的样本幸存下来，经过沧桑岁月，传到我们手中。

(1) 在古希腊字母序列中，阿尔发(α)排第一，拜塔排第二(β)。——译者注



中最有趣的一部作品是他写的历史小说，或者说是一部虚构的色彩浓厚的历史。中心内容是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居鲁士二世）的功业（公元前559～前530年在位）。事实上，当色诺芬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构思《居鲁士的教育》一书时，现实中的波斯帝国正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很快它就面对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的威胁，随后便被取而代之。

色诺芬对帝国奠基人传记的兴趣，在另外一位修昔底德的承继者和亲斯巴达的政治流亡者、开俄斯人泰奥庞浦斯（Theopompus）那里得到了响应。他也写了一部《希腊史》，涵盖的时间自公元前411年至前394年。但他的更为原创性的著作是《腓力史》，这是第一部围绕马其顿王腓力（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个人生平所写的（同时代的）一部通史著作。

泰奥庞浦斯

据称泰奥庞浦斯是伊索克拉特（起初是演说家，随后是讲演稿起草人和政治性小册子的作者）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于雅典创办的修辞学校的学生。他建立的学校，要先于柏拉图建立的阿凯戴米学园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利希乌姆学校，是雅典的第一所高级教育机构，也是由智者或诡辩学者——教育的竞争者——发起的希腊学问与知识的专门化、类别化的进一步证据。伊索克拉特以一种典型的希腊人的竞争方式对他们加以指责。我们尚不清楚，伊索克拉特及其众多学生的理论，对公共事务的实际运行有哪些（如果有的话）直接影响，但它们对学问的影响却不会有人怀疑，只是不可能予以精确的量化罢了。无论如何，据称是伊索克拉特的一个学生是第一个写出“通”史的人，即从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不久开始的希腊史。

它的作者是库麦人埃弗鲁斯（Ephorus①），但这部史作的大部分原文却没有流传下来，传下来的只是其他许多作者著述中的对这部著作的引文或解释。其中最有名的引用者是西西里人狄奥多洛斯②。狄奥多洛斯是公元前1世纪问世的《历史集成》一书的作者，或毋宁说是编者。这个有些奇怪的书名大概是对希腊化时代③的知识家园——公元前3世纪由托勒密一世于亚历山大里亚兴建的——图书馆（Library）的认可④。

波里比乌斯

埃弗鲁斯的希腊史由于错误连篇，也因为这本书对波里比乌斯——有作品传

① 埃弗鲁斯（约公元前405～前330年），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一书，共30卷，现大部失传。——译者注

② 狄奥多洛斯（约公元前90～前21年），罗马统治时代的希腊史学家，代表作为40卷的《历史集成》，现存第1～5、11～20卷，是地中海世界各地的通史。——译者注

③ 西方学界的一个概念，意指亚历山大征服近东与南亚部分地区之后，希腊文化在其占领地的广泛传播。现在看来并不很准确，因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译者注

④ 狄奥多洛斯的《历史集成》亦可译为《历史图书馆》，A library of history，本书作者猜测其书名与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建立的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图书馆有关。——译者注

世的史学家当中，他是修昔底德的真正的继承人——的影响，它在有关希腊历史写作的所有故事当中，总是占有一席之地。波里比乌斯写了一部他称之为“实用的”或关于相互作用的历史。这基本上是一部政治史，涉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和他自身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时代稍前的时代的历史。公元前200年，波里比乌斯出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阿卡狄亚地区的麦加罗波利斯(“大城市”)，他不可能不对罗马征服狭小的希腊世界以及所引起的政治变革加以记录。的确，这是一个他本人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的过程。他从特权的、恐怕也是带有偏见的立场出发，撰写这个过程。按他的观点，由于罗马通过迅速在其周边地区和中心地带扩张帝国的势力，已经缔造出一个广大的政治世界。对此，波里比乌斯个人已体验到了。他把自己视为撰写通史的历史学家，要完成一部真正的希腊通史，而这是人们公认的他的前辈埃弗鲁斯所梦寐以求的事。

波里比乌斯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希腊史学家，尽管人们继续用古希腊语中的阿提卡方言书写历史，并且一直继续到公元6世纪的巴勒斯坦人普罗柯匹乌斯(Procopius)[①]的编年史。后者较有名的著作是他所称的《秘史》，这是一本有关由女戏子变为王后的提奥多拉所作所为的丑陋故事，同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很合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口味。这位喜好希腊文学传说的史学家对普罗柯匹乌斯写同代人、同代事的通史具有浓厚兴趣。比如说，《秘史》包括对540年君士坦丁堡大瘟疫的描述，这是对修昔底德关于雅典大瘟疫的著名描述的模仿。而修昔底德又吸取了先前荷马的经验，《伊利亚特》是以神降瘟疫到希腊人营地开篇的，原因是一次不虔敬的举动。

用希腊文写史的做法延至7世纪的埃及希腊人泰奥菲拉克特·希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为止。但在波里比乌斯之后，那些运用双语(既用希腊语又用拉丁语)治学的批评家们认为，最值得保存的是拉丁文史作而非希腊文史作，最重要的是撒路斯特(Sallust)、李维(Livy)和塔西陀(Tacitus)[②]的作品。当出自叙利亚安条克的安米阿努斯(Ammianus)[③]——一位操希腊语的当地人——续写塔西陀的《历史》时，他使用的是拉丁文而非希腊文，这意味着文字与文化的流变。

爱德华·吉本

吉本的语言功力(或缺乏语言功力)同文化的变迁一样清晰可辨，他被公正地誉为第一位研究古代世界的近代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所受的教育，无论是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明显欠缺的。然而，他却是18世纪的一位富有教养的

① 普罗柯匹乌斯(约500~565年)，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最杰出史学家，生于巴勒斯坦凯萨里亚的希腊裔贵族家庭，早年学过修辞学与法律，读过许多典籍，约在27岁时成为帝国军队将领贝利萨留的幕僚，对帝国宫廷与政治内幕了解甚多。公务之余，撰写了三部著作，其中《查士丁尼战争史》与《秘史》是两本内容有很大冲突的史著，前书中的明君和杰出统帅在后书中成为无耻之徒。——译者注

② 三人均是古罗马杰出的史学家，用拉丁文撰述。——译者注

③ 安米阿努斯·马尔凯里努斯(约330~395年)，罗马治下的希腊人，用拉丁文撰写了一部史书。——译者注

典型文人。他对希腊语所知甚少，虽然他表示过他喜爱古希腊语和谐悦耳的语音。他的确缺少足够的其他古语知识，而具备这些古语知识，对于今天想要充分撰述4世纪至5世纪之间的拜占庭史[①]（这段历史导致与伊斯兰最终发生冲突）的历史工作者来说，恐怕是基本的要求[②]。但幸运的是，吉本是极有造诣的拉丁文学者，因为拉丁文是他依据的大量较新的“证据”以及一手史料所用的语言。从一定意义上说，他还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最后一位人文主义者以及典型的他自己所处的启蒙时代的人。

就相关的近代语言而言，他读、说法语几乎就像是在使用母语。这使他能够直接接近由孟德斯鸠、伏尔泰[③]开风气之先河的社会学的历史研究法。这两个人尝试根据气候、政治、社会等广泛的环境因素而不是个人特性或神命来解释人类历史。但他始终不懂德语，所以他也不了解在史学研究法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不懂Quellenforschung（史料收集）与Quellenkritik（史料考据）[④]。

尽管吉本在批判性地揭露谎言、偏见或废话上不亚于任何人，但他却未能认识到：一件史料由于接连转手，离本真（法语是泉水的“源头”）的距离越来越远，作为凭证的力量也随之弱化。不过，他很早就能正确评价碑铭学和考古学——它们有时被称做辅助学科——的价值这一点，可以弥补史料上的这一缺陷。

实际上，碑铭学（对公共与私人的、正规与非正规的铭文的研究）不仅能补充而且能纠正书本上的记载。书本上的记载似乎对我们而言都是一手史料，但在其成文的那个时代，它们不过是二手的、派生的史料而已[⑤]。譬如，矗立于雅典卫城的一根大理石的石柱上，铭刻着一份作为一手史料的清单，记录着雅典附属国交纳的贡款数额，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更正了修昔底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的记载[⑥]。

此外，考古学没有必要，也不应讲述与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同类的故事。这一点对于较新型的考古学尤其适用。较新的考古学包括精细的区域田野考察（见第34页），而不是或者排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对于很有限的地区的发掘。比如，这种考察能够发现大量诸如土地使用方面的变化和人口统计范式之类基本经济问题的有用信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一本主要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史作，如果包含某些碑铭学和考古学的材料，如吉本的著作那样，它就有可能胜过没有这类材料的著作。

① 即东罗马帝国的历史。——译者注

② 吉本的不朽之作是《罗马帝国衰亡史》，其内容主要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本书作者认为吉本的古语言功夫不足。——译者注

③ 启蒙时代法国的两位伟大思想家。——译者注

④ 启蒙时代的德国史学家（哥廷根学派）最先对史料展开批判研究，提出与运用了史料收集与考据的新方法。——译者注

⑤ 此言不妥。古代典籍中有一些是同代人记同代事，尤其是在记述作者参与或目击的事件或人物时，其记述便具有一手史料的意义。即使是后代人记前代事，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作者的史料出自何处或何人之手，然后才能判断该史料的价值。——译者注

⑥ 其实是补充了（supplement）修昔底德的记载，并非修改或更正（modify）。修昔底德的有关记载并非有误，只是没有明确的金额与交纳贡款的国名细目。——译者注

比较历史学

20世纪史学写作最富成效的进步之一是比较历史学的发展。在这方面，研究古典希腊的史学家们令人羡慕。他们不得不深入考虑上千个分散的、往往是迥然不同的社会。它们位于整个地中海、黑海周边地区，具有不同的环境和历史条件。当然，存在着不同时空范围内的证据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但是，对于比较或对照而言，比如说就雅典和斯巴达的比较而言，二者均显示出极为鲜明的特色。它们之间可比较的地方几乎是无限的。

除此之外，还有希腊与某个外部世界或多个外部世界之间的比较。首先最明显的比较对象是位于中东的青铜时代诸王国，其次是与腓尼基和埃特鲁里亚城邦的比较[①]，最后是同征服并保留了希腊的罗马比较。希腊人同所有这些外邦人都曾有过重大接触，包括和平或战争的交往，并且是经济或文化交流的受益人。

当然，比较历史研究对于吉本是完全陌生的方法，但有一种自他所处时代发展起来的历史研究法肯定引起了他的注意，即利用视觉形象作为理解创作它们的那个社会的一个途径。这个方法特别适用于古希腊人，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形象意识的文化，几乎到处都是形象。虽然希腊字母相对简单，但希腊人大概并不都具备阅读和书写能力。无论如何，除了在雅典那样发达的民主制下的公民可能是例外，他们恐怕不会为了阅读或书写而被经常性地召集到一起，以便有效地发挥作为公民集体参与者的职能。与此相反，无论是在绘画陶器上还是在神庙正面以及在公民家里或公共广场上的形象，则广泛流传。研究古希腊文化和思想的现代学者们业已证明，这些形象也能被“阅读”，“读者”亦可从中受益匪浅。本书就充满了图像，我们假定它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只是为仅用话语述说的故事提供一种有色彩的背景。

简言之，如果说我们在今天像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人，可以在认识古希腊的过去方面比吉本看得要远一些的话，那么这多半要感谢我们扩大了的视野，懂得历史研究应该适当地包括哪些东西。

① 腓尼基人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狭长地带，在公元前2000年后期分别形成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小邦，如推罗、西顿、毕布罗斯等。埃特鲁里亚人是古代意大利中北部的居民，操特殊的语言，曾入主罗马，最终被罗马人征服，融合在拉丁民族当中。——译者注

第二章　环境

在亚里士多德为数众多，学识渊博的著作中，有一本《气象学》。他在书中写道：

在特洛伊战争期间，阿尔吉夫的土地是沼泽地，只能供养很少的人口，而迈锡尼的土地却条件很好（因此迈锡尼才出类拔萃）。但现在情况倒了过来……迈锡尼的土地已变得……干燥荒芜，阿尔吉夫的土地则变得果实累累。目前，发生在这个狭小地区的相同进程在整个国土上，在大范围内正在进行……

32个世纪过后，在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的《希腊史》第1卷中，他采取一种更为聪明的处理方法：

希腊土地的特别优越之处因此在于它的自然财富的特性……土壤和水、山岭和平原、干旱和潮湿、色雷斯的暴风雪和炎热的阳光，所有这一切对立，所有自然生命的形式，都以极大的多样性结合在一起，唤醒并推动人的思想。但是，由于这所有的对立又融会成一种更高程度的和谐，其中包括整个沿岸地区与诸多岛屿，所以人们不由自主地去实现对立之间的和谐。它激励自觉的生活，即在享乐与劳作之间，在感觉与精神之间，在思想与情感之间的自觉生活……

这两段十分不同的引文——一段出自公元前4世纪的著名希腊哲学家，另一段来自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显示环境对于希腊社会进化的作用，长期以来就是人们讨论的课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气候与地形被认为是其许多特定的历史发展的原因。从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兴起与衰落（如亚里士多德设想的那样）对希腊哲学思维的促进（如库尔提乌斯设想的那样），到一般的观念，即温暖的气候会刺激社交和辩论行为，从而提供了一种民主得以在其中繁荣昌盛的气候条件。

20世纪晚期，这种相当天真的环境决定论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也不能否认，希腊的气候与环境的确对于这个地区的居民及其经济和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的也是微妙的影响。

地理与气候

古典希腊的中心地带（大约与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领土相当）是一座半岛，大体分成两部分，由一道极其狭窄的地峡连接在一起，另外还包括爱琴海中相互联系的岛屿。由于东地中海地壳构造方面的巨大活动，才使得希腊中心地带的地形地



貌以山脉纵横为标志。结果，在希腊几乎没有什么广袤的平原，较大的平原主要是在希腊北部。希腊大多数地区的这种分隔特征，意味着整个希腊在迅速快捷的信息交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这个地带的气候通常被描述为“地中海”气候，意思是它有炎热干燥的夏季，寒冷潮湿的冬天。但是，即便是在希腊某个相对较小的区域，也能看到某些气候的差异，最明显的是在降雨量的分布上。由于半岛多山的地形，其东部的雨量要明显少于西部，导致在自然面貌与农业潜力上，各地简直千差万别。比如说，在爱琴海域的东边，昔克拉底群岛的岛屿之一基亚岛上的地貌便显得相对荒凉（但在该岛一些山岭上却有梯田的痕迹，表明岛上的某个地点曾有过精耕细作）。相反，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边，比如美塞尼亚（见第32页）就比较湿润，有较丰富的植被，因此也是较肥沃富庶的地区。

当然，就地理条件而言，古典希腊不只包括巴尔干半岛南部。为数众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诸如以弗所或米利都等著名的城市，依次排列在今天土耳其的西岸沿线。古风时代（公元前8～前6世纪）的人口迁徙导致希腊殖民地的广泛建立，远至南意大利、西西里（人称Magna Graecia，或大希腊）、北非和黑海地区。希

希腊不规则的地形可以追溯到东地中海地区戏剧性的地壳构造史。在这个地区，小块陆地之间的碰撞不断造成火山喷发与某个区域的上升或沉降运动。地震活动在今天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向“地震之神”或“大地之神”波塞冬祈祷一事证明过去也有同样的灾祸。这种地理变动造成的山岭构成了今天希腊地貌的一些最显著的特点。作为地理屏障，它们将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分隔开来，促使（尽管不是引起）一种政治“马赛克”——相对很小却独立自主的城邦的出现。山岭走向形成了贸易、交通和入侵的道路。穿越崇山峻岭的隘口成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和象征意义的地点，譬如北希腊的铁尔摩皮莱（温泉关）——连接山岭与大海之间的一处狭窄通道。一些抗击入侵者的战斗便发生在这里，其中最壮烈的一次是决死的阵地战，即公元前480年，一小队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斯巴达人及其盟友与波斯入侵军的殊死搏斗。



卫星图片显示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地貌。图中是夸张的颜色，以便突出表面覆盖的情况：浅绿和中绿是草原与落叶林，深绿色是松林，浅棕色是贫乏的灌木丛。图下部的黄色表示部分北非沙漠。图的正中是爱琴海岛屿。图左方是希腊，右方是土耳其。图上方中央的深绿曲线显示的是喀尔巴阡山脉。尼罗河三角洲（绿色）在图右下部。这幅图像资料是由（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局的气象卫星拍摄的。

腊人围绕地中海生活，用柏拉图那充满感情的话语来说“就像环绕着池塘的蚂蚁或青蛙”（载柏拉图的《斐多》一文）。虽然这些地区当中的每一个都有自身特定的地形与环境局限（例如，西西里和黑海地区的农业就比希腊本身要繁荣），但大多数希腊人生活在广泛相似的既定环境当中，既享受它们的一切有利条件，也承受它们的各种缺陷。

希腊的居民如何看待古典希腊的地形？个人与社会同环境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此外，在怎样的程度上，古典时代希腊的社会和经济事实上是由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在怎样的程度上自然环境塑造了希腊？



昔克拉底群岛中的基亚的景色，西北方向可见阿提卡的海岸。图中看到沿岸的现代村落位于古代城市科莱索斯的卫城脚下。在这个岛屿的许多山坡上可以看到农业梯田的痕迹。

古人关于环境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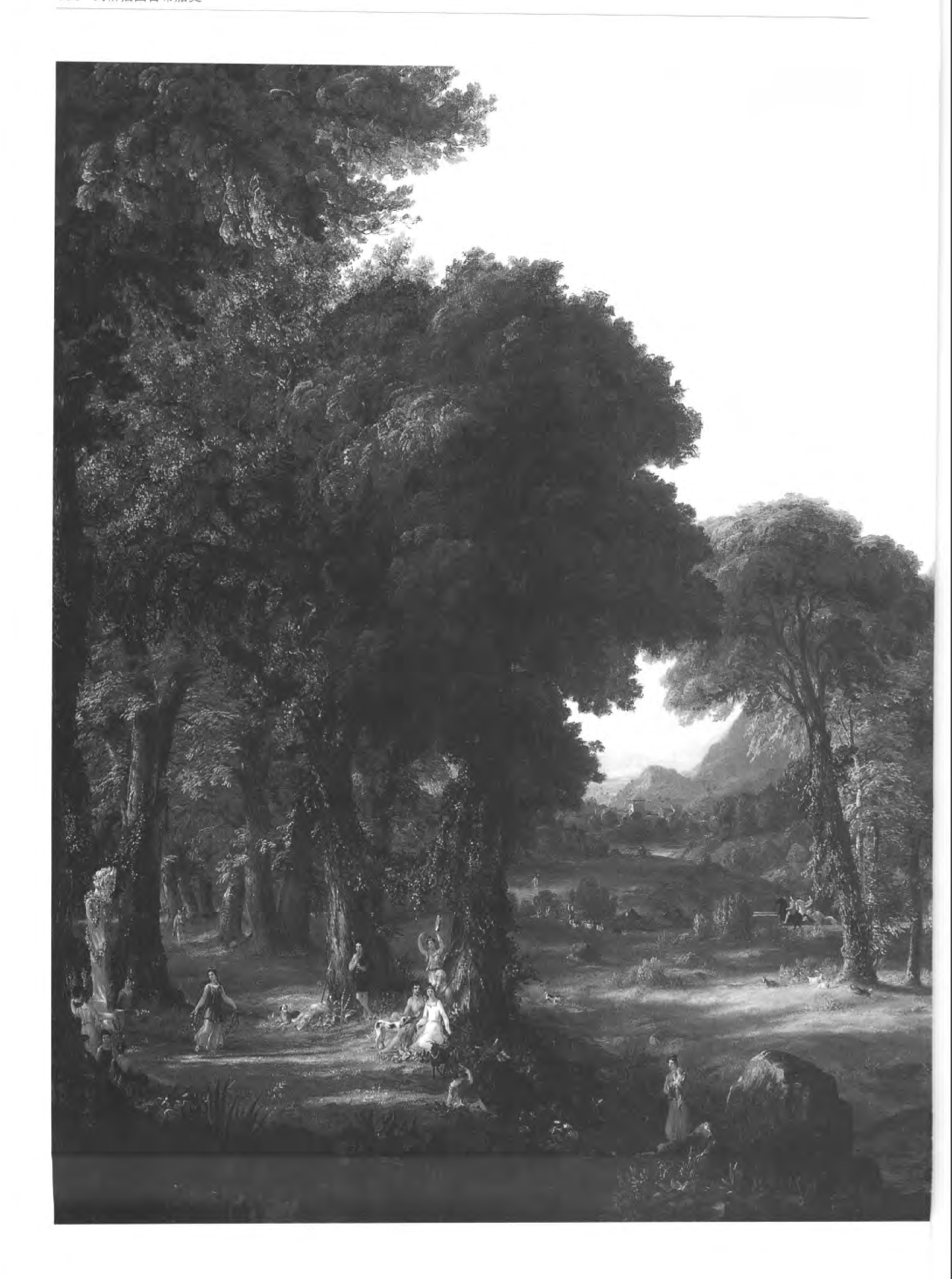
对于目前向游客兜售年历或明信片的人来说，这一点或许会感到奇怪，就是希腊自然景观秀美惊人，却没有成为古代文学或艺术的一个主题。虽然我们很难恢复生活在这种背景下的人们的目光，但他们对景色的"观察"与现代游客大相径庭却似乎是清晰可见的。一个基本的差别是对这里的神灵的认识与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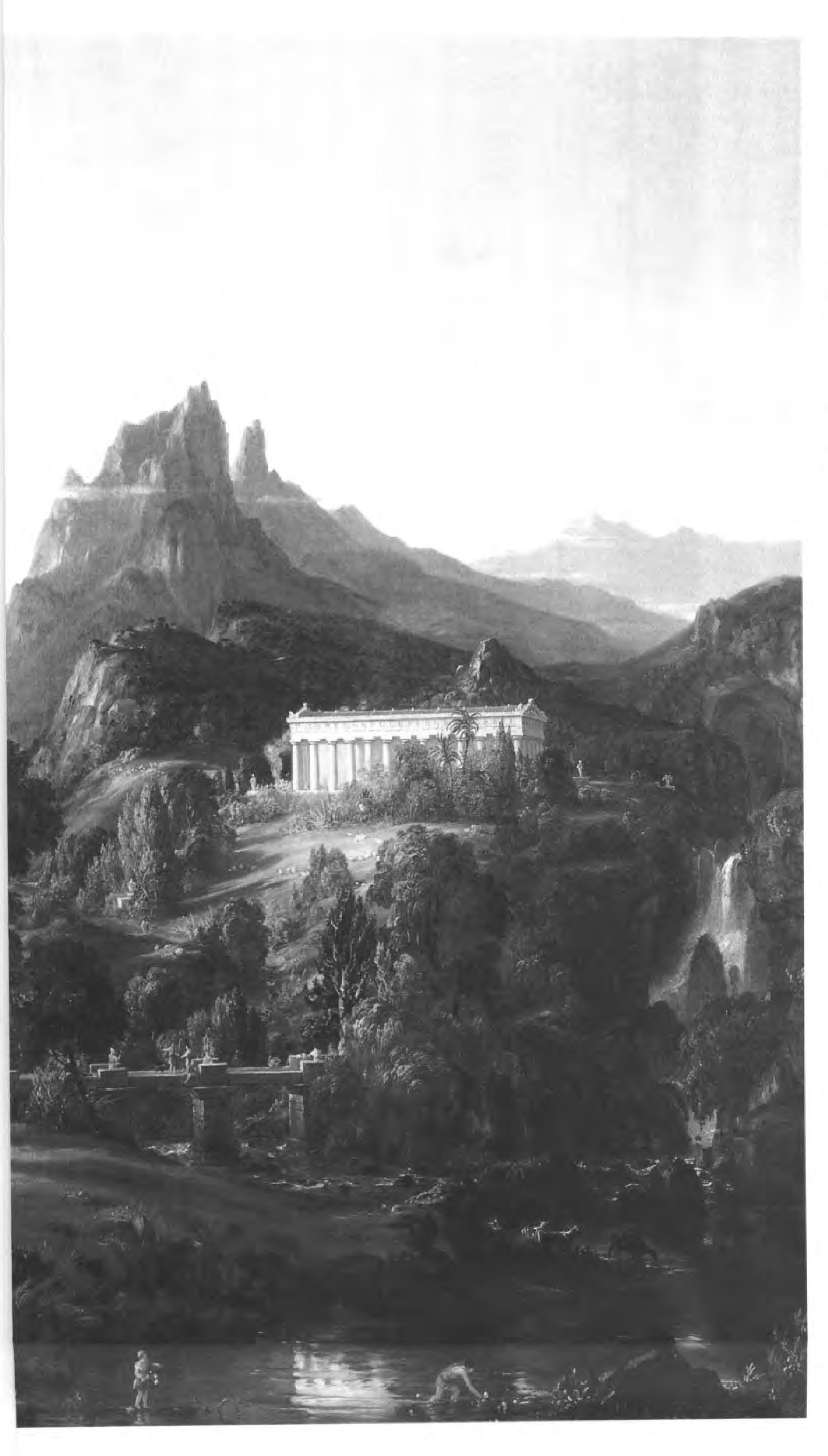
在希腊的景色中，到处都能见到对神祇的崇敬：在山顶上、在洞穴中、在泉水旁、在耕地里、在山坡上、在树林中、在石堆中（见第十二章）。在一些场合（但绝不是所有场合），神庙或祭坛就建在这些地点。

例如，阿哥斯的·赫拉伊乌姆(Heraeum)是女神赫拉的一座神殿，由阿哥斯人敬献。赫拉的这座神殿位于山坡上，俯瞰着阿哥斯平原。从那座城市（远处可见的）出发到神殿来朝拜，标志着阿哥斯人确立了对这个富庶的农耕平原的统治。

神话和传说也围绕着一些特定的自然的地形环境，因此有处形状怪异的山顶被解释为英雄彼勒罗芬的带翼坐骑皮喀苏斯留下的马蹄印记。当然，在这些山脉中，最著名的就是众神家园奥林波斯山[1]。希腊最显著的自然特点大概是露出地面很高的、平台状的石灰岩层，雅典卫城或"上城"便由此形成卫城，不仅用作防御的要塞和众多宗教建筑物的集中地（尤其是雅典娜·帕特诺丝神庙，即帕特农

① 位于希腊北部，山势险峻，高耸入云。古希腊人认为以宙斯为首的神灵家族居住在那里。——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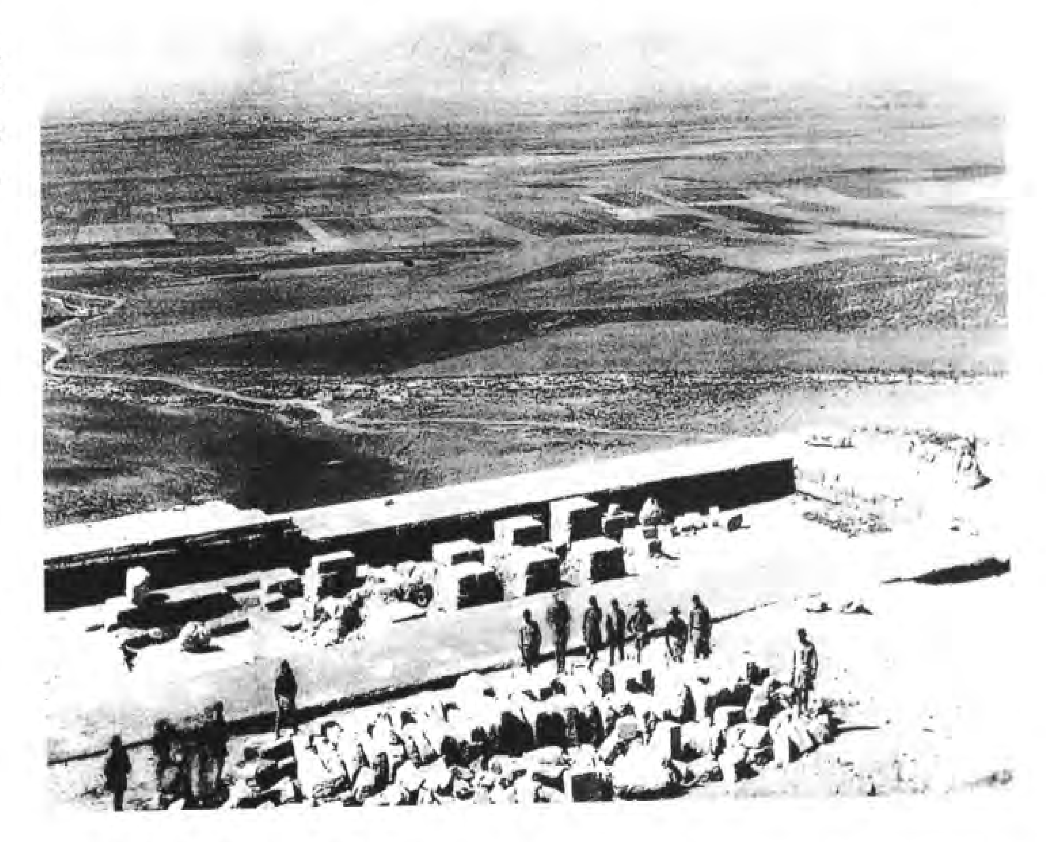




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01～1848年)的作品《阿卡狄亚之梦》。这是一幅具有浪漫色彩的对19世纪希腊景色的描绘。但一座远处的神庙却是宗教意义的精确反映，希腊人把这种意义赋予了乡间。当人们为众神的家指定一个地点时，希腊半岛的最高山——北希腊的奥林波斯山就成了众神的家园，于是传统希腊诸神家族有了"奥林波斯神"的名字。具体来说，奥林波斯山并非世界最高的山之一。它高9573英尺，大约是珠穆朗玛峰高度的三分之一。但是，在古希腊人的想像中，它是最高峰，众神正是从那里俯瞰红尘世界的。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的美塞尼亚的景观。埃伽里昂山脉静卧在远方。橄榄生产在现代希腊这个地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阿哥斯的赫拉伊乌姆，远处是横贯阿哥斯平原的阿哥斯城。这幅照片多半是在发掘这座神庙前后拍摄的，时间在19世纪90年代。

神庙），而且还是雅典历史上的重要神话事件的发生地点，譬如雅典娜与波塞冬为拥有这座城市而发生的竞争。倘若要求古希腊人解释他们的自然背景中有哪些重要的东西，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恐怕会毫不迟疑地强调宗教和神话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不是景色的美丽。



雅典卫城的石灰岩高台照片，威廉·斯提尔曼（William Stillman）摄于19世纪中叶。帕特农神庙在卫城上清晰可辨。图右方矗立的石柱是巨大的宙斯神庙——奥林匹昂的废墟，该神庙由罗马皇帝哈德良所建。

沉默的景观

古希腊人似乎并不重视——可能连提都没提过——从较为实用及生产的目的出发，利用他们的自然环境，也似乎不重视诸如农业或牧业之类基础性的活动。这对于绝对依赖土地来维持生存的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颇令人奇怪的沉默。对前工业时代人们所做的比较研究业已雄辩地证明，在这个时期的人口中，多达80%的人积极地从事农耕或食物生产活动。然而古代的史料却对农村的活动几乎不置一词。希腊城邦的这种矛盾现象（希腊人看来忽略了其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一般被解释为部分有作品传世的城市男性精英个人的偏颇。这些人既持有一种怀疑的观点，认为乡间缺少文化教养（乡间一词agroikos的意思是“住在乡下”和“土里土气”），又把他们自己在乡间居住视为理所当然。因此他们认为对乡间不值得评头论足。

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持续了很长时间。人们尊重希腊的艺术、文学、哲学与政治贡献，这使人们倾向于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希腊人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必须吃饭。但近些年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始对古代世界的实用生活领域表现出更多的兴趣。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各种可供选择的技术被用来探索希腊乡间生活的实际情况。这在地中海世界已变成一种交叉学科的共同努力，包括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孢粉学家（孢粉分析家）、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

考古工作无疑可以提供被文献资料忽略的农村卑微人群活动的细小证据。但不幸的是，古典考古学如同古代史一样，长期受到“沉默”的影响，只有微不足



正在进行中的对地表的考古调查。这支调查队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泛希腊的尼米亚神庙附近展开工作。其成员平行排成若干行，徒步走过这一地带，记录和收集人类过去的活动在地表留下的遗存（破损的陶器、瓦片）。在绘图并加以分析之后，这些发现物可以提供关于定居点与土地利用类型的重要信息。

道的希腊“普通”的乡村遗址得到发掘。令人颇受鼓舞的是地表考古调查的结果，这是地中海考古领域在方法上的一项创新。与调查一个特定的单一遗址及发掘有关遗址不同，这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的调查活动，旨在一片广大的地区内寻找人们定居以及其他活动的遗迹，调查面积通常包括数平方公里。在调查中，人们组成的队伍有计划地徒步穿过现在的乡间地区，观察、记录和收集地表的古物。众所周知，破碎的陶片具有耐久性，是最常见的发现物。但也可以找到破损的石制工具、屋顶的瓦片、农业加工设备，如石磨，甚至宗教祭品。当这些发现得到研究并绘制成地图之后，便可以构建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们在乡间生活与劳作的场景。

考古学家在解释他们的发现时认识到，如果以为他们所调查的、当前的地形地貌同几千年前没什么两样的话，那恐怕是天真可笑的。因此，必须与地质学家合作，尤其是与研究地形变化的地质学家合作。过去土壤的侵蚀与沉积，在许多情况下都与人的活动有关系，如平整土地和耕作活动，都可以通过地质考察予以

识别。其他科学家也参与了人类活动对古代环境的作用的重构工作。尽管希腊是相对干旱的国度，但孢粉学家们已发现并探测了某些长期潮湿的地区（如泉眼地带或湿地）。从这些地点钻取出来的深层泥芯可以看出，其中保存的花粉揭示了不同时期植物群落的不断变化。

例如，人们在希腊的孢粉记录中，观察到从橡树花粉占优势到橄榄树花粉占优势的转变。对人类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感兴趣的植物学家，业已研究了当代希腊的植被，放牧牲畜对环境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在现今希腊工作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对我们理解希腊的过去做出了贡献。虽然在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直接划等号是危险的做法，但对今天希腊村落生活的研究能够用来解释古代社会组织的情况。对传统农耕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构想出古代农民的生活状况。



一支由孢粉学家组成的队伍正在考察钻取的深层泥芯，取芯地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泛希腊尼米亚神庙附近的一片湿地。从泥芯中分离出的花粉样本已证明，这个地区多种多样的植物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

古典时代的地表状况

古典时代的大多数家庭大概居住在他们母邦的城市中心区。但这一点也很清楚，即农业“往返”——男人们白天到城外自己的田地上去，晚间返回城里——是一种习见的现象。农民精心组织自己的产业，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效用，所以大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蔬菜、水果）在他们居住地的最近处种植，而那些不必费多少心思照料的作物（橄榄树、谷物）则安排在远处的田里，这在当今希腊的大多数地区仍是通行的做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由于多种原因，如便于政治和娱乐活动，在需要时有多种支持的网络等，在城市居家过日子得到人们的青睐。

在对地表进行考古调查之前，人们集中而居的形态有可能是一种常规。而考古调查取得的最惊人成果之一则是发现了散布在乡间的袖珍古典遗址，其特征为精良的餐具、粗糙的厨具、房瓦与农业设备（磨石与石磨）。这些袖珍遗址迄今在所调查的希腊各地几乎都有发现，它们被解释为农舍或季节性的避难之所的遗存。在田地上生活，而不是往来于城乡之间，这就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耕作中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获得更多的收成弥补了未住在城里所失去的诸般好处。无论这



1974年在克里特拍摄的这张照片显示了传统农作方法在希腊的传承性。牲畜拖着脱谷滑板，滑板下面有锐利的燧石齿。滑板的压力与牲畜的践踏，有助于将麦粒与麦糠分离开来。

种农业结构是成年累月一贯制，还是仅仅在农忙的时节（如收获时节）才有，人们更愿意“忙碌”，因此居民在地表分布的范围较先前想像的要大一些。

这些小农户以及从远处来的城里人都种些什么作物呢？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主要食品通常被称为“地中海三元组”：橄榄、谷物与葡萄。

从青铜时代至今，这种饮食结构为地中海人提供了绝大部分日常所需的热量。古希腊人也种植其他作物，尤其是豆类，比如能够补充土壤肥力的埃及豆、赤豆。几乎所有农民都兼种这些作物，希望尽可能地保证其家庭的自给自足。每个农户根据农历周而复始地劳动，这样的农历是由公元前7世纪初期的诗人赫希俄德在其作品《田功农时》中以诗歌的形式提供的。诗中谈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营生：“当普雷阿德斯（Pleiades）——阿特拉斯（Atlas）的女儿们[①]在天空升起时[②]，你要开始收获；当它们正在落下时[③]，你要开始耕地……”

赫希俄德还强调家畜饲养在农民生活中的重要性：“首先，你要弄到一头耕

① 在希腊神话中，阿特拉斯是泰坦神之子，与偷天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是兄弟。普雷德阿斯是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的统称，一起变成天空中的七星（昴星团）。——译者注

② 约在阳历5月初。——译者注

③ 约在阳历11月。——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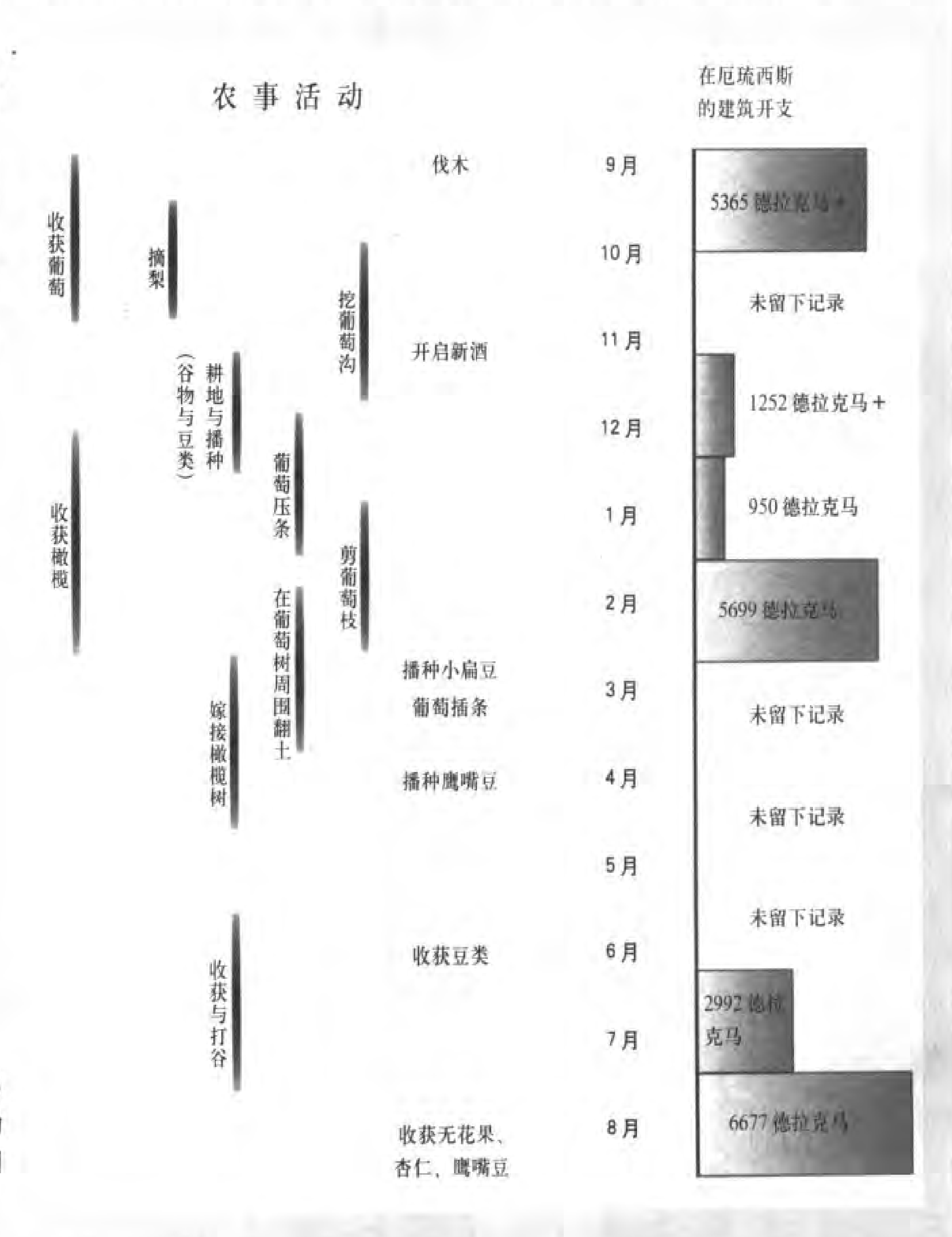
葡萄与葡萄栽培

葡萄与葡萄栽培在希腊人的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并不是夸大其词。农夫们一年到头经常忙活的一项工作就是栽培葡萄：种、锄、修剪、收获、踩碎、榨汁。葡萄酒（与水混合）是每个人（包括奴隶与孩童）日常饮食的必要组成部分。众多宗教节庆，如雅典的安特斯特里亚节[①]与狄奥尼索斯节，都是围绕着葡萄酒的生产与消费举办的。饮用葡萄酒或多或少地被视为文明世界的标志之一。

每个人都饮用葡萄酒，但并非人人喝同一种原料的葡萄酒。葡萄酒生产分为不同的等级。头一轮榨出的葡萄汁才能制出头等质量的饮料。如同橄榄油一样，人们认为头轮过后再经多次压榨出的产品越来越不合口味，最后一轮的榨汁只适合穷人和奴隶的需要。

虽然希腊到处都有葡萄栽培业，但某些地区的葡萄生产与出口已经明显专门化了。爱琴海北部的塔索斯岛就是这样的地区之一。人们发现该地制订了关于葡萄酒贸易的法律，时间属古典时代。有些违法的案例处罚的款项要献给城邦的保护神。考古学也证明葡萄对塔索斯经济的重要意义，特别充分的证据是双耳细颈陶罐（供贸易与出口用的盛装葡萄酒的大陶罐）的制作。

图表显示古希腊农作之年的周期性农事活动。建筑之类的其他活动的时间和劳动，主要是在周期内的某个农闲期间，如同在厄琉西斯的农业女神德墨忒耳及其女儿珀塞芬(Persephone)的神庙建筑支出记录所表明的那样。



① 安泰斯特里亚节(Anthesteria)是雅典人为酒神狄奥尼索斯举行的盛大节庆之一，时间在每年2月到3月间，持续三天。——译者注

这是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照片，一群山羊在牧人的驱赶下在向山地的夏季牧场转移。

牛……”（摘自《田功农时》）牛为犁耕和运输提供了牵引力，但因它们需要大量的饲料和水，所以它们并不是贫苦农民的家畜。马是希腊贵族的象征，同样属于代价昂贵、少数人使用的牲畜。但大部分农民，即使是最穷困的农民，可能也饲养一些绵羊、山羊、鸡、猪，甚至蜜蜂。有一些例子表明，这些家畜、家禽可作为农民食用肉的来源，在向神献祭之后食用。奉献牺牲是希腊宗教仪式的一项中心内容。然而，家畜禽经常给其主人提供副产品，如蜂蜜、蜂蜡和肥料。许多畜禽大概养在房舍旁边，为了便于为房舍旁的小块菜园及需悉心照料的庄稼施肥。这种在古典时代颇为流行的家养畜禽的粪便，突出地表明了农业资源与家畜饲养资源间的一种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关系。在古典希腊的野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放牧活动，包括远距离更换放牧场地。在走场[1]过程中，牧民驱赶着较大的畜群，根据季节变换，从一处草场移至另一处草场，通常是从山间牧场依次转移到海拔较低的牧场。按照剧作家索福克利斯的说法，婴儿俄狄浦斯曾被扔在彼奥提亚的基泰戎山中，后来被一位正在夏季山地牧场放牧的牧人发现并救了下来。山区以及其他杳无人烟的地区，还为捕猎野生动物提供了空间。对于希腊人来说，狩猎活动是一种充满情感的象征活动。此外，野味也给人们的饮食增添了美味可口的菜肴。

除了可耕地与航海资源外，希腊复杂的地质史造成各地分布着一些很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特别是黄金、白银、铁、铅和大理石。这些资源早在史前时代就得到开发，在整个古典时代以及后古典时代，采石业和采矿业曾持续繁荣。在深受欢迎的大理石资源中，包括阿提卡潘泰里库姆山中优良的白色大理石以及昔克拉底群岛中的帕罗斯岛出产的大理石。许多希腊艺术与建筑杰作就是用这些原材料制成的，直到今天仍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这些人类活动的多种形式——居住、农耕、放牧、养蜂、捕鱼、腌制、采石、采矿——同已得到公认的宗教实践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古典希腊的地表就呈现为一种非常充实、活跃的环境风貌。但身临其境的人们的生活又是如何获得安定与保障的呢？

不稳定的乡下

有些“定时炸弹”——既有天然的又有人为的——威胁着希腊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稳定。最不利的环境因素是气候。地中海气候的一个特点是降雨量逐年变化不定。一些特殊植物繁茂成长需要一定量的雨水（例如大麦每年需要大约200毫米雨量，小麦约需300毫米，豆类约需400

① 在我国内蒙古草原，牧民称这种随季节更换草场的做法为走场。——译者注

矿山与采矿

由于希腊人的采矿方法自古以来（到19世纪爆炸法引进之前）相对而言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很难辨认和分析特定的古代矿山的采掘情况。但是，坐落在阿提卡西南端的劳里昂银矿和铅矿却是例外。这些矿源是古典时代贵金属的最令人瞩目的来源，为雅典的民事与军事活动提供了无可竞争的财务基础。富有的雅典人通过承租获取开采矿层的特许权，为个人赚取财富，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雅典的经济发展。

当然，在社会底层是那些在劳里昂矿坑和隧道中挖掘的人们，他们也在洗矿的工作台旁劳作，并将矿渣堆积起来。可能几乎所有的矿工都是奴隶。人们对他们的人数虽然估计不同，但在采掘的高峰时期，在那里劳动的奴隶可能多达三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超过两万奴隶逃到斯巴达一边，其中有许多人可能是矿山中的劳动者。这样的逃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人们一般认为采矿业中的奴隶在恶劣条件下劳作和死亡的下层民众中，是处境最为悲惨的成员。

后来，在公元前4世纪，对金属的控制权保证了另一个崛起的势力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优势，这是指对北希腊黄金资源的掌控。据说潘盖昂山的矿场给马其顿王腓力二世提供1000塔兰特的岁入，这是一大笔钱，促使他以及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王[1]生出各种扩张的梦想。

在古代世界的金属当中，黄金和白银最受人垂涎，也受到人们最积极的开采。当然，最为经常使用和最容易发现的是某些价值小得多的矿藏，比如铁矿。铁矿储藏在整个希腊广泛分布。人们开发它们，用它们制作诸如农业工具、家用工具等必需品以及军事装备和武器。

(1) Alexander the Great一般被译为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起初是马其顿国王，后来虽建亚历山大帝国，但无皇帝称号，仍是国王。此英文名译为“伟大的国王”、“大王”较为适宜。——译者注

毫米）。一种或多种庄稼歉收是经常发生的事，而其间隔期是无法预测的。遇到严重的干旱时，一系列作物的收成都可能不足。更为复杂的是，在很小的范围内，降雨量就可能大相径庭。

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干旱或降雨会同时影响希腊大片地区，但有时，这种影响又仅仅是地方性的。虽然这个国度就一季或更多的季节来说，一般能经常获得适当的雨水，但在这个国度的一个局部却干旱缺雨。偶尔也有相反的情况发生：当整个希腊降雨不多，甚至干旱的时候，一个特殊地区却得到漫无止境的雨水。

（亚里士多德《气象学》）

如果说气候的不可预测性引起乡间生活的不稳定状态，那么人们的活动也造成了一些危机。战争可能中断农业周期，更令人感到沮丧的是对收成和农业设备进行处心积虑的破坏。但也应当注意到，古典时代的传统重装步兵的对阵似乎把这种破坏缩减到最低限度。古代军队不可能有时间和技术彻底摧毁敌人拥有的生命力很强的橄榄树和葡萄树。所以农业从这种破坏中复苏也可能比我们有时想像的要快些。然而，对于当地居民所造成的后果，包括心理影响，仍然是很严重的。最糟糕的也许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结合到一起的时候，比如一场大旱伴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两者可以说是希腊社会道地的风土病，很容易同步发生。

这些因素无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共同出现，都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即在希腊社会中，食物短缺现象肯定是周期性的，而且持续发生。依靠这样一些特殊力量的作用，上述事件在规模和严重的程度上是不同的，有时影响到家庭，有时影响

海洋资源

希腊各个地区以及希腊人殖民的地点都离海不太远。尽管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是古代世界食物生产的主要源泉，但人们也以各种形式对海洋资源进行开发。古代作家提到过吃鱼、吃甲壳类动物，以及捕鱼和买卖水产品；在瓶画中也有对类似情景的描绘。考古学家们已经发现了有关此类活动的一些不那么引人注意的痕迹，如鱼钩、鱼骨、软体动物遗存。不过，虽然许多希腊社区定位在沿岸地带，但我们不应对此加以夸大。地中海并不是渔产特别丰富的海区，没有现代的储存、运输鱼类的手段，把渔业产品运到任何较远的地方都是成问题的（尽管人们可以跑步将鱼从沿岸携带到内地，至少在训练一名奥运会冠军的过程中曾这样做过）。鱼类始终是一种辅助性的美味食品，虽说量很少，却也是一种美食，常作为其他乏味食物之外的一种与谷类、豆类有别的开胃小菜。



一团鱼钩，出土于阿哥利德南部的古典城市哈里埃斯。

除了食品之外，海洋资源还包括海绵和软体动物。人们从后者身上可以提炼出附着力很强的、著名的紫色染料。在海水存留的地方，经夏季烈日的烤晒蒸发，形成了盐滩，这样的盐滩遍布希腊的沿岸地带。许多这类资源同鱼类及甲壳类动物一道在当地出售，交换这些产品促进了希腊各地的商贸接触。大部分这种贸易可能是通过海路进行的，港口与海港设施发展起来，为这些商品以及其他商品提供交易条件。船只和海港还具有其他作用，当然是以较少互动的形式，比如说用于海盗行为与海战。最后也需指出，与其说接近海洋给希腊饮食和生活方式增加了一些特殊的产品，不如说更重要地是对希腊人本身以及希腊人与其他距离较远的地中海世界的海运业和交通提供了便利。

到社区，有时影响到希腊的所有地区。其中最糟糕的不是食物短缺，而是虽不经常发生但却可能发生的更为致命的饥荒——《圣经·启示录》中四位骑马者之一[①]。这些事件所引起的后果也多种多样，从勒紧裤带到明显可见的营养不良，直至因饥饿而死。极少数文献史料谈到地方性的食物短缺，尽管对饥荒情况（通常是战争）所作的某些痛苦的描述幸存了下来。对危机的宗教反应——祈求神谕、在某些神庙中增加礼拜活动或引进新神和新的礼拜活动——有时也能够在我们的史料中看到。比较切实的做法是古病理学家（研究健康和引起人口灭绝的疾病的学者）已开始借助骨骼遗存研究古代的饮食。虽然迄今为止从希腊的资料中还难以得出结论，但营养不良的痕迹（由骨骼与牙齿的发育中可看到）表明古典世界多半会周期性地出现这一问题。

① 《圣经·启示录》第六章羔羊揭开封严的六印，其中前四印均出现马与骑马者，标志某种人间世象。第四印揭开后现出灰色马，骑马人名作“死”，意谓带来饥荒、瘟疫、刀剑之灾。——译者注

这一切给了我们一幅生存环境颇为恶劣的画面，使它的居民过着一种缺乏保障的艰苦生活。这种看法与聚焦在希腊古迹与文化成就上的较为传统的关于希腊社会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古迹与文化成就提示我们，个人与社会一定找到了一些对付威胁（无论是对他们的个人安全还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的途径。应对机制有可能是基本性的，不显山不露水，比如储存多余食品以应付“多雨的日子”，发现多种保存食品的方式，种植一系列不同的作物（有些作物较其他作物更能适应气候变化），在一个宽阔的区域内分散耕种以便减少干旱少雨或其他灾难带来的风险。尽管一家一户的目标是自给自足，但为了生存，外界的定期帮助也是必需的。这导致了社会合作的产生，旨在需要时进行互助服务。人们采取的形式既有平等地位的人之间互利互惠的联系，也包括有权有势的富人与他们的被保护人之间的保护关系。赫希俄德就这些问题向农民提出忠告：“从邻人那里获得了一定量的东西，要公平地还给他等量的东西，或者更多，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如果这样做，当你再需要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毫不迟疑。”（《田功农时》）。古典时期在城区集中居住的人们更注重于这种社会联系。决定生活在一种能够很快获得支持的社会网络当中，而不是选择在乡间相对孤立的生活，现在成为或部分成为一种生存的策略。所有这些机制是——在传统的地中海社会仍然是——面对无法预测的希腊环境的基本保障。



金制谷物茎杆，发现于西西里岛的希腊殖民城市叙拉古的一处墓葬中。

然而，当这些机制失效的时候，或者当危机传播开来、邻人或保护人的援助不再可能的时候，就要采取更为重大的步骤了。对应的办法是各种各样的，它取决于危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首选的步骤包括种植产量小但耐旱涝的作物（如谷子）。寻找“饥荒食物”——野生食物是另一种选择。坚果和浆果始终是希腊饮食结构中的辅助成分，在饥饿时期，人们会去寻找和食用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切可食之物。希腊医生盖伦（Galen）在公元前2世纪的作品中曾谈到这种饥不择食的状况：

> 乡下人习惯吃山茱萸树的果实、黑莓、橡子以及杨梅，很少吃其他树种与灌木的果实。但是当饥荒席卷我们的土地时，橡子和欧山楂却很充足，人们把它们贮存在坑里，在整个冬季和早春时节，以此来替代谷物食品……
>
> （《论有益与无益于健康的食物》）

为较富裕的人打工或出售自己的家畜恐怕是随后的步骤（食品价格当然会随着短缺的持续而稳步提高），其后才可能是一些真正严重的措施，如出卖土地，甚至永久性的迁徙。其中采用的一些措施要比另一些措施的时间更长，有些则意味着陷入其中的个人生活永远不会恢复原状了。

这些应对机制更多的是在家庭的层面上实行，但大范围的社会也会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如同邻人在需要时互相援助一样，城市与其他共同体也建立起这样的联盟与关系，其关系的基础是不利的气候可能袭击某些地区而放过了其他地区[①]。雅典是我们拥有证据最多的城市，它采取积极的政治与军事步骤来扩大和保障其谷物供应，这也是造成它在公元前5世纪追求帝国利益的原因之一。其

① 作者的意思是没遭灾的地区对灾区伸出援助之手。——译者注

阿卡狄亚神话



阿卡狄亚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正中央，是一个高山环绕的崎岖不平的地区。它的古代居民在多样化的气候与环境的限制之下生活与劳动，偶尔还因此遭受灾害，这种地方性的气候与环境遍及希腊世界。另一方面，文献记载当中的阿卡狄亚，却是一个牧歌般的丰饶之所，牧人与农村少女、诗歌与音乐的麇集之地，爱是居民主要关心的。

这幅《阿卡狄亚神话》美化了欧洲人关于希腊的印象，它表明被认为是西方文明源头的这块土地看上去应当是个什么样子。作家与画家们浸润在古典神话和历史之中，想像着在宜人的良辰美景中发生的神话故事情节与显赫的功绩。画中景致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他们自己所在的北部地区，那里有比较温和的气候。当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开始到希腊旅行时，他们看到的景色一定令他们吃惊不已。正像著名的植物学家奥利弗·拉克汉姆（Oliver Rackham）所观察到的："法国或英国游客……期望看到英雄们在贵族的森林里用长矛刺翻野猪，看到居住在山林水泽的仙女在水晶般的喷泉中戏水。相反却发现真正的希腊充满杂乱的多刺橡树以及稀疏滴流的泉眼。他推测这块土地自从古典时代以来变得越来越糟。"甚至当面对真实情况的时候，艺术家们继续描绘自己想像中的希腊。

关于希腊自古代以来环境恶化的假设是颇为诱人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将古典希腊理想化，而不必接受其荒芜冷漠的外观。然而，我们并没有切实的理由认为曾经有过灾难性的衰落，或者说古希腊的农区景观与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巨大的差别。"阿卡狄亚"始终是一个想像中的地方。

维多利亚时期的画家J·W·瓦特豪斯（Waterhouse，1849~1917年）绘制的《希拉斯与仙女》图是把希腊乡间理想化的浪漫主义画派的出色范例。在有关阿尔古英雄们航行的神话描述中[1]，希拉斯是赫拉克勒斯[2]的侍从。在这次航行期间，他曾去泉边取水。泉水女仙因他英俊而爱上并俘获了他，把他拖入水中。瓦特豪斯描绘了这一遭遇的情节，但把场景放在更适合的气候温和的欧洲，而非古代地中海地区。

(1) 阿尔古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群英雄，曾经乘阿尔古舟去海外寻找金羊毛。——译者注

(2) 希腊神话中的大英雄，力大无比。——译者注



这张地图说明公元前4世纪塞勒尼（Cyrene）[1]捐赠的谷物，在希腊各社会中得到广泛的分配。有两个人——亚历山大大王的母亲与姐妹奥林匹亚丝和克赖奥帕特拉——这时也得到了相当数量的谷物（比给大多数城市的还多）。这些赠品明显提高了塞勒尼的声望，为该城的政治目的服务。

他城市也扶持市民个人之间的食品贸易，鼓励发展海外联系，打破与外界隔离的状态。

作为最后的手段，城市会“输出”饥饿的人口。虽然不能将希腊殖民现象仅仅看做是对食物短缺和饥饿的回应，但在某些例子中，很明显地包含着这样的因素。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铁拉岛（现代的山托里尼岛）连续七年遭遇干旱，岛上的树全都枯死，只有一棵幸存。这使该岛居民于公元前7世纪在北非塞勒尼建立了殖民地。

正像公元前4世纪由同一个塞勒尼所捐助的谷物赠品一样，食物最终可能成为国际外交和强权政策的筹码。这种赠与被看做是加深感情和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方式。在古代世界，当他国、他人没有粮食时，有食物的一方——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城市——的地位会大大提高。

环境的影响

以上的各种生存策略揭示：环境的压力塑造并促进了希腊社会的某些方面。古希腊的许多特点——城区居住、个人之间的交换网络和保护关系、城市间的联盟、海外联系与贸易、殖民——都可能与害怕粮食短缺、灾荒与饥馑有关，尽管不是惟一的原因。

(1) 位于北非的希腊城邦，由来自昔克拉底群岛的铁拉岛殖民者所建，建立时间约在公元前6世纪。——译者注



自然条件对希腊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已经发生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如果考虑到古希腊人本身的看法）似非而是的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人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自然景色方面的变化。自从欧洲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重新发现”希腊以来，有关这个国家的天然之美——它那辉煌的景色、星罗棋布的传奇般的废墟——已左右了我们的想像。

（上页图）位于阿卡狄亚的麦加罗波利斯城的剧场废墟前景，属公元前4世纪。这是希腊世界最大的剧场。其背景矗立着现代的发电厂。

早期旅行者对这种景色进行了描画，但基本上忽视了这个国家中同时代的居民，因为他们正热衷于自然的奇迹，比如山托里尼岛（当时的铁拉岛），或在历史与神话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如铁尔摩皮莱的山间隘口[①]。20世纪后期，阳光、娱乐和景致把大量游客吸引到希腊，使旅游业成为这个现代国家的主要产业。这导致人们对地中海气候的优缺点有了非常不同的看法。

撇开旅行者与游客不论，我们应记住，直至最近时期，许多希腊农民与农业社会虽然在农业技术方面有所改善，但仍然面临着同样的环境局限，继续面对同样的周期性的庄稼歉收，继续采用他们远古先人的应对手段。但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新的政治与经济力量（如欧共体）正明显地改变着希腊乡间的面貌，改变着其居民做出的决定。结果，传统耕作方法与传统生存策略在日益消亡，这是人类占据地中海地区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这些变化确实缩小了这个地区生活质量的负面成分，但也因为城市发展、旅游、工业化、污染而被迫付出代价。现在处于相对危险状态的不再是人而是环境本身了。

① 希波战争期间希腊联军与波斯军队在这一隘口展开殊死战斗，斯巴达国王李奥倪大与300卫士悉数战死，此地因此成为著名的历史遗址。——译者注

第三章　人民：谁是希腊人？

“标准”是客观的吗？

“谁是希腊人”是一个可以用不同方式回答的问题，它取决于具体条件与处理方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这也许是个种族的定义，或者说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定义。例如，头盖骨的尺寸与形态或许对希腊种族形态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分类。在这之后，按照进化或迁徙的理论，就涉及到历史上的其他地中海“种族”或欧洲“种族”的体质特点了。这种分类方法在今天显然是不足凭信的。它不仅缺乏适当的科学根据，而且在不久前还被用作种族灭绝的一种工具。种族最好是一个尽量避开的术语和概念。

另一个假定的客观处理方法是借助于语言系属的划分。迄今所阐释的最有用的语言学理论之一是关于印欧语起源的理论：广泛散布开来并经证明是由各种历史上的语言构成的印欧语系，具有共同的祖先，其中也包括希腊语。然而，在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一个民族起源的问题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假设的语言与种族之间存在同一性。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很难用任何标准——即便仅仅用一种语言的标准——把一个民族明确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种语言被大量的书面文本证实之前，有关使用这一语言的证据必然是推论性的，而且在没有文本的史前环境中，惟一直接的相关证据要由考古学来提供。铁铲是不会撒谎的，但它也不能自己讲话。于是，我们不得不让沉默不语的考古学资料说话，这就要再次用到推论和诠释。

第三种识别希腊人的方法既非生理的也非语言学的，而是文化的处理方法。这就是说，回到幸存的希腊文本本身中去，去看看希腊人认为他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在这里至少可以认为自己拥有更为可靠的根据。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陷入神话和传说的泥淖之中，它们被不断地修饰加工，以适应讲述者、写作者和听众们的特定需要；通常是为了提供一种人类学家布洛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称的“执照”之类的东西，意在证明根据某些所谓的初始条件或状态所做的现行社会政治安排是正当合理的。

文献史料

我们最早的文献史料出自荷马与赫希俄德，他们是这种尊贵的神话“执照”的执业人。赫希俄德的《神谱》的确是想把希腊人同宇宙的起源联系起来；荷马则主要是在歌颂希腊贵族，利用谱系模式来说明他眼中的希腊世界的人民与权力的现实分布状况。

柏拉图是在神话学这个学术概念（以及在这个词确实）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从



事写作的，他巧妙地评论希腊人的这种永恒的神话创作或神话制作的倾向："因为我们不知道古人的真实情况，所以尽可能接近于真实的近似虚构难道不是有用的吗？"（引自《理想国》）

我们并不想废弃看上去似乎是真实的谎言，但考虑到这样做在说明上的困难，还不如把我们自己限定在我们拥有的相对极小的事实（至少是可能性）范围内。例如，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希腊语的存在首次得到了证实，大概在什么时候用它来写作，使用的是什么书写符号和书写材料，什么时候确立了不同的历史方言，它们在文化上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不同的方言是如何传播到广大的希腊世界的（见第49页）。我们也知道希腊人赖以认同自身的希腊语及其他方面的非语言文化，同异族的交往活动影响到了这些文化。我们还知道希腊人如何也影响到他们的地中海与黑海沿岸的邻人。

青铜时代的克里特文明被亚瑟·伊文思（Arthur Evans）[1]根据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之名称为"米诺"文明。这一文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阶段。各定居点仍然是不设防的，这也许是来自希腊大陆的迈锡尼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这个地方的原因。但米诺人绝非彻头彻尾的性情温和之辈，他们在宫殿群内也开展危险的体育运动，如这幅壁画中所描绘的斗牛运动。出自克诺索斯。

线形文字B

线形文字B书写符号（这是一个现代的术语）使希腊语的存在首次得到证明，时间是公元前两千纪的后半叶。有两处宫殿遗址，即位于克里特岛南部的克诺索斯与卡尼亚，出土了带有这种书写符号的写字板。这些写字板是用粘土制作的，在宫殿焚毁时过火而变得坚硬。克里特岛也是线形文字A的故乡，但线形文字A尽管是线形文字B音节文字的前身，却与希腊文不同，它的语言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释读。

很明显，线形文字B在希腊大陆的宫殿（迈锡尼、提林斯、派罗斯、底比斯）中应用之前，是克里特岛上第一种适用于书写（但相当拙笨）希腊语的文字。但

(1) 考古学家伊文思是克里特文明的发现者，于20世纪初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发掘出传说中的米诺斯宫殿废墟。——译者注

表面上看，迈锡尼的统治者并不起眼，但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他们突然把自己安葬在精心构筑的坟墓里。墓内堆满了生前积累的宝物，与先前的情况简直大相径庭。有两座假定的王室圆形墓得到了发掘，其中的圆形墓A是较晚后的一座，由六个经过深挖、多次重复使用的竖穴墓组成。竖穴墓V〔这是海因里希·施里曼[1] (Heinrich Schliemann)给予的名称和编号〕的墓葬当中，有一具男性遗体，面部覆盖着图中这件精致的金面罩。易于兴奋的施里曼深受感动，声称他“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面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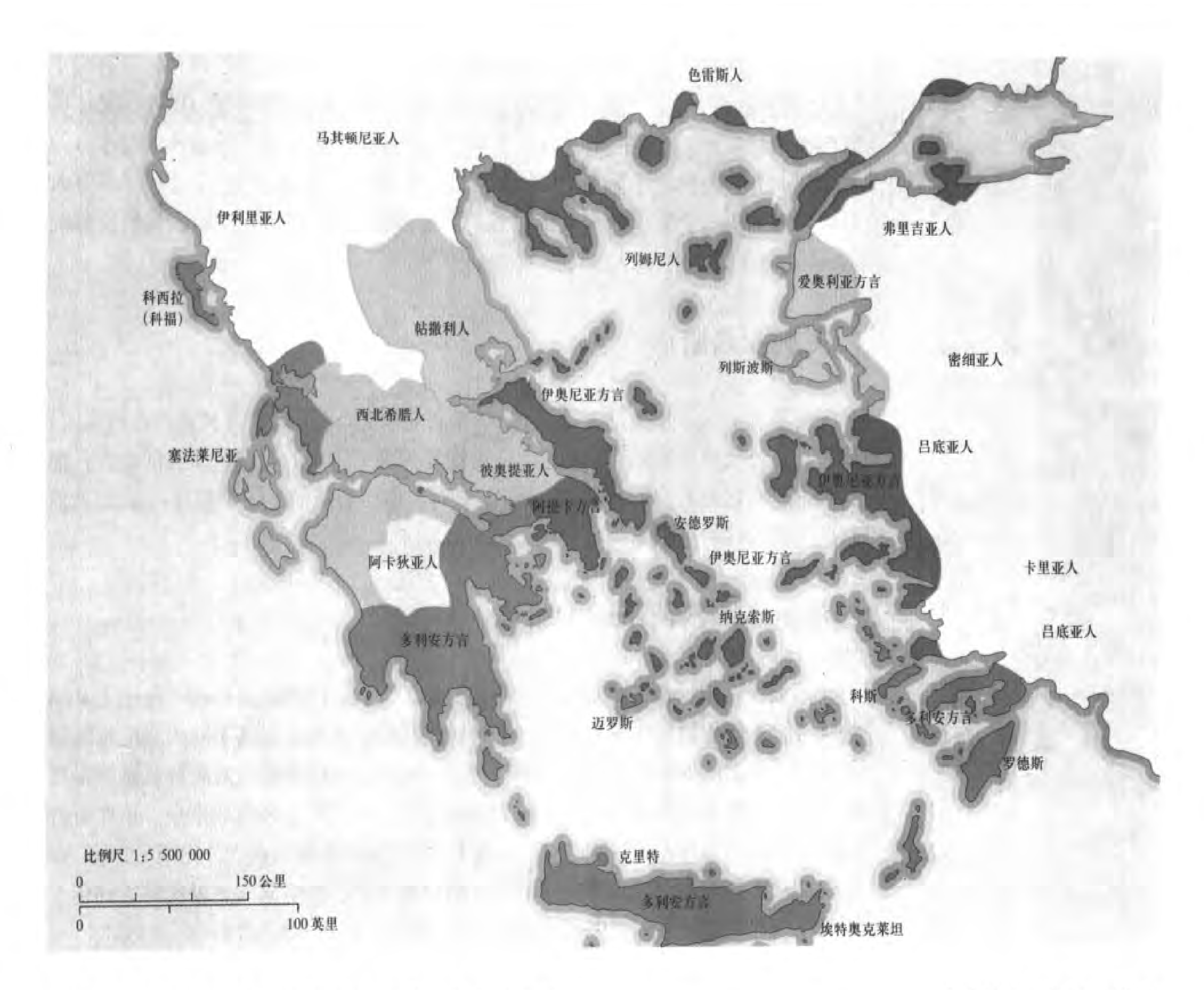


使用线形文字A的克里特居民（他们给我们留下来大量精美绝伦的工艺品）与线形文字B的发明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清楚的。希腊大陆人被称做迈锡尼人（根据荷马史诗中的希腊霸主阿伽门农的所在地——“富有黄金”的迈锡尼而得名），他们对克里特（克诺索斯的发掘者与复原者亚瑟·伊文思爵士依循荷马传说中的国王米诺斯而为之命名为米诺文明）的征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然而，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的上下文与内容使这一点显而易见，这就是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供行政管理使用的文字符号，并没有得到普遍应用。它的主要功能是记录一些经济事务，为“宫殿”中的统治者——类似于荷马史诗记载或虚构出来的阿伽门农和其他希腊国王那样的真实人物——的政治利益服务。

泥板文书是为了暂存而非永久储存用的。线形文字B符号除了“写”在泥板上之外，还“写”在或画在陶制器皿上，据推测是为了经济目的。在一些范围较大的遗址中已发现了这样的陶器。但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线形文字B符号所体现的希腊语如果当做口语的话，曾在极少数已发现的地点之外被广泛地使用过。线形文字B希腊文可能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行话，只有那些负责抄写的、特定的人才懂。无论如何，今天的专家们在解释这一早期希腊语或准希腊语（最迟在公元前1150年以后便消失了）与公元前8世纪以后出现的希腊语（它的清晰特点之一

(1) 德国考古学家，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和迈锡尼城的发现者。——译者注



古希腊语方言图。图中显示大约至公元前800年，在爱琴海域的希腊中心地带各个方言的分布情况。

是包含几种明显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时存在着分歧。

这些方言是分别产生的，其过程大约在公元前800年才完成，充分形成可能在大约公元前1150年迈锡尼文明的末叶和公元前8世纪初叶之间的这个时期。这是一个文化贫乏的时期，通常被称做“希腊的黑暗时代”，尽管一些亮点正在逐渐显现。这也可能是荷马史诗的成形时期，因为这类一般的英雄传奇在许多文化当中都曾出现过，或许是那些较早期的、使人感到很有成就的文明的残迹赋予灵感的结果。

伊奥尼亚希腊语

荷马史诗使用的语言，是德国人所称的Kunstsprache，即一种人为雕饰的混合书面语，从来没有在诗歌朗诵之外的场合使用过。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当代希腊方言学能够分类说明荷马所用的希腊语主要由伊奥尼亚方言的词汇与词形构成，同时也具有某些爱奥利亚方言成分，以及具有看上去更接近于迈锡尼时代的阿尔卡多－塞浦路斯历史方言的痕迹。

这三种分类名称中的每一个都在告诉我们有关它们自己的故事。伊奥尼亚是

指现在的土耳其西岸一带，那里坐落着一些拥有共同宗教崇拜的城市，并有一个“全体伊奥尼亚人”的崇拜波塞冬的中心（帕尼昂尼姆）。米利都与以弗所是这些城市中的佼佼者。正是由于来自这个地区的、操伊奥尼亚方言的希腊人与东方的各个强大势力与民族（亚述人和犹太人）经常接触，“伊奥尼亚人”才成了东方人对希腊人的标准称呼。希腊人的自我称呼是海伦尼斯（Hellenes），我们所称的Greek这个词出自罗马人的称谓“Graeci”[①]。

爱奥利亚希腊语

爱奥利亚位于伊奥尼亚北部，安纳托利亚西北，这里是爱奥利亚方言的家园。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定居在这个很可能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所在的地方，他们兴奋地将它命名为伊利昂（Ilion，荷马对特洛伊遗址的另一个称呼），以纪念他们祖先所取得的民族的伟大胜利。

阿尔卡多－塞浦路斯希腊语

第三种希腊语是“阿尔卡多－塞浦路斯”方言，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塞浦路斯希腊人使用的历史方言表明，它与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闭塞地带的阿卡狄亚人所讲的方言有着明显的亲缘关系。对此现象的最适当的解释就是假定操阿卡狄亚方言或准阿卡狄亚方言的大陆希腊人，迁徙到了塞浦路斯岛。正像考古证据所显示的那样，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与11世纪期间。公元前8世纪，有些住在塞浦路斯岛萨拉米斯的富有移民曾厚葬自己，他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使人认为他们在仿效荷马时代的做派。

为进一步说明阿卡狄亚方言与伊奥尼亚方言、爱奥利亚方言之间的区别（虽然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最可行的理论是阿卡狄亚方言通行在伯罗奔尼撒内陆的一个自身封闭的、相对难以接近的丘陵地区，比较容易保存共同的迈锡尼祖先的流风余韵；而后两种方言则是在黑暗时代[②]分别演化而来的。

迁徙理论

无论如何，上述观点并没有穷尽对希腊历史方言分布状态的解释，这里有两个原因。

首先，伊奥尼亚方言和爱奥利亚方言并不局限在小亚细亚西部地区使用，但在这里，荷马史诗完全有可能以较短小的叙事诗形式、经过几代人的口传，最终完成了里程碑式的整合。伊奥尼亚方言或伊奥尼亚方言的分支，在雅典的整个领土阿提卡以及在阿提卡与伊奥尼亚之间的一连串爱琴海岛屿上，也作为口头语。爱奥利亚方言或爱奥利亚方言的语支，流行于彼奥提亚和帖撒利以及希腊大陆与

① 指英语希腊人一词Greek。——译者注

② 即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至9世纪。此间没有文字记载，也几乎没有宫阙楼宇，希腊世界普遍处于贫穷状态。——译者注



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是受到腓尼基巨大影响的希腊殖民地。在大约公元前700年，它的统治者之一用“荷马”风格安葬。进入墓室要经过一个墓道，墓道中陈放着死者的战车和作为牺牲的马匹，两侧是大量陶器。墓室本身除了这些死者的火葬遗存外，还有大量夺目的殉葬品，其中包括死者的御座，上面贴有精工细作的透雕象牙板。其风格是腓尼基人的，受到埃及的很大影响——上面刻画了狮身人面形象，头戴意味着上下埃及的双王冠。

爱奥利亚之间的爱琴海岛屿上。如同阿尔卡多－塞浦路斯方言的情况一样，出自这两个地区的希腊人的向外迁徙，或许为这种方言分布形态提供了最方便的解释。这种迁徙只能发生在黑暗时代相当晚后的时期，甚至可能晚到公元前8世纪。这也是希腊人与腓尼基人发生接触的世纪，非希腊人提供的史料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接触引起希腊字母文字符号的发明，但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仍然坚持使用字音体系，而不是字母体系。

其次，伊奥尼亚、爱奥利亚和阿尔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在希腊大陆上留有一条空缺带，沿西岸从历史上的伊壁鲁斯到科林斯湾北岸，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其他非阿卡狄亚人。方言学家把这个地区分成西部希腊语的两个主要的方言语支。其中一个是西北语支，另一个是多利安语支（多利安人）。后者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其在北部的应用范围延伸到科林斯地峡。

然而，虽然——或者说因为——这种说法得到了晚后希腊历史神话的明显支

施里曼、迈锡尼与荷马

古希腊人是一个具有超常创造力和竞争力的民族，他们热衷于“第一个发现（明）者”的游戏。他们编写了每件事物——从陶器到鸡奸——的第一个发明者的名单，当然是竞争者的名单。假如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如他热切希望的那样，生为一个古希腊人，他无疑会发现他作为爱琴青铜时代考古的“第一个发现者”而上了某人的名录。施里曼通过经商致富，继承了“日耳曼人”那种与古希腊息息相关的浪漫情怀，找到了自己的投资途径，就是投到他心灵向往、代价昂贵且具有巨大破坏性的遗址发掘中去。荷马史诗的阅读对他这样做起了引导作用。他的目的就是想证明他钟爱的荷马既是历史学家又是诗人，只是做得多少有些不规矩罢了。

所以，他在土耳其西北部希萨尔里克的发掘，虽然正像目前的发掘所显示的那样，几乎可以肯定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遗址，但他对这座青铜时代晚期的整个城市却未做任何记录。此外，他还干了件令他声名狼藉的事，就是将普里阿姆[1]的特洛伊的年代定错了大约一千年。他还在迈锡尼、提林斯和奥尔克美努斯（假定是米尼阿斯[2]的宝库所在）展开进一步挖掘[3]，但他忽略了克诺索斯，这是因为土耳其人在他的特洛伊发掘中吸取了教训，没有授权他在那里进行发掘工作[4]。



然而，荷马史诗中的两座宫殿——墨涅劳斯的斯巴达和老聂斯托尔的派罗斯，直到20世纪都不仅没有被挖掘，而且始终未被人发现。事实上，人们肯定认出了墨涅劳斯的宫殿——如果说曾经有过这样一座宫殿或者的确是墨涅劳斯的话。但是，老聂斯托尔在派罗斯的宫殿则自从1939年以来就被确证无疑了。当时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布列根（Carl Blegen）掘出了“黄金”，或者毋宁说发现了宫廷的档案室。战后不久，多亏对派罗斯泥板文书所做的研究，泥板上的“线形文字B”书写符号（这是亚瑟·伊文思根据他在克诺索斯的发现所起的名称）得到了破译，所载为希腊语的一种早期形式。如人们所说，接着就是历史——“希腊

(1) 特洛伊的国王，其子赫克托和帕里斯在《伊利亚特》中，是希腊人的主要对手。——译者注

(2) 奥尔克美努斯城的建立者。——译者注

(3) 这些都是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王国。——译者注

(4) 施里曼将特洛伊出土的古物偷运出土耳其，使土耳其政府很是恼火，因此不允许他在克里特进一步发掘。——译者注

的" 历史了。这即是说，希腊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

但是，线形文字B是音节文字，不像利凡特[1]人（青铜时代晚期或迈锡尼希腊人曾与他们有过接触）已在公元前13世纪设计出来的字母文字。正像线形文字B的最终破译者迈克尔·文特里斯和约翰·柴德里克所估计的那样，它还是一种笨拙的音节文字，在希腊文书写方面简直勉为其难。所以，当这种文字符号在公元前12世纪至前9世纪的黑暗时代，与它为之服务的宫廷官僚体制及宫殿经济一道消失之后，并非一定是场文化灾难。公元前8世纪期间，希腊人通过与使用字母文字的利凡特人的重新接触，再次找到了书写工具，这就是他们借用并改造过的字母文字符号而非音节符号。这种立即得到应用的新交流中介的功能之一是可以写出韵文，有些学者认为这也许是希腊人首先采用字母文字的主要原因之一。

幸存下来的早期韵文的一个最佳例子，是涂写在一个陶杯上的句子，时间属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25年。陶杯的出土地点是那不勒斯湾中的伊斯奇亚岛。这个杯子本身有一段历史。它是在罗德斯岛[2]制作的，由一条大概是在优卑亚岛[3]建造的商船运至伊斯奇亚。伊斯奇亚岛上的殖民点无疑是优卑亚的希腊人建立的，建立时间仅仅是在这只罗德斯陶杯被运到该岛并作为陪葬品最终埋在那里之前的大约一代人期间。

无论如何，正是陶杯上的信息，直接告诉我们有关这些喜欢冒险、四处旅行的早期希腊人精神世界的最多情况。根据一种可能的读法，上面的三行诗文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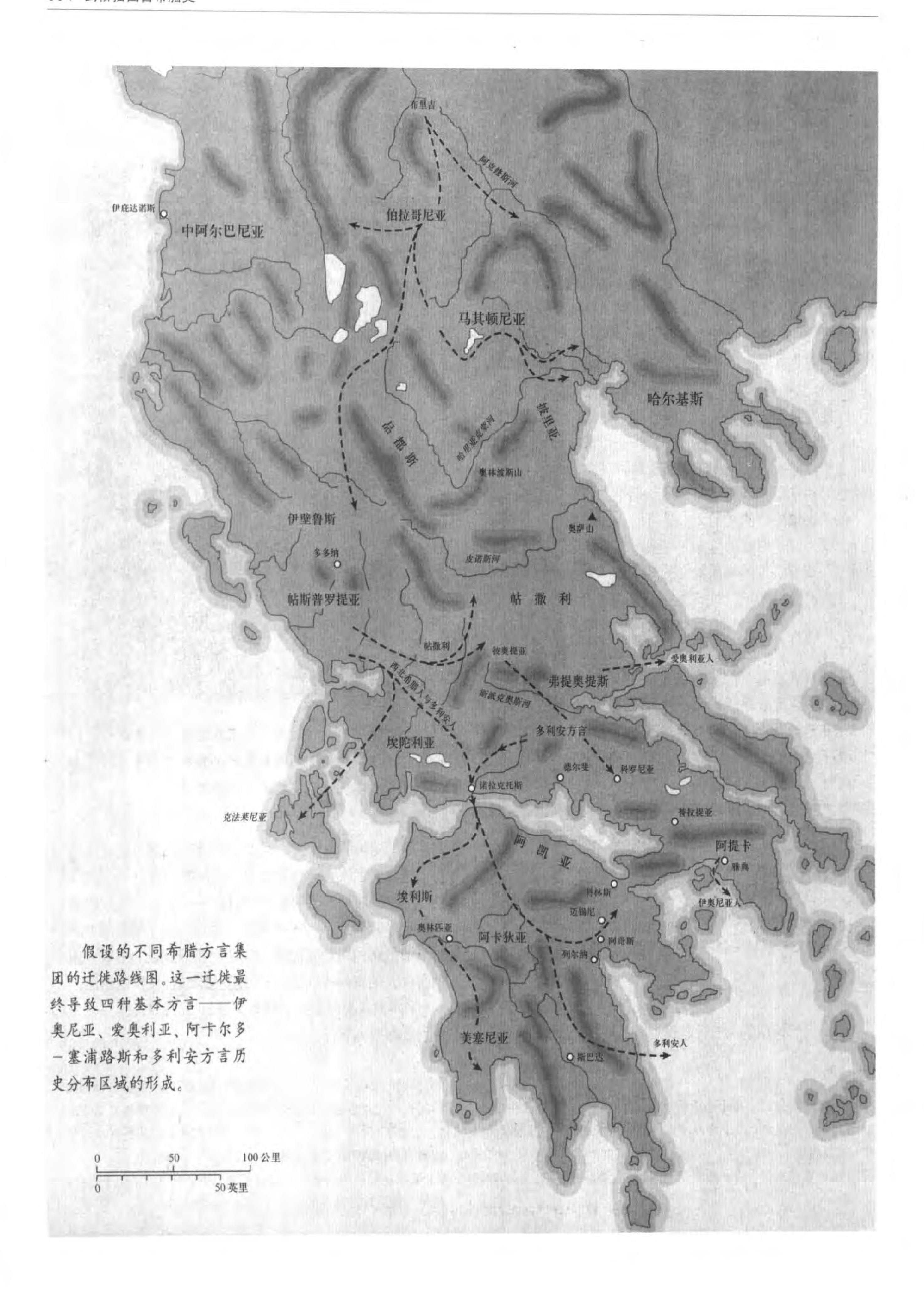
我是聂斯托尔得心应手的杯，
凡开怀畅饮之人，
都巴不得一下子被美丽无比的阿芙罗狄忒[4]相中。

三行诗中的头一行是长短格，但后两行则是六步格[5]，这是荷马史诗的韵律。虽然"聂斯托尔"很有可能是陶杯主人的真实名字，但也显然是对聂斯托尔之杯——如同《伊利亚特》第11卷所描述的那样[6]——的一种幽默的暗示。因此，至公元前720年左右，身处扩大了的希腊世界最西边的一位希腊殖民者，以这种并不显眼的方式，借助于伟大的史诗传统（这一传统把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同500年前或更早的先辈联系起来），已经自觉地强调了自己的希腊人属性。



线形文字B泥板文书，自派罗斯出土，属公元前13世纪。这块偶然烘干的泥板展示的是一份由表意符号与数字符号所体现的迈锡尼文写就的货单。

(1) 指地中海东部地区。——译者注
(2) 爱琴海岛屿，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附近。——译者注
(3) 爱琴海岛屿，位于雅典所在的阿提卡东北，由一道很窄的海峡与阿提卡分隔开来。——译者注
(4) 古希腊爱神，后来被罗马人借用，改称为维纳斯。——译者注
(5) 抑扬格或短长格诗源于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就表现形式而言，抑扬格诗比较活泼，具有讽刺诗的特征。它通常使用日常生活的大白话，运用一长一短或一轻一重的两音节组成的音步，形成特有的抑扬韵律，非常受大众欢迎。——译者注
(6) 聂斯托尔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老谋深算的国王之一，他随身带着许多精美的四脚酒杯。——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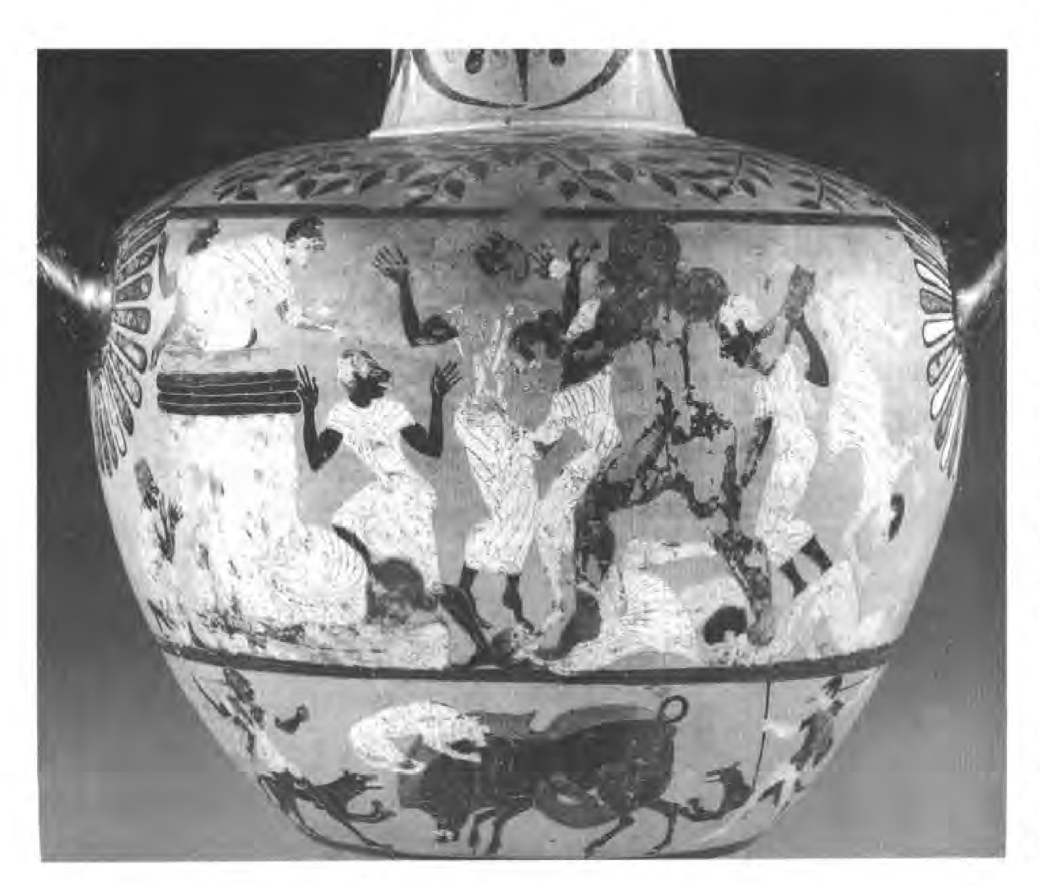
假设的不同希腊方言集团的迁徙路线图。这一迁徙最终导致四种基本方言——伊奥尼亚、爱奥利亚、阿卡尔多-塞浦路斯和多利安方言历史分布区域的形成。



公元前5世纪塞浦路斯由操希腊语的人和源自腓尼基说塞姆语的人分别占据，他们常常互相敌视。与处于爱琴海中央地带的希腊人不同，塞浦路斯岛的希腊人依然愿意生活在王国中。这块大约公元前470年代的青铜“板”来自伊达里昂王国。铜板背面以引行字符（音节而不是字母）记录着国王斯塔布基普路斯及伊达里昂城同一位名叫奥纳西路斯的医生及其兄弟们签订的合同。合同的背景是一次围城行动，可能是其邻国——腓尼基人的西提乌姆及其后台波斯人于公元前480年发动的。倘若奥纳西路斯及其兄弟无偿护理伤亡者，国王发誓将奖给他们现金或土地。为保证双方守信，这块铜板悬挂在雅典娜神庙中，由女神监督。但公元前450年，伊达里姆还是被西提乌姆征服。

持，它恐怕也有点过于简单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四种主要的方言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这种方言的差异，与在这个变换不定的时期里，许多分散的希腊小社会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例如，许多历史学家否认“多利安人入侵”（从北至南）的任何真实性，有些文献学家找到了原始多利安方言的线索，发现它们在线形文字B希腊文中已经出现。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对于身份的识别，方言本身毕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多利安人和伊奥尼亚人虽然因为某些独特的宗教和其他文化习惯而彼此有别，譬如



公元前6世纪末，来自东方希腊的一位也许是两位希腊移民艺术家，为资助凯莱城的埃特鲁里亚人绘制了一系列精美的水罐。本图描绘了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同埃及国王布希里斯（Busiris）[1]的自以为凶猛的手下厮杀的情景。赫拉克勒斯为英武的裸体形象，具有明显的希腊风格；而那些身着精致服装的东方人却不堪一击，惊惶失措。画家把脚踩失败之敌的埃及标准样式的法老肖像颠倒了过来。

[1] 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嗜杀成性，有一帮同样凶残的手下。后来布希里斯及其追随者均被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杀。——译者注

伊奥尼亚人的阿帕图里亚与多利安人的卡尔尼亚宗教节庆，但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之处远远超过彼此间的差异。说多利安方言的斯巴达人和操伊奥尼亚方言的雅典人完全能够理解对方的语言，阿里斯多芬的笑话所指的恰是这一点。再者，毕竟不应把方言同民族划分混淆起来，更不用说种族划分了。希腊人就是希腊人，无论他们是说底比斯人的爱奥利亚方言、希弗尼人的伊奥尼亚方言、罗德斯岛人的多利安方言，还是菲加里人的阿卡尔多－塞浦路斯方言。

"殖民运动"

希腊人口的迁徙运动还发生过两次，每次都带有方言的以及其他文化成分的含义。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750年至前550年之间，在现代著作中通常称之为"特定的殖民运动"。实际上，无论是"特定"还是"殖民"都是一种误导。古希腊人始终在地中海周边地区迁徙不定，寻找或参与新的永久性的定居地。这种活动并不仅限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殖民"一说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的大多数新的希腊定居地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并非帝国的前哨基地或它们母邦的附庸。然而，平心而论，正是这种向外扩展的人口移动而非其他因素，划定了"希腊"的空间范围，即从直布罗陀海峡延伸到黑海东岸，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麦加拉建立拜占庭的历史后果恐怕最为持久，但它还在较早些时候于西西里岛建立了一座麦加拉城，该城很快也成了一些殖民活动的发起城市。

引起希腊人的大批迁移的原因是"推""拉"因素的某种结合，依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埃特鲁里亚[①]金属的吸引力（他们的竞争者，作为商人和船主的腓尼基人也感到了这一诱惑），或者在利凡特或埃及贸易集散地所获利润的诱惑，对某些人来说举足轻重。对其他人则是国内的经济压力或政治灾难。现有证据很难使我们确定任何一个殖民点形成的决定要素。但考古学揭示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文化互换的复杂模式，尤其是在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有时弄不清一件物品是由希腊人还是由当地工匠制作的；有时非希腊人采用了希腊字母形式和其他希腊文化的外部标志，而他们的希腊邻人却并不因此认为他们少了"蛮族"味儿。

希腊北方的色雷斯人从居住在爱琴海北部沿岸的希腊人那里学到了希腊字母文字。图中是一件盛祭酒的银器皿，上面刻着铭文"Kotyos"，可能是男性人名Kotys的所属格形式，是在下葬前刻写的，时间在公元前360年左右。

至于文献证据，强调的是"殖民地"与"母邦"之间关系的情感性质，即所谓的血缘性质。在真正的殖民社会（例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一个殖民者家庭难以忘怀的东西是它在祖居国的根。在希腊，这种根源关系的维系却要靠宗教来不停地培育，即通过双向参与对母邦和女儿邦共同的节庆活动，或通过共同参与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披提亚赛会之类泛希腊或所有希腊人的节庆来加以维系。这些宗教节庆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已得到比较清晰的界定和认真的组织。



但这并没有阻止希腊人之间的彼此争斗。科林斯与它的女儿邦科西拉（现在名为科福，传统记载该城建立于公元前734年）据说是第一对彼此兵戎相见的

① 埃特鲁里亚位于意大利半岛中北部。——译者注



这件漂亮的黄金鱼制品，是在1882年于维特斯菲德——今天波兰西部的维塔斯科沃——发现的。它的制作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人们通常将它归属于"斯基泰－希腊"类型，意指由一位受斯基泰人思想影响的希腊工匠或更有可能是由一位受到希腊影响的当地斯基泰人制作。这种影响来自公元前7世纪中叶进入黑海北部地区的希腊移民。

母邦与女儿邦，时间是在科西拉建立之后的两代人之内。这种关系也没有阻止希腊人与非希腊人联起手来对付他们的希腊同胞。一个特别窘迫的处境是在西西里，希腊殖民者发现他们不仅彼此之间斗来斗去，而且还必须同土著居民西塞尔人互争雄长，同来自迦太基的腓尼基殖民者一争高下。腓尼基殖民者在非洲的母邦城市显示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意向，即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打算在军事上干预这座岛屿。

然而，截止到大约公元前500年，新的、扩大了的希腊"殖民"世界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希腊特征，这对一些英勇无畏的希腊城邦（名副其实的"希腊"城邦）抗击东方波斯的猛烈攻击正恰逢其时。

马其顿国王腓力与希腊

薛西斯大王①入侵希腊大陆失败几近一百五十年后，波斯反而成了被侵略的对象。腓力二世，作为刚刚征服希腊的霸主，准备入侵波斯帝国，打的旗号是要对薛西斯冒天下之大不韪毁坏希腊神殿的行为予以报复。腓力在亲自实行这个宏大计划之前便被人谋杀，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却在为时十年的征服战争中（直到他于公元前323年去世的那个时刻，这一征服仍未结束）为自己赢得了"伟大"的头衔。

最近在威尔格希纳和马其顿其他地方获得重大考古发现之前，有关腓力本人希腊化的程度以及他致力于促进和推广希腊文化的真实性受到明确的怀疑。但无论他和他儿子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亚历山大在征服事业上的成功却毋庸置疑。公元前3世纪及公元前3世纪之后，在遥远东方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竟有人说希腊语，希腊宗教和文化传入了印度次大陆。在靠近希腊的埃及和中东，除了巴勒斯坦某些地区是仅有的例外，都处于希腊人或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的统治之下。这种文化优势俘虏了在政治上最终征服希腊的国家——罗马，而罗马反过来也确保了作为西方遗产的希腊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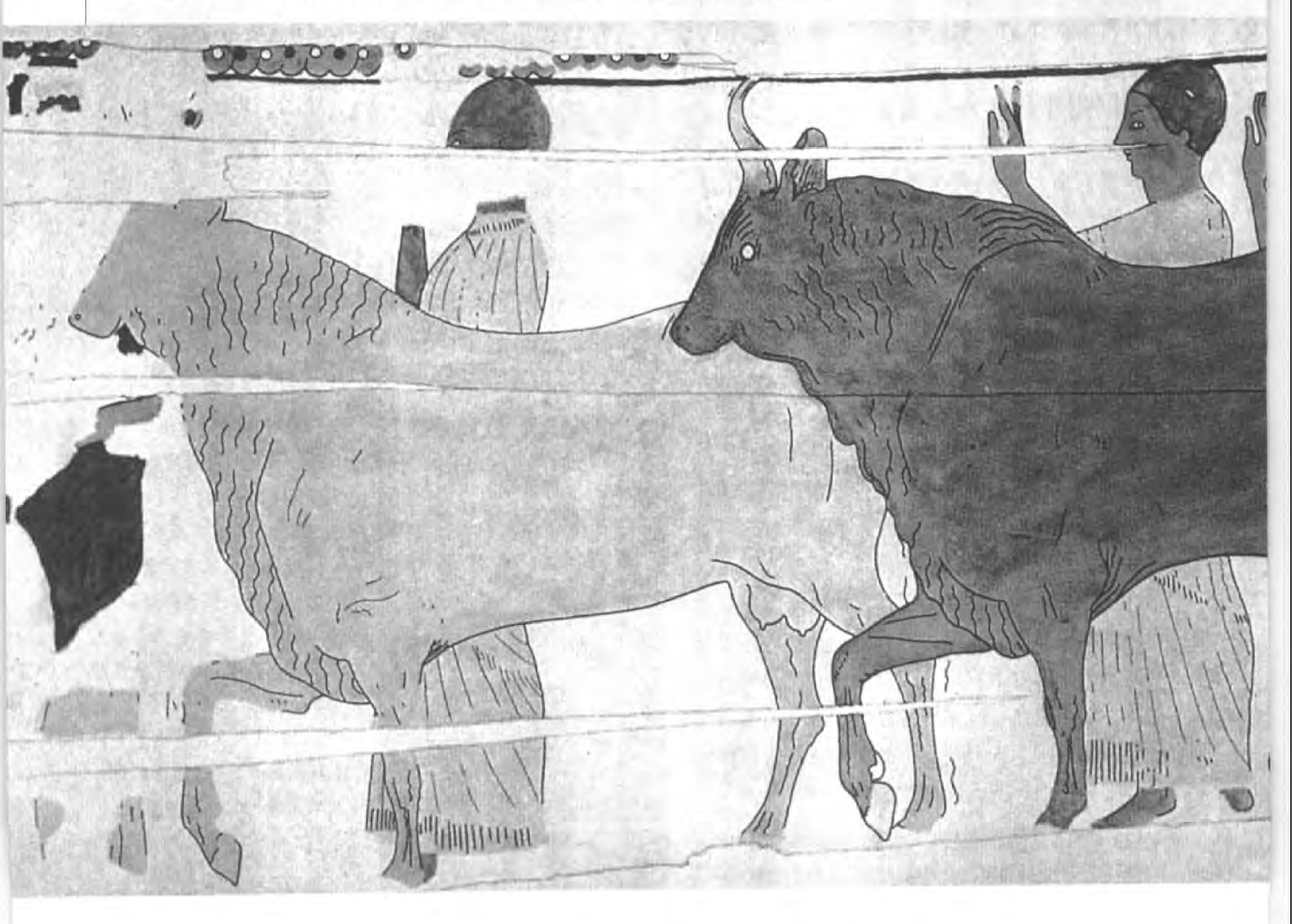
在位于威尔格希纳的人称腓力墓的精致墓室内，希腊发掘者发现了14个小象牙头像，似乎代表马其顿王室的成员。腓力因独眼而闻名于世。他的眼睛是在公元前354年围攻希腊城市迈松时头部中箭致残的。（左图）头像是法医学家理查德·尼夫（Richard Neave）根据在坟墓主墓室内发现的头骨残骸（显示眼窝处受到损伤）复原的蜡像。

① 波斯帝国国王，在公元前480年策划并领导了波斯第三次侵略希腊的行动，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译者注

希腊与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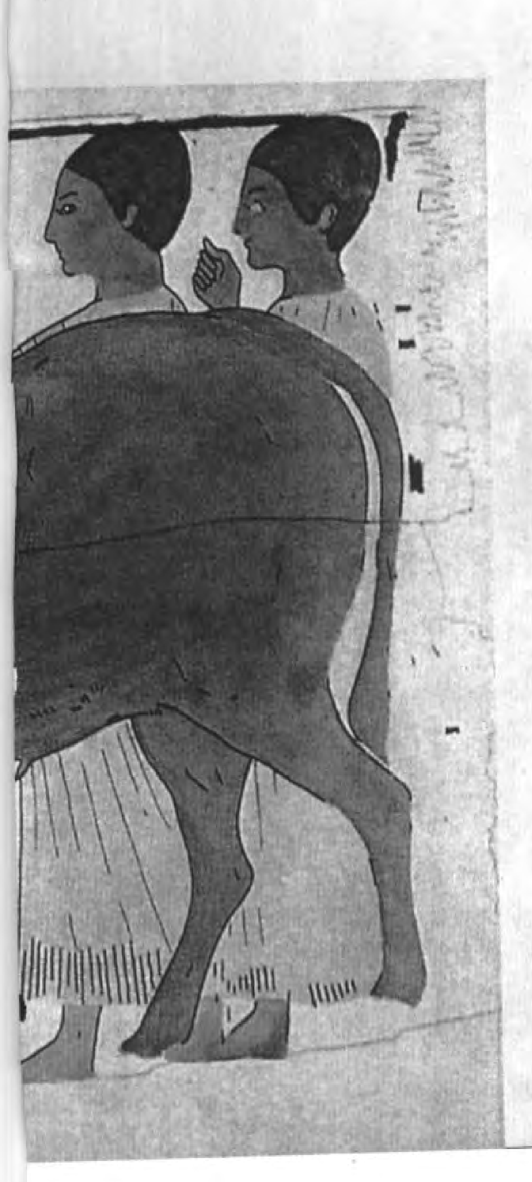
古希腊文明与文化在不同的时期里，同东方，特别是同埃及、塞浦路斯及中东其他地区的接触中，受到了重大影响。希腊人和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就有文化和商业往来，有个现代的思想流派甚至相信史前埃及是希腊宗教众神的直接来源。较为谨慎的说法是，希腊与埃及之间的相互联系在黑暗时代便终止了，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之前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恢复。在随后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对于希腊人来说，尤其是对于海岛上的希腊人以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希腊人来说，这种联系变得十分密切。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一个希腊人称之为诺克拉提斯的地方，还建立了一个希腊人的永久居住地。它首先是个贸易据点，是交换埃及货物和生产希腊手工制品的港口城市。这种贸易的实在结果是一尊妇女木制小雕像，发现于萨摩斯岛，由于赫拉神庙例外地处于水浸状态而得以保存下来。人们认为这尊雕像也许是表现了一位女神，并因此认为适当的解释是赫拉的雕像。

但即使早期历史时代的希腊人关于他们众神的思想及神祇特征的认识不是出自埃及，他们也肯定从埃及人那里吸收了用坚硬的石雕来刻画神祇与其他男性形象的特定方法。这尊腰缠遮羞布的花岗岩男性雕像（右外侧图）出土于卡尔纳克，属于公元前7世纪早期，但这种模式化的表现站立男性形象的方式，却是一种相当悠久的地方传统。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十个世纪里都能保持艺术风格一成不变，实际上是古代埃及的一个特征。究其原因，或许是人们感到改进某种在审美方面如此令人愉悦的事物是不明智或不可能的。希腊人却有不同的感觉，一种摆脱其埃及老师的因袭传统做法、逐渐趋向于自然地表现人物的明显变化，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雕刻中显现了出来。表现男性英武的裸像（但无女性裸像）也成了希腊雕刻艺术的特点。



（右内侧图）大理石青年雕像(Kouros)（约公元前610～前600年），近两米高。这尊典型的青年形象是为雅典的一处乡村墓地制作的。

（右外侧图）这尊用绿片岩雕刻的宰相巴肯莱内夫的形象，是希腊雕刻家赖以仿制埃及风格的最后样本，作于法老普萨姆提克（希腊人称普萨迈提库斯）一世在位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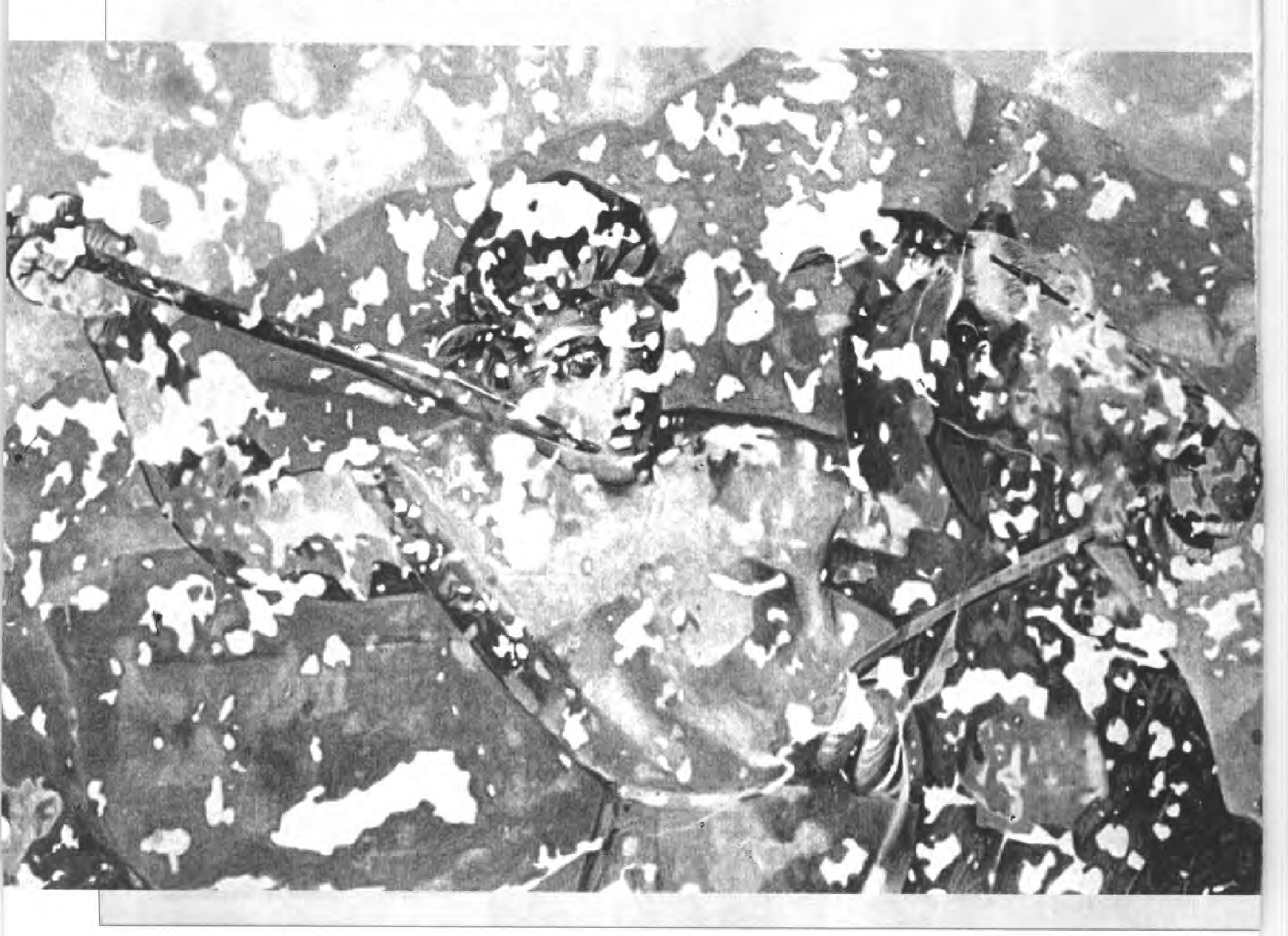
腓力的陵墓

马其顿是马其顿人在历史上的祖先之名，曾在赫希俄德的一首残诗当中以习见的希腊神话的风格被提到过。但由于马其顿人生活在希腊世界北部十分边缘的地方，他们的语言（尽管多半是希腊的一种方言）对于其他希腊人来说，并不总是能够轻易理解，所以国王亚历山大一世[1]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比赛之前，通过主持泛希腊的（全体希腊人的或仅仅是希腊人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权威们，正式确认他自称的希腊人属性。

然而，并非所有的希腊人均相信这种宣称的有效性。大概是为了应付对马其顿人的希腊属性的质疑，亚历山大的王位继承者们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促进自身的希腊化。例如，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受到阿尔凯劳斯（Archelaus）的邀请，到他在派拉[2]的新宫廷中作客并在那里去世。在位于马其顿南部边境的迪姆创立的体育赛会，成了北方奥林匹克运动会。

但马其顿诸王的充分希腊化只是在最近20年里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是因为在古代的埃盖（现代的威尔格希纳）发现并发掘了一些感人的造型和丰富的王室墓葬。其中，被令人信服地归结为国王腓力二世的墓葬是迄今为止意义最为重大的发现。腓力于公元前336年在埃盖辞世或毋宁说遇刺身亡。

这幅壁画（下图为细部）是陵墓的外饰，位于多利安风格的陵墓正面上方，画在一道连续不断的中楣上，描绘王室喜爱的娱乐——乘马狩猎的情景。而马匹在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象征意义。在骑手当中，已经识别出腓力本人及他的儿子与继承人——伟大的亚历山大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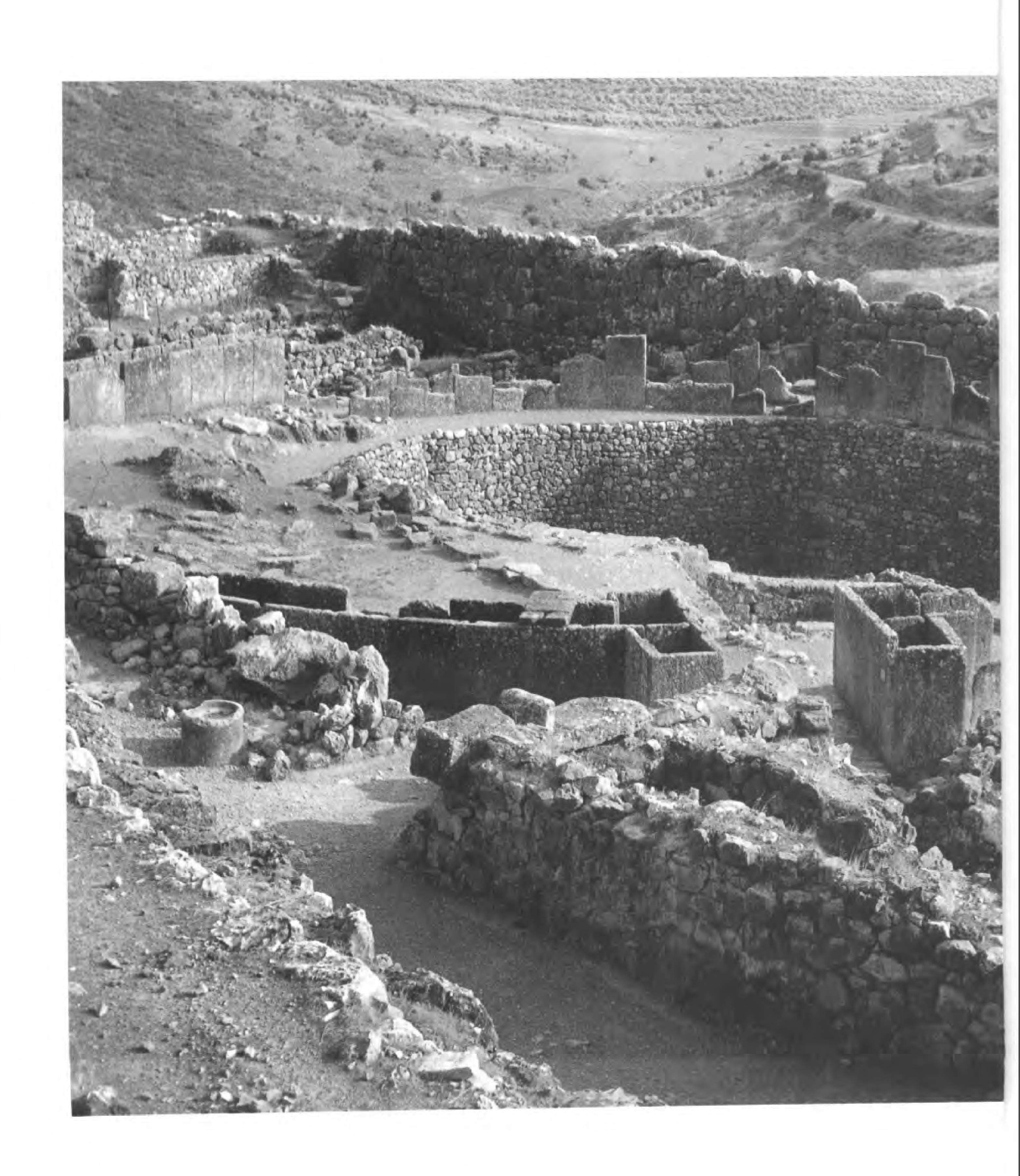
死者被陈放在陵墓主墓室中的一口金棺内（下右图），棺盖上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形象，那是马其顿王朝的标识。第二口金棺被置于陵墓的前厅，在金棺内发现了保存良好的、用来包裹一位妇女骨灰的紫色布料与黄金（右图）。

"当他们全体集合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先是用闪光的葡萄酒浇灭了火葬的柴堆……然后收拾起白色的骨骸，将它们包在柔软的紫布内，放在一个金匣当中……"这并非是一位目击者对国王腓力及王后葬仪的记载，而是荷马在《伊利亚特》结尾处对赫克托葬礼的描述。还有什么比保持这位希腊民族诗人所描写的伟大英雄时代的王家葬俗更能明显体现一个人的希腊特征呢？



(1) 指马其顿国王。——译者注
(2) 马其顿的都城。——译者注

间奏曲：历史脉络（约公元前1500～前146年）



公元前1500年作为起始年代，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约略年代。它并不意味任何可以得到可靠证明的希腊事件，而是指考古学上的晚期青铜时代的开端，或者说是指迈锡尼时期，出于对荷马史诗中的画面——由“富有黄金”的迈锡尼国王统领的一个松散的希腊人联盟——的尊重。但终结的时间公元前146年却标志着一个特殊的事件：众多大陆希腊人最后一次徒劳地阻止罗马人的政治征服。

在13至14个世纪里（参见年表），约公元前500年到300年这段时间将是本书第二部的重点。



（左图）围绕六座墓葬极为丰富的青铜时代晚期的竖穴墓的坚固城郭，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修建的，它们是迈锡尼重建的防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些陵墓本身却要早建了大约三百年。里面埋葬着不少死者，有男有女，大概都属于一个家族或一个王朝。如同荷马史诗对整个城市的称呼一样，这些墓葬也“富有黄金”，尽管黄金只是制作墓中大量殉葬品的一种贵金属材料。正是一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刻画着一位留八字胡的男性面孔的金面罩，使施里曼迅速给希腊国王发了一封电报，电文说他“凝视着阿伽门农的面庞”。倘若真有一位荷马史诗中的阿伽门农的话，那他应该是生活在公元前13世纪而不是16世纪。

迈锡尼

公元前17世纪和16世纪（希腊的这些年代是依据横向资料——埃及王家年表得出来的，最终由天文学的计算所证实），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很明显地发生了某些事，但它们被误解了。在迈锡尼，兴起了一个新王朝或兴起了若干个新王朝。对我们来说，它们偏好奢侈的墓葬。

那里发现了两处交错的圈形墓地，里边是墓葬极为丰富的竖穴墓。在大约公元前1300年，墓地中较晚后的一处（不很适当地被标以圈形墓地A）因受到尊崇的缘故，被并入新建的迈锡尼城墙之中。所以毫不奇怪，荷马史诗的热衷者、业余考古家海因里希·施里曼会不由自主地立即把这些竖穴墓的统治者同希腊传说联系起来，或者毋宁说通过把一件特别精美的金面罩视为荷马笔下阿伽门农的物品而将传说转变为历史。

实际上，假如史前希腊曾经联合为一个私人化的松散联盟，并且打了一场荷马风格的

（右页上图）这具平躺的女性遗骨陪葬有金饰和其他饰物，埋葬在一座大型墓葬建筑的下边，位于优卑亚岛的列夫坎迪，年代不晚于公元前950年。在同一结构的下方还埋葬着她的丈夫。他的骨灰同他的外衣一起放在一个装饰精美的青铜双耳大口罐或是掺酒的容器中，大概是塞浦路斯的产品。骨灰罐旁边是他的铁剑、长矛和一块磨石，表明他具有武士身份。

（右页下图）列夫坎迪出土的半人马身像。这个陶俑部分是运用陶轮技术制作的，约完成于公元前900年。它被称为希腊雕塑艺术的第一件杰作。它的耳朵很大，带有隐隐的微笑，左膝上故意造了一道很深的伤痕。这一形象充满了明显的个性。无疑它暗示着某个神话，但我们不能说清到底是哪个神话。有可能它是在刻画阿基琉斯的老师、聪明的希隆（Chiron）。

特洛伊战争，那恐怕也是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比施里曼挖出的“阿伽门农”要晚几百年。目前，并非只是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历史学家——对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努力（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希望证明荷马史诗真实性的激励）不屑一顾——认为特洛伊战争，或者说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战争，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是后来渴望看到自己光辉历史映象（被扭曲的）的希腊人心目中的一面镜子。真实情况将永远无法确知。那个最有可能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的遗址，必须提供诸如希腊人在有关时间里曾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某种证据。无论如何，考古学恐怕永远无法证明（或反证）具有倾国倾城之色的海伦在引起这场假定的十年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希腊的黑暗时代

考古学同样做出结论式的证明：在公元前13世纪，大陆希腊（从帖撒利往南）以及穿过土耳其西岸的爱琴海相邻地区，曾一度繁荣，人烟稠密，或者说在5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曾再次繁荣，居民众多。然而，在公元前1200年或接近于这个时期，发生了某种灾变。各个宫殿遗址都遭到严重破坏。在迈锡尼，这种破坏还不只一次。有些宫殿被彻底摧毁，如希腊西南部的派罗斯便是一例。中央集权的、重新分配的经济制度（线形文字B文献是幸存下来的有关证据）（参见第47页）也伴随着宫殿而不知所踪。希腊不同地区之间一度非常紧密的艺术、经济和政治联系，现在被削弱了或完全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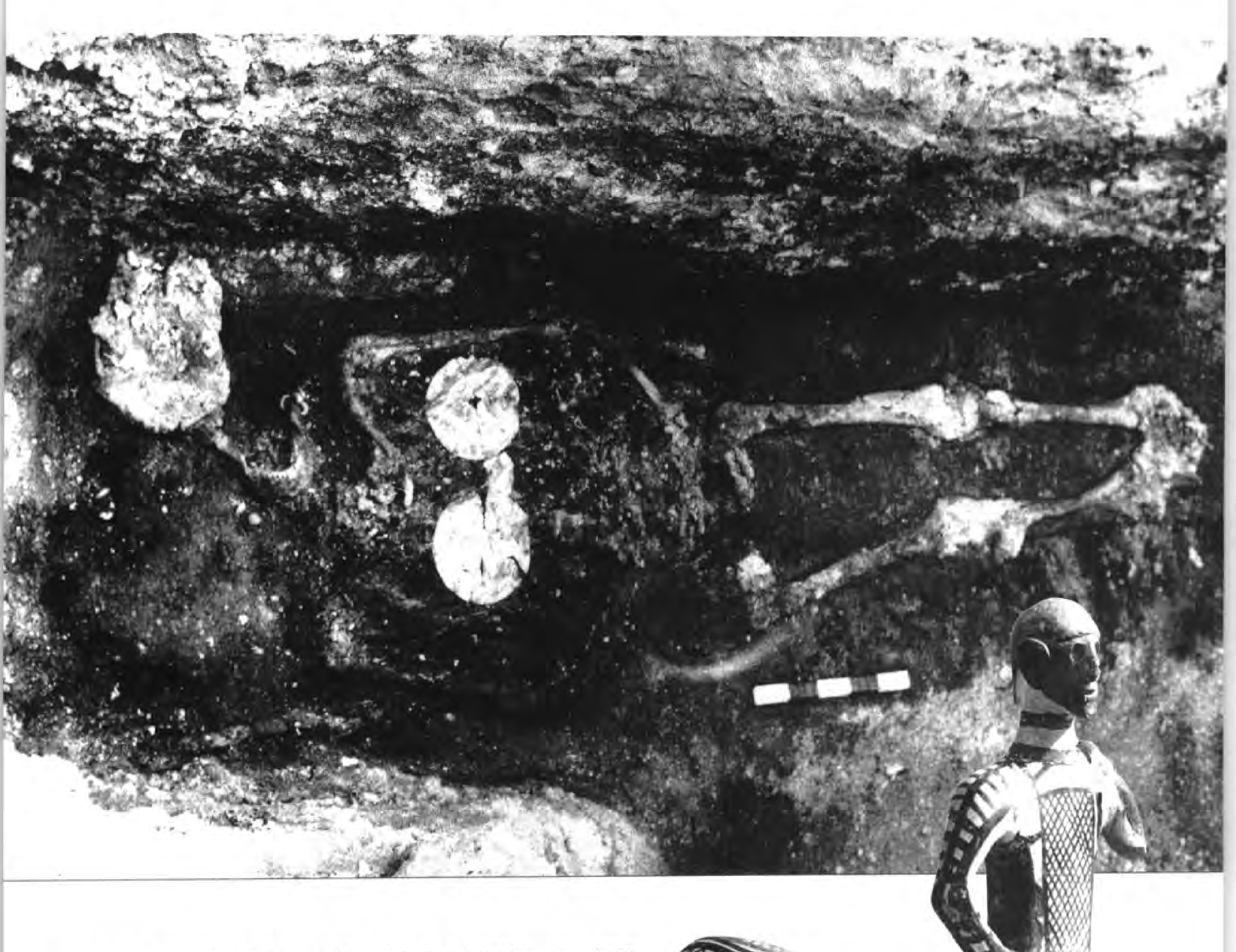
很快100年过去或到了公元前11世纪，我们看到了一幅与公元前12世纪截然不同的画面：居住遗址的数量大为减少，人口少了许多，无论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还是死后殉葬的物质财富都急剧缩减。线形文字B书写符号消失了，但并有任何其他文字体系取而代之。简言之，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

在某种程度上这当然是指旁观者眼中的黑暗，将来的发现有可能对这幅画面进行某些修改。但一般而言，情景似乎是凄凉的，生活贫乏而寂寥，即使还不能说是未开化状态。然而，毕竟有一些例外，最明显的是在塞浦路斯。迈锡尼人在公元前12世纪和11世纪移居到那里，利用了一种自线形文字B脱胎而来的书写符号。有些地区较其他地区要恢复得早一些，更为明显一些。例如，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之前，优卑亚岛上的列夫坎迪（lefkandi）已经在金属制作与海外接触方面成为黑暗时代的一道明亮的光线。在阿提卡与克里特岛，整个黑暗时代都有人居住。另一方面，在拉哥尼亚，作为先前十分重要的迈锡尼文化的家园以及荷马史诗中的墨涅劳斯[①]的所在地，却在这个时期始终是一片黑暗。

移　民

希腊的神话－历史传统认为在特洛伊战争之后，曾有过一段混乱时期，出现了宫廷革命。人们在希腊本土范围内和希腊境外四处迁徙，首先是向东，然后向

① 荷马史诗以及希腊神话中的斯巴达国王，其兄长是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译者注



南和东南。迄今为止，这种说法与考古画面相一致。但那些所谓的漫游故事之一，即多利安人从希腊北部或中部移居到伯罗奔尼撒一说，迄今得不到考古资料的证明。例如，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强大的多利安人共同体的斯巴达遗址，在公元前大约1200年之后至公元前800年前，却没有被占据的迹象。如果在那里有过一次多利安人迁徙的话，要么就是没有留下可以利用的痕迹，要么就是发生的时间比神话－历史之说要晚得多。后一种说法在这两种假设中看上去似乎更有可能一些，重要的原因是斯巴达人在历史上声称他们不是新来的入侵者，仅仅是返回他们的领袖曾在特洛伊战争之前被迫离开的故土而已。这显然是一个特许的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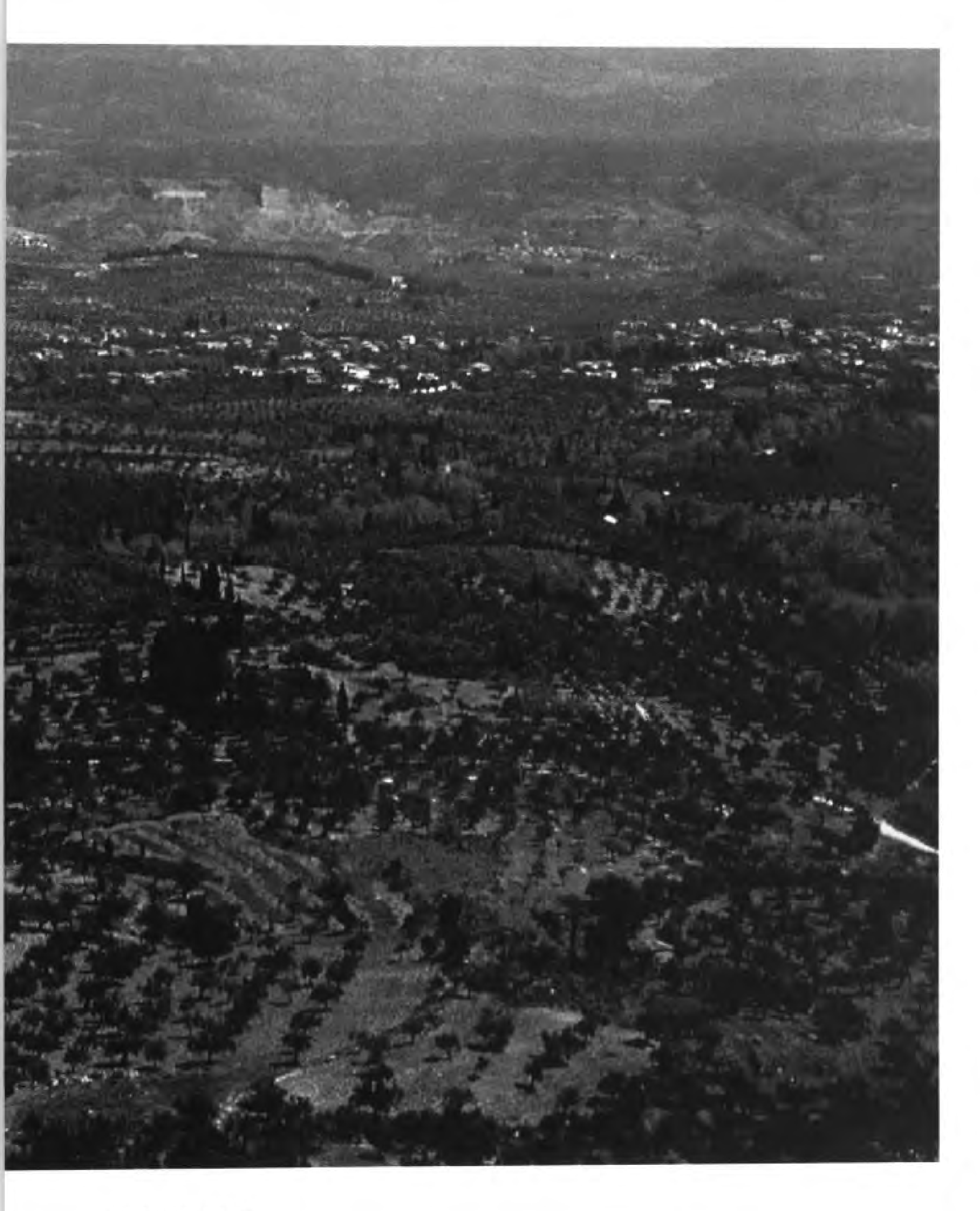
斯巴达人绝不是黑暗时代惟一宣称在神话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希腊人。一代代的游吟诗人吟唱着这些最终合成为荷马史诗的叙事短诗，他们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小亚细亚希



坐落在荷马所说的“凹陷的拉凯戴梦”的斯巴达，它的崛起仅仅是在青铜时代之后（当时这一带主要的定居点还位于东部更远处）。川流不息的埃罗塔斯河带来的丰富淤积层保证了粮食丰收。东边和西边的山岭是天然的屏障，长期以来，斯巴达人蔑视修建城墙。雅典英国学院的考古学家在20世纪头几十年对斯巴达遗址展开最初的发掘。令他们惊讶不已的是，他们发现斯巴达并不像文字史料所描述的那样始终是文化沙漠。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目前仍在继续。

腊人听众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公元前9世纪，希腊大陆与小亚细亚之间的正常联系一旦恢复，荷马史诗以及其他史诗便在确认希腊人的共同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同新兴的或者经过改造的奥林匹亚神庙、德尔斐神庙和提洛神庙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神庙把希腊各地的众多朝圣者吸引到它们那里去。

自公元前8世纪中叶以来，希腊人朝着相反的方向，也就是在西部为自己建立新的家园，随身还带去了吟游诗人的传统。在公元前700年以前，从罗德斯岛长途运至位于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奇亚的制品中，有一只酒杯属于最动人的希腊工艺品之列。它本身虽然并不很出众，但它的主人却追逐风雅，在杯上刻写了荷马风格的六步格诗文，使用的是优卑亚书写符号。



城邦的兴起

与希腊人的这场“殖民运动”同步，也可能因为“殖民运动”，城邦或公民国家应运而生。希腊人第一次能够谈及自己是雅典人或斯巴达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非一个原始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或者毋宁说只是一些希腊人能够谈及这类问题，而妇女则始终无权参与政治进程，尽管她们在生育子女与宗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正是这些新生的共同体，才使得大批希腊殖民者在随后一个世纪期间，在几乎整个地中海与黑海周边地区的移居成为可能。在某些场合，如公元前7世纪铁拉岛[①]的例子。该岛公民的迁移实际上是被迫的和不情愿的，以应对他们面临的一场经济危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希腊政治共同

① 爱琴海岛屿，现名为山托里尼，是希腊乃至欧洲的游览胜地。——译者注

体都参与了这种海外移民运动，事实上，最重要的两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就几乎完全没有这样做。

雅　典

晚后形成的雅典传统喜欢夸耀，在黑暗时代，雅典在公元前11世纪至前9世纪希腊大陆向小亚细亚西部的人员迁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无论当时雅典扮演了什么角色，但它在公元前8世纪或7世纪的海外殖民中所起的作用却无足轻重。

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阿提卡及其周围地区开始人满为患。起初，雅典人并没有感到需要进行海外移民，以缓解这种形势。只是到了后来，也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末，多半是因为国内的政治需要而非经济需求，雅典在靠近黑海的地区建立了若干正式的海外殖民地。

斯巴达

斯巴达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曾（或者斯巴达至少承认）在南意大利的塔拉斯(Taras)（现代的塔兰托）建立了一个正式殖民地。后来传说这个孤悬海外之地是极为动荡的国内政治形势的结果。但现代学者却宁愿把它的建立与斯巴达当时所致力于的主要活动——征服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泰格图斯山脉远侧的美塞尼亚邻人并侵占他们的土地——联系在一起。

这场战争的起因并不清楚，但结局却使斯巴达城邦占据了广大的领土（约三千平方英里，比希腊世界的第二大国家叙拉古要大两倍)，并且拥有大量非自由的希腊劳动者——希洛特人①，他们在强制之下为斯巴达人耕种土地。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是希腊城邦中最强大，大概也是最奇特的国家。无论如何，斯巴达（参见第五、七、八章）后来因政权的刻板严谨、性生活习惯的特殊性、占优势的尚武民风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制度而闻名遐迩或臭名远扬，所有这一切都假定是由一个深谋远虑的立法者——吕库古（Lycurgus，见第87页）所为。但它们更有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结果。

重装步兵战术

斯巴达与所有其他早期希腊重要城邦共同分享的东西是重装步兵装备与战斗阵形。最迟到公元前600年，大队重武装步兵排列而成的重装步兵方阵战术成了希腊大陆的作战定式，会战则发生在每个城邦赖以独立存在的农田或田野之上。

某些最富裕的公民继续作为骑兵参与战斗，或者至少骑马赶往战场。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即最贫困的公民组成轻装支援部队参加陆战，或者充当海上城邦

① 希洛特人(Helots)又译为希洛人、黑劳士、赫劳泰等，是束缚在斯巴达公民土地上的依附劳动者。一户斯巴达公民通常有七户希洛特人为其家庭劳作，提供粮食、橄榄油、葡萄酒等农畜产品；战时希洛特人要随主人出征，充当主人的奴仆，必要时还需参加战斗。关于希洛特人的阶级属性在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不同说法，有些学者认为是奴隶，有些学者认为是农奴。——译者注

战舰上的桨手。但是，在方阵中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重装步兵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以及军事舞台上的主角，即使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制（其权力的基础实际上是海军舰队）兴起之后，情况也依然如此。

僭主制

公元前7世纪的这种重装步兵革命不知什么原因同僭主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这一制度曾影响到或者说曾经使相当数量的颇有名气的城邦饱受磨难。“僭主”(Tyrant)或许是一个出自东方的借用词，可能出自吕底亚，但该现象本身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启示。最初是在阿哥斯或科林斯，然后在西具昂、麦加拉、密提林、米利都和其他地方，个人独裁公然挑战现存的政府或者只是对政府存在的统治权视而不见。作为篡夺权力者，尽管他们似乎都出自先前的贵族统治精英集团，但他们却需要武装力量以及能言善辩的人才能保持其自身的权力。这些武装由付给酬劳的重装步兵或重装步兵的大多数构成。

斯巴达不知何故避免了僭主制的威胁，大概是因为极其重要的政治需求，即维持公民联合阵线以便对付希洛特人；也许是因为所有斯巴达公民——在其他城邦中通常只有属于上等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男性公民——都是重装步兵的缘故。

雅典只是设法延迟了僭主制的建立，而它这样做的方式却对后来在雅典出现的希腊第一个民主政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最早企图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权的人是一位名叫基伦（Cylon）的贵族，他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得胜者。事情发生在大约公元前632年，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一致反抗，部分原因是他依赖国外军援，即他的岳父、麦加拉僭主提阿格尼斯（Theagenes）的军事支持。基伦和他的支持者们在其避难的圣坛旁被任意杀死，杀人者甘冒渎神的罪名[1]。但他的尝试似乎促使当政的贵族政权在大约公元前620年起草了或者说首次发布了某些正式的法律条文。对这个初步的法典内容，我们只知道一些涉及凶杀的条款。它的制订被归之于一位具有恶名的人——德拉古（Draco，在古希腊文中，德拉古是“蛇”的意思[2]），所有的惩罚实际上都是用血写成的，虽然我们的“draconian”[3]一词并不是这个意思。

尽管在仅仅20年之后，雅典国内似乎具备了足以在其他地方促生出僭主制的一些条件，但是有位名叫梭伦（Solon）的家财中等的贵族，却背道而驰，选择了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许多人害怕他成为僭主，某些人却希望他成为僭主。他在富人以及强有力的极少数人与穷人、无所依傍的大多数雅典公民之间进行调解。他于公元前594年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实行了改革，对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具有深远影

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法国考古学家在德尔斐圣路的下面发现了一座神殿的遗存，年代属于大约公元前6世纪中叶。该神殿显然是被焚毁的，其遗存通过一定的仪式掩埋在通向德尔斐守护神阿波罗庙宇的路石之下。在发现物当中，有一件与真牛一般大小的银牛，牛角和牛的生殖器是用黄金制成的。还有三尊用黄金和象牙制作的真人大小的雕像，黄金和象牙覆盖在木胚之上。人们认为它们是阿波罗（下图）和他的孪生姐妹阿尔忒米丝以及他们的母亲莱托的形象。这些造型的风格暗示它们是由伊奥尼亚的手工匠人创作的，这些匠人受命为极其富有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工作。



① 古希腊神庙是神圣之地，古希腊人有个不成文的约定，即在庙中避难的人是不可侵犯的。——译者注

② 蛇在西方人眼里是险恶动物。——译者注

③ 英文draconian一词源自德拉古（Draco），有严厉、苛刻之意，因为德拉古立法属严刑峻法，对犯罪的惩罚皆是死刑，所以雅典人称他的立法是“用血写成的”。——译者注

（右页图）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会战作为文明对野蛮、大卫对歌利亚的胜利[1]，不仅在雅典和古希腊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而且铭刻在所有西方人的记忆中。在战争胜利的神话遮盖下，我们很难发现真实情况。波斯大王大流士一世为惩罚雅典对小亚细亚西部希腊人暴动的支援，派出一支由米底人达提斯和其兄弟阿尔塔弗尼斯统帅的舰队和陆军。事先得到警告的雅典人令一支军队开赴东部海岸的马拉松附近。波斯人在该岛上已经摧毁了埃列特里亚城。因通向雅典的陆路被阻，波斯人计划派其主力经海路去攻击雅典城。但雅典人决定与盟友普拉提亚人一道，先在马拉松进行战斗，以避免回军保卫自己的城市。米尔提亚德斯是英明的雅典将军，策划出取胜之策。雅典人与普拉提亚人保持中央薄弱、两翼厚实的阵形，向前推进到箭可到达的距离之后，尽管手持重兵器、身披重甲，还是发起了冲锋。波斯人的两翼被击溃，随后雅典军两翼转而合击敌中央队列，并将其打得落花流水。据载，约6000波斯人被杀，而雅典人仅阵亡192人。他们战死后被誉为英雄，受到人们的崇拜。

(1) 把希波战争看做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显然有西方中心论和优越论之嫌。实际上波斯帝国的综合文明程度在希波战争期间并不亚于希腊诸邦，许多方面甚至强过当时的希腊人，如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大卫对歌利亚的典故出自《圣经·旧约全书》。据说歌利亚是希伯来的敌人非利士人的巨人，在战斗中却被大卫施巧计用石头击中。——译者注

响，对雅典公民权的确定也具有长远的意义。

他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大约公元前560年开始，雅典还是经历了一次僭主统治，或者毋宁说由同一个人，即庇西特拉图当政的三次僭主制。其中第三次僭主制是在公元前545年左右建立的，最终证明是稳定持久的政权。庇西特拉图引人瞩目地选择了保持梭伦政治改革成果的做法，同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培植出雅典人对国家的自豪感和“民族”的统一意识。在公元前545年和510年间，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改变了雅典的自然的和象征性的外表，为雅典民主制——当然没有人曾经预料到——铺平了道路。

来自东方的烦扰

与此同时，在远处的东方，有一片乌云正隐约迫近：崛起了一个由居鲁士大王（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59～前530年）统治的波斯阿契美尼帝国①。至庇西特拉图在雅典牢固确立了个人统治时止，居鲁士已经把他的统治向西扩展到小亚细亚濒临爱琴海的希腊领土伊奥尼亚。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许多地方囊括到自己的版图当中，其中包括两河流域和由喜好希腊的克洛伊索斯统治的那个富足的吕底亚王国。

在东部希腊，由米利都人泰勒斯（约公元前600年）倡导的一场宏大的思想革命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见第275页）兴起。在最大胆的伊奥尼亚智者当中，持有一种观点，后人也许可以称之为科学的观点，即他们试图借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某种）经验的调查，以自然的而非宗教的方法来解释宇宙。泰勒斯后来被尊崇为早期希腊的七贤之一，然而七贤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实践家，而非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考察宇宙的本原问题，也设想在大河上修筑堤坝的方式或预测月食的出现。

另一位伊奥尼亚贤人是科罗枫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他是长寿的人，跨越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他甚至具有类似达尔文那样的兴趣，关注化石。与萨摩斯人毕达哥拉斯一样，他选择了移居，从伊奥尼亚迁移到南意大利，部分原因是为了躲避波斯征服的汹涌浪潮。下面是他所写的深沉怀旧的诗句：

> 冬季你应当在火边谈话，
> 躺在柔软的卧榻上，有丰盛的食物，
> 喝着甜葡萄酒，嚼着鹰嘴豆②：
> “先生，您是谁？哪儿的人？
> 您有多大年纪？米底人来的时候，
> 您的岁数是多少？”

希腊人习惯上把波斯人和他们的同族人及邻人——米底人混为一谈，但他们对于业已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现状却不再困惑不清。在200年或更多的时间里，他

① 波斯帝国王族名为阿契美尼，意为阿契美尼斯的后裔。开国国王居鲁士和重建帝国的国王大流士均属这一王族，故波斯帝国亦称阿契美尼帝国。——译者注

② 一种出产于亚洲的豆科植物，有短而膨大的豆荚。——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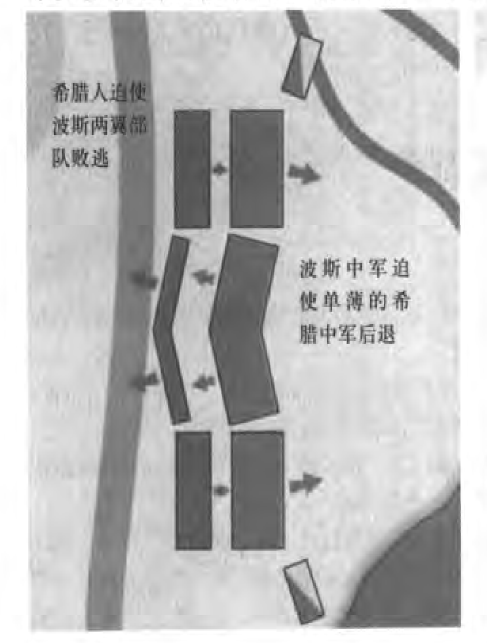
们都不得不以某种形式认真地与波斯帝国打交道。有些希腊人或多或少是自愿拥护波斯的，他们“米底化”了。其他希腊人更愿意进行殊死反抗，比如色诺芬尼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同胞们。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起始之时发动了伊奥尼亚起义，但最终却徒劳无功。有些希腊人起初接受波斯统治，后来又起而反抗，如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的萨摩斯僭主波里克拉特斯（Polycrates）。

约公元前522年，一位波斯地方总督擒获并处决了他[①]。与此同时，在波斯帝国，出现了一个广泛动荡的时期，包括全面的暴动，尽管希腊人居住的地区未卷入其中。这个不确定的时期被帝国的第二位奠基人大流士一世所彻底终结。他自大约公元前521年至前486年在位统治，成功地将他的疆土扩展到亚洲的西北边缘。伊奥尼亚地区以及东部其他地方的希腊人，同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一道，在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徒劳地发起反对他的起义。正是他在公元前490年为惩罚雅典对伊奥尼亚同胞的支持，发动了一次横越爱琴海的海上远征，只是在马拉松与雅典军遭遇并被击败。希腊人的这场著名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波斯的回应。到此时为止，这种回应虽然是以水陆分进的大规模远征的形式，可能还有水陆并进的形式出现，但大流士本人却去世了。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86～前465年在位）继承了王位。



雅典帝国

薛西斯最终证明比他父亲也强不了多少。希罗多德出生在哈利卡纳苏城，当时他是波







① 指波里克拉特斯，他被波斯帝国的小亚细亚总督欧洛伊帖斯抓获并处决。——译者注

斯的属民。他的开创性著作《历史》的主题就是希腊人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英雄般地抗击薛西斯入侵的记述，赋予它神圣的色彩。在希罗多德之前，参与战斗的埃斯库罗斯写出了现存最早的悲剧剧本《波斯人》（公元前472年），描写以雅典海军为主力的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战胜薛西斯的情景。尽管这是一场大胜，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主角主要还是长于陆战的斯巴达人。正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联军，构成了仓促形成的希腊联盟（仅有约三十个城邦）的基础。他们的重装步兵在普拉提亚战场显示出威力（公元前479年）[1]，这场会战决定了波斯人的命运。但恰恰由于斯巴达以陆军为基础，所以它未能利用这次胜利。雅典抓住了机遇。当时，雅典没有费多少气力便拥有了一支由三列桨舰组成的规模最大的海军。它的建成有赖于当地劳里昂银矿提供的资金，而萨拉米斯和米卡列海战（公元前479年）的壮举则激发了雅典人的自信[2]。雅典在修复了薛西斯破坏的城墙，使国内安全重新得到保障之后，建立起一个海上军事同盟，现在称之为提洛同盟（名字出自同盟国于公元前478年或477年交换盟誓的地方——提洛岛，该岛起初还是同盟金库以及存放其他公共资源的所在地）。

公元前480年以及前479年，波斯侵略军在薛西斯大王的统帅下，两次洗劫了雅典城，甚至没有放过神圣的卫城。侵略者显然被击退，这主要归功于雅典指挥官铁米斯托克里那颇具灵感的海军战略。也正是他在公元前479年或478年一手策划了雅典城墙的重建，但这项工作仓促上马，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石头，无论是加工过的还是未加工过的，都被抛到城垣当中。其中甚至包括墓碑，如这块浮雕墓碑，上面刻画着一位拳击手。他的一只耳朵多次受伤，但形状却很好。诸如此类的墓碑是很昂贵的，也许我们的这位拳击手是奥运会或其他赛会上的一位成功的参赛者。

提洛同盟演化为雅典帝国，某些人也许会说是或迟或早的事，但无论如何，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人同波斯达成某种和解行为（《卡里阿斯和约》）以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与斯巴达的斗争（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上之前。如同波斯一样，雅典靠着帝国带来的收益而日益膨胀，但它与波斯又有相当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把这些收益施到政治民主化的沃土之中。厄菲阿尔特（Ephialtes）[3]和伯里克利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晚期与50年代推行的改革，确认并促进了雅典重装步兵等级与日佣级公民[4]在军事及政治方面影响力的加强。日佣级属雅典财产阶级中最低的一级，他们是三列桨战舰的桨手。雅典卫城的建筑规划体现了雅典人对其保护神雅典娜的圣恩的感激之情，规划中的帕特农神庙是卫城这顶“王冠”上的宝石。这座城市无论是在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波斯还是在反对受到斯巴达支持的那些鼠目寸光者和寡头政权的斗争中，都坚定不移地捍卫了自由。然而，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这两个希腊敌对势力之间最终发生了灾难性的武装冲突，我们看到了雅典的衰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

① 彻底击败波斯第三次入侵的决定性会战发生在中希腊的普拉提亚。——译者注

② 萨拉米斯海战与米卡列海战是希波战争中的两次重大战役，彻底粉碎了入侵希腊的波斯海军。——译者注

③ 雅典民主政治家，公元前462年力主剥夺贵族会议的政治权力，后遇刺身亡。——译者注

④ 梭伦改革的措施之一是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并赋予不同的政治权利。重装步兵等级又称双牛级，是古希腊人所称的中产阶级，亦即家庭较为殷实的小生产者。日佣级是雅典公民集体中最低的等级，该等级的公民一般只拥有很少的土地或没有土地，靠出卖自身劳动力为生，故称日佣级。——译者注



建于公元前约420年的阿波罗神庙，材质为石灰岩，地处阿卡狄亚的巴赛。可能是为了纪念人们摆脱了一场瘟疫而建。另一种可信的解释是它也许由那些在国外靠当兵打仗赚钱（可能是为波斯雇主）的雇佣兵出钱建造的。阿卡狄亚天生贫困，是雇佣兵的主要来源地。据推测神庙建筑师是雅典人伊克提努斯（绰号“风筝”），他也被认为是帕特农神庙的两位设计师之一。该庙的显著特点是具有人们所知最早的“科林斯”石柱柱头和一道内中楣，上面刻画着赫拉克勒斯（Heracles）和亚马逊人（Amazons）、肯托斯人(Centaurs）同拉皮忒人（Lapiths）的战斗（如图所示）[1]。拉皮忒人的妇女紧挨着一尊可能是阿波罗的姐妹阿尔忒米丝女神雕像。

修昔底德不仅想胜过他的前辈与竞争对手希罗多德，而且要超出荷马。他宣称他撰写的战争将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我们知道在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期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确在爱琴海世界乃至西部很远的西西里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起初，双方只打了一个平手，但雅典在试图征服叙拉古和西西里时的惨败，使局势明显有利于斯巴达，尤其雅典海军力量在爱琴海的弱势使波斯得以再次干预希腊事务，这一次它以金钱资助了斯巴达。雅典在绝境中甚至被迫铸造了一种金币。经过一场丑恶的内战与寡头政变，以及丧失了几乎整个帝国之后，雅典最终在海上封锁与饥馑的打击下于公元前404年不得不投降。斯巴达人立即推翻了雅典的民主政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可靠的贵族寡头组成的傀儡集团。然而，由于他们的血腥统治，他们获得了“三十僭主”的称号，甚至连斯巴达对公元前403年重建民主制的行为都表示了默认。恢复后的民主政权行事十分谨慎，持续了八十多年，直到另一个外来势力马其顿将其彻底扼杀为止。

斯巴达的霸权

公元前4世纪的确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鼎盛期。像开俄斯和底比斯这样的城邦，长期稳定地实行温和的寡头制，但现在却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然而，斯巴达在国内仍然保持着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国外则基本上继续它的传统政策，即支持和推动寡头制政权。至公元前371年之前，斯巴达成功地保持了自己作为希腊大陆与爱琴海地区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但斯巴达并没有在自己的疆域之外实行或者相应地采取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它最终发现自己面对着致命的双重难题：手在国外伸得过长以及国内极端紧张的社会与政治关系。

公元前386年，斯巴达勉强同意了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强加的和平条件，被迫暂时性地从所有海外军事干预活动中退步抽身，包括不再真正参与任何反对

在古代巴克特里亚（现代的塔吉克斯坦）的阿姆河边的某个地方，有一处藏有各种金银器的储窖，于1877年被人偶然发现。其中大多数古物的年代属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它们多半是在当地的手工作坊制作的。当时巴克特里亚是阿契美尼的波斯帝国的一部分。但希腊的影响似乎表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这尊非波斯式的裸体青年小银像上。它穿耳并戴着具有波斯风格的镀金头罩。

(1)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力大无比；亚马逊是希腊神话中的女人部落，其成员骁勇善战，在特洛伊战争中与希腊人作对；肯托斯是神话中的一支凶猛的部落，其成员形象为上身人状、下身马状；拉皮忒人也是希腊神话中的一支部落。——译者注

雅典金斯塔特（stater），相当于4德拉克马银币，公元前407年或在此之后不久得以发行。正面是佩戴头盔的雅典娜女神像，背面是雅典娜的猫头鹰，环绕着雅典娜的神圣橄榄枝。金币的发行有众多原因，但最主要的是为了宣传和自我标榜。这是雅典在黑夜里吹口哨为自己壮胆，不久它便遭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失败（公元前404年）。





波斯侵略的行动。这实际上恢复了波斯帝国于公元前480年在亚洲取得的政治地位，当时它的势力曾扩展到爱琴海域。不过，斯巴达在国王阿哥西劳斯二世的领导下，积极并巧妙地利用和约中规定的所有希腊城邦无论大小均实行自治的条款，结束了一切多国组织和联盟的存在，但它自己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却属于例外。斯巴达的做法的确过分，它甚至解散了以奥林托斯为首的哈尔基斯人各邦组成的北希腊联邦，并强行在底比斯驻军。于是，它不仅恢复并加强了由于在公元前404年战胜雅典而取得的地位，而且也因路人皆知的帝国主义行径而招致底比斯和雅典的敌视，引起两国绝无仅有的一次联合反应。公元前378年，它们重建公元前478年的那种海上同盟，但这次是反对斯巴达而不是波斯。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在彼奥提亚的（leuctra）留克特拉，遭到其200年来重装步兵会战的首次重大失败。

这一致命打击暴露了斯巴达的外强中干。在六年时间里，斯巴达不仅被赶出了美塞尼亚，丧失了它的大部分肥沃农田及一半以上的耕奴，而且被迫让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领导地位。此外，新建立的城邦美塞尼（公元前369年）和麦加罗波利斯（约公元前368年），得到了由贤明的将军埃帕米浓达（Epaminondas）出色领导之下的底比斯的支持，它们使斯巴达永久性地失去了这些地盘。斯巴达现在发现，其经过阿卡狄亚进入美塞尼亚的捷径被封堵住了。在美塞尼亚，它面对的是一座以对先前的压迫者充满民族敌意为特征和自我形象的城市。

斯巴达在山穷水尽的形势下，甚至转而求助于先前的死敌雅典，而雅典对底比斯的用心正充满疑虑。然而，这两个国家在60年里（公元前418年至公元前362年）两次会战都不能击败底比斯，其中第二次重大会战是在阿卡狄亚的曼丁尼亚进行的。但胜利并没有给底比斯带来一劳永逸的好处。希腊各主要强国之间，在过去两代人时间里持续不断地互相争斗与残杀，使它们自身疲惫不堪，把潜在的希腊霸权拱手让给了新的国家，即北希腊的

埃斯库罗斯总结了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的希波战争，这是希腊矛对波斯弓的胜利。雕琢这件宝石工艺品的艺术家不怎么出名，他使用了另一个敌对民族的套路：希腊长矛手对波斯的骑兵。为了增强希腊人对蛮族人优越的形象，图中的重装步兵被刻画成“英雄般的”裸体，而他那柔弱的波斯对手却裹在防护铠甲当中。



一些史料强调一个希腊城邦并非只有城墙。像斯巴达这样的城邦，在实力最为强大、名声最为显赫之时就没有城墙。但对于公元前369年创建的新兴城邦美塞尼——是随着在几个世纪时间里处于奴役地位的希洛特得到解放而建立的——来说，城墙却是其国家地位的最为显著的证明，也是对美塞尼亚人旧日压迫者——斯巴达人的持续不断的挑衅。这道防御墙沿着伊托姆山的顶部与悬岩处，延伸约五英里，是一项颇为惊人的建筑成就。

马其顿。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

位于帖撒利[1]的城邦菲莱的僭主杰森，大概受到叙拉古[2]僭主狄奥尼修斯（他是他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希腊人）威势的鼓舞，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即公元前4世纪70年代，有望成为希腊大陆的主要势力。公元前370年他被谋杀，为底比斯几乎同样短命的霸权（公元前4世纪60年代）铺平了道路。然而，马其顿的腓力在底比斯如日中天的时候，便由其内部认识了这个国家。他懂得杰森吞并其邻近地区帖撒利的战略意义，并成功地把这种认识和理解运用于征服和统治整个希

① 帖撒利是北希腊的一块富庶地区，主要是平原。——译者注
② 西西里岛上最大的希腊城邦。——译者注

尽管传统把这尊巨大的大理石雕像（近十英尺高）称做“莫索勒斯”（Mausolus）[1]，但它多半表现的是这位卡里亚统治者（公元前377～前353年，莫索勒姆陵（Mausoleum）[2]因他得名）的一位祖先。人们是在由莫索勒斯的遗孀阿尔泰米希娅于哈利卡纳苏（现为土耳其西部的波德鲁姆）建造的莫索勒姆陵原址上发现它的。雕像的面部特征和发型表明这是位非希腊人形象，但是由希腊雕塑家为一个强大的希腊化王朝塑造的。该王朝以伟大的波斯国王的名义统治着由希腊人与卡里亚人混合而成的国民。

腊大陆的事业中。

通过行贿、施展外交手腕以及显示军事实力三管齐下的方法，腓力确保了自己的王位。他接着把四分五裂的马其顿王国统一起来，以应对希腊和非希腊的挑战者。随后他逐步向南推进，于公元前346年摧毁了雅典在中希腊的盟友弗西斯，从而为未来的征服事业取得了主动权。公元前338年，在彼奥提亚的科罗尼亚，他在同匆忙组合而成的雅典与底比斯联军的会战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至此，以及大概在此之前，腓力把控制希腊看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优先目标是扩大他对东方（至少包括波斯帝国西部领土）的支配权。波斯帝国的衰微已因埃及人旷日持久的暴动（公元前404～前343年）及一些地方总督半独立或公开的叛乱而充分暴露出来。

公元前338年或337年，腓力设法建立了现在所称的科林斯联盟。这是军事同盟与常设政府议事会的新型结合体，他本人被推选为联盟的第一任盟主或领袖。这个联盟囊括了希腊大陆大多数重要的城邦，但排除斯巴达却明显是一个蓄意安排的例外（排除它和招致它的敌视大概有助于加强盟邦对腓力的效忠之心）。联盟的第一个行动（腓力一向是利用宗教宣传的行家里手）是向阿契美尼帝国宣布一场圣战，以报复薛西斯率军于公元前480年至479年所犯下的摧毁希腊圣地（如雅典卫城）的渎神罪为名。公元前336年，他派遣最忠实于他的将军帕尔美尼昂去小亚细亚西北部建立一座桥头堡。但在腓力亲临指挥之前，他在马其顿的正式首都埃盖参加女儿婚礼庆典时，遇刺身亡。如同人们广泛认为的那样，近来在威尔格西纳发现并予以发掘的“腓力墓”如果确是腓力陵墓的话，那么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大王显然在安葬父亲时并没有节省开支。极为丰富多彩的大量随葬品展示出腓力征服事业的规模。

亚历山大大王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6年仅仅20岁，他的王位并没有保障。科林斯同盟的一些著名城邦认为这也许是它们摆脱马其顿统治的时机，但它们大错特错了。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挥师北征，远及多瑙河，平息了非希腊人的反抗，随后又立即率军南下彼奥提亚，在不到两周内驰骋300英里。在彼奥提亚，亚历山大效仿其父的严酷做法（腓力于公元前348年毁灭了奥林波斯），下令夷平底比斯，只保留了该城的宗教庙宇和卓越抒情诗人品达的宅第。这其中传达出的信息是明确无疑的：反抗马其顿即意味着毁灭。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认为对希腊可以高枕无忧了，遂开赴亚洲，去实现父亲未竟的事业。在11年的时间里，他经

(1) 小亚细亚的卡里亚国王，死于公元前352年。——译者注

(2) 卡里亚国王莫索勒斯的宏大陵墓，位于小亚细亚城市哈利卡纳苏，在古代被称做七大奇迹之一。——译者注

历了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和同样难以想像的成功会战，兵锋远及东方的旁遮普。这使他不仅成为爱琴海世界名副其实的主人，而且成为昔日居鲁士与大流士的整个阿契美尼帝国的真正主人。在6年之内，他至少在对外方面几乎变成了一位东方的专制君主，同时又是马其顿的一位希腊式的国王。但他始终没有返回马其顿的行政首府所在地派拉。风传当他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过早夭亡的时候，他正在策划更为宏大的征服事业，即进一步向南和向西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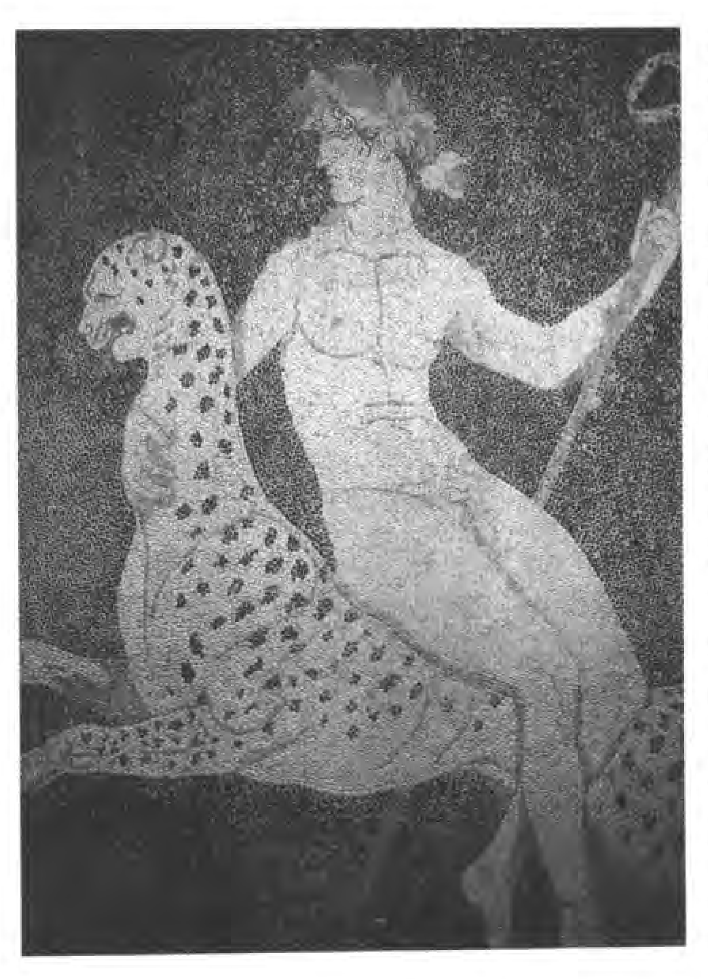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的遗产

亚历山大旋起旋落的短暂统治，自19世纪初叶以来，被人们称做希腊化时代（传统认为从公元前323年至前30年）。中东的希腊化（非希腊人采用希腊文化形式，如剧场、体育场），大概并不是亚历山大的主要目的。他在战略要地建立城市毋宁说是一种手段，以便对他的帝国进行政治控制，同时也是安置大量超期服役的老兵的一种途径。但他的希腊化却是他留给后人的恒久遗产。当地的语言，比如埃及语、叙利亚语，并没有消失，但希腊语成了整个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与行政管理的通用语。亚历山大去世之后，这个庞大的帝国迅即分裂为三个，后来又变为四个地域性王国：安提珂的马其顿王国、托勒密的埃及王国、塞琉古的亚洲王国，最后一个是阿塔里德的帕加马王国。

亚历山大的另一件重要的、也是间接的遗产，是保存了公元前4世纪以及在此之前的希腊文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保存下来了真正属于希腊文献的作品选。这件事的实现，有赖于托勒密一世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建立的众多冠以其名的城市中最著名的一个——博物馆与图书馆。学者们在那里工作（据说他们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藏书，这些藏书是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开办的进修学校吕凯乌姆获得的），确定所有希腊最出色的诗人和其他文人（自荷马与赫希俄德以来）的最为可靠的作品文本。但希腊化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决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例如，斯多葛主义作为一个新的哲学流派而兴起，它适应更大范围内的、世界性的时代以及有可能是更为动荡不安的时代的需要。伊壁鸠鲁学派也有非常广泛的建树。主要由新生的希腊化王室所资助的新艺术形式和新的艺术表现模式，给人以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果的印象。

然而，政治局面却令人有些扫兴。希腊化君主制虽然有明显的先例可循，比如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的僭主制或卡里亚的莫索勒斯（莫索路斯）的总督制，但可以说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不过它们的发展和繁荣却是以旧形式的希腊城邦（以外部自由和内部的公开争论为前提的公民国家）为代价，尤其是以牺牲民主制为代价的。亚历山大去世后不久，雅典领导的希腊人反抗马其顿的起义被粉碎，接踵而来的就是对民主制的直接镇压。这种反民主的趋向在整个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世界流行。新旧希腊城市中的上层阶级证明他们仅仅对此高兴，但并不情愿与他们的马其顿宗主们合作。他们拒绝这种对待他们似乎只比君主专制略好一点的制度。

在这个重要时期里，罗德斯城对于这种统治是个例外。如同古典时代的雅典一样，希腊化时代的罗德斯把它的民主体制牢固地建立在海军基础之上。直到公



一个具有阴柔气质、如猫般的狄奥尼索斯，骑在一头像是美洲豹的动物身上，传统称之为豹。采用小圆石马赛克拼成，位于派拉的一处大型柱廊的地板上，时间约属公元前300年。狄奥尼索斯头戴花环，手持一根魔棍，无疑迷倒了某些新征服者。

元前2世纪，它仍被视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民众革命的例子，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的内陆国家斯巴达。这是一场社会经济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因为革命的领导者本身是国王或者确切地说是僭主，即非常引人瞩目的阿基斯四世(Agis IV)和克莱奥蒙尼三世(Cleomenes III)[①]。然而，一般而言，旧式的民主制注定只剩下一个名称与影像，最多也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希腊化世界对于君主制和寡头制来说，是一个安全的世界。

罗马人

这样的世界完全符合罗马人的世界观，他们是予以民主制和希腊的独立地位致命一击的人。

罗马人最初认真介入希腊事务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叶，当时诺帕克图斯的阿哥劳斯曾经对他的希腊同胞发出过著名的警告："云在西方升起。"事实上，这正是罗马成为希腊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和其他广大地区主宰的起始之时。罗马于公元前2世纪最初崛起的情况，在亲罗马的希腊人——麦加罗波利斯的波里比乌斯[②]的笔下得到了记载，他想知道一个人怎么能对这种世界性事件的历史无动于衷。当然，这一点对于大陆上的希腊人而言，的确如此。他们同波里比乌斯一样，亲身经历过这一混乱的时期。该时期自罗马于公元前196年在科林斯——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象征性的地点，因为正是在公元前481年的科林斯，忠于希腊事业的人发誓抗击波斯——声明尊重希腊的独立开始，至公元前146年，也是在科林斯，罗马摧毁了希腊人对罗马统治的最后抵抗。

然后，取得胜利的罗马统帅穆米乌斯（Mummius）从马其顿的"图书"上撕下了一页，竟然将科林斯夷为平地，以震慑将来可能发生的反抗行动。同时，他

① 两人是晚期斯巴达的改革家，均因改革失败而身亡。——译者注

② 古希腊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200年至前118年，著有《通史》一书，记载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历程。——译者注



精心策划，把科林斯的一些主要的艺术珍宝装船运往罗马。这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做法，即破坏与保存相结合的做法，可以作为罗马具有的双重历史功能——既是希腊政治遗产的破坏者，又是希腊文化的保存者——的完美体现。

希腊文化在罗马的监护下，确实在继续发展变化。譬如，业已长时间失去政治或军事意义的斯巴达，变成了一个古代的主题公园，把四面八方的访客吸引过来，目睹据称上古风实际是重新发明的社会仪式，如在阿尔忒米丝①的祭坛前，对青年人施行的臭名昭著的残忍鞭打。另一方面，雅典成了一座大学城。一些举足轻重的罗马要人到那里求学，接受哲学与修辞学的高等教育。

事实上，希腊文化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迄今为止，即使是像犹太人那样骄傲甚至进行军事反抗的民族，都在罗马的统治下，吸收了一定的希腊文化成分。例如，正是因为这一过程，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才由操希腊语的非犹太基督徒用希腊文写就。他们希望把福音传播给希腊人或非犹太人、说希腊语的非基督徒。这大概是现代世界所获得的最普遍的希腊文化遗产，但绝不是希腊文化的惟一遗产。

科林斯卫城，字面意思是"科林斯之顶"，是守卫着伯罗奔尼撒门户的巨大的天然屏障。它靠近地峡[1]，公元前481年，坚持抗战的希腊人曾计划在那里抗击波斯侵略大军。科林斯人当然要竭尽全力将地峡控制在自己手中。但在公元前338年，他们败在了趾高气扬的马其顿人之手，但这并不是最终的失败。马其顿在这里驻扎了一支军队，用来"束缚"被征服的希腊人的手脚。这种情况持续到公元前196年，当时罗马正式宣布希腊独立，但并非真心诚意[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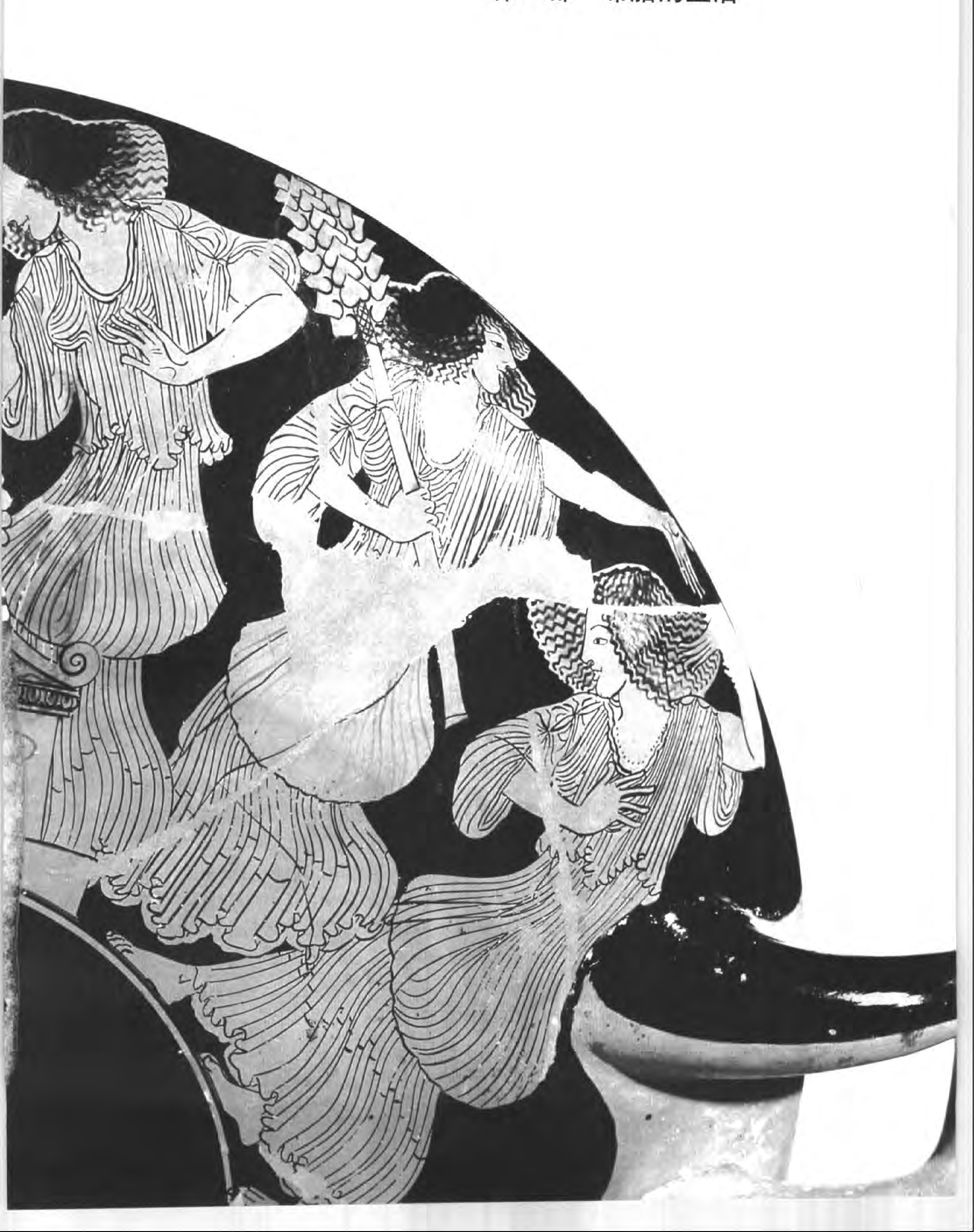
(1) 科林斯地峡，是连接中希腊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通道，在古代，战略位置很重要。——译者注

(2) 罗马为战胜马其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译者注

① 希腊神话中的月亮神。——译者注



第二部　希腊的生活



第四章　富裕与贫穷

亚里士多德：阶级分析家？

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家中理论最系统、思想最公允的学者。他习惯在各种论述的开头对一般现象加以概述。这些概述包括主要事实和（或）人们通常所持的最基本看法（以他的观点来看）。与他的老师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不愿意贸然支持与这些“常识”或多数人的意见相悖的理论。例如，他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见第287页）。因此，他在一系列讲稿中发展了自己关于政治理论和实践思想（这些讲稿收集在他的《政治学》中幸存下来）的时候，还列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计划。他和他的学生们按这个计划，发表了《政体》一书，研究了158个希腊城邦和某些非希腊城邦（城市国家或公民国家，见第六章）的发展史及常见的政治结构。《政体》一书仅存部分是纸草纸文献《雅典政制》，它出土于埃及的黄沙中，在1891年首次得以出版。

以《政体》为成果的研究项目是在吕克昂进行的。吕克昂是亚里士多德创建的一所学校，亚氏曾在马其顿宫廷担任年轻的亚历山大大王的老师，后来云游爱琴海和小亚细亚，之后在大约公元前335年返回雅典并创办了这所学校。他的研究项目有四个重要特征：

第一，它的提纲几乎完全以希腊为中心，把希腊城邦看做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天然”的政治形式。换句话说，希腊城邦是一个小型的政治共同体，有一定的农区和一个市中心，其构成还包括较小的社会群体，如家庭、村落、家族或其他团体。

第二，这种对城邦的关注导致对那些往往被称做“埃特诺”（ethnê[1]）而非“城邦（poleis）”的更大的社会团体的低估。虽然城邦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实体，但相互联系在一个“埃特诺”当中的不同共同体，却把某些权力交给一个共同的公民大会。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计划事实上也涉及许多这样的埃特诺，例如帖撒利城邦和埃陀利亚的国家。尤为令人惊讶的是，亚里士多德尽管对马其顿王国非常熟悉，却没有在著作中谈及它。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书稿时，正是马其顿王腓力二世通过外交、威胁、战争等多种手段，迫使希腊大陆的大多数城邦加入马其顿领导下的“科林斯同盟”（公元前338或337年）之后不久。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先前的学生亚历山大大王踏遍整个东方，征服了波斯帝国（见第157、181页）。

第三，这个研究计划既强调共同性，又强调多样性。城邦不管在地缘上有什

① 在古希腊文中，ethnô有族群、部落之意，一些希腊作家也把这个词作国家用，与poleis、koino等词同为国家之意，但互相间没有严格的定义界限。通常，Ethnô可以指一个部落国家或若干部落组成的联盟国家。本书作者在这里显然是指联盟国家。——译者注

么内在联系，起初都具有自身的经济、宗教和文化模式。它们不断发展自身固有的特点，并独自进行着各种政治变革。然而，在某些时期，尤其是在古风时代，由于一种复杂的、自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同等国家组织的相互作用”——城邦依循着一些可供比较的发展模式演化。而在其他时间，政治变革的产生主要由于较强大的国家，如雅典、斯巴达、底比斯，企图控制周边国家，并迫使它们采用与自己的政体（如民主制或寡头制）类似的政治体制，而有意向它们施加压力。城邦政制中的这些发展与变革通常是政治、经济发生剧烈冲突的结果，而且常常要诉诸暴力。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第四个特征清楚地展现了希腊政治的这种趋势，而且始终注意分析他所称的“停滞”（stasis）的原因，并鼓励各国学会回避它的方法。“停滞”这个术语在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政治分析和修昔底德的历史中都是很重要的，原指古代希腊的一种政治态度或观念，但它很快引申为一种严重对抗的政治派系斗争或一个城市陷于危险的动荡、冲突，甚至内战的情况。

那么，亚里士多德如何分析城邦的政治结构呢？对他而言，变革和动荡的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避免停滞呢？他的关于城邦的中心思想是“全权成员”即公民权的思想。关于公民权，他通常根据人们在表决过程中的三种参与情况来定义，即在公民大会上投票、担任陪审员、具有政治职务（执政）。但公民权也意味着享有公民身份所提供的保护（见第五章）。当然，这些“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仅限于自由的成年男性，他们的公民权可代代相传（见第144页）。

亚里士多德承认公民之间的各种差别，例如，职业差别。当然，一个公民可能有一个以上的职业。例如，一个士兵也可以是农民，因为没有常备的职业军队（虽然公元前5世纪晚期以后，雇佣兵越来越多）。

亚里士多德还主张，在某些社会中，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第三种力量，即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温和的集团，这是一个国家具有良好政府并维持稳定的基础。然而，他接着说，在大多数国家中，中产阶级很小，不足以构成重要因素。对他来说，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产生最重要的差别，绝大多数冲突便由此而生。亚里士多德在两个集团的统治及其建立的政体类型之间发现了一种必然联系：富人采用寡头制，而穷人则采用民主制。实际上，富人总是居少数，而穷人总是占多数（亚里士多德经常明确地把富人称做“少数人”，而把穷人称做“多数人”、“大多数人”或“群众”）。然而，他相当奇怪地坚持认为，即使富人成为掌权的多数人，国家政体也应当划归于寡头制，因为他们将会根据财产利益处理事务。

由于亚里士多德强调，对于大多数个人和集团而言，他们在经济上所处的地位是政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他被称为马克思的先驱。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对“当其中一派掌权时，另一派最忿恨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至少包括三个不同的方面：经济剥削（要么通过榨取穷人的土地，要么通过向富人征收重税）；无权担任政治职务或参与公民大会、出席法庭（重要的是，经常用来指政治职务或权力的术语是“timai”，即荣誉，意指极高的威望及由分享权力和真正行使权力而产生的荣誉）；对个人的人身或荣誉（timê）进行各种形式的直接攻击。这种严重的攻击经常被强烈谴责为狂妄自大（傲慢或自大），可能表

古风时代的正义

古风时代的诗歌反映了当时（公元前700～前550年）发生的政治变革情况。赫希俄德（Hesiod）是一位喜欢说教的诗人，生活在公元前700年前后。节选于他的诗歌的片断表明，这个时期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彼奥提亚村庄里，农民被排除于决策过程之外。当地贵族巴赛勒斯[1]牢牢地掌握着决策权力。只有那些相对富裕的农民，他们主要依靠农田获得经济收入，可能有时间或有办法从巴赛勒斯那里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那时的诉讼和现在一样，既费时间又费金钱）。但是这些农民可能受到鼓励，通过援用众神所支持的公平标准，来批评贵族的正义观念。在这个选段中，赫希俄德向他的兄弟佩耳塞斯（其涉嫌拿走其父遗产的大部分——比他应得的要多，而且为得到对己有利的判决而贿赂执法的贵族）训诫道：

佩耳塞斯！请你记住这些事：不要让那个乐于伤害的不和女神把你的心从工作中移开，去注意和倾听法庭上的争讼。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把一年的粮食、大地出产的物品、德墨特尔的谷物及时收贮家中，他是没有什么心思上法庭去拌嘴和争讼的。当获得丰足的食物时，你可以挑起诉讼以取得别人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再有机会这样干了。让我们用来自宙斯的、也是最完美的公正审判来解决我们之间的这个争端吧！须知，我们已经分割了遗产，并且你已获得并拿走了较大的一份，这极大地抬高了乐意审理此类案件、热衷于受贿的王爷们的声誉。

（《田功农时》第27～39行）

出身高贵的佩耳塞斯啊，要时刻记住我的忠告，无论如何你得努力工作。这样，饥饿或许厌恶你，王冠漂亮、令人崇敬的地母神或许会喜欢你，用粮食填满你的谷仓，因为饥饿总是懒汉的亲密伴侣。活着而无所事事的人，神和人都会痛之恨之，因为其禀性有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白浪费工蜂的劳动。愿你注意妥当地安排农事，让你的谷仓及时填满粮食。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增加羊群和财富，而且也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备受永生神灵的眷爱。劳动不是耻辱，耻辱是懒惰。但是，如果你劳动致富了，懒惰者立刻就会忌羡你，因为善德和声誉与财富为伍。如果你把不正的心灵从别人的财富上移到你的工作上，留心从事如我嘱咐你的生计，不论你的运气如何，劳动对你都是上策。恶的羞耻心是穷人的伴侣。羞耻既能极大地伤害人，又能大大地助人兴盛。羞耻跟随贫穷，自信伴着富裕。财富不可以暴力攫取，神赐的财富尤佳。一个人如果以暴力夺取巨大的财富，或借狡猾的辞令进行骗取，正如良心为贪婪所蒙骗、羞耻为无耻所抛弃时常常可以看到的情形那样，神灵贬斥他，让他的房屋枯朽，财富在他手里瞬即消失[2]。

（《田功农时》第298～326行）

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雅典立法家梭伦的诗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首先，依靠各种各样的（很多是非正当的）手段，财富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其次，普遍的不公正和狂妄自大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但比较公正的新法律的制订可能带来良好的秩序（eunomia，即欧诺弥亚[3]）。第三，所有公民对公民大会和新"法庭"的某种参与，也会带来公平与和谐，这种参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荣誉"。

以下诗句摘自梭伦的一首诗。这首诗常被冠以"欧诺弥亚"或"良好秩序"的标题。它显然被用来指导雅典公民，并试图警告他们关于雅典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梭伦首先指责贵族（领袖），强调通过新法来进行变革的必要性（第四首诗）：

我们的这个城市将永远不会因为
宙斯的旨意或受祝福的永生的神的意志而被摧毁，
这是因为她，强有力的宙斯之女，
勇敢的守护神帕拉斯·雅典娜
举起双手护卫着我们。
是公民自身屈从于他们对财富的欲望，
用愚蠢的行动，
想摧毁这座伟大的城市。
人民的领袖胸怀不公正的思想，
他们很快就会由于自己的狂妄自大而遭受许多悲哀，
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节制，也不知道
如何在和平的宴席上享受目前的欢乐。
……
他们通过不公正的行为发财致富，
……
既不节约神圣的财产，也不节约公共的财产，
他们无孔不入、强取豪夺，
不顾庄严的正义基础。

麦加拉的泰奥格尼斯(Theognis，公元前7世纪后期或前6世纪中叶)的诗歌，展现了诗人作为一个性情相当乖戾的贵族的画像。他强烈反对新生的富有者和非贵族在政府中的更多参与，也反对非贵族与较老的贵族家庭联姻。这些诗经常采取道德建议的形式，送给一位他的较年轻的“男朋友”，名叫库尔诺或波吕派得斯。



晚后的希腊人大概对早期诗人(如荷马和赫希俄德)的长相一无所知，但还是产生了用塑像和绘画来表现他们的传统。这是一幅镶嵌图案，把赫希俄德刻画成一位威严的老人，长着一撮又长又尖的胡子。这幅画发现于德国特里尔，属于4世纪。

库尔诺，城邦还是那个城邦，
但人民却不是原来的人民。
他们以前根本不知道公正或法律的作用，
但他们穿破他们身上的旧山羊皮，在城市之外，
像鹿一样，居住在农村。
而现在，他们是“高贵的人”，波吕派得斯，
那些过去高贵的人如今变成下贱的人。
谁能忍受这种情景？
当他们嘲笑别人的灾难时，他们互相欺骗，
并不懂得好人的思想也不懂得坏人的思想。
……
库尔诺，我们希望羊、驴、马生于良好的血统，
同样，我们也渴望由高贵的人生养。
但是高贵的男人不介意与坏女人——坏人之女结婚，
如果他能得到许多钱财的话。
一个女人也不会拒绝做一个坏男人的妻子，
如果他富有的话。因为她想嫁给有钱人，而不是高贵的人。
他们推崇的是财富，高贵的血统与低贱的血统相结合，
财富把血缘混合了。
不要惊讶，波吕派得斯，公民这一族类日益衰落，
因为好的血统被差的血统混合了。

(1) 在古希腊文中，巴赛勒斯的主要含义是国王，这种称呼一直持续到拜占庭时代。——译者注
(2) 以上译文引自张竹明、蒋平的中译本《工作和时日》，商务印书馆，1991年。赫希俄德的这部诗作的中文旧译名为《田功农时》，更符合原诗内容及诗名，故本译本正文中采用旧译名，特此说明。——译者注
(3) 希腊的季节三女神之一，意为良好的秩序。——译者注

现为对某人的依附者施行暴力和性侵犯，或对公民身份进行正式剥夺。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我们可能称为“阶级冲突”的含义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荣誉、身份和经济剥削与权力的问题。

金钱造就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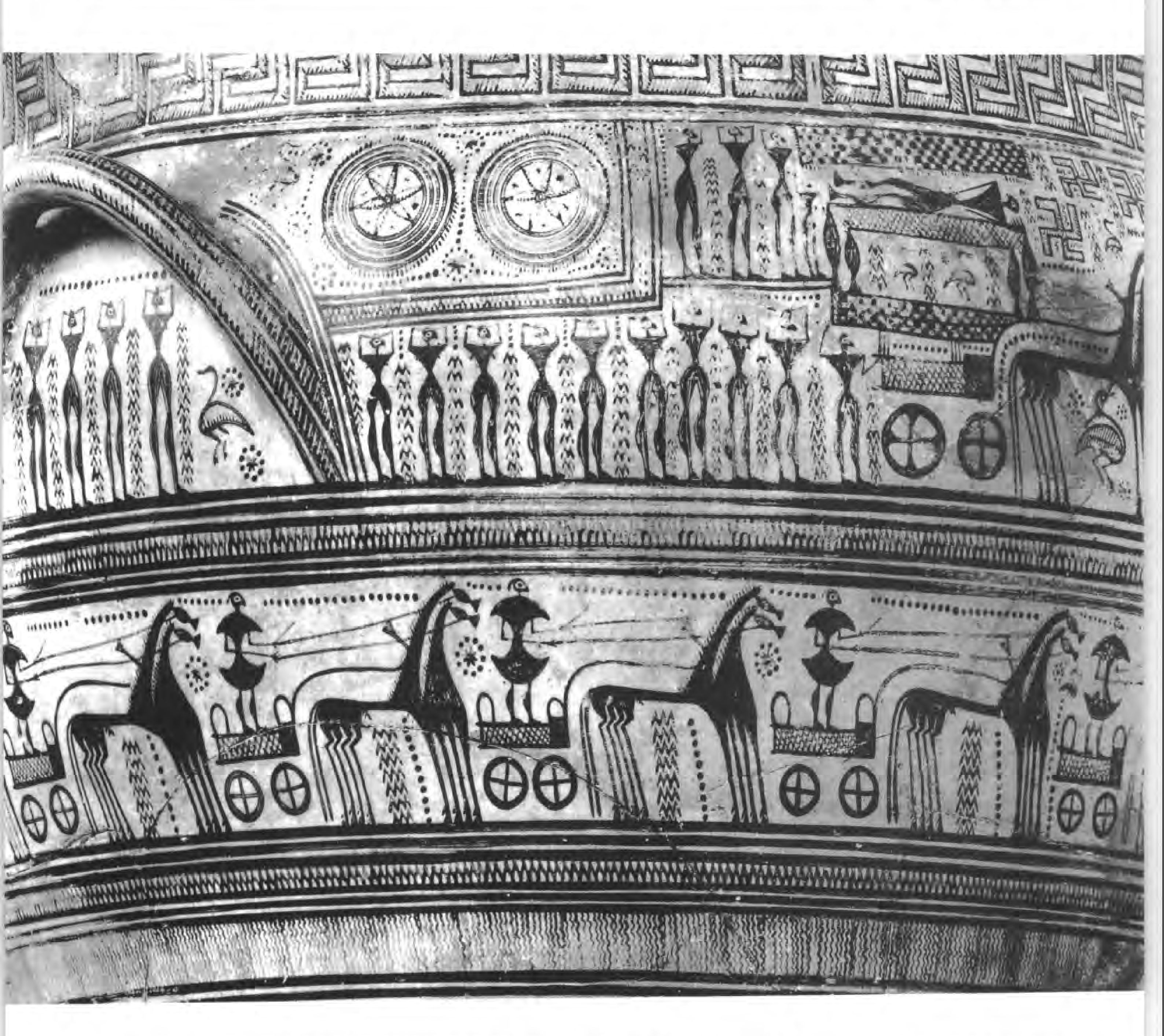
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准确叙述在古风时代伴随城邦发展而产生的阶级分化的起源。希腊传统往往表明，在后英雄时代（我们所谓的“黑暗时代”），各地的松散君主制形态被讲究出身的贵族制所取代。自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进一步的变革越来越清晰可见，中间还经常插入一段短暂的僭主制时期。这些变革要么导致基于财富而非基于出身的改头换面的寡头制，要么就是发展成比较平等的政体。

从古风时代早期起，发现于墓葬或神庙的物质遗存，例如发现于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的金属三脚锅祭品和小雕像，就清楚地表明，首领拥有象征权威的物品。在阿提卡，不同时期的贵族墓葬也呈不同的类型。例如，墓葬主人的高级地位似乎是由大量武器或大量装饰精美的几何陶罐陪葬品作为标记的。

当然，大多数墓葬可能没有这样的纪念物。但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地由此推测，各地要么由一些家族的骨干分子在实行无可争议的统治，要么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在进行着统一。例如，发掘出来的关于葬礼的证据表明，地方与地方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贵族身份的特殊标志也显然各不相同。当归属于一个可以确认的社会的感觉开始形成，城邦领土的界线开始变得更加分明——用于神圣的、公共的、私人的土地和房子有了明确划分——的时候，根据最早的文字记载，最富有的家族对权力和决策行为的垄断，便似乎受到了挑战。这些文本（及晚后的说明，在细节上往往令人非常怀疑）也体现了对于财富和权力存在着道德和政治上的对立情感和争议。自赫希俄德以来的古风时代的诗歌，使我们能够详细分析社会中的穷人为免受剥削和参与政权而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

许多不太富裕的希腊人死后用普通的墓石板或墓石作为纪念，上面可能只刻有死者的名字。自从书写的习惯于公元前8世纪被重新引入希腊，在许多场合，死者的名字很早就被刻在石头上了。这是绘制的图例，一块出自铁拉岛的粗糙墓碑，上面刻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埃特奥克里亚(Eteocleia)，刻写时间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名字的写法是从右到左，而且翻转90度。

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有一种反复出现的形态，就是僭主攫取权力（见第69页）并建立起一种很少能维持至三代的君主制（例如科林斯的塞普瑟鲁斯和勃吕安德，麦加拉的西延尼斯或西具昂的克里斯提尼）。一般情况下，僭主之所以有可能夺取政权，是因为社会中的众多具有实力的战士（当时是重装步兵方阵的成员）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或更多的荣誉而支持他们，至少拒绝支持现状。僭主以各种方式打破了贵族独占权力的状况，并且往往提高他们所在城市的威望，为城市增添光彩。然而，他们却极少（如



果有的话）真正改善大多数公民的经济条件或政治参与权。在个别情况下，通常是少数贵族本身，很自然地表现出上等贵族的样子，在泛希腊的神庙里通过奉献贡品展示他们的财富，或在他们自己的庭院里通过铺张浪费来显示自己的富有。

古风时代的贵族在他们的葬礼上显示自己的权力。这个阿提卡的几何风格的陶瓶，属于公元前740年左右，实际上作为坟墓标志，是象征权威的庄严物品。瓶画上的死者躺在一具覆盖着花格布的四脚棺材上，整具棺材则被置于一辆马车上。佩剑的男人出席葬礼，旁边跟随着许多正在哀悼的妇女。后来，仅限于贵族葬礼的习俗传入到许多希腊城市。

通向一致的斯巴达之路：真的一致吗？

至公元前480年，雅典和斯巴达成为希腊大陆最强大的两个城邦，但它们的政治、经济发展方向却完全不同。这使得它们为了在贫富公民之间增强凝聚力与合作关系而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事实上，古典时代的斯巴达城邦，既不像斯巴达传统所骄傲地宣称的那样，是由他们的立法家、英雄人物吕库古结合德尔斐神谕，提出一整套改革措施创立的，也不是从公元前7世纪早期到前5世纪早期，历



骑手之画（约前550～前540年）。这个斯巴达陶杯是众多表现优雅年轻骑手的杯子之一。画中还有一个长着翅膀、拿着花环的人。画四周环绕着一种沼泽地上的鸟。这个青年可能是一位被理想化了的斯巴达战士，刚开始其军事生涯。这些鸟也许表明，斯巴达的阿尔忒米丝·奥瑞亚[1]的神庙，位于埃罗塔斯河边的沼泽地上，人们就是在这里举行成年仪式的。

(1) 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译者注

经一个缓慢的变革过程最终形成的。斯巴达城邦形成的起点是对希腊人口众多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希洛特人（或曰社会的奴隶）的征服和控制。这不仅为正式的斯巴达公民（斯巴达人）提供了作为农业财富基础的大片土地，而且使斯巴达人自身不必在土地上参加劳动。不过，相应地，这也给斯巴达人强加了一种对那些充满仇恨、有时发动起义的农奴不断实行监督的负担。希洛特人比斯巴达人本身要多得多，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起，两者人数比例不平衡的情况日益严重。公元前7世纪中期，美塞尼亚的希洛特人举行了一次大暴动。几乎与此同时，斯巴达人中富人与穷人之间出现了政治、经济紧张的严重局势。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与大约在这个时候采用了重装步兵战术有关，这使大量的斯巴达士兵在军事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斯巴达的紧张局势是通过以下方式解决的：赋予斯巴达公民大会更多的权力，重新分配美塞尼亚人的土地。从此，斯巴达人开始自称为“平等者”(Homoioi)，每人分到一块由希洛特人耕作的（最小限度的）土地。在随后两个世纪里，斯巴达人发展出一种颇为均等又有点军事化的、共同的生活方式。这

王家的贡品与摆阔

为了摆阔而穷奢极侈和铺张浪费是早期希腊僭主的特征。科林斯的第一个僭主塞普色鲁斯（Cypselus）掌权后不久，就声称他得到德尔斐阿波罗神谕的支持。所以，他在那里建立第一座国库，以便盛放他向阿波罗神谢恩的许多贡品，并展示新的（非法成立的）政体的虔诚和富有。然而，关于以宏大规模进行自我炫耀之事，我们所了解的最引人入胜的叙述是关于西具昂专制王朝中最强有力的僭主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为了给他的女儿阿加里斯特找到一位合适的丈夫而大费周折的故事。这件事是希罗多德讲述的，发生在公元前580年左右。这位僭主通过赢得战车比赛为自己提高了声誉。他在奥林匹亚宣布（为女儿寻找夫婿的事）后，来自希腊各地的求婚者会聚在一起，选婿过程整整持续了一年。求婚者必须在克里斯提尼专门修筑的赛马场和摔跤场上展示他们的运动能力。希罗多德写道，求婚者的测试项目有“勇敢的男子汉气概、气质、教育和礼貌，他（克里斯提尼）每天把较年轻的人带到体育场，但是最重要的测试却在宴席上”。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奇闻轶事与雅典历史相关，尤其是与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兴起有联系。据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两个雅典求婚者中，被选上的是阿尔克迈翁·梅加克勒斯（Megacles），而不是“赛跑中跑在最前头”、“全雅典最富有、最英俊的人”希波克利得斯。

希波克利得斯不幸在最后的、决定性的宴会上丧失了机会。在那次有100头牛作为牺牲的酒席上，他喝得过多，“爬上一张桌子，先跳拉哥尼亚舞，接着跳阿提卡舞，然后在桌子上倒立，用他的双腿打拍子。”克里斯提尼不能容忍有这样的女婿，大声吼道：“希波克利得斯！你把你的婚姻跳完了！”然而，舞者却回答：“希波克利得斯并不在乎。”因为希波克利得斯可能没有穿内衣裤，所以近来有种解释是，在“你弄糟了你的婚姻”这句话中有个双关语（orcheisthai 意为“跳舞”；而 orcheis 意为“睾丸”）。这种说法看来极有可能。希波克利得斯当时可能被糟糕地看做是正在模仿下流的舞蹈，而这种舞蹈通常只是由较低下阶层的小丑——斯巴达的希洛特人、雅典的农奴或此类受蹂躏的阶层来表演，他们为求得残羹剩饭，被迫在贵族的桌边作践自己。

希腊古风时代的僭主特别渴望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他们通过在重要的神庙，首先是泛希腊神庙，如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的神庙，拨款建房，奉献雕像和战利品，以此来显示他们的财富和成就。由于在古典时代和后来的时期里，绝大多数财富遭到抢劫，金属雕像被熔化，因此这些最有价值的贡献几乎没有一件保存至今。然而，在奥林匹亚发现的这只精美金碗上的铭文表明，它是“来自赫拉克里亚的战利品”，奉献者是“塞普色鲁斯家族”。这个家族可能不是来自科林斯的塞普色鲁斯家族的僭主们，而是统治西北希腊安布拉吉亚地区的一个较晚后兴起的家族分支。



种方式主要建立在一种严格统一的教育制度基础之上，包括对体育、军事、音乐和各种竞技技能的培训。青年男子之间的同性恋组合又加强了这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培训之所以得以维持，依靠的是不断地在公餐（称为“西西提亚”、“西斯卡尼亚”或“菲迪提亚”）中集体吃饭，（作为终身成员）允许参加公共会餐也因此是取得公民权的一个条件。公餐的主食是不受人欢迎的，总是所谓的“黑汤”；娱乐和谈话的主题则围绕军事、打猎的业绩或同性恋者的友谊。

修昔底德称斯巴达人为穿着最简朴的人。在斯巴达，富人的生活方式要尽可能类似于普通人。然而，公元前4世纪及其后的许多关于斯巴达的史料（尤其是普鲁塔克的《吕库古传》）认为这种均等的程度无疑具有夸张成分。拿斯巴达和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做比较，以及从斯巴达人由俭到奢的道德堕落入手，来解释（公元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败并引起各种后果之后的）斯巴达在人口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可能会使人形成一种怀旧的情绪。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明显分化出了比较富有的斯巴达人与地产和不动产较少的斯巴达人。富有的斯巴达人想在政治上也取得更大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在达到可以进入握有实权的元老院（由28位“长老”组成）的年龄时，当选为它的成员。为了使这种分化所产生的社会分裂后果最小化，较富有的并在竞技活动（骑马和打猎）中更具竞争力的公餐成员，据推测（在理论上）会带来质量较好的肉食或面包，丰富了公餐的基本食物。在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中可以见到对公共会餐理想化的叙述，以下一段摘自此书，可供参考：

> 他（吕库古）为他们规定了固定量的谷类食品，以使他们的饭量既不太多也不太少。除了这些规定好的食品之外，打猎也能提供许多额外食物。富人们偶尔额外贡献一些小麦面包。结果，在他们离开会餐的帐篷之前，桌上决不会缺乏食物，但也不至于造成浪费。他还禁止在非必要的情况下饮酒，因为这会使身体虚弱，思想放松。他还规定每个人在口渴时应当喝酒，因为他相信这是最无害、最令人高兴的喝酒方式。

也许总有一些富裕的斯巴达人无视这些规范，私下过着较为奢侈的生活。这种情况与平等原则相悖，其后果是导致社会紧张。但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后来斯巴达连续称霸（公元前404～前371年）以来，这种情况似乎越来越多。占据领导地位的斯巴达人发现自己发财致富、吃喝玩乐和行使大权（由于统帅整个希腊的军队及其个人的影响地位）的机会来了，并且是不可抑制的。所以，斯巴达通过均等、约束、使竞争与娱乐同一化等手段来取得社会平衡的策略，在公元前4世纪及其后，便部分地失去了作用，即使当时正在编造的关于良好秩序和公民均等的神话，也没有改变这种情况。

斯巴达作为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多数国家在内的重要同盟[1]的领导国，倾向于支持某些政体。这些政体广义上可归类为寡头制。它们具有一些重要形式，即只有那些拥有超过一定财产水平的人，才能参与政治和担任公职。这类政体中有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公元前6～前5世纪之间）维持了政府的稳定。科林斯、

① 即伯罗奔尼撒同盟。——译者注

麦加拉、开俄斯是这方面的重要范例。他们可能利用这种政体（我们对其机制仍不清楚）避免了对社会上较贫困成员的过度剥削。然而，几乎所有这样的国家，从伯罗奔尼撒大战（公元前431～前404年）开始，在影响到大多数希腊城邦重大冲突和动乱期间，都多次体验到停滞、内战和政体变革的严重危机。

通向一致的雅典之路：动机、自由、差异与控制

雅典率先选择了一条较为公平和更为复杂的通向一致的路线。它也试图让周边国家接受与之类似的政治体系，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称霸爱琴海期间。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雅典（不断变动的）富人精英和较贫穷的大多数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利用的最早的文字史料是梭伦的诗歌和（晚近得多的）有关他的立法活动的历史记述。这些文字史料表明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梭伦受命担任特殊的立法者，负责平息在传统贵族、新近致富但对缺乏权力和势力感到不满的人和众多较为贫穷的农民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危险冲突。有些贫苦农民穷途潦倒，面临被卖为奴的危险；有的可能憎恨与富裕地主分享收成的长期规定——这些规定也许是先前几代人留下来的，那时山丘很多的阿提卡内地才刚刚产生农业。可想而知，还有一些富裕农民在（至今未加区分的）军队中充当重装步兵，他们感到为国家服兵役应当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那些不能提供重装步兵的穷人肯定憎恨富人的穷奢极欲和骄傲自大，讨厌他们在葬礼上过分摆阔，在私人酒会（交际酒会）和宴会上（在这些场合，有些穷人可能被迫作为“未被邀请的客人”或食客随从，以滑稽的、有损尊严的方式为他们的主人跳舞、作乐）上铺张浪费。

梭伦力求为所有公民及他们的依附者提供保护。为了防止经济剥削，他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和分享农作物的规定，并取消了债务。他还通过继承法使较小的家庭减少了断子绝孙的可能性，从而尽力维持经济与政治的稳定。他通过立法反对无礼或暴力行为，例如反对傲慢；他限制在葬礼上摆阔、过度服丧和随葬品过多。

更重要的是，梭伦根据农业收入的多少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即500斗级



我们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乞丐埃罗斯到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阿提卡喜剧中的“奉承者”和“食客”身上可以看出，属于较低阶层的人们可能被迫或被挑选出来，在重要的酒会（交际酒会）上为客人寻欢作乐。他们表演喜剧舞蹈、竞技运动或讲笑话。这只酒杯是一系列黑图彩绘阿提卡杯（所谓的“西亚那杯”）之一，属于公元前6世纪早期。杯上图案中的次要形象好像正用下流的舞蹈让宴会上的客人取乐。他们也显示出自梭伦改革以来（在改革时代，人们对雅典的经济与社会都很不满）形成的风俗。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可能体现的是在公共宴会上表演的比较正式的娱乐节目。

这尊年轻女子的大理石雕像（korē），装饰着编有花纹式样的头巾，佩戴着耳环和项链，十分精美。1972年，发现它与一位年轻男子的雕像葬在一起，出土地点是阿提卡的美兰达。它们大约雕于公元前550年，作为坟墓的精致标记。这个女性雕像的底座长久以来即为人知，上面的墓志铭确认死去的少女名叫皮拉希克里娅，清晰地表明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位少女之死的：

皮拉希克里娅之墓。我将永远被称为少女[korê]，给我这个称呼的是众神而不是婚姻。

（“500蒲式耳的人”）、骑士级——两个富有者等级、双牛级（中等公民，在军队中充当重装步兵）和雇佣级（穷人）。他按等级在公民之间分配政治职务，鼓励每个公民参与最终决策：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出席新的民众法庭（Heliaca），参与司法审判。不过，这种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限定产生的最重要的、全面影响可能是更严格地确认公民为社会的全权成员，并赋予他们一系列特权、权利、荣誉和义务。这也有助于使公民和居住在雅典的其他群体形成鲜明的对照。例如，定居雅典的移民不具有雅典公民资格。但最重要的区别是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区别。梭伦实行土地改革的一个后果——可能也是许多旧贵族令人惊讶地接受这些改革措施的一个原因——是扩大了从非希腊语地区（主要是黑海北部与南部的广大区域）输入奴隶。

梭伦的改革并没有立即创造稳定的政治局面。贵族家族与各自在当地的支持者之间的派系斗争，也许还有富人与穷人之间以阶级为基础的斗争，导致庇西特拉图及其子的僭主统治的建立（约公元前546年）。这种统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10年。后来，这段历史被视为相对良性的僭主制，此间梭伦的大多数新法律得以施行并得到巩固。当僭主统治结束的时候，贵族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剧烈冲突。属于阿尔克迈翁家族的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是领袖之一，他赢得了大众的支持，实行了一系列更深刻的著名改革，创立了更加民主的新机构，为所有公民全面参与他们自己的政治事务提供了新的机会。改革高度集中于公民权的概念，移民要获得雅典公民权变得困难多了，不管他们在阿提卡居住了多久。这样的新来者，现在正式称为外邦人（metics），当然作为他们的雅典保护人的德莫（或区）里的居民要进行登记[①]，而且（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起）男人每年得缴纳人头税12德拉克马，女人6德拉克马（这个数额并不太大，但具有重大的思想含义）。外邦人只有通过公民大会的特殊投票，才能成为雅典公民，这是对他们所做的特殊贡献的回报，但他们有可能被赋予较少的特权。不过，外国人仍然聚集雅典，受益于它在公元前5世纪的扩张所取得的经济繁荣和其他方面的实惠。在这个世纪中叶，雅典又颁布了一些对公民权加强限制的规定。此后，雅典公民的父母必须都是雅典人。这个规定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肯定是雅典男孩不再与外国女孩通婚，不管是（对贵族精英来说）与那些用友善与结盟的纽带（款待或“客人之谊”）连接起来的它国贵族家庭的女儿，还是（对所有人来说）外邦人的女儿，皆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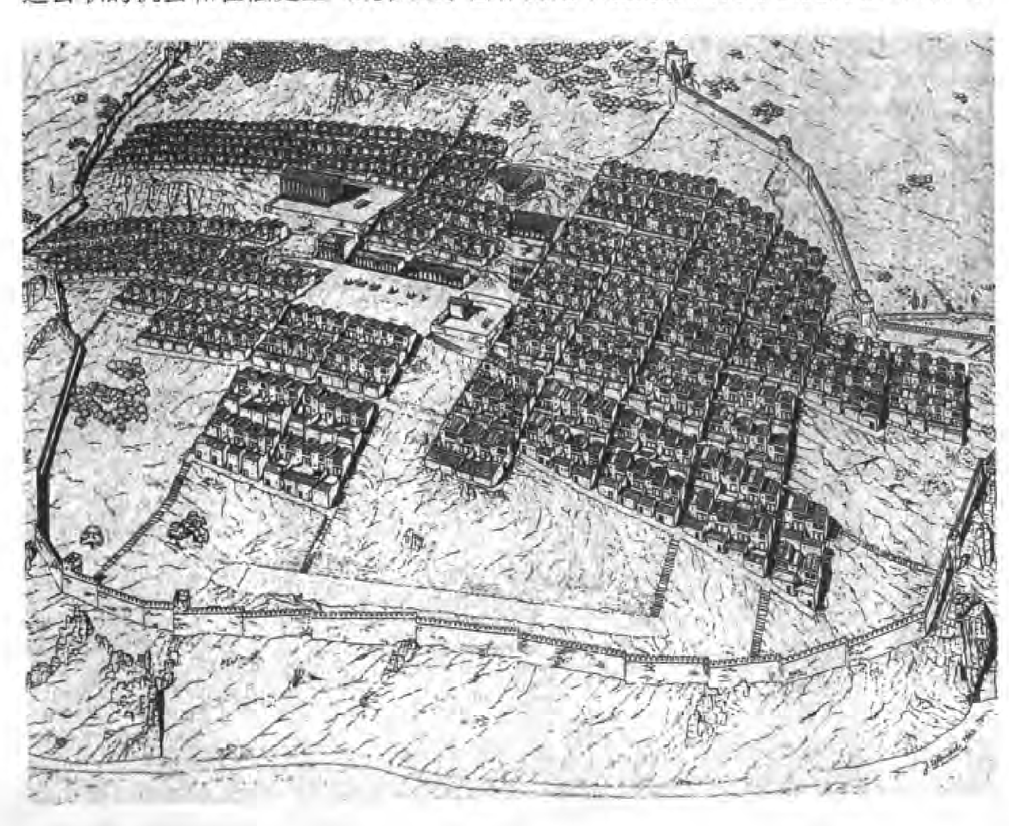
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贵族家庭可以通过在坟墓上竖立令人印象深刻的墓碑，尤其当男孩牺牲于战场或女儿在结婚前死去的时候，例如阿那维苏斯青年雕像和皮拉西克里亚少女雕像，来显示他们的虔诚、富有和权力。但是在克里斯提尼时代及稍后，越来越多的限制和压力迫使贵族富豪们把财富更多地用于社会，而不是花在个人的摆阔上。有一条法律禁止墓碑所

① 德莫是雅典的基层行政单位。——译者注

需的“劳动超过十人三天能干完的量”，而奢侈的纪念碑几乎完全被废弃了，直到公元前5世纪最后三个月里它们才重新出现（在其他城市也有类似迹象，即先对奢侈进行限制，后来奢侈的现象又重新产生）。然而，那个立法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雅典人一直按惯例使用普通的柱形墓碑，战死的人集体埋葬在一个石头砌成的祭坛似的墓中，每年用一种公开的仪式来进行悼念，而且国家领导人在仪式上发表爱国主义的葬礼演说。修昔底德的《历史》描述了公共葬礼的制度，并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关于伯里克利演说（于公元前430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年结束时发表）的版本。

雅典贵族的住房与服装看来并不奢侈，尽管据同时代的修辞学著作所说，公元前4世纪的房子稍微豪华了一点（考古记录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种情况）。然而，希腊的许多城市，包括阿提卡的海港城镇派里厄斯，采用了城镇设计的标准模式，即街道呈严整格子状，一模一样的房子组成了整齐划一的街区。

雅典的富人将他们的剩余财产花在奢侈的食物、精致的金银器皿和铺张浪费的酒会（见第91页和第201页）上，这一点并未被禁止。但是他们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使这种奢侈的消费降低到最小限度，并且更加慷慨、更加明显地把时间和金钱花在所有公民的利益上。主要是通过自克里斯提尼时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社会捐献制度，以适应一种较为平等和民主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方式，富人为国家的许多节日活动提供经费，做出贡献，赞助并指挥雅典的三列桨战舰——雅典取得军事胜利的基础。富人用这种方式做出奉献的动机不只是害怕不利的闲话和敌意，而且更为确定和更为重要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感激之情而产生的有条件的承诺，这种感激表现为“荣誉”或“政治职务”（这两者都用希腊术语“timê”一词来表达）。它采取这样一些形式，即更大的政治权威、更好的竞选公职的机会和在法庭上（现在几乎由作为陪审员的雅典贫穷公民所控制的）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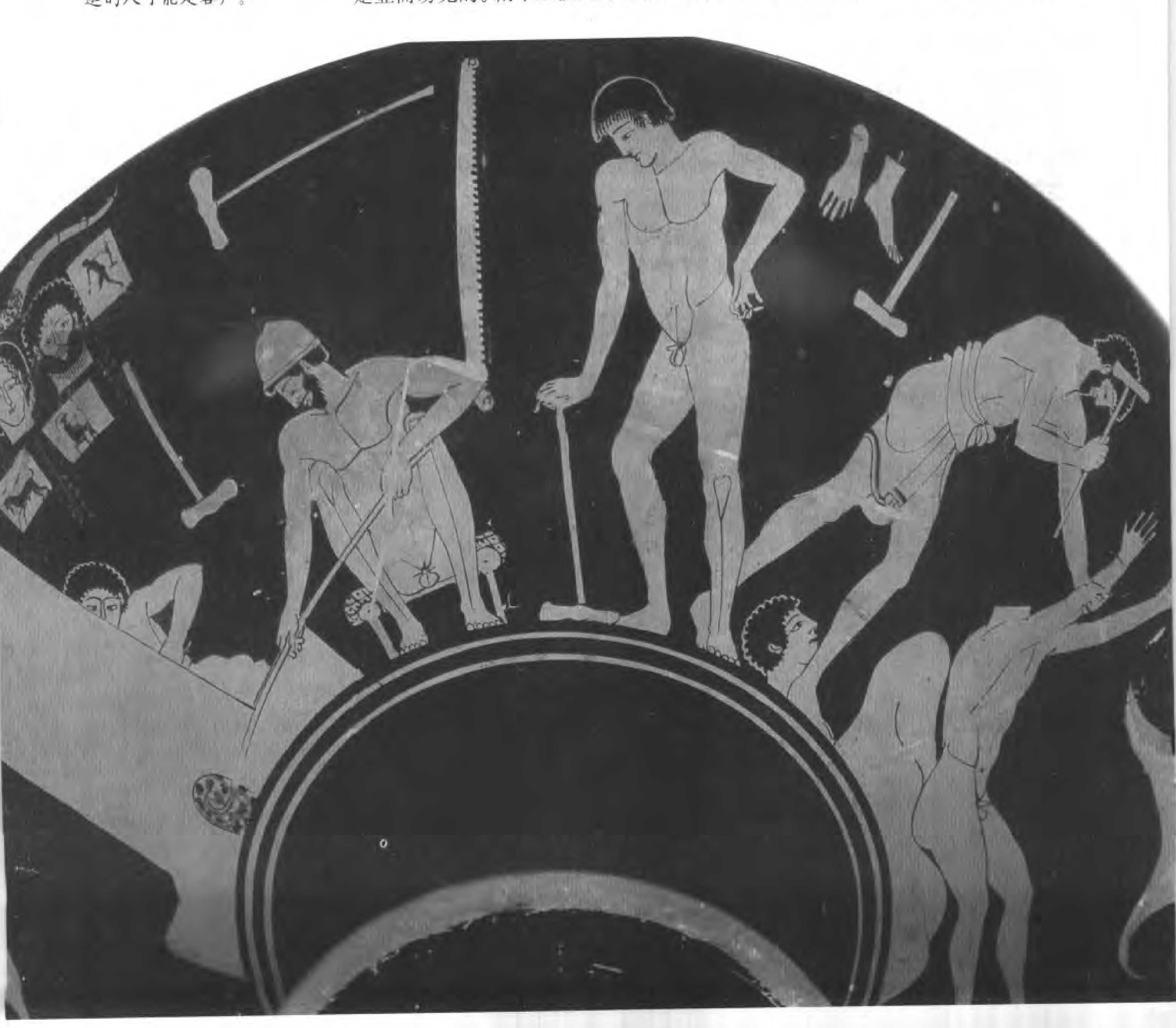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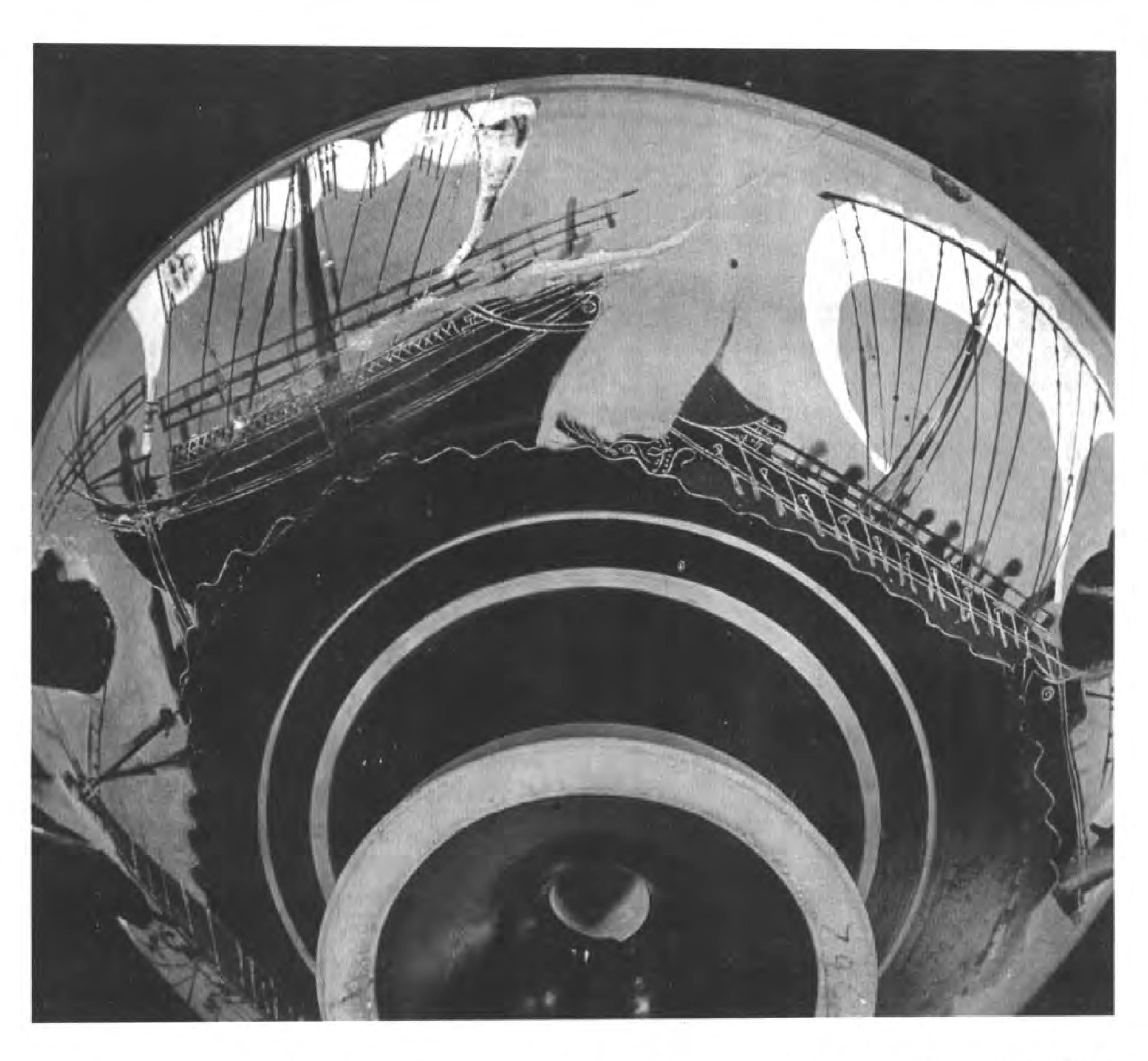
伊奥尼亚小城普里内位于小亚细亚梅安德河河口附近。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大概由于河里的淤泥充塞，这个较早出现的城市受到严重破坏，需要在一处新遗址上彻底重建。重建工程根据平等主义的城市设计规则展开。希腊人将这种设计方案与公元前5世纪米利都的设计师希波丹姆斯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位设计师的基本思想明显有些陈旧，但是他的作品在派里厄斯、米利都和罗德斯都被识别了出来。在普里内，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城市设计的主要特点是：明显地划出几块空旷的地方作为城市中心（广场）之用；还有一些主要的城市建筑，如主要的神殿和剧场；街道和大体相似的基本住宅区（八座房子均坐北朝南，组成一个街区）呈严整的格子状。每座房子有一个中央庭院、一间起居室、一间用来招待来访者或举办酒会的“最好的房间”，楼上还有一些卧室。

多胜诉的机会。

随着雅典帝国政治权力与经济的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早期起，致富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然而，在希腊其他地方，不管从经济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土地仍然是最重要的财富之源。大多数雅典人拥有一些田地。公元前400年左右，当有人提议（未被采纳）所有无地的人应被剥夺公民权时，似乎只有约五千名雅典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土地所有者。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只为公民（当然都是男性）享有，这进一步把他们与外邦人区分开来。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政治精英集团的所有成员本质上都是土地所有者，其中许多人属于世代具有影响力的家族，例如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迈翁家族。伯里克利的父亲与这个家族联姻，他事实上娶了一个名叫阿加里斯特的女孩。她宣称自己是西具昂僭主克里斯提尼（见第89页）的女儿的后裔。这样的人可以合乎情理地被称为贵族。但是新富人正在出现，他们的主要财富通常来自奴隶制作的商品（武器、衣服、灯具等等）。最初，许多旧富人和更为保守的普通农业公民，似乎对新富人成功步入政坛并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感到惊骇。这种现象在阿里斯托芬这一时期的流行喜剧中是显而易见的。剧中直接贬斥暴发户，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明显但可以接受的攻击。

随着雅典经济的发展，手工制作商品成为重要的致富来源，奴隶劳动也得到大量使用。这个绘有红色图像（称为"手工作坊的画家"）的精美的阿提卡陶瓶，属于公元前5世纪前期。它描绘出在手工作坊里制作青铜雕像的劳动情景。那些戴着帽子、形象粗鄙的赤裸工人大概是奴隶，那些腰上缠着布的工人可能是自由民，拿着棍子闲逛的人可能是客户。





如克里昂（Cleon）和他的制革产业。以下是关于辱骂的范例，选自阿里斯托芬创作于公元前424年的喜剧《骑士》。其中有位反对克里昂的将军德谟斯提尼，他讽刺克里昂是一个蛮族奴隶（Paphlagon），还骂他是一个皮匠、一个满口脏话、好斗又腐败的官僚，说他阿谀逢迎那些被视为愚蠢老人的人们（平民）：

> 现在我来告诉你，我们有一个主人，
> 他骨子里是乡下人，一个嚼嚼豆子、容易发火的人，
> 他是普尼克斯山的平民，一个坏脾气的小老头，简直是个聋子。
> 上个月赶集的那一天，他买了一个奴隶，一个臭皮匠，帕夫拉贡，
> 那是个彻头彻尾的罪犯，一个彻里彻外的造谣中伤者。
> 这个奴隶向他的老朽主人学到这些习惯，
> 干着制皮革的杂活，俯在他的脚边，
> 开始奉承、谄媚、阿谀、欺骗他。
> 停了手里的活计。

海外贸易对希腊城邦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用来交换的商品既有诸如谷物之类的大宗商品，以便在国内的歉收之年改善粮食供应状况，又有其他食物、饮料、金属和五花八门的奢侈品。这个黑图彩绘阿提卡陶瓶，属于公元前6世纪。它描绘一艘腹部很大、基本上靠风帆提供动力的商船，它的形状和性能与那些纤长、划桨的快速战船（三列桨战船）截然不同。画中一艘商船即要受到另一条船（可能是海盗船）的撞击。

穷人的自卫

阿里斯托芬的最后一部戏剧《财神》(公元前388年)情节离奇。据说财神是个瞎子，因此不公正的人是富人，而公正的人则是穷人。当财神的眼睛被治愈后，社会便转型了。但是在一场正式的辩论中，贫穷女神似乎举这个例子来反驳这部喜剧的男主人公克雷米鲁斯和他的朋友，并争论说，如果每个人都变得富有，那就不会有任何劳动的积极性了。克雷米鲁斯为了反驳她，回答道：贫穷无论如何是不幸的。但是贫穷女神的回答是指出可尊可敬、勤勉诚实的贫困与乞讨的贫穷之间存在重要差别。这个差别含有许多真理，但是几乎没什么奇怪的，这个道理并不能说服新近致富的雅典农民。以下是这场辩论的一个选段（第510～571行）：

贫穷女神：如果财神眼睛复明，并把财富平均分配给所有人，那么人群中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从事任何工艺或技术劳动——绝对没有一个人。如果这两种行业都被你毁灭，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悠闲地活着，忘记一切劳动的话，谁会愿意干金属制造的活儿，或建造轮船，裁制衣服，或制作轮子，或敲碎矿石，制作砖块，清洗衣服，或制造皮革，或犁地并收获德墨忒耳的果实？

克雷米鲁斯：你在讲废话。你刚为我们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有奴隶去做。

贫穷女神：你将从哪里获得奴隶？

克雷米鲁斯：我们当然用钱买他们。

贫穷女神：好，首先，谁会去卖奴隶呢，如果他也有钱的话？

克雷米鲁斯：哦，某个商人从帖撒利来，一块贪得无厌的奴隶商人的土地，渴望获利。

贫穷女神：但是，首先，根据你提供的论据，没有一个奴隶商人存在。哪个富人愿意冒着他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做那种事情？

所以你将不得不自己犁地、挖坑，做所有繁重的工作，而且你将体验比现在多得多的痛苦生活。

克雷米鲁斯：也许那种威胁对你的头脑有意想不到的影响。

贫穷女神：你没有一张床铺可以供你躺下——根本就没有床——也没有地毯——因为谁想去纺织呢，如果他有黄金的话？

当你开始迎接新娘的时候，你将不能向她洒香水，你也不能用色彩丰富的昂贵衣服打扮她。

如果一个人缺乏所有这一切东西，那富裕的好处是什么呢？

但是，与我共处，你将很容易得到你所需要的一切，因为我坐着像一位奴隶的女主人，向工匠们施加压力，让他们因为需要和贫穷而寻找谋生的手段。

克雷米鲁斯：你曾经提供过什么好处呢，为那些忍饥挨饿的小孩子们和一群老婆子？不过是从澡堂炉子中出来的水泡。

我不能告诉你虱子、蚊子和跳蚤的数量，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致于我们耳边的嗡嗡声把我们激怒，叫醒我们并说：“你饿了，起床吧！”

我们不得不穿得破破烂烂，没有一件体面的外衣；我们睡的是应急铺盖的草垫子，而不是床。草垫子上满是臭虫，我们睡觉时，它们就把我们吵醒。我们有的是一张腐烂的、应急的席子，而不是地毯；我们头边枕着的是一块又脏又大的石头，而不是枕头；吃的呢，不是几块面包，而是锦葵的新芽；不是大麦糕，而是枯瘦的萝卜叶子。用

皮塔科斯 (Pittakos) 是一位贵族，约公元前600年活跃于列斯波斯岛密提林邦的政坛之上，与诗人阿尔凯奥斯和萨福属于同一个时代。他当选为国家领导人达十年之久，握有大权并制定一些新法律，用以加强社会的协调一致，约束贵族的过分行为。其中包括一项措施，即酒后犯罪施以加倍处罚。阿尔凯奥斯讨厌他，骂他（在其他方面）出身卑微、肮脏、扁平足、肥胖。这尊来自庞贝的（相当晚后的）赤陶小雕像属“写实主义”的希腊风格，既体现出阿尔凯奥斯的诗所描述的皮塔科斯的身体特征，又表现出这位立法家在人们想像中所具有的像希腊古风时代七贤之一梭伦那样的“沉思”能力。



的呢，不是椅子，而是一个破碎的酒罐的上部；不是一只揉面钵，而是一个大贮藏桶，而且也破成了一点点。你能负责将我不能一一列举的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给予整个人类吗？

贫穷女神：你没有描述过我的生活，但你仔细研究过乞丐们的生活。

克雷米鲁斯：但我们不是说，贫穷女神是乞丐的姐妹吗？

贫穷女神：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也说，忒拉西布鲁斯和暴君狄奥尼修斯是一样的话。但这不是我所代表的生活的经历，而是宙斯的意志，也不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你所描述的生活，那是乞丐的生活，这种生活一无所有；而生活于贫穷之中是过着节俭的生活，艰难地从事你的工作，没有任何富余，但任何方面也不至于缺乏。

克雷米鲁斯：那么，受德墨忒耳祝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你描述了一个人节俭地生活，勤奋地工作，留下的东西不足以举行一个葬礼。

贫穷女神：你在尽力嘲讽和说笑，而没有注意保持严肃，没有意识到，在人们的思想方面和外表方面，我都比财神提供了更好的东西。财神的人是易患痛风的人、大腹便便的人、腿肚子肥厚的人、令人厌恶的肥胖者；而我的人呢，他们是纤瘦的、黄蜂形的，令他们的敌人望而生畏。

克雷米鲁斯：无疑是饥饿使得你的人瘦如黄蜂。

贫穷女神：我如今允许谈论自我克制，而且我将向你们显示与我生活在一起的秩序和体面，但财神的品质是傲慢。

克雷米鲁斯：是的，在房子的墙上挖洞和偷窃是很有秩序、也很体面的事。

布雷普西德姆斯：好啦，行了。如果他们不得不隐居着，那他们又如何不体面？

贫穷女神：好吧，瞧这个城市的这些政治发言人，当他们贫穷的时候，他们能公正地处理人民和城市的事务，但当他们从国库那里寻得财富后，他们马上就变得不公正，并阴谋反对群众，向人民宣战。

克雷米鲁斯：是的，那至少不是谎言。

目前很清楚，在阿里斯托芬死后几十年，他的戏剧不仅仍在雅典和阿提卡演出，而且也在南意大利的某些希腊城市演出。一些陶瓶为此提供了证据。比如这只出自塔兰敦绘有红色图案的容器，大约属于公元前370年，准确地表现了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地母节的妇女》(*Thesmophoriazusae*) 中的一个场景。那个男扮女装的男子是欧里庇得斯的亲戚。他在剧中混入妇女节日中，以便为欧里庇得斯辩护。他的男人身份被人发现。他当时在拙劣地模仿欧里庇得斯的一出剧《忒勒福斯》中的情节，抓住一只葡萄酒囊（代替欧里庇得斯剧中的婴儿奥瑞斯忒）作人质，威胁要在祭坛上“杀”了它（因此这个葡萄酒囊上挂着毛线鞋）。这个场景的幽默效果依赖于喜剧般的男性假设，即所有女人，不管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都畅饮葡萄酒，在她们自己的节日上用大量时间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克里昂和他那个阶层的某些人，似乎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平民主义和反富人的政治纲领作为回应。

公元前5世纪，雅典出现了一些新的致富途径和成功地发展经济的迹象，其中包括出租房屋，尤其是租给外邦人。许多传统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分散的农田的地主们，把他们的土地租给他人种植经济作物。有息借贷越来越多，例如贷款给船商，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但对国家和个人均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是阿提卡东南部劳里昂地区蕴藏丰富的银矿。有趣的是，源自采矿的财富的名声似乎介于受人尊重的土地财富和名声不佳的手工业财富之间。我们听说政治家尼西阿斯(Nicias)拥有的采矿奴隶数量最多（达1000名）。他想方设法使自己积聚的新财富免招一切带有偏见的耻笑。也许正是由于这笔财富来自地下，才使得它更易于和那些来自农业、较为人们所尊重的财富取得同等地位。

到公元前4世纪，许多传统家族已经渐渐消失，各种致富的来源变得司空见惯，因此在史料当中，人们对获得“新财富”的方式所持的偏见明显减少。我们

两种雅典人的财产

这里有两份作为部分法律陈述而保存下来的富人的财产清单。两者显示出有关财产及资金（投资在作坊里还是用各种不同的有息借贷形式贷出）的某些差异，也表明有一些大笔款项闲置或存储在银行里可供提取。

伟大的演说家和政治家德摩斯提尼首先就他父亲于公元前375年左右（当时他大约九岁）留给他的财产提起诉讼。德摩斯提尼的亲戚们作为他的监护人，负责管理这些财产，并侵吞了其中一大部分。德摩斯提尼到了法定年龄后，为了重新获得哪怕是这些财产的一小部分，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有关这份财产的最初陈述出自他的监护人之一阿弗柏斯，这是他在诉讼中提供的一系列法庭演说的第一部分。

这笔数目巨大的财产最不寻常的地方是它根本不包括任何土地财产。他的父亲，也叫德摩斯提尼，似乎想尽力为他的财产数额保密。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岳父基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由于在黑海地区遭到军事失败，而被判处一笔很大的罚金，因此老德摩斯提尼希望避开有关偿付基伦所欠国家债务的任何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避免为公共事务提供赞助。

陪审团的成员们，我父亲留下两座手工作坊，每一座都经营规模相当大的手工艺品生意。每个作坊拥有32或33名制刀匠[1]，每个制刀匠的价格几乎是5或6明那，至少不少于3明那。我父亲每年从这些工匠身上获得的收入是30明那。每个作坊又有20名制床匠，从低估价每人值40明那，创造的收入是12明那。他留下的金钱达1塔兰特，贷出去的占12%，每年获得的利息超过70明那。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生产资金。正如对方所承认的那样，这批资金总价值达4塔兰特5000德拉克马，年利润达5000德拉克马。而且，他还留下了工匠使用的材料，如象牙和铁器、制床的木头（约值80明那）、（用70明那购买的）栎五倍子染料和铜器、一座价值3000德拉克马的房子、家具和酒杯、黄金珠宝和衣物（这两项是我母亲的财产，共值10，000德拉克马）、家中现金80明那。除了他留在屋内的这一切之外，还有70明那用于海上贷款，借给了舒图斯。另外在帕西昂的银行里还有存款2400德拉克马，在派拉德斯的银行里有600德拉克马。还有1600德拉克马贷给了德摩（德摩斯提尼的堂兄）的儿子德摩梅勒斯，另有约1塔兰特贷款，不计利息的200或300德拉克马。这些的总额超过8塔兰特50明那。如果你们去调查的话，你们将会发现所有财产的总和约达14塔兰特。

德摩斯提尼：第27章《反阿弗柏斯》第9～11节（公元前364年）。

第二段摘自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埃斯奇尼斯（Aeschines，他本人将受到德摩斯提尼的控告，因其对派往马其顿王腓力那里去的一位和平使臣处置不当）设法剥夺了德摩斯提尼的一个政治盟友提马库斯的公民权。

所详尽叙述的财产（见第98页）大部分都是混合形财产。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富裕的个人只拥有少量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土地。有产阶级包括那些富得足以定期为公共事务提供捐赠的富人（可能有1000～1200个公民）和那些能够承担临时战争税（称为“eisphora”，为战争而设置的税种，征收对象是比较富有的雅典居民，包括外邦人）的富人（可能又有1000～4000人）。但是当这种征税通知颁布以后，这些人都必须在较短时间内拿出足够数目的现金。他们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在策略上部分依靠增加种植商品作物的数量，以适应雅典和派罗斯地区的城市市场的需要。他们通过这种方式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精英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高度参与政治事务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可能会导致死亡、流放或破产。或者，富人可能会蒙受突然降临的经济损失，例如收成不好（见第二章）。雅典社会上层的人员的快速变更是不足为奇的。

在社会等级较低的一端是25,000至30,000个普通公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疑仍然是小农场主。虽然他们享有政治与经济自由的程度，把他们与其他地区和时代的大多数农民区别开来，但我们恐怕还是可以将他们划为“农民阶级”。他

其方法是使陪审团相信，提马库斯作为一个年轻人，却依靠年长的人生活，既奢侈又放荡，败尽了自己的财产。

涉及“详细审查演说家”的相关法律，是人民对精英加以控制的一个范例，旨在使政治上担任公职的公民保持较普通公民高一些的道德标准，对虐待父母、逃避军役、自愿卖淫、挥霍自己所继承的财产，以及通常做出不符合一个适当的男子或公民的行为予以制裁。这种制裁——是以政治对手或私敌进行指控的形式出现——只有在那个被指控犯了此类行为之一的公民选择行使公民权利，即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向法庭提起诉讼，或争取某个公职的时候，才能够执行。但它好像几乎未被执行过。

提马库斯父亲的财产是一个良好的例子，即体现了能够承担社会捐献的阶层（有能力为社会捐献活动付费的人[2]）的资产来源多样。

提马库斯的父亲留给他一笔财产，另一个人倘若用这笔财产甚至可以进行社会捐献。但是，他却连为自己保存它都做不到。他在卫城后面有一座房子，在斯菲图斯有一块空地(eschatia)，在阿罗佩塞有另一块土地(chorion)。除此之外，还有9或10个从事制鞋业的奴隶，他们每人每天能带来2奥波尔[3]的固定收入（apophora），而那个手工作坊的管理人每天能带来3奥波尔的固定收入，另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熟练工人，女人娴于亚麻纺织，她将自己的精美产品带到市场上销售；男人则熟知刺绣；还有一些人欠他钱。另外还有家具……他把城里的房子卖给了喜剧诗人诺西克拉特斯，后来合唱队长克里埃尼图斯以20明那的价钱从诺西克拉特斯手里买下了它。那块空地面积很大，但提马库斯却让它变成了可怕的荒地，于是米希诺斯的穆尼思修斯把它买了下来。在阿罗佩塞的那块地，离城墙有11或12斯塔得[4]远。我听说他母亲恳求他把这块地单独租出去，不要出售，如果没有别的用场的话，让他留给她作为墓地。但是，提马库斯甚至连这块地也没有留下，而是以2000德拉克马的价格把它也卖掉了。他没有保住男女奴隶，把他们变卖殆尽。他父亲贷出去的钱，提马库斯将之追回并花了个精光。关于这个情况，我将提供斯菲图斯的梅塔根尼斯作为证人，此人欠他30多明那，并偿还他在其父之死时仍然欠着的7明那。

埃斯奇尼斯：《反提马库斯》（公元前346年或345年）。

(1) 老德摩斯提尼是雅典的奴隶制大手工作坊主。——译者注

(2) 雅典公民不必交纳赋税，但富人需承担所谓“社会捐献”的义务，数额相当大。能够承担的人都是雅典的富人。——译者注

(3) 古希腊小银币或价值为1/6德拉克马的重量单位。——译者注

(4) 古希腊的长度单位。——译者注

希腊人倾向于把所有外国人看做是“蛮族”人“barbarians”，尤其是那些臣属于波斯帝国的人，因为他们怯懦、柔弱、适于做奴隶。这种倾向在他们大败波斯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50年的战争中）之后大大加强了。这个属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酒罐上，有一个近乎赤裸的男子，手握着自己的阴茎，正在向前疾行。酒罐上写着：“我是欧里密顿。”这句话也许可以被认为出自这位青年人，他可能把自己当做雅典同盟军于公元前469年左右在欧里密顿河边战胜波斯的一个象征。右页图那个穿着东方人服装的男子，明显地做出一副顺从的姿态，无疑（且理所当然地）是在说“我屈服了。”在这样的政治解释当中，（虽然也有其他解释），希腊人对波斯的胜利被表现为对懦弱顺从的敌人的性侵犯。



们在文化上并非微不足道。在阿里斯托芬的许多戏剧中，标准的领袖形象（如《阿卡奈人》中的迪卡奥波利斯）是一位重装步兵兼农民。在公开讲演（如葬礼上的演说）和公共艺术（如帕特农神庙的雕塑）的杰出作品中，有许多地方也把理想公民描述为重装步兵。有些文本（见第96页）推测，由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浩劫和破坏的结果，农民中的贫困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学者认为贫苦农民阶级在急剧衰落。但是，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公元前4世纪的民主政体非常稳定，经济上实行保守主义，与这一观点显然格格不入。事实上，正如近来一些推测性成分相当大的统计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也许大约8%～10%的有产富人大概拥有可耕土地的三分之一（通常表现为几种不同的财产拥有形式），而大多数重装步兵和一些较贫穷的公民（按梭伦的分类法应归为雇佣级）可能拥有小块农田，大概只拥有六公顷地或者更少。无论怎样，许多雇佣级公民可能主要作为受雇的农业劳力，或者在城市中从事手工劳动或零售活动。其他公民可能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与人数较多的非公民共事和竞争。

虽然由于大多数公民必须习惯于艰苦劳动和精打细算，但他们承认可以接受的贫穷与赤贫、乞讨（见第96页）之间的区别。他们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亲自参与有关公共事务和税收制度的投票，享受数量相对较小的经济再分配。例如，公元前4世纪中期设立了一种专门的观剧津贴，意在（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作为民主的一个象征）使所有公民能够更容易地参加城市的酒神节（City Dionysia）[①]活动。城市酒神节是用来团结整个城邦和庆祝公民身份的两大节日之一（另一个是泛雅典娜节[②]）。通过演出伟大的悲、喜剧作品，这个节庆起到了对城邦政治与社会的原则及其全面加以审视和质疑的作用（见第九章）。

对这一制度的稳定来说，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这样一个事实：较贫穷的公民有权在民众法庭中担任陪审员（见第148页），他们对贵族的行为确实具有某种监督意义。然而，那些应受到尊敬的穷人对重装步兵和其他较有势力的集团享有更大

① 主要在雅典举行的古希腊季节性节日，尤其是秋季举行，以纪念酒神狄奥尼索斯。——译者注

② 每年在雅典举行一次，后来每四年举行一次，规模盛大。——译者注



的权威不满到什么程度，我们并不清楚，但他们作为水手，毕竟对雅典的军事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自公元前480年以来，由于雅典帝国（见第169页）具有航海的特点，他们在军事方面的贡献比重装步兵和骑兵显然要突出得多。在公开演说和公共艺术上强调重装步兵的美德，也许会引起某种抱怨，许多做出贡献的人显然没有受到像对理想的重装步兵公民那样的赞美（严守纪律、勇气十足、具有社会价值等）。究其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勇气或不守纪律，而是因为他们不是重装步兵。不过，他们中的大批人也可能以实际行动或雄心壮志，设法证明自己具有理想的重装步兵的这些价值。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明白，成年男性公民仅占阿提卡全部人口的15%左右，大概也就是20万人中的3万人。自然，他们肯定都自认为自己比其余的人优越，而且他们肯定都能对非公民（家中的妇女和孩子，外来的家庭和奴隶）行使某些权利，虽然行使方式不尽相同。当然，并不是所有雅典人都拥有奴隶，所以有关奴隶的数量，尤其是小农场里的奴隶人数，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见第192页）。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把自己看做是潜在的奴隶主。许多经营不好的农民或店主，可能根据其各自的需求状况，在不同时期里买卖奴隶。奴隶制以这种方式极其有效地避免了比较穷困的公民可能产生的不满情绪。雅典人基本上把所有奴隶都视为蛮族，认为由于征服而变为奴隶的蛮族较希腊人低劣，这可以从他们在许多战争中的失败看出来，尤其是公元前490年至前450年对波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能够为外邦人做担保或者将农田或生意租赁给外邦人的雅典人，要比拥有奴隶的人少得多。然而，所有雅典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遇到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阶层，也能感受到他们自己在法律与社会方面的优越性。当然，许多外邦人，如手工业者、商人、银行家等等，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些人，像普罗塔哥拉斯或亚里士多德，是他们那个时代知识界的领军人物。无论如何，普通的雅典公民一方面意识到自己与富裕的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这些联系使他们成为一个有凝聚力和较优越的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是公民集体的成员，一个因参加者享有的特权和殊荣而联合在一起的“男性俱乐部”。

第五章　妇女、儿童与男人

在古希腊人和我们自己通常的想像中，希腊妇女把她们的时间花在室内的羊毛编织活和其他家务上，就像这个花瓶上的图像所描绘的一样。那个坐在左边的女人正在监督一个女奴纺纱，在她的椅子旁边，放着一个装羊毛的篮子。坐在右边的女人正绕着自己的膝盖扯着松散的羊毛，她的腿支在一个特别的脚支架上（为了做这种工作，女人们有时用一种特别的陶制工具置于她们的膝盖上，如对面的示图）。另一个女人正在把纱线纺到纺锤上，她把这个纺锤举到装羊毛的篮子上方。那个坐在她左边的女人正抽出一大股羊毛，而一位右手拿着响板的女人正在跳舞，为工作着的人们取乐。有盖陶瓶，收藏于杜里斯学院（希科忒斯组），约公元前460年。

由于在古代城邦中妇女被排除于政治权利之外，所以城邦经常被看做是“男人俱乐部”。男人组成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上做出影响整个社会的决策；男人是法庭陪审员；城邦的几百个公职人员全是男人。而且，从社会思想的视角来看，城邦的空间被隔离：公共领域属于男人，而妇女则被限于家中的私人领域。

然而，这种说法并非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第一，享有公民权利的男人本身只占城邦人口的少数，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城邦，包括最著名的城邦雅典。而我们关于古代希腊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史料主要来自雅典。雅典肯定不是一个典型的城邦，它在古代希腊世界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其他城邦也大体上经历了与雅典相似的政治史，具有与雅典相似的制度机构和社会结构。

雅典居民除了男性公民之外，还包括大量男女奴隶、定居在雅典的男女外国人或外邦人（其人数与公民人数大致相当）、公民的妻子和孩子。公民的妻子享有公民身份，但这主要是赋予她生养孩子的权利——儿子将来成为公民，女儿将来成为公民的妻子。

第二，除了政治领域，在古代城邦中，市民的公共生活还有其他方面，妇女、非公民，甚至奴隶都在许多领域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宗教和经济领域以及在德莫或村庄社区中的各个方面。第三，社会思想把男人安排在公共领域，把女人安排于私人领域，但这不过是一种理想。许多希腊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非常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考察古代希腊社会与文化实践的某些细节，实际情况看来就大不一样了。



城邦：一个献祭的社会

城邦也被描述为一个献祭的社会，因为宗教渗透到它的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向众神供奉动植物祭品构成古希腊宗教仪式的核心（见第十二章）。而且，每当到了指定的一年，雅典就会花大约半年时间举行各种各样的节日庆典。这些节日中有35个左右的节日是主要节日，其中许多节日持续好几天。在该城的宗教典礼上，作为雅典人的骄傲最常被赋予雅典公民和他们的儿子，但是一些节日仅限于有公民身份的女人参加，而其他一些节日则给予她们重要的地位。外邦人和他们的家庭也参加某些重要的城邦庆典。在另外一些节日上，甚至奴隶也有一席之地。

庆祝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生日的泛雅典娜节，设在节日年的第一个月（大概相

思想意识

亚里士多德在著作中写道，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们（他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地区组织成宗教团体）看来，在这个可感知的世界里隐含的规律不只一条，而是十条。它们以成双成对的对立形式出现：有限与无限、奇数与偶数、单数与复数、右与左、男与女、静止与运动、直与曲、明亮与黑暗、善与恶、正方形与长方形（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城邦的思想意识领域由二极和类似的原则构造而成，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是这一原则支配的范畴之一。上列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十组对立关系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还有一句谚语——一位后世作家认为它是由传统称为第一个希腊哲学家的米利都人泰勒斯（公元前585年）所言——详细阐述了一套类似的但不那么抽象的对立关系。据说，泰勒斯在三处叙述中表达了对命运的感激之情："我生为人而非兽，生为男人而非女人，生为希腊人而非蛮族人。"

然而，文明与粗暴，希腊人与野蛮人，这两组对立关系并不总是表现为类似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帕特农神庙雕塑中，战争女神雅典娜和亚马逊女战士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另一种对照，即承认附属于男性的女神和拒绝承认附属于男性的神话中的女人之间的对比。

这种思想意识的版本被翻译到人类和家庭领域，就在卑微得多的艺术媒介上得到了表达。例如，这里展示的护膝是女人们纺织羊毛时使用的工具，它的一面描绘了全副武装、准备战斗的亚马逊女战士。但这个瓶子的另一面则描绘着合乎传统要求的雅典人的妻子，正在家内的女人活动空间纺织羊毛。她们自己的方式体现了雅典娜的意愿——雅典娜·厄尔加涅（"工人"）[1]还是她们的家务技能的保护神。此图为画家狄奥斯弗斯（Diosphas）所作，时间约在公元前450年。

[1] 雅典娜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被尊为战争和智慧女神，同时也是音乐、手工工艺和妇女家务技能的守护神。——译者注





泛雅典娜节庆祝雅典娜的生日。她那闻名遐迩的出生——身披铠甲，完全出自宙斯的头颅——在黑图彩绘的陶瓶上是个流行的题材。这个双耳细颈椭圆陶罐（用来运输或储藏酒的容器）描绘《荷马颂诗》中有关雅典娜出生的情景："宙斯自己从他那神圣的头颅上生下了她，而她穿着用来作战的金黄色盔甲，闪闪发光。当她从手持神盾的宙斯那不朽的头上蹦出、挥舞一把尖头矛的时候，众神都在观看，充满了敬畏之心。"这里令人敬仰的众神中，最左边是赫耳墨斯[1]，正在弹竖琴的是阿波罗，最右边是全副武装的阿瑞斯。宙斯面前站着白臂生育女神埃蕾西娅，她举着手臂，其手势与接生婆有关。双耳细颈椭圆陶罐。E组画家作于公元前540年左右。

当于7月），活动内容极其丰富。参加庆典的人有公民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妻子、外邦人和他们的家人、被释奴隶和非希腊人。在雅典帝国时期，还有同盟城邦的代表。然而，与此同时，这些群体之间的身份区别也被打上了清晰的烙印。

例如，泛雅典娜节的献祭过程在各个团体的引导下举行，这些不同的团体由佩戴着不同庆典标志的少女组成。但是，来自贵族家庭的女孩领先于那些来自普通公民阶层的女孩，年长的男人与那些正处于服军役年龄的男人分开游行，宗教公职人员与男女祭司组成他们自己的分队，外邦人的儿子与外邦人的女儿分开游行，等等。在其他节日场合也采用类似的仪式，尤其是在游行或仪典游行作为庆典组成部分的场合。

分析泛雅典娜节的整个内容及其预演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与其他城市生活领域中同样存在的差异，如年龄、阶级、性别和地位的区别。具有公民身份的女孩和妇女在仪典范围内享有各种特权，她们完全有可能从这些身份特权当中体会到某种程度的公民自豪感，觉得她们自己是而且事实上也是一个独特的、高贵的社会群体成员。

其实，女孩在城邦中扮演特殊的仪典角色比起男孩来要更细致。女孩在一些仪式中可以发挥作用，像为雅典娜编织女式长外衣（"长袍"）或清洗受人崇拜的

(1) 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科学、发明、口才、幸运等的神。——译者注



雅典少女保留着的一项特权是在宗教游行（如泛雅典娜节上的宗教游行活动）中被称为kanêphoros（“提篮者”）。例如，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吕西斯忒拉忒》中，妇女合唱队异口同声地说话，她们声称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独特之处和为之服务：“从前，当我是一个美丽少女的时候，我是一个提篮者，戴着一条用干无花果制成的项链（与多生育有关）。”

在这个陶瓶上，有一位（可能）出身贵族的年轻女孩，左手臂夹着一只仪式用的篮子（kanoun），右手向一个燃烧的祭坛倒酒。她后面是一个基座，上面画着一个焚香炉。那个篮子很典型，装着用于血祭的工具。在游行结束时和奠酒祭神仪式之后，少女把这个篮子递给一位从事献祭活动的男祭司。女孩和妇女不得参加血祭，但是她们却在仪典活动进入献祭之前以及相应的献祭之后扮演角色。

这个场景绘在一个基里克斯陶杯[1]的内壁上。这是一种酒具，主要与饮宴（见第119页）有关。出自马克隆，公元前5世纪早期。

雕像，碾碎谷物用作供奉雅典娜或德墨忒耳的庆典蛋糕，作为助手在位于布劳农的阿尔忒米丝神庙为阿尔忒米丝服务，或者当她们游行至港口上的阿波罗·德尔斐尼奥斯神庙时，拿着供仪式用的特殊的橄榄枝，在那里向神灵做赎罪祈祷。参与诸如此类的许多宗教职能的人，要么只限于一些女孩，要么限于贵族出身的人。但授予少数这类女孩特权可能意味着，作为一个群体的女孩，对于这个城市的宗教仪式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男孩子肯定经常随父亲参加宗教仪式。他们从中学会这些礼仪，人们可能期待他们今后遵守这些礼仪。直到他们成为青年（参加军训的青年男人），城邦的男孩才能在城市的主要节日上按例扮演光荣的角色。但也有一些节日，他们可以扮作小孩。例如，在安泰斯特里亚节，男孩们参加某种包括荡秋千的仪式，也参加饮酒仪式日（见第323页）的庆祝活动。在披亚诺普西亚（Pyanopsia）和塔尔哥里亚（Thargelia）这两个阿波罗节日上，男孩举着折成圆形的橄榄树枝，上面装饰着羊毛，挂着果实。他们唱着歌曲，请求受到款待。

[1] 古希腊的一种有双把手的浅酒杯。——译者注



在安泰斯特里亚节[1]的第二或第三天，男孩与女孩参加一种荡秋千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有个器皿被置于地上，冒着浓烟。孩子们在烟雾中荡着秋千，其目的与意义并不清楚。这在某个方面与传说中发明酿酒方法的雅典人伊卡瑞斯的女儿艾瑞根有关。伊卡瑞斯用一些牧羊人来检验他的发明，结果这些牧羊人喝得酩酊大醉，在发酒疯时杀了他。艾瑞根发现他的尸体之后，就上吊自杀了。在这个双耳大杯或酒杯上描述了有关这种仪式的神话版本：一个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正在推坐在秋千上的美丽仙女安提亚（"花"）。秋千下面没有器皿，但是器皿的确出现在其他有关这种仪式的花瓶上。画家潘奈罗普作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

男孩和女孩都在庆典场合里参加合唱与舞蹈。例如，潘尼西德斯节（Pannychides，"通宵节"）主要是崇拜狄奥尼索斯和德墨忒耳的节庆，尤其需要女孩和妇女的参与。在塔尔哥里亚节上，男人与男孩组成的合唱队分别角逐奖品。而且男人与男孩参加体育和音乐比赛，这些比赛是像泛雅典娜节这样的雅典重要节日的组成部分。

在与掌管雅典谷物收成的女神德墨忒耳和科尔有关的宗教仪式上，女性公民的地位就显得特别突出。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是播种节（Thesmophoria）。这是一个专门的妇女节，全希腊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庆祝这个节日，但只有公民的妻子可以参加。在雅典，这一节日设在10月下旬，延续三天。第一天，妇女们从家中出发，在一个营地上集合。第二天，她们斋戒。第三天，她们举办宴会，开展庆祝活动。在节日过程中，妇女们先前奉献的剩余供品被拿回去，然后与谷物种子混合在一起。

对妇女播种节意义的解释通常集中于它的假日功能，摆脱日常家务，强调妇女与农业丰产和生儿育女有关。但哈罗阿节（Haloa，在1月为崇敬德墨忒耳和狄奥尼索斯而举行的妇女节）、斯奇拉节（Skira，在7月的庆祝打谷节）和播种节的季节性举办时间与那些由男人们完成的各种农活的季节相交叉。因此，在这种节日周期之间，妇女自身不仅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群体，而且通过她们的仪式，负责确保男人从事的农业劳动能够取得成功和繁荣。

外邦人也参加泛雅典娜节的游行，他们同样有幸在大酒神节（Greater

(1) 雅典人为酒神狄奥尼索斯举办的节庆。——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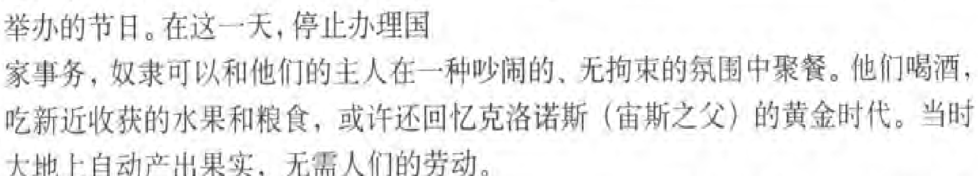
Dionysia）[①]的游行中扮演庆典上的角色。在其他节日里，如赫菲斯提亚节（Hephaestia），他们被指定提供献祭牺牲的一部分。然而，外邦人可能没有权利在泛雅典娜节和其他主要的城邦节日上分享牺牲。不过，尤其是在雅典的派里厄斯地区，外邦人也许可以经城邦授权设立宗教仪式，歌颂他们自己的神祇：来自埃及的外邦人在那里举行有关伊西斯的宗教仪式，色雷斯人举行一种有关本迪斯的仪式，而塞浦路斯人有他们自己的关于阿施塔忒（阿芙罗狄忒）的神殿。



在赫希俄德叙述世界生成、众神诞生的叙事长诗《神谱》中，克洛诺斯是天神（乌兰诺斯）和地母神（该亚）之子，他是泰坦神之一，属于众神中最早的、较年长的一代。为了预防被自己的儿子打败，克洛诺斯在他的孩子们从他的妻子瑞亚的子宫里出生之时就把他们吞掉了。但是当宙斯出生时，瑞亚欺骗克洛诺斯，她把宙斯藏起来，而把一块裹在襁褓里的石头交给了他。在这个花瓶上就描绘了这个情景。在《神谱》中，克洛诺斯吞下石头，后来宙斯长大了，强迫他把石头吐了出来。但是在这幅画中，克洛诺斯对他的婴儿的出生非常惊讶，其反应更像一位人类的父亲。

根据赫希俄德在另一首长篇叙事诗《田功农时》中所表达的不同的神话观点，克洛诺斯时代是希腊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像神灵那样活着，摆脱了劳作与痛苦”。那个时代的人们不会衰老，而且“出产谷物的土地自然而然地结出果实”。因为无需农业劳动，奴隶制在这个神话时代也闻所未闻。奴隶们参加一年一度的克洛尼亚宗教节庆，在现实的日常生活的束缚中，享受一下那个神话时代的自由。派里克。诺西卡画家约作于公元前450年。

某些城市庆典，如泛雅典娜节，奴隶也有资格参加。所有希腊人，包括奴隶，都可以参加厄琉西斯（Eleusinian）秘仪的宗教仪式。克洛尼亚节（Kronia）是一个专门为奴隶举办的节日。在这一天，停止办理国



家事务，奴隶可以和他们的主人在一种吵闹的、无拘束的氛围中聚餐。他们喝酒，吃新近收获的水果和粮食，或许还回忆克洛诺斯（宙斯之父）的黄金时代。当时大地上自动产出果实，无需人们的劳动。

城市中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狄阿西亚节（Diasia）的庆祝活动，这是宙斯·美里奇奥斯（Meilichios，“和善者”——在地下世界显灵的神）的节日。在更加庄严的仪式之后，家人和朋友在一种欢乐的气氛中举行宴会。毫无疑问，妇女、外邦人和奴隶可以以非正式的身份参加许多仪式。至少在一个公元前4世纪的法律诉讼案中，有个起诉人解释说，一个因通奸被抓的妇女，禁止参加任何公共祭祀活动。他还补充说，甚至允许女外邦人和女奴隶观看庆典盛况，还可以进行祷告。这个事例的含义似乎很清楚，在这个城市，即使是没有担任公职、政治上无权的群体，以观众的身份出现是理所当然的，除了那些他们被特别禁止参加的节日。当他们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城市的名义，自由地表达个人的虔诚。



证　据

在卢西安[②]的《关于爱情的对话》（公元2世纪）一文中，有个憎恨女人的人，

① 包括城市和乡镇的酒神节。——译者注

② 卢西安（Lucian，约120～180年）古希腊修辞家和哲学家，叙利亚的希腊移民城市萨莫撒塔人。40岁时迁居雅典，后来又移居埃及，并在那里去世。他的作品主要是对话体短文，内容广泛，涉及宗教、修辞学、哲学等论题。——译者注



希腊远征军的领袖阿伽门农从特洛伊战争中归来之后，被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及其情夫、也是阿伽门农的堂弟、其王位篡夺者埃癸斯托斯(Aegisthus)合谋杀害。这场谋杀及其后果——克吕泰涅斯特拉之子奥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其母，后来他受到审讯，被判无罪——是埃斯库罗斯著名的悲剧《奥瑞斯提亚》三部曲的主题。这个瓶画将谋杀罪行的主要责任归结于埃癸斯托斯。他推翻了无助的国王，身披一件透明的王袍，而克吕泰涅斯特拉挥舞着一把斧头，跟在他身后(右边的女性图像头发未扎好，可能是阿伽门农的女儿厄勒克特拉)。

在花瓶背面，奥瑞斯忒斯杀死了奸夫埃癸斯托斯，这在传统观念看来是值得称颂的业绩。然而，他杀害其母却很成问题。在《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中，奥瑞斯忒斯呼唤雅典娜把他从他母亲的狂怒追逐中解救出来。为答复奥瑞斯忒斯的请求，雅典娜确立了陪审团审判的规则，挑选了一个公民法庭(战神山法院[1])听证这个案件，制定"一切时期都适用的法律"，并详细规定其操作程序。投票结果难分伯仲，雅典娜打破了旗鼓相当的局面，支持奥瑞斯忒斯，很像安提丰演说中的那个控告人，自己宣称"站在丈夫即房主一边"。绘着花纹的双耳喷口杯。画家道吉马希亚约作于公元前460年。

[1] 古代雅典的贵族议事会，曾经拥有极大的权力。民主制建立后，其左右政治的权力被剥夺，最终保留了审理杀人案件的司法职能。——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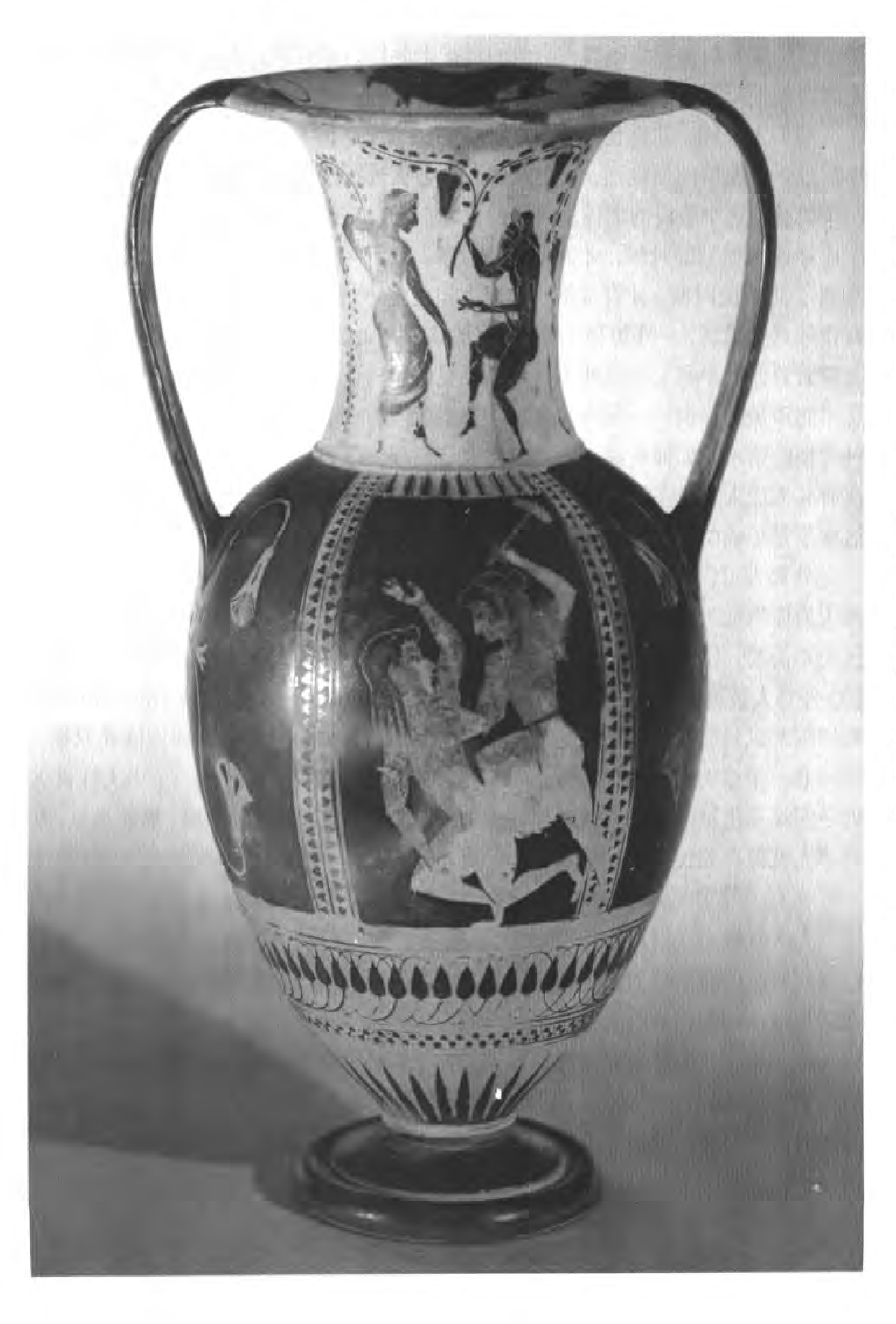
争论共有一个女情人的女人们的长处，这个女情人极力为妇女辩护，以至那个厌恶女人的人对他的反对者说："倘若公民大会和法庭向妇女开放，倘若她们可以参与公共事务，她们也许要选举你为将军或投票为你立一尊青铜像。"但这些集会场所事实上并不对妇女开放，正如这位厌恶女人的人接下来所指出的那样，他提醒他的对话者"男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代女人说话"。

事实上，我们发现坐落在阿哥拉东北和南部地区及这个城市其他地点的雅典法庭里，在他们辩论的许多案子中，就是这样做的。举个例子，在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案例中，一个被控谋杀丈夫的妇女的罪行是由她的继子提起诉讼的，而她的儿子则为她辩护，即使她本人仍旧健在。我们只知道控告人陈述的有关这个案件的一面之词。值得注意的是，他毫不犹豫地引用神话先例，把他的继母描绘成克吕泰涅斯特拉，或者简单地借用埃斯库罗斯的著名悲剧《奥瑞斯提亚》三部曲的论点声称，一个儿子的职责更多的是为父亲报仇而不是保护母亲。

然而，在其他比较平常的案例中，一个妇女在家庭成员面前所提供的个人证据可以被当做证词，而且经常具有很重要的分量。妇女可以通过一个特别的程序

——这个程序要求她们在德尔菲尼昂（一座阿波罗神庙）的仲裁人面前宣誓，之后，妇女便可以提供证据。但是有公民身份的妇女从来不能作为诉讼人在法庭上出现。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实践中做出某种判断时甚至不会提到一个妇女的名字，除非她是一个名声很坏的人，或者诉讼人希望以她的名字代表她这个人。

无论如何，妇女恐怕没有机会从事我们听说过的大多数犯罪活动，如袭击他人、破坏财物、通敌和其他需要进入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才发生的此类犯罪行为。而涉及家庭法的案件可能由妇女的监护人——她的丈夫、父亲、儿子或其他成年男性亲戚处理。但是，考虑到在宗教事务中妇女的突出作用，在我们知道的某些



人们期望，男人们在法庭上进行的审议工作，应该由城邦的法律或者当没有专门的法律可适用的时候由正义（dike，狄刻）的法则来指导。根据赫希俄德的《神谱》，狄刻是一位女神，由宙斯的第二位妻子忒弥斯所生，与女神荷赖（Horai 季节之意）、欧诺弥亚（Eunomia，法制）和厄瑞涅（Eirênê，和平）一起“监督着会死去的人类的工作”。因此，在希腊社会的许多领域里，妇女本身虽被排除在外，女神们却被召唤而来。这只陶瓶上显示，狄刻成功地征服了不公正之神或非正义之神。狄刻既矜持又沉着，头发盘成一个发髻，衬衣的衣饰悬垂成有规则的褶皱，束着一条腰带。不公正之神用力挥动手臂，面部特征明显而异常，张着嘴巴，披头散发，敞着衬衣，文过的手臂和腿怪异地乱舞。这是阿提卡红图双耳细颈椭圆陶罐。属于公元前520年。

案件中妇女因不虔诚被起诉（并被宣告无罪），是不足为奇的。

当对小的侵权进行争论的时候，一个有公民身份的妇女，也可以运用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中一个卖面包人用来反对菲洛克列昂的程序，当时她在一个负责处理“毁坏商品”的城邦公职人员面前拽住了他。如果受损失的金额低于一定数目，这种赔偿便适用于一切情况。肯定有许多法律案件是通过城邦的公职人员或私下里通过仲裁人在法庭之外解决了。

然而，一个身份受到公开质疑的妇女恐怕就要被传唤亲自到庭了。例如，在尼埃拉的案例中，那个被控以一个外邦人的身份非法侵犯公民权利的妇女。按照可能是杜撰的记述，演说家希波里德斯（Hyperides）为妓女弗里涅（Phryne）辩护，这位妓女被指控为不忠。当他的辩护未起作用的时候，为了使陪审员确信她无罪，他把袒露着胸脯的弗里涅带入法庭。

与妇女一样，儿童在法庭上由他们的父亲或监护人代理。例如，演说家安提丰写过一篇典型的演说词，其中谈到有个男孩被指控在投掷标枪时意外杀死了另一个男孩。这个假设的案件由男孩的长辈们加以审议，因为一个年轻男子只有到了成年（18岁）的时候，才能按法律行事，或者为自己辩护，以对付讼方；他只有到了30岁的时候，才有资格在法庭上担任陪审员。但如果说几个演说家的抱怨有指导意义的话，一些男孩（和女孩）从早年开始便会有法庭的体验。很明显，男人带着自己的小孩上法庭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他让孩子们围在他的周围，哭着恳求陪审员的怜悯——苏格拉底在《申辩篇》[1]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专门拒绝提出这种怜悯的请求，如他所说，即使“我也有亲戚……和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还没有长大成人”。苏格拉底解释说，他不认为一个像他这把年纪、这种名声的人做这种事是正确的。

外邦人可以直接进入雅典的法庭，有个专门的法官（the polemarch）监管外邦人为原告或被告的案件。然而，一个被起诉的外邦人不得不交纳保释金，而公民则不需要。公民谋杀外邦人所受到的制裁看来比外邦人谋杀公民所受的制裁要轻。外邦人被迫提供一个公民担保人（prostatês），并付一笔人头税（metoikion），他们因此也只能在这些地区起诉，如果被宣布有罪，也只能在这些地区受奴役。

在一个这类案例中，女外邦人左比亚被控没有纳税。此案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左比亚由她的担保人代理出庭。由于男性外邦人可以自己出庭，显而易见，女外邦人就像有公民身份的妇女一样，更希望由男人来代理。

在有关奴隶的案件中则没有这种性别之分。不管男奴，还是女奴，在雅典法律中大多都被当做财产看待。他们可以被买卖、殴打（被他们的主人而非其他人），但侵犯奴隶的合法行为必须由他们的主人来实施。不过杀死奴隶的凶手会受到谋杀的指控，即使犯罪的人是这个奴隶的主人也不例外。

在诉讼中，当要求奴隶提供证据时，他们必须真实地提供有关证据。奴隶的供词如果是未经拷打获得的，他们的供词将被视为无效。拷打在广场上公开执行，使用的器械是鞭子或拷打支架。例如，在被控谋杀妻子的案件（见第107～108页）中，对于那个实际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下了毒的女奴，原告只说：“她被拷打，并被交给死刑执行人。”

① 对话体作品《申辩篇》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国家与人民

公共奴隶（dêmosioi douloi）是城邦的财产，他们组成某种精锐队伍。例如，他们中的一支被用来作为公元前5世纪的警察力量，在公民大会会场维持秩序。如果一个不受欢迎的发言人不愿坐下，他的声音被叫喊声和吵闹声盖过的话，那么公职人员将命令警察把他从讲坛上拖下去，或者甚至会把他逐出会场。

当然，奴隶不是公民。但一名（男性）奴隶要变成公民在理论上并不存在绝对的障碍。如果他被释放，就变成了外邦人，此后他有可能被赋予公民权。例如，帕森的一个奴隶，在被释放之后，掌管其前主人的银行，后来由于他对这个城市的贡献而被赋予公民权。帕森的例子当然是件不寻常的事，但它证实了一点，即在雅典城邦中，完全被释放的奴隶或外邦人要转变为公民并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

事实上，公元前338年，雅典在科罗尼亚战役（见第75～76、179页）中遭到惨败之后，有人在公民大会上提议，释放所有奴隶并使所有外邦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能够参与保卫雅典。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曾被执行，学者们认为，很明显，当腓力准备结束和平的时候，这个法令肯定被废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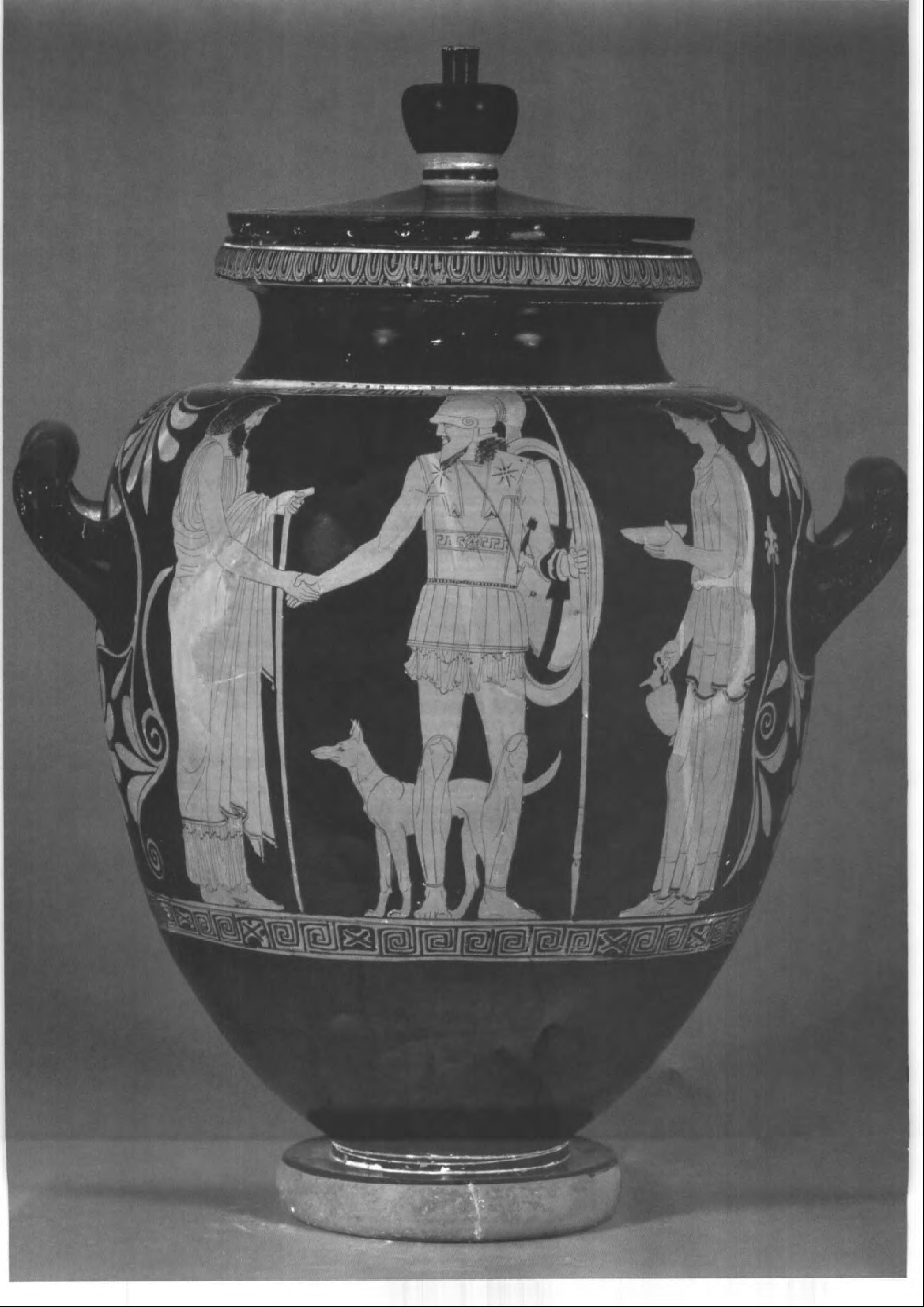
在一般情况下，外邦人像所有非公民一样，被公民大会拒之门外，不能担任公职。但是他们可能被叫到公民大会上提供信息或代表自己的利益在公民大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雅典"人民"）上发言。在这种情况下，外邦人和其他非定居的外国人（Xenoi）首先必须提交一份正式请愿书，以便允许他们在议事会或公民大会上讲话，而一位公民必须提出与之相关的任何一项动议。例如，公元前4世纪中叶，一群来自奥林托斯的外邦人要求减轻外邦人的人头税，他们按照程序被准许参加公民大会——这种程序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一些铭文中："（关于这种事件）奥林托斯人被判有权在民众德莫斯（公民大会）请愿（也就是提交请愿书）。"

外邦人与其他非居民的外国人一样，可能单独或作为一个群体被授予公民权，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被赋予各种特权，例如，拥有土地的权利，或在奥林托斯人的例子中，被免除外邦人的人头税。但是，大多数外邦人无疑不会拥有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即使这个群体有可能包括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演说家吕西亚斯那样著名和富有的人。

雅典男孩一旦达到成年人的年龄并通过详细审查（审查他的公民权资格），他作为一位新公民的第一项义务就是到军队服役，此后他的第一项特权就是参加公民大会。然而，在他不到30岁之前，是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担任陪审员职务的。

因此，所有在雅典定居、又通常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体（奴隶、外邦人、其他外国人、儿童与妇女）中，只有妇女是绝对不可能获得公民权的人。可以肯定地说，在传统神话中，妇女曾经拥有投票权。在阿提卡第一任国王凯克罗普斯时代，她们通过投票选举雅典娜而非波塞冬作为这个城市的守护神，并且因此受到惩罚，被剥夺了公民权（见第113页）。

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公民大会中的妇女》中，妇女们接管了城邦，通过了一个方案，投票废除了私有财产和家族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取消奴隶制。因为即使在这个荒诞无稽的情节里，按照男人的观点，雅典也将由女人们的主要利益（食物和性）来统治。社会经济的现实强行主宰了这个问题：对于筹办宴席的



人（见第96页）来说，要生产食物和酒，劳动毕竟是不可缺少的。

然而，在一年中总有段时间，比如在播种节（见第106页）的场合里，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确实可以控制公民大会。在为期三天的节日庆祝期间，妇女们在召开公民大会的正式地点普尼克斯山宿营。节日的第二天，当妇女们正在斋戒的时候，议事会和法庭不得开会或开庭。如果必须召开公民大会，他们便到别处举行。

而且，妇女像男人一样，为这个节日选举她们自己的公职人员，使她们自己能够运用那些通常局限于政治领域的程序。引人注目的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地母节的妇女》（“妇女庆祝播种节”）中，妇女模仿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她们完全熟悉公民大会的仪式和政治提案，也熟悉演说者的修辞技巧。相反，在更为离奇的《妇女公民大会》的世界里，女主角对相应的提案的了解要求给予解释。她说，她和她的丈夫住在普尼克斯山的斜坡上时，她已经学会了它。

因此只有在神话或喜剧情节里，妇女们才能进入公民大会。甚至当公民团体需要一位妇女提供的信息的时候——例如，一名女祭司传达神谕——这个信息也要由她的男性亲戚带到公民大会上。

（上页图）妇女不能享有男性公民的特权，也被免除相应的义务。一个公民对城邦履行的最重要、最危险的义务是服军役，在许多陶瓶上经常出现战士开赴战场的场面。在这样的场景中，如这里所描绘的一个场面，家庭成员通常围绕在即将离别的战士周围，重装步兵的妻子拿着标志着生活转变的礼仪器皿。她把酒倒入一只浅碗之后，把一些酒洒在地上，作为对众神的酒祭仪式。随后，这位战士、他的妻子和他那上了年纪的父亲一道喝尽剩下的酒，这是全家团聚的最后一次体现。储酒罐。画家阿西里斯作于公元前450年。

交易场所

晚期的一位作家米南德·瑞特（Menander Rhetor）说：在雅典，如同在许多古代希腊城市一样，“人们认为，一个年轻人在上午9点之前或天黑之后，在户外的市场（阿哥拉）上被人看到，或者女人开店铺或在市场上做其他生意，都是

公民大会上的妇女

“雅典”城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为了对它的守护神雅典娜表示敬意。希腊神话详细叙述了雅典娜与波塞冬之间竞争的两个不同原因。竞争的结果是雅典娜取得了胜利：两个版本都说这个城市的第一棵橄榄树归于雅典娜，而波塞冬则得到了一眼泉水和一片湖泊。在公元前2世纪的神话学家阿波罗多罗斯（Apollodorus）的叙述中，宙斯把对这两位神祇的裁判权委托给一个由12位神灵组成的陪审团。这些神灵站在雅典娜一边，因为传说中雅典的第一任国王凯克罗普斯（Cecrops）可以证明，她是第一个种植橄榄树的神。

然而，公元前1世纪的伟大的罗马学者瓦罗（Varro）对这个最终决定如何做出的问题却给出了一种不同的解答。圣奥古斯丁在他的《上帝之城》一书中保留了这一说法：

刻克洛普斯召集一个由所有公民（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公民大会，让他们针对这个问题投票，因为当时在世界上的那个地区有个习俗，即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参与国家事务的审议。既然这个问题摆在群众面前，男人们投海神（波塞冬）的票，女人们投智慧女神米涅瓦（雅典娜）的票。结果，女人恰好比男人多一个，因此胜利归于智慧女神。

于是海神狂怒，令海水暴涨，毁坏了雅典的土地……为了平息他的愤怒……女人们遭受了三重惩罚：她们再也不准参加投票；她们的孩子们永远不得姓母亲的姓氏；谁都不能称呼她们为“雅典的女人”。

奥古斯丁在评论这个神话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对雅典娜未能保卫她的拥护者的不满：“智慧女神米涅瓦至少要保证她们有权被称为‘雅典的女人’，而且作为回报，也应当让她们拥有这位女神的名字，因为正是她们的投票才使女神取得了对男性神祇的胜利。”



直到公元前6世纪末叶，公民大会都在阿哥拉召开。公元前5世纪，在非常的情况下（例如实行陶片放逐法，见第144页），公民大会也会在阿哥拉举行。但从那以后，公民大会（ekklêsia）移到阿哥拉西南边的一座小山上召开，于是便有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见第95页）中的"普尼克斯山的公民大会"。4世纪时，威廉·斯蒂尔曼在这座山冈上筑防御墙（从这张照片中可见到）。左下方刚好可以看到的河谷（战神山西南）里有一些点缀在私人住宅间的神庙。也许，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妇女公民大会》的主角普拉克萨哥拉（Praxagora）就在其中一个神庙里临时住宿，并无意中听到了公民大会的辩论。

不当的举止。"显然，这是一种社会观念。有些事例与这种观念相吻合。比如，在色诺芬所作的一篇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中，雅典人尤希德穆斯（Euthydemus）因为年龄关系不能进入阿哥拉，于是坐在靠近阿哥拉的一家马具店里。从其他史料来看，很明显，在富裕的家庭中，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奴隶而不是有身份的妇女去购物。

阿哥拉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公共场所，既是政治、司法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在古典时代，它的地界里有许多议事堂、公职人员的办公室、法庭、宗教神庙，尤其是还有这个城市的市场，人们在这里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见第115页）。在普尼克斯会场建成之前，公民大会也在阿哥拉召开。

就理想而言，妇女不会步入这个涉及公共事务和商业的竞技场，年轻男子也不会在中午前出现。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最清楚不过的有关社会理想与实践之间存在差异的例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评论的那样，要阻止"穷人的妻子"走动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妇女是谁？人数有多少？最近的统计估计，大约4%的雅典公民是富裕的，而这些人中，真正的富有者大概只占1%。那么，大多数雅典人是"贫穷的"，虽然这些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大约1%是真正贫穷的。

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穷人的妻子"，就构成了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的大部分。因此，我们听说许多妇女在阿哥拉或附近工作，并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通常很难判断这些妇女是公民、外邦人，还是女奴。她们中的某些人从事小型交



易、出售食品（如上面提到的卖面包的人）或像香水、花环之类的东西，其他人则是开酒馆的或纺织工。

只在那些微利的行业中有女工和女商贩，在真正盈利颇丰的领域中则没有她们的位置，例如，手工艺、制造加工、借贷、奴隶耕作等等（见第四章）。其实，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妇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职业就是那些被释女奴们从事的职业，如羊毛纺织、货物零售和做奶妈。德摩斯提尼的一篇演说提到一个事例对我们具有启示作用：一位公民的母亲迫于贫穷去卖花环并做奶妈，由此产生了关于她的公民身份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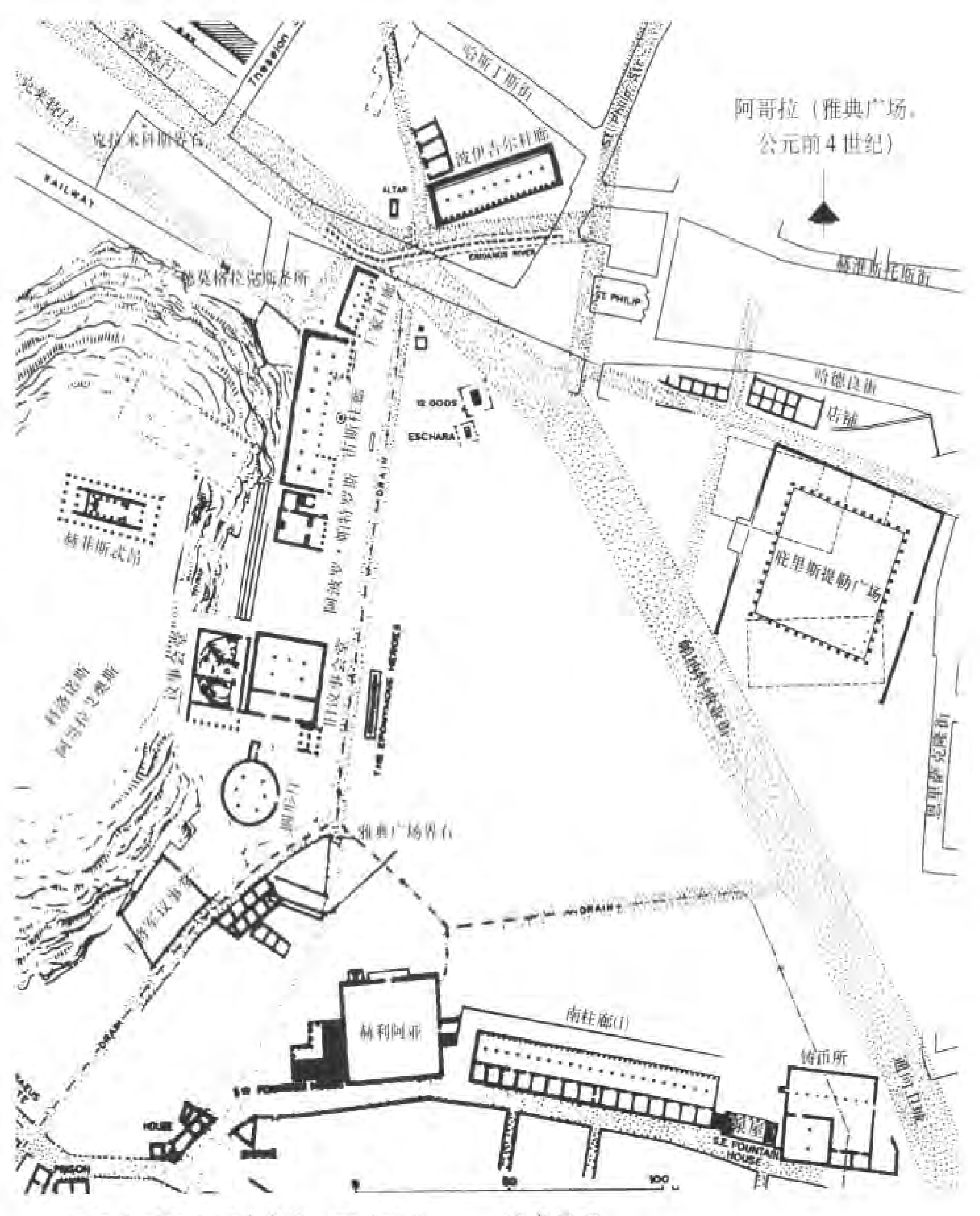
显而易见，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外邦人和奴隶们经常肩并肩地在阿哥拉或阿哥拉附近的众多工艺品商店里工作。有关厄瑞克修姆庙的修建记载表明，公元前5世纪末期，大约四分之一的（男性）工人是奴隶，四分之一是公民，而其余的是外邦人。所有熟练工人都得到同样的报酬，每天一德拉克马（相比之下，法律禁止妇女做数量超过一麦第姆诺[①]的买卖。一麦第姆诺是相当于三到五德拉克马之间的一种重量单位）。

根据诅咒牌的记载，那些在阿哥拉商店中一起工作的男女看来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社会，既与他们的邻居竞争，又与他们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阿里斯托芬

到公元2世纪中叶，雅典成为罗马帝国的附属城市已达三个世纪之久。在新政权统治之下，它在文化上所扮演的主导角色被保留了下来。新的潘代诺（Pantaenus）图书馆和古代剧场对此提供了证据。不过，在建筑方面，罗马的统治体现在市中心。一座罗马长方形会堂（行政机构）建在帕特农大道边。罗马的拱廊（有圆柱的门廊）把那些古典的（宙斯·埃琉忒里乌斯）和希腊化（阿塔鲁斯）时期的柱廊连在一起。但最重要的是，把阿哥拉商业区划分成一个专门修建的、与市区分开的新市场。

① 阿提卡通用的谷物度量单位。——译者注

雅典的主要集会场所阿哥拉，于公元前4世纪时就成为繁荣的政治（包括宗教）中心和商业中心。一年一度的帕特农游行路线，横贯这个城市的主要行进大道。这条路的两侧是政治、司法和宗教建筑。与其说它在卫城的遮蔽之下，不如说它与卫城互为补充，几乎是平等的关系。进入阿哥拉就是进入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神圣"的地方。因此，某些被宣判有罪的人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准进入的。另一方面，它并不是一个只限于成年男性公民进入的场所。这张平面图无法显示大量的（混乱的）、出售各种商品——从小装饰品和便宜货到生活必需品的叫卖小贩的临时货摊。卖者和买者包括女市民、外国人、男女奴隶（他们并不总是自愿地到这里来，有时他们来买东西，有时他们自身被买卖）。据说这里实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保证公平与和平的交易。不存在打架和欺骗。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骑士》（公元前424年）中，给那个卖香肠的人物取了个名字"阿哥拉克里图斯（Agoracritus，那个卖香肠的人也是这样自称的），意思是"在阿哥拉的争吵中长大的"。很少有一个名字能够单独传达这么精确的信息。



此图个别处看不清字迹，可略不注。——译者说明

的作品中，粗俗的叫喊和谩骂与女商贩联系在一起。例如，在《蛙》中，酒神狄奥尼索斯提醒两位正在比赛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说："他们彼此之间像卖面包的人一样严厉指责对方是不合适的。"如果情况如同修昔底德所述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上所表明的那样，最优秀的女人是那些最少听说和提起的女人，那么，阿哥拉的妇女们显然并不期望成为这个优秀团体的成员。

有一个暗中赢利的商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妇女手中——性行业。可以肯定地说，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不会为了金钱去从事性交易，除非像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在他的作品片断中所描述的那种，成为一个高级情妇，既贫穷，又"没有监护人和亲戚"。因此，高级情妇（hetairai或"女性伴侣"）通常是外邦人，而妓女（pornai或"待售的女人"）大多数是那些在妓院（由妇女或更多的是由男人经营，他们向城邦交纳个人所得税）里工作的奴隶。

普通妓女仅要价1德拉克马或更少，但高级妓女就会要求市场所能容忍的最

商业限制

作为katouchios（"约束者"），传令之神赫尔墨斯被要求批准在诅咒牌（curse-tablets）中对男女店主，连同他们的商店及他们的手工制作技术进行诅咒。诅咒牌是一种刻着咒语的薄薄的铅片，通常祈求与地府有关的神灵确保咒语的灵验。大多数诅咒牌，如下面引用的那块一样，属于晚后的时期，但有一些较早的范例在形式上与之相似。诅咒可以用来反对在爱情、体育运动、法庭或商业方面的竞争者。

在与商业有关的诅咒牌中，典型的例子是把商店店主及其妻子"捆绑在一起"，把男人与女人联系在一起，包括他们的作坊、技能以及利润。也许被诅咒的零售商欺骗过他们的消费者。如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普鲁图》中，有人抱怨"我邻近的（女）酒馆主人总是少找给我酒钱"。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由于"整个店主和商人阶级"总是想方设法扩大他们的利润，因此他们常常受到人们的轻蔑和辱骂。

但是，这些katadesmoi（"扎在一起的符咒"）更可能反映人们在商业竞争中的激烈情况。在一套出自3世纪的阿提卡的诅咒牌中有一群男女，有的单独受到诅咒，有的与（可能是）他们的一些邻居和（或）合伙人一起受到诅咒。他们的职业并没有得到说明，但这个诅咒者可能代表一个业主们的竞争团体。他们正在寻求商业之神和其他神灵的帮助，以便在市场上取得对他们的主要竞争者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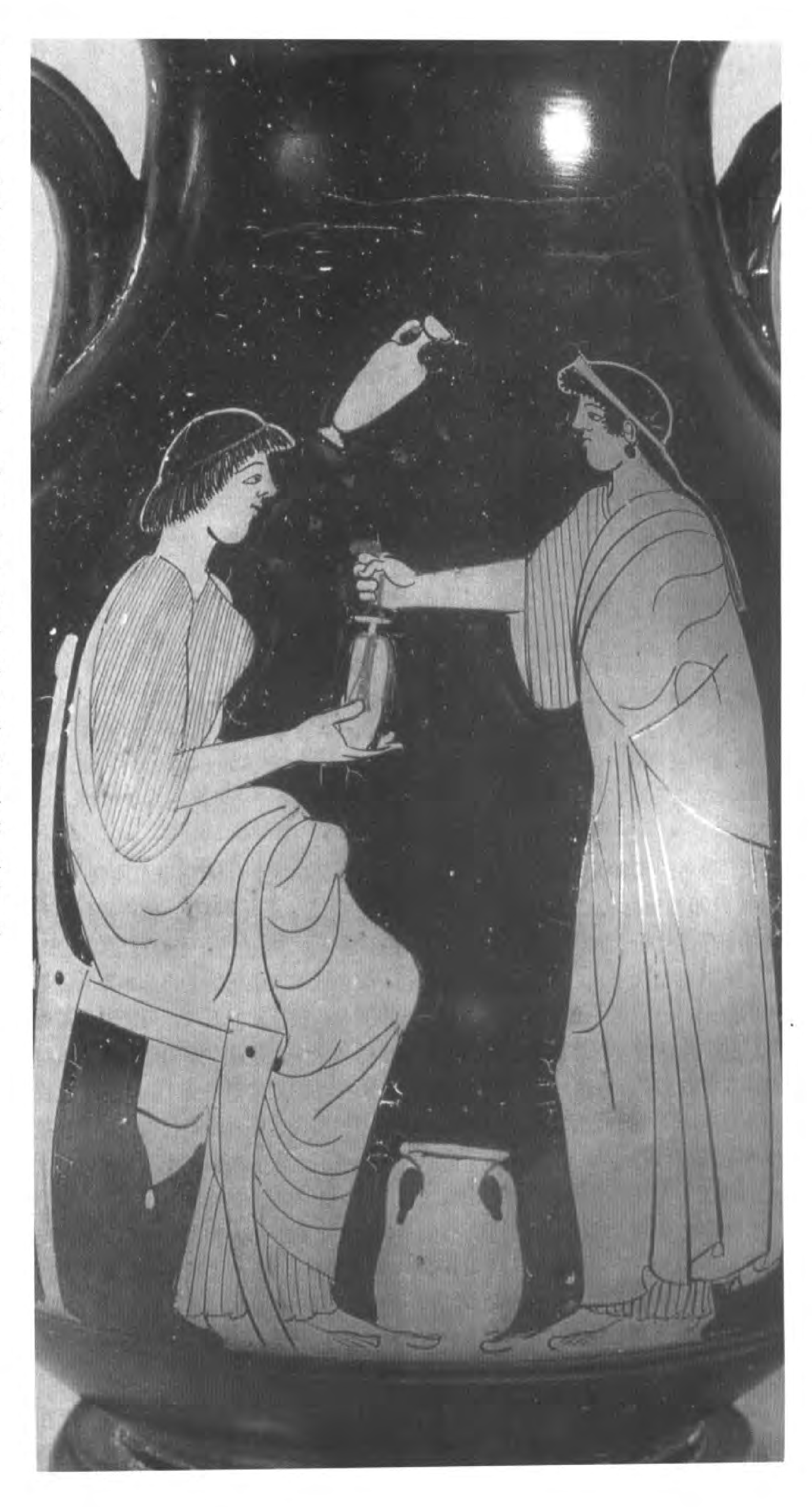
> 我联合奥菲里翁（男）、奥菲里梅（女）、奥林波斯（男）、皮斯提亚斯（男）、玛伽蒂斯（女）、普罗托斯（男）、卡多斯（男）、陶克雷德斯（男）、梅拉娜（女）、卡莫斯（男）、巴基斯（女）和基托斯（男），这些男人与女人期望从神灵和英雄那里获得[生计](elpidas)，从赫尔墨斯·卡图希奥斯（Hermes Katoukhios）、赫卡忒、大地女神和所有神灵及众神的母亲那里获得所有（手工制作的）技术（ergasias）。

高价。著名的雅典情妇像弗里涅（Phryne，参见第108页），其服务可能就达到1明那（100德拉克马）之多。当苏格拉底拜访高级妓女忒奥多特时，他注意到她和她的母亲都打扮入时，而且她的许多女仆也穿着华丽，她的房子装修得颇为豪华。

在特殊情况下，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奴隶或前奴隶可能变得非常富有。更多的奴隶，包括在手工作坊里劳作的、从事商业和银行业的奴隶，可能属于被称为"独立生活的"奴隶范畴：他们独立地生活和工作，并且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付款。大多数在"公共领域"（即阿哥拉或附近）劳动的奴隶是熟练工人。我们也许会把这些人看做一个有特权的群体，但他们显然不会这样看待自己。据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中，逃离雅典及被围地区的人超过两万，其中有大量的熟练工人（不清楚他们是矿山奴隶、工匠、手艺人还是熟练的农工）。

大多数外邦人和他们的妻子，同大多数公民家庭的男人和女人一样，是拥有中等财富的人。公元前401年或400年，当帮助推翻三十僭主统治（见第73页）的外邦人被投票授予荣誉的时候，在法令中为他们列出的是一些地位低下的职业：农民、厨师、木匠、赶骡人、建筑工人、园丁、赶驴人、商人、卖坚果的人、面包工、漂洗工、被雇佣的仆人、雕刻匠。

然而，如同公民一样，少数外邦人是富有的，他们享有很高的声望。例如，在《理想国》一书中，开篇便提到苏格拉底（一位雅典公民）到派里厄斯看望他的朋



这家商店的妇女卖给一个奴隶少女一瓶香水，她把香水装在一个长细颈瓶或一个小香水瓶里。商店墙上挂着一个有柄的细颈瓶（用来装橄榄油的瓶子），地板上放着一个用来装水、酒等液体的派里克或储藏罐。在同类型的陶瓶上都绘着这个情景（这里没有显示陶瓶的另一面：这位女奴把长细颈瓶带回去交给坐在屋里的女主人，其身边地板上放着一个盛羊毛的篮子）。

女零售商通常从事香水买卖。不仅女人使用香水，男人也在交际酒会上或palaestrae（角斗学校）中使用香水。据说，男人卖香水是丢面子的事情，但是如果做的是一笔大买卖，显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在演说家的演说中能看到存在男人因经营香料店而引起借贷和债务纠纷的争论。这种矛盾解释了一个较为重大的问题，即妇女往往作为零售商出售同样的商品，这可能为男人们做更全面、更有利可图的生意打下了基础。大约公元前460年绘制。



这只当时最流行的酒杯——基里克斯陶杯上描绘的是一个酒会的场景，看来这是交际酒会的一般情景。如图所示，陶杯画通常表现酒会上的放荡。那个有胡子的男人戴的花环是女零售商们出售的最普通商品之一，它既被用于宗教庆典中，也用于其他庆祝场合。

画中描绘的性活动应该有助于我们解开有关妓女和情妇的生活及其财富的任何浪漫化的概念之谜。例如，据说尼埃拉开始谋生时是一个奴隶妓女，最后以高达20明那（2000德拉克马）的赎金买得自由。这笔赎金从她所挣的钱及一位名叫弗里尼昂的雅典人那里筹集而来。但是当弗里尼昂把她带到雅典时，据说他对她的方式就像这个瓶子上的妇女们遭受的那样：

> 他既不尊重也无节制地对待她，把她带到他参加宴会的每个地方——他在那里喝酒，把她当做狂欢时的伴侣。只要他愿意，就随时随地地与她公开性交，向旁观者们展示他的特权。

我们在史料中较多了解的那些学识、美貌和技艺俱佳的名妓只占少数。大多数妓女和小妾可能属于蒙受屈辱的一类，就像尼埃拉受到弗里尼昂的任意摆布一样。画家派迪奥斯绘于公元前6世纪后期。

友、原先来自叙拉古的塞法路斯。塞法路斯拥有一个盾牌作坊，使用的奴隶超过100人（演说家吕西亚斯是塞法路斯的儿子）。另一个外邦人塞菲索多鲁斯也居住在派里厄斯。他拥有价值大约两千五百德拉克马（大致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七年的工资）的男女奴隶，但由于被判犯有渎神罪，他的财产被没收和拍卖。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把塞法路斯和他的儿子们当做社会上的同等人来与之交谈，这种谈话模式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如果要在外邦人和公民之间划一条线，那么这是将富人和穷人分开（见第四章）的另一个社会障碍。属于上等阶层的外邦人缺乏政治权利，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那些和他们层次相当的公民的生活方式并无重大区别，并且他们都抱有同样的社会理想。与此类似，这样的外邦人的妻子和女儿也无疑为她们自己采取礼貌之道，作为表明她们的社会身份的一种方式。这种礼节与具有公民身份的上层妇女所遵守的习俗是一致的。

剧中的雅典

在古希腊戏剧中，妇女扮演着重要角色。悲剧的特征是由许多希腊传统中的著名女英雄作为主角，而且许多部喜剧的主题着重体现对妇女的关注，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不过，戏剧舞台上的惯例也给它打上了不同于平常的现实生活的烙印。例如男演员扮演女角色，所有演员都戴着面具，大多数情节取自希腊神话传统（见第九章）。

因此，戏剧舞台是一块想像的园地，剧作家们可以在那里探究当今城邦的紧

张局势、不确定的事情和矛盾冲突，也可以在神话范式的情节之内表达城邦的理想。在这些剧中，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问题有时表现为家庭喜剧，而悲剧的极端对立通常用性别冲突的方式来表达。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中，杀人事件是由发生在妻子与丈夫、儿子与母亲之间的争斗而引发的。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女主人公违反统治者的法令，结果陷入了与她的叔叔兼监护人克雷昂的冲突之中。在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中，彭透斯反对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到来，结果悲惨地被他自己的母亲杀害（见第313页）。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也表现家庭冲突。在《云》剧中，一位父亲设法管住他那挥霍无度的儿子；在《马蜂》中，儿子试图限制父亲对陪审团职务的迷恋。有几部喜剧的情节是围绕两个性别之间的斗争安排的：在《地母节的妇女》中，妇女们对不屑于描绘她们性别的欧里庇得斯进行报复；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妇女们为结束战争而接管卫城、举行性罢工；在《妇女公民大会》中，妇女们占领了由男性把持的公民大会领域。

今天，我们主要在文本中读到这些悲剧和喜剧。然而，这些文本对于一系列演出来说只不过是“剧本”而已。在古代，这些演出只是一个重要的城邦节日——为崇敬酒神狄奥尼索斯而于春天举行的酒神节的一部分。

事实上，庆祝这一节日的最初形式并不以戏剧演出为主，而是像为向雅典娜表示敬意而举行的泛雅典娜节一样，集中围绕在（在这个场合里）向卫城东南斜坡脚下狄奥尼索斯神殿行进的大游行（pompê）上。公民、外邦人、奴隶和妇女全都参加，就像在泛雅典娜节大游行一样，每个团体独立前进，而且承担不同的职能。外邦人穿着紫色长袍，举着盛贡品的碟子；男性公民带着盛酒的皮囊；贵族少女提着盛有收获的第一批果实的金黄色篮子，带领整个游行队伍。人们沿着游行道路载歌载舞。这一天结束时有一场盛大的宴会。公元前333年的那个宴会需要屠杀至少100头公牛作为牺牲。

到公元前5世纪早期，戏剧演出被增加到这个节日中来。这些演出在酒神庙正北面的一块空地上举行——这块空地起初可能用于演出纪念狄奥尼索斯的集体舞。后来，这个空地被逐渐扩大，最后在卫城斜坡上用石头修筑了座位。

城市的酒神节，顾名思义，也始于游行、举办宴会和一般的庆祝活动。后来，在三四个单独的日子里演出戏剧，进人剧场需要持有人场券。在戏剧开演前，要举行一系列仪式来建立人们对城市、政治和军事的自豪感：十将军举行奠酒祭神仪式；来自雅典帝国的各个城市的贡品被搬上舞台展示；以公共开支抚养的烈士遗孤在成年时被授予重装盔甲；城市的赞助人被公开授予荣誉；最后，宣读被释放的奴隶的名字。

外国人、外邦人、同盟国和其他城邦的代表们，也出席这种显示城市团结的活动，并随后观看戏剧表演。妇女们是否也在场呢？在《地母节的妇女》中，她们很熟悉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她们亲自观看这些戏剧，或只是阅读有关剧本，或从他们的丈夫那里听说过这些戏剧，我们对此无法确切知道。有关证据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对这个问题讨论了两百多年也没有结果。

一方面，妇女似乎不可能是惟一被排除于酒神节之外的人群，因为这个节日向所有希腊人开放。事实上，外国人不仅受到鼓励而且被要求参加这一节日（在

雅典帝国时期，作为同盟国的情况下）。这一点似乎很明显，即那些沿街向普通男性公众叫卖陶器（和她们自己）的较低阶层的妇女是在场的，也许她们在演出开始之后溜了进去，或在可以免费进入剧场时进去的。亚里士多德的同伴泰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收集的人物速写中就包括一个这种类型的吝啬鬼——他带着自己的孩子用这种方式进去观看演出。

另一方面，戏剧演出的仪式安排突出了雅典公民身份的军事和政治地位，而这是雅典男人的专利。另外，节日的合唱和戏剧演出是剧作家与合唱队进行比赛的场合。有由十名裁判组成的专门评委小组，每个裁判来自一个部落，该小组决定奖项的授予。大酒神节的政治重要性在与庆祝活动相关的公民大会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大会在节后召开，只是考查那些负责这一节日的公职人员的表现。当然，会议只对男性公民开放。

再者，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可能并没有作为观众出现在剧院里，即使在舞台上，女性角色的特征也是很显著的。而且，妇女可能也被排除在莱纳亚节(Lenaea)[①]的戏剧演出之外。莱纳亚节是冬季中间的一个酒神节，在这个节日里，演出悲剧和喜剧。与城市酒神节不同的是，在这些节日里，外邦人可以担任合唱队员。

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富裕的外邦人可以参加这样的仪典。但是，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人可以参加这个节日（与其他节日一样）的开幕式——大游行。如果这个所谓的“莱纳亚陶瓶”（下页图）是某种线索的话，那么妇女也作为酒神的侍女围绕着酒神的偶像跳舞庆贺这个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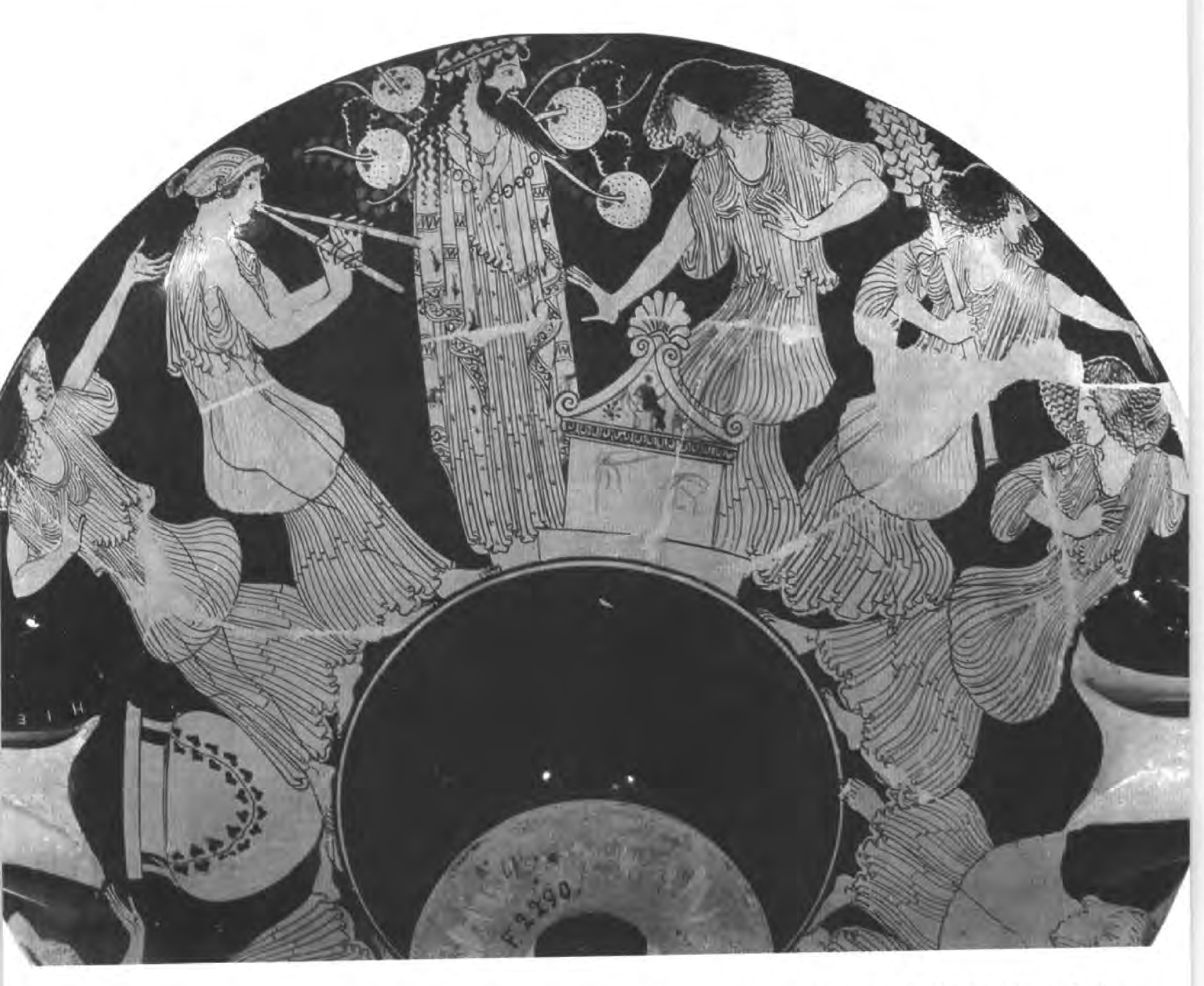
人口统计状况

在公元前42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5年之后的莱纳亚节上，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阿卡奈人》上演，其戏剧主角狄卡奥波利斯，一个乡下农民，“憎恨这个城市，热爱（他的）村庄”。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狄卡奥波利斯表达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雅典人的感觉。由于斯巴达人于公元前431年入侵，迫使他们从农村撤退：“他们对抛弃自己的家园和代代相传的圣殿……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离开每个人认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市镇……而深感不满。”

一个雅典人对市民身份的感觉既含有地方的意思，又含有“国家的”意思：所有公民都属于139个德莫或“村庄”之中的一个。这些村庄构成了雅典城邦，其中最大的一个德莫是阿卡奈。在雅典城内有5个德莫，另有10个或15个坐落于与之紧密相连的周边郊区。一些德莫相当小，比如位于法勒农港口正南面的哈里摩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时，它的公民人数大约仅有70或80个。然而，大量雅典人像狄卡奥波利斯一样，居住在阿提卡乡下的村庄里，也像他一样，可能强烈怀念他们的家园、农田和德莫中非常盛行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政治、宗教和其他形式的团体。

公民和外邦人都在德莫中登记。公民作为德莫成员的权利是可以世袭的。一个雅典公民由他的源于父名的姓和德莫来确定。例如，“苏格拉底，阿罗佩塞德莫

① 也是为崇敬狄奥尼索斯而举行的一个节日。——译者注



的苏弗罗尼斯科斯之子"。一个外邦人属于他（或她）所定居的德莫："居住于阿罗佩塞的苏西亚斯。"相比之下，一个具有公民权的妇女跟随丈夫或父亲而属于一个德莫："阿雷玛科，阿那基罗斯的卡利马科斯的女儿。"

德莫有点像个微型城邦，也具有城邦的几个最重要的公共机构，例如，有一个公民大会和一些公职人员。德莫公民大会与城邦公民大会处理事务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用不着处理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事务，而负责在公民名册上对公民进行登记。在其他方面，德莫公民大会及其主要公职人员——德马尔赫（demarch），讨论并通过法令，处理财政、荣誉的授予、公共财产的管理、公职人员的任命、宗教仪式和节日的筹划等事务。

在《阿卡奈人》中，狄卡奥波利斯与一个斯巴达使者私下里达成一项和约，因此他与女儿、妻子和两个奴隶参加乡村酒神节的庆祝活动。乡村酒神节主要体现在酒、宴会、歌曲和生殖器崇拜的游行上，它是这座城市各种仪典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德莫中庆祝。在比较大的德莫，戏剧表演和体育竞赛是这个节日的一

部分，正如在城市酒神节中的情况一样。

某些德莫节日是城邦节日在地方上的衍变，它们的庆祝活动在城邦庆祝之前或之后举行。但是，还有许多重要的德莫节日是地方独有的，例如，那些为表彰地方英雄或农业之神——像伊卡瑞斯（Icarius），由伊卡瑞恩德莫而得名的英雄——而设立的节日。

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是德莫生活，尤其是德莫最重要的宗教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一些女祭司出现在德莫法令中。我们听说妇女被她们的伙伴（“德莫男人的妻子们”）推选出来担任公职（archousai），负责与宗教庆典女祭司一起监督播种节的庆祝活动。正如一篇铭文所特别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场合或其他类似的场合，“妇女们以传统方式聚集到一起”。

这样的播种节可能是一种地方习俗，也可能是城邦的习俗。而大量与德墨忒耳和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相关的其他节日，则既在地方，也在城邦里庆祝。在其他德莫节日中，妇女也被考虑到。例如，在乡村德莫厄尔基亚举行的酒神节地方典礼上，一条法令具体规定：两头山羊———头献给狄奥尼索斯，另一头献给塞墨勒（Semele）——将被移交给“那些妇女们”，女祭司则得到那些羊皮。

外邦人也是德莫居民。大多数人住在雅典的德莫中，或住在与之紧密相连的周围的郊区中。外邦人尤其集中在派里厄斯的港口德莫，但有些外邦人也散居在乡下。外邦人可能参与德莫的宗教生活。在一个城市德莫中，他们可经法令赋予的权利，分享献给这个德莫的部落英雄的牺牲。但是外邦人不能担任德莫公职人员或祭司。在德摩斯提尼的一篇演讲中，有个发言人想像，如果一个外邦人或外国人设法担任这两种职务，公民们感到的愤怒。狄那尔库斯是一位雅典的演说家，本身是来自科林斯的外邦人。他写了一份演讲稿检举一个来自派里厄斯的外邦人，说这个外邦人买通他进行德莫登记，进而在哈里摩斯取得了公民权。

所有公民都属于氏族，这是一个社会和宗教的“团体”。这个宗教团体与合法、血统和继承等问题有特别的联系。但外邦人完全被排除在氏族之外。一个氏族（至少由30个人组成）的成员身份，就像德莫身份一样，是世袭的。虽然氏族有会议场所，拥有神殿和耕地，但是他们最重要的活动是在宗教庆祝活动的场合里举行。这些活动的大部分一定同一个公民的生命周期（出生、成年、订婚和结婚）中的主要事情有关。但是一个男人的phrateres（“兄弟们”）也可以充当最可依靠的“家族外群体”，当他发现自己陷于法律纠纷或财政困境中时，他可以向这些人请求帮助。

一个公民的儿子在两个年龄段可以为他的氏族所认识，即婴儿期和青春期，具体时间是在每年的阿帕托里亚庆祝会上。这是一个为了尊崇宙斯、雅典娜和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神为期三天的氏族节日，与播种节在同一个月举行。在这两个场合，人们奉献牺牲，并且正式审查这个男孩是否有资格获得公民权。例如，在伊萨俄斯（Isaeus）的一篇演讲中，有个正受审理是否有权继承其外祖父遗产的发言人声称，他出生后不久，其父亲把他介绍给他所属的氏族的成员们，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对他（这个发言人）的登记入册持反对意见，“虽然许多氏族成员在场，而且他们经常严格地审查这样的问题。”

女孩可能也被介绍给其父亲所属的氏族。但是，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审查一

（上页图）有胡子的狄奥尼索斯（Pionysus）形象，头戴常春藤花冠。当妇女们伴着一个吹笛者吹出的旋律，以宗教舞蹈为他庆祝的时候，他好像在自己的祭坛旁被动地观看。扁平的、神圣的蛋糕在他头旁旋转，一个挂着常春藤花环的贮酒罐（混合酒用的瓶子）立在把手下边的地上。就像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中所描述的那样，那些酒神的侍女光着脚，头发自在地飘散着，其中一人扛着酒神的手杖——一把缠着常春藤花环的权杖。这个花瓶的另一部分（图中看不见），另有一位装扮成酒神侍女模样的妇女拿着这样的手杖，抱着小鹿在跳舞。

这个陶瓶和与之类似的其他陶瓶上所描绘的仪式，可能表现了在莱纳亚节或安特斯节（在这一节日里，一群妇女代表城邦为狄奥尼索斯举行秘密庆典）上人们对酒神的崇拜。这两种庆祝活动都与所谓的酒神纵酒狂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妇女们在其他城邦节日上也使用酒神侍女的仪式装扮，如常春藤做成的权杖和花冠。在艺术作品和文学作品中，酒神侍女是为人熟悉的形象，最早出现于《伊利亚特》中：安德罗玛（Andromache）听见她的房间里传来哀悼赫克托耳（Hector）的哭声，扔掉她的梭子，“像酒神的侍女一样”疯狂地奔向特洛伊的城墙。马克隆。公元前5世纪早期。

个妇女是否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要调查她作为一个男孩的母亲和一个男人的妻子的情况。然而，新郎通常和他的氏族成员们一起举行庆祝婚礼的宴会(gamêlia)。在一篇演讲中，这被当做正在接受身份审查的新娘出身于公民家庭的证据。

就像在德莫中一样，具有公民身份的妇女好像也参加氏族的宗教生活。在一篇铭文中，一个氏族下属成员的妻子和女儿参加了祭祀活动，并分得牺牲的一部分。我们对与氏族相关的女祭司们一无所知，但是男祭司在一组法令中得到了证明。而其他官员，像氏族首领（相当于德马赫的氏族领袖），也几乎没有出现过。因此，缺乏有关氏族女祭司的资料并不表明她们不曾存在过。

再者，在城邦的地方组织中有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团体。其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德莫。它是城邦的一个行政单位，但是氏族也是公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中心。大量与这些团体并列（有时在它们之内）的其他组织十分盛行：殡葬社团、贵族的宗教组织、商人协会、哲学学派等等不一而足。大多数团体只有男性成员，而且只向公民开放，但妇女们在某些团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有一些团体是外邦人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组织的。相比之下，奴隶之间的差别与其他的身份确认形式毫无关系，职业将一群奴隶与另一群奴隶区分开来，例如，把工匠和面包工人区分开来，把农业奴隶和家务奴隶区分开来，把妓女、情妇和劳动者、公共奴隶区分开来。



婚庆是一些家庭和他们所在的德莫或氏族的其他成员共享欢乐的多种欢庆形式之一。毫无疑问，正像在许多场合的情况一样，男人与女人尽管分成不同的群体，但这是男女共同庆祝的仪式之一。

这只陶瓶的瓶身上描绘着一次婚礼游行的场面。在火炬光的映照下，新娘由她父亲家去她丈夫家。新娘的母亲手里举着火把，带领整个游行队伍。如图所示，新娘、新郎与伴郎坐在一辆骡拉的车中，新娘取下她的面纱，这一动作叫做anakalypteria（“揭去面纱”），这是以这一名字命名的婚礼仪式的关键步骤。新娘用来揭面纱的那只手同时还握着一顶花冠或stephanê。她在揭面纱之前，把这一物品戴在她的面纱底下。新郎的母亲站在这对新婚夫妇的新房门口，一只手举着火炬，另一只手抬起来做欢迎的姿势。这辆车后跟着另一辆骡拉的车（图中左边刚好可以看见它的前头），上面坐着四个男人，其他男人和女人在一边步行，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这场婚礼上的客人。细颈油瓶（Lekythos）。画家阿马西斯。公元前6世纪中叶。

斯巴达的妇女、男人与儿童

我们掌握的古代史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非斯巴达人提供的史料。在这些史料中，斯巴达社会是著名的军事化和管制森严的社会。一种为同龄人制定的严格的体制（agôgê或“培育”）——传统上可追溯到传说中的立法家吕库古（Lycurgus）的时代——划分出7岁至17岁的男孩（paides，“男孩”），他们向18岁至19岁的男孩（paidiskoi，“较年长的男孩”）学习跳舞和唱歌；而这些较大的男孩所受的训练围绕生存技能进行。那些20岁至29岁的青年（hêbôntes，“青年人”）则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年轻的斯巴达成年人（hêbôntes）是全权公民，应该或必须结婚。

从“培育”制的最早阶段起，斯巴达男孩就住在军营里，与他们的家庭分离开来。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则属于syskania或“公餐团”——一些共同相处，一起进餐的小团体，居住在单独的“男人的房子”里。男孩在13岁左右开始与男人建立制度化的同性恋关系，这是斯巴达公共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有时，人们拿雅典的酒会与斯巴达的公餐团做不太确切的对比。

拉凯戴梦[1]的庇里阿西人（“周边的居民”）居住在斯巴达外面，他们是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自由人，被迫服军役，但是不能享有与公民权有关的任何特权——这些权利包括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和选举五名城邦行政官员（ephorate）的权利。由于斯巴达公民被禁止从事商业活动，因此商业和手工制造业掌握在庇里阿西人手中。

斯巴达的依附人口——希洛特人——是希腊人，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归斯巴达国家所有，监察官每年向他们宣战。希洛特人缴纳大量农产品，养活其余的斯巴达人[2]，因此他们是永久性的农奴。美塞尼亚（伯罗奔尼撒西南地区）的希洛特人不时发动起义。

斯巴达女孩所受的体质训练的形式经过改进，主要是体操、合唱和舞蹈。有些史料表明，制度化的同性恋生活也是抚育女孩的一部分。我们在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诗人阿尔克曼（Alcman）所作的《Partheneia》（合唱“少女之歌”）的片断中，可以看到直截了当表达性欲的词句。例如，在一首诗中，一个女孩（或合唱团）歌唱她（或她们）对阿斯提梅洛伊萨（Astymeloisa）的渴望：“……这种渴望使大腿松弛，但她看了几眼，比睡觉和死亡更令人销魂……如果她（阿斯提梅洛伊萨）走上前来，用她那柔软的手拉住我，我立刻就会成为她的祈求者。”

按照色诺芬的说法，训练一个斯巴达妇女的目标是使她成为一个战士的母亲。色诺芬记载，吕库古“像为男人们那样，为妇女们设立了跑步和体力方面的比赛项目，并相信如果父母双方都强壮的话，他们将生育比较健壮的后代”。色诺芬还说，吕库古认为在其他城邦中羊毛纺织以及与之相关的需要久坐的活儿最好留给女奴们做。但在另一个伯罗奔尼撒城邦埃利斯中，一群“16岁的女人们”被授予为女神赫拉纺织宽松外袍的荣誉——她们所织的外套在庆祝赫拉的节日赫拉亚节（Heraea，类似雅典的泛雅典娜节）里献给这位女神。上述妇女为向赫拉表示敬意而进行比赛，让女孩们按年龄组竞走。她们为尊崇这位女神，安排女孩们跳集体舞。在竞走中获胜的少女被授予橄榄枝编成的花冠、献祭牺牲身上的上好部分及（为赫拉）奉献铭刻着她们名字的雕像的权利。

插图中的杯子庆祝的是另一种胜利。在纺织羊毛时，人们必须有技术。在女孩的梳理（棉、毛、麻等）比赛中，这个杯子是胜利者的一个奖品。人们解开和抽出羊毛纤维（见第102页）时需要速度和灵巧。这个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杯子来自塔林敦——一个斯巴达的殖民地，位于南意大利，以优质的羊毛和纺织技术而闻名于世。这是一只酒杯，装饰着大眼睛和战争场面，其中一个战争场景是一位女战俘被带走。也许，这些主题之间的联系意味着，如果妇女们把她们自己限制在传统的女性追求上，而不支持她们的战士儿子或丈夫，那么等待她们的命运就是如此。

然而，传统上，斯巴达妇女蔑视纺织业和需要长时间坐着的职业。普鲁塔克在其作品中提到斯巴达妇女们的一些话。例如，一个斯巴达妇女在回答一位在纺织中表现出自豪感的伊奥尼亚妇女时，指出自己有四个表现出色的儿子，并说“这应该是一位优秀的、高贵的母亲的职业，她应该对此感到愉快和自豪。”（《道德篇》）

绘有大眼睛的杯子，出自阿提卡，公元前6世纪中叶。

(1) 斯巴达的另一名称为拉凯戴梦，斯巴达人在古代亦称拉凯戴梦人。——译者注

(2) 即斯巴达公民及其家庭。——译者注



在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0年），体育馆是“希腊”公共机构的精髓。然而，在古典时代的一些城市中，它只是大多数城邦的许多特征之一。体育馆和palaestra（“角斗学校”）都是年轻男子的训练场所和社交中心。这些年轻人主要是那些18岁至20岁的男孩，老主顾们是年轻公民和那些属于上层社会的男人。

体育馆包括健身房和健身设备、澡堂、众神（尤其是赫拉克勒斯）的圣殿和图书馆，花园和公园可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雅典，最古老、最著名的三大体育馆是阿卡德米、吕克昂和吉诺萨尔格斯室内运动场。其中的每一家体育馆在公元前4世纪时还拥有一个哲学学派（分别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犬儒哲学家狄奥格尼斯（Diogenes）领导），在健身房里还放着几篇柏拉图的对话录。

体育馆和健身房也是搞男同性恋的地方。例如，在这个酒杯一边的表面上，男人与男童正在谈情说爱和做爱；海绵、刮身板和油瓶表明这是在一个体育运动场所。那些年岁较大、比较主动的人是追求者（erastai），那些年龄较小、较被动的人是被追求者（erômenoi）。男同性恋关系的礼节是要求年轻的伴侣采取谦逊和勉强的态度，他们的追求者通常需要通过示好的礼物来求爱。这样的恋爱关系需要双方都有闲暇和财富，因此，这种关系只限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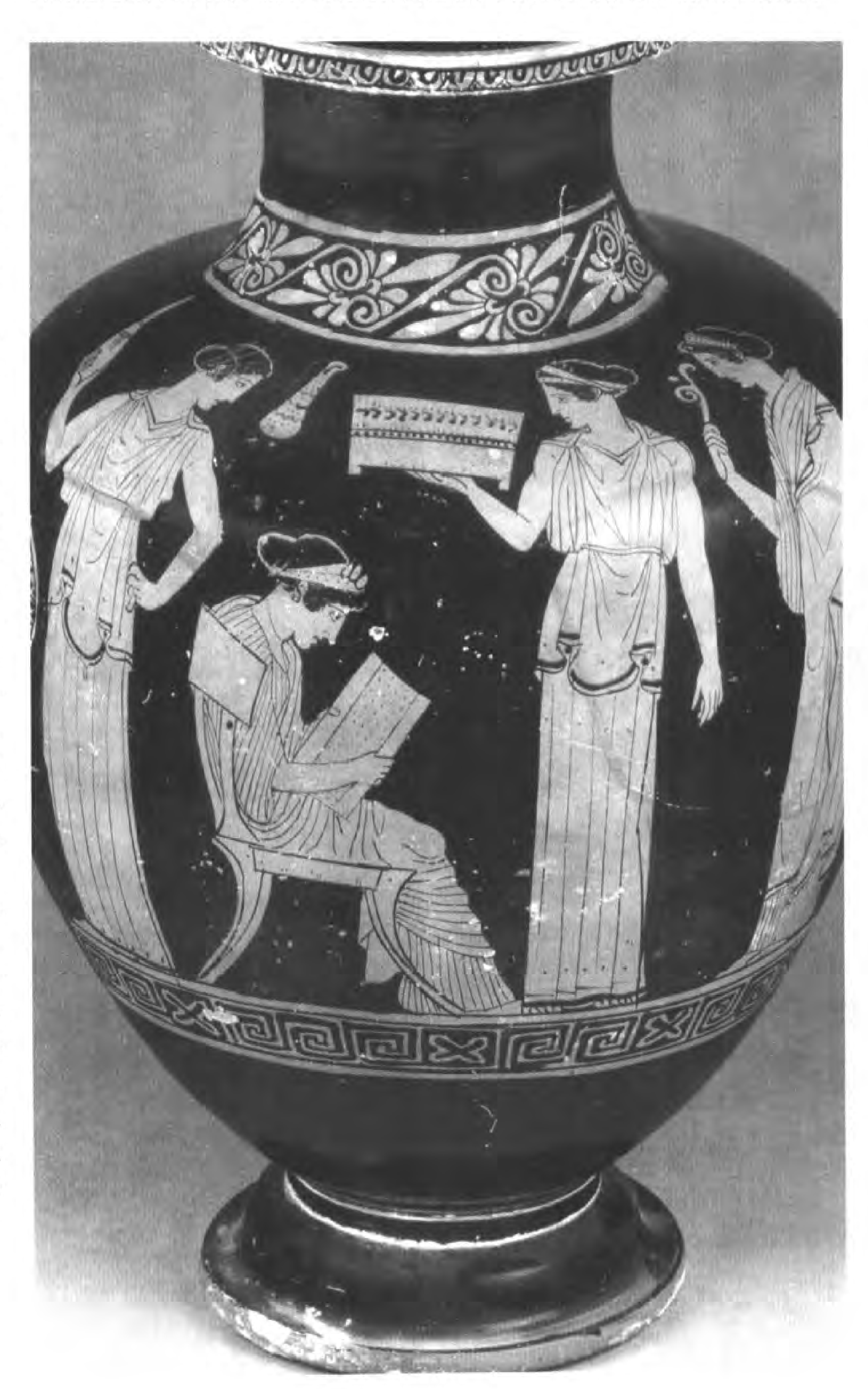


层社会，像图中那些花环和带子显然属于这些男孩。而他们那精心设计的发型也突出地表明他们属于那个有美男子的阶层，这一阶层来自那类富有的、优越的家庭。在柏拉图的《论节制》中，苏格拉底曾在健身房中羡慕这类家庭。

在陶瓶的另一面，三个男人有点沉默寡言，在向女人求爱。这些女人经过精心打扮，戴着头巾。几乎可以肯定不是高级妓女。在其他花瓶上也有类似的情景，我们很难猜测这种场面的内容，尤其是如果我们认为她们不是上层社会的妇女的话。但是将这两种类型的追求方式排列在一起，表明这是众所周知的希腊性生活的主旋律，其愿望不是根据爱的对象（可能是男性或女性）来定义，而是根据性欲的目标来定义：主动者与较年长的男人联系在一起；或被动者与男孩或妇女联系在一起。出自裴斯诺斯。大约公元前510年。

以家庭为中心的人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大多数古代史料所详尽阐述的社会理想，大多数雅典妇女的一生几乎都在家里或室内度过。然而，只有很少数的雅典妇女，不管具有公民身份还是外邦人身份，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因为大多数妇女，像大多数男人一



根据色诺芬的《家政论》，伊斯科马库斯的妻子像许多上层妇女一样，懂得如何在宗教节日上唱歌、跳舞，有可能她还会读写。在家里，她被分配的任务是，与她的丈夫一起计算并编写家中所有器具的清单。而且她必须精打细算，因为她丈夫跟她说，要使“储藏一年的粮食不致在于一个月里吃光”。

描绘在这个陶瓶上的活动及许多与之类似的情景，属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这些活动极少表现出功利目的。挂在墙上的那个长细颈瓶（香水瓶）表明，这是妇女住处的一个室内场景。一位妇女坐着朗读一卷文稿，文稿上画着的一排排圆点表明这是一些信件。另一位妇女在她面前站着，端着一个匣子，里面放着一些纸草纸文稿。另外两名妇女正在全神贯注地听她朗读。

绘有这个场面的陶瓶是个提水罐（hydriai）（水壶），妇女们拿着它到院里的水井或公共水源处打水。许多提水罐显示，当妇女们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候，她们聚到一起，友善地交谈。这个瓶子和与之相似的其他瓶子上的场景表明，至少上层社会的妇女也为文化活动而聚集在一起。

样，毕竟没有富裕到可以不工作而坐享其成的地步。那些居住在乡村的妇女可能要参加农业劳动，而那些住在城镇的妇女可能要和丈夫一起做小买卖或开商店。至于做家务、带小孩、纺织羊毛和准备食物，可能并没有占去她们工作日的大多数时间。

而且，那些富裕一些的雅典男人与妇女，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从事宗教活动上：要么在家中或家外进行私人祈祷，要么参加分布在庆典之年的许多节日活动。但是，我们掌握的许多史料也使我们能够瞥见优越富裕的雅典人的日常家庭生活。他们的活动与一种社会理想大致相符，即“男人的工作是在阿哥拉处理城邦的事务，而妇女的工作是纺羊毛、烤面包、做家务”。

例如，在色诺芬的《家政论》中有一段关于财产管理的论述：苏格拉底通过叙说他与伊斯科马库斯的谈话，向他的富有的对话者解释有关这一话题的重要观点。他说，伊斯科马库斯是被所有人——“男人和女人、外国人和公民”当做“绅士”的男人。因为伊斯科马库斯与他所属阶级的其他人不一样，他不会把他的钱财浪费在高级妓女、男友、赌博或狐朋狗友身上。另外，他也不是一名工匠，他的职业使他“没有闲暇结交朋友或处理国家事务”。

倒不如说，伊斯科马库斯是一个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他的财产包括几块土地，这些土地由奴隶耕作。奴隶们由一个工头管理，他则亲自监督这个工头的工作。伊斯科马库斯的日常事务是在大清早时，骑马到镇里看管生意。当奴隶把他的马拉回农场的时候，他就步行回家。然后，伊斯科马库斯回到农场，骑马到田里视察奴隶们的劳动，并进行军体练习。最后，他准时走回到镇里，回家吃午饭。

伊斯科马库斯与大多数男人一样，在30岁时结婚。娶了一个14岁的女孩为妻。这一婚姻是新郎和女孩的父母安排的，双方都想为管理家庭和生养孩子尽可能地找到最好的伴侣。

这位年轻新娘早年是在严格监督下度过的，“以使她尽可能少看，少听，少说话”。接下来，由伊斯科马库斯训练他的新娘子做家务。她与他一样，已经受过要

雅典人的宗教生活并不仅限于参加大量的城市或德莫的节日活动。我们知道，许多家庭一起献祭，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是家家户户重要的活动内容。例如，在色诺芬的《家政论》中，伊斯科马库斯的妻子与她的丈夫开始婚姻生活之后，她就与丈夫一起献祭、祈祷。在这幅插图中，一个妇女抱着贡品走向家门前的祭坛，画中左边是她的家。

家中的妇女也可能独立从事仪式活动。例如，在米南德(Menander)的剧本《狄斯科鲁斯》中，有个人抱怨他那迷信的母亲在她居住的地区四处旅行，到各个神殿祭祀。在另一部戏剧中，一个妇女在墙上挖了个洞，以使能够与住在隔壁的她的私生女交流，而墙上的这个洞隐藏在家中的一个神龛后面。伦敦画师。公元前470年。



陶瓶上的妇女被赋予神话中的名字：从左往右是海伦、克吕泰涅斯特拉、无名者、卡桑德拉、伊菲哥尼亚、达奈。她们的活动是描绘妇女住所的陶瓶上的图像中特有的。海伦在往篮子里绕纱线，克吕泰涅斯特拉递给她一个长细颈瓶。墙上有面镜子。圆柱右边，一个妇女递给卡桑德拉一只篮子，卡桑德拉在扶正面纱。伊菲哥尼亚站在开着的门里，看着达奈，往头上裹着丝带。达奈从柜里取出一个花冠，向伊菲哥尼亚走来。这是个有盖瓶——一种圆形、有盖的坛子，用来装化妆品。画中，陶瓶的主体部分被“展开”，以显示典型的闺房的全貌。大约公元前460年。

谦逊温和与自我节制（sophrosynê）的教育，而且他声称，他们俩在一般意义上（epimeleia）拥有同等水平的记忆力和管理能力。不同的是，女人生来（生理上）要负责家务（带小孩、制作面包和纺织羊毛），而男人则要负责外面的工作（犁田、播种、种植、放牧）。

在伊斯科马库斯看来，家庭在理想上是一种对丈夫和妻子都有利的合作关系：妻子为家庭带来嫁妆，丈夫为家庭奉献财产并继续挣钱。然而，为了使家庭繁荣，双方都必须留心对待自己的份内工作。伊斯科马库斯的妻子要学会如何监督家务奴隶、看管家庭存粮、仔细预算开支、井井有条地储藏家庭财产。



做面包是妇女的家务活，希腊人的饮食包括面包和各种副食，如干酪、蔬菜，尤其是鱼。

做面包的过程很繁重。要先把小麦或大麦磨成粉，然后加水，揉制成形，最后烘烤。在较富有的家庭中，家务奴隶做大部分这类活计。伊斯科马库斯的妻子在家里监督面包工人，但丈夫向她建议，参与和面和揉面是很好的锻炼。做这些及其他厨房中的活计的场景经常被塑成陶俑，如图所示，这个妇女正在揉面或做面饼。

到公元前5世纪末，城市居民可能每天购买面包，因为那时雅典出现了面包市场，人们知道某些有天赋的面包师的名字。例如，色诺芬记载，一个叫塞雷布斯的男人靠制作面包“很好地养活了全家，并且生活富足”。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彼奥提亚陶俑。

伊斯科马库斯有个工头为他服务，他妻子也会有一个管家帮助管理家务。她要整天在房子周围来回走动，监督仆人们的工作，视察一切是否按部就班。因为她的房子相当宽敞，这些家务连同纺织、和面、揉面、叠衣服和亚麻制品等工作，将给她提供锻炼的机会。

伊斯科马库斯告诉苏格拉底说，他的妻子是一位值得赞赏的家庭主妇，“她自己确实能够管好家里的一切事务”。对他来说，他要关心善待她。他想使苏格拉底确信，受到善待的妻子在为丈夫增加财产方面，会变成“志同道



伊斯科马库斯最终希望他和妻子会有孩子，随后他的妻子将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依照自然的指示，既然"神分配给妇女一项更伟大的任务——热爱新生儿"。但是他们将"一起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抚养他们"，因为伊斯科马库斯对他的孩子们怀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男孩，就像这个陶瓶上描绘的这位父亲一样。

合的伙伴"。因此，伊斯科马库斯把婚姻当成一种生产与再生产的合作关系，一种社会伙伴关系与性伴侣关系。他的妻子管理着家庭，并保存家庭的账目。她从他那里了解到，如果她没有化妆，她会更加性感迷人。当他在家里模拟审判情景的时候，她则扮演陪审员的角色。他希望他们最终有孩子，她将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

伊斯科马库斯有一些合作伙伴，但他没有提到他妻子的社会生活。某些悲剧中的女主人公抱怨，妻子被迫单独呆在家里。但在阿里斯托芬和米南德的戏剧中，在演说当中以及在瓶画上，妇女们经常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一篇演说中，有个发言人谈道，他的对手们提出诉讼反对他之前，他母亲和他们的母亲们过去曾是亲密的朋友："她们过去常常互相拜访。当然，因为她们都住在乡下，而且她们的丈夫彼此之间也是朋友。"在另一个案件中，有个人说，他给家庭带来他的两名老保姆——现在一个是孤寡的女自由人——陪伴他妻子。演说



母亲将她的男婴递给保姆，婴儿的父亲倚着拐杖，在一边看着。画中有架织布机，表明这是妇女的住所，那个挂在墙上的花环可能是这对夫妇在不算很久以前结婚时的一个纪念品。

女孩通常呆在家里直到结婚，受母亲和女奴的监护。但男孩按照惯例是在七岁时处在男人的监护之下，比较富有的家庭的男孩则在一个男奴隶（paidagogos）的看管之下去上学。成年的孩子应当孝顺父母双亲，在他们老年时照顾他们，并给他们提供生活费。在雅典，不这样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提水罐。属于公元前440年至前430年的波吕格诺图斯的作品。



伊斯科马库斯建议他妻子以威严的方式亲自站在织布机前教她的奴隶们纺织。她已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纺织、如何给女奴们分配纺纱任务。纺纱和纺织是妇女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一种可由奴隶来做，也可由妻子们来做，或由女英雄与女神们来做的活计。由奴隶来做，这是一件令人筋疲力尽的家务劳动。由妻子来做，这可以锻炼她们并展示她们的精湛技巧。珀涅罗珀(Penelope)的纺织既证明她的美德，又证明她的灵巧；雅典娜具有司妇女工艺之责而被崇拜为Erganê（“工人”）；摩伊赖(Moirae)（“命运三女神”）吐出生命之线，并在生命的终点上将之切断。

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纺织羊毛的活动被描绘在陶瓶上。在图案中，妇女们经常从事各式各样的工作，如图示的这只陶瓶上的图案。图中五组妇女独立完成与羊毛纺织有关的任务：左边的两个妇女往一只篮里装纱线；她们旁边的两个妇女在折叠织好的布匹；一个妇女在精纺毛线；她旁边的一个妇女把羊毛梳理进一只篮里；另外两个妇女在一架拉直纱线的织布机旁一起工作；右边两个妇女称出毛线团。

贫穷的妇女也通过织羊毛谋生。在一套罗列着被释奴隶职业的铭文中，妇女们大多被确认为塔拉西欧尔哥(talasiourgoi)，即清洗、整理、梳毛以及把羊毛纺成能够过秤并出售的线团的妇女。长细颈有柄油瓶图案的摹本。画家阿马希斯。约公元前560年。

提到她们坐在花园里一起用餐。

伊斯科马库斯的婚姻当然是一种家长制婚姻。他妻子在家中的权威是他给予她的，家庭经济状况良好有赖于她的全部贡献，而土地财产的收入则归功于他：“通过丈夫的辛勤努力，财产进入家门；但它是通过妻子管理家务才得到合理安排。”无论如何，在其他方面，包括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伊斯科马库斯和他妻子的婚姻都类似于《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所赞美的理想婚姻：

>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那更美好、更伟大的礼物……
> 当男人和女人拥有他们的家，两颗心两个头脑，
> 步调一致时。绝望是他们的敌人，
> 欢乐是他们所有的朋友。他们最有权力要求得到荣誉。

出乎意料的是，色诺芬笔下的伊斯科马库斯和他的妻子多半是历史人物。伊斯科马库斯生于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435年时与克里西拉结婚。他们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位富人。后来，这个富人死了，她又嫁给了卡利阿斯，一个富裕的雅典贵族、臭名昭著的放荡行骸者。婚后不到一年，卡利阿斯把克里西拉带进家门，竟与母女两人住在了一起。绝望的女儿设法自杀，但后来被她母亲逐出了家门。不久，卡利阿斯对克里西拉感到厌烦，虽然她已怀有他的身孕，他还是抛弃了她。当儿子出生时，卡利阿斯否认这是他的儿子。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重新爱上了克里西拉，“这个古怪的丑老太婆”，把她接回家中，并承认这个儿子是他自己的孩子。

对伊斯科马库斯来说，看来他并没有过上多少好日子。作为我们所知的雅典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去世后，其财产已不到他在世时财产的七分之一（他的财产可能在公元前413年至前404年的狄凯利亚战争中被糟蹋完了）。

在古代雅典，社会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大概是体现这种差异的最突出的一例。然而，只要我们考虑到所有妇女在城市与德莫的宗教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考虑到大多数妇女参与正在发展中的城乡经济活动，甚至上层社会的





在这个陶瓶上，妇女聚在女人住所里打扮自己。一个长细颈瓶（香水瓶）挂在墙上，一位女奴隶拿着另一个瓶子。另一个女奴隶（这两个女奴隶都是根据她们的短发来判断的）拿着一面镜子。

伊斯科马库斯建议他的妻子不要“像一个奴隶那样”或“以一种傲慢的方式”坐在家附近，也不要使用化妆品和其他形式的女性装饰。这个陶瓶上表现的聚会显然不被认为是一个妻子应当做的，因为妻子们应当忙于家务劳动。其实，从古风时代到古典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人物类型——贵族妇女，她们沉溺于荣华富贵之中，躲避家务劳动一类的苦差事。与之相对的一面是懒散邋遢的妇女，还有就是蜂王，伊斯科马库斯将他的妻子与之进行过详细比较。

蜜蜂也与纯洁相关，在劝告妻子不要使用化妆品时，伊斯科马库斯想使妻子确信，他会发现她的天然美，一种更大的性魅力。他说，一个未加修饰的、衣着简朴、可爱的妻子比一个女奴隶更具吸引力。因此，伊斯科马库斯承认双重标准，即使他不愿意给自己一个承认的机会。婚礼画家。公元前460年。

妇女们对家庭繁荣做出的贡献，而家庭正是希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基础，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时，其他较少浮夸或诽谤的事例就出现了。因为如果从一种视角出发，如人们通常所声称的那样，古代雅典城邦是一个“男人俱乐部”，那么显而易见，它也是一个许多妇女在其中享有一种客人身份的俱乐部。而其他来自比较富裕阶级的人则组成一个举足重轻的、不可缺少的“妇女的助手”。

第六章 权力与国家

城 邦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个著名片断。时间是公元前413年，两年前雅典人派去征服整个西西里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不愿意掌握最高指挥权的雅典人尼西阿斯（Nicias），试图给垂头丧气的雅典人和同盟军鼓气。他们由于远离家乡，孤立无援，全都明白他们即将面临的命运——立即遭受屠杀或在叙拉古的石坑里慢慢地饿死，或带着绝望和耻辱被卖为奴隶。在这个最后关头，尼西阿斯选择（尼西阿斯是否真的做了这样的选择，或者修昔底德是否说的只是他认为最适于描述这样一场可怕危机的话，都与我们的目的毫无关系）提醒他的听众："男人就是城邦。"

这个定义具有双重含义。对于尼西阿斯时代的希腊人而言，正如在过去三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城邦并不同我们想像出来的术语"国家"那样，是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由人构成的实体——一个公民的社会。正是希腊人享有某种公认的公共的与私人的特权和责任，这种特权和责任使他们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共同体突显出来。也就是说（正如修昔底德笔下的尼西阿斯所说的那样），城邦并非指城墙或舰队，仅是些人工制造物，而是一种精神的共同体。其次，尼西阿斯所用的那个词"男人"（andres），是指生理、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成年男性的成员。希腊城邦是一个含有性别与"国籍"双重意义的排他性的团体。

希腊城邦与中世纪或现代国家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另一个方面，即空间方面。城邦（polis）有时被拐弯抹角地译为不合适的"城市国家（city-state）"[①]。这种观念表明，我们不是在涉及拥有大片领土的民族国家，而是在论及非常类似于中世纪的阿马尔菲或热那亚那样的某种实体。阿马尔菲和热那亚是意大利城市，也是独立自主的政治共同体。"城市国家"还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希腊城邦的中心是某个城市中心，通常集中于一个（用于商业目的，或更狭隘地用于政治目的）市场或集会场所。但是，一个城邦几乎总有一片农村土地，这片土地往往构成它的主要经济基础。而且，在观念上，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城市中心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没有一个英文词能够适当地表达城邦的所有这些意义和内涵。"公民国家（citizen-state）"也许是最折中的一个词，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词都更精确地反映希腊城邦的精神和物质的实质。

① 在本书中，译者也采用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译名，其实"城邦"即"城市国家"，并不能充分体现古希腊人对自己国家形态的认识，严格地说，Polis一词最好音译为波利斯，因为无论英文还是中文都没有对应词。但如果译成波利斯，又会给习惯旧译名的读者造成重新理解的困惑，所以我们在这里仍依循传统。——译者注

由于缺乏与之相关的同时代的文献资料，我们不能肯定回答如下问题：在希腊，城邦如何或为何正好以一种国家的形式出现？无论如何，恐怕这个过程可能比起“城邦的出现”这一空洞的短语复杂得多。有点相似的政治单位，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大概同时出现于铁器时代的地中海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腓尼基和意大利中部（拉提乌姆和埃特鲁里亚）。起作用的时期似乎是在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此时也可以看到出于经济和政治动机而迁徙的“殖民”运动，当然不是同步发生的。这同样是不仅仅局限于希腊的过程，虽然在希腊人的例子中，它拖得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在文化上更具有决定意义。至公元前500年，从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除了某些地方之外，如利凡特、埃及、北非的腓尼基－迦太基人地区）以及黑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都散布着希腊的政治共同体。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考察了数百个经历过各种发展阶段的希腊城邦，在《政治学》一书中认为，他可能识别出一种适用于城邦形形色色的政治和政体发展的潜在模式，它具有典型的希腊特征，是一种战争、经济与政治的结合体：

希腊最早的政治制度——君主政体，事实上包括战士，首先是骑兵，因为正是在骑兵身上，人们发现了战争中的实力和优势……后来，当国家扩大，那些拥有（重装步兵）武装的人变得强大，参与政治制度的人数增多的时候……足以理解，这些早期的政制是寡头制或君主制。

亚里士多德对早期希腊广泛、普遍地存在君主政体提供的证据，部分依赖于一个幸存下来的古词 basileus（“国王”），这是他所处时代城邦中的一种非贵族的城市官员的头衔。但他的证据主要还是出自荷马史诗。那些在特洛伊作战的希腊人不仅都是一个或另一个国王的属民，而且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则就是王权至上，以致较小的国王全都同意服从一个最高王的指挥，即“万民之主”、“富有黄金的”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其实，在《伊利亚特》第二卷中，荷马令这些较小的贵族之一，伊大卡的奥德修斯鞭打并申斥一位自负的平民忒耳西忒斯，严厉地提醒他并告诫大家，统治者太多是件坏事，蛊惑必然导致错误的决定。

贵族的兴起

今天我们就荷马史诗是否是史实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诗作为史实看的话，那么诗中虚构的场景最接近于真正的希腊人的哪个时期？最常见的一种观点似乎是，如果有一个由国王统治的真实的荷马世界，那么它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不可能超出这个世纪之外。到了赫希俄德的时代（约公元前700年），贵族制已经取代了真正的君主制。无论如何，人们一般赞同，最早的城邦主要由那些“最优秀的”（aristoi）男人来治理。他们依靠自己优越的经济实力以及把他们的祖先追溯到某位神灵或英雄，为自己赢得或要求得到特权。

普鲁塔克为创立雅典的英雄提修斯（Theseus）作传，其中有一段话作为有关

提修斯的史实可能是不准确的，但它确实简洁地概述了早期希腊贵族制的本质：

> 提修斯让贵族们掌管宗教仪式，充任政治职务，宣讲并执行法律，解释所有宗教事务。对于其余公民，他确立了特权的平衡，根据这样的假设，即贵族最高贵，农民最实用，工匠人数最多。

这里强调宗教以及贵族对宗教权力的垄断是切中要害的。希腊城市既是神的城市，也是男人的城市，独揽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管理权，就把一根世俗权力至高无上的杠杆给予了贵族。

然而，不久之后，平民向大权独揽的贵族提出了挑战。荷马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忒耳西忒斯和真实的历史人物、彼奥提亚诗人赫希俄德，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这种趋势。然而，忒耳西忒斯和赫希俄德仅仅抱怨，在某些城市中，持不同政见的贵族对平民加以有力的引导，把他们的忿怨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亚里士多德怀

梭伦：雅典民主的先驱

雅典的梭伦，古希腊最初的“七贤”之一，出身于元老（Eupatrid），也就是贵族家庭，但家境并不是非常富裕。因此，公元前600年左右，他成为陷入困境的雅典统治贵族解决困扰着雅典的危机的最佳人选。梭伦于公元前594年被他们任命为执政官。这场危机产生于两种明显不同却互相关联的压力合成的一种潜在的灾难形势，这种压力就是要求进行激进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就经济而言，阿提卡的乡间，作为雅典公民的属地，分裂为两个主要的对立阵营：贪婪剥削他人的大地主和大量负债的农民。后者中有些人是债务奴隶，他们把自身作为他们可能无法偿还食物和种子借贷的抵押。还有些人事实上已被卖到阿提卡境外当奴隶。那些贪婪的地主几乎都是世袭贵族，属于古老的贵族统治阶级。但并不是全部如此，也有一些富裕的非世袭贵族，因为出身之故而不能享有政治权力，只能作为骑兵或重装步兵扮演一种新的军事角色。所以这也是危机在政治方面的部分体现。

非贵族富人要求取得与他们的经济和军事身份相称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贫穷百姓的政治要求则比较温和。在一旦减轻了他们身上的直接债务负担之后，他们主要的要求就是免受任何可能重新出现的奴役。然而，穷人中有些比较大胆的人想要的更多——不仅取消他们的债务，而且重新分配有产者拥有的土地。

然而，中庸的梭伦对此划了一条界线。他在自我辩白中说，对于富人和穷人，他一碗水端平，所给予的特权只是他认为每个集团应当得到的那部分。所以，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富人对这场危机负有主要责任，但他并没有激进到干预他们的土地财产权。不过，他废除了所有现存的债务，并把今后以人身作为借贷抵押的契约视为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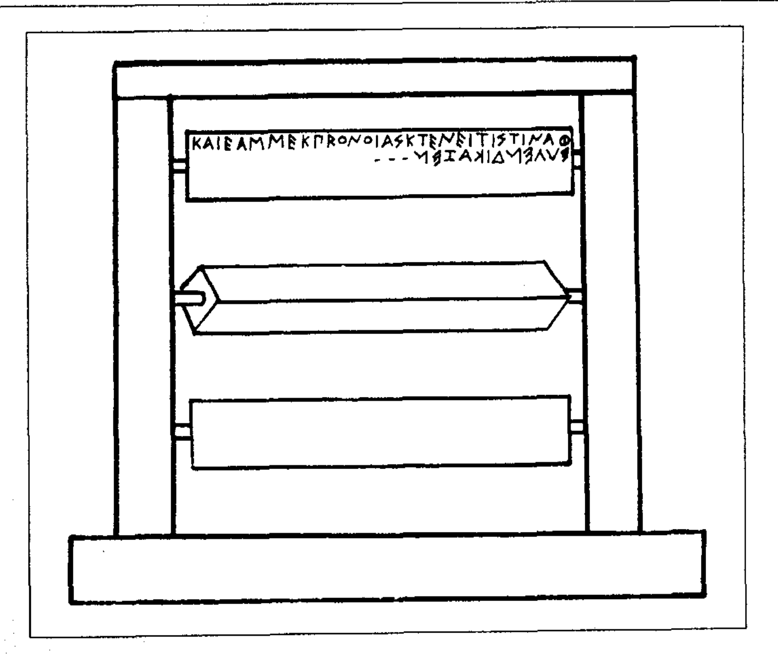
在政治方面，梭伦剥夺了世袭贵族的政治垄断权，但他没有解散旧贵族的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因为议事会原来在战神阿瑞斯（Axes）山上召开，故名），而且他允许权力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富人手里，从而主要是满足了富裕的非贵族的要求。对穷人来说，他们获得某些保护，通过赋予上诉权（可能向一个称做“民众法庭”的新法庭提出上诉），免受富有官员们对他们施以非法或不公正的对待。由于“民众法庭（Heliaea）”这个词可以指“公民大会”，因此民众法庭可能是公民在一个审判厅中定期召开的公民大会。在大会上，每个公民都有投票权。但是可能只有比较富有的雅典人才能参加这一活动。

然而，不管梭伦的立法由于未授予贫穷的雅典百姓以社会和政治权利而如何具有局限性，它们确实体现了普遍适用的平等观念。这些法律不仅写了下来，而且在也许是新设立的广场或城市中心的木柱上公开加以展示。它们也证明是未来以民主为特定本质的政治发展的坚实基础，这就是梭伦经常被人们不合年代地当做雅典民主奠基人来回顾的原因。

疑这个变革背后隐藏着军事原因，他的看法似乎有道理。大体说来，发生了权力从由贵族家族构成的狭小群体转移到或被强制转让给一个比较广泛的、由家道殷实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社会经济阶层手中。由于公元前7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型重装步兵方阵（见第162页），为这些土地所有者提供了在政治上获得彻底的军事优势的条件。所有这种寡头制变革的最完备的记载，体现在雅典的梭伦改革（见第136页）当中。

于是贵族制基本上被寡头制取代，尽管我们必须记住，希腊贵族与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贵族一样，在他们作为统治阶级而光宗耀祖的时代已经化作缥缈的记忆之后，他们仍然有能力把有关他们身份的最后一点痕迹清楚地保留下来。关于这种能力的最明显的体现恐怕就是交际酒会或上层阶级的私人聚会，这种酒会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在公元前4世纪仍然盛行，如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哲学著作被题名为《宴饮篇》中可见）变成了重要的文学文化论坛和中心。

有关早期希腊贵族这种能力的另一个展示领域是城市的宗教节日，体育或音



载有梭伦新法典的一种装置的大概复原图，法典被写在带轴的、可旋转的木块上（kurbeis）上，装在框架里公开展示。

不过民主制事实上并不是直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才建立起来的，也不是主要由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进行的那些改革巩固下来的。克里斯提尼的创新是重新勾画了阿提卡的政治地图，把德莫（村或行政区）的成员权利作为雅典公民权的基本标准，并把德莫合并为人为设立的新部落。这些新部落将阿提卡主要地理分区的公民团结在一起，从而重新划分了雅典的行政区域。这10个新部落是雅典军事组织的新基础，每个部落选出50名成员组成一个新的议事会，其主要职责是使所有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能够承当雅典的主要决策机构。

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司法改革上。战神山议事会最重要的政治特权被剥夺，此时不过是审判某些宗教案件的法庭。它以前的权力被转移到克里斯提尼设立的五百人议事会、公民大会，因此最重要的是被转移到由梭伦创立、经过改动的民众法庭上。这个新的人民法庭不只是上诉法庭，还是初审法庭，它使志愿公诉人制度（可能梭伦已经设想过）首次具有了付诸实际的可能，从而促进了民众司法的事业。

这种人民法庭的陪审员是以民主的方式抽签选举产生的。抽签是随机的选择，给予雅典贫苦民众供职于公共事务以最大的机会和鼓励。进一步的激励措施是对当选者支付一笔数额虽小却并非微不足道的每日“薪酬”。这是一种可行的最早的政治酬金。后来，在议事会供职（也由抽签选举产生）也可以获得报酬，甚至出席公民大会也可得到津贴。

当然，雅典作为第一个民主城邦是非同寻常的，但它在从贵族制向寡头制的过渡中，在采用一整套公开、依法实施的规章制度和原则上实行法治的过程中，是同其他较先进的多数希腊国家携手并进的。

在形状和装饰方面，这个小双耳细颈椭圆陶罐（酒罐）是对每四年一届泛雅典娜运动会上作为奖品的同类陶罐的不很准确的复制。这个罐子的前面，戴着头盔、拿着武器的雅典娜在大步前行。图中所示的是这个罐子的背面，一个吹笛手（auletes）在两名听众或评委面前展示他的技巧。



乐比赛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些节日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整个希腊的体育节庆，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披提亚运动会、伊斯米安运动会和尼米安运动会[1]。在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的后半期，这些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没有中断过。但是，一

[1] 这四大集会主要用来祭祀神明，分别为天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塞冬和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译者注

个像雅典那样的规模很大、雄心勃勃的城市很快在泛雅典娜体育运动会上展现出自己的地方吸引力。这项活动是与庆祝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与阿提卡异常广大多样的领土在政治上的统一（因此人称“所有雅典人的”）的活动同步进行的。

僭主制

其实，那时候的联合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泛雅典娜节运动会建立后的十年时间，雅典两次受到一个名叫“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的未来僭主举行的未遂政变的困扰。当然，庇西特拉图本人自称，他的传统的贵族血统可以追溯到荷马笔下的涅斯托耳（Nestor）的儿子。庇西特拉图最终确实在雅典建立起稳定的僭主政治，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他甚至建立了一个短暂的朝代。但尽管如此，僭主政治在雅典人眼里，事实上在所有希腊人眼里，仍然是一种pis aller，即某种不完全属于希腊的东西，背离了共和制的规范——公民的自治。

一个醉醺醺的人或至少很快乐的成年男人，头发盘卷在一个花环之中，身套一件编织而成的昂贵外衣，躺在睡椅上，唱着“噢，最英俊的男孩们啊”，一边抚弄着一只野兔。他可能已将这只兔子作为爱情信物送给了他那年少的心上人。在这里，我们被直接带到了雅典的一个贵族宴会或酒会的情景当中。但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在这种酒杯被制作出来的时候，对于像这样的雅典人而言，这种聚会从政治上说来，已经几乎是过眼云烟了。民主政治已经到来。

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的后半期，出现了与雅典有关的另一位僭主，但在这个事件中，僭主之位是获取的而不是继承的。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具昂僭主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加里斯特（Agariste），嫁给了一位雅典贵族梅加克勒斯（见第89页）。他们生了一个儿子，按照通常的取名方式，依据他外祖父的名字，也叫做克里斯提尼。在适当的时候，这个克里斯提尼成了希罗多德笔下的“为雅典人创立（新）部落和民主制的人”。

梅加克勒斯为了（他是这么想的）巩固一个政治联盟——该联盟意在结束代表阿提卡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经济及政治利益的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庇西特拉图。起初，这次联姻是成功的，庇西特拉图因此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50年代中期，暂时获得了他第二次（共三次）僭主统治的成功。但是，这场联姻很快以眼泪收场，据说是因为庇西特拉图拒绝过可能导致生育的性生活（他已经在前一次婚姻中有了两个儿子）。

庇西特拉图被再次流放，这一次是流放十年。他把这段时间花在有效地整合经济、政治和象征性的资源上，不仅足以在激战中打败他的敌手组成的联军，而且足以保证他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结果几乎达到20年）掌控权力。可以预料到，宗教是他的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不仅泛雅典娜节引起了他的特别重视，而且悲剧演出在他的统治之下首次突显出来。他和他的儿子还把资源滥用在功利性的和精神方面的公共事业当中。这种开销的副产品之一是大大增加了官方铸造银币的数量，而这种银币始终是希腊公民感到自豪的一个象征。另一个副产品是

女神雅典娜和猫头鹰之间有联系。雅典人把猫头鹰当做他们国家的象征。公元前6世纪后期以来，雅典的银币上便装饰着这种鸟的近乎滑稽的可爱形象。在铸币的另一面，可以看见雅典娜的圣树——那棵橄榄树的一根小树枝。





第一枚雅典银币“猫头鹰”的诞生。难以预测的是，庇西特拉图选择通过现存的雅典的宪政来实行统治，即由中庸的寡头制改革家梭伦于这个世纪初期确立的体制，而不是通过直接实行独裁来实行统治。当然，他也谨慎地把最高职务始终交付给“正确的”人，即他自己的人。对庇西特拉图来说，不存在自由的和公平的选举。然而，夹在旧土地贵族和大量贫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构成雅典公民主体的中产阶级，却从日常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某些经验。这在古代的政权之下恐怕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在梭伦改革了的政体之下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庇西特拉图时代在某些人眼里，就成了一个旧日的黄金时代。

然而，正如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序言中所明智地看到的，这是一个人类历史的铁定的规律：繁荣转瞬即逝，渺小可以变成伟大，伟大在某些时候也会无情地变得渺小。所以，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也是一样。它的统治起初因为内部反对而衰弱，后来被外部干涉所推翻。公元前514年左右是反对力量最活跃的年代，当时庇西特拉图的两个儿子之一希帕科斯（Hipparchus），即起支配作用的僭主希比阿斯（Hippias）的弟弟，被谋杀了。哈尔摩狄俄斯（Harmodius）和比他年长的情人阿里斯托盖敦（Aristogetion）事实上并没有打算为城市的自由和平等而战斗，更不用说为民主而战了，他们谋杀希帕科斯是出于私人原因。但是，后来的人们是这样设想他们的行动的（这与我们也许可称之为“重新获得的记忆”相符），这种假定的“诛杀暴君者”的青铜雕像立在了雅典的阿哥拉，它们是最早用来纪念人的雕像。

后来，公元前480年，波斯大王薛西斯抢走了原作并带回苏萨[①]，诛杀暴君者的群雕不得不被替换。至此为止，大多数普通雅典人忘记了发生在公元前514年的暗杀和公元前508或507年克里斯提尼改革之间曾有为时六年的一段尴尬的间隔期。更重要的是，他们显然也忘记了在间隔期间发生在两位贵族——伊萨哥拉斯（Isagoras）和克里斯提尼之间的那种旧式派系斗争的不光彩的较量。伊萨哥拉斯支持寡头政治，如果他不是倾向于僭主政治的话；克里斯提尼知道他应反对僭主政治，尤其是如果僭主政治受到雅典的敌人斯巴达人的支持（正如人们普遍相信的那样）的话。但他可能并不确切地知道要用什么制度来取代它，或在他的派系斗争中号召雅典人民的支持会最终产生什么后果。

（右页图）雅典人哈尔摩狄俄斯和他的伙伴阿里斯托盖敦，大约于公元前514年一起暗杀了希帕科斯，之后他们被尊为英雄“诛杀暴君者”。根据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命令，组雕原作被移至波斯首都苏萨。我们在图中看见的雕像是罗马人对其仿制品的复制品。原仿制品为一组公元前475年左右创作的希腊青铜像。

克里斯提尼是贵族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后来的伯里克利由于母亲的关系也属于这个家族。在克里斯提尼与伯里克利的领导下，先是建立，后是急进地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民自治政府。这里所指的人民是人们熟

① 波斯帝国的四个首都之一。——译者注





知的“民众”(demos)——这是一个既包括地位最低下的商人，也包括身份最高贵的贵族的术语，他们的全权统治是一种“掌权”(kratos，字面含义是“掌握”，在当今的现代希腊语中，则意味着“国家”)形式，于是“民主”这个词应运而生[①]。

民主政治

起初，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507年或508年)开创的新政体事实上并不叫“民主制”。相反，用以替代的词是isonomia(“伊索诺米亚”)，意思更像是“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权力平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词避开了“民众”(demos)一词暗含的争议。民众，除了指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集体意义上的人民之外，还可以在阶级意义上仅仅解释为群众，即大多数人、穷人、一般人、乌合之众。另一个表达平等的基本思想的正式的、中立阶级的术语，就是isegoria(“伊塞哥里亚”)。它很早就用来指发展中的雅典民主政治。这个词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指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发言权，特别是在公民大会上平等地享有当众发表演说的权利。但事实上，要在露天会议上，在代表当政的雅典中央政府的公民大会上，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公共演说家，需要足够的勇气、技能、强健的肺部和具有魅力的舞台表现，因此在实践当中，纵观民主政治的历史，大多数正式的或专职的公共演说家都出自于一个小的精英集团。

在雅典彩陶罐上只有三个补鞋匠形象的画，这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文字史料中，补鞋匠经常被描绘为典型的公民小手艺人。有个叫西蒙的人，甚至参与了同苏格拉底的对话。图中的人可能就是这个鞋匠西蒙。他的房子(以及修鞋的平头钉)已被挖掘出来，地点在雅典广场附近。

部落的结构

对于大多数雅典人来说，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完全自治，而只是大部分自治，那就意味着它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把新生的民主体制建立在变化多端的民众(demos)一词的另一种含义(即demos作为村庄或行政区)基础之上，这是克里斯提尼政权所表现出来的最大胆、最出色的地方之一。经过他的重新分配之后，在1000平方英里左右的阿提卡地区(大致相当于卢森堡的面积)，被认可的这样的德莫(demes)大约有140个。一位男子要成为雅典公民，必须由具有公民身份的父亲或男性监护人将其(把他的名字)登记在他出生的或祖先生活的德莫的正式户口上。德莫在决策的层次结构中，被组合进上一级的30个单位，这30个单位被相等地分在三个政治地理区：城区、内地和滨海。这30个单位按每个政

① 古希腊民主一词Demokratia 是组合词，由demos(民众或人民) 和 kratos(掌权)组合而成。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译者注



在这个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双耳细颈椭圆陶罐上，描绘着一位公共演说家。他站在讲台上，台下站着一位成人，象征性地代表他的听众。演说家的两只手臂裹在宽大的外衣里，这意味着他的礼貌和克制。据说半个世纪之后，克里昂开创了带有戏剧姿势、不合礼节的演说新风格。

治地理区一个的方式依次分配，组成10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一个部落英雄，作为部落成员忠诚和宗教崇拜的中心[①]。所以，希罗多德把克里斯提尼描述为“雅典部落和民主”的创立者。公民正是作为一个部落的成员在军队中打仗或在五百人议事会中任职。五百人议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此时开始在普尼克斯（pnyx）山上召开，见第五章）下属的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常设机构。

① 克里斯提尼的地域部落划分方法比较复杂，在世界史上十分少见，反映了改革者的良苦用心。他先把平原、滨海、内地三大地理区各平均分割成10个地区，称三一区，共计30个三一区，即作者所说的30个单位。然后从每个地理区各抽出一个三一区组成一个新的行政“部落”，计10个部落。这样，每个部落包括三个互不相邻的三一区，每个三一区内原有的自治村（德莫）是隶属部落的基层单位。——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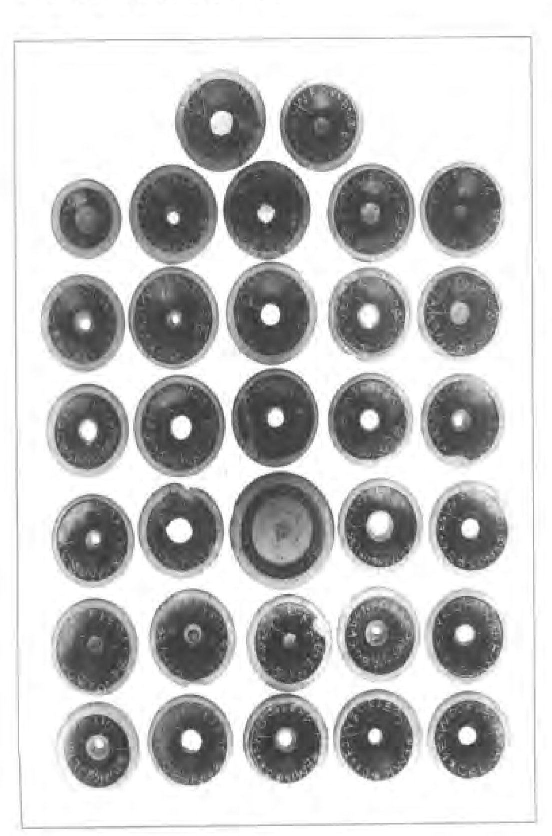
这个雅典的红图彩绘基里克斯陶杯（公元前470年左右）上的画面内容，尚未得到充分确定，但可能是对一次实施陶片放逐法的点票过程的描绘。图正中右边的那个有胡子的男人，一手握着铁笔，一手拿着书写板，可能是在记录票数。选票从左右两边送过来，放进桌上的巨爵（混合容器）中。

投　票

几乎在任何气候条件下公民大会（但下雨可能会阻止会议的进行）都会在一个露天的山坡上召开，与会者有几千人。大多数雅典人可能从无斗胆在公民大会的会议上哪怕发过一次言，更多人可能敢于在议事会或在德莫的公民大会上讲话。但是，基本上所有人都可能感到自己能够通过投票的方式积极参与了执政。亚里士多德最终把公民定义为那些参与管理（担任公职）或审判（主要指法律方面，但也并不限于此）的人。他补充说，这种定义尤其适用于民主政治下的公民，他们同少数富人统治的寡头政治下的公民形成对比。因为从理论上讲，民主决策是所有人民通过投票以公开的方式共同决定每一件事情。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大多数投票都是用举手来表决的，然后进行估算而不是逐一点票，这样做纯粹是出于时间上的考虑。不过，这种方式也比斯巴达人通过喊叫进行投票的方法有所进步。在斯巴达，声音洪亮的人赢得了与之不相称的政治作用[①]。为了与严格的平等标准相吻合，投票不管是秘密的（如在法庭上或有时在公民大会上），还是公开的（如在议事会上），都必须完全遵守一位公民只能投一票的原则，不考虑他们的财富、出身、智力、外貌或其他任何条件。

一种独特的民主投票方法（虽然不仅限于雅典）被称为“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因为选票并不是石块（卵石，我们的词语“选举”即由此而来）或青铜票证（如在法庭上使用），而是一些

公元前4世纪80年代，铁米斯托克里以超常的谨慎，成功地把陶片放逐法当做一种政治武器来使用。但在大约公元前470年，局势最终发生逆转：他发现自己成了选民们排斥的对象。他的死敌不择手段，甚至事先准备好一批陶片，在上面刻出他的名字，可能是供文盲或至少是懒惰的投票人用的。在阿哥拉出土的190块陶片上只有14个人的笔迹。



① 斯巴达公民大会常用的投票方法是喊叫。赞成或反对某项议案的声音大，即为多数。只有在会议主持人难以判断赞成与反对的声音的大小并且提案意义重大的情况下，才会点票。——译者注

碎陶片、陶瓷碎片（ostraka）。陶片放逐法作为反向选举的一种形式，是除去危险敌人的一种主要手段。失败者，也就是那个得到大多数选票（写着他名字的陶瓷碎片）的人，被迫引退，放逐到阿提卡之外十年，有效永久地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有一种古代的传统看法把陶片放逐法的发明权归于克里斯提尼（于是产生了具有幽默色彩的现代推测，即克里斯提尼在公元前507年突然间从人们视野里完全消失的原因是，他被自己的陶瓷碎片打发走了）。但是，尽管这种制度可能与我们所知的克里斯提尼的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赋予普通公民权力——并不矛盾，但是陶片放逐法并不一定直到20年之后，即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早期才被采用。不过，一旦它被实施，便被人用于报复。

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波斯为洗雪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之役中受到的耻辱，不断加大对希腊的威胁，外交政策的危险系数不断增大，因而国内发生了陶片放逐法之战，其中明显的赢家是铁米斯托克里（Themistocles）。正因为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海战中采用了他的策略并取得成功，所以埃斯库罗斯在他那幸存下来的最早的悲剧《波斯人》（公元前472年）（见第9章）中回顾了这场大捷。但不久之后，铁米斯托克里也被陶片放逐。他在雅典政治中的领导地位传到了米尔提泰（Miltiades）（马拉松战役胜利的指挥者）的儿子西蒙（Cimon）身上。

军事影响

在西蒙领导下，雅典人把反波斯的海军联盟（提洛同盟）发展为新兴的海上帝国，使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改变。这种力量从比较富有的重装步兵身上转到了较贫穷的雇工级公民身上，正是他们将力量赋予提洛同盟所提供的大部分雅典战舰（见第172页）。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发展的模式，政治制度往往随着军事变革而变革。这种发展模式使得我们期望：雅典的海军帝国主义或许会对政治体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情况果真出现了。公元前5世纪60年代晚期，厄菲阿尔特与他的年青助手伯里克利说服当时非常激进的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把克里斯提尼的中庸民主政治有效地转变为充分成熟的人民统治。战神山议事会——雅典从前的最高法庭，但现在变成了过时的贵族特权的遗迹——被剥夺了残存的大部分权力。

危险中的民主政治

战神山议事会职能的减少，在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三部曲（公元前458年）中得到反映，而且受到了明显的称赞。但厄菲阿尔特本人在那时已被暗杀。在雅典政治中，顽强持久的反民主潜流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几乎所有写出幸而传世的作品的雅典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原则上都是反民主的人。这种反对民主的人士所能收集到的各种论点，在保存下来的西方最早的政治理论分析文本——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所记载的有关波斯人的争论中[①]，被简洁地罗列出来。他们归结出的是一种鄙薄的看法，即平民不适于统治雅典，因为他们浮躁、无知、

① 希罗多德记载了大流士等波斯贵族在粉碎高墨塔政变之后，曾讨论在波斯实行什么政体最符合国情。会议最终采纳了大流士的意见，继续君主专制，大流士后来被推为波斯帝国的新国王。这段记载显然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基本看法，并事情本身不一定真实。——译者注

愚昧，甚至不能管好自己。

抽 签

与反对民主的人相反，赞成民主的人认为应以公民平等的理念为基础。由于每个公民原则上都是平等的，同样有义务参与制定影响共同利益的政策，因此雅典的政治机构就应该如此设置，以便最大限度地允许人们负责任地参与。为了实现这种预期的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便是抽签，选任官职通过抽签来决定（除了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最高职务之外，因为这些职务需要专门的知识或责任）。五百人议事会的任命情况和公民在民众陪审法庭的职务分配情况也通过抽签决定。

君主制永存吗?

希罗多德如此肯定地认为，约公元前520年，三位波斯贵族同谋[1]为了讨论政治大计，在年轻却已经颇为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行政首都苏萨会面。他们阴谋反对篡位者高墨塔（Gaumata），此人于冈比西斯（Cambyses）（波斯帝国的建立者居鲁士大王（Cyrus）[2]之子）死后，在混乱之中夺取了王位。这场阴谋的领导人，即历史上合法的君主政治权威的最后恢复者，是大流士（Darius）。大流士既是冈比西斯的远亲，又是他的妹夫（大流士娶了冈比西斯的妹妹阿托萨）。

在希罗多德有关这次讨论的记述中，这是一场正式讨论会，大流士自然是主要的与会者。他是第三个发表意见的人，他的主张——赞成合法的君主政体，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不仅要明确地支持君主制，而且还必须反驳他的两个讨论对手分别提出的民治和寡头之治的论点。

首先发言的是欧塔涅斯（Otanes），他花费了大部分时间反对君主政治，说它是货真价实的暴政的恶劣形式：

当君主能够为所欲为又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时候，君主政治怎么能成为一种秩序井然的制度呢？……既然暴君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好东西，他就不应该再怀有忌妒之心，但是他在对待他的臣民方面恰恰相反……他所做的最恶劣的事情是：他任意改变我们祖先代代相传的传统习俗；他强奸妇女，他对人民不经审判而任意诛杀。



为了防止这类恐怖事件发生，欧塔涅斯极力主张“伊索诺米亚”——有点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称这种制度有“最好的名声”。在他看来，这种多数人统治的制度有三大最重要的特点将它与其他制度区分开来：“人民通过抽签任职；他们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他们公开辩论。”

换句话说，欧塔涅斯主张民主政治，但避免使用这个词，因为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变得很明显。正如欧塔涅斯将君主政治和暴君政治混为一谈一样，美伽比佐斯（Megabyzus）将“人民（平民）”和“闲荡的暴徒”、“放肆的群众”相提并论。他对平民抱有敌意，因此他愿意承认，甚至暴君也比他们强，因为他至少“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不过，美伽比佐斯更愿意波斯人应该由“最优秀的人”（贵族）统治。通常，“最优秀的人”是指贵族的用语，他们具有高贵的血统，是富裕的少数人。但是，美伽比佐斯不合常规地用它指最有才智的、受到最好教育的人。而第三个人，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者大流士却不考

由于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的改革，此时的民众法庭和公民大会一样，是一个民主决策机构（希腊人不认可我们现代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分开的原则）。另一项重要



抽签选举产生的雅典民众法庭的陪审员，会领到一个青铜的身份标签"皮纳吉昂"。这个公元前4世纪的身份标签上刻着其主人的名字、父姓（他父亲的名字）以及他进行公民身份登记的那个德莫（塞菲西亚）的名字。有些陪审员非常爱恋他们的这种标记，把它们带进了坟墓。

虑这一点。

关于暴民统治的恐怖，大流士赞同美伽比佐斯的观点。但是，他抨击他所理解（或误解）的美伽比佐斯支持寡头政治、少数富人统治的观点。

在寡头制中当一大群人在人民面前争胜时，他们个人之间产生激烈的敌对情绪……因此招致内部斗争，由内部斗争又造成流血事件，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是独裁之治。

当然，假设君主是"一位最优秀的人"，那么，由于其实效性和原则性，更加上君主制是波斯传统统治模式的缘故，因此君主制一定比民主制和寡头制"优越得多"。

希罗多德并不同意大流士关于君主制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就希腊人而言都会如此。希罗多德似乎有些同情美伽比佐斯对明智的贵族政治的偏好。不过，他对新的、纯粹属于希腊人的民主制的看法并不明确。一方面，他高度赞扬雅典的"伊塞哥里亚"——字面意思是言论自由的平等权利，但这是由于军事方面的优越性而非较狭隘的政治上的益处。他认为，当雅典人受到斯巴达和其他希腊城邦的攻击时，正是"伊塞哥里亚"促使他们在保卫国土的时候发挥出其重要优势，而在庇西特拉图专政的束缚之下，他们仅仅是一般的好士兵。另一方面，他因为雅典群众的轻信而赞成美伽比佐斯和大流士的观点。他觉得，在伊奥尼亚人起义期间（公元前499年～前494年），人民群众在亚洲举行一场注定失败的反波斯运动是愚蠢的行为，只能导致希腊人受到进一步的压迫和奴役。

修昔底德的政治观点则清晰得多。他认为，他所知道的雅典政府的最好形式不是民主政治，甚至在他笔下的英雄伯里克利的领导下也是如此。雅典最好的政府形式是由5000人组成的中庸的寡头政治，它于公元前411年统治了几个月。显而易见，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不同，他似乎持有标准的精英观点，即群众天生愚蠢无知，容易受骗上当和变化无常，因此不适于统治国家。正如修昔底德所描述的一样，伯里克利的标志性成果在于他统治人民而不是人民统治他。正如他认为的那样，这才是典型的民主体制。

伯里克利凭着他的等级、能力和著名的正直，确实能够独立地控制群众。简而言之，是领导他们，而不是被他们领导。因为他从没有使用过不恰当的手段去攫取权力，所以他也从没有必要去迎合他们。恰恰相反，他享有很高的声誉，可以直接反对他们，不惧怕激怒他们的危险。

然而，把伯里克利看做是雅典的一位没有王冠的国王，可能是夸大其词[3]。修昔底德自己的叙述表明，即使在伯里克利的统治下，人民也处于支配地位[4]。

(1) 按希罗多德在《历史》第3卷第70章以次的说法，起初是3人，很快便扩大为7位波斯贵族，并且推翻高墨塔统治的密谋与行动均由7人参加，关于政体问题的讨论亦是7人，并非3人。作者在这里明显有误。——译者注

(2) Cyrus the Great 之类称呼常被译做居鲁士大帝，这是不准确的。Great在这类场合往往只是一种荣耀的称乎，并没有"大帝"之意。如前所注，马其顿王腓力和亚历山大冠以Great，也只是"大王"或"伟大"的意思。——译者注

(3) 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比喻伯里克利像一位无冕之王，意思是说他能引领群众，而不是讨好群众。——译者注

(4) 伯里克利因群众误解，被公民大会免职并课以罚金。——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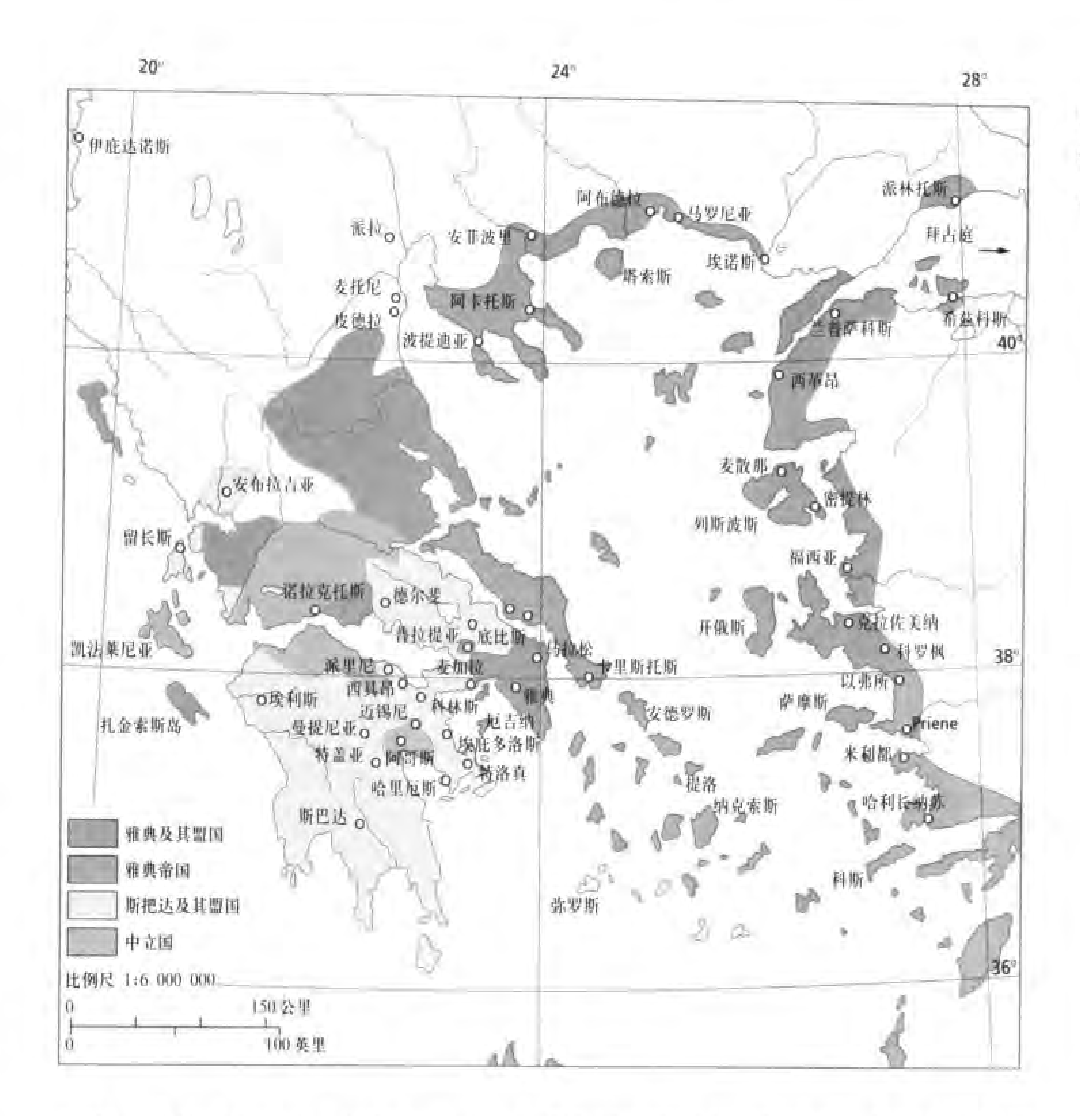


雅典人用陶制水时计(他们称之为clepsydra或"滴漏")来计量法庭上规定的发言时间。每个水时计的容量根据choe(水壶)或双耳细颈椭圆陶罐(罐子)来测量。这个保存下来的水时计约属于公元前400年，可容纳2水壶或大约0.4升水，大概6分钟流尽。

的民主改革是在政治方面引进酬金制度。起初，陪审员一职可获得津贴；随后在议事会上任职可获得津贴；后来在军队和舰队中服役也有报酬（但津贴制发展的顶点，是非常富裕的雅典人必须承担一项公共义务，每年保证承担一艘三列桨战船的装备和维修）。最后，也就是直到公元前4世纪90年代，出席公民大会也可拿到酬金了。

陪审员与法律制度

考古证据作为文学材料的补充，帮助我们理解雅典直接参与的民主制的实际运作方式。人们发现了一个复杂的分配机构的痕迹，用于挑选陪审员并将他们分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爱琴海域的希腊世界分为由雅典和斯巴达领导的两大势力集团（见第154页）。

派给一个特殊的法庭。每年有6000名雅典公民当选为候选陪审员，其突出之处是他们比平均年龄大，较平均水平穷。从他们中再选出一定数量的陪审员，以满足每年150天至200天中的每一次开庭。一方面，为了防止贿赂事件发生，另一方面，为了强调陪审工作是一种公开的政治行为。根据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陪审团的规模往往很大——从201人到6000人之多。公元前399年，审判并宣布苏格拉底犯有“渎神”罪的陪审员的数量（501人）是一个正常的数目。列入每年6000人大名单的陪审员要被授予一个身份标签“皮纳吉昂”（pinakion），即一个青铜条，上面刻着他们参与政治时的正式名字。我们可以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公元前422年）和《鸟》（公元前414年）中推测到，雅典人对待陪审员的工作是多么严肃认真。但关于陪审员重要地位的更加雄辩的证明，恐怕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雅典人实际上把“皮纳吉昂”作为自己的陪葬品。

在雅典的法庭上投票是无记名投票。陪审员们手中有两种青铜选票，一种是有罪选票，另一种是无罪选票。部分原因是由于参与投票的陪审员的人数太多，所以他们事先未经讨论就开始投票。判决之后没有上诉程序。如果一个“有罪”的判决被投票通过，那么在某些案例中，执行的处罚是严厉的，例如对叛国罪处以死刑。但在其他案例中，还有进一步的讨论以及对这个判决再一次投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501名陪审员以微弱的多数判处犯有渎神罪时，绝大多数陪审员投票赞成处以死刑，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苏格拉底没有为自己提出一种足够严厉

民主的颂歌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于1863年所做的葛底斯堡演说，恐怕是有关近代民主政治的最伟大、无疑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演说。它的基本参照和灵感来自伯里克利在为公元前430年最初几个月阵亡的雅典将士举行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时间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阶段的战役结束之时。我们拥有林肯演说的原文，但伯里克利的演说却不是由他本人所写，而是由修昔底德创作的一种文学的或模仿的作品。因此，有关演说原文和文学表现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修昔底德是否保留了某些东西，比如是否保留了伯里克利的原话？或者，是否根据他所认为的伯里克利可能说过的话，或应该说过的话，或（更令人担忧地）为了适应修昔底德自己的政治观点或艺术目的，对演讲做了某种程度的重新编写？

对此，我们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答案。我们确切知道的只是，这并非是伯里克利被授予发表年度公众演说的殊荣的第一个场合。此前至少有一次，他站在塞拉梅科斯公墓，即恰好在雅典主城门迪普利翁外边的陶工居住区内，向悲怆的死者亲属们发表过演说。在庄严的国葬之前，死者的骨灰装在柏木制成的匣子里，摆在亲属们面前。这样的葬礼大概是在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也就是厄菲阿尔特实行激进的民主改革之前不久开始举行的，葬礼与民主政府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直到伯里克利这位演说家尽其个人所能，对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与民主政治下的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最鼓舞人心的描绘。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赞美，如修昔底德所记述的那样，几乎无法再加以润饰：

我们的政体并非对邻国法律的模仿。我们自己与其说是别人的模仿者，不如说是一些人仿效的楷模。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而是在多数人手里，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的原因。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社会身份而言，在公共生活中领先是才能带来的荣誉。我们不允许考虑阶级差别而抹杀某些人的优点，也不允许让贫穷妨碍了民主的道路；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为国家服务，他就不会因为其身份低微而受阻……

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城市值得羡慕的仅有的方面。我们优雅却不放纵，我们知书达理却不柔弱娇气。我们更多地把财富拿来使用，而不是用来炫耀；坦然地承认贫穷并不可耻，真正的耻辱是拒绝与之斗争……与其他任何社会不同，我们雅典人把那些不参与国家事务的人看做是毫无用处的人，而不是缺乏抱负的人。即使如果我们不能制定政策，我们无论如何也能判断它。我们认为阻碍行动的不是辩论而是事情尚未辨明就付诸行动……一句话，我要说我们的整个城市是希腊的学校……

我的任务现在结束了……至少在口头上我满足了法律的要求。如果这是一个关于功绩的问题，那么现在出席葬礼的人已经获得了他们的部分荣誉。对于其余的人，他们的男孩子的教育将由公费支付，直到他们成年为止。因此，这个国家确实把贵重的奖品，在这场勇敢的竞赛中获胜的花环，既授予为国捐躯的人，也授予他们的遗属。哪里对功劳的奖赏最大，哪里就能发现最优秀的公民。



伯里克利的半身像，系罗马时代的复制品。原作是由克莱西拉斯（Cresilas）于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有人不怀好意地批评说，加上头盔是为了掩盖伯里克利怪异的头型。上面的铭文是："伯里克利，伊克山提普斯之子，雅典人。"



雕刻的大理石浮雕，出自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雅典，人们称之为“哀悼中的雅典娜”。这位雅典的守护女神身着戎装，戴着头盔，倚着一支矛。她似乎正悲伤地低头凝视着也许是为国捐躯者的名单。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以来，雅典人还举行一年一度的追悼仪式，悼念在该年度战争中的牺牲者。在悼念仪式上，会挑选一位像伯里克利这样的著名演说家，在战士的骨灰前发表葬礼演说。

受鄙视的民主政治

在雅典民主政治史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寡头制感情、理论和行动的反对思潮。实践中的民主政治家们，如伯里克利和德摩斯提尼，好像并不认为有必要将他们有关民主政治的思想系统地写下来，因此，几乎所有保存下来的同时代的政治理论和评论，或多或少都是反民主的。拥护寡头制的色诺芬就是一个这样的评论家。在这方面，他至少是苏格拉底的一名杰出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来说，大多数人总是错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保存下来的最早的雅典散文范本后来被称做色诺芬的作品。但事实上，这本所谓"雅典政制"—— 一本有关雅典民主制和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的强烈反民主的小册子，不可能是他的作品，因为它最有可能写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色诺芬还是一个小男孩。现在，这本小册子习惯上归属于一位人称"老寡头"（虽然他的年纪和身份都不为人知）的作者。色诺芬关于寡头政治的真正理论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尤其是在他的著作《回忆苏格拉底》当中。

这是一部虚构的谈话集。其中，苏格拉底和真名实姓的雅典人谈到其所处时代雅典政治实践与伦理的基础问题。这些对话中有一段是色诺芬虚构的。据推测原本的对话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30年代，是伟大的伯里克利和他的被监护人、十几岁的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之间的对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基比亚德斯比其他任何人更想毁掉他的监护人的政治遗产。他们讨论的题目是法律。

告诉我，伯里克利，你能为我解释一下法律是什么吗？

阿尔基比亚德斯，法律是公民群众颁布的东西。

法律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好事还是做坏事呢？

当然是好事，我的孩子，不是坏事。

但如果并不是群众集合在一起制定应该做的事，而是——正如寡头制下所发生的那样——由一些人制定，那你称它们为什么呢？

在这个城市中统治者颁布的任何东西都称为"法律"。

即使一位暴君为公民制定法令，那也是一种"法律"吗？

是的，一位作为统治者的暴君所制定的一切也被称为一种"法律"。

但是，当强者不是靠说服而是靠武力强迫弱者做他所想要的一切时，那不是对法律的否认吗？

啊，是的，我想是这样。

那么，一个暴君用法令而不是通过说服，强迫公民们所做的一切是对法律的否认吗？

是的，我赞同——我收回我刚才的陈述：一个暴君不通过说服而制定的一切是法律。

假定极少数人使用强力而不是说服制定法令，我们将称之为高压政治吗？

我应该说，所有强制形式，不管依靠法令还是其他，都是对法律的否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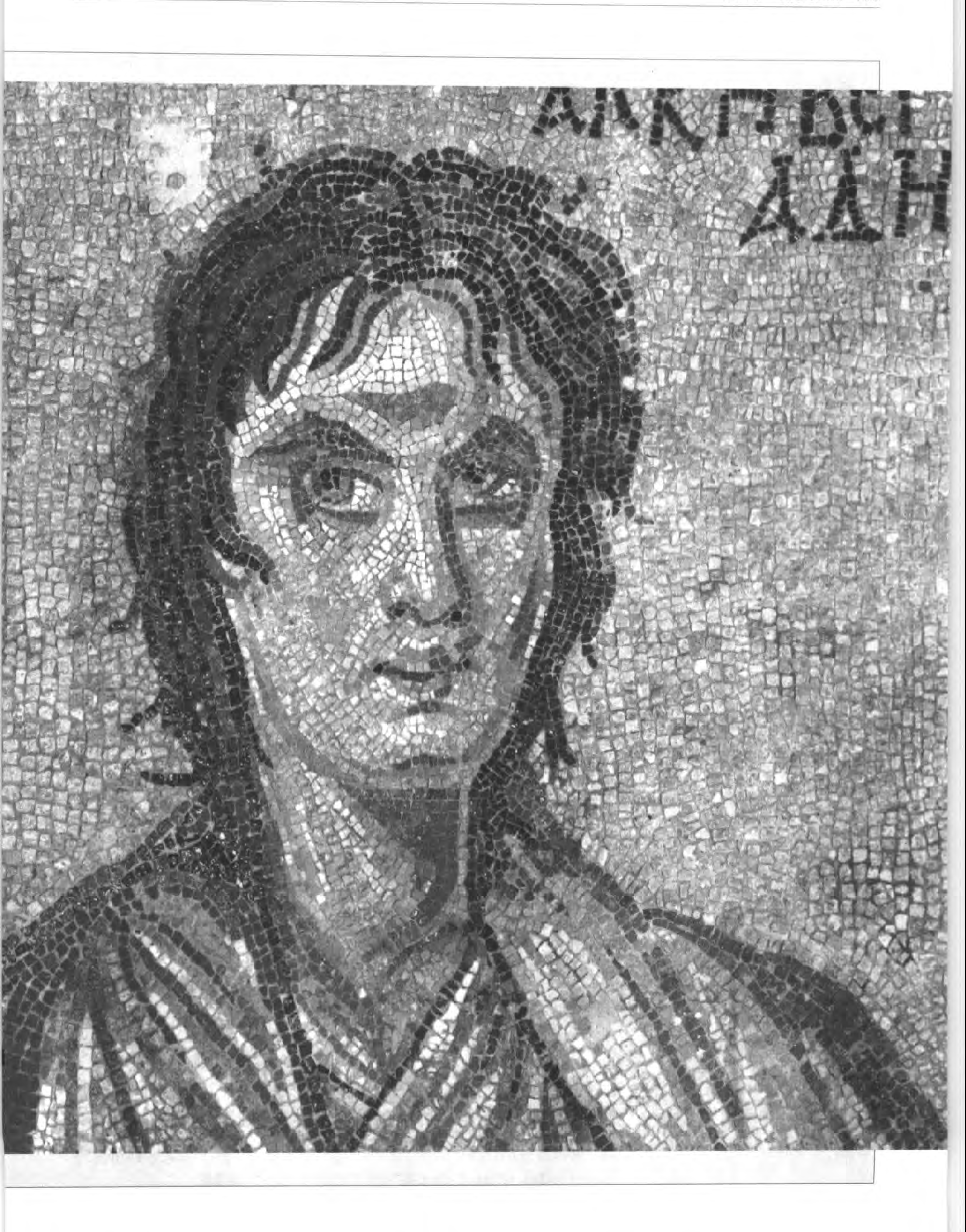
阿尔基比亚德斯想令伯里克利到他让他去的地方，并且能够发表有力的反民主论点：

那么，群众不是通过说服而是通过强迫有产者（极少数最富有的公民）所颁布的一切，可能是高压政治而不是"法律"吧？

告诉你吧，阿尔基比亚德斯，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在这种辩论中也是非常聪明的。

"啊，伯里克利，"阿尔基比亚德斯说了最后一句话说，"但愿我在你年轻时就认识了你！"

在青年时代，阿尔基比亚德斯是苏格拉底的一位狂热的崇拜者，他与苏格拉底在狄里乌姆战役中并肩战斗，并为他奋不顾身（为报答苏格拉底，因为当他在波提迪亚作战受伤的时候，苏格拉底救了他）。然而，阿尔基比亚德斯巨大的个人勇气和超凡的魅力被浪费和不负责任玷污了，他和苏格拉底很快分道扬镳。他继续使自己也使雅典卷入外交和政治混乱之中，这种混乱最终导致了他的羞耻和死亡，并由于他们早期的联系而使苏格拉底受到牵连。图中阿尔基比亚德斯的形象出自在斯巴达发现的一块镶嵌地板，时间属公元前4世纪。



的惩罚，从而激怒了他们。于是，也给陪审员分发了蜡板——蜡中的一条长线意味这是重判赞成的选票。

另一个必需的法庭设备是水时计，即用双耳细颈椭圆陶罐（一种具有特定容量的容器）（见第148页图）来测量允许原告和报告——双方必须亲自出庭——发言的时间。允许发言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诉讼的类型和涉嫌犯法的性质。一个最有获胜把握的语言伎俩是伪称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以至于当事人不需要用完官方允许的时间，并得意地喊叫："把水倒掉！"

伯罗奔尼撒战争

雅典民主制在重新恢复了活力之后，拥有大约三万或更多的公民参与者，他们及时地在德莫登记并被部落接受为成员。这一复兴的民主体制发现自己不能停滞不前。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期间，雅典平均在每四年里总有三年在与某个敌人——希腊人和（或）非希腊人进行战争。它从未享受过连续长达十年的和平。最著名的、旷日持久、也最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的一场战争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

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在另一场长期内战中写道："为祖国而死是美好和值得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patria mori）。这样的口号在公元前431年是最急需的，当时迫切需要用这样的口号来号召雅典年轻人保卫他们的海上帝国和富有活力的参与民主制——自从击退薛西斯和他的蛮族大军之后，近五十年来，这种民主制盛极一时。雅典人从伯里克利身上看到了一位雄辩的贵族演说家的形象，看到了这位爱国主义者的去世。自从公元前443年起他连续当选最高政治官职——将军。他显然也是最具权威的民主领导人，尽管（或甚至因为）他有无懈可击的贵族血统。

如果修昔底德是正确的，那么雅典必须面对的最可怕的敌人既不是斯巴达，也不是斯巴达的国外同盟波斯，而是雅典人本身。正是雅典人的战略失误和内部分裂，而不是他们的敌人的技术或资源，决定性地造成雅典最终灾难性的失败。然而，修昔底德的解释基本上出于一种政治偏见，这种偏见使他把雅典的失败归咎于民众的无能和伯里克利的那些政治继承人（素质极为低下）的狂妄的个人野心，他认为这两者结合注定了雅典的失败。其实，修昔底德自己的叙述令人怀疑：雅典人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彻底背离了伯里克利在战争初期所制定的战略呢？另一方面，他对雅典内部政治分歧的强调却并不是完全错误的。

公元前427年，科西拉的民主政治支持者与寡头政治支持者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修昔底德在对这场内战进行精彩评论时，就注意到这场斗争此后会扩大到整个希腊世界，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来陷入深不可测的野蛮状态一样。因此，他用了大量篇幅着重叙述公元前411年在雅典爆发的不道德的血腥战争。如果他活得更长，能写完他的历史著作的话①，他无疑也会着重叙述雅典于公元前405年晚期在赫沦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最终战败之后所爆发的内战。那些于公元前

①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连最后一句也是不完整的，表明作者可能在撰写著作的过程中猝死。——译者注

411年成功发动了反民主政变的极端寡头派，于公元前405年或404年在斯巴达人的支持下，再次步早期阴谋家们（修昔底德的确记录了他们的行为）的后尘。

公元前415年，正当庞大的舰队要扬帆启航，开始注定要交厄运的西西里远征时，雅典出现了政治和宗教密切联系的预兆。前一天晚上，大多数刻有赫尔墨斯头像的方碑或旅行者之神赫尔墨斯的雕像——呈矩形柱子状，有竖起的阴茎，顶部是赫尔墨斯的头像——遭到破坏：头像被打碎，阴茎则被砍掉。

由于赫尔墨斯充当私家住宅和公共神殿的神圣的保护者，因此，其头像的毁坏是一种蓄意的不吉利的举动。这恐怕只能是反民主的人士精心策划的阴谋活动造成的结果。经过长期调查进行了罪行宣判，在一些案件中处决了五十名左右的富人——定居的外邦人和雅典人，其财产被没收或被公开拍卖。

在这次搜捕中被逮捕的最重要的囚犯是阿尔基比亚德斯，他受到的指控不是打碎了赫尔墨斯的头像，而是亵渎神圣的厄琉西斯的宗教秘密仪式。阿尔基比亚德斯根据其出身和教养是一位有钱的贵族，其父去世后，伯里克利是他的监护人。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具有感染力、又怀有不道德的个人野心的复杂人物。他曾是西西里远征的主要推动者，但在刚出发后，因为他要面对不敬神的死罪指控而被召回。但他并没有回国，而是叛逃到敌人那里，劝告斯巴达人说，对他和像他这样的人而言，民主作为一种政府体制只不过是一种公认的愚蠢。难怪那位聪明的寡头制支持者，即那本小册子的作者，为了宣传的目的，希望让他反对他的前监护人，即自我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者阿尔基比亚德斯反对严肃的民主主义者伯里克利。

公元前404年，雅典民主制再次被废除，这一次是借助于斯巴达的直接干涉。与此同时，雅典人爱琴帝国的最后残系也被剥夺，斯巴达人设法自己接管了这一帝国。雅典人处在一个狭小的寡头政府的统治之下，该政府包括30名成员，由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斯（Critias）领导。这一政体本身因其野蛮行为而十分著名，人们给它取了个“三十僭主”的绰号。斯巴达在一段时间里支持这个政权，为它提供了一支驻军，并支持其雇佣军。但是，克里提亚斯实行恐怖统治，致使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斯巴达盟国底比斯，开始暗中向它的敌人雅典表示同情。

为了设法阻止底比斯在中希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当“三十僭主”被推翻时，斯巴达作壁上观，甚至允许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同时，它关心的是雅典应该在外交事务方面保持无能为力的状态。在斯巴达的监督之下，雅典宣布对公元前403年以前被判有罪的政治犯实行大赦，但“三十僭主”中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党羽不在赦免之列。这次大赦基本上得到了施行。

复兴的民主制

因此，正是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几年与公元前4世纪最初几年里，雅典人全力以赴地恢复民主秩序，并竭尽全力防止寡头统治卷土重来。在此期间，始于公元前410年的法典检查工作已经完成。新法典刻在斯多亚的石墙上，雅典最重要的宗教官员巴赛勒斯或“王者”执政官在此就职。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正是被他的三个控告者向这个官员指控他犯有严重的渎神罪和腐蚀青年罪，其中一个

反抗马其顿的民主英雄德摩斯提尼去世后，人们用一尊雕像纪念他。这尊雕像多半不能当做一尊逼真的人像。这一大理石仿制品系罗马人所作，原作由波吕尤克图斯（Polyeuctus）用青铜铸造，在公元前280年，德摩斯提尼死后（公元前322年）40年，竖立在雅典的阿哥拉。

（右页图）公元前336年，雅典人通过一项反僭主制的法律。雅典民众（人民）在浮雕上被刻画为一个长着胡子的成年公民，正在由人格化了的女神德谟克拉提亚加冕。这条法律禁止与策划反民主政变的人合作，并要求宣判任何被指控为谋杀未来暴君的公民无罪。公元前336年，雅典人民非常恐惧马其顿僭主制度将强加给他们，他们对腓力在科罗尼亚的胜利仍然记忆犹新。

控告者是阿尼图斯（Anytus）——最杰出的战后民主领导人之一。苏格拉底是否像他被指控的那样有罪（我们主要根据他的支持者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证据来判断）并无实际意义。公元前4世纪中期的重要演说家埃斯奇尼斯（Aeschines）无疑正确地解释了对苏格拉底命运的通俗理解：他说，雅典人之所以处死了诡辩家（异端知识分子）苏格拉底，是因为他曾是极端的寡头制当权者克里提亚斯的老师。

然而，除了苏格拉底之死和其他一些惩戒性的司法处决之外——公元前403年的全面特赦不包括这些处决，如果不是根据这些字面意义的话，复兴后的民主政治其实在行事上是颇为中庸和克制的。

新的民主制度和精神是否比前任伯里克利领导下的民主制温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变化无疑是有的。例如，公元前403年之后，公民大会不再拥有立法权，这项权力转移到一个小机构，该机构可能从每年一任的全体陪审员（共6000名）中抽出来的。尽管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它可以防止人们在受情绪控制的情况下，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重大决策，如公元前5世纪时不只一次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这一点并不清楚，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体制在原则上是否少了一些民主。公民大会仍然决定立法会议是否召开，立法者仍然根据抽签任意选出，以便尽可能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不过，平心而论，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比较保守的。根据他们对寡头派反革命的负面经验，他们几乎偏执地保护民众的统治免受所有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马其顿的霸权

自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后期起，有一种这样的威胁来自马其顿。德摩斯提尼（他对雅典政治的影响可与年富力强时期的伯里克利相比）从来不失

时机地强调雅典人以所有代价抵制马其顿王腓力扩张的必要性，但他的努力徒劳无用。公元前338年，在彼奥提亚的科罗尼亚，雅典人和他们的底比斯盟军被腓力统帅的最优秀的马其顿与希腊军队彻底打败。不管是否愿意，雅典人于公元前338年或337年被接纳为腓力联盟即我们所知的“科林斯联盟”的附属成员。通过这个同盟，腓力掌握了希腊半岛的霸权，并借口为整个希腊复仇，自己领导一支军队讨伐波斯帝国。为达到这一目的，腓力需要雅典的舰队，因为他自己一艘舰只也没有。这是雅典人受到腓力客气对待的一个原因。而腓力打败的其他一些希腊对手受到的待遇就差多了，尤其是底比斯人（马其顿强行向其派军）。



然而，结果却是腓力在动身去小亚细亚之前在家中被暗杀。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父亲的遗愿，没有着重利用雅典人和他们的舰只就取得了惊人的征服的成功。他把政治上不可靠的雅典人看做是保证这座城市有序运转的人质。在其他方面，亚历山大像腓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允许雅典自由。但雅典人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也是很自然的：马其顿推翻了他们的民主体制，就像公元前404年的斯巴达一样，它对民主制显然没有任何好感，已经在它的盟国中安插了亲马其顿的僭主制。这就是雅典于公元前337年或336年通过一项反僭主法的背景。这项法律的内容刻在一根保存下来的石柱上。在石柱顶端，民主制作为女神德谟克拉提亚（Democratia），正在给人民——化身为一个中年男人的雅典人加冕。

然而，再多的法律也不能防止雅典民主最终走向灭亡。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后，在安提帕特（Antipater）的统治下，雅典民主制彻底灭亡了。但这不一定就是民主制在古希腊的终结。罗德斯城似乎完好地将民主传统保持到下一个世纪。但随后的希腊化国王及后来的罗马都积极地、不同程度地加强寡头制和君主制，将它们作为帝国统治的工具。至公元1世纪后半叶，希腊词“democratia”已经被滥用，甚至罗马帝国本身也可以被一个叫做埃琉斯·亚里斯提德斯（Aelius Aristides）的希腊修辞家吹捧为一种

修正的民主政治

18世纪后期发生了两场政治大变革：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每一场变革都伴随着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并以此为革命的先导。一些这样的讨论是以书面形式出现的，如书信、小册子、虚构的文学作品以及正式的论文和视觉艺术作品。由于18世纪也是新古典主义的伟大年代，因此这次讨论的参与者们必然回顾古典时代，以寻找他们要模仿或要避免的模式。

于是，民主制问题非常热门，是效仿雅典还是罗马，两种选择被尖锐地提了出来。在法国革命者中有一个"左翼"群体，提倡伯里克利和德摩斯提尼时代雅典所实行的群众直接参与的那种民主政治。毕竟，实行民主的雅典所提出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口号，事先为他们准备了战斗的口号："自由"与"平等"。但这些左翼成员人数很少，缺乏影响力。

在美国革命者中间，更多地注意自由，对平等则多少有点忽略。他们拒绝以希腊的民主制为范本的做法也是比较有力和彻底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大体上继承了西方的思想传统，把民主制（误）当做一种主要的城市暴民统治的形式。因而对他们来说，一种类似雅典民主的直接民主制具有暴力、腐败、不公正和不稳定的污名。但是，美国革命者拒绝希腊民主政治的特殊原因还是他们把自己当做反民主的共和制罗马人的继承人，他们因此选择了"国会大厦"（而非"卫城"）和"参议院"[1]，而乔治·华盛顿也以著名的罗马将军辛辛那图斯（Cincinnatus）（他一感到共和国已经不再需要他时，就欣然隐退，去过个人生活）为自己的楷模。关于罗马共和国，特别吸引美国创立者们的是有关个人财产、尤其是农业财产不可侵犯的理论与实践。的确，西塞罗竟走得如此之远，他甚至宣称国家的目的就是保存并捍卫私有财产。

以下一段摘录选自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Tefferson）的《关于弗吉尼亚州的笔记》。在这本书中，坚定的自耕农和堕落的城市群氓彼此相依的观念得到充分的发挥，依据的是对基督教《圣经》文句的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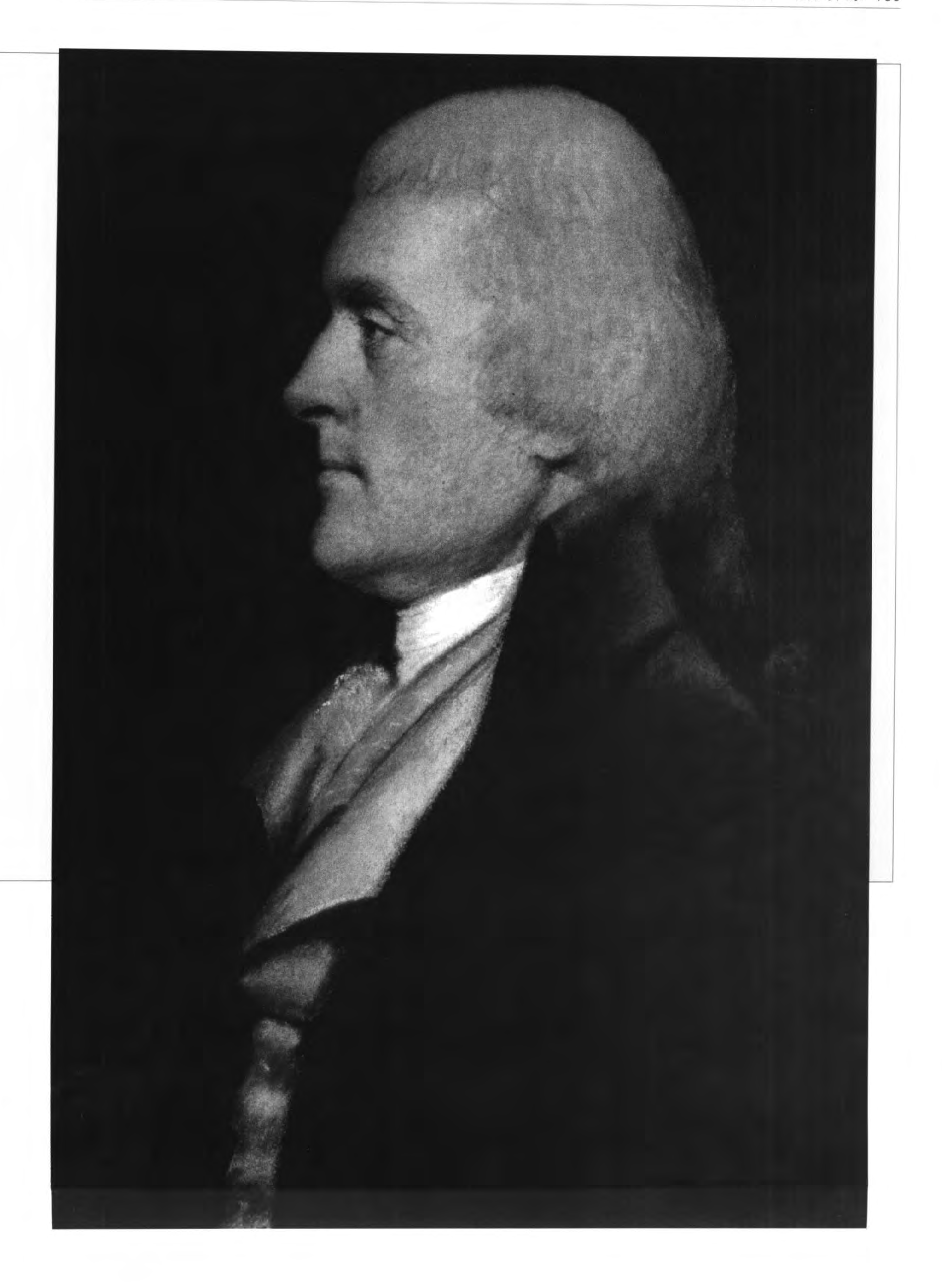
> 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是上帝的选民。倘若他曾有一个选好的民族，那他会特地使这个民族的胸怀充满了纯正、实在的美德。他使圣火持续燃烧，否则它有可能逃离地球的表面。耕作者大众的道德腐败，是任何年代和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先例的一种现象。腐败是附着在那些不仰望天堂、不敬重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产业（不像农夫所做的那样）的人身上的一个标记，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依赖于对消费者的伤害和反复无常……大城市的暴民只是给纯粹的政府增加了这么多的支持，如同痛苦增加了人体的力量一样。正是一个民族的风度和精神才保持了一个共和国的活力。风度与精神的堕落则是一种溃疡，它很快会吞噬掉法律和制度的心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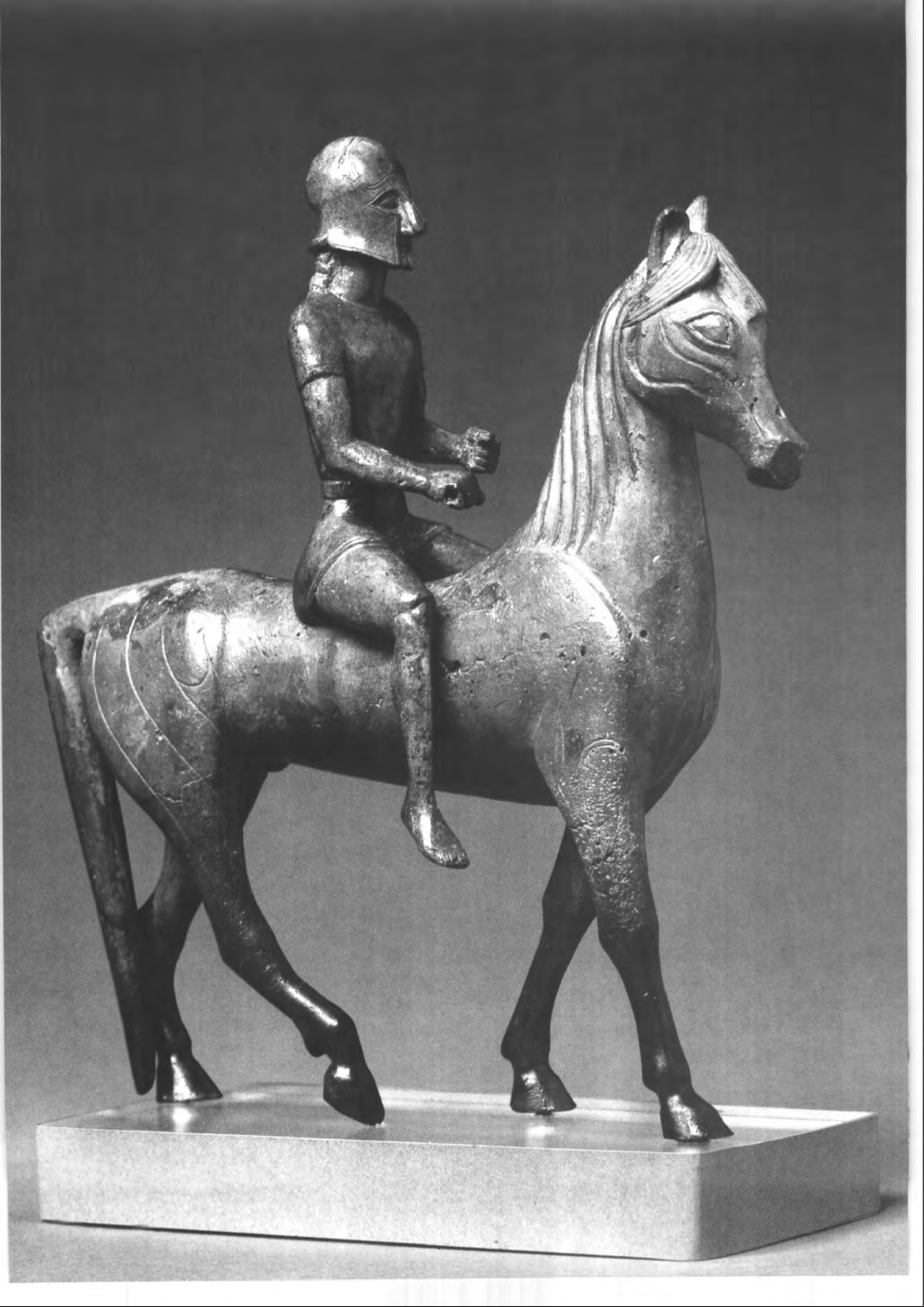
詹姆斯·莎普利斯（James Sharples，约1751～1811年）绘制的托马斯·杰斐逊的画像。

(1) 美国参议院的名称直接来自罗马的元老院名（Senate）。——译者注

"完美的民主制——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

到6世纪，在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这种语言上的退化甚至更厉害，democratia甚至可以用来指城市暴动。简而言之，希腊的民主人士一直不得不与之竞争的强大的反民主传统成功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文艺复兴期间及其之后，当希腊的成就被引用为当代政治实践的楷模和向导的时候，显然缺失的是雅典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体制这一范式。今天，我们西方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把我们自己称为民主派，但对一个古代雅典人来说，我们所称的民主制看起来很少见，像是选举产生的寡头制。





第七章 战争与和平

在古希腊语中，对“外交政策”这个概念的解释之一是“关于和平与战争的事务”——附加的条件实际上是战争而不是和平才是它的标准，姑且不论和平在理想上有多么令人向往。政治与战争间的另一种联系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根据他的模式，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适应并有利于该国为了生存所需要进行的战争。

（左页图）马和骑手都被铸成了实心的雕塑，但两者是分开来的。这组雕塑发现于南意大利卢卡尼亚的格鲁门图姆，但它可能是在希腊的梅塔庞图姆制作的，铸造时间大约为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的后期。这匹马有点瘦削和呆板，但铸造技巧非常突出：骑马者身穿一件短束腰外衣，头戴一顶科林斯风格的头盔，头盔上装饰着荷花蓓蕾和（原先）横向的顶饰。

骑 兵

亚里士多德模式的最薄弱之处是假设很久以前真正的骑兵战争在整个早期希腊世界占优势。或许他从荷马和历史上某些贵族集团（例如在优卑亚岛上的卡尔基斯的希波波泰Hippobotae或“养马人”）的名称中推断出的这一点。事实上，希腊大陆和岛屿的地形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不适于骑兵作战。例如，公元前6世纪晚期，雅典人不得不在帖撒利（在地形上比较适于马上战争的少数地区之一）同盟军的骑兵部队到来之前，特地清理了阿提卡的土地，以便适于马匹活动。

在其他地方，小亚细亚或意大利南部，也许有其他的地方特例。但在陆战中，骑兵的军事重要性似乎一直从属于各种风格的步兵战斗。因此，战车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用的交通工具，它的用处是给人一种庄严的印象，例如在葬礼上或在某种其他宗教场合，而不是用在实际的战争中。另一方面，骑兵的声誉，尤其是在早期希腊，被人夸大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即使在民主政治的雅典，它也始终没有失去自身的意义。

骑兵拥有社会威望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富有。马匹需要广阔的、水源充裕的牧场，这样的牧场在希腊土地上十分罕见。饲料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保养费也非常之高。只有具备特权的极少数人才能够养得起一匹战马，更不用说一匹赛马了。在陆地上，马匹是稀缺之物。人们一般更常用牛来牵引和运输。有个关于克里奥比斯（Cleobis）

这只巨大的青铜双耳喷口杯（Krater）（混合器皿）与格鲁门图姆的骑手一样，是在一处非希腊人的遗址上发现的，有可能是委托一个斯巴达作坊或南意大利的希腊作坊制作的，最终成为法国中部韦克斯的一座凯尔特人公主墓里的陪葬品。围绕瓶颈部分是一圈正在行进的装备良好的战车和重装步兵。人物的背部刻画着一些说明其作用的希腊字母。这座墓葬的年代是公元前500年左右，但双耳喷口杯可能是在此前几年，甚至前几十年制造的。

和彼顿（Biton）兄弟俩的著名故事。这个故事源于家里的公牛——而不是他们的马匹——没有按时从田野回来，于是兄弟俩把自己套在了母亲的牛车上，以便确保母亲能够抵达距阿哥斯约五英里的赫拉神殿，去履行她作为一位女祭司的职责。可以想像，早期希腊贵族可能骑马上战场，然后再下马作战。也许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徒劳地希望，在步兵日益重要的现实面前保持某种身份特征。

步兵及重装步兵的崛起

重装步兵的崛起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军事革命。重装步兵通常是公民土地所有者，是平均拥有约5英亩至10英亩土地的人，他们大约占城邦成年男性公民人口的30%~40%。这种新型步兵的名称可能来自他们装备中具有最鲜明特点的

骑　兵

保存下来的有关骑兵的文学与考古学资料极为稀少，与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很不成比例。但骑兵虽然享有盛誉，真正的骑兵（Hippeis或"骑士"）在雅典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却显然扮演着一种从属的军事角色。他们的明显优势更多的是与可以用来购买耐久纪念物品的财富有关，也与政治和艺术的考虑有关。例如，公元前424年，当阿里斯托芬以骑兵为基础写出一部完整的喜剧（名为《骑士》）时，他这样做的原因与他个人的戏剧与政治观点有关：他想把这些尊贵的精英与贫苦公民大众——"海军群氓"们作鲜明的对比。他剧中的主要批评对象是声称为"海军群氓"们说话的克里昂。

从前，或许骑兵在战场上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的波斯战争中，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是希腊重装步兵和三列桨战舰的水手。即使如此，富裕的骑兵阶层仍喜欢委托他人制作陶器，把他们自己刻画成军事行动中的决定性力量。例如，在这一时期的这件红图彩绘酒杯上，我们看见一匹骑兵的战马，还有一个非洲的黑人马夫——这样的外来仆人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可能也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

几乎一百年后，在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期间（公元前395~前386年），雅典人德克西莱奥斯（Dexileos）在一支规模不大的雅典骑兵部队中阵亡。雅典国家非常自豪地纪念为国捐躯的人，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一名像德克西莱奥斯这样的贵族骑兵的富有亲戚们，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委托制作一座宏伟的石碑或墓碑，并把它竖立在塞拉梅库斯国家公墓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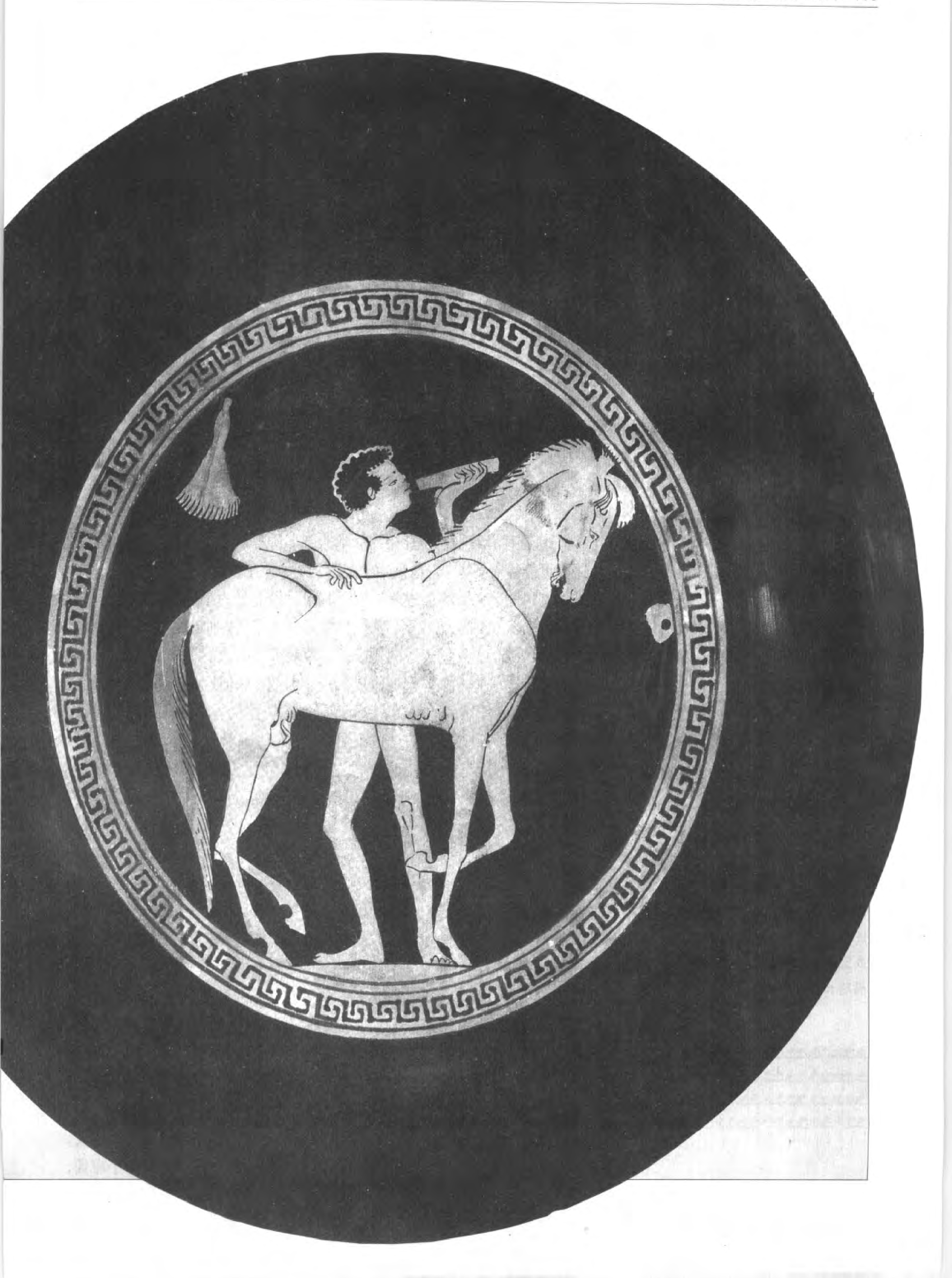
德克西莱奥斯的亲戚们之所以强调他的忠诚和爱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刚好是在德克西莱奥斯牺牲之前十年，贵族们组成的骑兵都表示愿意站在三十僭主一边，这是斯巴达作为公元前404年和平协定的一部分，强加给雅典人的一个反民主小集团。为了清楚地说明德克西莱奥斯不可能是这个卑劣集团的一员（如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人采取不寻常的步骤，把他的出生日期也写入下面的碑文中：

德克西莱奥斯，吕萨尼乌斯之子，来自托里库斯德莫，生于特山德鲁斯担任执政官（公元前414年或413年）之年，死于幼波里德斯担任执政官（公元前394年或393年）之时。他是5名骑兵之一，死在科林斯。

"5名骑兵"指谁或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确实也有为20岁的德克西莱奥斯和其他10名与他命运相同的骑兵伙伴而写的雅典官方的碑文：

这些骑兵死在科林斯：部落指挥官安提芬尼斯、梅勒西亚斯、奥涅托里德斯、吕西忒乌斯、潘狄乌斯、尼科马库斯、忒安格鲁斯、芬尼斯、德谟克勒斯、德克西莱奥斯、恩德鲁斯。

（右页图）安闲地歇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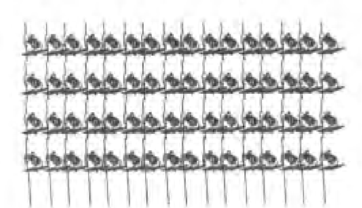




“奇吉（Chigi）瓶”。这个小饰带上的图形描绘着重装步兵方阵在交战时的瞬间，其画家是在科林斯作的画，时间在大约公元前640年。但这个陶瓶出口到埃特鲁里亚的城市维爱。这是最早为人所知的、十分逼真地描绘重装步兵方阵的作品，虽然作者并没有非常准确地画出步兵的脚的数目。所有重装步兵都戴着科林斯头盔、钟形胸甲和护胫甲。重装盾牌内的两个把手如同纹章一样，清晰可见。



当重装步兵以展开的阵形接近敌人的时候（上图），队列会靠拢，盾牌搭在一起，形成一座由青铜和木头组成的非常坚固的墙壁（下图）。大多数方阵纵向排列8至16人。他们集合成一系列矩形。随着队伍扩大，士兵人数增加至1万或3万人，矩形长度也从几百码延长到一两英里。



hoplon（盾牌）。这种有双把手、直径约一米的圆形盾牌基本上用木头制成，虽然其表面和边缘可能裹着青铜。它很重（约二十磅），除了在特定的环境中使用之外，与其说它是件有用的装备，不如说是累赘。其设计目的是为了近距离的肉搏战。

一个单独的步兵也许无足轻重，甚至自身是一个矛盾。他也许是一个负重累累(他的装备重达75磅)、行动迟缓的靶子。在重装步兵战法的早期年代里，一名步兵可能没必要作为一个严整阵形的组成部分参与战斗，但这是步兵战争的无情之处所致，部分原因在于盾牌的性质，它至多只能防护住执盾者的身体的一半。幸存下来的有关有组织的重装步兵方阵的最早描述，大约属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但成功的方阵战斗有可能早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也就是在国王菲顿（king Pheidon）(他的年代不清楚）统治下的阿哥斯已经开始实行了。

武器装备

重装步兵上阵时身上的装备像一套制服，尽管各个国家没有采用整齐划一的式样，而且各支军队的内部恐怕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可以容忍的差异——这取决于重装步兵个人的财力。每个战士兼土地所有者都要为自己购买盔甲，并在需要服兵役之前，把它们存放在家里。根据装备的条件，它们可以由父子相传。

如同描述的那样，最重要的一件装备是盾牌。其余的装备，从头顶开始是颇具特色的头盔，用青铜薄片制作，其工序需要高超的技术。头盔提供良好的防护，但不幸的是，它也把戴盔者的视力和听力降低至近乎危险的地步。

在阿哥斯，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战士墓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是变革中的重要年代标记，时间属于公元前8世纪晚期（约公元前720年）。其中的头盔是一种非重装或前重装步兵类型，而两片青铜胸甲可确保在近距离内急战的防护需要。在新型重装步兵头盔的实例中，包括一个正在工作的头盔制造者的青铜小雕像，

属于公元前8世纪最后20年。重装头盔和胸甲很快形成了特殊的结合，这意味着重装步兵的两个最薄弱的部位是脖子和腹部。

在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重装步兵的长矛（山茱萸杆长2~3米，有铁制长尖）面前，这些部位是薄弱的。因此，在方阵编队中需要尽可能地保持近距离，通常纵深大约为八排，盾牌紧靠邻近战士的盾牌。所以，在队列的位置上"站整齐"（en taxei——有趣的是，这句话在现代希腊语中解释为"OK"），既是道德的也是军事的诫令。对此，没有一个重装步兵比斯巴达人做得更好。

这座阿哥斯的所谓的"全套甲胄墓"，定年为大约公元前720年，里面填满了一个时兴的武士所需的每一样东西，包括晚上用来做饭的铁制烤肉叉。两片胸甲在解剖学方面力求准确合体，但也许为了更舒服起见，还需穿上一件内衣。另外，这顶头盔既为实际应用，也为了显示华丽的外表，因为它几乎提供不了保护，并有一个在胸甲所暗示的近战中相对容易手持的把手。

斯巴达的重装步兵

斯巴达的确是最早的、最典型的重装步兵国家。装备与行动的整齐划一适合一个在观念上平等的共同体，其生活方式和真正的生存建立在对人口更多的非自由希腊人——希洛特人的压制基础之上。斯巴达，一个始终处于军事戒备状态的城市，利用宗教、音乐和其他帮助，加强了一个因恐惧和必要而降生的训练方法，



公元前6世纪绘有图画的斯巴达陶器上的大多数场景都与神话和传说有关，但偶尔也会掺入一些写实内容，如这只酒杯上所示的图画一样。斯巴达重装步兵在身体上的突出特点是他们的长发，在道德和精神上的突出特点是他们非常团结；在这件简洁描绘的手工艺品上，两者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把重装步兵方阵战术发展到了顶点，这并不令人奇怪。在斯巴达的重装步兵所向披靡的很长一段历史中，有两场战役十分著名：第一场是“冠军”战役（公元前545年），第二场是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

“冠军”之战

这在重装步兵史上显然是一件怪事。战争双方是斯巴达和阿哥斯，它们同意首先省却常规重装步兵的消耗战，根据数量上完全均等的原则，在双方各300人的精英部队之间展开一场非同寻常的仪式化的战斗。换句话说，这将是一场英勇的较量，其中技能与勇气、纪律一样，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场战役的直接后果是：600人中除了3人——两名阿哥斯人和一名斯巴达人——之外，全都阵亡。但是，当两名阿哥斯幸存者奔回国去，宣布他们所认为的胜利（这场战役是为了争夺靠近阿哥斯而不是斯巴达的边界地区而战的，扩张主义的斯巴达人是侵略者）之时，那个幸免于难的斯巴达人则按照重装步兵方阵的要求留在战场上待命。接着，他用可以令人接受的方式宣布胜利——竖起一件战场上的战利品，把缴获的敌人的武器和盔甲系在一个树桩上。

阿哥斯人当然拒绝接受这一宣称，战争必须重新开始。这次双方都全力以赴。我们不知道双方在这个过程中又多损失了多少人，一般情况下，胜利一方似乎能够期望己方兵力的损失在5%左右，而败方至少损失这个数目的双倍。斯巴达人显然是胜利者，他们牢牢地控制了那块有争议的边界领土，并且保持了近两个世纪之久。

希波战争

普拉提亚战役是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间的那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会战。薛西斯率领的庞大侵略军可能有10万人左右，他们在公元前480年的陆战中表现出色。那些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leonidas）率领的敢于抗击薛西斯的极少数人及他麾下300名斯巴达人，在温泉关结局悲惨。西摩尼德斯的著名碑文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斯巴达人的英雄主义：

朋友，把这个消息带给拉凯戴梦人：
我们听从他们的指挥，安息在这里。

随后，包括阿提卡和雅典本身在内的中希腊，迅速变成蜂拥而来的薛西斯掳掠大军的牺牲品。

萨拉斯与海战

然而在公元前480年，坚持抗战的希腊人却在海上占据优势。在优卑亚岛附近的一场不甚重要的遭遇战之后，雅典人在铁米斯托克里的领导下，用他们新造的三列桨战舰（见第172页）带领希腊的抵抗者们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在萨拉斯湾打败了薛西斯的（由薛西斯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属民提供的）舰队。薛西

斯在这场灾难之后，返回小亚细亚，并且一去不复返。但他留下了一支由马尔多尼乌斯（Mardonius）统帅的陆军，认为这支具有战斗力的庞大陆军，足以打败那些仍然效忠希腊的人并占领伯罗奔尼撒。

普拉提亚

波斯霸权的欲想于公元前479年在彼奥提亚的普拉提亚受到决定性的挑战。由于为数众多的至关重要的战役都发生在普拉提亚，所以希腊人把这个地方称做“希腊战神阿瑞斯的舞蹈之地”。斯巴达摄政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在这里指挥大约四万希腊人。斯巴达率领一支主要由伯罗奔尼撒同盟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它在军事上享有无可匹敌的声誉，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陆军强国。

起初，人们并不清楚希腊人会有一支构成颇为多样、规模非常之大的军队（虽然确切的数量并不清楚），但最终马尔多尼乌斯统领下的波斯军队被击垮，斯巴达重装步兵则是取胜的主力。后来，普拉提亚胜利被所有希腊人当做获得解放的胜利来纪念。不过，希腊人毕竟是希腊人，斯巴达的决定性作用决不会始终得到承认。

弓与箭

然而，一个雅典人却承认这个事实，这就是伟大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公元前490年，他曾参加了打败波斯的著名战役——马拉松战役，正如他的碑文所骄傲地注明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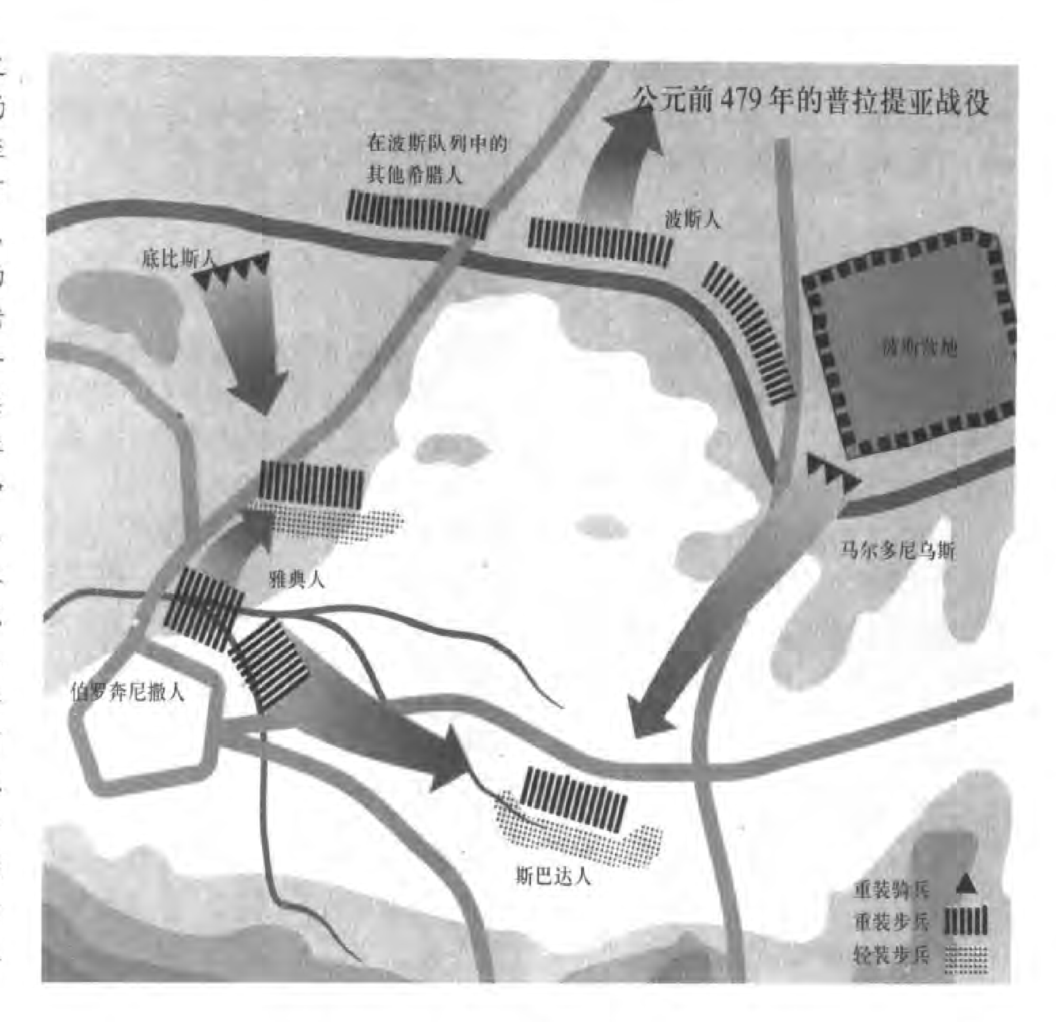
> 埃斯库罗斯，欧福里翁之子，雅典人，立在盛产小麦的盖拉[①]的这块纪念碑，遮掩着死去的他。马拉松的小树林能够叙说他那不凡的力量，长头发的米底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

埃斯库罗斯可能也在萨拉米和普拉提亚打过仗，他记得更清楚的是后者。在公元前472年创作的悲剧《波斯人》中，他把希波战争描述为多利安人（斯巴达人）的矛战胜了亚洲的弓。希腊人也可能是射手，赫拉克勒斯和奥德修斯都有传奇般的威力（虽然奥德修斯是在他的宫殿里而不是战场上展示他的能力，由于他长于射箭，他随后杀死了对他妻子珀涅罗珀缠扰不休的求婚者）。但在日常军事生活中，弓一直被看成是一种低劣的武器，与重装步兵的矛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其中一个原因是弓箭手为隐蔽起见，需要依赖其他兵种的战士。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是远距离的战斗者，不能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面对面交战的考验，更不用说接受白刃战的最高考验了。从荷马以来，对“女人似的”弓箭手的嘲笑和轻蔑，就充斥在希腊人充满男子气概与英雄气概的战争文学作品当中。这种轻蔑也有一个社会原因：希腊的弓箭手通常被解释为穷人，他们就像其装备一样是廉价和可以被牺牲的。

当然，弓箭手并不是除了骑兵和重装步兵之外的惟一兵种。如果需要的话，那

① 埃斯库罗斯在西西里岛的盖拉身亡，其葬仪是盖拉居民操办的，墓碑也为盖拉居民所立。——译者注



在萨拉米丧失了舰队之后，驻扎在帖撒利的残留的波斯人侵者，由大流士的侄子马尔多尼乌斯率领，计有步兵25,000名，骑兵5000名，南下普拉提亚，继续陆上的会战。马尔多尼乌斯的希腊盟国——底比斯是其中之一——提供给他13,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他们在普拉提亚与40,000多重装步兵和70,000人的轻装步兵遭遇。马尔多尼乌斯在进行了几天兵力部署并袭扰敌人供应线之后，最终发动了全面进攻。然而，他的骑兵所夺取的阵地却因步兵的缘故而未能守住，因为他的步兵被波桑尼阿斯率领的斯巴达重装步兵彻底击溃。马尔多尼乌斯的部队只有3000人在溃逃中幸免于难，马尔多尼乌斯本人则被杀。

些最贫穷且无一技之长的人至少可以投掷石头，虽然专门的投石手也是为人所知的，尤其是在克里特。

轻盾兵

公元前5世纪较晚时期，一种新型的轻装战士从希腊半岛北端非希腊人的色雷斯崛起。与重装步兵一样，轻盾兵（peltast）因其所持盾牌（pelta）而得名，但这种盾比重装步兵所用的盾要轻一些，通常用枝编工艺制造而成。正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其后的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前386年）期间，重装步兵首次不及轻盾兵的更多的机动性，尤其是在丘陵或山岭地带。斯巴达的敌人借助于轻盾兵，使之成为一种摧垮斯巴达重装步兵的有效手段。公元前390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斯巴达的一支600人的分遣队在科林斯战争期间受到羞辱性的打击，损失了大部分人。予以这次打击的是由雅典人伊菲克拉特斯（Iphicrates）指挥的一支精锐力量，地点在科林斯附近的莱凯乌姆，而波斯则给伊菲克拉特斯提供了资金。

这次失败是灾难性的，因为斯巴达在陆上被打败了。在海上，斯巴达人只是在公元前413年和前394年期间，暂时可以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力量。此间，他们赢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04年），当然使用的是非斯巴达的水手和波斯的金钱，但他们却彻底输掉了科尼杜斯战役（公元前394年）。海洋总是更有利于雅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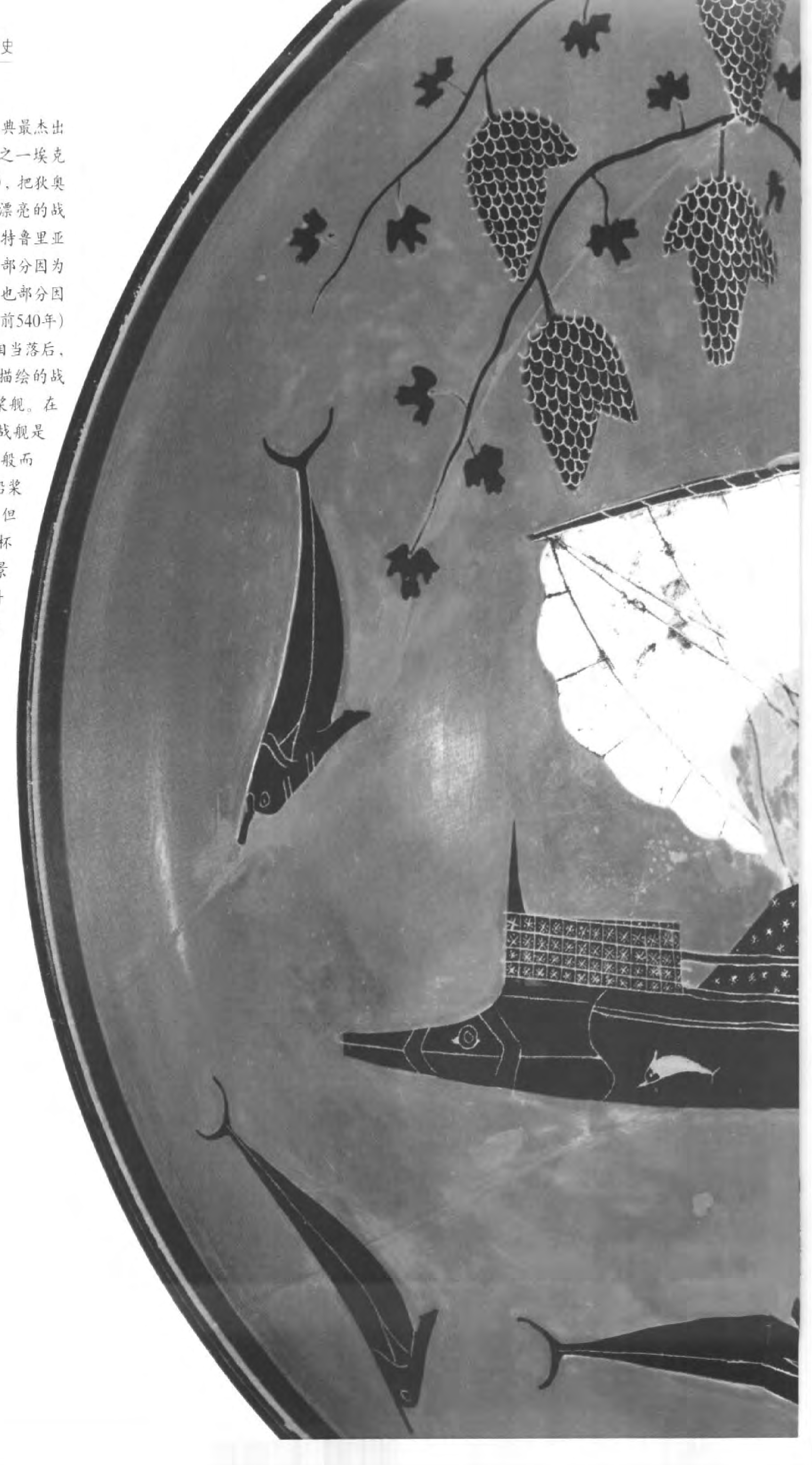
不足为奇，在公元前480年前后的雅典瓶画上，流行着一个希腊重装步兵战胜一个波斯敌手的情景。在这个出自特里普托勒摩斯的画家之手的瓶画中，戴着头盔、赤裸着胳膊的希腊人正恶狠狠地盯着蜷缩成一团的波斯敌人。而这个波斯人头戴皮革军帽，身着一套做工精细的服装，袖子和裤子均为东方风格。他的腰间有一个箭袋或弓袋，暗示着他的剑与希腊人的剑不同，是最后使用的一种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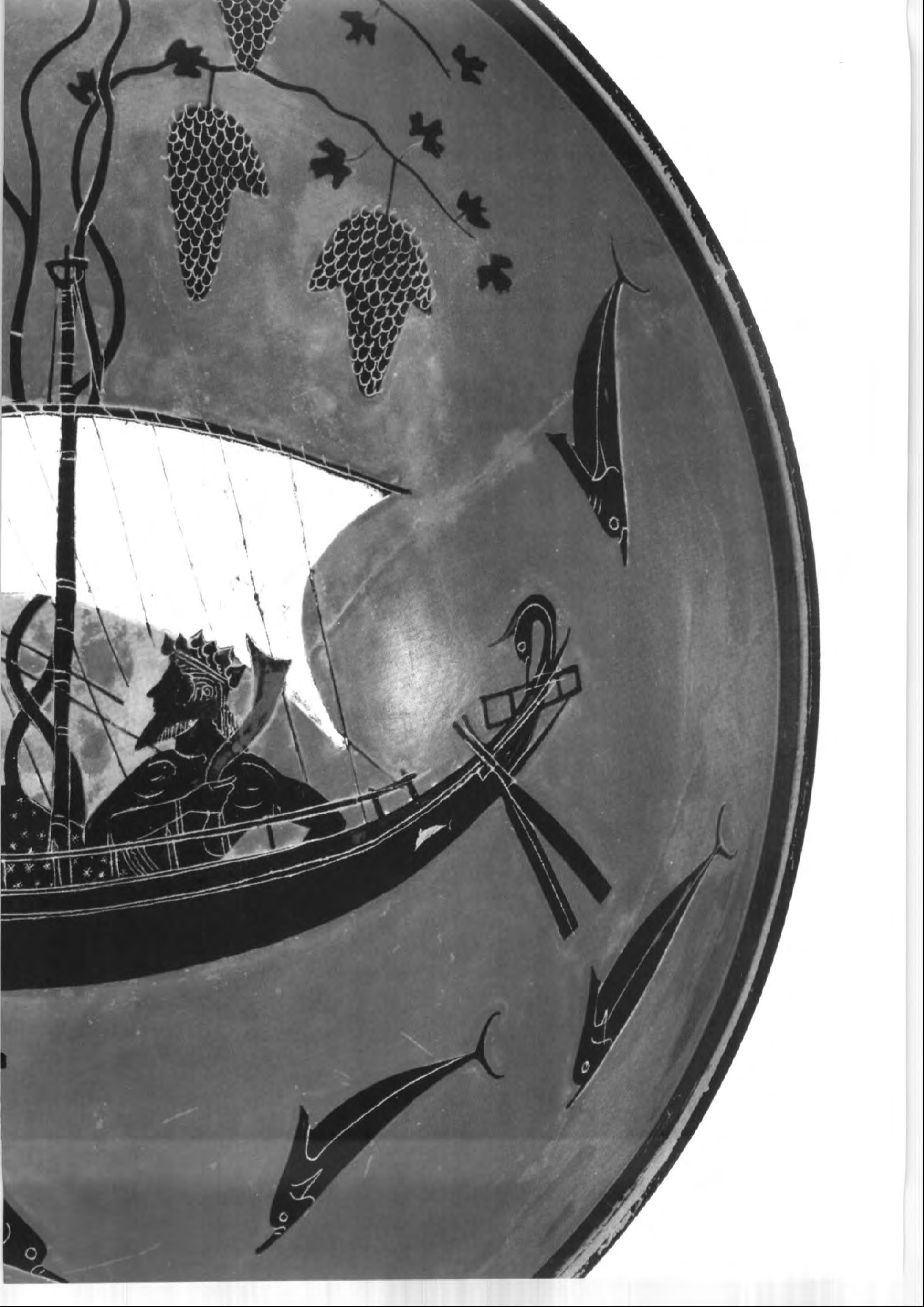
海　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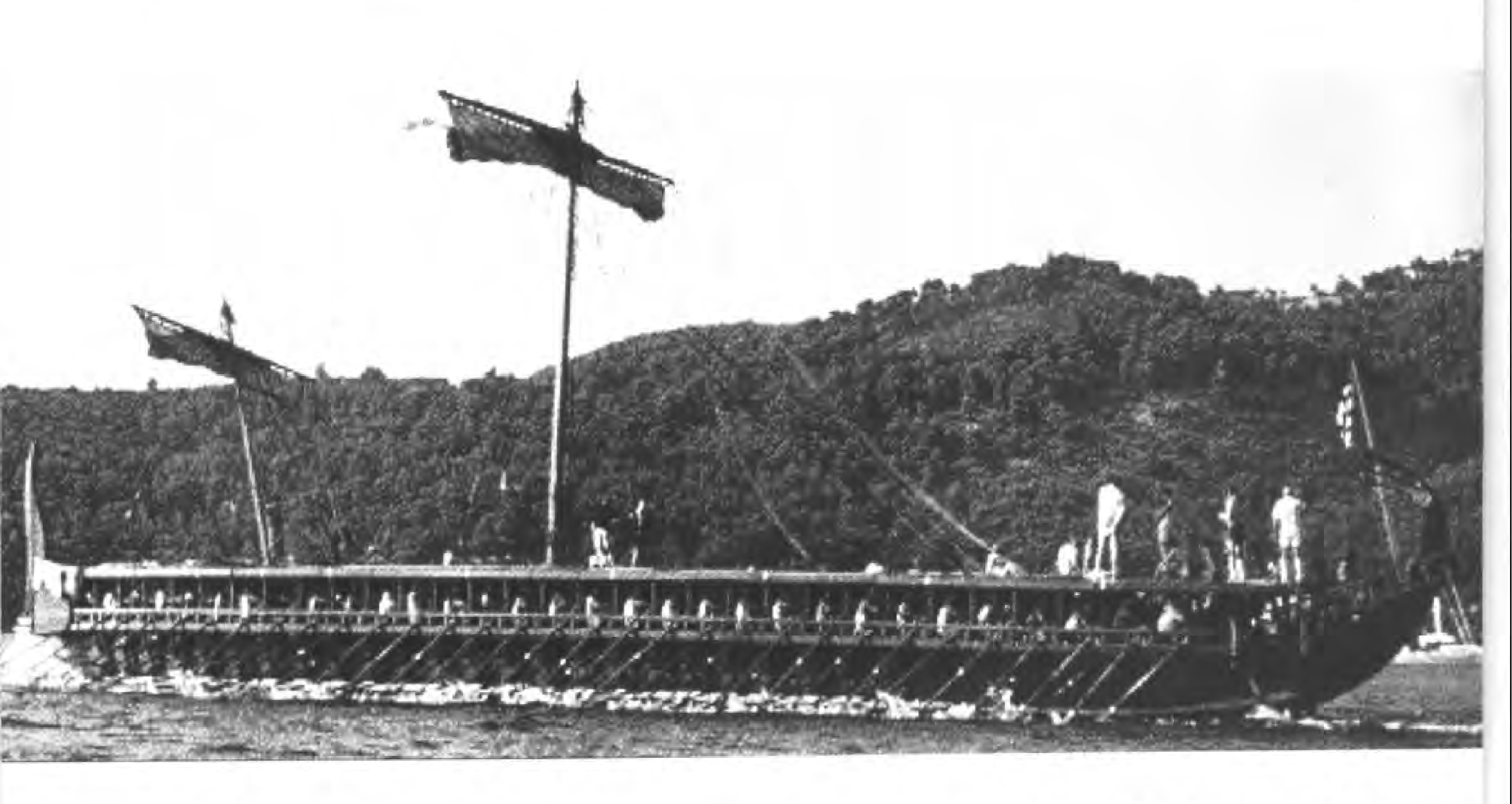
三列桨舰（trireme，来自希腊词trierês的拉丁文形式）是一种有三层船舷、用桨划动的战舰，可能最早见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埃及或腓尼基。到公元前500年，它偶尔被希腊人采用，但在希波战争之前，还没有成为战争中的常规战舰。三列桨战船的"三列"似乎指有桨的三个船舷，其中两层直接相互搭在一起，而第三层则位于舷外支架上。

三列桨舰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光荣的赛船，它是为速度和机动性而非为力量而制造的。这意味着轻型的舰体构造必须与协调的肌肉力量和老练的舵手结合在

公元前6世纪雅典最杰出的黑图彩绘瓶画家之一埃克塞吉阿斯（Exekias），把狄奥尼索斯画在一艘很漂亮的战船上，表现酒神被埃特鲁里亚海盗俘虏的神话。但部分因为在技术上存在困难，也部分因为这个时期（约公元前540年）的雅典在海战方面相当落后，所以埃克塞吉阿斯描绘的战船并不是一艘三列桨舰。在船舶设计中，这种战舰是很晚才出现的。一般而言，战舰也许是靠船桨驱动（见第91页），但为了艺术效果，在杯内的深珊瑚红的背景之下，狄奥尼索斯斜倚在一面鼓动着的白帆下方。







一艘名为"奥林匹亚丝(Olympias)"(根据亚历山大大王的母亲而命名)的实验性三列桨舰，最近被成功地复制出来，并在希腊海军中服役。它至今没有达到古代文献史料中所说的一艘古代三列桨舰的速度，人们在继续对它进行改进。

一起，以便在行驶时发挥最大限度的效率。一艘三列桨舰的全体乘员约200名，其中包括170名桨手（出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各种军官以及少数作为后备水兵的重装步兵。船上的储藏空间实际上为零，因此在采取进攻行动的地区，必须有一个友好或至少是中立的供应基地。制造三列桨舰相对昂贵，而最昂贵的是在服役期间要对它进行维护。

劳力——人的肌肉力量——是主要固定的支出对象。假设一个船员每天要支付给0.5德拉克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一段时期，这看来是正常的），那么仅仅维持一艘三列桨舰的全体乘员一个月，就得支付0.5塔兰特。按此计算，一支由10艘舰组成的小型舰队每个月要花5塔兰特，而在3个月的战役期间要花费15塔兰特——大大超过了雅典海上帝国的成员国所必须缴纳的贡金的平均值。因此，雅典帝国的国库——来自国有银矿和盟国贡款的岁入——承担着这笔开支。

至于对船身构造的维护，雅典人以年为基础，把这种财政负担加在特别富裕的公民头上。除了雅典，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指望建造、更不用说供养得起由300艘三列桨舰组成的海军保持战备状态，而雅典却在公元前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这样一支海军。然而，由于自我挫伤和波斯对善于陆上战争的斯巴达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援，雅典最终在海上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希洛特人的叛乱和皮洛斯的陷落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许多在军事上自相矛盾的事，其中一件是公元前425年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较量。雅典海军对斯巴达的国内领土，尤其是对斯巴达人在地方上的依附者——大多数希洛特人的聚居之地美塞尼亚造成了威胁。为了利用自己的优势，雅典人派遣一支舰队环绕伯罗奔尼撒巡行，表面上要驶往科福，甚至要深入西部至西西里岛。但在美塞尼亚西南海岸的派罗斯（Pylos）附

近，这支舰队受大风逼迫而到岸边避险。雅典人在那里掘土建造堡垒，并成功地说服许多希洛特人逃到堡垒中来。然后这些被雅典人武装起来的叛逃的希洛特人被派回到附近的乡村。由于他们对地形熟悉，并且说希腊语的多利安方言，所以他们对斯巴达造成了严重破坏。

斯巴达人当然不能长期容忍在自己的国土上存在这样的敌方的要塞，于是派遣一支重装步兵支援效忠斯巴达的美塞尼亚希洛特人。但是，灾难接踵而至。这支重装步兵援军的分队受到雅典精锐轻装部队的伏击，士兵们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可以说，这是雅典的弓战胜了斯巴达的矛。令许多人——不仅仅是雅典人——吃惊的是，斯巴达重装步兵分队中活下来的292人没有抵抗至死，而是投降。他们试图换回自己的面子，声称真正的男子汉与弓箭手的“纺锤”——妇女的工具——作战是不值得的。

这些幸存者们被押解回雅典作为人质。他们在雅典又呆了四年。在此期间，他们的盾在阿哥拉被当做战利品展览。其中的一块盾牌掉到一口井中，从大约公元前300年起一直封存在那里，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在考古发掘中重新发现了它。经仔细辨认，能够在盾上看到的铭文是：“雅典人从派罗斯的拉凯戴梦人那里（得到这块盾牌）。”

包围战和兵器技术

还有一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后变得重要的战争形式是包围战。然而，在使用有威力的远程发射物或能够造成严重破坏的攻城槌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希腊的围攻军队能够利用除了封锁战术：包围敌人、切断其供给线、等待饥荒发生时发动攻击之外能造成其损失的其他战术。

公元前5世纪期间，土耳其西南部利西亚（Lycia）的山图斯受到希腊的强烈影响。这座纪念一位统治者涅瑞伊得（Nereid）的墓碑约属于公元前400年，称做“涅瑞伊得纪念碑”，刻画了一座被重装步兵包围的城市，时间大概是在西西里开发出攻城技术之前。这种技术使优势转移到了围攻者一方。



“海军群氓”的回击

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当海军是非常低级的服役。至少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雅典就有了某种海军，而公元前6世纪时，可能就有一种固定的征税程序，以便支持一支海军力量——无疑是古代战争中代价最昂贵的一种作战手段。直到公元前5世纪90年代，雅典仍然不得不向希腊海军建设的先驱和长期的领袖——科林斯租借战船。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期间，雅典幸运地发现了国有银矿，这个机会使雅典能够为自己建造一支庞大的、由200艘最新的三列桨舰构成的强大舰队。

在铁米斯托克里明智的领导下，这支相对没有什么经验的新舰队，于公元前480年在阿提卡海岸附近的萨拉米斯海湾战胜了波



斯人，此后雅典的军事和政治命运便主要取决于它在海上而不是陆地上的表现。雅典海军事业的英雄时代是公元前475年至前426年，在此期间，舰队在整个东地中海水域（向东远至塞浦路斯，向南至尼罗河三角洲）游弋，甚至开进黑海。在爱琴海，雅典人开创并维持着一个由附庸国组成的海上帝国（见第149页）。正是在这个史诗般的时代，约公元前460年，某些不知名的雅典人骄傲地在卫城上捐赠了一块陶制盾牌，上面装饰着红色图形的海军图案。

这个以海军为主题的陶制盾牌可能是三列桨舰所载的10人或更多的重装水兵所配备的盾牌摹本。然而，尽管水兵的角色很重要，但是比起那些舵手（kubernetes）和170名桨手来说，他们就成了并不重要的配角。舵手是技术娴熟的人，可能属于社会上层。阿尔基比亚德斯于公元前406年准备把整个同盟国的舰队委托于他的舵手来指挥，虽然当他不在时，安提奥库斯在重要的诺提乌姆会战中打了败仗。此外，一艘雅典三列桨舰的桨手属于低下的社会阶层，通常还是非常贫穷的人，甚至是无地的人。他们包括自由的外国人，并且实际上还包括奴隶和雅典公民。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正是他们当中的雅典公民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驱动这座城市的战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些“海军群氓”（正如上层社会的批评者，如修昔底德，喜欢称呼他们的那样）在日益激进的民主政治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见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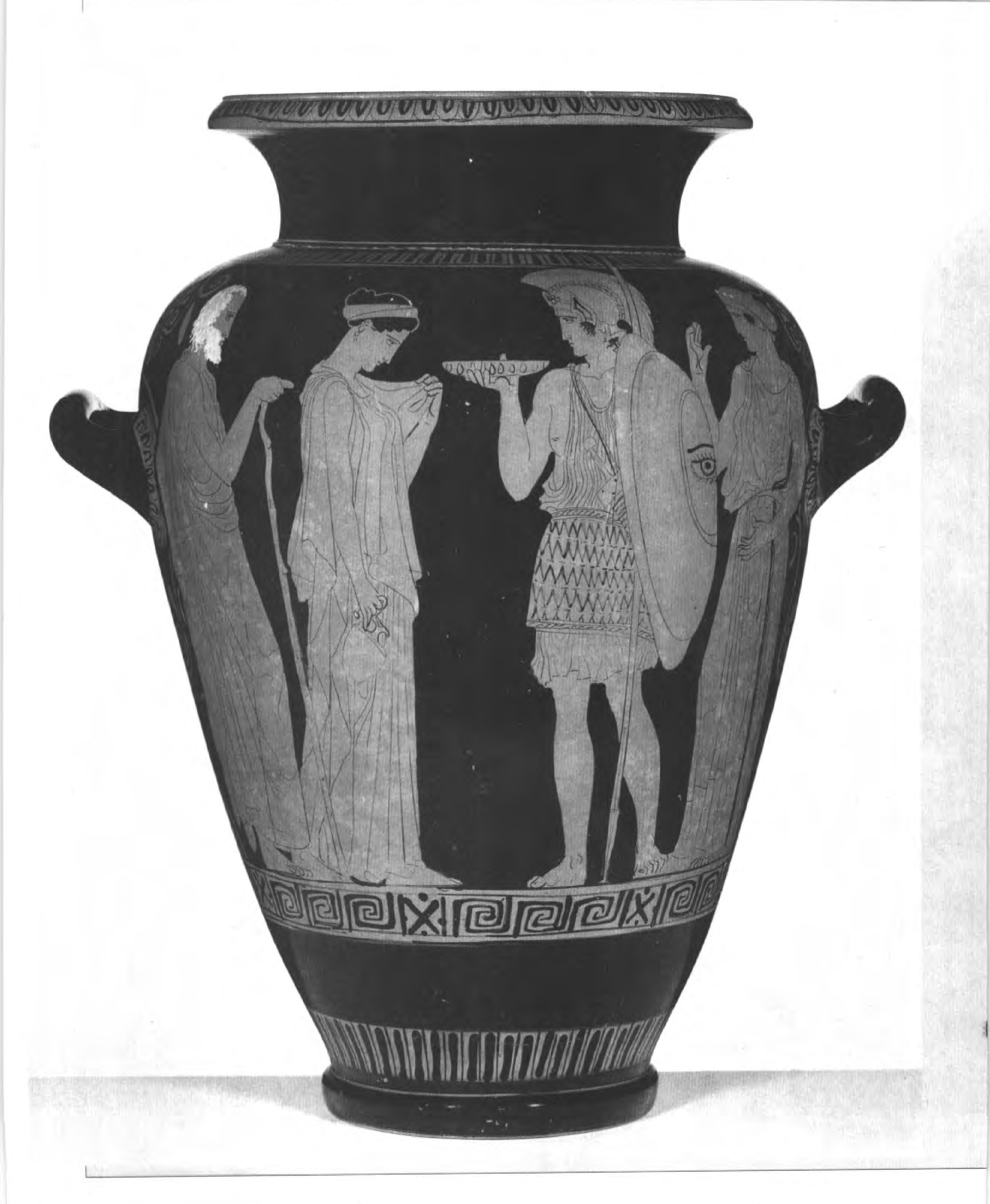
然而，就人们的意识而言，重装步兵仍然占据着优势。有一种想法认为在三列桨战舰上充当桨手不是体现“男子汉气概”的工作，因为在冲锋陷阵的关头却看不见敌人，有时还要进行策略性的后退，而不像在陆上的一场激烈的重装步兵交手仗中所表现的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迎击正面的敌人。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修昔底德借助伟大的雅典海军指挥官之一弗米昂（Phormion）的嘴说出了下列话。这是弗米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对水手们所做的战前动员讲话中的一部分：

> 至于这场战役……你们在船上要待在自己的岗位上，要听清每一句命令。当我们和敌人在极短距离内互相对视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行动上，听从指挥和沉默在一般战争中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在海战当中。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你的行为要与你过去的功绩相称。你为之而战的事业是伟大的，要么摧毁伯罗奔尼撒人在海上的希望，要么使雅典人更加恐惧海上控制权的丧失。

公元前429年夏天，弗米昂的士兵们在科林斯湾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但长远来看，当雅典人于公元前405年在赫伦斯滂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的埃哥斯波塔米——希腊半岛另外一端的一个狭窄的海峡，输掉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他们的确失去了海上控制权。

这块碎片来自一块陶制盾牌贡品，用红陶技术加以装饰。它在大约公元前460年被捐献给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图中一位穿着优雅的妇女两只手各握着一把阿弗拉斯敦（aphlaston）——一艘船的艉部装饰。两个阿弗拉斯敦都饰有一张戴着东方头饰的人脸。它们大概意味着雅典人约于公元前475年至前450年雅典取得海战胜利时从一艘波斯战船上缴获来的战利品。这个女人可能就是胜利女神尼克。公元前450年之后的某个时间，人们在雅典卫城上捐建了一座她的神庙以及她的祭坛。在雅典的三列桨舰上，大多数船员都是桨手，但是三列桨舰也载着一小部分重装水兵。这面陶制盾牌作为贡品，可能是对水兵们所持的真正木盾和青铜盾的仿造品。



战争的起因

希腊战争是男人的事情，而且只是男人的事情。勇气是有性别之分的：那种在希腊式的战斗中所要求的好勇斗狠是同男子汉气概相提并论的。然而，妇女并没有被完全排除于战争范围之外。正如无数临战前的演说所反复讲的那样，正是为了城市的妇女们——诸多原因之一——男人们才发动战争。在这样的军事文化中，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是忠诚的妻子形象：当丈夫为了她和他的城市出征战场的时候，她温柔地向她的战士丈夫辞别。

斯巴达的民族神话包含着这种观念：母亲更希望她们的儿子打胜仗、战死在疆场，而不是蒙受失败，"带着你的盾牌或躺在盾牌上"活着（回来），据说是她们离别时的嘱托。甚至有人声称，那些有儿子捐躯在沙场的母亲会公开地庆贺，而幸存者的母亲则由于耻辱而无法抬起头来，并避免去公共场所。在稍微温和一些的雅典军事文化中，公众和私人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达到了一种较好的平衡。但我们可以确信，在这里，一位男性公民也将自觉地带着妻子对他的期望，以及怀着为自己的城邦效力并在他的同胞中获得名声的愿望奔赴战场。

一个威胁要推翻整个希腊军事男权主义、结果却适得其反的妻子，就是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的一个著名片断中，出身于科林斯军人家庭的美狄亚（当然由男人扮演），向科林斯的女合唱队表达了伊阿宋背叛她而给她造成的痛苦。她以明确的性别角色这样做，唱到高潮时，她用分娩来与战斗进行了挑战性的比较：

> 一个男人同家里人住得厌烦了，
> 可以到外面去散散他心里的烦闷，
> 或是找朋友，或是找玩耍的人。
> 可是我们女人就只能与一个人厮守。
> 他们反说我们安处在家中，全然没有生命危险，
> 而他们却要举着长矛上战场。
> 这说法真是荒谬！我宁愿提着盾牌打三次仗，
> 也不愿生一次孩子。

一方面，美狄亚是苦难之妻，一位外国妇女，是从已知世界的另一端（现代格鲁吉亚的科尔奇斯）来的女巫，她蓄意谋杀自己的孩子，为的是向她的丈夫报仇。另一方面，她是每个处于困境中的希腊妻子的极端的化身：一个因丈夫寻找新欢而被抛弃的永无取胜希望的妇女。然而，甚至激进的欧里庇得斯也可能觉得，他仅能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质问关于男性战斗经历的优先权和中心地位。



（左页图）妇女正好是希腊人中非军人身份人数的一半，但正是为了她们，也是带着她们始终不渝的支持，男人们应该出门打仗。离家前要举行一种宗教仪式，以确保众神站在正确的一边。奠祭者从一只phiale（浅碗）中倒出一种奠祭用的酒并祈祷。在这只约属于公元前430年（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同时期）的雅典酒罐上，一身重武装的丈夫端着一只碗，他的妻子已在这只碗里倒入祭祀用的酒。妻子向外拉着衣服，好像要用一种谦恭和忠诚的动作蒙住自己的头，以表示真诚和忠心。这位妻子身后站着一位过了当兵年龄的老年男子。他胡子花白，拄着拐杖，可能代表这位战士的上了年纪的父亲。

女巫美狄亚把一剂特殊的药倒入一个沸腾的三脚大鼎中，不可思议地使一只老公羊返老还童。她许诺使伊阿宋的父亲，年迈的珀利亚斯，也能恢复青春，但结果却使他丢了性命。雅典红图彩陶提水罐（水缸），约属于公元前470年。



这位色雷斯轻盾兵被描绘在一个约属于公元前480年的红图彩绘雅典酒杯上，由一位与色雷斯人有关系的画家布里哥斯所作。这位轻盾兵足登色雷斯靴，头戴色雷斯帽，身穿一件围裙(perizoma)。为扩大执盾者的视野，盾牌的顶部削去了一块。

因此，斯巴达人花了两年时间（公元前429～前427年）才结束了他们对普拉提亚的包围，尽管他们将复杂的喷火器当做一种特殊的武器来使用。雅典人在公元前415年至前413年之间的叙拉古，使用他们过去常用的更为坚固复杂的壁垒，结果也证明是不成功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早期，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才开创了一种有效的攻城塔和扭转器。接下去的一项重要的技术上的发展是腓力统治之下的马其顿取得的。腓力使用攻城武器和先进的军备，成功地在数周（而不是数月或数年）之内结束了他的大多数包围战——总共才失败过两次。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对腓尼基海港城市提尔（Tyre）的七个月的包围，显然建立在他父亲的成就基础之上（尚未得到证实）。

雇佣兵的崛起

然而，总体上说，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役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技术之类的诀窍，甚至也不是更为有效的人力部署。例如，在伯罗奔尼撒的冲突期间，轻盾兵通常作为雇佣兵用来补充希腊重装步兵的力量，这是他们对希腊战争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色诺芬和万人雇佣兵于公元前400年前后在亚洲的蛮勇和明显成功以及向黑海的进军①，极大地促进了希腊各国和外国当权者利用雇佣兵的做法。这种做法确实变得相当常见，以致于雅典公民大会越来越愿意从日渐减少的公共储备中拿出钱来，投资在雇佣军身上，以便让他们以雅典人的名义或代替雅典人去打仗。因此，德摩斯提尼绝望地反复呼吁他的公民同胞们“亲自参战”。

科罗尼亚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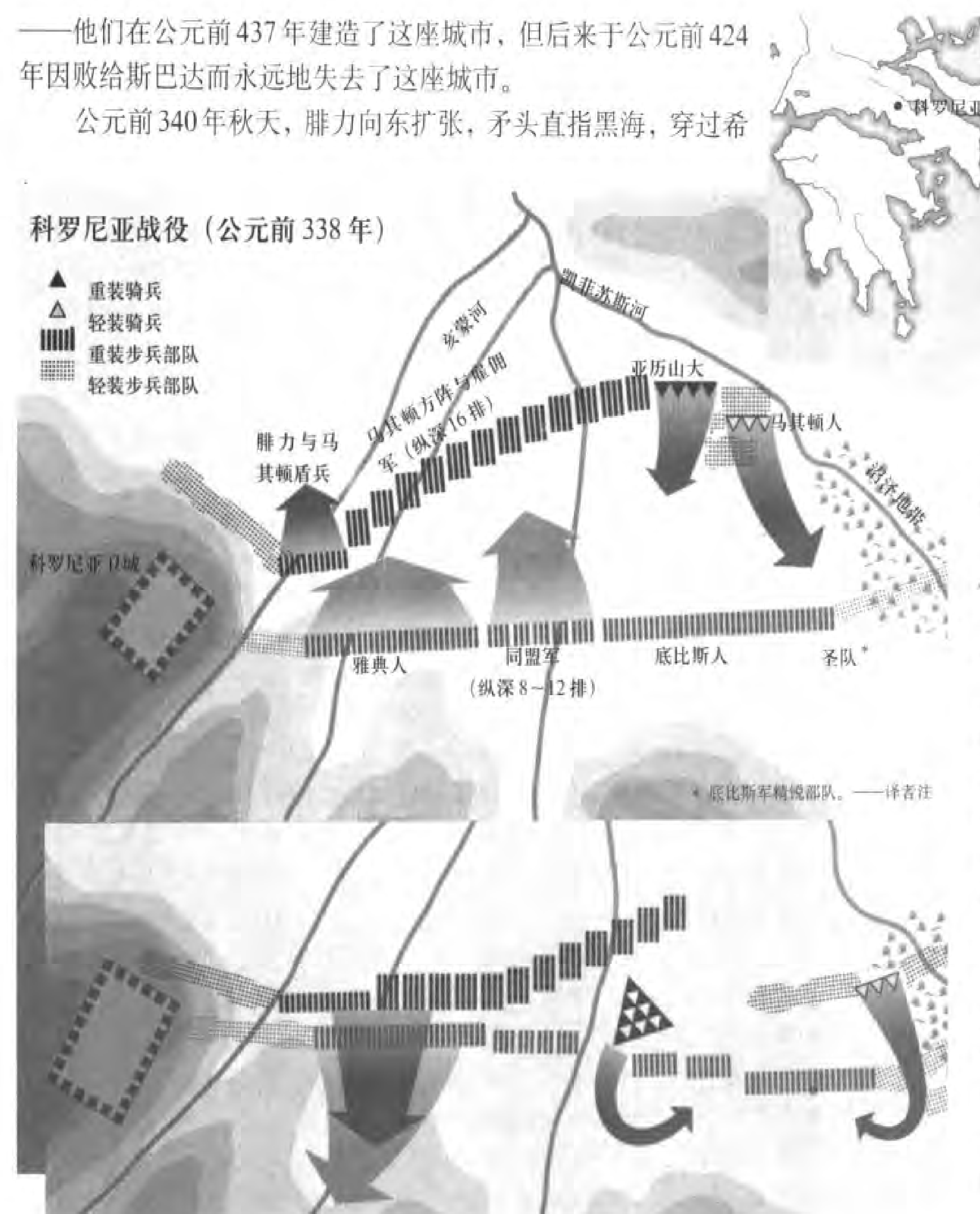
尽管包围战得到发展及轻盾雇佣兵得到越来越多的利用，但那场可能为公元前4世纪的决定性战役，在希腊人一边，大体上仍然是重装步兵打的一场战役。公元前338年发生的科罗尼亚战役的简要背景如下所述：

腓力统治下的马其顿自公元前359年以来的崛起，迫使雅典在《菲罗克拉特和平条约》（公元前346年）中公开承认它自身的劣势和虚弱。大多数雅典人始终不能容忍这个条约的条款。他们渴望收回位于色雷斯的安菲波里城(Amphipolis)

① 色诺芬是西方第一本《长征记》的作者。这本回忆录体的史著描写在波斯小亚细亚总督麾下服务的万名希腊雇佣兵随雇主远征巴比伦，参与波斯帝国王位之争的战斗，然后又撤回希腊人居住区的经过。书中透露了波斯统治的虚弱，为后来亚历山大东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译者注

——他们在公元前437年建造了这座城市，但后来于公元前424年因败给斯巴达而永远地失去了这座城市。

公元前340年秋天，腓力向东扩张，矛头直指黑海，穿过希腊和非希腊的领土，为雅典敲响了有可能发生危急的警钟。一支由200余艘船只组成的、完全属于希腊人的运送谷物的船队，载着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小麦驶向爱琴海，其中大量谷物要运往派里厄斯港。但这支船队却落入了腓力手中。与公元前405年或前404年和前387年或前386年的斯巴达人一样，腓力此时牵制住了雅典。雅典别无选择，只能与他战斗到底。为了在彼奥提亚的科罗尼亚展开的那场灾难性的会战，它虽不情愿，却还是与它的最强大的邻国及老对手底比斯结为同盟。



公元前338年8月2日，腓力和他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在彼奥提亚北部的科罗尼亚平原上，攻破了底比斯和雅典的方阵。希腊的失败，部分由于马其顿人的聪明战术，部分由于希腊人缺乏纪律。腓力前去攻击雅典人，接着佯装撤退。雅典人未加考虑便予以追击，背后留下了一个很大空档。亚历山大横穿进来，包围并切断了底比斯的右翼，接着腓力再次攻击雅典人，致使雅典人惊惶失措。轻视腓力的德摩斯提尼——他曾把腓力比做一头跛足的独眼怪兽，说他“如此喜欢冒险……为了扩大他的帝国，已经遍体鳞伤”——却在这次战役中羞辱地逃跑。

这把精心装饰过的金制剑鞘发现于克里米亚的一个非希腊人的墓葬里，属于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的前半期。其上描绘着正与斯基泰射手作战的重装步兵。制造这把剑鞘的工匠可能是一位深受希腊工艺影响的当地斯基泰人。

雇佣兵

"雇佣兵"一词在近代带有极其强烈的贬义。它从原意"被雇佣的"向"仅对个人收益感兴趣"的意思转化。在古希腊语中，雇佣兵要么是xenoi(外国人)，要么比较礼貌一点说是伊壁科罗伊epikouroi（助人者）。甚至据说在阿卡狄亚巴塞的阿波罗·伊壁科里奥斯（Apollo Epikourios，有一座贡献给他的著名神殿，建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由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师之一设计）的这个称号就归之于对雇佣兵的支持。无论如何，当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雇佣兵服役的现象首次开始对希腊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候，阿卡狄亚就成了希腊雇佣兵的主要供给地之一。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说一目了然，因为大多数雇佣兵都是粗俗的穷人，而位于丘陵地带的阿卡狄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中央的，现实的阿卡狄亚，而不是神话中的阿卡狄亚——是希腊的一处著名的贫瘠之地。驱使男人们为谋生而充当雇佣兵的其他原因可能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例如，在一场内战中吃了败仗的人可能要在外被放逐一段时间，为了回国而在外挣钱糊口，提高技能和增强体质是否就比充当雇佣兵要更好一些呢？或者他们也许可以采取更加个人化的闭门思过，使人忘记其耻辱的方式。



所有这些原因（还没有提到单纯出于冒险的渴望），可能促使那些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会聚于小亚细亚的众人，组成了一支最庞大的希腊雇佣军。这支雇佣军号称"万人"，最初有13,000人左右，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来自阿卡狄亚。

在位的波斯大王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II)和他的弟弟、觊觎王位者小居鲁士(Cyrus)之间的一场王朝权力之争，是引起这种特殊需求的原因。公元前407年，小居鲁士被他们已故的父亲任命为波斯帝国西端所有波斯军队的统帅(generalissimo)。他卷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支持斯巴达一方。事实上，他为来山德(Lysander)[1]输送了大笔金钱，决定了斯巴达在这场争夺中的有利地位。作为回报，斯巴达人尽其所能帮助小居鲁士进行斗争，以取代他哥哥，坐上波斯的宝座。他们同时还受到一个事实的鼓舞，即小居鲁士的希腊雇佣兵的主要征兵人和指挥官之一是斯巴达人克勒亚库斯(Clearchus)。

年轻的色诺芬是群集在小居鲁士麾下的人员中的一个，当时他因在雅典支持三十僭主的邪恶政权而招致政治上的坏名声。正是由于色诺芬的《长征记》(*Anabasis*，"向家乡行进")，我们才获悉了一名雇佣兵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之交期间，在中东和小亚细亚生动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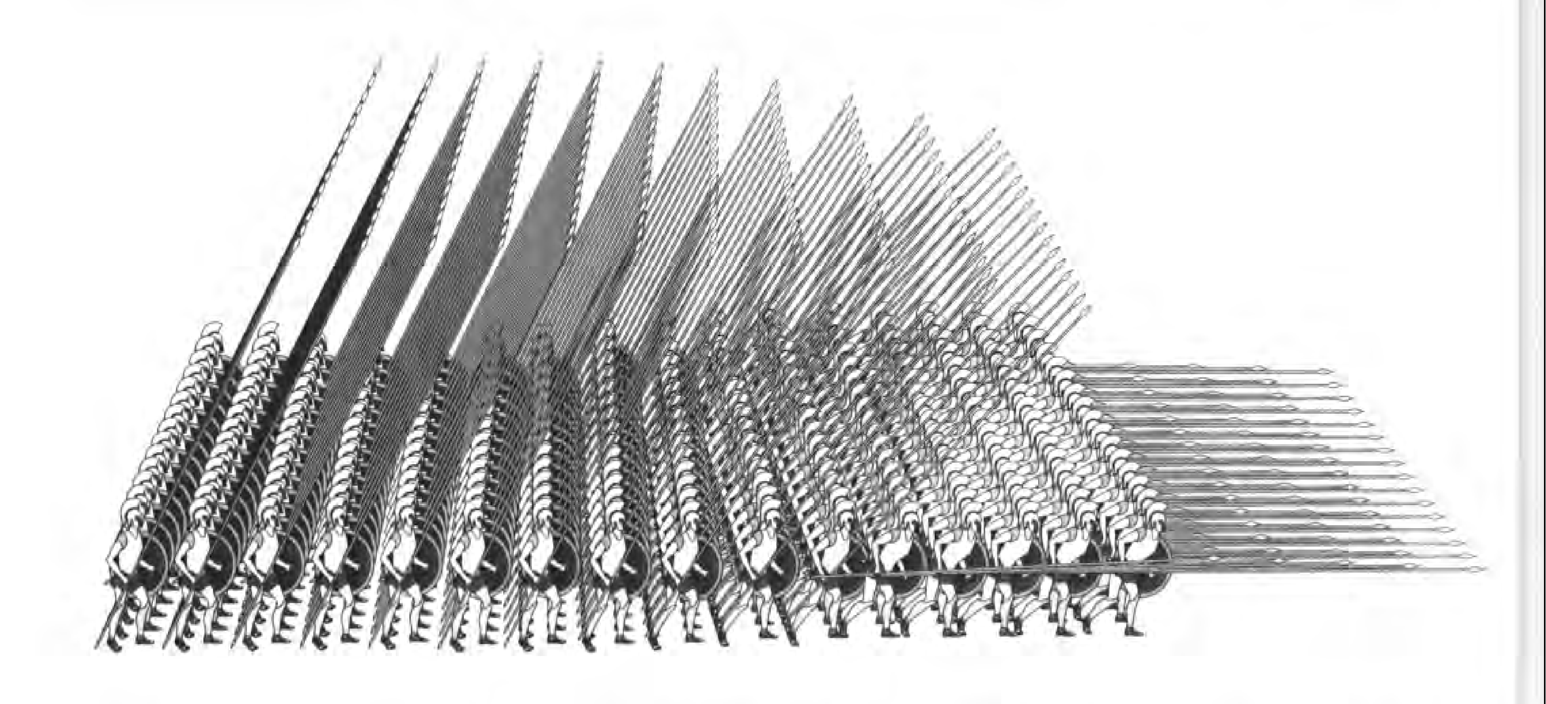
色诺芬的作品并不是完全客观或者真实的描述。他在极大程度上避开了他的大多数雇佣兵同胞们的物质动机，对他自己作为指挥官从亚洲拯救"万人雇佣军"所起的作用充满溢美之词。这件事发生在小居鲁士于公元前401年在靠近巴比伦的库纳克萨（Cunaxa）战死之后。然而，他不能完全掩饰他从这次行动中获得了多少钱财，尽管他为之寻找借口，强调他把这些财产献给了神明。

由于叛国罪，他被正式逐出自己的故土雅典。他的新保护人——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Agesilaus），赐给他一份离奥林匹亚不远，令人向往的土地。他在那里过着富足的乡村绅士生活，度过了以后的几十年。以下是他以第三人称所作的自传体陈述（摘自《长征记》），涉及如何处理他的一些雇佣兵收益：

> 他购置一些地，作为献给女神阿尔忒米丝的一份贡品……也利用这些神圣的金钱建造了一座祭坛和神庙。从那以后，他在为表示对这位女神的敬意而举行的献祭庆典上，总是供奉一小部分季节性产品。斯吉罗斯和周围地区的所有居民、男人和女人，都参加这个节日活动。阿耳忒米丝为那些参加这个宴会的人提供大麦面粉、面包、酒、干果和一份既包括从神圣牧群中宰杀的家养动物又包括野味的食物……这座庙宇是以弗所的阿尔忒米丝大神庙的一个小规模复制品，而那尊崇拜的雕像——由柏木制成的形象，尽可能地与以弗所的金像原作取得一致。

（左图）一件雇佣兵陶俑，样子滑稽真实，属于公元前3世纪。

(1)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斯巴达将军。——译者注



当时，年方18岁的亚历山大作为腓力的精锐伙友骑兵中的一员，在马其顿的胜利中据信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实是腓力的枪兵方阵令人敬畏的坚定性和严格的训练赢得了这场胜利。

前排士兵挥舞着五米长的长枪（sarissa），使马其顿步兵看起来好像是一头长着金属尖刺的豪猪。枪兵可以机动地与骑兵联结在一起（联结的是更为轻装与灵活的精锐王室卫队——王家执盾兵），这样做是为了立刻形成一道难以突破和可以变换阵形的战线。

在不可阻挡的马其顿方阵的逼迫之下，左翼的混乱打破了希腊战线，马其顿骑兵冲进正在扩大的缺口。后来的结局已毫无悬念。但就在那一天，在希腊一方却凸显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部队。如果一支部队的所有成员都在各自的位置上战斗至死，传统的做法是把牺牲者全部埋葬在战场附近（如果不是埋在今天用来标记战场所在处的狮子纪念碑下的话）。这支部队就是成立于公元前378年的由300人组成的所谓“圣队”。他们是专门从底比斯的重装战士中挑选出来的，据说是一个由150对同性恋者组成的团队。他们既并肩作战，也一起做爱，直到他们在科罗尼亚集体做出最后的牺牲。

马其顿方阵的效力依赖于严格的纪律。最前面五排长枪在开始接战时都接触到目标，他们紧挨着的长矛构成的墙刺向来袭者，像钢刺一样，不断压制敌人的前进。中间和后翼的战士忙于举矛抵挡箭，用枪托刺杀受伤倒地的敌人，用肩膀推着前面的人向前。一大堆枪托上下晃动，一定对后面的人造成严重的意外伤亡。由于长矛的重量和行列向前推进的压力，几分钟后，使人人精疲力竭。在战场上互相残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因此，大概毫不奇怪，油滑的青年和文雅的男子是不能参加这种战斗的。果敢机智、具有胆量和经验的老兵才不会临阵退缩，也许他们就是马其顿方阵的动力。

亚历山大大王①

腓力的军事改革成就一再得到其子亚历山大所指挥的军队的发扬光大。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6年登基，到公元前323年去世。先是马不停蹄、挥军希腊半岛全境，后又纵横驰骋了整个波斯帝国。

在确保自己的后方希腊或多或少不会闹事之后，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向亚洲进军。但是，当他把从陆上击败敌人舰队的策略付诸实施的时候，即通过围城的方式拿下敌方舰队的一些战略性海军基地（如提尔）时，他派出的雅典船只当然仅仅是运输工具。



三场主要的成功激战——格拉尼库斯（Granicus）河畔之役（公元前334年）、伊苏斯（Issus）之役（公元前333年）和高加美拉（Gaugamela）之役（公元前331年），推翻了末代波斯君主大流士三世。后来这三场战役成了最著名的战役。

亚历山大的征服战争仅仅由于他在巴比伦的突然去世才告结束。他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打过几场游击战，为打开渡河通道而战以及在旁遮普与大象作战。他还凶猛地穿越印度西北部的一系列主要、次要的城镇，然后沿波斯湾北岸打回伊朗。为了尽量加快速度，亚历山大把他的辎重车队减到最少程度。他的坚忍不拔的老兵，尤其是作为中坚的马其顿老兵，不仅必须作战，而且必须携带自己的行

（左页图）这头科罗尼亚的高贵的狮子（是最近由许多碎片拼凑而成的），矗立在被残杀的希腊人最为集中的地点（已出土了许多遗骸），仍然守望着彼奥提亚的科罗尼亚战场。正是在这里，马其顿的霸权得以确立。

亚历山大



据一位后来的传记作者（撒提鲁斯（Satyrus））记载，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曾热衷于婚姻——他总共娶了七个妻子，其中几个是同时娶到的。他的希腊妻子奥林匹亚丝（Olympias）占有特殊地位。她于公元前356年生下了腓力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当腓力踏上进军东方的无情的征服之路时，16岁的亚历山大已经被认为足够成熟，可以留下来作为马其顿的摄政者了。公元前338年，亚历山大在科罗尼亚大显身手。公元前336年，他作为亚历山大三世继承了马其顿王位。

腓力被谋杀了。有人怀疑是当时正与腓力不和的奥林匹亚丝所为。谋杀的真相永远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她的儿子是腓力较早去世的最大受益者。亚历山大很快显露出政治、军事勇气，包括残忍的性情。这种无情促使他在公元前335年批准摧毁底比斯。从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3年他去世为止，亚历山大离开马其顿和希腊，进入亚洲，主要事业就是积极作战。

除了在三大激战中获胜之外，亚历山大的作战行动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就是他于公元前330年至前327年在今天的阿富汗和伊朗北部所长期进行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不只一次严重地危及到自己和军队的生命。公元前325年，他那支当时始终毫不动摇地效忠于他的马其顿军队，最终反叛，拒绝再向东前进一步，拒绝进入在他们看来是一无所知的世界。

公元前324年，亚历山大在返回伊朗途中，又一次显露出他那残忍的性情，处死了自己先前任命的几位地方统治者。在他心中，过度膨胀的希腊－东方帝国的统治将有怎样的未来，我们永远无法知晓。随之实施了进一步的作战行动。关于他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的死亡，有一些传闻说他已经策划好了反对阿拉伯人（还有别的讨伐对象）的更多战役。

传闻又说，亚历山大的死亡不是由于自然原因。但疾病折磨看来仍是最可能的原因，当时因过量饮酒和甚至更为艰苦的战斗已经导致亚历山大身体极端虚弱。

公元前334年至前325年，亚历山大大王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埃及、波斯和巴克特里亚的胜利以及他所创建的几座城市，有助于将希腊人的语言和文化传播到近东和远至印度河下游。关于亚历山大军事威力的传奇也把他刻画成具有远大抱负的人：求知欲强，喜好发现、征服、超越，甚至想超凡脱俗。公元前332年至前331年，他进行了一次危险的、在军事上没有必要的长征，穿过沙漠，去位于锡瓦绿洲的神秘的埃及阿蒙（相当于希腊的宙斯）神殿，以便确认他作为神的儿子而具有神的血统。这枚硬币上的英雄肖像刻画着他头戴阿蒙神的公羊角。他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死于高烧，年龄接近33岁。

李。最终，甚至这些老兵也受够了。公元前324年，他们在巴比伦附近的奥皮斯完全停止了行进。

亚历山大死后，他拥有的如此短暂的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事实证明，他的不朽遗产既不在政治方面，也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文化方面，这从他建立的或授意建立的、遍及中东的一系列冠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事实上明显可见。这些城市分布在从埃及（最早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建于公元前331年）到阿富汗（东部最远是在古代索格迪亚）的艾哈努姆的广阔地带。

第八章 工作与休闲

工作思想

前面的章节探讨了环境、经济活动、军事活动、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这里我们着重考察与工作、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意识以及有组织的集体休闲的典型形式。古代城邦的一些休闲活动由城邦资助，其目的是通过宗教仪式和激烈的竞赛来加强公民的凝聚力。还有一些活动是向个人提供消遣，然而关于它们到底是增加还是缓解了希腊城邦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紧张关系的问题，还存在着争议。正如前几章的情况一样，许多幸存下来的史料都是有关雅典的。这个国家虽说不是所有城邦中最典型的，却属于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城邦之列。

作为最早的希腊诗歌，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描述的普通人的世界（与众神的世界或奥德修斯旅行中所遇到的神话中的人相对）是家庭的世界。人们以小麦和大麦面包为主食，用橄榄油烹调食物、涂抹身体，饲养家畜，用它们劳作。有些家畜在用酒和水冲洗祭祀神灵———种供奉神灵的奠酒祭神仪式后，被烹制、分享。

《伊利亚特》第18卷中，阿基琉斯盾牌上刻画的农业情景几乎就是一幅和谐、安定的理想世界的画面，它并不想表达对农业劳动的本质或者这块土地上的贫富之间关系的一种标准观点。更多的现实生活场景在荷马的许多诗句中得到了反映（如《伊利亚特》中提到耕地、打谷和簸谷），《奥德赛》中也有对年迈的拉埃尔特斯（Laertes）精心修建一座农舍的情景进行的特别的描述。赫希俄德的诗歌《田功农时》，大约与荷马史诗同时期创作，对此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在《田功农时》中，有几种相关的思想极为突出。首先，耕种是主要的工作，由男人完成，而妇女"生来"适于在家中干活，主要是纺纱织布（见第五章）。

其次，工作艰苦备尝，尤其是基本劳作——从地里收获庄稼。这在神话语境中被看做是宙斯施予的一连串的惩罚和磨难，由于"黄金时代"在神与人之间的隔阂与报怨中解体。在赫希俄德的《田功农时》及其《神谱》中所讲述的主要神话，是有关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惩罚，因为他成功地从众神那里盗来天火送给人类。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创造了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她的后代，即"女性"，后来成为男人痛苦和灾难的主要原因。潘多拉打开了一个大贮存盒的盖子，原先禁锢在里面的各种疾病和邪恶被放出来，飞往世界各地。潘多拉自己也因此成为女人邪恶和欺骗本性的一个例证。在这一切变化发生之后，男人为了生育后代得与女人一起生活，同她们结婚。此外，原先不需要人们劳动、大自然中野生的食物现在深藏在土里，只有通过艰苦繁重的劳动才能获得。而且人类与众神之间的那种曾经是开放和直接的关系，现在则不得不通过屠宰、烹制和分享动物等献祭仪式（伴随着酒祭、祷告）这样的神圣化的中介联系。当然，这些祭祀仪式也是

农业生活：理想与现实

他（赫淮斯托斯）在盾面附上一块贵族的地产，
雇来的割麦人手握锋利的镰刀正在那里收割麦子。
割下的麦子一束束躺倒在地，
被捆麦人用草绳一束束捆起。
那里站着三个捆麦人，男孩们不断
从他们后面抱起麦子送给他们。
国王也默默地站在他们中间，
手握权杖站在地里，喜悦充满心头。
远处橡树下侍从们正在准备午饭，
他们在烤制一头刚刚宰杀的肥牛，
妇女们把洁白的面粉撒向为割麦人准备的午饭。

这段描述摘自《伊利亚特》中荷马对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为阿基琉斯制作的盾牌的描写，旨在叙事。凶悍的英雄阿基琉斯一直带着这面新盾牌参加与特洛伊人的一连串决战，这给他带来了荣耀，但也使他早逝——事实上他再也没有回到和平的世界，即那个盾面上的大部分场景所描绘的世界。这正是他原先在诗中有时主张建立的世界。因此，在拥有大片地产的一位贵族的仁厚注视下的这些愉快劳动的农人形象以及所有人将一起分享午餐的景象，都被用来描绘理想的农业生活的美景，意在增强对战争悲剧性的讽刺。

《奥德赛》（第24卷）描写拉埃尔特斯和他的奴隶在山地开垦的农田中劳动，可能较为准确地说明了农村生活的艰辛。

（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出了城，来到拉埃尔特斯
精心修建的农庄，那是拉埃尔特斯
亲手修建，为它付出了无尽的辛劳。
那里有他的住屋，住屋周围是棚舍，
他们在那些棚舍吃饭、休息和睡眠，
听从他役使的奴仆们干各种令他高兴的活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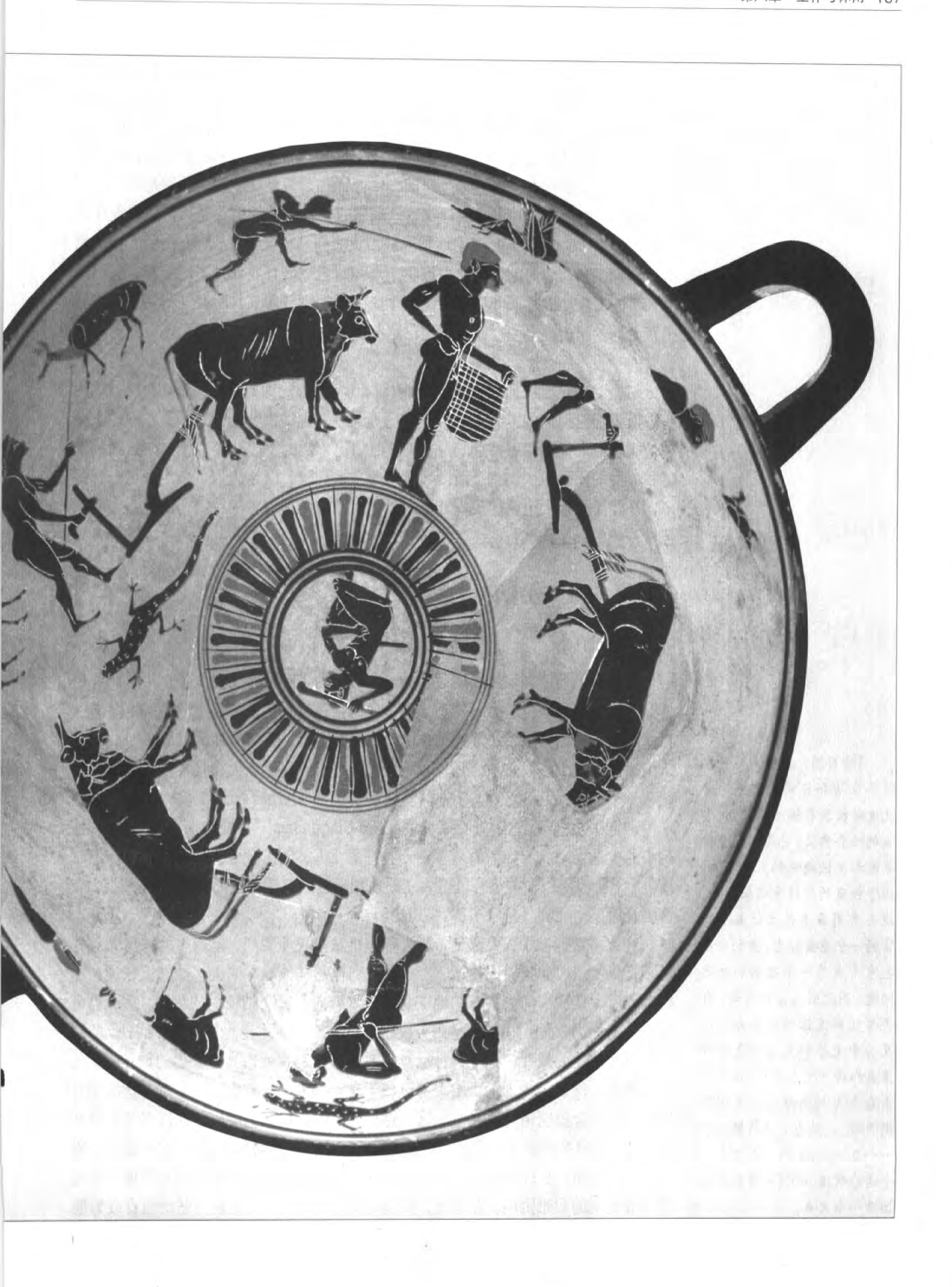
奥德修斯（正在找寻拉埃尔特斯）
试探着走近那座繁茂丰产的葡萄园。
他走近那座大果园，未见到多利奥斯，
也未见到他的儿子们和其他奴隶，因为他们
都前去为果园搬运石块垒围墙，
老人多利奥斯带领他们，在前引路。
奥德修斯看见父亲拉埃尔特斯只身在精修的果园里，
为一棵果树培土。

（奥德修斯对他那穿着破烂衣衫的老父亲说）
老人家，我看你管理果园并非无经验，
倒像是位行家，果园里一切井井有条，
不论是幼嫩的树苗、无花果、葡萄或橄榄，
还是梨树或菜畦，显然都得到了精心料理。

赫希俄德在《田功农时》中给独立的小农场主的建议可能也较为确切地说明农业生产开始更加精耕细作，并开始使用奴隶劳动。

所以耕种季节一到，
你自己要和奴仆们一起不分晴雨抓紧时间抢耕抢种，
每天早晨就下田干活，这样你的田地才能耕种完。
在春季耕种，夏季休耕的田地也不会使你的希望落空。
如果土质变得贫瘠，你就播种休耕地。
休耕地是生活的保障，孩子们的安慰。
为了获得粒大实满的谷物，
在刚开始给耕牛戴上颈轭，系上皮带，握住犁把，
手挥鞭子赶它们拉犁耕地时，
你就要向主神宙斯、神圣的德墨忒耳祈祷。
你在耕种时要吩咐一名奴隶带着锄头跟在后面，
用泥土盖住种子，以免鸟儿啄食。
因为管理得好是凡人的至善，反之则是凡人的极恶。

这个公元前6世纪的黑图彩绘陶杯出自由尼科斯提尼斯（Nicosthenes）经营的雅典陶器工场，描绘了古希腊的一些乡村生活。杯上分别刻画了耕地和狩猎的场面，有三个农人在套牛耕地、一个农人在播种。在较远的高地上，猎人在捕猎。



为了对人类消费土地产品（食物与酒）和动物（为农作物提供畜力与粪肥）肉奶的赞美与表示敬意。

再次，赫希俄德的《田功农时》讲述了一年四季的农业活动，也为农闲时候的集体休闲活动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参加宗教节日和竞赛，参加朋友们共同举行的宴会。但是他反对花费过多的时间在铁匠铺和娱乐场所闲聊，即使是冬天也不宜如此。这清楚地反映了希腊城邦发达的宗教与社会性的历法是如何与农业年景紧密相连的（见第二章）。无论城邦的城市化演变到什么程度，所有希腊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众神对自己城邦农业生产的支持。人们懂得一年一度庄稼的生长和收割、家畜生命的周期循环模式，所有这一切使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繁衍、出生、成长和死亡这些更复杂的社会模式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个更大的一般秩序。

对当时的希腊人而言，努力工作（ponos）并未受到必要的重视，相反被认为是宙斯强加给他们的。赫希俄德和梭伦等许多人也认为劳动，尤其是在田地上劳动，能够带来正义和更持久的昌盛，胜过用更卑鄙的手段获得财富——过量的财富和过度的闲适带来剥削、傲慢和奢侈等重重危险。但是认为工作本身是一件好事，并能提升个人道德的观点并不常见，而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或在修道院的苦修传统中，工作就是向上帝祈祷。

土地、农业与劳动

耕作技术

在所有的希腊国家中，就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象征力量来说，土地始终是具有最高价值和地位的经济资产。在任何时候，对有争议的领土的争夺都是导致相邻城邦之间频繁爆发小规模战争的最常见的起因。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对此已有认识。在希罗多德叙述的公元前500年至前494年伊奥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战争中就有一个例子，伊奥尼亚人领袖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向希腊大陆诸国求援，极力劝说斯巴达国王克莱奥蒙尼斯（Cleomenes）“不要为了争夺那些贫瘠、狭小的少量土地而与你们的对手——美塞尼亚人、阿卡狄亚人、阿哥斯人，进行战争，不要与那些根本没有值得为之厮杀和牺牲的金银财富的人打仗”，相反，应该去征服整个亚洲（希罗多德：《历史》）。

在大多数国家中，大部分希腊人都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中的许多人首先是小农场主。假如我们记住这一点，即他们比起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农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向更富有的地主交纳钱财或向国家交纳税赋的负担，那么也可以把他们称为“农民”。他们是由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武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城邦，如雅典、厄基那或科林斯，农业也具有突出的地位。

然而，许多可耕土地恐怕大部分属于有产富人。一方面，土地占有状况相对稳定，农民公民也相对独立——这一点在民主的雅典最为明显，在许多其他城邦也是如此（包括在公元前5世纪的那些推行民主制的雅典同盟国），但可能逊于雅典。另一方面，在许多较小的城邦中，仅能糊口的农民继续面临陷入严重债务或受债务逼迫的艰难困境。在那里，负债的农民或多或少地向债主缴纳粮食或为他

（右页图）捕鱼与吃鱼在经济生活和日常饮食中的意义也许极其有限，却具有相当大的社会意义，它是制作多种菜肴和烹饪趣味的主要来源。由于鲜鱼的价格浮动相当大，能否常用鱼类待客就成了财富的一个重要标志。鱼的价格也常常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此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宴饮和烹饪的雅典喜剧以及其余文献都充分论及各种鱼类和讲究吃鱼的人。在这个出自意大利南部的红图彩绘调酒碗上，较为罕见地描绘了一个鱼摊。白发的鱼贩在为一个满脸胡须、掏钱买鱼的顾客切开一条大鱼。

们劳动。从公元前4世纪起，这些人日益倾向于支持民主政治家或那些允诺重分田地、取消债务、渴望成为僭主的人。

我们对古希腊耕种技术的描绘变得越来越复杂（见第二章）。例如，从田野考古勘测以及从经济人类学和古植物学中获得的新证据表明，人们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多种方式使大量土地得到精耕细作。所采用的不同耕作方法中包括不同形式的翻地，谷物和豆类的轮种，在一块地上同时种植多种庄稼，在国内各地购买许



橄榄文化

橄榄种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地中海农业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橄榄给人们提供了食物，人们用橄榄油烹饪、调味、点油灯。运动员参加训练前在身上涂抹橄榄油以防灰尘。运动员或其他人在洗浴时还将它作为肥皂用（然后用一种特殊的器具——刮身板将其刮掉）。阿提卡的地形和气候非常适宜种植橄榄树，梭伦制定了许多法律（约公元前590年）鼓励和规划橄榄树的种植。很明显他阻止其他农产品的出口而鼓励橄榄油出口，他还立法阻止农民将橄榄树种得太靠近田边，以免根须破坏邻人的土地。橄榄树要生长6年才开始结果，15年后才进入丰产期，但可以存活数百年。但即便是成熟的树，其产量也有大小年之分。因此，种植一小片橄榄树林意味着一笔较长期的投资。橄榄树成为雅典的一个主要特征，其表现之一就是泛雅典娜运动会上竞赛的奖品是造型特别的"泛雅典娜节双耳花瓶"，里面装着价值不菲的橄榄油。



正如这个由画匠安提米尼斯绘制的阿提卡黑图彩绘双耳花瓶上所描绘的那样，在农作年后期，收获橄榄是一个缓慢和细致的劳动过程。从画上无法确定这些劳动者到底是奴隶还是自由民。

这是装满橄榄油的"泛雅典娜节双耳花瓶"，用作运动会颁发的奖品。在黑图彩绘陶已经普遍让位于红图彩绘陶之后（见第十章），其标准、传统形式持续了几个世纪，仍保持着黑图彩陶的风格。它们一般如图所示，一边是雅典娜，站在圆柱上的斗鸡（强大竞争力的象征）为其助威；在另一边则是竞技比赛或训练的场景。

多小农场。这样，在保持“地中海三大农作物”——谷物、橄榄树、葡萄的同时，通过尽可能多样化地种植庄稼、蔬菜和水果，农民们聪明地学会了分摊风险，使市场效益最大化。也有证据显示农民们垒筑梯田，通过放养和役使牲畜（它们既可用来劳动、为田地提供粪肥，又能为人们提供食物，有时还能提供毛皮），大量发展小规模的“农、牧结合”的农场。



在农业与家畜饲养业兼而有之的农场，大多数情况下猪的数量可能不多，但它们却是家畜饲养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为人们提供了肉食，又为土地提供粪肥。它们常常被用于祭祀，如特别是被用于祭献女神德墨忒耳。尽管陶瓶上往往并不描绘猪，但在这个阿提卡红图彩绘瓶画中，一头成年猪和一头小猪跟随着两个农民，也许是要被带到集市上出售。

农业劳动力

雅典以及其他重要国家，如科林斯、开俄斯，可能拥有大量的奴隶（主要是非希腊人）——尽管那些仅存的古代数据完全不可信：阿提卡有400,000奴隶，厄基纳有470,000奴隶，科林斯有460,000奴隶。这些数字意味着这些国家拥有难以置信的高密度人口（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国家曾对奴隶进行过人口普查，但各个国家的确为了军事目的，对诸如公民或外邦人的人数做过统计）。在有些国家当中，常住的依附希腊人口是主要的农业劳动力，他们通常是在相对较大、浅耕粗作的农场上劳动。斯巴达的希洛特人、帖撒利的佩内斯太人或克里特岛阿菲泰罗人都是这种农奴类型的劳动者的范例。

在其他国家，大量所谓的自由农民仍然以收益分成的形式或者其他类似的形式受制于大地产主。梭伦改革在雅典废除了这些依附关系（见第四章）。在一些岛屿国家中，如开俄斯、科福岛（后被称做科西拉），许多富裕的公民似乎已经经营由奴隶管理的大庄园，从事混合型农业，出口高质量的葡萄酒。

雅典农业奴隶制的情况还无法确知，因为缺乏直接的证据。但是许多可耕地似乎可能由富人掌控，并分成不同的单位加以经营。有时他们也许将土地出租给佃农，但在所有田地上都会使用一些奴隶劳动。许多混种的较小田产可能由能够担任重装步兵的公民精耕细作，有一个或几个奴隶帮手（据说重装步兵在服役时一般有自己的奴仆随从陪伴）。但是对劳动力的安排必须考虑到许多农业活动过程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别是葡萄栽培与酿酒，以及阿提卡特别著名的橄榄种植。

雇佣级是梭伦划分的四类公民（见第92页）中的最低一级，他们是较穷困的独立的雅典人。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拥有小块田产以及是否使用奴隶，始终是个疑问。在经济较为繁盛或衰退时期，这一情况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奴隶的价格也会有很大的波动，战争胜利后奴隶的价格会低得出奇。总之，奴隶制或农奴制在大多数已知国家——不仅在希腊民主政治的典范城邦雅典，也在它的最主要敌人和

奴隶主克菲索多鲁斯

公元前415年，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的灾难性事件之前不久（见第73页和第154页），在一场重大的政治、宗教诽谤案中，许多著名的雅典人士和侨居的外邦人被指控亵渎厄琉西斯秘仪（即祭献德墨忒耳和佩尔塞福涅的一种原始仪式），并阴谋污损雅典人住宅外面的许多赫尔墨斯小神像。接下来的几年中，那些被认为有罪的人的财产被相应的雅典行政官员拍卖，这些官员被称为"公卖者"。

雅典广场东南部发现的大量碑文碎块（阿提卡石碑）记载着这些交易。以下摘录的内容，记录了居住在派里厄斯（此人还被证实可能是个喜剧诗人）的一个名叫克菲索多鲁斯的外邦人用德拉克马购买奴隶的价格。他至少有16个奴隶，这些名单上的其他人至少有7到8个奴隶。

居住在派里厄斯的外邦人克菲索多鲁斯的财产：

（价格）	（特征）
165	色雷斯妇女
135	色雷斯妇女
170	色雷斯男子
240	叙利亚男子
105	开利亚男子
161	伊利里亚男子
220	色雷斯妇女
115	色雷斯男子
144	西徐亚男子
125	伊利里亚男子
153	科尔启斯男子
174	开利亚男孩
72	开利亚儿童
301	叙利亚男子
151	米利特奈男子(也许在卡帕多客亚)
85	吕底亚妇女



如图所示，雅典陶瓶上常画有女奴。她们的脖子、手臂和腿上带有装饰性的文身。这些文身表明她们的"蛮族"血统，尤其是色雷斯人。文身和烙印还是对逃跑的奴隶（不论性别）施加的处罚，也成了他们不能被信任的永恒印记。

对手斯巴达——的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手工制造业与交换

虽然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思想一直具有影响力，但希腊生产的多样性以及只有从非希腊社会才能获得所需商品的意识，导致了复杂的交换形式的产生。剩余农产品被用来交换进口必需品，如金属制品。在歉收的年头，希腊城邦会进口作为主食的谷物。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一个正在发展的奢侈品、工艺品或更多种类的特殊主食品市场日益繁荣，是刺激地中海两岸多种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希腊进口的多项物品中，常有一些来自东方，包括从俄罗斯南部进口的小麦（优于本地产的大麦）、腓尼基或开俄斯的酒（比当地产的酒更受欢迎）和其他的食品、香料、药物、香水或衣物。陶器作为普通容器进出口；精致的彩绘罐（和那些更珍贵的金银器一样）主要用于展示和聚会，比如宴饮（symposia）。陶器由于其经久耐用性越来越成为我们掌握的最主要的历史证物，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它是最重要的商品。

贸易、钱币和银行业

从公元前6世纪早期开始，铸币的传入使得希腊世界的交换更容易进行，但是铸币逐步得到发展的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用贵金属（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铸成标准化的硬币，两面印上标记，取代人们所认可的以这些金属的重量进行计量的方法，这种想法可能来自与伊奥尼亚接壤的吕底亚人的近东王国。铸币的一



这个黑图彩绘花瓶清晰地说明古风时代货物交换的复杂性。它是约公元前560年在拉哥尼亚制作的，但是和希腊幸存下来的众多彩陶一样，发现于埃特鲁里亚。画中描述的是位于利比亚的希腊殖民地塞勒尼的国王阿塞希拉斯（Arcesilas）（瓶上已标明）（也许是阿塞希拉斯二世）。国王在画中置身于奇异的环境中：他坐在遮篷下的凳子上，由一只猴子、一群驯养的鸟、一只豹和一只鹤陪护，正在监督吉莱尼的一种主要农作物的称量，大概是为了出口（见第43页）——虽然并不清楚该农产品是羊毛还是塞勒尼著名的特产、珍贵的植物希尔菲昂（silphion，现已绝迹，也许像阿魏[1]），这种植物用处很多，可用作烹饪、药物，比如避孕药。

[1] 一种植物树脂，曾被用作镇痉药。——译者注

(上图)在大约公元前530年,位于阿提卡附近海湾中的小岛厄基纳,开始铸造硬币,这是最早铸币的地区之一。如图所示,对于一个主要凭借海洋贸易而繁荣的小岛来说,他们很自然地将海龟作为标准印记,铸在硬币的正面。也可能是由于公元前457年雅典征服了该岛,并将之纳入雅典同盟,硬币上的标记因此改为乌龟。

(下图)公元前7世纪铁拉[1]人来到利比亚、建立城市塞勒尼。此后该城逐渐繁荣(见第43、第193页),并与该地区的其他希腊殖民地结盟。他们所引以自豪的两大标记(如图所示):一是被希腊殖民者认定为宙斯的当地主神阿蒙(Ammon,见第183页),据说他在沙漠中的锡瓦绿洲有一道著名的神谕。另一个标记是具有多种用途的植物希尔菲昂。

系列功能也许经历过几个阶段的演化。作为钱币流通的功能意味着人们认可了使这些象征物具有法律效力的人的权威。公民政府在城邦中日渐增大的权力在币制中明显得到反映。起初,一个城邦中所使用的硬币上的符号纷繁多样(也许反映了几大贵族家族各自掌控某种权力),后来发展为相对稳定、易于辨认、代表城邦的符号。例如,雅典铸币上的雅典娜和猫头鹰、厄基纳货币上的龟壳图案、塞勒尼货币上的一种植物希尔菲昂的图案。创作这些标记的目的最初也许是为了方便城邦之间的经济往来,如征收土地税、港口税或支付雇佣军的费用。

然而,有一套确定的币制最终必然使商人获利,也为紧接其后的公元前5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如海事贷款的兴起。富人借此发放高利贷,为商人的生意活动提供资金和保障。作为一种促进不同国家所使用的难以数计的币种之间的兑换方式,它也引起了货币兑换业和银行业的产生。保持一套独立的币制始终是一个城邦力量的有力象征。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当雅典试图在整个帝国强行推行它自己的币制和度量衡制,以使交换合理化的时候,雅典帝国的许多附属成员国表示抵制,这一点便是证明。

除了银钱兑换,银行家们还吸收存款,提供资金借贷。贸易额因此迅速上升。由于国家引入更小的度量衡单位,繁荣了集市(位于城乡宗教、竞技、公民集会的中心之地)的零售市场,从而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有几位幸运的商人获得了巨额利润,如厄基纳的索斯特拉托斯(Sostratus)和萨摩斯岛的科莱奥斯(Colaeus)。但是大部分商人似乎仍然是小规模经营者,通常只有一条船,在政治上无足轻重。

在雅典,也许在众多其他城市也是这样,大多数商人不是公民,而是外邦侨民或没有居住权的外国人,因此他们不能拥有土地和房屋。外邦侨民,包括自由民,只能作为佃农耕种土地,必须向公民租房居住。这就造成农耕和贸易这两大经济之间的巨大鸿沟,因为外邦侨民不拥有土地,所以不能以土地作为抵押,借钱来开发其他的经济收益。在贸易和银行领域,奴隶和被释奴隶常与他们的主人并肩劳动,并经常被委以重任,独立经营。

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法律体系中针对商业案件设立了一条特殊法规,目的显然在于加快这些案件的审理。在这类案件中,外国人受到与公民同等的待遇。也仅在此类案件中,奴隶才可以免遭拷打,以自由人的方式向法庭提供证据。

交通网

农产品、原材料和工业品的交换要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家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

(1) 爱琴海中的一座岛屿,现名为山托里尼岛,曾遭受火山喷发灾害,现为希腊著名的旅游与休假圣地。——译者注

都必须更新。总的来说，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要便宜得多。当然要配套建设港口和拖运的道路。最为著名也最重要的是公元前600年由僭主佩里安德（Periander）铺设的横贯科林斯地峡的道路。路面上开有凹槽，以便车辆的行驶，并使船只和货物能从一个海湾进入另一个海湾。在整个古风时代和早期古典时代，陆地上已形成由车道、驴道和具有重要经济、军事作用的远程道路构成的交通网。然而，当时的山路并不适于有轮子的车辆行使。据某些记载说，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之一希帕科斯在他们的父亲死后与其兄分享雅典的僭主政权（公元前527～前510年）。据说他曾经着重强调综合利用国内建成的道路网；在城市和每个德莫(位于乡间的村落①)之间的半路上树立一个“赫尔墨”（一尊方形的赫尔墨斯像，该神掌管旅行与交换）。这些像仅仅突出脸部和阴茎（赫尔墨斯与人类的繁衍有关）。在石像的“身体”部位则刻着铭文，告诉路人他们正处在哪两个德莫之间，并给他们一些道德训谕，如“过路，要打定主意。”

这是早期红图彩绘大师爱比克泰德(Epiktetos)制作的精美杯子。图上描绘着一个年轻的雕刻家正对一个木质赫尔墨斯像进行最后加工。这是典型的雅典风格的赫尔墨斯神小雕像。这些雕像被置于私宅的门口和圣殿内，也当做道路系统的标记。像许多这类图像一样，这个例子描绘的是一个木质赫尔墨斯像。石刻的赫尔墨斯像也许是富有家庭的标志。在公元前415年西西里远征军起航前发生的那场著名的诽谤案中，被有意损坏的就是这类石像。这一形象上绘有铭文“英俊的希帕科斯”，也许指的是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但是，阴茎勃起的成年赫尔墨斯像被夹在没有胡须、头戴花环的年轻人的两个大腿之间，这一位置不禁让人产生联想，使它看起来又像是赞成鸡奸者的典型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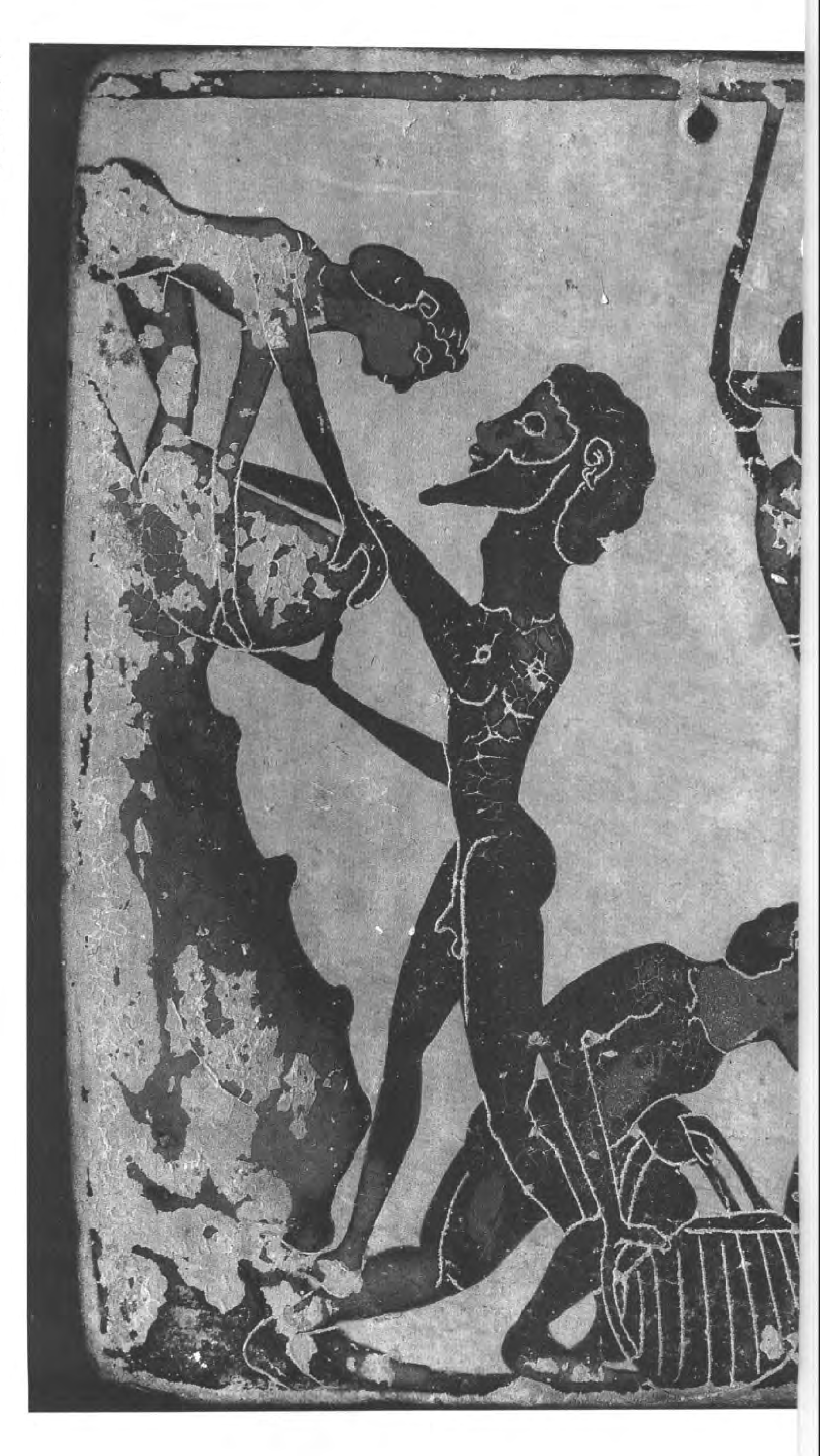
采石业和采矿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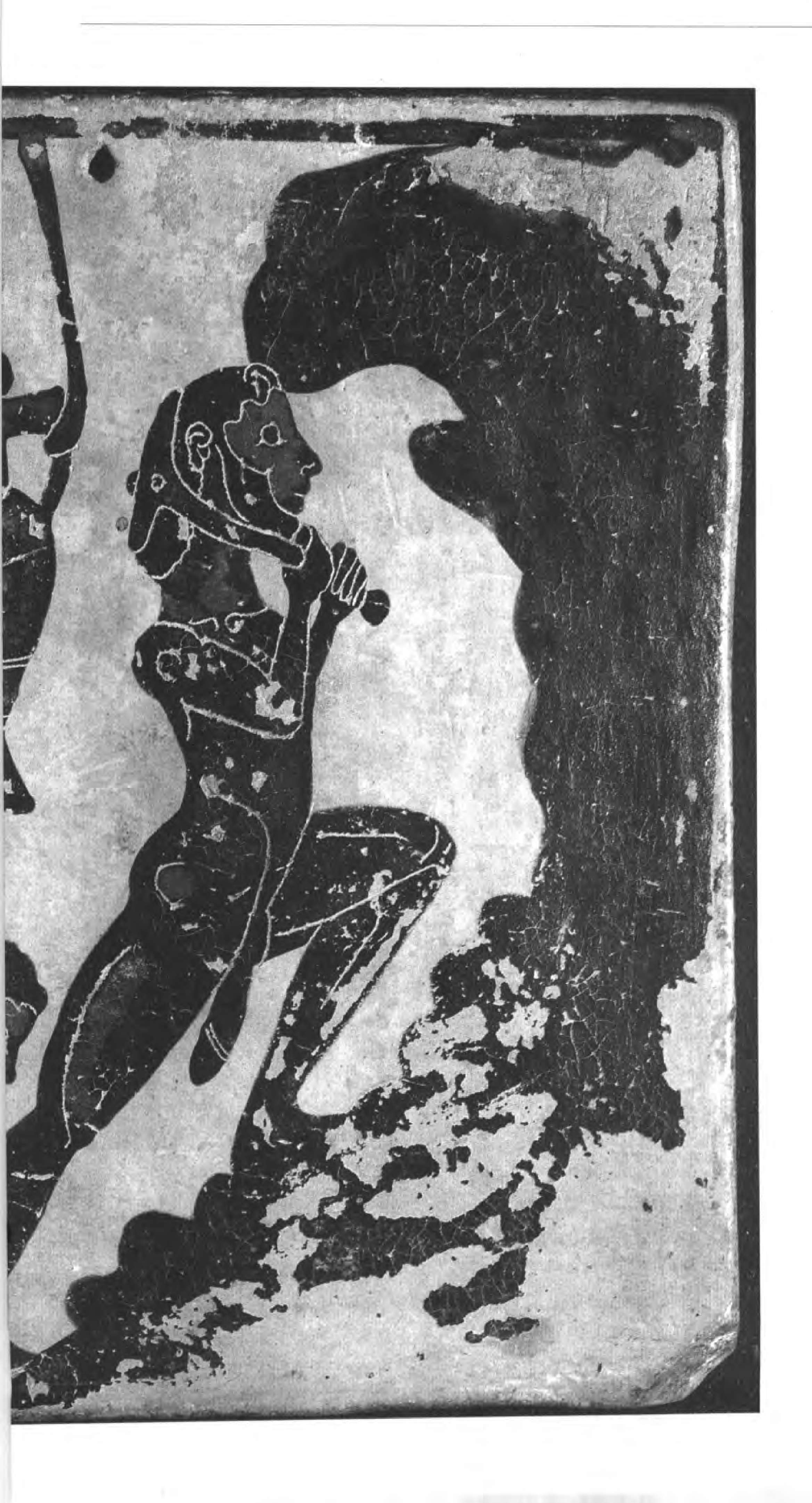
某些城邦发现两种储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两种相关产业——采石业和采矿业便应运而生，并导致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各国一般采用当地出产的石灰岩建造大多数房屋，但一些高质量的大理石由于产量有限而被用于建造庙宇、雕刻石像或铭文。开采与运送大量粗加工的雕像或大理石块是一种非经常性的经济活动，它们通常出自诸如纳克索斯、帕罗斯、开俄斯或塔索斯等爱琴海岛屿或阿提卡的潘特里康与希迈托斯的矿场。这给那些拥有奴隶石匠的奴隶主（其中许多可能为外邦人）或拥有马车、牛和奴隶的农场主带来不定量的收入。在建筑高峰期，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雅典的建设项目中，这类活动就相当多，包括为运送石头的马车新修道路和修缮旧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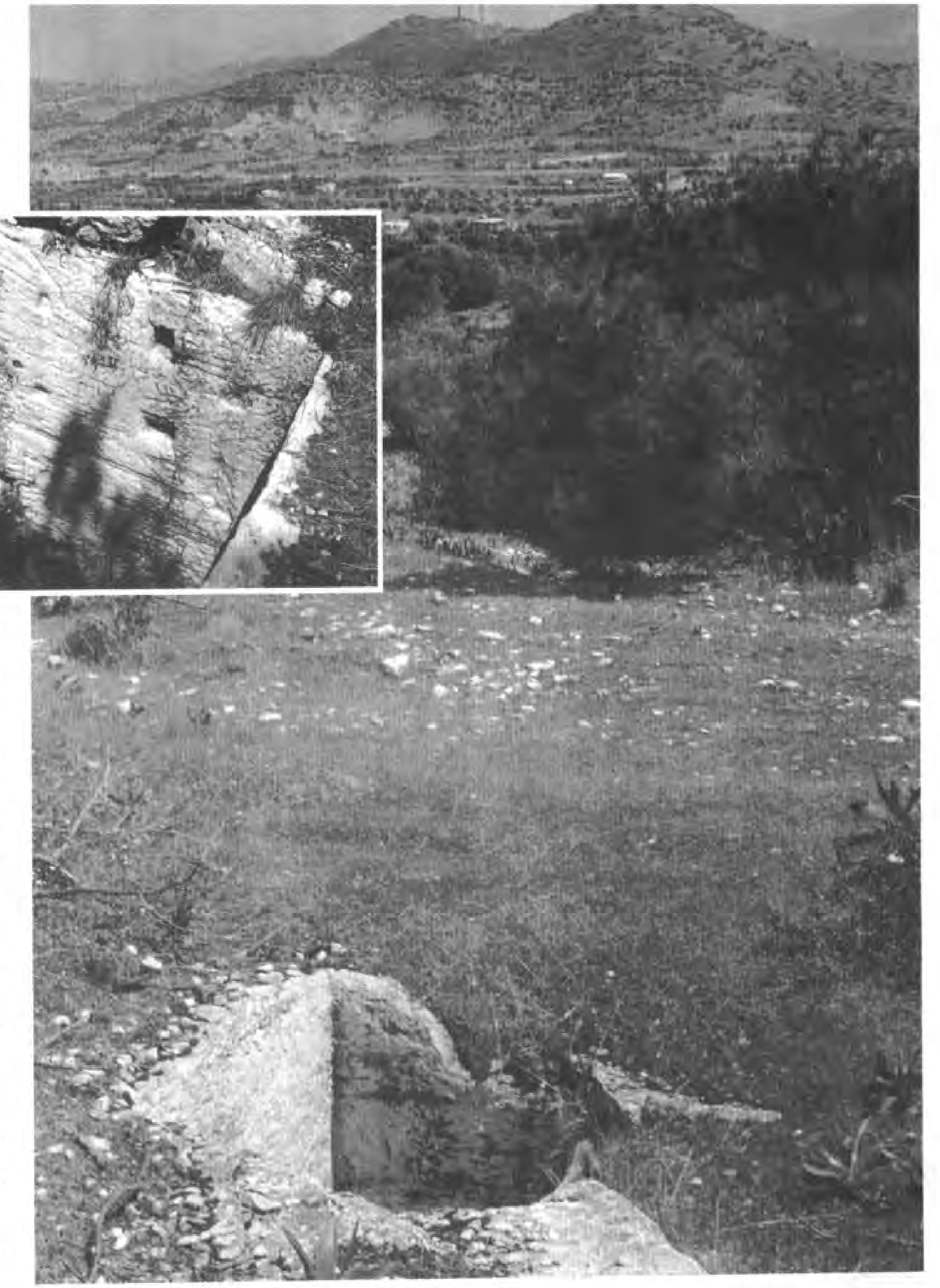
对发现矿藏的地区来说，以金银为主的采矿业是最具经济效益的——最显著

① 德莫是雅典的基本行政单位，也包括市区德莫。——译者注

在科林斯陶器工匠居住区旁的一个神殿内，供奉着许多小陶板。在这块板上描绘的是，工人们正在矿坑中开采陶土，食物被放在篮子里吊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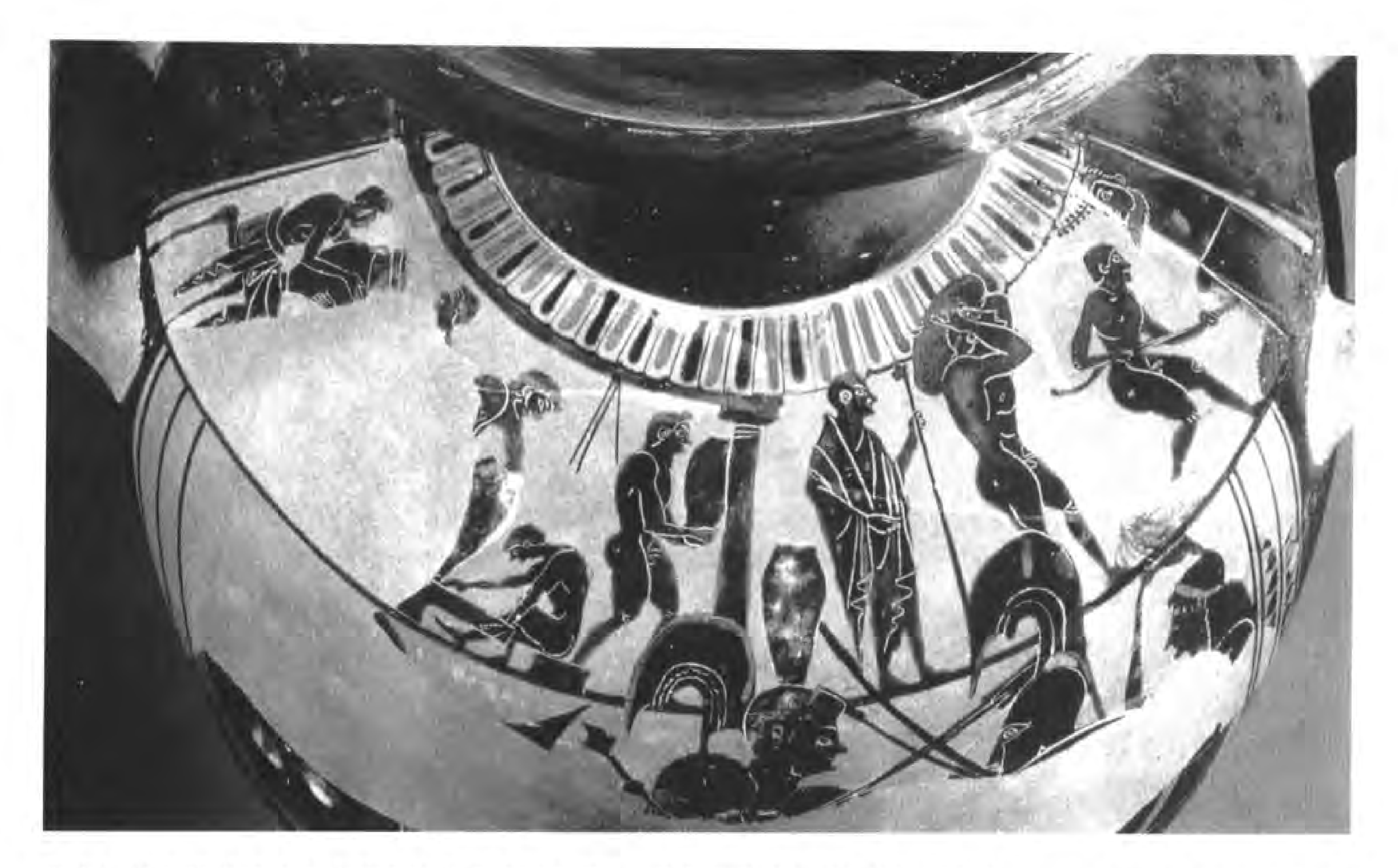


这是一幅面向托里科斯德莫的一个方形矿井的俯视图。托里科斯剧场在山脚下依稀可见。该德莫位于劳里昂银矿区内。这个地区的银矿也许早在公元前1000年间就得到了开采。公元前483年达到开采高峰，所获银两用来资助雅典舰队，使之在公元前480年的撒拉米海战中击败了波斯军队。雅典银币用劳里昂的银锭铸成，流通于整个古典时代，直到罗马时期。马其顿的潘盖库姆金银矿参与竞争，导致劳里昂银矿的衰落。大约在公元元年初时，劳里昂银矿最终被开采殆尽，只留下了空空的矿井。

（附图）托里科斯附近的一个矿井。在坚硬的岩石上整齐地凿出一个长方形矿洞。石壁上的小洞用来架设梯子或类似的东西，以便采矿的奴隶进出矿井。奴隶矿工的劳动条件异常艰苦。坑道狭窄幽暗，仅靠散发着烟雾的油灯照明，使空气一片污浊。他们实行每班十小时的工作制，干完十小时后休息十小时。最强壮的男子持镐在采掘面上工作。身体较弱的男子和男孩将矿砂运出矿井。女人和老人淘筛矿石。

的地区是位于阿提卡南部的劳里昂地区、希夫诺斯和色雷斯的潘盖昂地区（只是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开始，这里才被马其顿国王充分开采）。所有人都能从采矿业中获得丰厚利润，只有那些在矿坑中劳作并常常在那里丧命的奴隶除外。

在劳里昂银矿，国家声称这些矿产的最终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特许个人（几乎全是公民）三年或十年的开采租赁期。开采者可持有或出售由他们购买或雇用的奴隶开采的矿银。他们也许还不得不向这片土地的原所有者付钱，这些土地所有者可能事先已经开凿出了采掘井和通风井。事实上，许多矿主在获得矿区时，这些矿区就已经具有良好的人矿通道。在劳里昂地区挖掘时发现了许多地下矿井和坑道、众多淘砂处以及坚固的塔楼（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塔楼，如在塔索斯



岛上)。这些塔楼或许意味着当地农民感到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保障，他们对在这些条件恶劣的矿场中所雇用的大量奴隶感到忧虑。在采掘高峰期，这个地区有几十万人受雇采矿。显然，以上我们提到的矿区拥有数量最多的奴隶。据说位居榜首的是尼西阿斯（Nicias），他曾雇用1000名奴隶去开采银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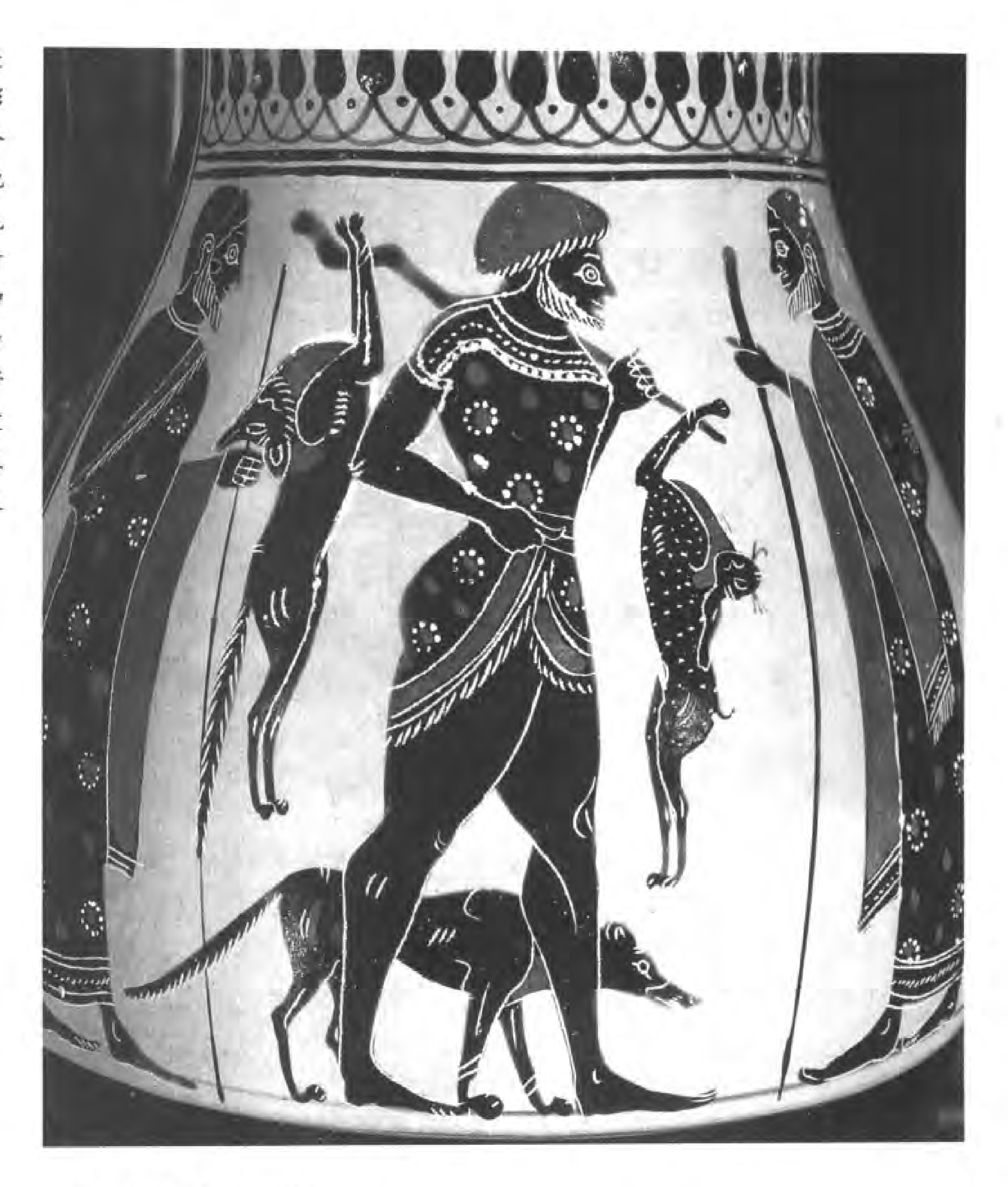
这件黑图彩绘贮水器皿制于公元前520年至510年间，十分详细地描绘了一个陶器作坊的具体情况。左侧一个男孩在传递一个已经完工的精致双耳细颈椭圆陶罐，这是该作坊（名为"黎哥罗斯群组"）独家生产的器型。一个陶工即将完成一个巨大的储藏罐（广口陶坛），因为一个男孩已经将它放在陶轮上旋转。其余的罐子被拿出去烧制或摆放在外面。炉火已经烧旺，炉工正在添加燃料。全面负责的显然是那个手持细拐杖的老人，他可能是作坊主。

手工业

冶金业和手工生产似乎需要规模较小、协作更紧密的劳动群体，例如我们发现这些行业里通常是工匠们带着几个奴隶一起劳动，制作雕塑和陶器。这类生产大多在小房子里进行而不是在工厂里，所以被称做家庭小作坊。这些房屋往往也是房主和奴隶们的住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手工业生产如同那些重装步兵级的农民们的农场一样，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家庭(oikos)的理想模式，但这里是手工业生产而不是农业生产。

纺织品生产主要由妇女在家中进行。在家中纺织羊毛或指导她们的女奴纺织是所有妻子最主要的家务劳动(见第五章)。较穷的家庭妇女也许得冒着名声受损的危险去田里参加户外劳动，或者开小店、摆摊位或租柜台出售丈夫生产的手工业产品。

然而，一些生产作坊会越开越大，如德摩斯提尼的父亲开的作坊(见第96页)。许多手工业奴隶在自己的店里或家里独立生活和生产，当然主要是指在雅典和派里厄斯城区的奴隶。人们专称他们为"分居"奴隶。事实上，许多奴隶和自由民也经商。



在这个由阿马西斯画匠于6世纪绘制的阿提卡黑图彩绘陶壶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满脸胡须的成年猎人带着他的猎狗和猎物——一只野兔和一只狐狸，正在向老人打听什么。打猎主要是富人的一种休闲活动，又被认为是可以为战争提供良好训练的活动。野兔是老人们馈赠自己所钟爱的青年伴侣时特别喜爱的上好礼物，公鸡也有相同的意义（见第205页）。

奴隶和劳动的思想

奴隶和农奴劳动在城邦经济中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对自由民各阶层的工作态度具有深刻、巨大的影响。大量奴隶的出现意味着许多有产阶级不需要雇用或剥削贫困的自由民。较贫穷的农民、手工业者和零售商都希望购买属于自己的奴隶。为了保持自由民或城邦公民（大多数是公民）的身份和尊严，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从事奴隶的工作——即直接或长期为别人的利益工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任何粗俗的手艺都不能算作高尚的事情，因为一个自由人的条件是不为别人的利益而过活。"（引自《修辞学》）

社会对工作及工作条件还有其他偏见。农民（无论是有闲的农民还是穷困的农民）大概都瞧不起手工业者，认为他们像女人和奴隶一样在户内劳动，空间狭小、环境危险。他们也鄙视商人，认为他们自己不生产，不种植，而只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在现金交易中欺骗别人。有闲阶级一向瞧不起比他们穷的人，但他们对那些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公民的嘲笑比对贫困农民更厉害。所有自由民虽然都拥

有自己的农场或作坊，但他们都非常担心自己有朝一日变为奴隶。自己不能支配自己，被迫接受别人的指挥，为别人劳动。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自由。这种担心的主要后果是自由雇佣劳动或有偿劳动一直非常有限，只有非常贫困的人才会受雇于他人。

休闲与社会和谐

财富对希腊人来说，本身并非生活的目标，而主要是享受闲暇的一种手段。自古以来，富有阶级沉溺于最惹人注目的消费，追逐时髦（引人羡慕），穿戴讲究，房屋装修气派，购买豪华的家具，铺张浪费地饮食、娱乐以及运动和赌博。但是，在许多希腊城邦（雅典和斯巴达照例为此提供了两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它们留下的证据最多），为了增强社会凝聚力，国家力求控制上层人士的这些活动，以防社会分裂的后果。

在斯巴达，公民平等的牢固信念几乎遮盖了隐匿在公餐制下的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①]（见第90页）。然而，社会却越来越无法与这种理想相适应，最后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在许多寡头制国家，贫富之间的鸿沟则似乎愈来愈明显，因而社会对立也日渐加深。

富人的消费

但是在雅典，或许在较小程度上也在其他民主制国家，许多普通公民（即陪审员，他们每年从6000名陪审团成员中抽签产生）控制的法律和法庭为穷人提供

①古代斯巴达禁止私人用餐，所有公民一律在公共食堂吃饭，否则要受到惩罚。据说这项制度开始于传说中的莱库古改革。——译者注

正如许多陶瓶的形状是为宴饮使用而设计的一样，宴饮场景是希腊瓶饰画匠最喜欢表现的主题之一。在陶瓶画师的这幅图中斜倚着的男客在饮酒，玩着“科塔波斯”游戏，即把杯中的葡萄酒沉淀物弹向目标，欣赏并注视着那个裸体吹笛者的演奏，一边欣赏着音乐。演奏者可能是雇用的奴隶，以供晚上消遣和进行性活动。



了某些有限的保护，以防止富人的欺凌和剥削。富人，尤其是钟爱政治的富人，可能觉得自己时常潇洒地站在法庭上，是正常参政过程的组成部分，也是精英阶层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的一种表现。如果他们能做到以下两点，那么他们在陪审团面前赢得胜诉的可能性就会增大：首先，他们不会因为生活奢侈而被控暴殄财富，如过分吃鱼、饮用好酒、坐豪华的马车出行、为情妇或男友滥花钱。其次，在社会捐献上，能够慷慨解囊、出手阔绰，也就是以现金和个人奉献，使战舰得以开动或者使国家的众多节庆得以举办。

这些沉重的经济义务给富人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负担，加剧了现金流转的困难，也使许多人因此一贫如洗。然而精英阶级中的许多人选择超出被要求的支付，以博得民主选举团体和陪审员团体的信任或"称许"。这些在普通人和有钱人之间的复杂利益安排有助于说服更多的上层人士参与或始终参与公共生活。这种社会捐献似乎常常能产生社会凝聚力和团体精神——普通公民也深深地卷入到这些军事和节日活动中，如担当三列桨舰的桨手，参加或观看节庆竞技比赛和宴会。当然，也有许多雅典富人很自然地对此愤愤不已，一些人试图抵制这一制度，他们将财富进行流动性投资，令人难以察觉。这样他们就能逃避社会捐献派给他们的份额，将钱用在奢侈享乐上。

向上层看齐

雅典人可能有些沉迷于表现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也许因为他们觉得这种奢华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触手可及的。通过休闲活动，他们发现社会可变性的一些机会，和在某些方面分享"上等生活"的机会。

由于公民共同体既要适应军事上的需要，需要训练有素的公民士兵，也由于在诸如泛雅典娜节之类大型节日中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竞技和音乐竞赛，大批普通公民和他们的儿子们便有机会进入体育场和角斗场，这些地方成为最主要的公众集聚地。对矢志于政治或富有智慧的公民来说，这些地方成为他们宣传政治主张和进行哲学讨论的论坛。柏拉图学园和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园都在这些运动场附近。许许多多的公民，有城里的有乡下的，也都赶来参加戏剧和诗歌竞赛中的伴唱和伴舞，这些竞赛成为城邦节日中（如城市狄奥尼索斯节）最重要的节目。

在这些文化活动中，最重大的盛事是在奥林匹亚、德尔斐等地举行的泛希腊运动会，或者是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就开始的演员和歌队在各国的巡回演出——胜者不仅可获得数额很高的奖金，而且名声大噪。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胜者获得终身在雅典市政厅免费吃饭的荣誉。此外，由于运动场里和竞技比赛中全是男性参加，带有某种对男性裸体的膜拜，促使希腊文化接受青年男子（或者并不年轻的男子）与男性青少年之间发展某种同性恋的关系。早在公元前6世纪，人们就认为所有男人无论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是绝对正常的，尤其在上层阶级中，男性一般要度过两个有明显差别的同性恋阶段：先是在青少年时作为"被爱的人"受到年轻的成年男子的追求，然后作为一个年轻的成年男子追求一个男孩或青年。这些人见面的主要社交场合就是运动场和训练场。

在这种情况下，在竞技场上（有时是在性爱上）获胜就可能就成为一些出身贫寒但天资聪慧的男子获得名声或进入上流社会的途径。上层社会开始抱怨出身

低微的运动员所取得的成功，埋怨运动越来越职业化，运动员的训练过于专业化。亚里士多德曾经引用公元前5世纪西蒙尼德斯的一句格言，赞誉奥林匹克长跑竞赛的一名获胜者：他以前肩背一只大筐，将鲜鱼从阿哥斯运送到特盖亚。后来的史料中提到的一件事可能不可信，有个叫格劳库斯（Glaucus）的人，据说是优卑亚岛上的卡里斯图斯的一个耕童，公元前520年在奥林匹克拳击赛中获胜，后来被僭主革隆（Gelon）（约公元前491～前478年在位）任命为西西里岛卡马里那地区的总督。

依照法律，妇女和奴隶被排除在体育场活动之外。然而，妇女在城邦的许多宗教节日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独立组织一些节日，如许多有关生殖的祭祀活动，向女神德墨忒耳和她的女儿佩尔塞福涅献祭（见第106～107页）以及城邦不允许举行的、更具颠覆性的节日，献祭英俊的男神阿多尼斯（Adonis）①。人们可能会猜想还有其他供女性休闲、只允许女性参加的组织活动，然而在被男性主宰的史料中，我们几乎难以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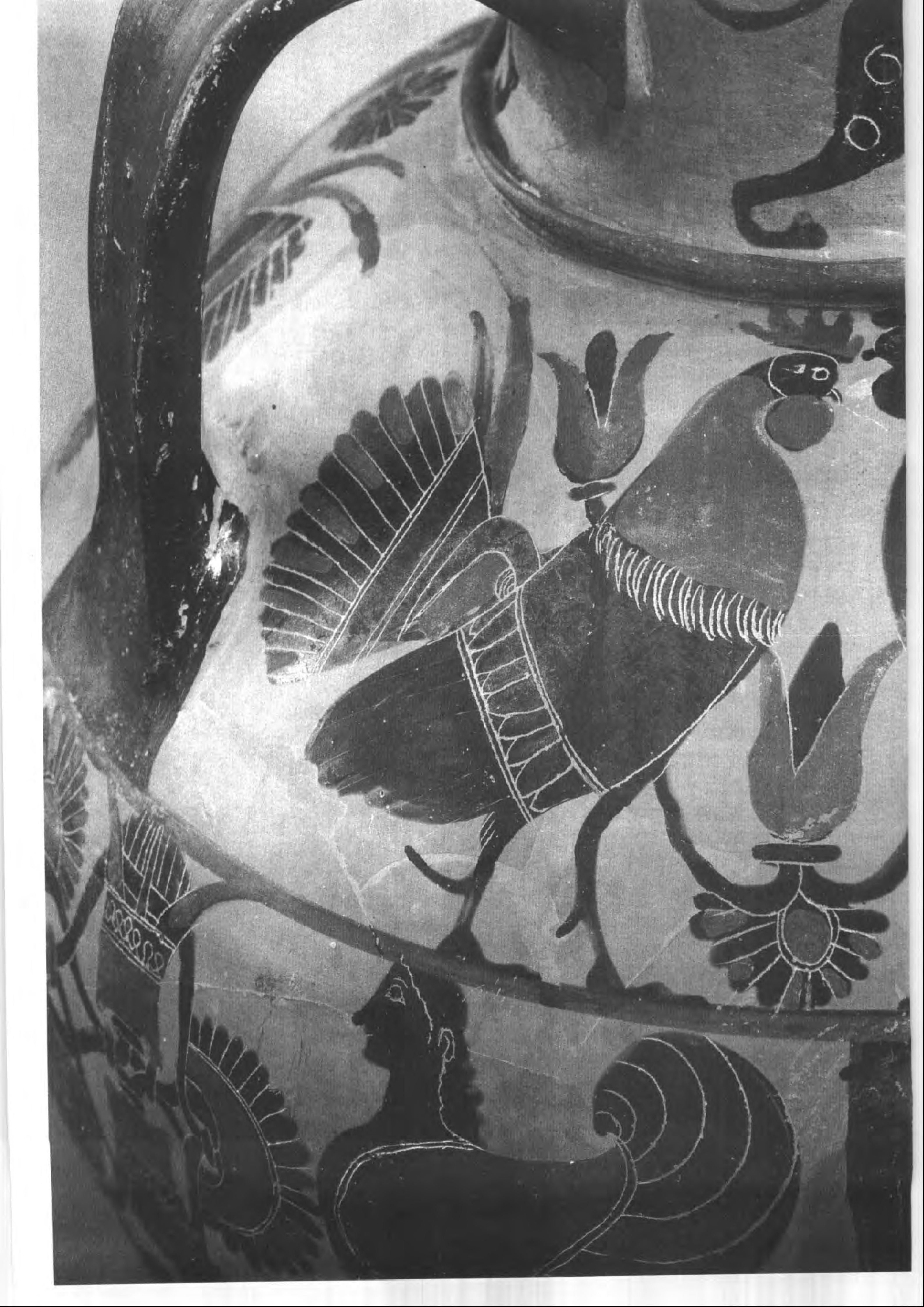
宴　饮

全希腊上流社会的典型夜生活是传统的酒宴，即宴饮，已形成了自身的形式结构：斜靠着长榻，向神奠酒，从一个公用调酒碗里倒掺水的酒喝等等；同时伴随着音乐欣赏，相互谈天说地和进行性活动等娱乐。有钱人晚上常常在自己的私宅中装潢漂亮的“男人屋”（andron）里用昂贵的鱼、酒和女人款待朋友，或是一群人醉醺醺地穿街过巷，再跑去参加别人家的宴会。这些友人在政治和法律争辩上彼此合作，因而组成政治“俱乐部”。他们似乎能够表现与民主价值观相对立的看法和行为，甚至形成寡头政治阴谋的中心。

然而，雅典和其他各地的许多普通公民都有充足的空闲和钱财在自己家中喝酒吃饭，至少偶尔为之。从公元前5世纪70年代以来，在港口小城派里厄斯，住宅底楼无一例外地设计了一个起居室。起居室房门的位置说明它是为了方便而摆放一系列斜靠沙发，也就是说，普通的雅典男子也有他的专用房间。这些普通的雅典人还在出售酒的商店或酒馆喝酒，这被称做kapelcia（被认为是“穷人的宴饮”）。所有雅典人都喜欢偶尔掷骰子赌博或参加斗鸡比赛——这种游戏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公鸡被认为是男子气概和男子力量强大的象征。在较为特殊的场合，中产的雅典人或许会模仿富人，组织较为正式的宴饮。旨在对宴饮表演人员（如女乐师）的费用加以限制的禁止奢侈的法规，对这类欲望会有所帮助。所有的公民都有机会分享许多公共宴会和酒会，有些是在诸如酒神节、花月节等城邦节庆的末尾，有些是在由这些公民所属的部落、德莫、胞族等更小、更地方化的群体所组织的节日上。还产生了许多自发的团体（其中典型的团体名为提亚索或奥尔格奥尼斯），经常吸纳公民和非公民参加，以民主管理的形式，打着向某位神或英雄献祭的旗号，举行宗教集会，同时效仿贵族宴饮，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

于是，借助于所有这些向大多数或全体公民开放的广泛的活动，他们赢得了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俊男孩，为爱神阿弗罗狄忒所喜爱，交给冥后佩尔塞福涅抚养。男孩长大后，冥后舍不得放弃，两位女神发生争执，最后由宙斯调解。阿多尼斯每年四个月在冥后处，四个月在爱神处，四个月自己自由生活。——译者注





在雅典，斗鸡是深受人们欢迎的游戏，雅典的各种艺术作品中会频繁地出现一对斗鸡，就像在这个黑图彩绘细颈双耳陶瓶的瓶肩上的一对斗鸡一样，竖着鸡冠，怒气冲冲，准备格斗。显然，各种年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喜欢观看这种游戏，但年轻人似乎尤其喜爱，特别是那些有钱又有空闲的年轻人。公鸡是一位恋人送给他的年轻男友的一件十分流行的礼物。确切地说，公鸡被人们看做有男性的冲动和性功能的象征。格斗可证明参赛的公鸡到底是一个真正有战斗力的雄性还是缺乏雄性气概的懦夫。

宴饮上的性活动

体面人家的妻女都禁止参加私人酒会（宴饮），这种酒会的后半段完全充满了色情、粗俗的情爱气氛。色诺芬曾经仿效柏拉图那篇更有名的《宴饮篇》，写了一篇描述苏格拉底参加的一次上流社会的哲人聚会作品。其中若干片断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如同阿里斯托芬的《马蜂》一剧所喜剧性地描述一个上流社会的聚会一样，有个粗俗的陪审员不习惯这种聚会的高雅而把酒会搅得一塌糊涂。绘画也表现出这些酒会中的色情狂欢。

在色诺芬的作品（也称做《宴饮篇》）中提到一个酒会，这是希腊首富之一卡里阿斯（Callias）为庆祝他的漂亮男友奥托里库斯（Autolycus）在泛雅典娜节上参加的所有角斗赛中获胜，而在派里厄斯的家中举办的。聚会中所谓"睿智"的讨论只是嬉笑着谈论爱的本性、异性恋的性活动，同性恋的性活动和一些哲学问题。也有其他的逗乐之法，一种是听食客们讲笑话。这些食客都以聪明诙谐闻名，常常不请自来，直接去有钱人家参加聚会。另一种是看一班职业表演者们表演节目，由一个来自叙拉古的经理人带着三个迷人的乐师或舞蹈演员，两女一男。这部分节目安排在酒会的尾声之时，受到色情场面刺激的客人们要么回家和妻子做爱，要么决定结婚。这些最后的说明似乎根本不合情理（因为在这座城里的酒会上就能找到性对象），或者多半是色诺芬对此所做的一个严厉的嘲讽。

讨论到此结束。奥托里库斯站起身去散步，因为到了他该散步的时间。他的父亲吕孔和他一起离开时，转过身来说："我以赫拉、苏格拉底的名义，觉得你是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然后架起一个神座，那个叙拉古人坐上去说："先生们，阿里亚德娜[1]现在进入她和狄奥尼索斯的新房。狄奥尼索斯也将进来，在与众神一起喝酒之后，他来会她，然后他们将相互取乐。"

风笛艺人吹奏出一曲"狄奥尼索斯之歌"，以模仿狄奥尼索斯神和阿里亚德娜的"洞房之夜"。当客人们看到英俊的"狄奥尼索斯"和美丽的"阿里亚德娜"不再嬉戏，而真的开始接吻时，他们热血沸腾……艺人们似乎并未真正做什么，但是看起来他们最后可以做他们早就想做的事…… 最后，当酒兴正酣的客人们看到他们拥抱在一起、显然要上床的样子的时候，那些单身汉们发誓要结婚，已经结婚的男子骑上马飞奔回家找他们的妻子去做他们想做的事。苏格拉底和那些仍呆在那里的人同卡里阿斯一起出发，加入吕孔和他儿子的散步。酒宴至此结束。

引自《宴饮篇》

在阿里斯托芬的《马蜂》中，那个滑稽可笑的主角——一个老陪审员菲罗克勒翁——他儿子"治愈"了他对陪审的痴迷，鼓励他去参加一个上流酒会。他在那里的活动先是由他的一个奴隶讲了出来，然后由他自己讲述给那个跟他一起离开酒会的女乐手或妓女。

克珊提阿斯：
难道那老头子不是最恶毒的害人虫，
宾客中的大醉鬼吗？
在座的还有希皮罗斯、安提丰、吕孔、吕西斯特拉托斯、忒俄佛拉托斯、佛律尼科斯和他的朋友们，
迄今为止，在所有的宾客中，要数这老头子最傲慢了。
他吃饱了美味佳肴，
就蹦蹦跳跳，一边放屁一边笑，
活像一头吃饱了大麦的毛驴，
他使劲打我，叫我"小厮，小厮！"
……
他这样挨个侮辱客人，
开的是庸俗的玩笑，讲的是粗鄙的故事，
一点也不合时宜。
后来，他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来，
沿途逢人便打。

菲罗克勒翁：
上这里来，我的小金龟子！
拿住这根索子。
拿住！要当心，这索子有些朽，

(1) 传说是克里特岛上米诺斯王国的公主。据说在米诺斯的迷宫中住着一个牛头怪，每年要吃14个雅典的童男童女。后来雅典王子特修斯自告奋勇，来到米诺斯，决心消灭牛头怪。阿里亚德娜一见到特修斯就爱上他，她告诉特修斯消灭牛头怪的秘诀，还给了他一团红线帮助特修斯杀死牛头怪，走出了迷宫。特修斯回来时带走了阿里亚德娜。但在那克索斯岛，特修斯抛下阿里亚德娜。后来，阿里亚德娜成为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司和妻子。





却还经得起摩擦。
你看，正当酒友们要玩弄你的时候，
我多么巧妙地把你偷了出来。
因此你应当向我报恩。
可是，我知道，你不但不报答，不接手，
反而想欺骗我，讥笑我，
你曾经对许多别的老头子这样干过。

（上图）许多阿提卡陶瓶都喜欢描述直接的性爱活动场面，通常认为是发生在酒宴的最后，可能是在异性之间，也可能在同性之间。有一对一的，也有集体的，但要估计男性的性幻想的程度恐怕并不容易。

友谊，获得了支持，也取得了新的社会身份。在人们共同参与的这类活动中，有许多具有相当高的知识含量（如许多音乐竞赛以及通常具有挑战性的、极其动人的戏剧）。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尽管许多公民或许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足以认读名单上人的名字或签订合同，但他们参与我们所称的雅典文学活动则主要是通过观看演出、聆听吟诵。雅典始终具有源远流长的口头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甚至作为便捷的教化形式得到传播。有读书习惯的人其实微不足道。其他形式的社会娱乐则没有那么多的文化味儿，比如运动、赌博、饮酒及相关的晚会嬉戏。但是它们都有助于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因为公民大众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带有原先只属于贵族的上等生活的内容。

第九章 文学与演出

有背景的竞争性表演

公元前330年，雅典最伟大的演说家德摩斯提尼面对五百多位同胞公民组成的陪审团和数百（也许有数千）听众，驳斥他的政治对手埃斯奇尼斯对他的品格、政治主张和政绩发动的言辞激烈的攻击。埃斯奇尼斯曾是一位职业演员，在对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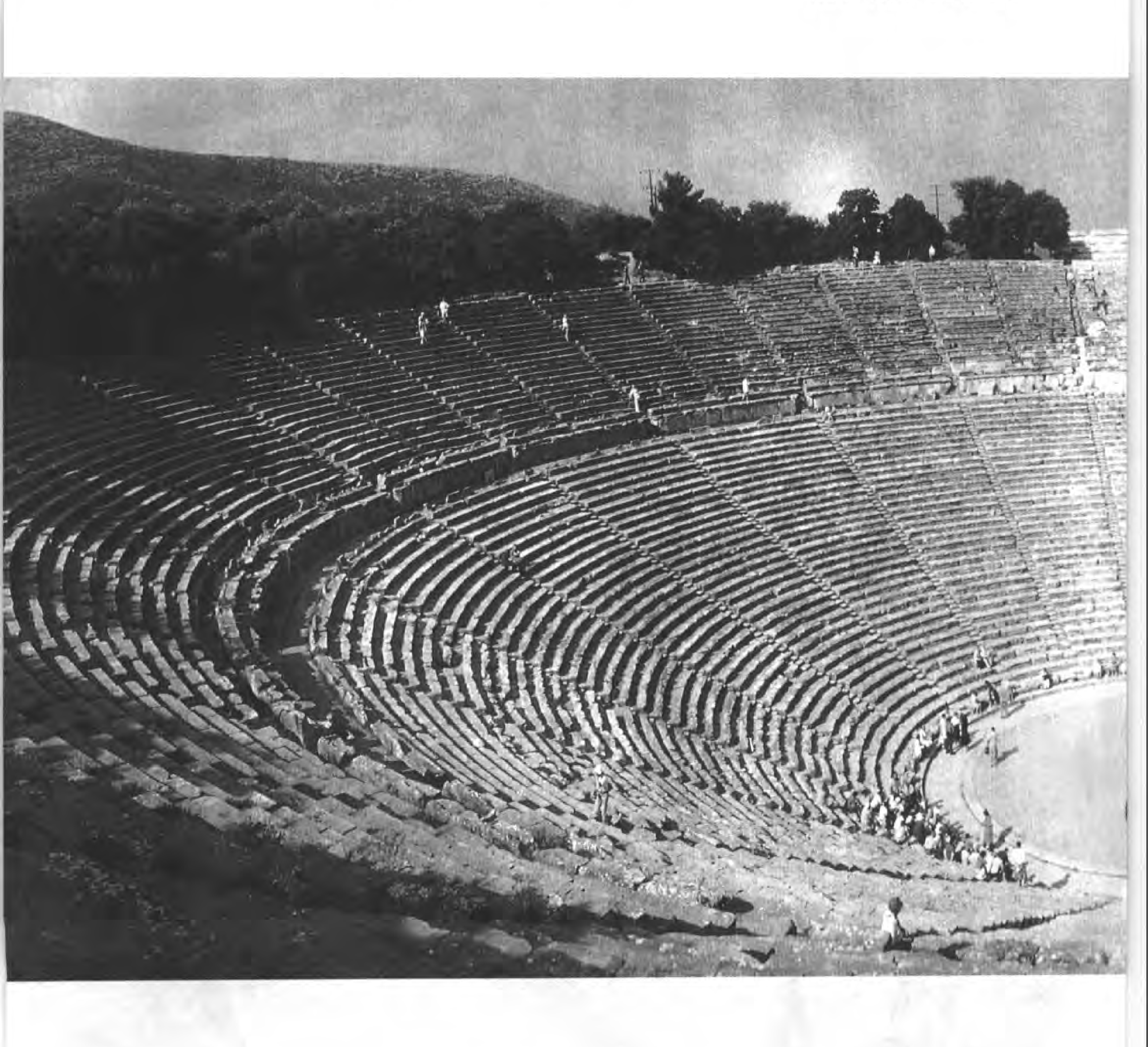
希腊拳击比赛可能异常残忍。古代的作家描述了受伤的拳击手的情形。拳头通常击在头部而不是身体的其他部位。比赛一直持续到其中一方被打倒在地或举起食指承认对方的胜利。在这个黑图彩绘双耳陶瓶上，裁判员站在拳击手的身后，手中拿着鞭子，等待着在需要的时候，宣布取消比赛资格。



剧的必要铺陈中学到了语言艺术。现在他将他的伶牙俐齿用在了他的政治生活中，反对德摩斯提尼要求授予他荣誉的桂冠，以表彰他为公众所做的奉献。埃斯奇尼斯的反对理由之一是德摩斯提尼的声誉不能与过去已经去世的领导人相提并论。德摩斯提尼发表了一篇令人难忘的演说：

你评价一个活着的人应该将他与其他活着的人，即他的同时代人相比较——正如你评价戏剧诗人、歌队和运动员那样。斐拉蒙（Philammon）并没有因为不如卡里斯图斯的格劳孔(Glaucus)或其他昔日的冠军而一无所获地离开奥林匹亚。他获得桂冠、成为公认的胜利者是因为他战胜了所有与他比赛的对手。同样，你也应该将我和现在的演说家相比。

（德摩斯提尼《论桂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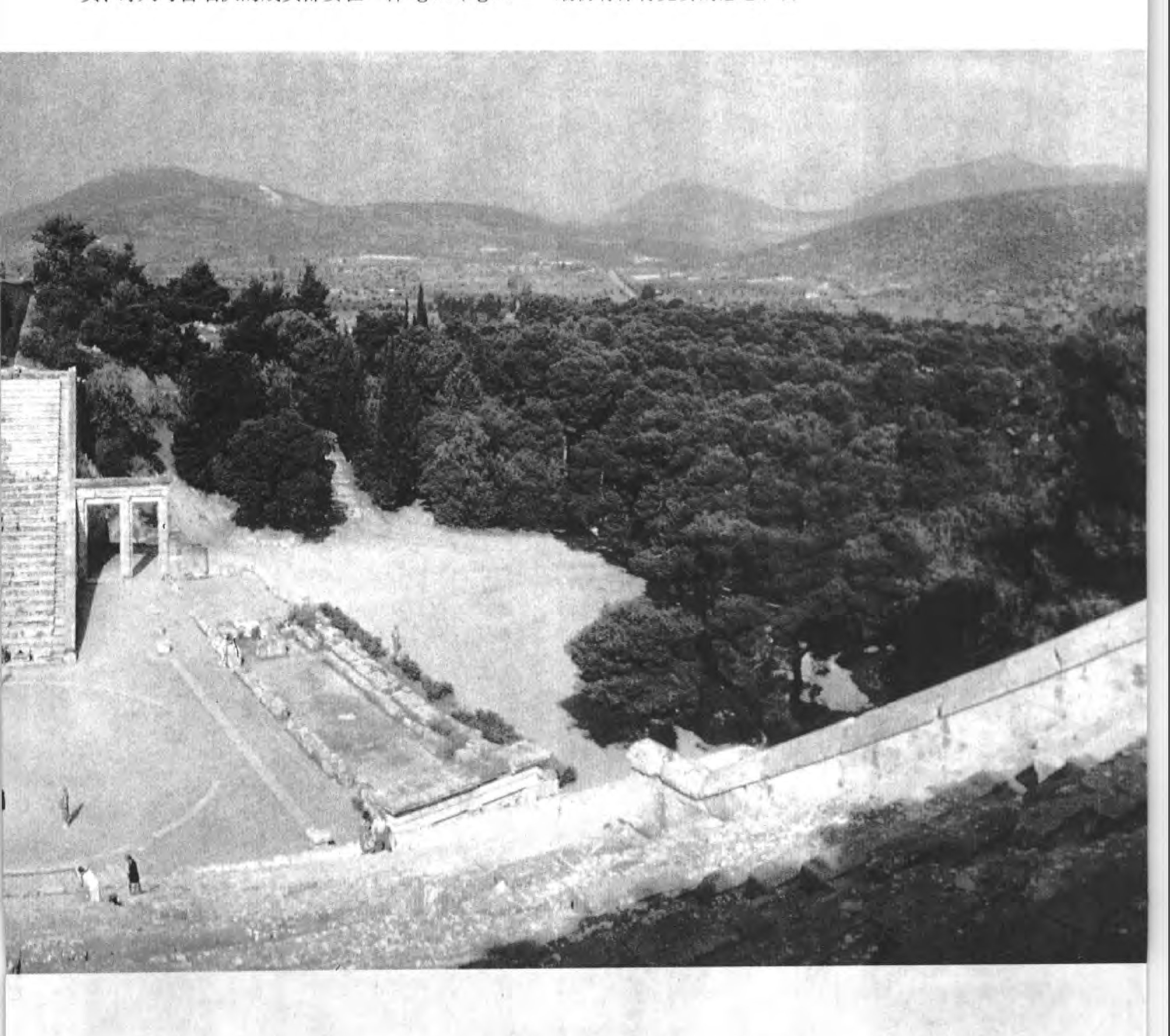
这座建于公元前4世纪的厄庇达鲁斯（Epidanrus）剧场，是保存最好的古代剧场中的一座，有着近乎完美的声学效果，同时清楚地显示出这种半环形的坐席为观众欣赏圆形orchestra（合唱队员的载歌载舞的场地）和skene（舞台建筑）上的表演，提供了绝妙的视觉条件。戏剧是在白天上演的。

这样，德摩斯提尼聪明而巧妙地使用了一个对己有利的类比，将自己比拟为斐拉蒙，后者是他同时代备受人们喜爱的拳手，他那杰出的拳击技术为喜欢他的公众增添了乐趣。

德摩斯提尼的指责发人深省，因为它说明古希腊人已经开始很自然地将互相对抗的政治演说类比为竞技对抗。他强调对拳击和演说的评价之间具有可比性，他还暗示了评价戏剧和歌队演出的标准也是类似的。

所有这些表演类型确实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最明显的就是都由专业人员在露天公共场所面对一大堆吵吵嚷嚷、颇为挑剔的观众而演出。不同之处是运动员在运动场或露天体育场竞赛，演说是在集会上或法庭上进行，戏剧则是在剧院上演。

对成功的表演者来说，竞争性的运动、演说和戏剧令他们声名鹊起。希腊人觉得很难将任何一种表演概念化，除非使之成为一种竞争的过程。演说家、运动员、诗人与合唱队的成员都要在一种agon（agon——最初有体育竞赛的意思，从





这里我们得到了英语单词“agony”）中与他们的对手（ant–agonists）一比高下。动词“表演”（agonizesthai）最初的意思是“参加一场比赛”。该词被用于各种语境：在战争中作战；上演喜剧，比如上演阿里斯托芬的《蛙》；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车竞赛。甚至农业劳动也被当成一种比赛性的表演，如在《奥德赛》中，荷马让奥德修斯对佩涅洛普（Penelope）的一个纠缠不休的求婚者说，他想与他进行一场收割干草比赛，“我拿一把弯钩长柄大镰刀，你拿一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比试比试。我们两人来割这割不尽的草，天黑以前不吃饭。”在雅典，这种竞赛精神甚至引起对男子体格（cuandria）的全面比试，似乎既要考核形体美，又要检验是否强健。

公元前431年首次上演的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是古代最著名的悲剧之一，也是当今演出最为频繁的剧目之一。剧中聪明、专横、富有心计的女主角出于对丈夫伊阿宋（他为了娶一个比她年轻的女子而抛弃了她）的愤恨，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狄亚娜·瑞格（Piana Rigg）细致入微地表现出美狄亚那可怕的阴谋。

运动会、政治和戏剧

在所有遗留下来的古希腊文化遗产中，对现代西方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体育比赛、民主政治和戏剧。今天研究古希腊的人为数很少，但是大多数人都观看过（即使仅仅在电视上看过）体育赛事或政治家们所参与的民主辩论以及戏剧的演出。他们甚至直接观赏过古希腊的一出戏剧。古希腊的戏剧，特别是欧里庇得斯的剧作，现在进行的商业性舞台演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们并不能根据现存史料使古希腊社会的许多方面得以再现，但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参赛夺标的选手在等待起跑的枪声（然后是号角）时，或者说一位政治家在与他的雄辩的对手辩论时，或者当帷幕为一位伟大的演员拉开时，无疑我们也在分享那种期待成功的激动。

对古代人而言，尽管这些公开表演的场所全然不同，但正如德摩斯提尼所强调的那样，这些活动是同样出色的。戏剧、演说和体育表演都是公开进行、彼此竞争的演出。成功给参与者带来无上的荣耀，失败则使参加者感到沮丧，使公众感到耻辱。

公元前498年，当帖撒利的希波克利阿斯（Hippocleas）在德尔斐举行的男子赛跑竞赛中获胜后，底比斯诗人品达受帖撒利的统治家族——阿勒奥阿戴（Aleuadae）家族的委托，创作一首颂诗（胜利之歌）歌颂他的事迹。在诗中，希波克利阿斯的成功部分归功于阿波罗的帮助，因为披提亚运动会是为感念阿波罗而举办的；另一部分则归功于他自己的家族：

> 哦，阿波罗，甜蜜是您赋予人们劳作的报酬。一方面是您的指点使他获得胜利，另一方面是他先天的遗传使他步其父后尘，他父亲曾在奥林匹亚两次赢得全副武装的比赛。

神的指示

人们认为获得体育比赛的胜利能使胜利者更接近于神灵。参赛者在尊崇众神的节日里通常在神殿中进行表演。所以，一场胜利被归因于神的指示和恩惠。据说，胜利者在胜利时实际上看起来就像神一般。

品达的颂诗也赞颂了希波克利阿斯的父亲，他曾经在奥林匹亚的披甲竞赛中获胜（见以下和第216页）。但是实际上，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直接赞颂委托他写

这首诗的贵族阿勒奥阿戴（Aleuadae）家族的。对于希波克利阿斯与阿勒奥阿戴家族的真正关系，人们并不清楚。他是有钱人资助的一个运动员，还是这个家族的一个贫困的远亲，这还值得商榷。但是，显而易见，希波克利阿斯的体育表现还有品达的颂诗，都提高了这个贵族家族的声望。

对古希腊人来说，人的各种功绩也很清楚地确定了人与神、人与人的界限。希波克利阿斯可能受到阿波罗的支持，但他也受到遗传基因和贵族资助人的佑助。

因为神的帮忙人才获得出色的成就，这种观点在很多颂诗中都很明显。在《奥德赛》第8卷中，全希腊最多才多艺的英雄奥德修斯是费埃克斯人（Phaeacians）的国王阿尔西诺斯（Alcinous）和王后阿瑞忒（Arete）的座上宾。经过三天“史诗般”的游泳后，精疲力竭的奥德修斯喝了些酒振作了精神，主人通过献祭和宴请表达了对他的尊重。然后客人们（the banqueters）聆听了德摩多卡斯（Demodocus）的音乐。弹唱小竖琴的吟游诗人像神一样出场（theios，出自神一词）。据说，上帝赋予了德摩多卡斯任何人都没有的歌唱天赋，在这种情况下“缪斯女神让他唱出英雄的伟绩”。由于具有这种神圣的天赋，吟游诗人也像神一样。《奥德赛》中另一位重要的吟游诗人菲米奥斯（Phemius）对奥德修斯解释说：“我是无师自通的，神将所有的演唱技艺注输在我心中。我值得为你吟唱，就像在一位神灵面前一样。”

这些“吟唱方式”包括一连串的诗歌语句、程式化的用语和传统的场景。在文字产生之前的社会当中，吟游诗人把它们熟记在心。在这种口头文化中，那个赋予德摩多卡斯灵感的未指明的“缪斯女神”被认为是记忆女神的女儿。诗人向她祈求速记之法，诗人由此进入恍惚般的表演状态，并且通过全神贯注的表演，力求把存储在自己脑海深处的诗歌语言提取出来。

体育运动

《奥德赛》第8卷特别生动地表明，希腊人认为在不同的表演中，如演说、戏剧和体育运动中，表现出色的话，其价值是相同的。在诗中，德摩多卡斯的音乐表演和对演说和竞技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费埃克斯人正在举行一些竞技比赛，包括掷铁饼比赛。一个叫欧律阿洛斯（Euryalus）的年轻人恶意地指责奥德修斯是一个贪婪的商人，不是一个竞赛者。这两项指控显然与有关阶级差别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基础。正如委托品达写诗的资助者是如此急于证明的那样，参加竞技比赛几乎与拥有财富、闲暇和成为贵族社会中的一员同等重要。奥德修斯——这个杰出的勇士、竞技者和国王——根本未受到取笑。他将欧律阿洛斯出众的美貌与其稍逊一筹的才华做了比较：

> 陌生人，你出言不逊，像个放肆之人。
> 神明并不把各种美质赐给每个人，
> 或不赐身材，或不赐智慧，或不赐词令。
> 从而有的人看起来形容较他人丑陋，
> 但神明却使他言辞优美，富有力量，

人们满怀欣悦地凝望他。他演说动人，
为人虚心严谨，出类拔萃。
当他在城里走过，人们敬他如神明。

欧律阿洛斯不善言辞，但是奥德修斯却是伟大的演说家，他的例子证明了以上的观点。

在《伊利亚特》中，安提诺尔（Antenor）记起，“无论在任何时候，从他的胸腔发出洪钟般的声音，发出像冬日里雪花飞扬般的言辞，那时没有哪个凡夫俗子能与奥德修斯媲美。”这种伟大的演说天赋，就像竞技者的胜利和吟游诗人的说唱一样，是神灵赐予的。演说如同体育运动和吟唱，使演说家变得完美，神圣。

似乎是为了强调体育运动、诗歌和演说之间的相似性，奥德修斯接着更加有力地驳斥欧律阿洛斯的含沙射影的批评。

他从座位上站起，外袍未脱，
便抓起一块石饼，更大更厚更沉重，
超过费埃克斯人互相竞赛的那一块。
他挥动强劲的臂膀，抡起石饼抛出去，
那饼呼啸飞过，费埃克斯人惊恐得



米隆的《掷铁饼者》，罗马时代的复制品。

掷铁饼者塑像

米隆塑造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好几位奥林匹克获胜者的雕像，他的最著名的雕像作品无疑是《掷铁饼者》。原像用青铜铸成，有打着无数小卷的古朴发型，身体弯曲，具有绝妙的艺术魅力，体现了精湛的冶金技艺。在掷铁饼时，古代运动员先用左手抓住铁饼向前伸出，然后递到右手。手臂向身后摆动到这座雕塑所表现的大概位置，然后跳起，挺身，同时左脚向前迈出，用力掷出。在一本名为Eikones（《肖像》）的著作中，作者卢西安（Lucian）[1]描述过这尊雕像的原作：“屈身做投掷姿势，头部后转，向着那只握着铁饼的手，一条腿稍稍弯曲，看起来就像要立即跳起投掷。”这是极其精妙的描述，因为这尊雕像确实给人以肌肉绷紧、身体发力、准备掷出的感觉。米隆意在表现四肢最大限度的弯曲，恰好在投掷实际上将要开始之前，人在蓄势待发的瞬间。

(1) 又译做琉善，罗马统治时期的古希腊作家，古代无神论者。出身于叙利亚的一个穷人家庭，学习努力，自强不息。曾在地中海地区广泛游历。40岁时迁居雅典，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目前所知他的作品有80多部，主要是对话体裁，多采用讽刺手法批评一些哲学派别和宗教的欺骗性。——译者注

迅速扑向地面。石饼从手中迅速飞出，
超过所有人的标记。雅典娜幻化成常人模样，
亲自度量石饼飞过的距离。

通过投掷石饼，奥德修斯最终确立了他的社会地位，完全打消了人们认为他是商人的疑虑。他的价值也由雅典娜亲自裁夺。掷铁（石）饼是希腊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著名雕刻家米隆（Myron）的《掷铁饼者》更使之名垂千古。

奥林匹克运动会

掷铁饼是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运动会上向宙斯表示敬意的一种比赛，是五项全能运动中的一项。其余四项为跳高、掷标枪、短跑和角斗。其他运动项目包括一些赛跑，距离从不到200米短跑到大约4000米的长跑，其中包括重装步兵赛跑。这项运动最初要求全副武装，但到了5世纪，只要求参加者象征性地戴着头盔和手持盾牌。

最具对抗性的比赛是角斗、拳击和潘克拉提昂（pankration，一种可怕的单项比赛，包括猛烈的拳击和使用摔跤中的擒拿法）。只有两种攻击方式被明令禁止，这就是用手抓眼睛和用嘴咬。

角力比赛的目的是将对手摔倒在地，动弹不得。就是既将他摁到地上又使之难以摆脱，五局三胜的人获胜。希腊神话赞颂英雄赫拉克勒斯和提修斯之间充满传奇的角力比赛。





“重装步兵赛跑”反映出战争和体育竞技之间最初的密切联系。奥林匹克运动会、披提亚运动会和泛雅典娜运动会都设有这项比赛。参赛者并不需要全副武装地穿着重装步兵的铠甲上场，只需要象征性地戴着头盔、手持盾牌。赛跑距离为两个斯塔德[1]——约400码远。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最古老的希腊运动会。传统认为这一运动会最早开始于公元前776年，起初可能只是伯罗奔尼撒人的体育赛事。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观看、参加比赛。裁判被称为“希腊人的裁判”(Hellanodikai)，这个称呼暗示着这是一个真正的全希腊人都来参加的节庆。

事实上，这类竞技比赛的普及似乎是古风时代希腊民族意识自然萌发的一个关键因素。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行一次，时间在盛夏时节。这一赛事至今已持续了一千多年。

披提亚运动会

另一个重大赛事被称做披提亚运动会 (Pythian Games)，在德尔斐的“披提亚”阿波罗神庙附近举办，于稍晚一些的公元前582年创办。这一赛事也是每隔四年举行一次，但在时间安排上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交替举办，这就意味着每隔一年就举办一次重大比赛。如果算上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伊斯特米亚和尼米亚①这两个影响较小的赛事的话，希腊人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大型比赛。

为纪念雅典城邦的守护女神雅典娜而举行的泛雅典娜运动会也是四年一次，除了音乐和戏剧比赛，还有重要的竞技比赛。事实上，本书许多关于体育竞技和音乐表演的精美插图，都画在最初用作这些雅典赛事所颁发的奖品（或纪念物）的陶瓶上。

军体竞技活动

几乎所有体育运动都是军事技能高低的检验。虽然举行过赛船，如在撒拉米

① 古希腊人在尼米亚举行隔年一次的赛会，主要内容为体育及音乐比赛。——译者注

(1) 古希腊长度单位，约为607至738英尺。——译者注





骑兵训练活动的开展影响到节庆的比赛项目，公元前5世纪末，泛雅典娜运动会可能已开始设立赛马比赛。在这个颁发给获胜者的奖瓶上，赛手身披斗篷，其中一人戴着一顶特殊的宽檐帽。



《德尔斐战车驭手》。这尊著名的青铜塑像曾被供奉在阿波罗神庙西南不远的德尔斐阿波罗圣所，它表明在战车比赛中获胜所带来的崇高声誉堪与贵族般的显赫地位相比。这尊塑像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整个古典时代早期几乎没有留下真人大小的青铜塑像原作。年轻的驾车人身着典型的驭手服饰，肩上和腰上紧紧束着带子以防衣服飘动，同时也给人一种倨傲、紧张及努力保持身体平衡的感觉。这尊塑像起初应属于一组塑像，也许包括几匹战马、一驾战车和一位马夫。战车里也许还立着马车主人和获胜者的塑像，即西西里的盖拉僭主波吕泽卢斯（Polyzelus），这位驭手是专门为他驾车的。这组塑像是波吕泽卢斯奉献给阿波罗神的，意在感谢阿波罗赐予他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的战车比赛中夺冠，以及提高了他和他的家族在所有访问这个崇拜中心的希腊人中的声望。

海湾，但古代希腊几乎没有留下关于游泳比赛的记载，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游泳对直接的战斗并不重要。其他已证明存在的竞技性运动，显然来源于军事训练。例如，泛雅典娜节运动会包括危险的“阿波巴德斯”（Apobates）比赛，这是为了检验从行驶中的战车上一跃而下的人的灵敏性。在泛雅典娜节上，一项富有特色的比赛是骑马向目标投标枪，这项技能显然有助于骑兵训练。色诺芬在他幸存的两

部论骑术的专著《骑兵指挥官》和《骑术》中赞颂了这一比赛。投掷标靶是绑在一根柱子上的盾牌，骑手必须在打马飞奔时投掷。据说雅典将军铁米斯托克里甚至教给儿子一种特技：笔直地站在马背上投掷标枪。

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早神话说明，战车比赛一直具有重要作用。据说佩罗普斯（Pelops）[①]是这一赛事的奠基人，伯罗奔尼撒半岛便因他而得名。相传他在一次为了获得希波达米亚(Hippodamia，意为“驯马人”)公主的青睐而进行的战车比赛中取得了胜利。战车比赛的意义和重要性在古典史料中一再得到证明：在《伊利亚特》（第23卷）所描写的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的葬礼运动会上，首次提到这一比赛。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厄勒克特拉》中，女主角的哥哥在披提亚运动会赛车中的死，被描写成一种特别的贵族式的死亡。

演讲术与民主制

就在波吕泽卢斯向阿波罗奉献那组青铜塑像的前几年，雅典人梅加克勒斯在同一运动会的战车比赛中获胜。品达为之写了一首诗——《第七首披提亚颂诗》，诗中直接指出梅加克勒斯是著名的阿尔克迈翁家族的一员（见第89页）。诗人曾在诗中问道：“难道还有哪个家乡更适于你居住，难道你还能说出在希腊人眼里更著名的家族吗？”雅典新型的民主政体并没有阻碍出身高贵的显赫家族通过参加这些重大赛事来提高其声望的热情。但是民主制度在希腊的诞生也产生出新的要求，即要求公民能够读书识字。他们需要具备阅读铭文中的法律和名称的能力，也许还要会写自己的名字。民主制也意味着演说开始作为一种堪与体育竞技抗衡的竞争性公开表演，并最终成为那些雄心勃勃、准备从政的人们需要不懈努力的一种技能。

在《伊利亚特》中，在公共场合演说的权利及其能力显然已被定义为贵族阶层的特权。当平民特尔西特斯（Thersites）敢于在特洛伊城下代表普通士兵提出抗议并发表演说，中伤阿伽门农的时候，正是伊大卡的伟大演说家奥德修斯本人，对他加以训斥，并用（阿伽门农的）权杖——国王世袭的至上地位和神圣权力的象征——击打了他的背部和双肩。特尔西特斯被打得鲜血淋淋，躬身屈膝，从此在诗中默无声息。

然而随着民主制度的确立，需要普通公民能理解和评价关于政策的各种辩论，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直接构思并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

这种要求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逐渐出现了艺术性的散文和其他全新的文学样式。但是在民主制下，演讲术的重要性甚至胜过散文写作——无论是吕西亚斯、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词，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史学作品，还是普罗塔哥拉斯、柏拉图的哲学著述。如果说许多问题必须在法庭或公民大会上当着一群反应迅速、拥

① 传说中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居民的祖先，是一场著名的马车比赛的获胜者。据说皮萨国王埃诺玛俄斯是希腊最著名的车手，他听到预言，说如果他的女儿希波达米亚出嫁，他就会死去。因此，他提出所有向他女儿求婚的人都必须同他赛车，败者将被杀死。佩罗普斯以馈赠半个王国作为条件，买通了埃诺玛俄斯的驭手，使其在主人赛车上做了手脚，致使赛车在比赛途中发生故障，埃诺玛俄斯因此身亡。于是，佩罗普斯如愿与希波达米亚结为夫妻。——译者注

《厄勒克特拉》剧中报信人的话

说话者是奥瑞斯特斯的老监护人：他必须使奥瑞斯特斯的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相信被放逐的王子已经死了。这段话显示出德尔斐的披提亚运动会极其激动人心的场景，但也告诉我们这个盛会更为黑暗、危险的一面，特别是发生事故（这是不可避免的）时，罹难者的尸体被碾得血肉模糊，令人惊骇。

另一天，当太阳升起时，举行了一场马车的速度比赛。奥瑞斯特斯与许多驭手一起参加……当指定的裁判按抽签的方式确定了他们的位置后，他们便各就各位。铜号声一响，他们就策马飞奔。驭手一路吆喝马匹，手握马缰，摇动缰绳，放松它们；战车一路驶过，吱嘎作响，尘土飞扬；所有战车挤成一团，驭手连连挥鞭，都希望超越其他战车和呼哧呼哧喷着鼻息的战马；战马喘息，把白沫溅到自己全身和身后的战车上。

每次掠过终点柱时，奥瑞斯特斯都会立马停在柱座旁，试图操控右侧的马占住空档，以挡住紧随其后的战车。起初所有人都站立在他们的战车之上，但后来那些伊尼安尼亚产的难以驾驭的公马开始不听使唤。在跑完第六圈，开始第七圈的转弯处，它们一头冲向巴尔克人的战车。一个驭手撞向另一个，撞得血肉模糊。然后整个克利塞平原到处是战车的残骸……围观的人看到奥瑞斯特斯摔下战车都惊叫起来，为这个年轻人大呼可惜。随后他们看到他惨遭不幸，先是一头栽下，后来四脚朝天，等到驭手艰难地制止住乱窜的马匹，把他救起来时，他满身鲜血，所有的朋友都已认不出他那凄惨的模样。

（选自索福克勒斯的《厄勒克特拉》）

有举足轻重的投票权的听众的面来解决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欲出人头地的演说家兼政治家，都必须具备借助话语来提出雄辩的观点并影响公民决定的能力。

雅典人对演说的喜爱不亚于对竞技或诗歌的喜爱。修昔底德提到政治家克里昂（他自己就是语惊四座的著名演说家）谴责雅典公民将集会变成了演说竞赛的舞台。他说："你们简直就是你们自己的听觉享受的牺牲品，你们不是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国家大事，而更像是坐在一个职业演说家脚下的一群听众。"

这些话看来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出色的演说技巧所带来的影响力与声望，对于那些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无疑有时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政治家们都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指控只是为了在法庭上进行唇枪舌剑的较量，德摩斯提尼和埃斯奇尼斯之争（见第209页）几乎可以说既是政治的竞争，又是口才的比赛。

因此，在公元前5世纪末和4世纪初，雅典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众多的演讲教师，最著名的当数西西里人哥尔吉亚斯（Gorgias）。他的演讲中充满了优美迷人、使人眼花缭乱的修辞成分，特别是节奏、头韵[①]、对句以及在同等或类似长度的句子上平衡节奏的修辞技巧（isocolon）。他擅长"为不可原谅的人辩护"的诡辩术。为了酬金他会在私人家中或赛场上，如在奥林匹亚的泛希腊运动会上，运用极富感染力的修辞技巧发表一段表演性的演说（epideictic）。

哥尔吉亚斯最著名的演讲之一是所谓的《海伦颂》，这是一篇展示演说技术的演说词，在一个假想的审判中为"不可原谅"、早有定论的神话人物海伦进行辩护，而大多数其他作者都认为海伦应为特洛伊惨遭屠戮的惟一负责的人。哥尔吉亚斯在开头的段落中就简洁地阐明他将采用什么修辞技巧，其英文译文能转达的只是改动了的原文词序以及哥尔吉亚斯所使用的引人入胜的对句、对称等修辞手法和机敏的遣词造句的某些部分。

① 一种语法技巧，指在一组词或一行诗的开头用相同的字母或声韵。——译者注

哥尔吉亚斯的《海伦颂》的开篇

城邦的荣耀在于人的出类拔萃，身体的荣耀在于美丽，思想的荣耀在于智慧，行动的荣耀在于美德，言谈的荣耀在于真理，它们的反面则是耻辱。无论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一种言谈还是一种行为，一个城邦还是一次行动，如果值得赞扬就应该加以赞扬，但如果应受谴责，就应该予以谴责。谴责值得赞扬的东西和赞扬应受谴责的东西同样是错误和无知的。一个说真话的人应该驳斥那些责难海伦的人，他们听信诗人和有关她名字的信息，将这名字看做灾难的象征。我希望用我在演说中陈述的理由，抹去对这个女人的诋毁中伤，证明那些谴责她的人是在撒谎，说明真相是什么，使他们不再无知。

这个演说的主题是这样一位妇女，她的德性与血统在男人和女人中间都是卓然而立的。显而易见，她的母亲是勒达（Leda），她真正的父亲是一位神灵，即宙斯，人们相信就是这样。她名义上的父亲是一位凡人廷达瑞俄（Tyndareos），因为是他自己这么说过，廷达瑞俄是男人中的佼佼者，而宙斯是万物之主。

如果某个政治家感到哥尔吉亚斯的独特风格不合口胃，那么还有一些其他学习途径可供选择。他可以去学现在所说的说服“艺术”或“科学”（techne）。从诸如安提丰（Antiphon）[①]的《四重论辩》这类手册上，人们可以发现如何预见对手的观点，以及如何从可能性中引出论点来设计演说。智者希匹亚斯（Hippias）[②]则教人提高记忆的窍门——这是表演所需的基本技巧。此外，哥尔吉亚斯的学生阿尔基达玛斯（Alcidamas）[③]专门研究即席发表演说的技巧，他敏锐地感觉到一篇文辞优美的演说辞不足以保证演说的成功。他如同《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也认为出色的演说家是“神圣的”。

谁不知道即席演说对于在公民大会上发言的人，对于去从事法律事务以及处理私人事务的人是必要的呢？发言的机会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落在一个人头上，如果他此时沉默不语，那也许会受到鄙视。但我们看到那些发言的人却受到其他人的尊敬，似乎他们有着神样的智慧。

在理论上，任何一个能向修辞学教师付得起学费的雅典公民现在都能在集会上与其他演讲者辩论。但实际上，自从奥德修斯用阿伽门农的权杖将特尔西特斯打得哑口无言以来，演讲曾经走过很长的一段路。

诗歌表演

史　诗

幸存下来的最早的希腊“文献材料”是书面记录的口述史诗，由长短格的六韵步诗构成。换句话说，它的节奏共分六个韵步，每个韵步有两至三个音节，重

① 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演说家，智者。——译者注
② 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演说家，智者，出身地不详。——译者注
③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演说家，出身于埃莱亚，高尔吉亚的学生，推崇即席演说，反对过分雕琢演说词。——译者注



萨福和阿尔凯奥斯（Alcaeus）。这是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瓶画师对列斯波斯两位最著名的抒情诗人的描绘。画上的阿尔凯奥斯和萨福大概在一问一答地表演着抒情诗，萨福好像正等着她的同伴先弹一个音乐过门。他们两人各拿着一把带有碗状音箱和长柄的简易诗琴。柏拉图这样评论萨福："有些人说有九个缪斯女神，但他们错了。不信你们看看列斯波斯的萨福，她是第十个。"

音押在每个韵步的第一个音节上。这种安排完全是口述社会的产物。

公元前6世纪以前，史诗说唱的语境一直是有争议的。在《伊利亚特》中，伟大的阿基琉斯自己（半神的勇士，演说家和哲学家）被描写成坐在他的帐篷里，显然只有他的朋友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一个听众，"弹着一把音色清脆、外形美观、做工精致、带有一个银制琴马的小竖琴直抒胸臆"，在音乐的伴奏下，"他唱起了勇士们光荣的业绩"。这样看来，吟诵不只是职业诗人的领域。然而史诗歌手通常不像运动员那样引人注目。《奥德赛》中描述了处于依附地位的职业化吟游诗人，他们受雇到国王们的宴会大厅里为他们的晚餐吟唱，如德莫多克斯（Demodocus）为费埃克斯人唱诵，费米奥斯（Phemius）在奥德修斯的宫殿表演。

在史诗中，吟游诗人的社会地位与占卜者（预言家/先知）、医生或木匠相似。

一些资料显示在开俄斯岛上也许出现过一所培养史诗诗人的专业“学校”。《荷马颂诗：献给提洛岛的阿波罗》中也有证据表明在提洛岛的阿波罗节庆中表演过史诗吟唱，“穿长袍的伊奥尼亚人为了向阿波罗表示敬意，带着他们的孩子和温柔的妻子，聚集在一起，按惯例用角斗、跳舞和歌咏比赛来全身心地取悦您。”

事实上在任何情境下，有一个不错的表演者和一位心甘情愿的听众，就没有理由不演唱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其他讲述英雄从特洛伊归来、七将攻打底比斯①、阿尔戈英雄（Argonauts）历险②和赫拉克勒斯的苦难的诗歌③。六韵步史诗并非古风时代的希腊人喜爱的惟一的一种音乐表演形式，有些著名的作曲家用哀歌韵律创作用于歌曲的表演，尤其是在酒会上用风管（aulos）伴奏的歌曲。

这幅作品是关于西塔拉琴师的最佳绘画之一。他一边为手中的乐器调弦，一边登上演奏台，演奏台上用希腊文铭刻着形容词“漂亮”的阳性形式。西塔拉琴师的服装强调了他的特殊社会地位：他披着镶边披风，头戴花冠。他的西塔拉琴是典型的瓶画师描绘的竞赛专用乐器：平底、七根弦，里面的琴臂（简称内臂）上刻有精美的花纹。内臂是琴身结构的一部分，而不纯粹为了装饰。西塔拉琴表演（Citharody）一直都是一种最负盛名的表演活动。获胜者不仅能赢得最高的声誉，还能获得任何一个独奏音乐家所能获得的最高奖品，原因在于学会弹奏西塔拉琴极其困难。亚里士多德称之为一种“专业”的乐器，不适于大众学习。图中是一个阿提卡红图彩陶，约作于公元前475年，藏于巴塞尔。

抒情诗

也有诗人谱写各种韵律的歌曲（通常为情歌），由一人弹奏诗琴独唱。独唱的抒情歌曲与东部的爱琴海有关，尤其是列斯波斯岛上的主要城邦密提林，那里也是诗人萨福和阿尔凯奥斯的家乡。

公元前6世纪，希腊大陆的独唱音乐表演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史诗表演开始走进雅典，这时的雅典已成为古风时代晚期最重要的城邦之一。据说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第一个下令将《荷马史诗》用文字记录下来，还确立了吟唱比赛。在西塔拉琴④的伴奏下吟唱史诗和其他诗歌，先是在披提亚赛会上举行这些竞赛，接着在雅典的泛雅典娜节上举行。在雅典的比赛后来改为用风管演奏，或在风管的

① 传说底比斯国王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罪恶被揭露后，刺瞎双眼，放弃了王位。他的两个儿子约定轮流执政，但后来弟弟霸占王位，拒绝让位给哥哥。哥哥招募了七位英雄，率军进攻母邦，最后兄弟俩共同战死在战场。——译者注

② 指希腊神话中的一批英雄，包括赫拉克勒斯，帮助伊阿宋找回了金羊毛。——译者注

③ 赫拉克勒斯相传是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私生子。宙斯的妻子赫拉嫉恨宙斯，设计使赫拉克勒斯注定一生遭受各种磨难。赫拉克勒斯强健勇敢却缺少智慧，他完成了十二项英雄壮举，却又在疯狂中杀死自己的儿子和好友，并为得到奥哈利亚公主攻打奥哈利亚，杀死该国国王。——译者注

④ 古希腊一种类似诗琴或小竖琴的乐器，有7至11根弦。——译者注

演奏音乐的妇女。柏拉图的《宴饮篇》中曾建议让第一个女风管手离开，为那家的妇女提供娱乐，这明确暗示了在希腊一定有过无数次并未记录下来的女人为女人所进行的音乐表演。这幅图上画了一组女子音乐表演者，包括一个女风管手、一个舞蹈者和一个弹奏诗琴的女伶。人们不应忘记与风管的发明相关的神是雅典娜，然而与这种乐器联系最紧密的无疑是狄奥尼索斯。人们在唱颂关于他的颂诗时，以及在狄奥尼索斯节的戏剧演出中，都用它来伴奏。



伴奏下演唱。

男性对公共节日中的那些享有盛誉的竞技表演的垄断，并不能掩盖妇女的作用，大量事实表明不少妇女成为出色的乐师，她们直接参与了许多古希腊音乐的创作。

女风管手(auletris)也同样是晚会上的常客。风管是一种管乐器，在演奏上更像现代的双簧管而不像笛子。希腊人几乎总是要同时吹奏两根风管。在柏拉图著名的《宴饮篇》中，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一道出席了一个传奇般的酒会，决定取消女风管手的表演——“如果她愿意，让她自娱自乐吧，或者去为这家的女人们吹奏吧。”但是这种宴饮的文学背景后来引来了另一位女风管手。阿尔基比亚德斯很晚才醉醺醺地进来，他头戴用常春藤、堇菜和丝带做成的花环。也许他是个喜欢深夜出去寻欢作乐的典型雅典人，陪同他的是一个演奏风管的女人。

赞美酒神的颂歌

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一个公众人物在任何政治演说或法庭演说中提出政治主张时，往往会历数他曾一次或多次承担为公众培训、装备和资助合唱队的巨额费用——一种向富人征收的税，称为考里吉亚(Choregia)①。

对希腊人而言，合唱队意指载歌载舞地进行表演的一个群体，各种舞蹈最终都是献给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在风管伴奏下边跳边唱狄奥尼索斯颂歌被称做狄替拉恩伯(dithyramb)，它在整个古典时期是雅典各个节庆竞赛中的一项著名活动。

一些酒神颂诗的片断得以幸存：品达为雅典娜节谱写了一首这样的诗，诗中邀请奥林匹亚众神加入雅典跳舞的行列。诗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人们的秀发

① 古希腊没有系统的国家财政，国家财政支出大多由社会赞助，这种赞助半是自愿，半是强制，这种制度被称做Choregia。赞助者对活动本身具有较大的发言权，所以前文提到歌队的赞助者同时又是歌队的领唱。——译者注



在约公元前425年的这幅雅典瓶画上，形象逼真地表现了酒神颂歌歌队表演的情形，这比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上演要早20年。画上所有人都标有普通的雅典人名[1]，站在杆子左边、面向画外的那个看上去未张嘴歌唱的人很可能是领唱，同时也是这次演出的赞助者。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歌队只有4到5人，而通常应有12人，而且似乎没有舞蹈的迹象。但是，风管乐手的出场，不戴戏剧演出的面具，用常春藤装饰的杆子（常春藤是狄奥尼索斯的主要象征之一），华美的戏装，头戴花环，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看到的这场演出肯定是为尊崇狄奥尼索斯而演唱的一首庄严颂歌，只能是赞美酒神的合唱诗。

缠绕着玫瑰，歌声在风管的伴奏中飞扬，歌队高唱赞歌，赞颂那头戴王冠的塞墨涅（Semele），狄奥尼索斯的母亲。"

酒神颂歌起初肯定涉及有关酒神的神话，主题源于酒神崇拜仪式。也许在涉及酒神颂歌这一类材料的文献中，我们拥有的最佳文献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由狄奥尼索斯的崇拜者组成的歌队，反复唱着他们作为酒神的颂扬者所过的迷狂生活，其中强调的一点是纵欲的自然色彩。

戏 剧

经过一个不可思议的演化过程，酒神颂歌产生了希腊的三大戏剧品种：悲剧、喜剧和羊人剧（satyr）[①]——所有剧目的演出都充满了资助人和剧作家间的竞争，在一年一度的雅典狄奥尼索斯节上的每次演出都得到赞助人的资助。

① 亦可称森林之神剧。萨梯（satyr）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极其好色。——译者注

(1) 西方人的取名方法是名在前，姓在后，这里的名字特指在前面的名，不包括姓。——译者注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说，悲剧把人描写得比现实中的人要好，而喜剧则把人刻画得较现实中的人要差。最能体现悲剧与喜剧差别的莫过于考里格斯(Choregos)陶瓶。这种陶瓶产于公元前4世纪初意大利南部阿普里亚地区的希腊城邦，上面描绘着精彩的喜剧演出，要么是旧喜剧，要么是中期喜剧。前者首先是与阿里斯托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是在这之后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意大利南部出产的陶瓶上，过去描绘的场景往往是与当地民间剧院或与称为弗里阿克斯（phlyax）的滑稽剧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描绘的场景几乎全是舶来的雅典喜剧，因为“考里吉亚”肯定是雅典的一种制度。

然而，这种陶瓶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在喜剧的场景中出现了毋庸置疑的悲剧人物。厄吉斯托斯（Aegisthus[①]）所穿的戏装的每个细节，甚至是他那圆锥形的



赞颂狄奥尼索斯

在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伴侣》一剧中，一支由亚细亚人组成的歌队跟着扮做祭司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来到底比斯，他们唱着酒神崇拜者在山腰狂欢的欢乐场面，还唱到狄奥尼索斯节的戏装、音乐、舞蹈和献祭活动。

群山在沸腾啊！那位崇拜者身披神圣的鹿皮，坐落在地，他的同伴们欢欣跳跃；我们的首领狄奥尼索斯啊！他曾到佛律癸亚或吕狄亚山上，追赶野羊，猎获那温热的羊血、新鲜美味的羊肉！欧嗬！遍地流着乳汁，流着酒浆，流着蜜蜂酿造的甘露！松脂火炬熊熊燃烧，那飘逸的香氲好似叙利亚的乳香，又如从茴香中流出；他奔跑着，在欢舞中大声喊叫，鼓励离散的队员，他那美丽的卷发在风中飘荡。在一片狂欢声中，他发出惊雷般的声音："信徒们，前进吧！信徒们，前进吧！播响那明亮的手鼓，吹响那甜美的圣笛，唱起那斐利癸歌曲，唱吧！歌唱我们的酒神，歌唱我们辉煌灿烂的幸福之神！在这绝妙的欢乐中，让我们向上攀登，爬上去啊！爬上去啊！

帽子和系带子的高筒靴显然都出自悲剧。悲剧演员被直接引入到喜剧舞台上。

我们并不拥有描写这种绝妙的悲喜交加场面的喜剧，大概这种喜剧就是所谓的考里格伊(Choregoi)。这个陶瓶的价值在于它生动地表达了希腊人对自己的戏剧舞台的真实反映，同时也表明美丽庄重的悲剧与滑稽变形的喜剧之间观念的对立，显示出在悲剧和喜剧之间存在的张力对希腊人生活的重要性，以及说明"文学"的产生——戏剧表演的产生——通过考里吉亚制度而与这个城邦的公民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关系。

面 具

戏剧对艺术的作用常常被人低估。例如，戏剧使用面具的现象，用不同颜色绘制面具的技艺的开发（这一发明归结于埃斯库罗斯）和在剧院观看这些能说会动的"塑像"的经历，促进了公元前5世纪的绘画和雕刻中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发展。

普罗诺谟斯陶瓶是雅典的一种特别的手工艺品，最早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400年，它给我们提供了所能见到的有关戏剧面具的最完好的图画。事实上它与羊人剧这一神秘的剧种有关，关于这个剧种，只有欧里庇得斯的《凯克罗普斯》一剧流传下来。

羊人剧与常见的描写英雄的悲剧不同，它由多毛、猥亵的羊人组成歌队，显得滑稽可笑。普罗诺谟斯陶瓶根据瓶上所描绘的风管演奏师的名字来命名。瓶上画着两横排与某一部羊人剧有关的众多形象，他们都是来向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圣殿奉献面具的，也许是为了感谢酒神使他们获得戏剧竞赛的胜利。

① 显然系笔误，应与前文 Aigisthos 为同一名。当然，在古希腊词转为拉丁字母对拼词时，o 可以与 u 代换，但同一本书中不应有两种拼法。——译者注

（左页图）斐莱西门的考里格斯陶瓶局部。左边画着一个身着悲剧戏装的人，摸着头，一副困惑不已的样子，也可能是在调整他的帽子。他被明确地标上了厄吉斯托斯(Aigisthos)的名字，与阿伽门农的堂弟即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emnestra)的情人同名[1]，这是几部著名的悲剧中常用的名字。显然他是从舞台左边半开着的门中出场的，这扇门也许就代表舞台的门。右边三个人已经站在舞台上，相对较矮，毫无疑问都戴着面具，穿着戏装。中间的那位叫皮里阿斯(Pyrria[s])，这个名字常常是奴隶名，意思是"红头发的"或"脸色红润的"。他被画成正面像，摆着一副引人注目的姿势，站在一个纺织物上，一只手指向空中，看上去像在宣布什么或是扮演一尊塑像。他的两边各有一人：一位年长、满头白发者和一位年纪较轻者，这只陶瓶由他俩而得名。他们穿戴着完全相同的戏装和面具，手里拿着相同的棍子。两人都叫考里格斯，相似的打扮说明他们在所描绘的戏中都扮演歌队队员。因此这幅瓶画描绘的是一出喜剧，剧中的歌队由两位考里格斯组成，也许是突出一老一少之间的对抗，因为两代人之间的对抗是老式喜剧最喜欢表现的一个主题。

(1) 据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率军远征特洛伊，十年未归，其妻与厄吉斯托斯勾搭成奸。阿伽门农回来后，克吕泰墨斯特拉与厄吉斯托斯联手杀死了阿伽门农。——译者注

普罗诺谟斯陶瓶。瓶身上半部右边画有两个惹人注目的形象，分别代表两个扮演赫拉克勒斯和羊人剧的创始人帕波西勒努斯（Papposilenus）的演员。画上，两个演员各抓着一个面具，因此花瓶的观赏者一看便知他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和真实的身份。

赫拉克勒斯是色情剧中最常见的角色，他总是带着棍棒和箭囊，因此人们可以轻易地将他辨认出来。帕波西勒努斯带着一根棍棒，披着豹皮，身穿紧身带袖子的羊毛戏装，全身都是毛茸茸的。瓶画家刻意地将演员的面部画得像面具。赫拉克勒斯的面具与扮演他的演员的面孔差别不大：蓄着又黑又齐整的胡子，时值壮年，脸庞宽阔，表情愉快，满头浓发。

帕波西勒努斯的面具却与扮演他的演员一点都不像：满头灰发，胡子长很多，头戴狄奥尼索斯式的常春藤花环，一副野蛮人的模样。陶瓶上的其他演员或头戴或手持各种各样的面具，从迷人的年轻女子面具到东方王子和较年轻的森林之神的面具，可谓种类繁多。



舞台布景

传统认为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对背景画进行了改革，这也可能促使希腊人开始熟练地绘制明显的立体建筑图案。一个残破的公元前4世纪的陶瓶为此提供了证据。陶瓶是用格纳提亚陶器上发现的一种不寻常的多色技艺绘制而成，对布景的描绘提出了一个关于古典时代舞台布景的重要问题，即性质问题。这是布景设



一个阿普里亚陶瓶的残片，描绘了一出不知名的悲剧的一个场面，也可能是一些失传的著名戏剧之一（如欧里庇得斯的《斯忒奈波亚》(*Stheneboea*)）。剧中的一名已婚妇女陷入对他丈夫的客人或她的继子的情欲之中。图中一个年轻人与一位比他年长的人在交谈，一个年轻女子在偷听，而另一个女子站在另一条过道的右侧远处。

计者在平面的背景上绘制虚幻的立体宫殿的证据吗？还是瓶画家试图在平面的陶瓷画面的有限范围内绘制一个侧面具有透视效果的三维立体的舞台建筑？无论是什么情况，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即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舞台设计者可能已经能向观众描绘一个立体宫殿的视觉图案。

女性角色

希腊悲剧最显著的特点是塑造了众多意志坚强的女性角色。也许这就是《美狄亚》、《特洛伊妇女》等剧作至今依旧使我们着迷的原因所在。

在私宅中举行的一种非正式的戏剧演出可能使用女演员、女奴隶或高级妓女。在色诺芬描写的一次宴饮中，狄奥尼索斯勾引可爱的阿里亚德娜（显然由女子扮演）的一场色情表演令客人们欲火中烧，“没有结婚的人发誓要娶妻子，已经结婚的人骑上马，打马回家去找他们的妻子寻欢。”（见第206页）然而只有男性才能从事悲剧创作和演出，在狄奥尼索斯节观看悲剧演出的绝大多数观众是男性。他们显然喜欢体验通过女性扮演者而产生出的悲剧情感。



女歌队。画上的几个年轻女子正在进行一场“少女”歌舞表演，它始终伴随着舞蹈，由风管音乐伴奏。与之密切相关的是为待嫁女子举行的仪式和节日。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结尾，剧中的男主角成了他的继母斐德拉 (Phaedra) 爱慕的对象。女神阿尔忒米丝为他举行了一个仪式，由后世的少女表演了一场处女歌舞：“未婚少女将在结婚以前为你剪去绺绺头发，你将在长时间内享有她们的眼泪所表达的最大痛楚。少女将受到鼓励而永远歌唱你，斐德拉对你的爱也不会销声匿迹，悄然无息。”

女歌队在悲剧中普遍存在，有一首年深日久的未婚年轻女子的传统合唱歌曲可以解释这一点，该曲名





正在装扮女性的男性歌队成员。左边的年轻人已经穿上高至腿肚子的靴子，戴上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子的面具（带有细致盘好的头发），正在练习这一角色在剧中的恰当姿势。右边的同伴正在穿另一只靴子，尚未拿起地上的女性面具遮盖头脸。这个场景因此非常准确地描绘了性别－角色转换的瞬间和过程以及这一瞬间与具有转换作用的戏剧面具的关系。

这个"穿戴异性服装"的陶瓶产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只比由12个年轻的雅典男子装扮成科林斯妇女歌队、首次演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公元前431）早几十年。

（上页图）1995年，在国家剧院上演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妇女》中，简·波尔金（Jane Birkin）扮演了安德罗玛。此剧由安尼·卡斯特尼迪勒（Annie Castledine）执导。特洛伊陷落后，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的遗孀坐在获胜的希腊人的一辆战车中，被拉到舞台上，抱着她那还是婴儿的儿子阿斯提亚纳克斯，这是特洛伊王族最后一个男性幸存者。他将很快被希腊征服者从她怀中夺走，从城墙上抛下——这是古代悲剧中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场面。

为《少女之歌》。品达就写过好几首这种作品，阿尔克曼所写的古朴的《少女之歌》曾在斯巴达演出过。但悲剧中之所以出现坚强的女性角色，是由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古希腊观众发现，无论从心理还是从社会角度来说，利用一个神话般的女替身，通过她来间接地体会绝望、丧失亲友、复仇和性欲困扰等痛苦的悲剧情感都是适宜的。

古代有些涉及特殊的悲剧表演的趣闻轶事颇为动人，几乎总是围绕着剧中的女性角色，这一点具有启示意义。公元前4世纪中期，费莱的僭主亚历山大[①]在活埋敌人时眼睛都不眨，而在观看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妇女》演出时却不得

① 此亚历山大非马其顿王，而是北希腊帖撒利城邦费莱的僭主。——译者注



不离开了剧院，因为他耻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看见他为赫库巴（Hecuba）和安德罗玛的不幸而哭泣。传说这种情况也曾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扮演索福克勒斯的剧中人厄勒克特拉的演员波罗斯（Polus）身上。在那场著名的戏里，厄勒克特拉听到“假”信使的报信后（见第222页），她对着误以为装着她弟弟骨灰的骨灰罐痛哭不止。当波罗斯扮演厄勒克特拉时，他自己的儿子刚刚死去。因此，“他身着厄勒克特拉的暗色长袍，捧着从坟墓中取出的他儿子的骨灰罐，把它当做奥瑞斯特斯的骨灰罐。在他眼中，周围的一切已不再是表演性的道具和布景，而是浸透着那种来自真实生活的切肤之痛。看到此情此景，观众无不为之动容。”（引自奥鲁斯·盖里乌斯所著《阿提卡之夜》）

一些古代思想家认为悲剧中的女性焦点，特别是其中包含着异性装束，对社会秩序是一个巨大威胁。苏格拉底之所以将悲剧逐出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悲剧会滋生演员和观众的女人气。但是一些瓶画家却认为一个男性身份的人转变为女性戏剧人物是有着强烈吸引力的艺术表现手法。

对于古希腊社会戏剧演出的讨论，也许只消看看学者们近几年刚发现的那只最激动人心的陶瓶，即所谓克力夫兰的美狄亚（Leveland Medea）陶瓶，就再也找不到比那更好的结论了。这只陶瓶高五十多厘米，特别醒目之处是盘绕着的黄龙拉着美狄亚乘坐的战车，背景是圆形辐条状的“光芒四射”的光环，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古代的瓶画家没有找到一种更高明的手法，来表现欧里庇得斯的这一著名悲剧结束场面——当太阳神的孙女美狄亚出其不意地乘龙车自空中出现时——所具有的令人眩晕的效果。她那几乎发狂的丈夫伊阿宋（在这幅瓶画的左下角）一直嘭嘭地擂打着房子的大门，让我们以为他那杀死儿子的前妻会从门中走出来。因此她在天空中突然现身是希腊悲剧中最完美的出乎意料。正是这样一些场景使欧里庇得斯成为最受欢迎、最有影响力的古代剧作家之一，也保证了他的悲剧至今既在文学中活力不减，又在舞台上常演不衰。

（左页图）有关美狄亚的神话是古代艺术家最频繁描述的一部分题材，欧里庇得斯在公元前431年对悲剧进行了革新之后，尤其如此。这个精美的陶瓶出自公元前400年左右，1991年被克利夫兰艺术学院购得。瓶上描绘了这部悲剧的尾声，凶暴的美狄亚乘坐她的外祖父、太阳神（Helios）借给她的龙车离开。她身穿极其华丽的服装，袖子上绣着花，戴着令人难忘的东方头饰。面对她的两个孩子的尸体，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年保姆和男性监护人陷入悲痛中。伊阿宋站在图的下方左边角落，惊恐地向上望着离去的妻子。两个长着翅膀、在悲剧中象征复仇的厄里尼厄斯从上方盯视着地面发生的事情。

第十章 建筑与其他视觉艺术①

雕塑与建筑一样，非常讲究彩绘装饰。在雅典卫城出土的一尊约属于公元前530年的雕像（高1.17米，即3英尺11英寸），说明彩绘雕塑（Kore，在希腊语里这个词指"女孩"，在现代意义上则是指一种雕塑类型）的出现。彩绘雕塑对我们了解古代的服饰、发型和珠宝的情况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证据。这尊"佩普罗斯"彩雕，因穿着多利亚式连衣裙而得名。这种裙装较之做工精细、广泛流行的伊奥尼亚长袍在穿着上更为方便。这类雕像通常被认为是年轻女子的象征，但是人们推测其中有一些也许象征着女神，那个佩普洛斯式彩雕实际上可能是阿尔忒弥丝。该像以及其他古风时代的雕像的头顶有一个金属钉——承载某种形式的装饰物。图中的装饰物被称为"meniscus"或小月亮，可以呈现为月牙形，或者就像这尊雕像所复原的那样，像个小圆盘。它的作用尚不清楚，虽然阿里斯托芬在于公元前414年写的喜剧《鸟》中，提到保护雕像用的一个吓鸟物件，他在剧中让鸟去警告裁判员们：(1)

> 要是你们不让我们得奖，
> 你们可要准备好，
> 就像空地上的那座雕像，
> 顶着个小铜盘，
> 每当你们出门，穿着白净的新衣服，
> 愤怒的鸟儿就要来复仇，
> 在你们身上撒满粪便。

(1) 阿里斯多芬在剧中实际上是通过歌咏队队长的嘴，道出鸟对赛会裁判员的警告。——译者注

谁的形象？感知希腊艺术

对古希腊艺术和建筑的模仿在大多数具有古典传统的国家广为流行，通常的模仿是在大面上，比如由众多圆柱构成的大英博物馆的正面。人们或许还会想到一个颇为突出的古代特点，即博物馆的主门是仿造厄瑞克修姆神庙的北门建造的。厄瑞克修姆神庙位于雅典卫城，可以说是最精致的古代建筑。它建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因厄瑞克修斯（Erechtheus）而得名。此人是传说中的一位雅典国王，荷马在《奥德赛》中说，他有一所"造得不错的"房子，雅典娜曾去过。厄瑞克修姆神庙也是人们最喜欢仿造、改造、援引为例的建筑之一，至少从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如此。当时为了表达对罗马和罗马元首奥古斯都（Augustus）的崇敬，人们在附近建了一座圆形小庙宇，忠实地模仿了厄瑞克修姆神庙的精致外形。

但是，古希腊对艺术家和设计师来说充满了如此神奇的魅力，以至于它往往成了一种幻象，这种幻象本是错误地创造出来的，却在不断重复。我们对那些未经彩绘的古代大理石习以为常，这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的雕刻家和建筑家已经使我们习惯于看到光洁的白色石雕。但是我们从遗留的颜料痕迹上得知，古代雕刻和建筑都是色彩缤纷的。我们知道他们所使用的许多颜料以及着色的技艺，但是现在我们很难想像那些彩雕给人的印象。在现代的希腊，人们站在充足的阳光下面观赏一尊新雕好的本色大理石雕像时，肯定感受不到彩雕的眩目光彩。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艺术和建筑在传统上一直是大众和学者关注的焦点，幸存下来的该时期的建筑与雕刻，特别是雅典卫城的建筑和雕刻，是人类的一份丰富而珍贵的遗产。但是希腊艺术在每个时期都有一

① 此章名与原书目录中的章名（"视觉艺术"）不同，显然是原作者笔误。为求得统一，译本将目录章名改为这里的实际章名。——译者注

种显著的特征，对众多趣味不一的观众，有着不同的吸引力。当然，我们不应该天真地以为那些在一定时期里生活和劳动的人们——这个时期不是由他们自己划定的，而是由现代学者划定的——知道自己在历史进化过程中的位置，一旦这个时期过去，



（上图）雅典卫城的厄瑞克修姆庙是又一个最著名的特征，这就是充当廊柱、衣着精美的女性石雕。尽管今天它们被称为女像石柱（希腊人称"卡瑞阿提德"），但是建筑铭文将它们称之为Korai或"姑娘们"。

（左图）如图所示，从公元2世纪位于提维里的皇帝哈德良[1]的别墅，到19世纪后期雅典的住房正面，人们一再模仿女像柱。

(1) 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前76年出生，117年当皇帝，138年去世。他崇拜希腊文化，爱好音乐、绘画、雕塑和数学。——译者注

他们就会对这个时期冠以某个名称。每个时代都在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喜好利用以前时代所取得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古典时期是这一过程的鼎盛时期，但是在它之前的各个时期也并非无足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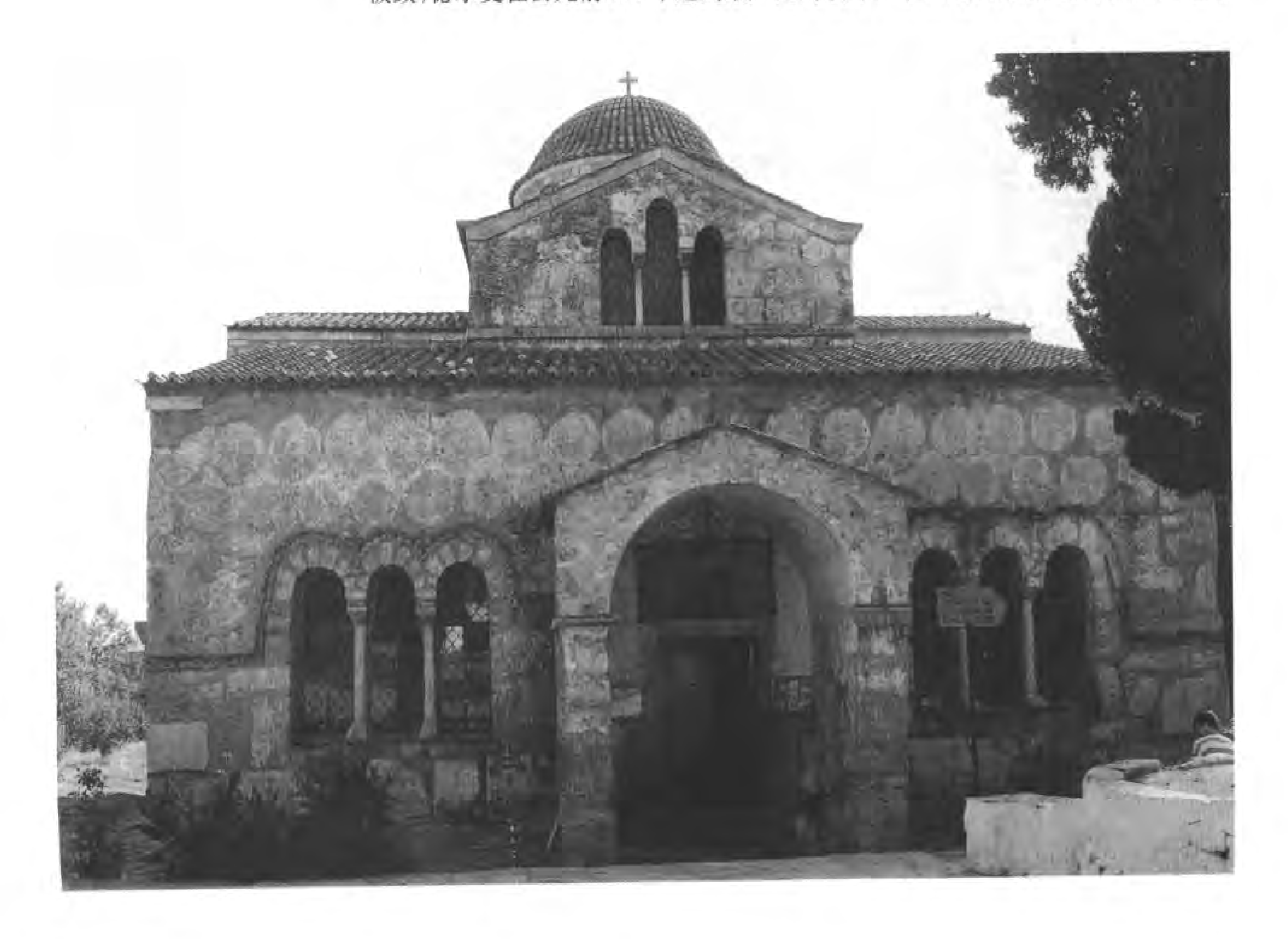
因此，古典艺术和建筑的模仿者们的工作虽然基于这些艺术形式，但他们一直不是这些形式的精确传播者。那么，真实又在哪里呢？

史料：恢复过去

史料可以分成两类：遗留的人工制品（从微不足道的陶器碎片到雄伟的庙宇）和文献史料。大部分保存下来的艺术和建筑都是支离破碎、残破不全的，而比这多得多的史料则已失传。在这些残片当中，有一些之所以能以某种形式保存下来，是因为人们将陶器碎片用在新修的路面上或重新作为建材用在新建筑上。例如，位于西西里岛叙拉古的一座大教堂就是这样。这座教堂是围绕雅典娜神庙（约公元前480年建）修建的。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古代、现代都有。已被切割的和成形的石块确实值得利用，不应该浪费。

自然原因造成了很多损失，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中，有许多次地震和山崩可资证明。例如，帕特农神庙在竣工后的六年里遭到地震的破坏。最近一次地震发生在那之后约2400年的1981年。奥林匹亚在公元6世纪发生的两场地震中几乎全部被毁，德尔斐在公元前373年遭到最广泛的破坏，本世纪又再次遇到同样的命运。

古代建筑的石块、雕刻、塑像基座、三脚鼎基座、铭文等，在这座位于彼奥提亚的奥科美诺斯（Orchomenus）的拜占庭教堂的墙壁上都能有所发现。特别显眼的是那两排鼓状圆柱。对这类建材的重新利用节省了时间与费用，成为一个悠久的传统。最著名的例子是希波战争（见第72页）后不久，铁米斯托克里在雅典四周匆匆建造防护墙，使用了古风时期的雕刻。与此类似，在建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雅典卫城北墙上，我们现在仍能看见古风时期用于修建卫城的建材。





（左图）1905年，德尔斐发生了一场山崩，泥石流使雅典娜神殿——人称“普洛诺亚”（Pronoia，深谋远虑）或“普洛纳亚”（Pronaia，在殿前）——的重建工作半途中止。像希腊的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古时候德尔斐也发生过几次地震，最为著名的是公元前373年，阿波罗神庙（上图）在这次地震中被毁。



自萨摩斯岛出土的木雕小神像，属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所谓“埃克索阿农”(xoanon)类型。文献史料常提及木雕像，然而保存下来的极少，主要从水淹的遗址上获得。这个小雕像的风格是戴达罗斯“Daedalic”[1]（见第248～249页）

“毫不奇怪，由于女神正忙着生育亚历山大，阿尔忒弥丝神庙被焚毁”，普鲁塔克这样描写公元前356年的一个晚上以弗所（Ephesus）的阿尔忒弥丝神庙被烧毁的情景，这正是伟大的亚历山大国王出生的时刻。这些著名的事件只是众多火灾中最为人熟知的。特别是神庙发生火灾，可以说防不胜防，因为希腊建筑广泛使用木材。自古以来，屋顶的主体建设以及早期庙宇中的柱子，都使用木材。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就是一个例子。此庙建于公元前6世纪早期，用的是木头柱子，很明显这些木柱由于腐朽而逐渐被石柱所替代。后来在大约公元前173年，波桑尼阿斯记载道：“在后面的房间里有两根柱子，其中一根是橡木。”此外，储存在庙宇及其他建筑中的油极易燃烧，用它点灯时可能也非常危险。波桑尼阿斯还告诉我们，阿哥斯的赫拉圣所中的那座神庙“被烧毁是因为在火苗舔着了花环的时候，赫拉的女祭司克里西丝睡着了”。

木头不仅会燃烧，也会腐烂，我们所知的木头的诸多用处是从较结实的木料的残存物中推断出来的。从古代作者那里，我们得知人称霍阿纳（Xoana）的简单雕像主要是木制的。一位收集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作品的编者告诉我们，在他的剧本《护送雕像的使者》(*Xoanophoroi*)中，“众神从特洛伊带走了他们自己的木雕像。”有些小型木雕像的样本得以幸存，主要是由于有关遗址处于水浸状态。人们还找到一些木盘子——虽然没有大雕像和庙宇那么壮观，但是可使我们一窥当时的日常生活。

除了自然原因，还有人为的毁坏。有些人为的毁坏事出偶然（如战争），但大部分则是故意为之，如青铜、大理石之类材料常被加工后重新使用。事实上，古典时期的独立雕刻作品幸存下来的比率之所以低，主要是因为它们大部分是铜制品。旧建筑遭到破坏也许仅仅是为了建造新建筑，或者是由于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目的。例如在基督教时代的早期，许多最著名的异教圣地都遭到破坏。在这个时代也能看到许多建筑遭到拆除，部分原因是需要建筑石材，还有一个原因是铅的使用。古代建筑不用砂浆，建材通过夹具固定，通常是铁夹具。由于铁在空气中会氧化，这些夹具表面包着一层铅皮以防与空气接触，正是这层珍贵的铅皮才使得所有建筑成了十分诱人的拆除对象。

(1) 古希腊文的意思是“精工细琢的”。——译者注

古代作者对艺术的描写需要谨慎对待，因为大部分人与他们所描写的艺术存在的时期相去甚远，例如，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①]和波桑尼阿斯，他们分别生活在大约1世纪和2世纪，其写作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读老普林尼有关青铜或大理石雕像的记述时，应该记得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冶金术和地质学，而不是艺术。波桑尼阿斯于大约150年至175年间曾在希腊旅行，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做了广泛的描述，成就了现存最完好的一部游记《希腊纪实》(*periegesis*)，即一种游历文学形式。这些作家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家，都沿用了前人对希腊艺术和建筑的记载，利用了先前的游客所编写的关于艺术家及其著作的名录。这些写作主要围绕艺术家个人及其成就，带有很强的传记色彩。它们虽然存在种种缺陷，却在当今丰富的文学传统中，体现着那些保存得最完好的部分，而它们谈及的大量艺术作品则久已失传了。

在这些古代的记述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对可以称做公共艺术的雕刻、建筑及壁画或嵌画的一种偏爱。建筑以及附属于它的雕刻也许是由当时的权威——僭主或民主政府——授权建造或制作的，这些权威可能决定了艺术表现的主题。它们的展示是公开的，对它们投入的费用是可观的。古典时代大量单独屹立的雕刻和壁画作品也是如此。

瓶画是一种现代学者极为重视的艺术形式，这是因为瓶画遗存的数量巨大。无论是经过绘制或未经绘制的陶罐都很流行，它们具有不易磨灭的品质，其形状、瓶饰技艺和风格的发展变化一般可以加以推测，这一切使它们在古代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广泛的现存文字材料中并未提及彩陶。这是一种巨大的失衡状态：一方面，在史料中有过许多讨论的绘画之类的公共艺术作品几乎完全失传了；另一方面，瓶画是一种相当私人化的艺术形式，规模较小，其作品有许多保存了下来，被供奉在圣所里显眼的位置或被放在家里不显眼的地方。陶罐的制作成本显然低于雕刻和建筑，因此，流传范围较广。陶罐上所描绘的场景包含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使我们了解制造这些产品的地区居民的兴趣和所专注的东西。因此，我们的文字史料中缺乏有关彩陶的记载无疑意味着我们必需意识到这类史料的局限性，特别是它们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当时社会的片面观点。一切文字史料都是人为的产物，我们要像对待那些微不足道的陶片一样，对它们加以缜密的审核。

艺术开端和早期发展：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50～前700年）

要追溯整个历史时期艺术的发展，必须回到早期铁器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有地区特点。例如，这个时期整个希腊大陆的建筑主要是石头地基泥砖墙，屋顶往往覆盖着茅草；而各个岛国（尤其是克里特）的建筑却全用石头（反映当地可供使用的材料），还喜欢造成平顶（也许是为了贮存雨水）。最精致的建筑位于优卑亚岛的列夫坎迪，建于公元前1000年。这是一座典型的半圆形拱顶式建筑，两端为马蹄形，带有一个走廊，中心有一排柱子支撑屋顶。它的

① 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出生于公元23（或24）年。其代表作《自然史》有部分内容流传于世，包含自然、地理、科技等方面的知识。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他曾亲临现场调查。——译者注

陶工和制陶

陶工和陶器画匠的工作比雕刻匠和建筑师卑微，后两者通常受别人委托而工作，常常使用昂贵的进口材料，而陶土在希腊的大部分地区唾手可得。正如这幅画上的两条铭文所说的那样，陶工往往和陶瓶画匠及陶罐画匠地位相当。有时他们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也许仅仅是为此感到自豪，但更可能是一种广告形式，在竞争性



的商业环境中很有必要。实际上，有许多迹象表明陶工和陶瓶画匠们彼此竞争，试图超越对手。也许正是陶工和陶瓶画匠本身使我们能够通过铭文——其中有许多涉及陶工和陶瓶画匠自己——以及通过对陶工工作的描述，认识这些艺术家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面。陶器作坊似乎是由大家庭组成，其情其景常常反映普通人的日常事务。它们不仅表现各种宗教仪式，而且展示打水、饮酒、跳舞、竞技、婚姻、死亡及其他日常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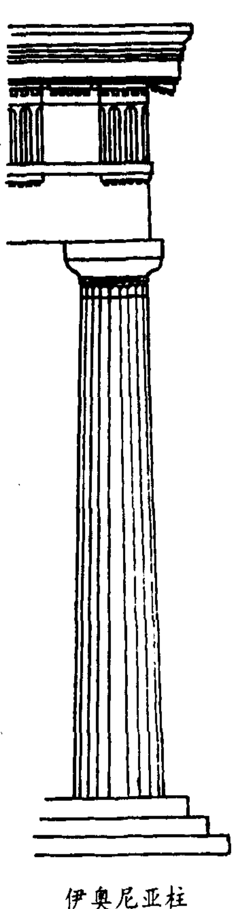
通过比较署名作品，我们可以推断每个陶瓶画匠的特征，再将未署名的花瓶归类。这个方法的开创者是约翰·比赖爵士（Sir John Beazley，1885～1970年），他不仅研究质量上乘的陶瓶，也研究质量低劣的陶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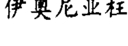


约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一个小科林斯油壶的瓶颈部分。画师先用黑色涂料覆盖它，然后用白色涂料画了三朵玫瑰花。起初的两朵笔触齐整，但在画第三朵时出了差错，画师用人们通用的表示扫兴的方式将它叉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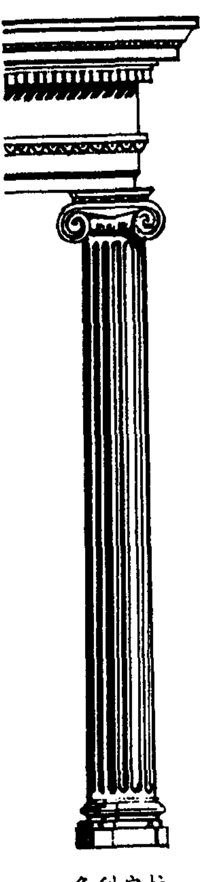
这是古风时代后期的一个红图彩绘陶瓶的一部分，上面的铭文表示这个名叫米松的人，既是制作这个陶瓶的工匠又是画师。

（左页图）写着“奥伊科菲勒斯制作了我，并对我进行绘画”的字样，这位艺术家两次自豪地提起自己的名字。但是，“我”这个词说明是这个杯子本身在对我们说话，很像曼提克洛斯（见第248页）制作小雕像的做法。





伊奥尼亚柱



多利安柱

独特风格令人们对它的功用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本是一幢普通的房子，后来成为它的主人的英雄神殿，又有人认为这本来就是一座神殿，只是外形像座普通房子。很难确定房子的功能——是家庭居住、宗教祭祀还是二者兼用——成了这个时期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石雕仍是原始的，没有大尺寸的雕塑流传下来。自公元前10世纪开始，人们用铸模的方法把青铜用于制作三脚鼎和小塑像，如在奥林匹亚的神庙中，就供奉着这类小塑像。偶尔还有武士塑像，但大多数是马和其他四足动物。它们线条僵硬，棱角分明，非常像那个时期的瓶画中所描绘的样子。早在公元前9世纪，首饰上出现了加工精细的透雕图案和颗粒的表面。与后来一样，木材在那时也被广泛应用于建造房顶和用做泥砖墙的支柱。但是，无论建筑还是雕塑，都未达到后世所获得的和记载的那种重要成就。

相反，在公元前8世纪，彩陶则可被称做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在陶器史上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其原因主要是公元前8世纪中期雅典出产了一批大型陶罐，数量虽少却引人注目。这些陶罐主要被用做随葬的墓标（gravemarkers），瓶身饰有呆板模糊的侧面人物轮廓，或参加豪华的葬礼，或参与作战，周围的图案都是有棱有角的纹路（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这种风格在现代被称做“几何陶”。雅典陶罐上饰有彩绘形象早有先例，最早出现的是一匹马，比第一个人物肖像的出现早了约一个世纪。第一个人物肖像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中期，是个女性送葬者。很快，在大约公元前770年，出现了第一批有人物的场景——战役、海战、停尸台（用于摆放尸体）。除了僵卧的遗体，还有送葬或ecphore[①]的场面，这种场景很适合画在随葬的陶瓶上（见第87页）。

人们对叙事的兴趣现在开始了，这成为希腊人的鲜明特征，对希腊最美好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样，我们现在也首次有了可以加以辨识的作者，即那些绘制陶瓶的画家们。首当其冲的是“狄斐隆大师”（Dipylon Master）。这一名称来自雅典的狄斐隆大门，因为在大门附近的墓地中首次发现了“他”。这是通过个人独特的笔触，即近似于笔迹的特别之处识别出来的。借助于对陶瓶画家工作历程的估测，我们可以推断陶工作坊的许多情况，尤其是古风时代后期和古典时代的雅典的一些陶工作坊。其实这种方法已经被成功地用于推断其他许多流派的情况，如古风时代流传极广的科林斯陶。我们在出自皮特科塞（位于那不勒斯湾的伊斯基亚）的几何陶时代后期的一个巨爵上，首次发现了一个陶工的署名，名字结尾是“-inos”。

作为希腊艺术的两个意义最为重大的现象——叙事的诞生与作者的识别（所有晚后的艺术均源出于此）——的最早表现，其重要性真是难以估量。但至此为止，雅典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领风气之先的是科林斯。

古风时代（约公元前700～前48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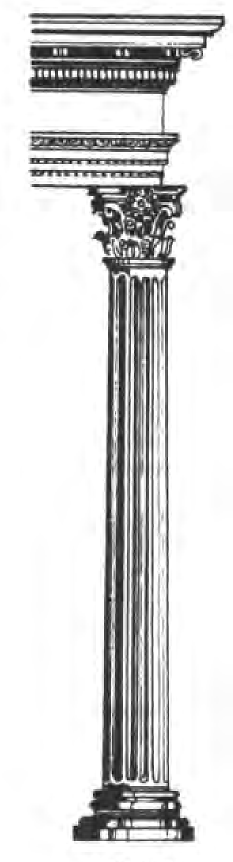
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希腊与东方进行了广泛的交往，起初限于优卑亚和克里特等地区。结果大批人工制品纷纷涌入希腊大陆，希腊艺术中也广泛出现

① ecphore在古希腊文中有“送葬”的含义。——译者注

了东方的特征。公元前7世纪是“东方化”的时期，这在整个希腊世界都是明确无误的，也引起了许多希腊地方艺术风格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科林斯的变化尤为显著。在公元前8世纪的下半期和前7世纪早期，科林斯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它的兴起与其在地峡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方之间。继巴克基斯家族（Bacchiad）统治之后，库普塞洛斯（Cypselids）家族执政（前650～前580年）。他们像许多僭主一样，似乎一直积极资助艺术。考古证据与文献史料都说明科林斯把建筑、绘画和雕刻等艺术推到了新的高峰。

关于公元前7世纪的雅典和阿提卡，史书记载的相当少，惟一提到的是基伦注定要失败的建立僭主制的图谋——这一时期是僭主政治的鼎盛期。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提到公元前7世纪20年代，基伦围攻卫城，但以失败告终。在考古学上，我们对这个时期的雅典也知之甚少。那时出产了最富有特色的原始阿提卡（Protoattic）风格的陶器，然而连这种陶器也受到科林斯和希腊东部艺术的强烈影响。所以在古风时代早期，雅典比以前更缺少创造力和影响力。但是在公元7世纪后期和6世纪，雅典及雅典艺术空前繁荣，而科林斯的经济实力和艺术创造力却走向衰退。



科林斯柱

建　筑

科林斯有一座大约建于公元前680年的神庙，多半是献给阿波罗的。它由一个内殿和一个长方形的大厅（用于置放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像）组成，大厅也是后来所有希腊神庙的中心。它的墙壁至少有一部分用石头砌成，用木头横梁作支撑。屋顶向两面倾斜，在两端末梢形成中国式的屋檐，而不像后来的庙宇，带有人们熟悉的三角墙[1]。科林斯神庙的一部分曾被着色，内殿里面被粉刷过，饰有黑色和红色的长方形镶板。屋顶盖着陶瓦，按竖行颜色相间，五行黄色插一行黑色。

附近的科林斯地峡边有座保存尚好的波塞冬神庙，约建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延续了这种风格。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座全部墙面都用石头砌成的希腊大陆上的庙宇，并且墙面都经过粉饰，有些地方绘有图案和人物形象。还有大约十六吨陶瓦保存了下来。实验考古学业已证明，一支由七位工匠组成的小队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制造出所需的陶瓦。地峡边的这座神庙可能是有围柱的，也就是说，它的四周有柱廊环绕，这也许是希腊神庙最明显的特征。它是已知最早的希腊大陆上的神庙之一，但它的柱子也许是木制的，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埃陀利亚的特尔蒙的阿波罗神庙，那块有精致彩绘的陶饰说明，科林斯艺术在风格、技艺、主题等方面的影响。这些陶饰镶嵌板是成熟的排间档饰的先驱，它们与三联浅槽饰交替用于多利安形制的希腊建筑当中。第一例保存下来的成熟的多利安形制是约建于公元前580年的阿尔忒弥丝神庙，位于科林斯的一个重要的殖民地——科孚岛。神庙的两头带有最早出现的山墙雕刻，上面描绘着可怕的

① 希腊式古典建筑正面入口门廊顶上的装饰性三角墙，一般没有屋檐，更没有向上翘起的飞檐。——译者注



这是发达的多利安建筑上的排间档饰（metopes，右图和第247页上图），镶在这些陶板中（下页中图、下图），出自埃陀利亚的特尔蒙神庙，时间约属于公元前630年。其规格约为0.88×0.99米，或2英尺11英寸×3英尺3英寸。它们被嵌入阿波罗神庙上半部的狭槽，也许是后世建筑上常见的三联浅槽饰之间。陶土产于科林斯，题材取自科林斯的各个剧目。在风格上可谓科林斯艺术的典型代表，反映了科林斯在这一时期的兴盛。



这是西具昂人珍宝库的排间档饰，描绘的是卡斯托尔（Castor）、波吕克斯（Pollux）和伊达斯（Idas）。根据忒奥克里托斯[1]的《田园诗》第22首（*Idyll* XXII），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在他们的堂妹希莱拉（Hilaera）和福柏（Phobe）（她们要嫁给伊达斯和林凯奥斯）的婚礼上劫持了她们。在最后的搏斗中，林凯奥斯杀死卡斯托尔，但又被波吕克斯所杀。宙斯用雷电将伊达斯烧成灰烬，救出波吕克斯，并将他带到奥林波斯山。

(1) 约生卒于公元前310年至前250年，古希腊田园诗创始人，在30首田园诗中以《泰尔西斯》最著名。诗作对罗马诗人维吉尔及后来的田园文学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戈耳贡（Gorgon①）正转向那些看她的人，将他们变为石头。试想，在一个约三米高的石雕戈耳贡的凝视下走近神庙，是多么令人惊骇。

一旦多利安神庙的基本形式确定下来，主要的发展就只是表现在细节和地方

① 希腊神话中的三蛇发女怪之一，见到她人会立即变为石头。——译者注

风格的多样化方面了。我们从雅典卫城各个神庙，包括古典时代帕特农神庙的前身的遗存中获悉，到古风时代末叶，建筑技艺已变得非常精湛，已经有了非常精确的计算。尽管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伯里克利当政期间建造的庙宇（首先是帕特农神庙）已体现这种趋势，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水平，但是近期学术研究清楚表明，古风时代的建筑特质，是被波斯人破坏的。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大多数所谓的爱奥利亚式柱头产生于小亚细亚西北和列斯波斯岛，它们是伊奥尼亚柱式的前身，后者兴起于约公元前6世纪中期，被用于萨摩斯岛和以弗所[①]等地的大型神庙。其中，以弗所神庙占地55 × 115米（181 × 378英尺）。尽管我们在建在德尔斐的岛国西弗诺斯（Siphnos）的宝库上明显见到了这种风格，但希腊大陆毕竟迎来了一个伊奥尼亚式的神庙建筑时代。宝库是各国在泛希腊的圣地上建造的仓库，其部分目的是展示城邦的富庶和艺术的精妙之处。西弗诺斯宝库大约建于公元前525年，是所有宝库中装饰最精美的一座，有一系列伊奥尼亚传统风格的浮雕带，精雕细刻的装饰线条，还有多利安风格的山墙雕刻。另一特点是立式女雕像，个个服装华丽，头饰精美，取代柱子竖立在入口两侧，是古典时期的厄瑞克修姆神庙中发现的女像柱的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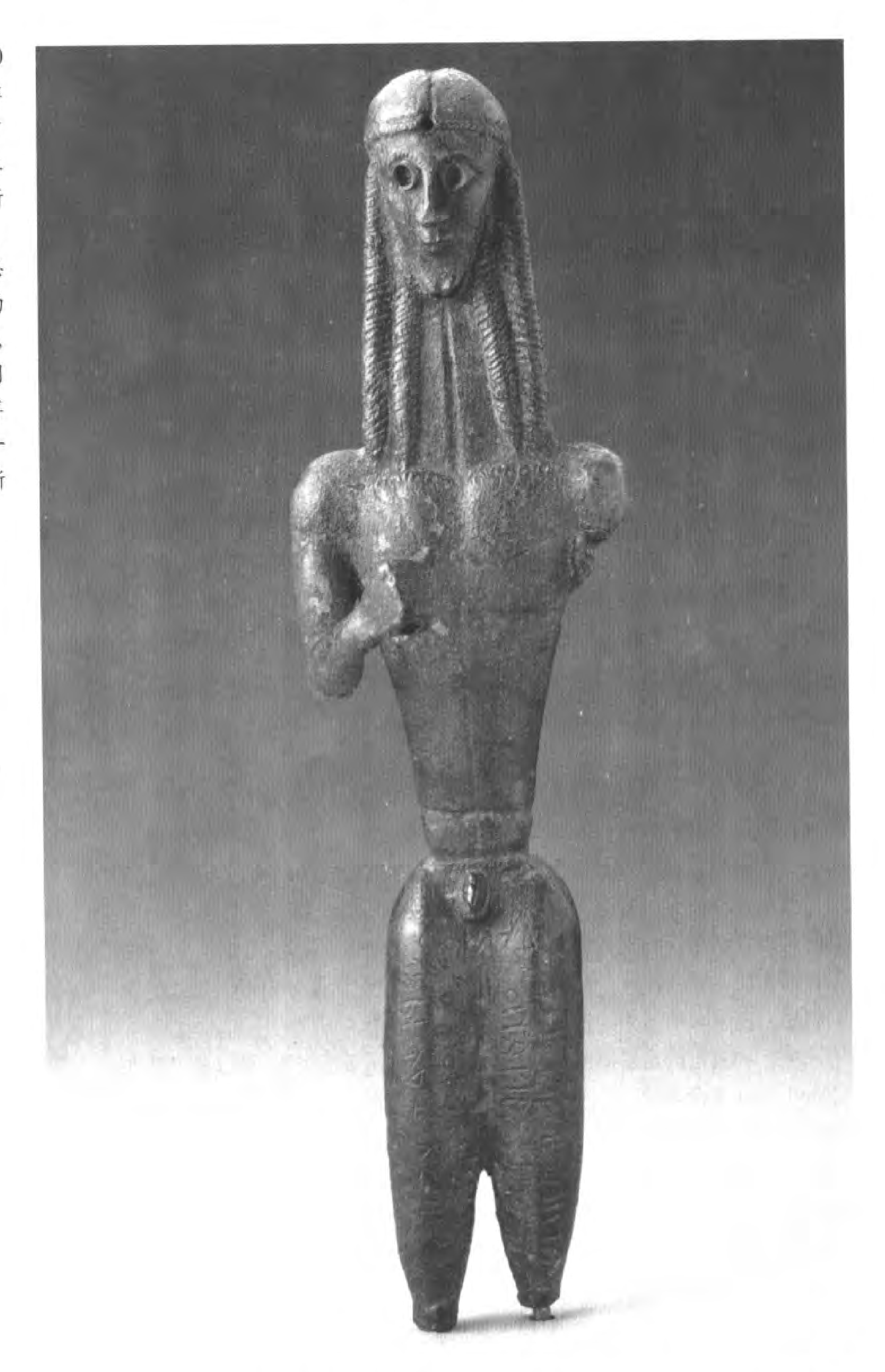
雕 刻

雕刻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主要涉及雕刻的尺寸和材料。随着人们对石雕技艺的信心不断增长，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左右，开始从雕刻较软材质的小雕像向雕刻硬质石料转化。从公元前8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常见的是具有东方特征的小雕像，用的是赤陶、象牙等材质。到了早期铁器时代，常见的是用青铜制作的姿势僵硬的斗士和动物小塑像。随后，动物、人物塑像日渐生动、形态各异。但是，直到公元前6世纪后期才出现大尺寸的青铜制品。古风时期雕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石雕上。

第一种真正的希腊雕刻风格现代被称为戴达罗斯风格，是以戴达罗斯（Daedalus）来命名的。相传他是第一位希腊艺术家，最为我们熟知的是他带着他那苦命的儿子伊卡洛斯（Icarus）飞离克里特岛的故事。戴达罗斯风格大约统领了公元前7世纪最后四分之三的时间，其特点是小型板式正面雕像，三角形的脸，两侧各有一绺绺倒楔形的头发。这是东方化趋势的一部分，带有源自东方生育女神小雕像等素材的灵感。这一风格体现在众多方面——赤陶小雕像、粘在陶瓶上的人头像、青铜小雕像、黄金首饰，在希腊世界广泛流传，但它的起源却不甚清晰，虽然有可能源自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也许更有可能源于科林斯。但是希腊雕刻的未来发展却不在于小尺寸的作品和软性石材，相反，它取决于质地较硬的大理石。这种石材在希腊世界广泛分布，随着希腊人开发出各种工具以便最充分地利用它，大理石雕刻技艺日益娴熟。越坚硬的石材，越有利于精雕细刻。一旦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① 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的重要城市，城中的阿尔特弥丝神庙蜚声爱琴海世界。——译者注

这个属于大约公元前700年至前675年间的青铜小雕像，有二十多厘米，或八英寸高，供奉在底比斯，两条腿上刻着以下铭文："曼提克罗斯把我献给手持银弓的阿波罗；福玻斯（阿波罗）请赐给我恩惠，作为回报。"在雕像头颅的前部，有一个小洞清晰可见，头顶还有一个；这些可能是用来固定头盔的。这意味着这尊小雕像有可能是阿波罗，他一般不被认为是战神（除了在斯巴达）。



起初，人们的主要兴趣在于人像雕刻，特别是男性人像，按照社会传统雕成裸体，这样也使雕刻匠有机会探究如何表现肌肉。库罗斯（"Kouros"）是现代对立式裸体男性雕像的约定俗成的名称。从公元前7世纪后期至公元前5世纪早期制作的雕像都面孔朝前，手放在两边，左脚向前迈出。Kouros这个词的意思是"年轻人"，这些雕像是对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男子理想的刻画，特别是那些早期的雕

刻，比真人大得多。有时，在雕像基座上可能会刻上名字，要求瞻仰者“在死者克罗伊索斯前哀悼。他作战在前，被凶猛的战神阿瑞斯所毁灭”。但雕像本身体现的是年轻英俊的理想典型。库罗斯在某种程度上起源于埃及雕刻，尽管它很快呈现为鲜明的希腊形式（见第59页）。虽然库罗斯像主要出现在墓地，对路人来说，它们具有几乎是幽灵的模样，但人们也发现了一些女性雕像，即身着打褶服饰的库莱（Korai），主要是作为神庙中的奉献物。

这两种雕刻构成希腊人探索立体表现人体艺术的真正开端，衣纹通常是表现人体而非遮盖身体的一种手段。人们发现这些雕刻广泛流行于希腊世界。其他独自屹立的雕像包括坐像，例如，在通向小亚细亚米利都地区的神谕遗址狄底玛(Didyma)的圣路两旁，便有这种雕像。我们也许可以推测，奉献这些雕像会给某些奉献者带来社会声望。有个奉献者宣告：“我是卡瑞斯，克雷希斯的儿子，泰丘萨（Teichioussa）的统治者，这座雕像是献给阿波罗的。”也有骑士雕像，例如雅典卫城的“拉姆宾（Rampin）骑士”像，约属于公元前550年。他的胡须和头发刻得特别细致，戴着一顶花冠，表示他是运动会上的一位获胜者。稍早一些时候，还有一尊绝妙的摩考斐卢斯像（Morchophorus），或扛小牛的雕像，即一人用双肩扛着一头小牛的雕像，同样出自卫城。这自然是一件供人欣赏的艺术作品，但表现出日常生活的情节。罗恩波斯（Rhonbos，雕像基座上的铭文对这一形象的称呼）肩上的小牛是被送去祭神或宰杀的。

浮雕也得到发展，例如一些库罗斯像基座上的浮雕，或者前面提到的科福岛上的阿尔忒弥丝神庙山墙上的浮雕。公元前6世纪雅典卫城上的一系列石灰岩山墙上的雕刻涂有艳丽的色彩，表明这个城邦正日益走向繁荣。这些早期建筑雕刻往往有对称的设计，也可称为“希拉尔狄克”(hiraldic) 设计，题材往往取自当地的神话。正如我们所见，在德尔斐，西非诺斯建造的宝库饰有精美的浮雕。在它附近矗立着稍后建立的雅典宝库，这是一座多利安风格的建筑，它的雕带间饰表现的是提修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历险故事。这两位雅典英雄（前者出生的故事和后者归天[①]的故事）常常被用来为雅典增光添彩。

① 传说提修斯的父亲埃哥奥斯是雅典国王，他一直没有孩子，就到德尔斐神庙向阿波罗请求帮助。阿波罗给他一个神谕，但他不解其义，就去特罗真请聪明的皮特修斯帮助释解。皮特修斯明白神谕，知道埃哥奥斯将生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孩子是将来雅典最伟大的英雄。皮特修斯想让特罗真成为这位英雄的祖国，于是就把女儿埃特拉嫁给了埃哥奥斯。埃特拉果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提修斯。提修斯出生后不久，埃哥奥斯回国，把自己的鞋和宝剑压在一块巨石下，对埃特拉说待孩子长大能推开这块石头时，就让他带着鞋子和宝剑来找他。提修斯长大后，带着鞋和宝剑去寻找父亲，一路上杀死不少土匪、强盗和猛兽，终于回到雅典。后来还自告奋勇去克里特杀死了牛头怪，最终继承父位成为雅典国王。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强壮、勇敢的大力士。他是宙斯的儿子，一生当中消灭了十二个怪兽，但由于缺少智慧，为此多次受到惩罚。为向奥纽斯的女儿德阿涅拉求婚，他与河神阿科洛奥斯展开决斗，并打败河神，娶回妻子。返家途中，他们来到一条水流湍急得河边，马人涅索斯答应驮德阿涅拉过河，但涅索斯惊叹德阿涅拉的美貌，在过河当中调戏德阿涅拉。赫拉克勒斯一怒之下用带有巨毒的弓箭射中马人。马人临死时让德阿涅拉取一些他的血，称这会使爱他的人永不变心。后来，赫拉克勒斯夺得少女伊俄勒，德阿涅拉为防止丈夫变心，就用马人的血涂在一件外衣上送给赫拉克勒斯。结果，赫拉克勒斯弓箭上的剧毒发作，使赫拉克勒斯疼痛难忍。他命儿子许罗斯架起柴薪，将自己烧死。许罗斯不忍，由菲洛克特斯点着火堆，菲洛克特斯由此获得赫拉克勒斯的神箭。火堆惊动了宙斯，他命雅典娜和赫尔墨斯神救走了自己的儿子，并使他成为永生的神。——译者注

瓶 画

接近于公元前8世纪末，科林斯发明了黑图彩绘瓶画，这是一种新的瓶画技术，它用切刻技术、红白染料使得在几何陶时代就已采用的侧影画获得了生气和活力。在科林斯原始几何陶时期（约公元前720～前620年），科林斯人很快看到黑图画的潜能并加以利用，同时意识到现在可以将多个人像部分重叠起来，每个人像又可以识别，而使用的色彩使画面更加鲜艳。许多科林斯的瓶画都尺寸不大，需要用雕刻刀和刷子精工细作。在任何时期，质量都是变化不定的，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前后，科林斯几个瓶画家创作的一小系列陶瓶达到了希腊艺术的一个高峰。这些瓶画由于精微细致、构图复杂和高超的陶艺而卓越不凡。在这个时期，越典型的陶瓶，其质量就越差，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亮丽生动，所绘的动物昂首阔步，列队前进。其中有现实中的狮子、山羊、公牛、公猪，也有想像中的斯芬克斯和女海妖。后者就像科林斯陶瓶背景上散布的装饰一样，源自东方，是上述东方化趋势的另一个表现形式。与同时代的雅典相反，科林斯瓶画中缺乏宗教形象和人物的描绘，对日常生活的描绘相对而言也缺少内涵（但有一个例外，见第164页）。

在随后的科林斯时期（约公元前620～前550年），瓶画的风格日趋呆板，花瓶上布满了技法拙劣、毫无生机的温驯的动物。然而仍然有一些技艺高超的画家，这个时期绝不是单纯的衰退期。自公元前6世纪中期，科林斯的瓶画偏好于图案而非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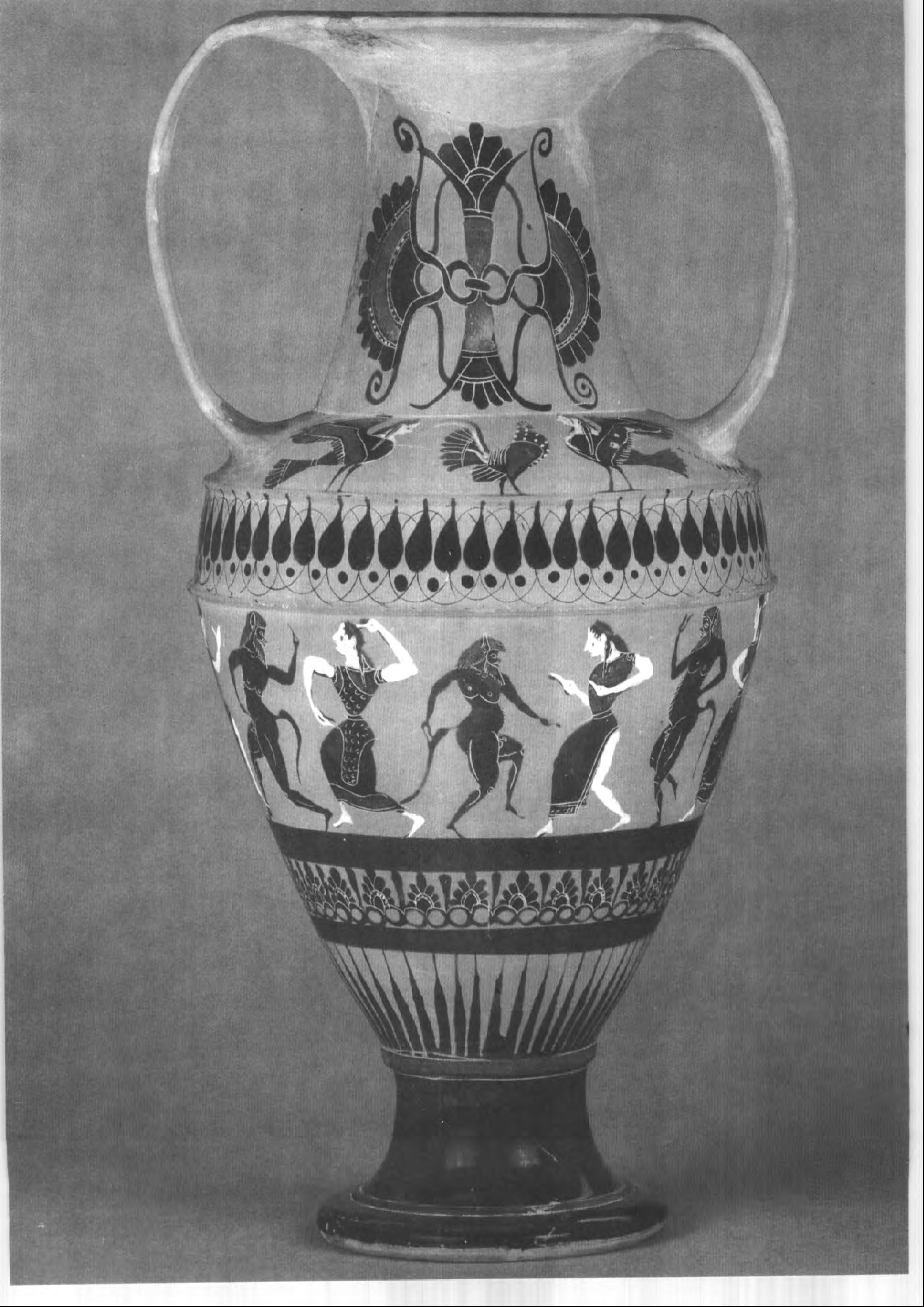
公元前575年至前550年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科林斯画匠在绘画前将花瓶表面染红。科林斯陶土本性暗淡，表面一经染红，花瓶就呈现出一种暖红色彩，而暖红色是雅典陶土的特点，雅典陶罐如此引人注目就得益于这个特点。染料是以制作陶罐的陶土为基础，随地区不同而变化不定。科林斯染料是暗黑色，而阿提卡陶土则含伊利石，这种元素赋予雅典染料一种非常独特的光泽。因而，尽管雅典和科林斯都采用黑色彩绘，但是最终的产品差异却十分显著。在公元前7世纪和6世纪早期，科林斯对其殖民地以及其他地方的产品输出，较之其他任何手工业生产中心都更为广泛。但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成为主要的彩陶输出国，有时要适应详细的市场研究（见第253页）。正是在这个时期，面对雅典出口贸易的日益兴旺，科林斯的出口贸易不断减少。科林斯的艺术家开始模仿雅典的染色工艺，将自己的陶瓶染成红色。因此，这种拿自己的陶瓶冒充当时最受欢迎的雅典陶瓶的举措，似乎是为了保持他们在市场上的地位而进行的孤注一掷的挣扎。

黑图彩绘瓶画在古风时代被广为采用，只有希腊东部是个例外。大概在公元前6世纪中间的50年，当雅典达到鼎盛之时，精美的陶艺与高超的绘画珠联璧合。陶瓶上所署的几个画师和陶艺师的名字都是外邦人名，意味着他们可能是第二代移民。他们的父母是那些据说是在梭伦的鼓励下来到雅典的外邦人，其中有一位叫利多斯（Lydos）。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吕底亚人，还有阿玛希斯（Amasis），这是个陶工，可能也是位瓶画师，该名是希腊化的埃及人名字。

公元前525年左右，雅典陶工发明了红图彩绘瓶画技艺，藉此他们画出人像轮廓，再用粗细不同的线条对其内部细节进行勾勒，接着，用黑色染料填涂背景。绘画取代了雕刻，画笔的柔韧性越强，技艺就越精妙，对人像和衣纹的描绘就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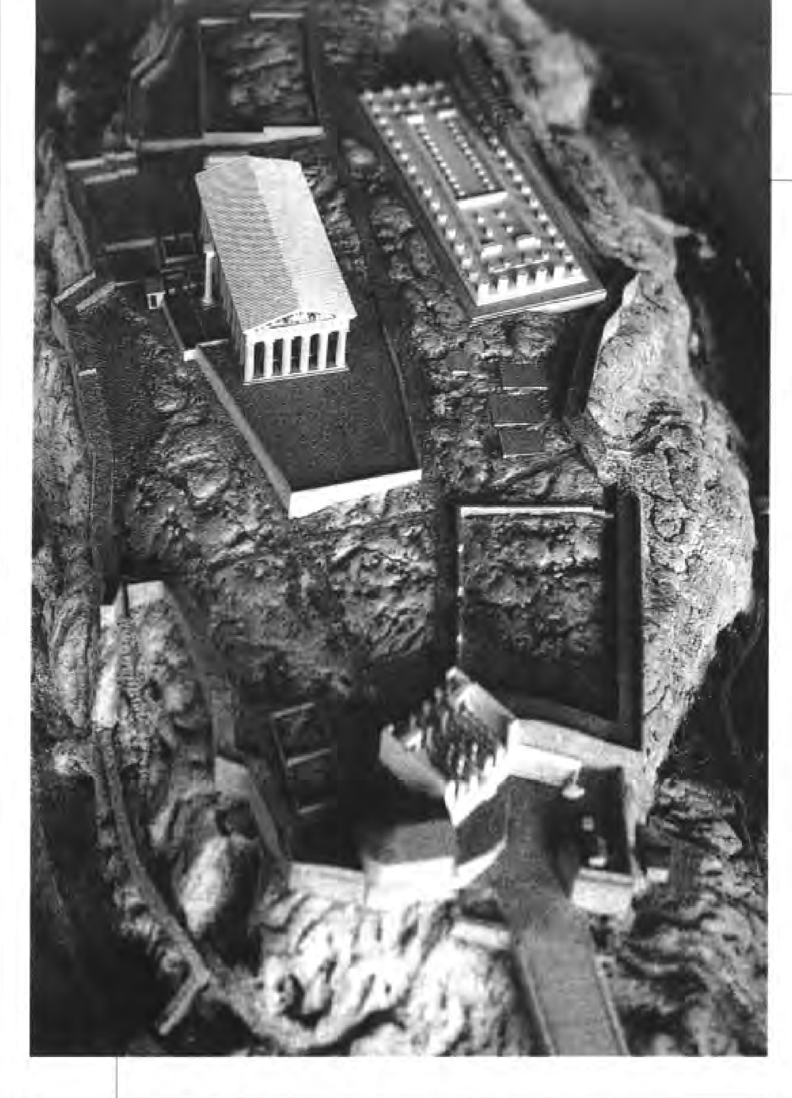
这是公元前6世纪中期雅典出产的细颈油瓶（17厘米高，约7英寸），描绘了妇女纺织的情景（见第102、第103、第130～131页）。这是一幅有关日常生活的非常细腻的图画。



生动逼真。正如人们对雕刻的关注一样，人们也开始致力于瓶画，这为瓶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尽管红图彩绘瓶画取得了进步，但是黑图彩陶仍在大量生产，直到古风时代末期。从那时起，雅典彩陶的生产独占鳌头，超过其他任何时期，惟一的例外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中后期。



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支配着陶器出口市场，但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开始，雅典取而代之。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一位名叫尼科斯提尼斯的业主仿造埃特鲁里亚当地陶瓶的形状进行制作，如这个双耳陶瓶（左图），用的是当地产的一种叫做布克罗（bucchero）的黑色陶土。他的作坊生产的工艺陶瓶远销雅典境外，如这个双耳陶瓶（对面页图），针对埃特鲁里亚的一些特定城市，向不同的城市出口不同形状的陶瓶。瓶上描绘着埃特鲁里亚的图像，如人们所熟悉的埃特鲁里亚壁画中的拳击、宴饮场景。尼科斯提尼斯的双耳陶瓶上的主要浮雕带表现的是手舞足蹈的羊人与侍女、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伴侣。





雅典卫城

爱德华·里尔（Edward Lear）于1848年在描写雅典卫城及其废墟时说："面对如此的壮美，可怜老迈的罗马简直不名一文。"卫城位于一处平原的中央，建在天然形成的高地上，有良好的水源供应，这使它成为安全定居的理想之地。实际上直到1831年，它才不再被当做保垒使用。三年后，希腊国王奥托（Otho）坐在帕特农神庙内一个饰有橄榄枝、爱神木和桂枝的宝座上，正式为卫城的重建举行了开工典礼。

在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5000年），人们开始在卫城居住。迈锡尼人在这里的活动痕迹保留在约公元前1250年至1200年间修过的一面墙上，墙的一部分至今还清晰可辨。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某种形式的建筑还遗留下来了建筑用彩陶，但我们获得的大量遗存都属于公元前6世纪初期，大概与公元前566年雅典重新组织泛雅典娜节有关。可能建在帕特农神庙旧址上的所谓"赫卡托派敦神庙（Hecatompedon）"就属于这个时期，其字面意思为"一百尺长"。属于同一时期的还有一个献给雅典娜·尼克（Nike）（胜利女神）的祭坛，位于古典时代神庙的旧址上。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在卫城北边修建了雅典娜旧神庙，用以供奉雅典娜·帕里阿斯（Polias，城邦守护神）的神像。这是一座多利安风格的建筑，但在雅典建筑中也融入了伊奥尼亚的一些成分——廊柱和浮雕带。一系列有着精致彩绘的石灰石雕刻装点着各种各样的山墙，尽管具体建筑的最初安排和功用还无从确定。在这些年里，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甚至有可能在卫城上为自己建了一处居所，一些遗存也许就来自于这样的一座建筑。

公元前508年开始，克里斯提尼确立了民主制，这导致了在雅典广场更大程度的集中，使之成为一个政治活动而非宗教活动的地方。从大约公元前490年开始的十年时间里，也就是从建造帕特农神庙的前身开始，卫城的建筑工程持续不断。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间波斯人摧毁卫城时，这座神庙已经建到两至三个鼓形柱基那么高。一些这样的柱基和出自旧帕特农神庙的其他建筑材料，在公元前5世纪被用于卫城四周城墙的建筑上，至今仍可见到。尽管旧帕特农神庙离竣工还相去甚远，但我们知道它表明在阿提卡首次大规模地采用了大理石，融入了伊奥尼亚建筑要素，建造得很是雅致精美。在这些方面，它是几乎完全建在旧址上的古典帕特农神庙的先驱。

所有这一切都由于波斯人的破坏而荡然无存。古典时代的卫城对战后的空地进行了最为充分的利用。在该世纪



C·P·斯蒂文思（C.P.Stevens）所绘雅典卫城的入口大门，后面是帕特农神庙，如同公元前5世纪的模样。

（左页上图）波斯入侵前夕的卫城复原图。

（左页下图）卫城鼎盛时期的复原图。

中期之后，雅典财力逐渐从战争中得到恢复，重建工作即告开始，但这已拖了一代人的时间。另一个拖延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普拉提亚誓约》。鉴于雅典人和他们的盟友在希波战争后发誓说："对于那些被蛮族烧毁和破坏的圣地，我不会重建，我让它们保存下来，作为蛮族不敬神行为的纪念碑，以警示那些后来的人。"

进入卫城的路由西而来，上一个斜坡，经过庄重的大门入口或普洛披隆（propylon）。大门在被波斯人摧毁时尚未建完，现在则建了一条更宽阔的，有台阶的道路，通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入口。整个大门口建得几乎像一座神庙。它的外貌是严肃庄重的多利斯风格，顶上有山墙，里面的廊柱是较为柔和的伊奥尼亚风格。任何人走进去时都会被天花板上蓝色和金色的花格镶板的彩绘图案所吸引。左边的房间最初也许是作餐厅用的，但现在成了为人们所知的皮纳科特加（Pinakotheke），即艺术长廊。木板上悬挂着我们的文献中曾激情洋溢地赞誉过的绘画，右边矗立着雅典娜·尼克神庙（见第260页）。普鲁塔克在评论卫城时指出：卫城入口看起来就是一座按神灵旨意修筑的建筑，雅典娜"在这项工作的开始和结束都给予了帮助"。

雅典卫城的入口和帕特农神庙的位置，都经过刻意挑选，彼此关联，以便最充分地展现帕特农神庙，因为当人们穿过卫城入口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都一样——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帕特农神庙的西北角。尽管当时它们之间有一面墙，以免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帕特农神庙的柱廊，但拥有所有雕刻外观的上部却可尽收眼底。走出卫城入口，就可对帕特农神庙朝西的正面和长长的北面一览无余。这样，一眼就能看清这座建筑的一半风景。此外，帕特农神庙的活动区和大多数希腊神庙一样是在东头，从那里进入内殿祭拜神像。要想到达另一头，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顺着长长的边缘走，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仔细地观赏整座神庙的四分之三。这种设计如此聪慧和富有魅力，游客在进入神庙之前，就似乎不知不觉地看到了整座建筑的75%。这是地形赋予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契机，被建筑师们充分地加以利用了。

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一座建筑就是厄瑞克修姆庙。它超出了雅典娜旧庙的范围，其不规则的形状说明雅典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几尊历时已久的偶像必须被安置在指定的位置，北边地势急遽倾斜，在这里用上了高高的廊柱；与之相对，在南门廊使用了著名的女像柱。女像柱的优雅令19世纪中期的旅行家奥布里·德维利（Aubrey de Vere）惊叹不已，他写道："她们表情开朗安详，支撑着突出的檐口，状似戴着一顶皇冠而不是承载着一副重担。"

见过卫城的人很少怀疑普鲁塔克对卫城所下定论的准确性，他说这些建筑"给雅典带来了最赏心悦目的装点，也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惊异。"

古典时代（约公元前480～前323年）

从波斯人的破坏到伯里克利开始重建计划的30年间，雅典用几种途径迅速富裕起来。公元前483年至前482年，在阿提卡东南部劳里昂发现并开采了矿藏丰富的银矿；公共金库里饱存着提洛同盟成员国缴纳的贡金（该同盟的宝库在公元前454年从提洛岛迁到雅典）；在雅典北部潘提里库姆山（Pentelicum）系统发展起来的采石业。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它不仅提供了纹理格外细密的坚硬大理石，这是象征财富和高品质的理想之物，以致日后成为卫城建筑的一大特色，而且其位置就在城外。在古代，原材料的运输非常昂贵。例如，阿卡狄亚的巴塞（Bassae）神庙曾经给威廉·海伽特（William Haygarth）提供了写作灵感，他在1814年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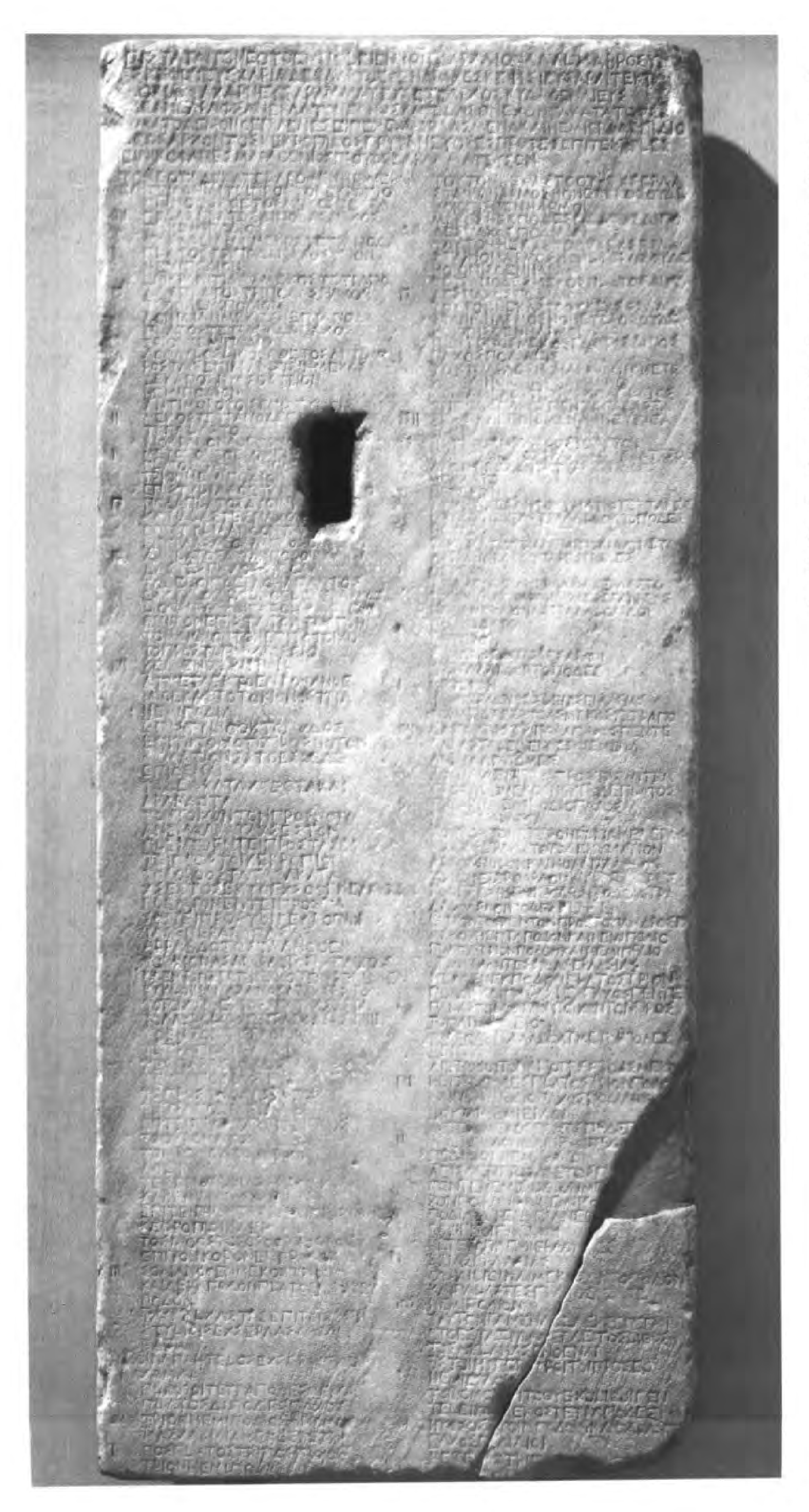
> 那些不断碎裂、颜色灰白的多利安石柱轰然倒地，
> 砸在散落成堆的厚重山墙之上。

这座神庙主要用当地产的石料所建，但有些石料是从帕罗斯运来的，经过400公里的海运和22公里的陆运，才运到1100米的高地上。由于附近有了采石场，建筑师和雕刻匠花费在考察采石场和选用合适石料上的开支与时间就可以节省下来。这些条件使雅典能建成一批举世无双的建筑，形成独一无二的风格。通过刻在大理石基碑上的记录，我们了解了这个工程设计和建造的众多进程。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政府挪用了建筑基金，使卫城的建设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之后，雕凿大理石的锤击声在卫城回荡了近半个世纪。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至公元前5世纪末叶，来到卫城的游客，首先看到卫城的入口以及突出在右边、规模不大的伊奥尼亚风格的胜利女神雅典娜神庙。过了入口就是帕特农神庙，它的宽度与长度都非同寻常，大概是希腊建筑中最伟大的成就。引以为傲的是，它精致的外观装饰在所有神庙中首屈一指。山墙装饰的丰富多彩与错综复杂可谓前所未有。全部92块精美的外部雕带间饰布满了雕刻，简直无与伦比。在外侧柱廊内的主殿外墙顶部不太引人注目的部位，有一排伊奥尼亚风格的浮雕带。它长达160米（524英尺），近1米高（超过3英尺高），最深的雕刻约6厘米（2英寸）。

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帕特农神庙是一件杰作，最明显地体现在它的精致上，也体现在建筑师为了纠正明显的视差所做的调整上。例如，为防止从下面看时垂直的柱子似乎向外倾斜，实际上把柱子处理成略向内倾。据估计，如果将这些柱子的上行线加以延长，会在空中1.5英里处相交。这种技术并非第一次采用，如在那座被波斯人毁坏的帕特农神庙的建筑中就曾使用过，但是现在的设计精度和改进的程度都胜过从前。实际操作中所面临的困难也相当大。石柱呈鼓形，用暗榫联结固定。如果柱子要一致内倾，每个鼓形柱切割的角度必须略有差异，使人们难以察觉整体的倾斜。通过这些加工方法，约三万吨大理石的排列竟然精确到毫米的程度。

在多利斯风格的帕特农神庙的北面，伊奥尼亚风格的厄瑞克修姆庙(公元前421～前406年)的精致堪与之媲美。但它虽然比帕特农神庙华丽，却没有它庄重



公共账目是许多古代建筑项目的一个特征。这些记录是反映工匠们的活动和社会地位的极为宝贵的证据，对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也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些来自厄瑞克修姆庙（约公元前421～前406年）的账目已得到公开展示。它们说明工匠中有一半是有居住权的外邦人，有四分之一是奴隶，还有四分之一是公民。建筑师的日工资是1德拉克马，其余工人根据工作付报酬：1条雕带可挣60德拉克马。给柱子制作凹槽，每20英尺可挣350德拉克马。必要时，3奥波尔或半德拉克马是维持生存的基本工资。



这是具有高度想像力的帕特农神庙图，是贝诺特·洛维奥特（Benot Loviot）在1879年至1881年间所绘，集建筑雕饰带、雅典娜雕像、古风时代后期厄吉纳岛的阿斐亚（Aphaea）神庙于一体。山墙顶两侧的猫头鹰尽管作为雅典娜的神鸟是恰当的，但却是虚构的。古希腊语中的“去雅典的猫头鹰”相当于英语中的“运到纽卡斯尔的煤块”。

——任何挑战帕特农神庙的尝试都是鲁莽的，具有不同特点的不同柱式使它成了完美的陪衬。但是，像帕特农神庙一样，它的建造是极其细心、极其精确的。铭刻在大理石上的建筑账目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厄瑞克修姆庙使用工人，包括自由民和奴隶的详细资料。

与大多数神庙一样，卫城的神庙被当做存放奉献物的宝库或仓库，而最初的设计则是把它们作为卫城圣所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圣所的主要功能。厄瑞克修姆神庙的作用清晰地体现在它的不规整布局中所举办的众多祭祀仪式上（我们不应忘记神庙区不仅指有形的建筑物本身，还包括庭院和祭坛），其中包括崇拜雅典娜、波塞冬和赫淮斯托斯的祭仪，也包括祭奠厄瑞克修斯本身。然而帕特农神庙的祭祀功能至少还难以确定。在帕特农神庙的内殿，由菲迪亚斯雕刻的雅典娜·帕特农雕像赫然耸立。雕像高约四十英尺[①]，用人们所知的黄金和象牙装饰技术制成，其躯干是根大木柱，装上象牙雕成的头和四肢，衣服上缀满用陶模铸成的金

① 约12.2米。——译者注

质圆片。尽管沿用了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制作工艺，但在大小尺寸上却是一种创新，因此它与帕特农神庙建筑的精美可谓珠联璧合。但正确地说，它应当称为“一件光彩夺目的奉献物而不是一尊祭祀神像”。

谈到它的“寓意”，我们不得不再回到帕特农神庙的外观。它的规模、精致程度以及建筑材料都非常有效地展示了雅典的财富和辉煌。雅典的各个方面都极为清晰地呈现在每一位游客面前。人们首先看到西山墙上描绘的雅典娜（城邦的守护女神）和波塞冬争当阿提卡保护神的故事。在此之前，这个神话肯定是不存在的，而且看来恐怕只是雅典人的神话。在所描述的人物当中，有一位雅典早期的国王凯克罗普斯（Cecrops），他与厄瑞克修斯是同时代的人，他的神殿就在对面。东山墙上描绘的是雅典娜的诞生。所以，这是独特的雅典主题而非普通的希腊神话。

排间档饰描绘了希腊人和东方人的战斗，西侧描绘的也许是亚马逊人，北面描绘的是特洛伊的陷落，东面是神与巨人的战斗，南面是希腊人与半人半马怪的斗争。这些浮雕刻画了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往往也被解释为雅典战胜波斯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那些由公众出资修建的壁画中，人们发现主要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涉及雅典对波斯的胜利。在雅典广场，西蒙奉献了一幅有关马拉松战役的作品。在大约公元前475年至前450年间，这里有人们熟知的画廊。这个主题也出现于胜利女神的神庙上。文学作品中也直接谈到最近的历史事件，例如，公元前472年由伯里克利出资承办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一剧。在他领导下，雅典后来大兴土木，修建公共建筑。因此，缅怀刚刚发生的英雄伟绩显然成了雅典人的义务，而且似乎成为雅典人的一大偏好。

倘若卫城建筑的这些装饰主题意在向外人反复传达一种有关雅典过去及其辉煌胜利的信息，一种老生常谈与充满自信的陈述，那么它们无疑很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是雅典人对这些建筑又有什么反应呢？他们肯定无法视而不见，即使在远比过去大得多的现代雅典城，这些建筑都格外引人注目。伯里克利说：“强大确实是我们留给这个帝国的标记和纪念碑。后世的人会对我们惊叹不已，就像现在这一代人的惊叹一样。”人们还会赞同他的这种美好情感吗？

大多数雅典人会多长时间为了献祭而爬上那道陡坡，或者仅仅去那里看看呢？那些著名的城垣——有些仍是迈锡尼时代的（约公元前1250～前1200年），但大部分是公元前5世纪建的——是否会使他们的注意力从今日的荣耀转向昔日的冲突呢？他们会和现在住在豪华住宅或古代遗址附近的许多人一样，从来都不屑于拜访它们一次吗？他们严厉诅咒过锤子敲击石头发出的无休止的叮当声和漫天飞扬的大理石灰尘吗？他们抱怨过食物的价格和浪费在建筑上的钱财吗？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庄严宏伟、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与色彩暗淡、几乎千篇一律的私宅之间的鲜明反差（见第92～93页）。

在希腊大陆的其他地方，泛希腊圣地的建筑和艺术装饰，如奥林匹亚和德尔斐，在古典时期也发展到新的高度。它们从希腊世界各地获得各种奉献，从宏伟的神庙到鄙俗的赤陶。如同雅典卫城一样，它们完美地展现出艺术和宗教之间的紧密联系，人们通过奉献贵重而美丽的东西来取悦和安抚众神。但是献祭不仅在于取悦众神，它还是向同胞炫耀自己的一个机会，再没有比奉献建筑、雕刻和奇

雅典娜·尼克神庙

"从这里可以看见海，据说埃勾斯就是在这里投海自尽的。"波桑尼阿斯这样谈及传说中的雅典国王提修斯的父亲之死。他是从伊奥尼亚风格的雅典娜·尼克或胜利女神庙坐落的地方投海的。提修斯约定如果他前往克里特岛消灭怪物米诺塔得手的话，回雅典时将在船上悬起白帆。然而，他因为成功而兴高采烈，竟然忘了约定的事，仍然挂着志哀的黑帆，结果悲剧性地误导了他的父亲。据说埃哥奥斯看见他儿子的船从远处驶近阿提卡，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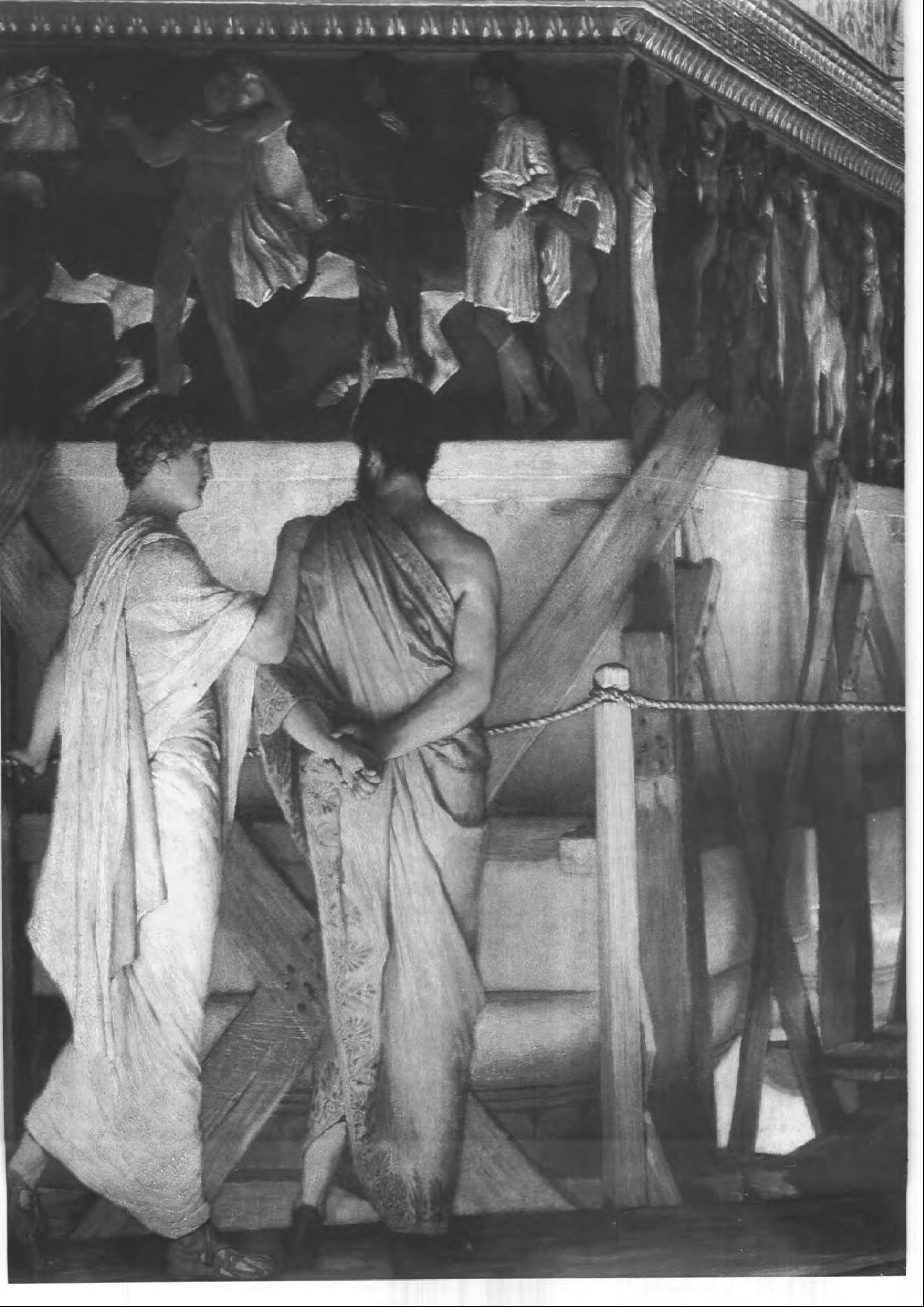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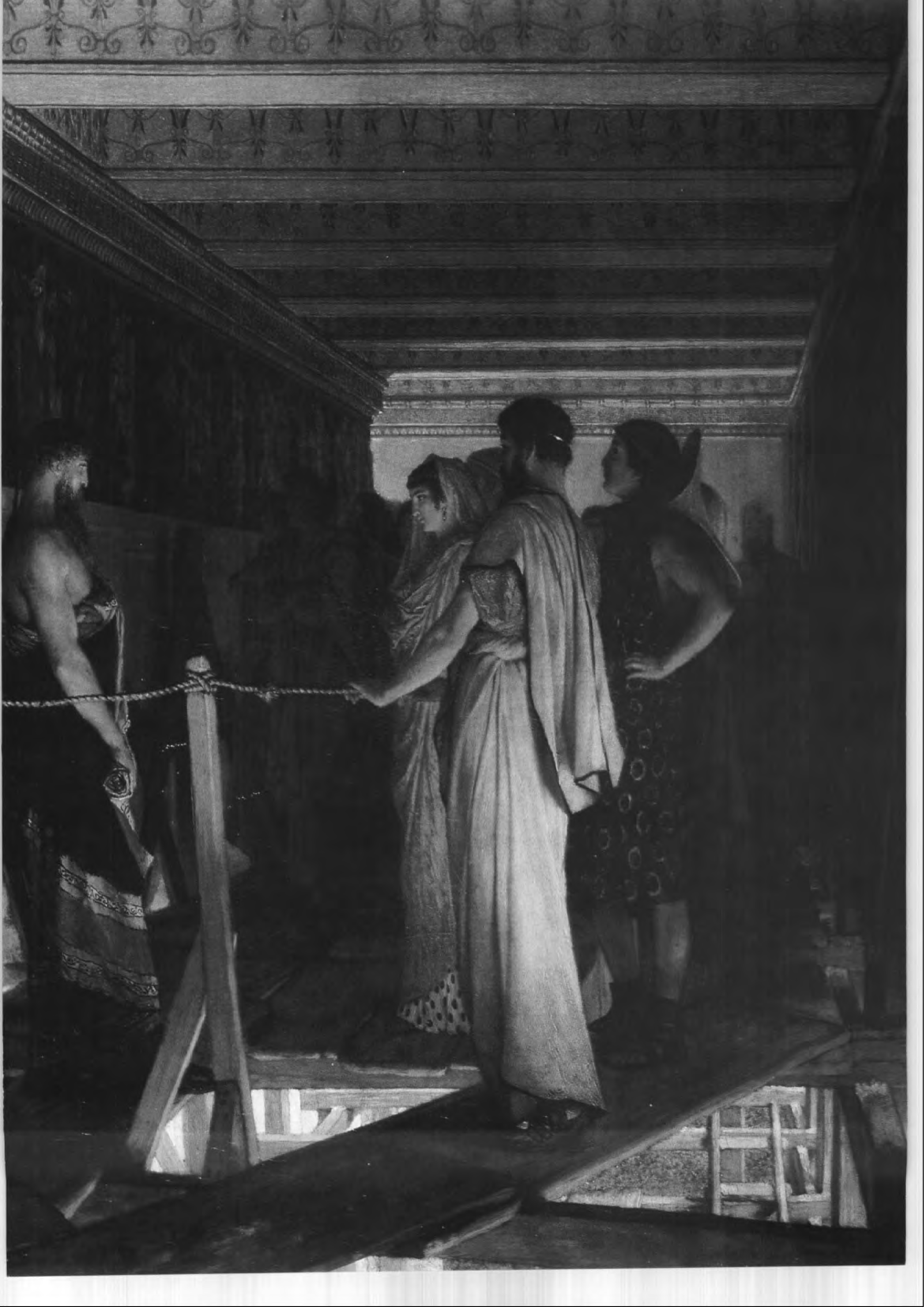
一事实有力地证明这座神庙应该是建在一个突起的山嘴上。它位于卫城的右边，在迈锡尼时期上面曾修过一座堡垒。古典时期又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然凸出的地方修建了卫城神庙中最小的一座，仅有5.4×8.2米(18×27英尺)大小，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27年至424年。

公元前575年至前550年建的一个祭坛是这一祭仪留下的最早遗迹。公元前480年至479年对波斯的胜利促进了雅典娜·尼克的祭祀活动的开展。她的神庙向所有来到卫城或从南面和西面仰望卫城的人，传递着清晰的讯息。根据约公元前450年的一项新规定，雅典娜·尼克的女祭司通过民主抽签的方式从所有的雅典妇女中选出。三面清晰可见的是公元前5世纪最后十年间修建的三面环绕的低墙。墙上有一系列的浮雕嵌板，各有1.40米(4英尺7英寸)高，载有精美的胜利女神尼克浮雕。三位雅典娜·尼克的姿态各异，身着精工细雕的衣袍。尼克女神是胜利的象征——在雅典她是无翼的。据波桑尼阿斯说："这样她将永远呆在她现在所在的地方。"用鲜亮的大理石和青铜传递的胜利信息不可能丧失或被误读。在一个像古希腊这样的视觉文化中，像这样的简单讯息能够通过艺术非常有效地广为传播。在石柱上方，一连串雕饰带表现了希波战争的场面，其中大概也有马拉松战役。

(1) 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怪物，被米诺斯禁闭在克里特岛的迷宫里，每年雅典需送七对童男童女供其食用。——译者注







（上页图）这是1868年，劳伦斯·阿尔玛－塔得马（Sir Lawrence Alma－Tadema））[1]对“菲迪亚斯（Phidias）和帕特农神庙的雕饰带”逼真的临摹，是一幅色彩斑斓、富有想像力的复制品，再现了帕特农神庙的彩绘雕刻。它清楚地揭示了在修建雅典广场的那些年代必然存在的特征：忙乱和嘈杂。

1863年，阿尔玛－塔得马在渡蜜月时参观了庞培城，完全被这些古典时期遗留下来的建筑美景迷住了。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描摹古典世界遗留的场景。在去希腊和意大利的旅行中，他不断地绘画和测量，可以说成了一个古典建筑和考古学界的专家。他用色大胆艳丽，如“蛙绿色”，然而古典文献却用极阴暗的笔调将豪华的建筑遗迹描绘成宗教奉献物。

珍异宝的方式更好的展示个人的机会了。

建筑师的技艺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对神庙内的装修也越来越重视。例如，阿卡狄亚半岛巴塞地区的阿波罗神庙（据波桑尼阿斯说，它由帕特农神庙的设计师伊克提努斯所建，首次在它的内殿装饰了带状浮雕（这些浮雕现在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以及第一个有记载的科林斯式柱头。在同样位于阿卡狄亚的特吉亚（Tegea），公元前4世纪中叶过后不久，神庙内墙上出现了堪与极富感染力的山墙雕刻和雕带间饰相媲美的装饰线条。建筑师巧妙地嵌入了门碰头，以便确保门在完全敞开时不致于撞上装饰线条而将其损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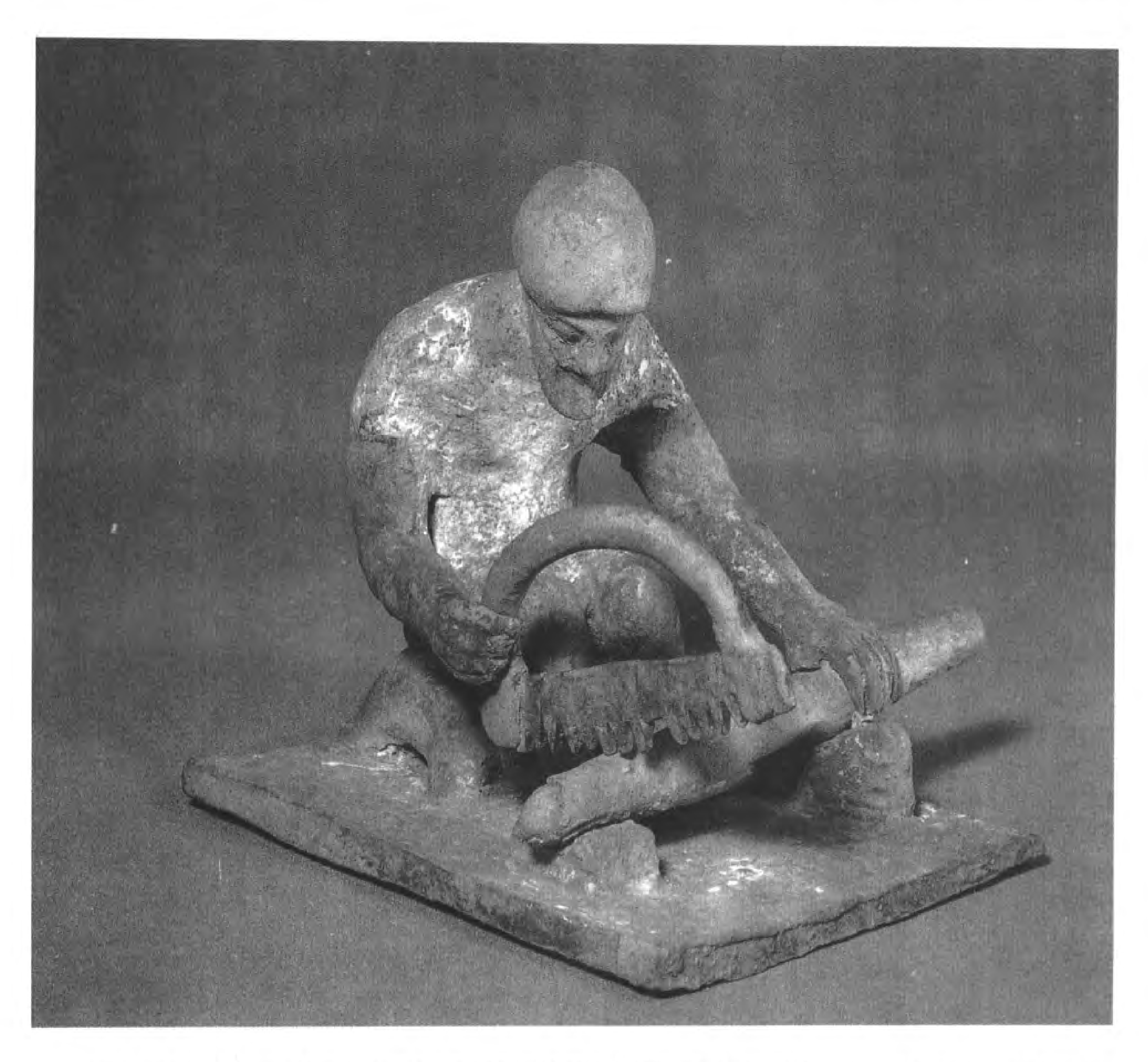
在希腊世界的两边，庙宇的尺寸非常独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有许多多利安传统风格的神庙。西西里岛阿克拉伽斯（Acragas）地区的宙斯神庙规模宏大，最为壮观，面积为53 × 111米（173 × 361英尺），至公元前406年迦太基人入侵时还未竣工，此时距开工已有一个世纪。

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柱式还像古风时代一样备受青睐。在以弗所，人们在古风时代的阿尔忒米丝神庙旧址上又建了一座阿尔忒米丝神庙。事实上，在小亚细亚采用的是希腊大陆所没有的建筑传统。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希腊国家和他们的那些处于独裁和宗主地位的邻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一种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糅合希腊世界和东方艺术影响的能力。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利西亚的那座精致的陵墓，即公元前4世纪早期著名的涅瑞伊得的纪念碑(见第173页)，现在它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这座纪念碑有一个高高的基座，上面饰有浮雕，描绘了一位东方国家的国王以及围攻城市和希波战争的场面。雕像的两侧有石柱，这些雕像也许是海洋神女或风神。一面山墙上描绘着一男一女在接受加冕，另一面山墙，描绘了一场战役，但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所有这些陵墓纪念物中最精致的一座位于哈里卡纳苏，这是公元前370年至前350年间为卡里亚(见第79页)统治者莫索勒斯建造的。这座原始的莫索勒斯陵，其基本形式与涅瑞伊得斯纪念碑一样，但规模大得多，约42米高（140英尺），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四马战车。在柱子之间有36尊该王朝统治者的雕像，大小或为真人的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在墩座的一级台阶上还装饰着更多的雕像。据普林尼（Pliny）说，墩座各边的装饰带是当时最著名的雕刻家斯科帕斯（Scopas）、布雷雅克希斯（Bryaxis）、提摩特奥斯（Timotheus）和里奥卡莱斯（Leochares）的作品。像菲迪亚斯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像和以弗所的阿尔忒米丝神庙一样，这座陵墓被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独立的雕刻

从古风时代后期开始，青铜成为人们雕塑独自矗立的雕像所喜爱的材料，原因是青铜具有更大的抗拉性。雕刻匠现在可用它制作各种雕像，其姿势也较大理石雕像要更自由多样一些。雕像的各部分先是独立制作，然后被拼装起来。它们都是用浇铸法制成，铸模的外面是赤陶，里面是石蜡制成的模芯。制作时把熔化的青铜注入铸模，石蜡融化后溢出。青铜重复使用时很脆，而且容易被腐蚀，因此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原件非常少（见第220页和第328页），详细情况只能依赖文献资料和罗马的摹制品。

[1] 英籍荷兰画家1836～1912，作品多描绘希腊罗马古迹，1899年受封为爵士。——译者注



公元前6世纪制作的一个正在锯木头的彼奥提亚陶俑。古希腊词architekton的字面意思是“木工师傅”。

公元前5世纪的主要人体雕刻家可能是阿哥斯的波吕克力托斯（Polyclitus）[1]，他的最著名作品是“多里弗洛斯”（Doryphorus），或“荷矛者”，该雕像还有一个名字是“卡农”（Canon），这是根据波吕克力托斯对这尊雕像的描述和应用的数学知识而得名的。它确立了新的人体比例，它的巨大影响不只是体现在同时代的许多衍生作品中，还体现在后来的浮雕和瓶画中。后来，另一位雕刻家——西具昂的李希波斯（Lysippus）[2]将波吕克力托斯的身体与头的比例由7：1缩小为8：1，这使得人体看上去更高和更苗条一些。据说李希波斯制作了大约1500个青铜雕像，但这一数字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尊雕像的制作都可能耗时一年。他多半只是设计者，而不是实际制作者。

① 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阿哥斯雕刻家，以其青年运动员青铜雕像著称，主要作品有《束发运动员》、《荷矛者》等。——译者注

②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雕刻家，所作雕像造型躯干较修长，头较小，以增加视觉高度。作品无存，仅有摹制品《刮汗污者》等。——译者注

在所有希腊雕刻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普拉克希特勒斯（Praxiteles），但他始终是一位晦暗不清的人物，甚至他的出生都不确定。我们有理由认为曾经有一个比他年轻的普拉克希特勒斯，也许是他的孙子，而他的一些作品（例如，奥林匹亚的赫尔墨斯和婴儿狄奥尼索斯像），被错误地当做那个更著名的普氏的作品。普拉克希特勒斯的作品风格比以前的更流畅，他塑造的雕像动作柔和，线条优美，有普拉克希特勒斯“S”形曲线之称。人们认为是他再次引入了大理石雕刻，也是他开始雕刻真人大小的女性裸体像。他用他的情妇弗里涅作模特，创作了著名的科尼多斯的阿弗罗狄忒像。弗里涅曾因在厄琉西斯节和波塞冬节上当着所有希腊人的面脱掉了她的长袍而声名狼藉（见第108～109页）。

人们在德尔斐发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后不久用黄金和象牙制成的雕像碎片。否则，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描述和从奥林匹亚找到的几片作坊瓦砾，来了解这种用在雅典娜·帕特农像上的最奢华的雕刻材料了。正是在那里[①]，屹立着用黄金、象牙制作而成的最著名的雕像范例，那是由菲迪亚斯为宙斯神庙雕塑的巨大坐像，时间是在创作完成了帕特农神像后不久。尽管这些幸存的作坊碎片并不属于那尊宙斯神像，但是它确实提供了这种技艺的某些迹象。波桑尼阿斯提到过这尊雕像，称“神自己见证了菲迪亚斯的艺术才华”。他说这尊雕像的前面有个油池，为的是造成湿润的环境，防止象牙碎裂。在雅典有一个水池对帕特农神像起到同样的保护作用。维护这些赫赫有名的雕像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特权。在奥林匹亚，菲迪亚斯的后代受命承担这项任务，他们被称做phaidruntai，或“擦拭者”。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感到印象深刻，公元2世纪的讽刺作家卢奇安冷嘲热讽地指出：观看者应该，“朝里窥视，我们看见了什么？乱糟糟的一堆木条、钉子、支架、楔子以及树脂、灰泥之类一切难看的东西，更别提它可能是老鼠与耗子的殖民之地了。”

在结束雕刻部分之前，值得再说一下在希腊各处发现的、往往经过精心绘制的成千上万件陶器。陶器生产的传统自早期铁器时代就一直延续，它的前身是迈锡尼陶器。据普林尼说，陶艺是从科林斯引入大希腊[②]的。两个地区在陶器的制作方面的确都具有高度娴熟的技能，但陶艺在西部却因缺少可供建筑雕刻的坚硬石材和大理石而持续繁荣。我们以出自科林斯的几件低档的儿童玩具来结束这部分的介绍，也许是比较合适的。

出自科林斯的德墨忒耳和佩尔塞福涅（Persephone）神殿的两个拼接的玩偶，时间属公元前4世纪。这些小陶俑易于制作，买来作奉献物或玩偶也很便宜。年轻女孩也许会给它们穿上衣服，献给两位女神。

① 指奥林匹亚和奥林匹亚的宙斯大庙，菲迪亚斯在那里制作的宙斯神像大量应用了黄金和象牙装饰。——译者注

② 大希腊（Magna Graecia，较为准确的译法应是“大格莱基亚”）是罗马人对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城邦的统称，西文中广泛应用的希腊（Greece）一词便出于这个术语的后一词。古希腊人称自己的国土为希腊斯（Hellas），亦即中译名“希腊”。现代希腊人仍沿用古希腊的这个称呼，而不是西文普遍使用的“格来基”或“格里斯”。相对而言，中文“希腊”的译名更符合实际。——译者注

瓶　画

众神穿梭
在花瓶周围，
说什么？
玩什么？
不知道，
虽说很美好。

牛蹄状的陶杯（角状杯），出自阿提卡，时间属于大约公元前470年至前460年。这是一组彩绘水平较低但却极富魅力的样本，展现了农村日常生活的景况。大概带有幽默的成分。

路易·麦克内斯（Louis MacNeice）的诗巧妙地使人联想到一个希腊陶瓶上所描绘的情景，这是从一定的文化距离上观察到的情景。彩陶是一种比较粗糙、易于理解的艺术，因此它比辉煌壮丽的建筑和雕刻更好地诠释了普通公民的兴趣，而建筑和雕刻则带有使命，为的是让外邦人和本邦公民产生深刻印象。当然，许多陶器没有彩绘，而在彩陶所表现的场景中，我们恐怕看到的也只是限于精英阶层的活动，其中主要是自我放纵的宴饮或酒会的情景。古风时代晚期的男性青年贵族热衷于此类活动，该时期雅典的陶器一般对此有所描绘，但陶瓶上也表现内容广泛的日常活动，如正在劳作的工匠——陶匠（见第199页）和金属匠（见第94页）；或者商贩——鞋匠（见第142页）[1]和鱼贩（见第189页）。妇女的情况与古风时代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主要以附属的角色出现，作为宴饮上的玩物、泉水边的打水人，或者大概在家中用羊毛纺线织布，或准备嫁妆（见第五章）。



① 作者把鞋匠或补鞋匠（Cobbler）划归商贩似不合适，应也列入工匠一类。——译者注

在古典时代的红图彩绘陶瓶中，令人注目的是一些像“柏林画家”那样的艺术家创作的名贵作品。这一名字来自有可能是他的最著名陶瓶的收藏地的名字，他对人体结构的把握与他的艺术造诣相结合，形成对人物形象的最精妙的研究。在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到50年代，有一组瓶画从同期的壁画——目前已经失传，但波桑尼阿斯描述过它们——中吸取灵感，描绘英雄的主题。许多人物被排列在不同的水平线上。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瓶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以极其精密、复杂的衣纹为特征——这种瓶画风格与当时的雕刻风格如出一辙，特别是与雅典娜·尼克神庙的雕刻风格（见第260页）。另一种是较为宏大的风格，成功地描绘了现实生活，但更为节省。

红图彩绘不是这个时代惟一的瓶画技艺，另一显著的技艺是白底画，图像画在一层白釉上——一种薄薄的陶土溶液——先用它在陶瓶上涂层。自大约公元前

绘 画

在我们拥有的文字史料中，绘画的突出地位与幸存下来的作品不成比例，所以我们对希腊绘画的许多理解依赖于如何解读这些文字史料。对彩绘柱廊装饰的部分复原，是对波桑尼阿斯的描述蕴含的众多信息所做的最新诠释，并且多半是最准确的诠释，因为它所根据的是同时代的瓶画形象（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然而，我们应当意识到文字史料有可能是以修辞方式撰写的，往往喜欢用“比较和对比”人物传记的方法。譬如对比两个古典时代的画家，其中阿伽塔尔科斯（Agatharchus）是绘画快手，而雷克西斯（leuxis）则是慢手慢脚的画家。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雕刻家和画家攸弗拉诺（Euphranor）说：他的竞争对手帕拉西奥斯（Parrhasius）画的提修斯是吃玫瑰长大的，而他自己画的提修斯则是吃肉长大的。

雅典广场（约公元前475～前450年）边上的画廊是由三位著名画家装饰的，即米孔（Micon）、帕纳埃努斯（Panaenus）和波里格诺托斯（Polygnotus）。画廊是西蒙对雅典进行改建的一部分，据说他和波里格诺托斯是朋友，因此，波里格诺托斯的画中包含着一幅隐蔽的西蒙妹妹的画像。柱廊上描绘的主题（如特洛伊的陷落、希腊人和亚马逊人之战、马拉松战役）是这类建筑物通常采用的重要题材。

私人住宅不用图像装饰，一个特殊例外是阿尔基比亚德斯的住宅，他曾经“将画家阿伽塔库斯（Agatharchus）囚禁在他的住宅中，直到他用画装点完房子才放他走”。据说阿伽塔库斯曾为埃斯库罗斯画过戏剧舞台的布景（见第231页），这种与当时名人联系在一起的例子反映出许多古代画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绘画与公共建筑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公元前7世纪中期科林斯地峡的波塞冬神庙的绘画，是保存得最好的少数几幅古风时期的作品，也许是受科林斯的统治家族委派创作的。它们画在内殿里面经过粉饰的墙上，用了各种各样的彩色涂料作为底色。画上的人像（约12英寸高）和图案与公元前7世纪中期科林斯陶瓶上的非常相似。

从威尔格希纳的马其顿统治者的陵墓（也许是腓力二世的）可以看出，国家与统治者紧密的同一性，这是希腊化世界的一个特征。正面的彩雕带描绘森林中的狩猎场面，也许描绘的是腓力二世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王。它的构图是幸存下来的图画中最复杂的，其特点是人像姿态各异，处于不同的水平面之上，与前景的距离也不等。此外还运用了各种色彩——棕色、橙色、蓝色、绿色、紫罗兰色和紫色。

雅典的“艺术长廊”或卫城山门的皮纳科特加（Pinakotheke 希腊语“艺术长廊”）的那些绘画（见第255页），都是在用白色粉饰过的木头嵌板上创作的。我们从德尔斐的希腊化柱廊的残迹获悉，嵌板可能是被挂在屋架上，用钉子固定。但一块嵌板也未能保存下来。事实上，我们仅有的木板绘画是一系列匾牌（见第196～197页），出自公元前540年至前500年科林斯附近的皮萨（Pitsa）。其中最大的6块的尺寸为6 × 12英寸，肯定比古典时代的嵌板小得多。沃基纳绘画既使用真正的湿壁画法，也使用干壁画法，在其他地方也使用蜡画法，即把颜料和融化的蜡混合在一起作画，这种技艺也被用于制作雕像和建筑。

重建后的腓力二世陵墓正面，位于威尔格希纳，呈现出彩绘雕带（见第60～61页）。

520年以来，白底画技艺就断断续续地用在各种形状的陶瓶上，特别是古典时代早期的陶杯上。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这种技艺主要限于制作细颈油瓶（不同用途的油瓶）。白底陶瓶通常用于丧葬，用来盛葬礼用的油，然后往往作为死者的陪葬品。白色造成中性的背景，较之鲜橙色陶土所允许的范围来说，有可能在上面使用更多的色彩。现在我们已发现有蓝色、绿色、红色和黄色。尽管许多陶瓶的颜色已经脱落，但仍有一些色彩绚丽的样本幸存下来。颜色的脆弱性使得它



一个雅典白底油瓶(95厘米/3英尺2英寸高)，约属于公元前410年至前400年。它被用来装油，在白底色上着有各种颜色，描绘葬仪场景。这是公元前5世纪民主雅典的最具特色的殉葬陶瓶（见第87页）。图中陶瓶的尺寸是个例外，相当于普通瓶尺寸的三倍。它在技艺上完全用白釉打底，利用明暗法和透视法以及各种彩色涂料，特别是紫色。

(右页图) 这是第一批希腊马赛克画中的一幅的局部，出自优卑亚岛埃列特里亚的一所房屋。其制作时间是公元前360年左右，在一定程度上是用建筑房屋时所使用的陶器碎片制成的。图案用按在胶泥上的碎石子拼成，有些图案先有素描大样，采用的方法同制作红图彩绘陶瓶的方法雷同。围绕由棕叶和光芒四射的太阳组成的圆形浮雕，是相互对称的狮子袭击马的场面，以及一位身穿斗篷的英雄正与狮身鹰首怪对峙(神话中的野兽，半狮，半鹰，王室喜欢将它作为纹章符号)。

们并不适于正常使用的磨损，但它们却是理想的陪葬物。白底油瓶在希腊陶瓶中不常见是因为它们上面的图像几乎总是反映了它们的用途，上面描绘的神话往往与死亡有关。但我们更经常看到悬挂着带子和奉献物的墓冢和纪念碑。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描绘的人是普通的雅典人，特别是妇女，她们在坟墓旁伤心落泪，与逝者诀别。

公元前4世纪是雅典经济衰退时期，雅典彩陶通常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到了公元前320年左右出现了停滞。但是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质量上乘的雅典陶瓶标志着最后的繁盛期，面世了一些人体描绘的精品，只用寥寥几根线条就鲜明地勾勒出了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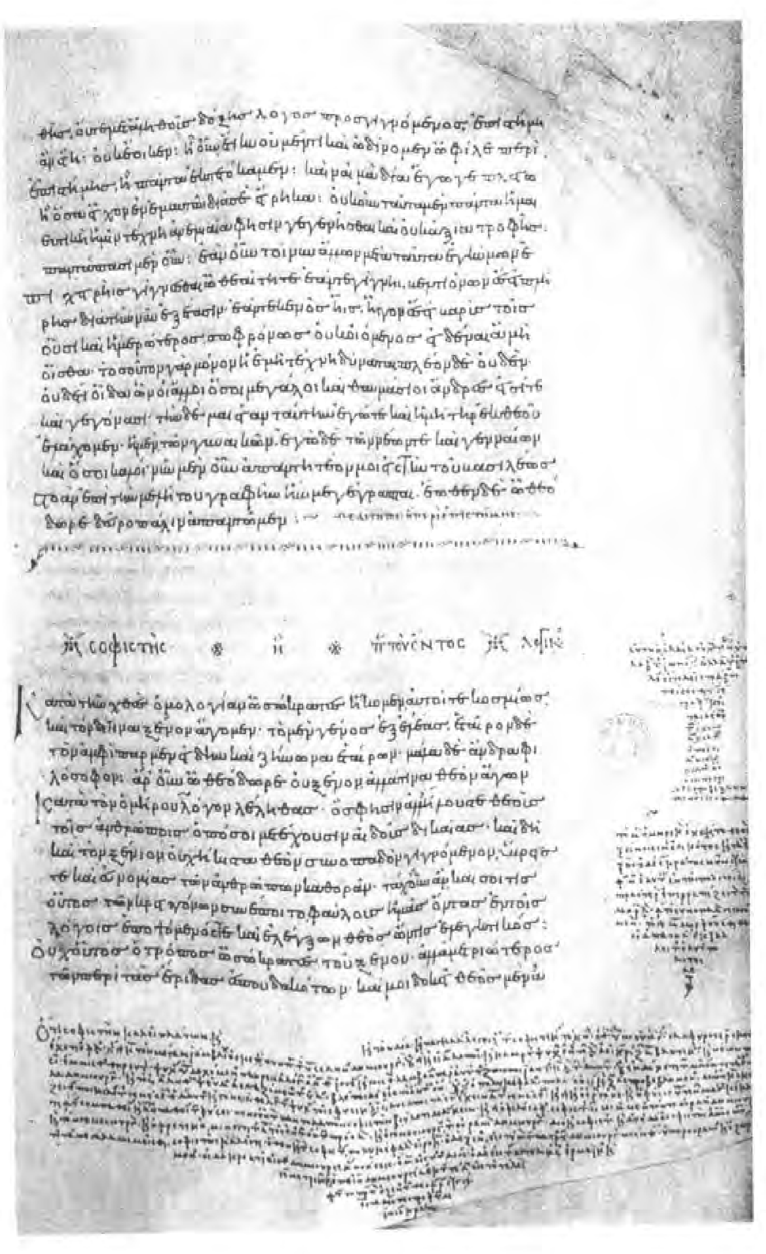
相反，在南意大利，公元前4世纪却是一些地方瓶画流派繁荣的时期。在希腊大陆，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斑纹马赛克，如在雅典、西具昂和埃列特里亚的陶器上。但最引人注目、最上乘的陶瓶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的马其顿尼亚，特别是在马其顿王朝的首都派拉。也是在马其顿尼亚的威尔格希纳 (Verghian)，发现了第一批保存下来的古典壁画。于是，恰恰在古典时代终结之时，希腊艺术转移了方向，艺术力量与保护、赞助人之间的平衡发生的变化，不再与政权的变更无关了。我们所讲的故事在告别本章一直讨论的那些中心之后，又在希腊化时代延续，但那已是另一个时代了。



第十一章 哲学与科学

史 料

前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家们的众多文本，存留下来的是一些断简残篇，有时仅是只言片语。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出自早期著作、长短不一的残篇，是由相当晚后的古代学者从古代图书馆的大量藏书中摘录出来并汇编成册的（或收在他们自己的小册子中）。这些残篇广为流传，一再传抄而得以保存，而较早的哲学家本人的完整作品却失传了。结果，有时很难确定编撰者何时在引用、释义或诠释哲学家们的原作。



柏拉图的情形恰恰相反。种种迹象表明，柏拉图发表的作品都已流传下来，而且有许多作品冠以他的名字发表，却并非出自他的手笔。因为他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受到人们的尊崇，所以我们拥有他的所有作品的最好手抄本。对于他的作品的含义分歧通常不是由细微的文本差异所引起，而是由具体的章节在整部作品中的具体上下文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又是另一种情形，他的作品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普及性作品，意在公开发表；另一类是学院式作品，这是他在吕克昂学园给学生上课用的讲义。只有普及性作品保留了下来，由于这些文本未经润饰，几乎每一章节的含义都引起巨大的争议。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许多章节不仅要结合各自的上下文，而且要结合他的文集的所有内容来讨论，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较柏拉图更多地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这样只会增加诠释他的作品的难度，因为亚里士多德经常改变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时前后观点是明显相悖的。

由此造成的误解与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任何一位哲学家的观点的正确性，他的意图，有时甚至是他说的话，学者们所持的观点都可能截然相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早期希腊哲学的任何段落的看法一概没有共识，而是告诫人们不要把任何问题都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希腊文化中关于世界性质的最早的理论表现为诗人创作的神话和占卜者或预言家发布的神启。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概括性认识，认为人们能够借助理智而无需求助超自然的东西，就能弄清楚主宰世界万物的力量——这种思想形态通常被称做自然哲学。希腊思想的这种新维度最先在伊奥尼亚（现代土耳其沿岸，当时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得到记载，所以这一思想进步有时被称做



柏拉图的著作由于受到他的门徒及后来的所有哲学家们的尊崇，从未面临失传的危险（参见上页）。这是9世纪流传下来的他的对话体作品《智者篇》的一页手稿。空白处较小的文字是中世纪一位学者所做的批注，在众多流传下来的手稿中具有代表性。有时，当作品再次被抄录时，这些批注偶尔可能会被收录进原作，这就使得即便是一部保存完好的文本，其原始内容也遭质疑的原因。由于一次又一次地被转抄，古代幸存下来的著作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偶尔也能重新发现一些古代被遗弃的纸草纸残篇，就像（左图）这一页希腊化时期的、出自业已散佚的其他著作的几何学纸草纸残篇。有时也的确能够发现一些保存完好的新著作，如人称“无名氏的隆基尼西斯”的纸草纸文献，发现于1892年。它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古代医学的知识。

伊奥尼亚革命。

促使这一革命的两个重要因素是闲暇与财富，这使一些伊奥尼亚人有时间沉思冥想。伊奥尼亚人的富足得益于同巴比伦和埃及的贸易，这两地均有古老而丰厚的文化。但其他社会显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济繁荣，但它们却不像希腊人那样醉心于试图用理性来解释世界。

希腊人对巴比伦天文学成果的认识以及对这些成果的利用，有力地说明希腊自然哲学的革命成就是什么。当伊奥尼亚第一批思想家开始思考世界本原的问题时，巴比伦天文学家观察、记录某些天体现象已有大约一千年的历史。这使他们能够预测某些天体活动，并开始开发出一种数学体系来帮助他们进行天文预测。巴比伦人对天体感兴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天体预示着人间的君王个人及其王国的未来。他们对为何月食会在特定的时间发生不感兴趣，只是对这一现象感兴趣。他们不去争论天空必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而是研究天象所隐含的神灵对人类的指令。

希腊人利用巴比伦的天文学资料（也同样利用了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学思想以及某些医学知识），采用的是前一种探询方法，其原因部分在于希腊社会的两种特殊制度。

首先是希腊神职人员的性质。与巴比伦、埃及和其他大多数早期文明古国不同，希腊的祭司并不被看做是有高深智慧的人，因此对于任何使自然力世俗化的最初尝试，希腊社会不存在强大的阻力。第二是公开的争辩，这是民主制的先导。希腊思想家们如果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理论，其理论架构必须经得起公开的、理性的探讨。因此，伊奥尼亚的思想革命主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原因——财富、闲暇、贸易、软弱的神职人员以及公开的辩论。然而，我们永远无法充分理解为什么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希腊人就能极其乐观地认为人类能够理解、解释以及或许能够操控自然界的运行。

西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有其坚实的经验基础。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们把世界的存在看做是预先存在的，并致力于解释世界为何以这种方式存在。但他们也提出一种假说，认为知识是真实和永恒的。因为世界万物是永恒变化的，它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呈现的状态并非是它们的“真实”状态，因此认识这个世界必需识别出始终隐藏在所有变化之后的、永恒不变的一种基本物质。

今天人们认为这种努力更应当属于科学领域，而不是哲学领域。但在西方哲学发展初期，这两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作为哲学家，早期的希腊思想家们主要依靠推测而不是通过系统的观察和实验来证明和阐释自己的理论。然而，他们相信他们建立的学说可以借助于一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加以证实，但是那些与之论争的学说也能用同一类现象进行反驳。起初，当那些观察到的现象有利于其观点时，希腊思想家偶尔也会加以利用。希腊科学始终没有发展出一种方法，即为了证实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而精心设计一些方法来证明它。不过到了古典时代末期，还是出现了一些学科，特别是医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的理论尽可能多地运用经验的论据来加以阐释。有些理论可以通过若干程序加以证实，而这类程序可随意重复，且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这实际是一种初步的实验。这种立足于观察的研究方法后来逐渐成为哲学探索中的对比法，但其根源在于相同的信念，即相

信人类的理性能够认识隐藏在变化着的世界背后的秩序。古典时代末期，“哲学”这一术语是指对知识、存在、神的本质、道德等领域所做的系统探讨和理论建构。这一认识主要是受柏拉图的影响，虽然人们认为毕达哥拉斯最早使用这个术语来标明自己对认知的热爱。

米利都的泰勒斯被认为是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尽管曾经有个杜撰的故事说他是位心不在焉的人（据说他在观察星星时掉到一口井中），但是历史上的泰勒斯看来非常讲究实际。据说他曾提过政治建议，提出伊奥尼亚人建立一个单一的协商议会，还建议进行河水分流，以疏通河道。他利用根据天象预测天气情况的知识，种植橄榄而发财致富。据说他还预测过一次日食。

米利都派

泰勒斯

泰勒斯是文字记载中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初叶的伊奥尼亚城市米利都，据说曾是位商人，因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假说而享有盛誉。他这样考虑的理由是水作为惟一的物质，以液态、气态和固态形式自然地显现，或者说一切生命都取决于水。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

泰勒斯似乎把世界的本质——水看做是有生命的，并具有再生性，因为他找不到任何一种能创造水或能毁灭水的外力。他以磁石和琥珀具有吸引力为证，说明即使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东西也有灵魂，如自身驱动的生命力。但是大部分石头并不具备自身驱动的能力。如果泰勒斯意在暗示所有石头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灵魂，那么他引磁石的特性为证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例子，说明希腊哲学家们仅凭经验性的观察而完全不考虑其他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他区分有生命的与其他各种无生命的石头，他就无法解释作为生命之源的水如何能成为无生命的物质，或一旦水变为无生命的物质，它又如何再生。



阿那克西曼德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也是米利都本地人，是泰勒斯的同时代人，但年龄要小一些，可能是泰勒斯的学生。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无限定”（希腊语为apeiron）。“无限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它也是“无界限”，将它的一部分分割开来也不会限制它，如同分割水一样，比如往杯子里倒入一些水。在这个意义上，无限性不能等同于任何一种自然产生的物质。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水和杯子这两者都是相同的、持久不变的“无限定”。因此，这种“无限定”尽管仍是一种东西，但只有那些智者才能理解。从这个无限体中，通过永恒的运动分离出对立物，如热和冷。这些对立物一旦产生，根据公正和必然性的原则，彼此间互相作用转化，从而创造出世界万物。当这些对立物又复归于无限时，世界万物又消灭了。关于万物始基的观念表明阿那克西曼德有可能把“无限定”看做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但他把必然性和公正性看做是外在于物质自身的引起变化的力量，这一点仍不

明确。阿那克西曼德始终没有讨论过从空间、时间和形而上的角度去区分无限性。

阿那克西美尼

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是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位代表。他活跃于公元前650年至626年间，可能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他重新将一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质作为世界万物的始基，这种物质就是空气。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举了个例子：空气在两种最基本的对立面——冷和热之间变化。噘起嘴去吹手，空气是冷的；嘴巴张大哈气时，空气是暖的。因此，他认为世界万物——一般认为较空气冷——是由于空气逐渐变浓形成的（如风、云、水、土、石)。像火这种比空气温度高的物质，是空气变得稀薄时形成的。这样，阿那克西美尼首次试图用事物的量的差别来说明质的变化，虽然他并未能认识到引起变化的本质力量，这很可能是由于他认为空气是有生命的。

色诺芬尼

色诺芬尼于公元前570年左右出生在伊奥尼亚的科罗枫（Colophon）城，但后来定居在意大利南部。他接受了自然哲学家的观点，认为世界是某一种无形物质的有形体现。但是，他不再去研究这一无形物质到底是什么，而是把研究转向促使事物发生变化的力量——神灵。他之所以名闻于世是因为他指出大多数文化都用他们自己的形象来描绘神的形象，并说如果马能描绘神的形象，那么神肯定跟马相似。因此色诺芬尼认为传统的神灵观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缺乏一种超越世界偶然性的必然绝对性。取而代之的是他提出了一位惟一的、不会运动的神祇，通过纯洁的思想统治着世界万物。

色诺芬尼的“神”很可能是一种超验的想法，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清楚地阐明了这位神是怎样与世界上的万物发生联系的。他可能并未试图去解释这种关系，这是因为鉴于神本身既是实在的、永恒的，因此又是可能认识的对象。色诺芬尼认为人们关于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万物的认识只不过是一种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色诺芬尼否认观察和理性有助于知识的发展。毕竟他关于神性的观点是以理性化的秩序世界的存在为基础的。他认为内陆深处存在着海洋化石，表明现在的干旱大陆过去曾是一片大海。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彻底认识属于神的职权范围。

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派

毕达哥拉斯和色诺芬尼同是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人。与色诺芬尼一样，他也是伊奥尼亚人，后来定居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敦（Croton)。在克罗顿，他建立了一个社团，其成员联结的纽带不仅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思想，而且是共同的宗教信仰。自社团建立之日起，毕达哥拉斯派教义的任何进步都与毕达哥拉斯本人的贡献分不开。因此，从后期积累的记载中很难分辨出最早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形式。

毕达哥拉斯主义中有两个明确的特征，即神秘主义和关注数学。毕达哥拉斯

学派的许多关于伦理道德和行为美德方面的信仰，与其说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宗教神秘主义之上。例如，他们相信死后灵魂能够轮回转世（他们认为灵魂能够移居到其他肌体中，包括动物的身体，这导致了他们禁食肉类）。这些信仰基于神秘主义而非理性，很难与他们的哲学理论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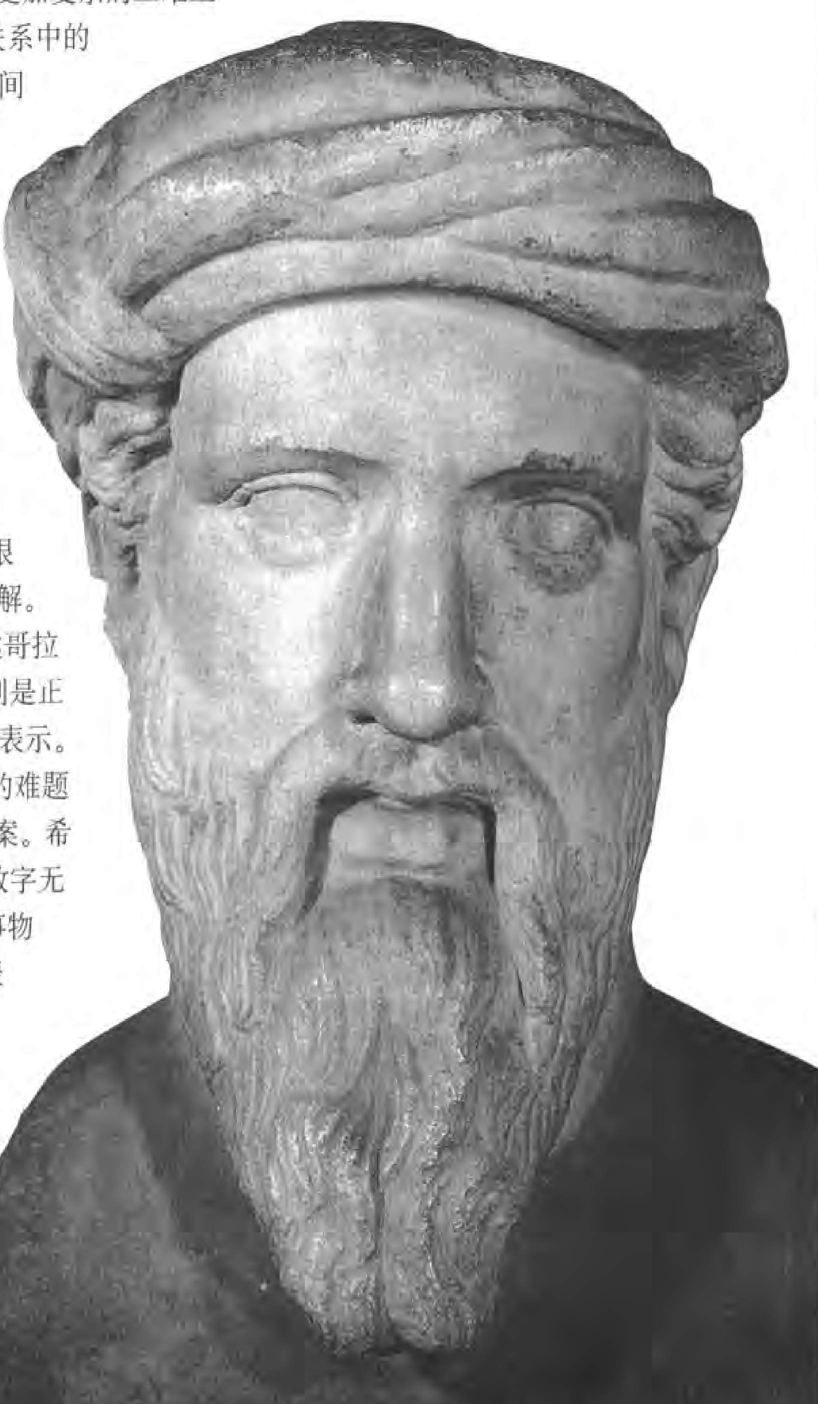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是数"。传统认为，毕达哥拉斯的这一信念来自他对音乐的观察，他发现两个谐音之间音调的不同可以表示为数量的比例关系。例如，把琴弦的长度缩短一半可以发出八度音阶的最高音，而这根琴弦原先却发出最低音调。因此，一个八度音阶的最高和最低音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2∶1，而第四音、第五音与最低音之间的比率分别是4∶3和3∶2。毕达哥拉斯学派由此进一步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数字现象，主要是在几何学领域。他们用数学来表达事物的形成，从一点开始，逐步构成各个事物：1是一个点，2是一条线，3是最简单的面（三角形），4是最简单的体（四面体）等等。更加复杂的三维立体和抽象的概念则与更大的数字相关联。这些对应关系中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偶然形成的，例如250这个数与人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他们确实能做出有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一定的数字与一定的物和概念有关，例如公正与数字4之间的关系。他们总的信仰大概是：认识每一个具体事物的数就能认识该事物是如何与其他事物发生联系的，进而能够全面理解整个宇宙的秩序。

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没有指出数字规约的实质，但承认如果没有可以用数来表达的物，就不会有像数（它设定形式或界限）这样的事物。所以世界上的现象是由两种基本对立的元素——有限和无限相互作用形成的，虽然人们只能对有限（数）有所了解。

在公元前5世纪的某个时候，有一位可能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腊人，发现了一些不能通约的现象，特别是正方形的边与其对角线的关系就不能用整数的关系来表示。事实上，这一问题巴比伦人在推算2的平方根数值的难题时已经知道，但他们通过取近似值的方法来得出答案。希腊人在解决同一问题时，最终用几何方法证明这一数字无法表达。连正方形及其对角线这样关系密切的两个事物之间的比例都无法用两个整数之间的比例关系加以表达，这不能不说是对毕达哥拉斯思想——认为只要认识事物的数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可以认识整个宇宙——的一种严重挑战。有一则传说说明这一挑战对毕达哥拉斯理论所含的威胁：希帕苏斯（Hippasus）发现存在着不可通约数，神对此大为不满，就把他淹死了。

然而，柏拉图着手研究了数学、几何、

毕达哥拉斯。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两边平方之和"这一定理，然而在此前几个世纪，巴比伦数学家和工程师们就已知道这一定理了。希腊人称它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他们认为他首先用直观的证据表明这个定理的真实性，尽管后人并未找到这样的证据。



谐音中的数之间的关系的纯粹性和永恒性，他用数学来揭示认识存在本身这一活动的纯粹性。

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在公元前5世纪初活跃于另一个伊奥利亚城市以弗所。我们仅拥有赫拉克利特哲学著述的残篇，这是一些精心雕琢、晦涩难懂的警语，因此我们很难看懂他的思想体系的各部分是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如他的前辈一样，他相信在变化多端的世界背后肯定存在着某种永恒的理性化的秩序。赫拉克利特用“逻格斯”（Logos）一词来指这一秩序。宇宙中存在着的这种秩序是各事物之间存在一种“比例”关系的“原因”，人们可以用“理性”去认识它，用言说来表达它。这些斜体字都可以用希腊术语“逻格斯”来表述，每当赫拉克利特使用“逻格斯”一词时，他头脑中似乎想到的是所有这些含义。

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理论与其先辈理论有一个明显差异，他认为正是事物的多元性及对立物之间的张力才使世界具有统一性、永恒性和实在性。世界的本质，即所谓“逻格斯”是不断变化的。他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弓的存在仅仅在于弓弦和弓背的反方向拉动；如果没有死亡标志生命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生命就没有意义；没有下降就没有上升。简言之，如果A的对立面（非A）不存在，A本身也将不存在。在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学说里，不存在一种单一的、本原的、普遍的物质。

火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尽管他从不认为有那么一个时刻万物都是火（他确实认为没有那种时刻），但他认为万物最终会与火“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总是“按量度”实现的，因此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世界万物之间始终存在着同样的比例值，世界的永恒性和“逻格斯”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持着存在。火对于赫拉克利特具有特殊的意义，至少部分因为它与其他物质相比是更为清晰可辨的变化之源，因此它有时更易于形象地表明作为原因的“逻格斯”。因为只有当人们有生命、有温度的时候，才参与到“逻格斯”（理性）当中，所以赫拉克利特把不朽的灵魂等同于人身上的“火”。

赫拉克利特明确主张：一旦他搞清“变化”是世界真正永恒的特性，并能识别引起变化的力量——火一般的“逻格斯”——虽然有点令人困惑不解，他就有可能认识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在事物按一定量度“燃烧”和“熄灭”的过程中，变化本身赋予事物以规定性。赫拉克利特认为：人在不同的时间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那河中流淌的水却已经不同了。这一陈述并未否认人两次踏入同一条河的可能性，这一点有时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如果河流不会变化的话，它将不是一条河。倘若人没有经过从出生到衰老的各个阶段，他们将是某些别的东西而非是人。

巴门尼德

出生于爱利亚（意大利南部）的巴门尼德，是赫拉克利特的同时代人，只是

年轻一些，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他同先于他的每个希腊思想家一样，是从这样一种预设开始的，即能够认识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和永恒的。然而，他是第一位否认现实世界的万物具有真实性的思想家。他致力于解释的问题不是变化的存在，而是存在的本质。他对真实的绝对本质的阐释可能受到色诺芬尼的影响。

他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思维“途径”：一种是必须遵守的“真理之路”，它宣称“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另一种是必须放弃的途径，即“存在者不存在，并且必定不存在”。这种思想是对赫拉克利特观点的反驳。后者认为事物A的存在必然意味着有其他的事物，尤其是与A对立的非A的存在。巴门尼德把“存在”作为他的探询对象，认为“存在”不存在，也就是否认存在的存在，是非常荒谬的。通过把否定“存在”为本质或特征的“不存在”这个用语引入“真理之路”也是不可能的。巴门尼德视这种关系是互补的，如果它们否认“存在”，那么“存在”也否认它们，于是对它们来说就没有真理之路可言。

这并非意味着巴门尼德对“存在”的论题没有做出否定的陈述，而是说“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关于“不存在”，人们不可能了解或说出它来。

那么，对巴门尼德来说，只有与“存在”相一致的论说才是真实的。比如“存在是永恒的”就是这样的例子之一，因为“存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同样，关于“存在”是连续的、不可分的、同质的论断也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在把它从自身分离开来后还能够存在。巴门尼德把“存在”看成是有限的，因为他把有限性看做是自足和完美的一面，但却又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存在”，特别是他认为没有虚空这一现象，因此“存在”是不可移动的。

虽然巴门尼德从未讨论“不存在”之路的不可能性，但他的确探讨过“表相之路”，他借助“存在”与“不存在”来解释到底是什么促使人们形成了关于世界不能永存的流行看法。他看来提出了一个很成熟的理论，即宇宙起源于事物的对立面，如光明与黑暗，稠密与稀疏。巴门尼德始终认为，人们观察到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因此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我们对巴门尼德这方面的理论所知不多，因为即使是这一理论的创立者也无法证明它的真理性，所以这一理论对后期希腊哲学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

巴门尼德的遗产使希腊哲学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研究真实的本质，以及如何撇开“不存在”的存在这一似是而非的问题，解释存在的不可分割性和运动的发生。从巴门尼德的初步推论或抽象逻辑推理之中，衍生出了苏格拉底的反驳论证法、数学证明法以及柏拉图的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

在巴门尼德的追随者当中，有爱利亚的芝诺和萨摩斯岛的麦里索斯(Melissus)，两人都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一并被划为爱利亚学派。芝诺和麦里索斯提出了新的论点以便支持他们的老师（巴门尼德）关于真实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学说，尤其是运动只是看似发生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观点。因为在走完任何一段距离之前，必须先走完它的一半；接下来，必须走完一半距离的一半，依次下去，有关距离在不断缩短，但永远也不能到达终点，即彼此之间的距离为零。所以，永远不可能走完这段距离。在有关这种似是而非的学说的一个说明当中，芝诺认为

阿基琉斯永远也追不上比他先出发的乌龟。

恩培多克勒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大约在公元前492年生于西西里岛。同南部意大利的邻人色诺芬尼和毕达哥拉斯一样，他对宗教和神秘主义感兴趣。他接受了巴门尼德的学说，认为存在的东西必然存在，意即它不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但他也坚持原始伊奥尼亚学派的经验观察法，认为这个世界有一种相对的真实性。他在论证这一点时把世界变化的过程解释为四大永不变化的元素按不同比例不断分离和聚合的过程，它们是土、气、火和水。但与巴门尼德相反，恩培多克勒认为这四大元素是可分的。与泰勒斯和阿那克西美尼的体系相反，他认为水永远不可能是“非水”，空气也永远不可能是“非空气”，而是以不同的量混合在一起形成的不同的物质。

恩培多克勒的理论体系中还包含两种力量，用来解释分离和聚合发生的原因，这两种力量比赫拉克利特的火（逻格斯）学说更明显地具有无形特征。他把这两种力称为“爱”和“恨”。“爱”使所有元素聚合，“恨”使所有元素分裂。恩培多克勒认为宇宙本身在绝对的“爱”和“恨”这两种力量间来回摆动。当完全是“爱”时，所有元素聚合成同质、无差别的整体；当完全是“恨”时，各种元素又被严格地互相分离开来。当这些元素在两个极端之间游移，从“爱”转到“恨”时，它们便借助于聚合或分解，化生出世界万物。恩培多克勒指出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事物是一种变动的事物，只有那些具有适应性的事物才能幸存下来。

然后，恩培多克勒转向伊奥尼亚派的思辨的唯物主义，但在探讨原因方面比伊奥尼亚学派前进了一大步。他用四大元素不同比例的混合来解释宇宙的变化，而不是用单个物质的质变。这一学说在其后2500年时间里成为科学的基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承认四大元素（土、气、火和水）成为恩培多克勒学派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恩培多克勒明确地将物质和力量分开。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希腊思想具有强烈影响。

原子论者

原子论的最早提出者是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琉基浦斯（Leucippus），但更有名气的倡导者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他是苏格拉底的同代人，年龄较苏格拉底稍小一些。但正像恩培多克勒和阿纳克萨哥拉斯的理论一样，由于原子论是对巴门尼德学说的一个直接回应，所以它基本上属于前苏格拉底哲学。

如同恩培多克勒一样，原子论者赞同巴门尼德关于“存在”本质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同世界是由这个“存在”而产生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原子论者同意爱利亚学派关于“存在”是永恒的、不可分割的、永不变化的和同质的观点，但是他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存在实体，即原子，其数量是无限的，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不可分割的东西。在原子论者的理论体系中包含这种实体的多样性，因为他们拒斥巴门尼德关于“不存在”不可能存在的说法。他们认为虚空对于运动来说是必

要的。只有承认被巴门尼德否认的三种状态的存在——多样性、虚空、运动，“存在”才能创造出万物世界。

原子的大小、形状不同，而且是永远处于运动当中。它们在运动中任意碰撞，但有时在无限的时间中产生可以长期延续的结合，并由此产生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众多原子以不同的比例和配置进行结合，从而生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包括颜色、气味和口感等一些“次生”的质（“触摸”是影响原子形状的一种功能，因此属于“原生”的质）。任何由于原子结合而成的物体最终会由于虚空的介入而被毁灭，因为在虚空中，两个原子无论结合多么牢固，也可能在外部原子的碰撞下或因其内部原子的运动而分裂开来。

对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的思考，可以使人们认识真理。因为事物的本质是由灵魂感知的，灵魂本身则由精细、圆形的微小原子构成（像火一样）的物质性的、可朽的物体。就构成灵魂的原子确实会移动而言，这些说法是正确的，但它未必反映了事物存在的真相。为了获悉关于原子、虚空和运动的最终真相，我们必须利用理性认识——物质性的灵魂的又一种功能——从可见物推知不可见物。



据说德谟克利特发现人类的愚笨是可笑的，因此最迟到西塞罗所处的时代[1]，他获得了“欢笑的哲学家”这一称号。德谟克利特坚信生活必须适度，这种思想体现在他的有关道德论述的残篇中，如下面的记载：“没有节庆的生活就像没有旅店的漫漫长路一样”，“更多的人是在实践中变善，并非天生就是善人。”

阿纳克萨哥拉斯

与恩培多克勒及其他原子论者一样，克拉佐美纳的阿纳克萨哥拉斯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主要生活在雅典。阿纳克萨哥拉斯认为事物的变化出自一些事物的比例变化而非源于一种事物的质变。他争辩说世界上并不存在诸如元素和原子之类比另一物质更真实和更永恒的物质。任何一种物质只包含一部分该物质，土壤之所以看上去像土壤是因为它比其他东西包含了更多的土，但它也包含着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其他物质。这就是为什么土壤里的种子能生长出草、庄稼和树的原因。土里的物质按不同比例重新组合，产生出植物的物质。随后动物吃了这些植物，物质经过重新组合变成血液、骨骼和毛发。在这一系列变化当中，组成物质自身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变化，因此当某个动物死后，它的躯体又化为土壤。阿纳克萨哥拉斯坚持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不管是一个多小的物体，它里面都含有物质，“纯土”只是个抽象的概念。

心灵（nous）的活动使世界万物的分离和聚合具有秩序，这显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世界上无处不在。但阿纳克萨哥拉斯并没有把这个世界解释为一种理

(1) 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是罗马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译者注



性的秩序组合，人们不清楚他是如何说明他的心灵说的。

智者派

公元前5世纪中叶，哲学争论的主要题目从自然界问题转向对整个社会与个人的权利、义务方面的思考。古希腊人具有悠久的民族学思想传统（赫卡泰奥斯可以说是第一位地理学家、民族学家，他与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是同时代的人）。古希腊民族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说明人们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是随着文化的不同而各不相同的，但这并未产生反面的结果。那么，人类依据什么来确定构成人类生活中的阿莱忒（arete，优点和美德）呢①？最初，阿莱忒一词包含了人类许多活动领域的优点或美德。只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阿莱忒"才几乎仅仅用来特指"美德"，这样的用法主要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

这个问题在雅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波斯战争之后，雅典成为地中海世界新的引人注目的城邦。那些有志于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学者，虽然大多不是雅典人，却都被雅典所吸引。他们被称为"智者"，即"传授智慧的人"。当然早期的哲学家们已被人们公认为是"有智慧的"（如泰勒斯就被称为"七贤"之一），但他们的理论并没有实际效用。智者声称能向世人传授"阿莱忒"，因此前来拜访的不仅有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还有一些交学费的顾客。

许多这类求学者不仅想学会如何在生活中选择最佳的行为方式，而且还想学会怎样在公民大会的辩论中影响公共决策。有些智者们不仅要教"阿莱忒"，而且还要在他们的理论内容之外，传授如何组织一种论点，使听众确信一种立场的正确性，这就是修辞技巧（见第221～222页）。智者关于道德实质的许多理论与雅典传统思想格格不入，如他们认为强者把自己的需要和欲望凌驾在城邦利益之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智者对辩论形式的关注使传统的雅典人怀疑智者的追随者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权力而不是真理。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智者"这一词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最初的尊严，成了通过争辩来提高自己名声的代名词。有时明知一些争辩的内容是虚假的，仍要把它当作真理来狡辩。这样的训练显然对雅典的民主政治构成了威胁。

但是，虽然关于智者思想的材料都大多来自他们的反对派（主要是柏拉图，他自身并不是雅典民主的支持者），我们仍然能从他们的某些理论中看到西方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生活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的种子。例如普罗塔哥拉斯认为任何人或社会都不能确立一种所有社会成员都赞同的绝对公平。无论一个社会把哪种法律视做公正，也仅仅是对该社会而言，因此其公正性是相对的。一个社会中的所谓"聪明人"

① Aretē 是古希腊词，表示事物所具有的特性或特长，最初并无美德的含义，后来人们多用以指"美德"。在英语中译做 excellence、virtue。——译者注



这幅地图是根据赫卡泰奥斯两本书中对世界的描述所重新绘制的、带有推测性质。两本书中的一本写欧洲，另一本写亚洲（其中包括了北非）。他认为世界是圆盘形的，被大海包围，并分成四等份。东西轴以地中海和黑海为标志，南北轴以尼罗河和伊斯特河（Ister）为标志。虽然希罗多德讥笑赫卡泰奥斯的大部分地理知识，但他本人从赫卡泰奥斯那里获得了大量民族学信息，尤其是关于埃及的信息。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赫卡泰奥斯在与一位埃及祭司的会面中，自诩他能够追溯16代前的祖先（追溯到神），但埃及祭司却数出了345代的家谱。

（左页图）雅典娜女神，是希腊神话中的聪明与智慧之神，也是雅典的守护之神。但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雅典并不被誉为学问的中心。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不仅日益富裕、国力强大、生活悠闲，允许公开辩论，将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家吸引来访学，而且在民主政治的氛围中，人们对美德做出了与传统世界观和人性观截然对立的新解释。例如，当时的喜剧家阿里斯多芬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都表现出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当然公开辩论的宽容程度不是无限的，我们可以从有关阿纳克萨哥拉斯的记载中看到这一点。阿纳克萨哥拉斯提出太阳学说被判有罪，如果不被流放的话，他可能和苏格拉底一样被处死。

也许对什么是“公正”能提出一些更有价值的观点，但是除非他能心平气和地说服社会采纳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能构建真正的公正。当然普罗塔哥拉斯认为他自己就是一位具有“更有价值”的有见识的“智者”。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像“智者”一样，他关心人的伦理道德问题。但是与“智者”不同的是他没有宣称他知道美德是什么。他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证明，“智者”其实也不明白什么是“美德”。他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就是沿用早期自然哲学家的假设，即知识是真实和永恒的，这与普罗塔哥拉斯的相对主义正好相反。如果美德是能被认识的，那么它在世界上所表现出的所有不同的形式就具有潜在的、永恒的统一性。而要认识美德，就需对这个统一性做出说明或给出定义，且这种说明或定义应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真实的。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人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美德。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苏格拉底一样无知，只是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因此才被认为比他们更具智慧。即便能列出美德的一些具体内容，甚至行为举止始终符合美

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399年，在一个由501人组成的陪审团的主持下，微弱多数的雅典人被说服，投票赞同处死苏格拉底，罪名是引介新神、腐蚀城邦的青年。柏拉图在他的《申辩篇》中替苏格拉底做的辩词其实不是什么申辩，如果苏格拉底真的讲了那些话，可能会使那些处于中间立场的陪审员投票反对他。

由于苏格拉底拒绝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被流放，惟一让他离开雅典的方法只能是处决他（那时没有长期监禁）。因为在审判末期正好遇上阿波罗节，苏格拉底不能被立即处决。他被关在紧邻法院（位于广场）的一所监狱里。这座建筑现在已被确认，这座建筑中有许多狭窄的小屋，中间有一个通道。其中一间有砖砌的地面，还有一个排水道，好像是清洗用的。这间屋子大概就是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前居住及洗澡的地方。在那间控制着整个建筑入口处的屋子（也许是狱卒的房间）的一角，有个壁龛，里面放着一些盛放香水和毒药的小广口瓶。在雅典，执行死刑是使犯人服下一定剂量、足以致命的毒芹制剂。

这座建筑当中最有趣的物品之一是在院子里发现的一个小雕塑（见第286页），与我们看到的苏格拉底本人的其他雕像非常相像。它的有趣之处在于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设想，即雅典人在苏格拉底死后不久便对判决有了悔意，并用这类纪念品表示怀念。

尽管苏格拉底在世时并非毫无影响，但正是他对待死亡的方式以及这种态度对柏拉图的影响，才使他成为一个受人崇敬的、理想的哲学家——一个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知识，宁可牺牲生命也不放弃对真理追求的人。





在画家查尔斯·阿尔方斯·杜弗雷斯努瓦(Charles Alfonse Dufresnoy, 1611～1668年)创作的这幅题为《苏格拉底之死》的画作上，可以看到这位哲学家英雄般地对待死亡。苏格拉底被囚期间，每天都与他的门徒们进行一些哲学会话。柏拉图在《斐多篇》一文中，描述了苏格拉底在被处决的当天还在讨论灵魂不朽的可能性，他以毫不在乎死亡的方式喝下了毒芹汁。但与柏拉图和杜弗雷斯努瓦传递的信息相反，一份致命的毒芹汁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它所包含的毒素——毒芹碱会引起人的神经系统的瘫痪。

苏格拉底最初可能是靠雕刻为生，这是他父亲索弗洛尼库斯（Sophronicus）从事的职业。但他很早就放弃了其他任何职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与其他雅典人、通常是名人讨论关于勇敢、正义及其他美德方面的观点。他提出了一种人称“苏格拉底反驳法”的辩论形式。用这种方法，苏格拉底让他的对话者自己反驳自己，证明他们对某个对象的认识是有矛盾的。苏格拉底外表丑陋，缺乏魅力，经济贫困，对那些并不欣赏他的智慧的雅典人来说，他是取笑的话柄。但他对一些雅典年轻人的影响达到了使他们入迷的地步。柏拉图告诉我们：阿尔基比亚德斯（见第152页）甚至想和他发生性关系（没有成功）。

德，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知道美德是什么。如果人们不能解释是什么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美德的话，也就不能保证他们在未来任何时候都能按美德行事了。

苏格拉底认为，虽然具有德行不能保证一个人具有这方面的知识，但关于美德的知识却能使人按美德行事，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犯错误。犯错误会伤害人的灵魂——在人体内部的真正的“人”，如同所有人都不愿伤害自己一样，没有人自愿犯错误。事实上，任何人犯错误的惟一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一旦他们掌握这种知识，他们会成为具有美德之人。苏格拉底讨论的目的（他不认为他在授课，所以也不收学费）是让他的学生们抛弃原先认为自己知道美德是什么的想法，从而引导他们去寻求真实和永恒的美德。

苏格拉底虽然有可贵的追求，但却被雅典政府强迫服毒自杀。无疑，导致这一结局的部分原因是他的同代人认为他与智者学派有联系，还有就是他向传统的道德观提出了挑战。他当过一些支持寡头政治的卖国者（如阿尔基比亚德斯和克里提亚斯）的老师，他们在步入苏格拉底曾经予以痛责的政治生活之前，都属于苏格拉底学派。但有些人还是把苏格拉底个人的思想看做是对公民集体的威胁。在希腊社会中，美德曾一直被认为是社会赋予的品质，告诉众人美德只有通过哲学探索才能获得，并非社会赋予，这种思想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柏拉图

柏拉图对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介绍使他相信，只有与追求知识的同伴之间进行问答式对话，才是哲学表现的最佳形式。所以，柏拉图的哲学著作都是采用两人或更多的人之间的对话形式写就，其中一人通常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早期的对话作品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式的，或诘问式(aporetic)的，因为就像苏格拉底最初采用的方法一样，它们使读者在困惑状态下抛弃了关于美德本质的任何明确的思想。逐渐地，柏拉图开始借苏格拉底之口阐释自己的一些比较确定的关于美德的观点，这些著作被称为“中期对话”。在他的“后期对话”中，他批判了前面学说中的许多确定的观点。

作为一名希腊人，柏拉图接受了这样的原则，即如果美德是认知的对象，那么它们必须是真实和永恒的。在中期对话中，他把这种永恒的真实性置于先验的领域当中，宣称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表面的世界，因为所谓美德的东西似乎是频繁变化着的。在这方面，他受埃利亚学派存在说的影响。但是他与巴门尼德不同，他不否认世界在整体上包含了真实性。对于柏拉图而言，世界具有自己的面貌必定有它的理由。这就是他为什么拒绝恩培多克勒和原子论者认为世界万物的形成只是一些永恒元素或原子间的偶然聚

合。在他的一篇中期对话中，他借苏格拉底之口嘲笑了阿纳克萨哥拉斯的心灵说，因为柏拉图认为这一理论只说明了世界是怎样的，而没有解释世界为何是这样的。

柏拉图的相论①

柏拉图解释说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是预先确定的，因为世界万物分享了那个真实而永恒存在的超验王国的原型，虽然他从未具体说明他所设想的"分享"是怎么回事。柏拉图认为，许多人没有明白美德的真实性和永恒性的本质，却把某些特殊的行为看做是美德，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还未出生前他们的灵魂或一部分灵魂存在于超验世界。因此，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某个特定事物分享到了"相"时，他们的灵魂就能从表象中辨别出本相，尽管有的辨别不甚清楚。这种"相"就是存在于"美德"、"善"等概念背后的一种真实的、永恒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柏拉图的相论。

柏拉图认为获得真正美德的惟一途径就是在生活中不断求取关于美德的真实而永恒的知识，其方法是从某些特殊事物入手，逐步地探讨越来越抽象的知识（包含毕达哥拉斯的关于"数"的真理），直到真正的哲学家最终能够认识超验的纯粹真实、永恒的美德。要做到这一点，人必须具备纯洁的灵魂，这是人性之中真实而永恒的部分。

柏拉图在他的许多思想对话中，把灵魂分成三部分：最优秀的部分是智慧的，最劣的部分是情欲的，介于这两者之间是热情的。一个哲学家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应该通过智慧充分控制自己的热情和欲望，尽可能抵御一切欲望。

哲学家们一旦认识了"相"，就不仅掌握了一个人如何最适当地生活的知识，而且知道如何把社会管理得尽可能完美。这种知识（个人对"相"所做



作为一名有着显赫家庭背景的雅典人，柏拉图的家人曾希望他从事政治生涯。但是在"三十僭主"的恐怖政治（他的舅舅、昔日苏格拉底的学生克里提亚斯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⑴）以及苏格拉底被卷土重来的民主政权判处死刑之后，他彻底放弃了对雅典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但仍对政治理论保持着很大兴趣，并于公元前366年试图把他的政治理论应用到年轻的叙拉古僭主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二世身上，将他塑造成为一名"哲学王"。但这场试验遭到了彻底失败，由于狄奥尼修斯二世的舅舅、柏拉图的挚友狄翁（Dion）被谋杀而终止。狄翁是在卡里普斯（Callippus）支持的一场阴谋中被暗杀的。他是柏拉图的一位弟子，柏拉图本来是派他去帮助狄翁的。这个事件之后，柏拉图不再参与任何政治冒险活动。他在晚年曾设想过一种理想的国家，他赋予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力，统治者也必须遵守。

① 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只是一个表象世界，它处于不断的变化运动之中，因此也是一个不真实、不可认识的世界。在现实世界的表象背后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超验世界，它是可以认识的、真实的，同时也是最完美的世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超验世界的模本，超验世界则是现实世界的母本，或曰本相，所以柏拉图的这一思想被称做"相论"，也有学者称之为理念论。——译者注

⑴ 公元前404年，雅典贵族寡头派在斯巴达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建立三十僭主统治，大肆屠杀民主派，柏拉图的舅舅克里提亚斯以及卡尔米德斯是这场政变的领导者。——译者注





阿卡德米学园[1]，罗马统治时期制作的马赛克镶嵌画（公元1世纪），发现于庞贝城附近。约公元前380年，柏拉图开始在小树林旁边的体育馆中讲学。这座体育馆位于雅典城外，是献给英雄阿卡克德莫斯（Academus）的。柏拉图后来在此买了一块地，建了座房子，将房子和这块地用来办学。正如它的名字那样，阿卡德米有个宗教中心，在一个缪斯圣所中，柏拉图可能出于对毕达哥拉斯的敬重，既把自己的门徒组织成一个颇具凝聚力的团体，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宗教中心。在后继学头带领下，雅典学园不断发展，影响日渐扩大（尽管不包括亚里士多德，他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即吕克昂学园），直到公元529年被皇帝查士丁尼关闭。

(1)柏拉图创办的阿卡德米（Academy）学园是一所集传授知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为一体的学校。学园大门上写着一行字："不懂几何学者不许入内。"来自希腊各地的一些青年在这所学园中学习，包括亚里士多德。西文"科学院"一词便出自"阿卡德米"。——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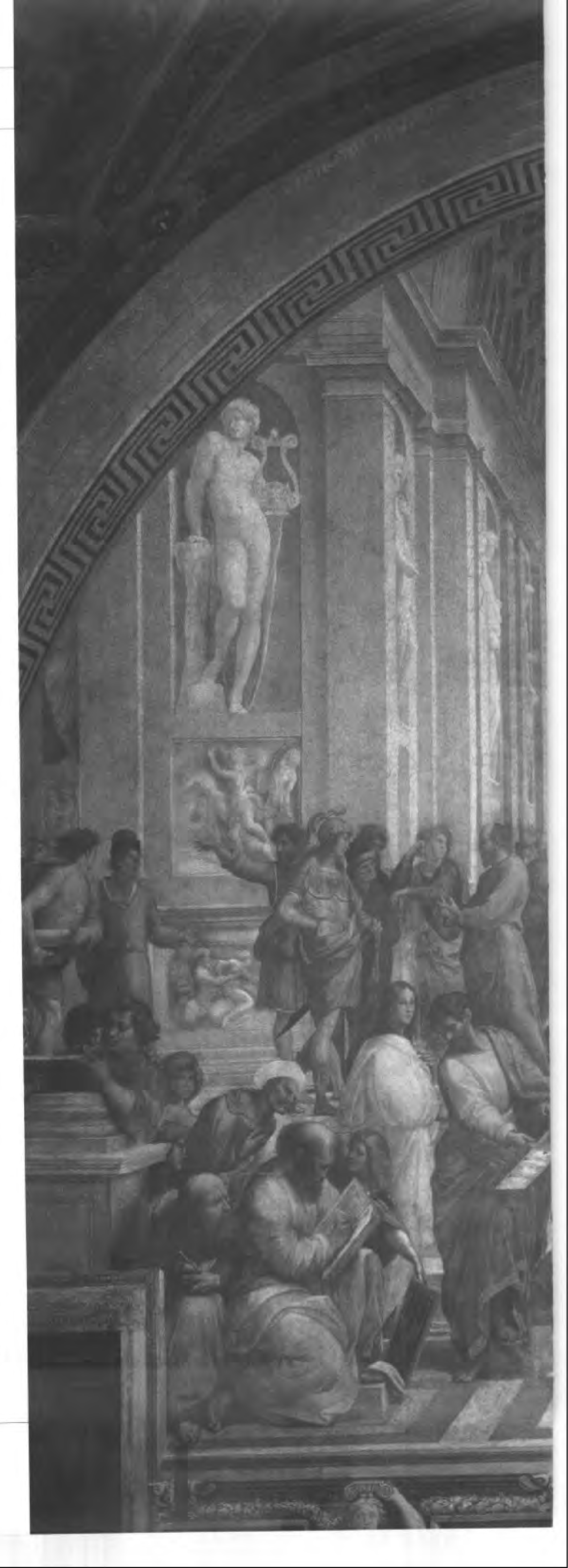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学派里较年轻的一位，他的老师去世以后，他第一个承担起记录苏格拉底教义的本质的职责，后来把它精心阐释成一种确定的学说。他对人们难以说出美德到底是什么却能辨别美德这一难题的解答，是假设在这个世界的范围之外存在着超验的“相”。所有灵魂在降生到人世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它的存在。特定的美德就是这样被认识到的，因为它们带有“相”，人类对“相”只有模糊的记忆。只有那些毕生致力于对真理的艰苦追求、超凡脱俗的哲学家们才能真正了解“相”为何物。在拉斐尔的著名油画《雅典学园》中，柏拉图手指上空就是指这些超验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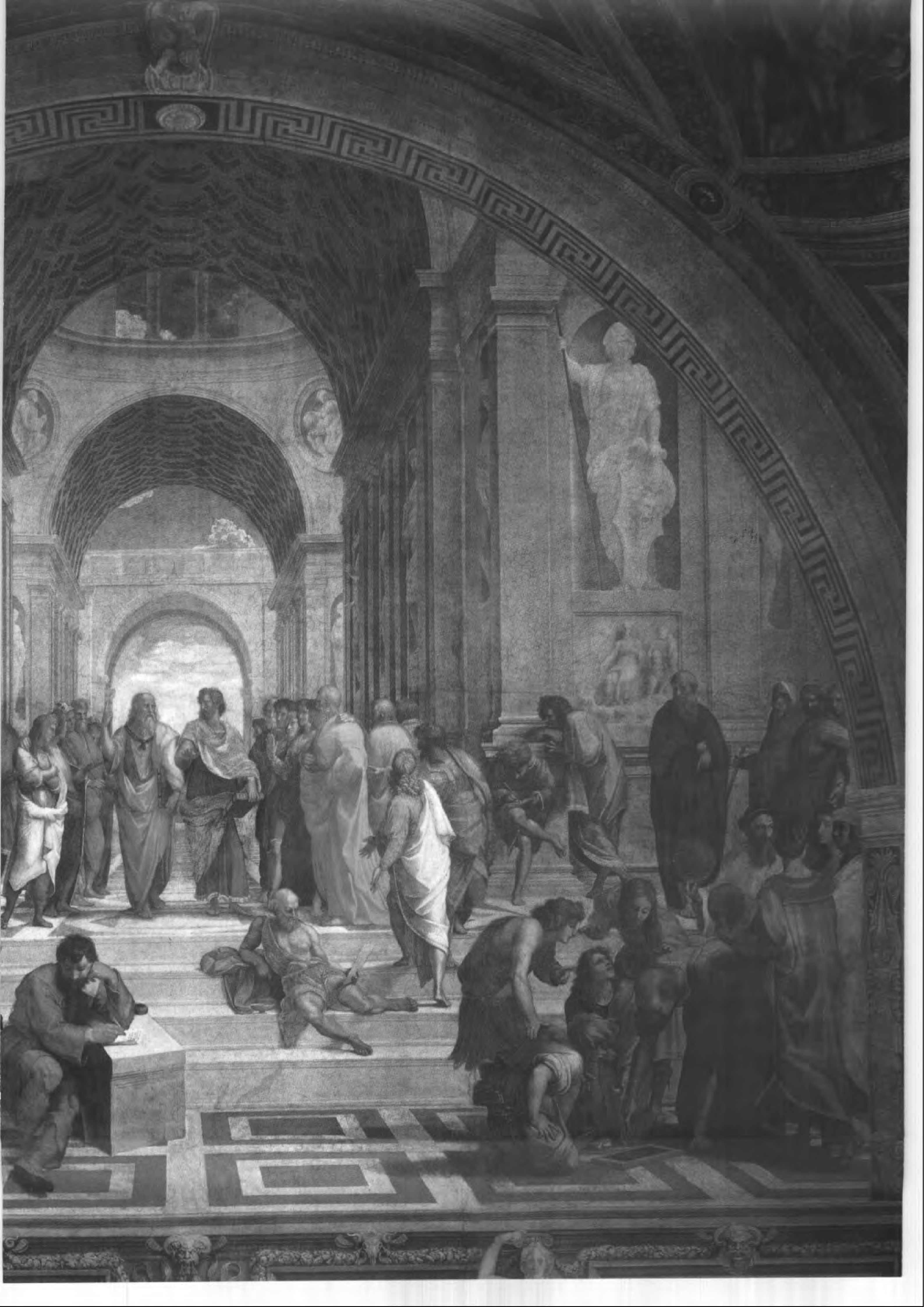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曾在阿卡德米学园师从柏拉图，并赢得了柏拉图的尊重。据说柏拉图称亚里士多德为“有才智者”，如果亚里士多德不到场的话，他就拒绝讲课。但在拉斐尔的油画中，亚里士多德手指下方，这是因为他在制定自己的“相”，即那些能被认识的永恒真实，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特定事物中是内在或固有的。尽管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有关天体的知识是最理想的知识，但关于事物内部运动的知识，如蚂蚁体内运动的知识，才是更可靠的知识，才能从整体上去了解事物的本质属性。

由于对我们来说，获得有关地上万物的更多、更完备的信息是可能的，我们拥有的关于它们的知识对于其他事物（永恒的事物）具有优越性……虽然有些动物对于感觉缺乏吸引力，但是对科学的眼睛来说，对生来就具有哲学气质、能辨明事物起因的学者来说，造化事物的大自然所提供的乐趣是无法度量的。

（亚里士多德：《论动物部分》）



拉斐尔(1483～1520年)的油画《雅典学园》(1509～1511年)。这幅画描述的是众多哲学家们聚集在古罗马一座拱形大厅内争论不休的情景，画中柏拉图手指上空，亚里士多德则更注重尘世，手指下方。



的直接思考）的性质意味着哲学家无法像对待法律一样，把它行诸于文字，并让其他某个人去治理这个城邦。柏拉图认为，哲学领军人物在一个兼具公正与美德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智慧在一个兼具公正与美德的人身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都对人类的激情和欲望成分加以控制。

柏拉图认为对一个完善的城邦来说，有必要注意所有的三种因素（激情、智慧和欲望），因为就像一个哲学家在必要的时候不吃不喝就不能存活下去一样，任何一个城邦如果不把居民当中的“欲望”部分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话，这个城邦就无法发展。如果一个城邦没有士气昂扬的士兵，就不能捍卫自己，抵御入侵。同一个具有美德的个人身上的情况一样，在一个正义的城邦里，统治和激情因素应该协调行动，与欲望因素仅有极少的瓜葛。

柏拉图晚年也开始批评他自己的“相论”，虽然后人们不清楚他是否彻底放弃这一学说。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分享“本相的人”的实质使人成为人，那么是什么使“本相的人”成为人？他是否分享他自身或者分享另一个“相”？这种无穷尽逆向思维的可能性被称做“第三人论辩”。

还有一个有关事物的范围问题，如果说世界上的某些特定事物被理解为一种表象的话，那它们必然存在于一个尘世之外的王国，例如，泥土的“相”是什么？柏拉图的不足在于他把真实、永恒和可知的世界与短暂即逝的现实世界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又让前者赋予后者以秩序。他的最伟大的学生[①]就是通过否定这种二分法来解决这一矛盾。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生于哈尔基斯半岛[②]的斯塔吉拉城邦。17岁那年，亚里士多德到雅典阿卡德米学园学习。他也相信知识必须是真实的、永恒的，正是这种真实性和永恒性赋予世界有序性。但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他把这种真实性和永恒性置于世俗世界之中。他认为，虽然它们不停地变化，但事物之间却有着共同的类型。正是这些类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才是我们所要掌握的知识中最真实、永恒的东西。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形式”是世界成其为世界的四种“原因”之一，这四大原因是：形式因、质料因、能力因和目的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永远不能独立存在，它们始终以质料——第二因——来表示存在。和形式一样，质料是真实、永恒的，也不能单独存在，它总是与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被称做物质实体。实体因为有形式才能被人感知；纯质料是不能被感知的，因为据定义可知，它不是物质的一种“型”。只要质料被赋予四大元素——土、气、火和水中的最基本的形，它就成为具备一种“形”的物质，正是这种“形”使之能够被认识。

这使得形式因居于优先地位，虽然质料对实体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各种形式本身是可以进行不同等级的组合——一个形式不太复杂的实体可以建构具有较复杂形式的实体。例如，粘土是砖的质料，砖是房屋的质料，等等。较复杂的形

① 指亚里士多德。——译者注
② 位于希腊东北部。——译者注

式被认为是更优越的原因，因为它们可以产生较简单的实体。粘土具备成为砖的潜能，黏土能成为砖的原因就在于砖反过来具备成为房屋的潜能，因为要造房子的缘故才制造了砖。只有用“潜在”的、更复杂的“形式”才能解释那些简单的、具体的实体何以存在。将质料由潜在形式转化为现实物体的动因是能力因，潜在物转化为实体物的原因是目的因。所以，为了解释一座房子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说一位建筑师（能力因）为了有个居住场所（目的因），用砖和木材(质料因)建成了一幢房子(形式因)。

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所有生命体都是尘世间（月亮下方那部分）的完美实体，因为它们有最复杂的形式，同时也因为它们集形式因、目的因和能力因于一体。一只动物存在的能力因是他们父辈的动物形式，一只动物的形式因是该动物所有功能的总和（包含繁殖功能），它的目的因是通过发挥其所有功能，或者换句话说，通过展现它的充分形式，来使它的潜在可能性变为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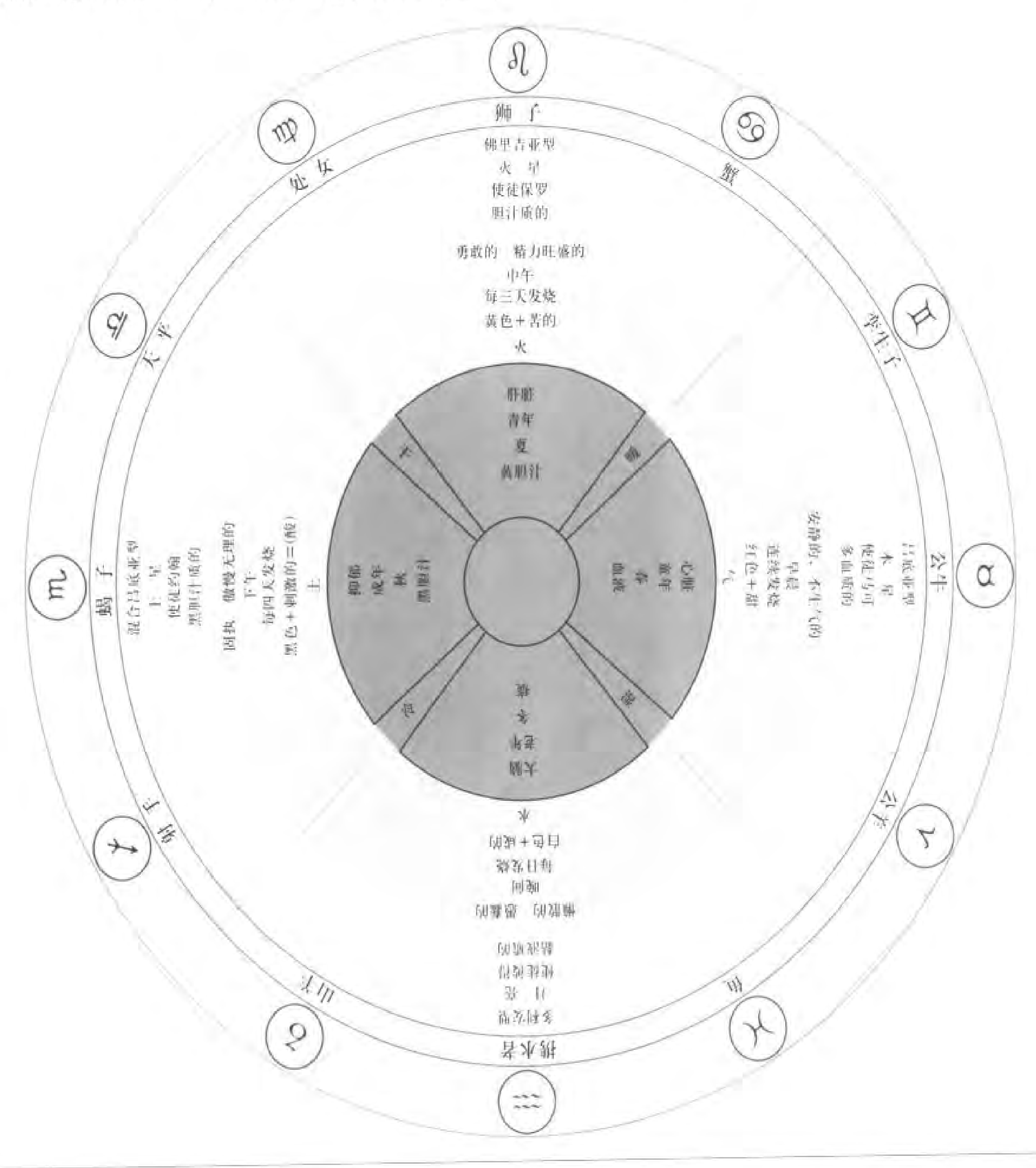
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所有的真实都是此岸世界的万物所固有的。他认为最纯粹的、最好的现实只存在于尘世之外，如同此岸世界上的生命一样，那些天际间的物体自身运动，除了实现自己的潜能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但是，与地上的物体不一样的是，天际间的物体本身就具有永恒性，因为它们是由纯粹的“以太”(aether) 构成。以太是形式和质料的惟一永恒的结合体。它是不可能存在于尘世间的，尘世间的实体都是由恩培多克勒的四大元素组成的。

亚里士多德把整个宇宙设想为一些同心的球体。地球位于中心，四周首先被水球体、气球体和火球体包围着。位于稍外围一点的球体上携带着环绕地球的星星和行星，最外围的球体携带着一些固定不动的星星。在所有这些球体之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不移动的动者”，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宇宙说中的“上帝”，因为它是宇宙千变万化和运动的最终解释。它并不运动，因为它是纯粹的形式。它不包含物质，所以它始终是真实的存在。它没有潜在能力，所以没有什么事物优先于它。它通过理念活动、通过启示其他实体发挥它们的潜力来推动宇宙运动。构成各个天体的物质永远不可能改变。然而，由于它们是由物质构成的，存在于空间和时间当中，因此它们具有运动的潜力，以一个圆形的轨道（其本身是永恒的象征）来实现这种运动。各种生命被驱使去发现维持生命的食物，以便实现它们全部的潜在能力。然后它们进一步受到驱使去再生产它们物种的其他个体，以便实现各个物种所具有的永恒的潜在能力。

人类是大地上的最高生命形式，因为他们拥有智力或*nous*。为了使人类特有的潜能得到发挥，个人必须进行智力活动。然而，由于他们并不像最基本的不移动的动者是纯粹的形式，他们还不得不实现自己的其他潜能，当然，始终是在智力的引导之下。高洁的生活要求一定量的物质基础，以便能够实现这些潜能，因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一直受到指责，认为应当为传统的观念，即人的一生的成功与否是通过他的财富多寡以及忠诚于社会的程度来评价的。但这种说法忽略了智力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其他活动都是根据人的智力产生的。亚里士多德试图将道德系统化并解释它，也就是把道德变为一种伦理“科学”。

体液理论与静脉切开放血术

希腊有关健康的科学理论认为，人体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通常认为是流液或体液。当体内的各种液体以正确的比例达到平衡时，人体是健康的。当体内的液体由于不恰当的饮食、锻炼、受伤或污浊的空气而产生不平衡时，人体就会生病。最初有各种体液理论，但黏液、胆汁、黑胆汁和血液最终被确定为标准的四种体液。一旦病人生病，医生就会频繁地进行放血。这不是因为希腊医生认为血液本身是一种病理性体液，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患病的某个时刻，一种病理性的体液可能会被分离出来，进入血管。一个优秀的医生有能力确定在什么时候、什么位置及有多少血应当排放出来，以确保病理体液从体内排放出去。如果一个医生觉得需要排出大量的血，为了防止血流不止而无法止血，那么他往往只开一个小切口，然后在切口上放一个加热过的吸血杯。由于杯中的空气冷却收缩，通过真空法从切口吸出血来。当拿掉杯子后，流血就止住了。放血术和杯吸法作为治疗方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左页图）绿环表示希波克拉底关于体液联系的看法（黄胆汁暖而干，与青春、夏季相联系等等），盖伦（Galen）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图表（黄环）。在中世纪再次得到补充（白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得出四大气质类型：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choleric，来自希腊词胆汁）和黑胆汁质或忧郁质（melancholic，来自希腊词黑胆汁）。

（上图）刻画放血器具的浮雕，放血工具盒两边各有一个吸血杯。



（下图）大约属希波克拉底生活时代的一幅雅典医生施行外科手术的图景，绘在一个香水瓶上。当时的医生既出门行诊，也在自己的诊所给病人看病。在这幅图上，医生正打算在病人的手臂上切个口子，也许他还打算用挂在他身后墙上的吸血杯。吸出的血都会流入或被倒入病人脚下的碗里。

科学的出现

最早的希腊哲学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有时哲学家们利用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来证明他们关于世界“真正”是什么的观点。例如，阿那克西美尼注意到噘起嘴唇吹出来的压缩空气比从张开的嘴里吹出的稀薄空气冷；色诺芬尼提到内陆发现了海洋化石（见第276页）。但是，在亚里士多德以前还没有对数据进行系统收集。



医　学

然而，在自然哲学出现之前很久，希腊人已经开始积累了大量治疗疾病的经验性数据。为了在面对疾病时不致完全无能为力，他们认为必须记录在哪些情况下采取什么措施可能奏效。

不过，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医疗还不能算是一门科学。人们认为巫术、有魔力的护身符、向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祈祷等方法可能和草药、饮食、养生同样奏效，却没有兴趣研究人体本质、疾病自身或为什么一些方法能够奏效。

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波克拉底[①]的时代，一种科学化的医学形式得以确

① 约公元前460年至前377年，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学之父”，生平不详，现存《希波克拉底文集》，内容涉及解剖、临床、妇儿疾病、预后等，但经研究，该文集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希波克拉底曾写有告诫人们遵守职业道德的“誓言”，内容包括知恩图报，尊敬师长，无保留地向遵守誓言的人传授医术，作为医生，必须为病人谋利益，对一切病人不分男女、出身、地位、尊卑，哪怕是奴隶，都一视同仁，救死扶伤，不谋私利，保护病人隐私等等。违背誓言，将受到神的严厉惩罚。这一誓言始终是西方从医者的戒条。——译者注

盖　伦

佩尔加姆的盖伦（约129～216年）在2世纪下半叶活跃于罗马。作为一名医生，他在同时代人中赢得了崇高声誉，担任过三位皇帝（马可·奥留略、康茂德和塞普提米乌斯·塞尔提乌斯）的御医。他也是有史以来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他去世后的13个世纪里，他的内容广泛的著作一直是所有理性医学分支学科的基础。

他的父亲尼康（Nikon）最初想让盖伦成为一位哲学家，因此盖伦早年接受了算术、逻辑和语法等训练。然而，当盖伦16岁时，尼康做了个梦，这个梦主张他让儿子成为一名医生。从那时起，盖伦就跟着佩尔加姆、科林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大师学习，但他早期接受的训练和对哲学始终不渝的兴趣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医生涯。

尽管盖伦的写作是在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去世五个多世纪以后，他仍然把这两个人分别作为医学和哲学的最高权威，并写了一篇论文:《论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科学原则》，证明他们之间彼此的协调和在真理观上的一致性。柏拉图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目的论中，他认为宇宙的规律性表明它是由一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设计的，宇宙中的一切都有目的，因此身体中的一切也有目的。他认为希波克拉底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的倡导者，人体各部分是医学的基础。

盖伦认为理论和逻辑的运用对医学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一点来说他陷入希腊医学的“教条主义”阵营。然而盖伦比许多其他的经验主义者更清楚地意识到经验、经验性的检验在证实理论和推论上的重要性。他频繁地对动物进行公开解剖与活体解剖来证明他的理论，但他从来没有解剖过人类尸体。作为一名科学家，盖伦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或希波克拉底，尽管他不承认亚里士多德对他有着同样的影响。

盖伦的医学可以看做是结合了哲学与科学的学科。通过他的著作的传播，古典希腊医学、哲学与科学继续影响着西方医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吉奥哈尼·卡克勒姆斯托（Giohanne Cademosto）留下一份15世纪的手稿，记述了医学与药理学的前辈。从图上部左边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埃斯科利皮奥斯（Asclepius）、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奥维坎纳（Avicenna，又称伊本昔纳(IbnSina)）、拉泽斯（Rhazes，又称阿尔·雷兹）、亚里士多德、盖伦、马克尔（Macer）、阿尔伯图斯·马格鲁斯（Albertus Magnus）、狄奥斯克里德斯（Dioscorides）、麦斯勒（Mesre，又称尤汗纳本·马萨维）和萨拉皮翁（Serapion）。古希腊对现代医学的建立贡献颇多，尤其是盖伦，他的工作以观察与解释为基础。他的诊断方法包括扣诊、号脉，偶尔也检查尿样。

他定期在罗马知名人士观摩下进行尸体解剖与活体解剖。在他的一次著名的演示中，他揭示了一头活公猪颈部的生理结构，通过压迫从大脑连下来的喉部神经显示了公猪的吼叫如何能够被制止。这证明了盖伦的观点:人类意识（这在演讲中可以得到完美的证明）存在于大脑之中，而不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的存在于心脏中。

立，它结合着自然哲学的原则，完全摈弃了魔力。神灵自己能恢复健康也只是因为他们与自然规律保持和谐，而人类能够学会并应用这些规律。“希波克拉底式的医学”（这个术语用来指我们所知的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大部分理性医学）利用一些传统的治疗方式，但仅仅是那些能够解释有关人体和疾病的合理方式。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又区别于自然哲学，因为医学从业者认为，关于有关医学研究对象（疾病和人体）的知识，随着时间发展，通过进一步的经验观察而得到改善，这种知识不是人们理论思维的产物。那个时期的许多医学论文的宗旨只是记录这些观察。此外，一种医学理论的真实性可以通过它在一系列不同人体上的应用结果而得到证明或反驳，这是一种并不适用于思考宇宙的理论家的认识来源。

也正是在早期希腊医学当中，“科学方法”超越对世界的被动观察，开始迈出蹒跚的步子。例如，一篇匿名的论文提到首次简单的实验：把一罐水整夜放在室外，让水结冰，第二天让冰融化，你会发现少了一些水。这是一种实验，因为这是刻意做某件事，为的是要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且结果是可以重复的。

然而，作者利用实验来证明他的理论，即认为人类饮用雪水是有害的，因为水中最精华的部分由于结冰而被分离了，留下的只是很厚的“浑浊”部分。他没有考虑或检验其他有关结冰后水量损耗的解释。

另一位匿名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作者建议切开一只山羊的头来证明他的理论，即癫痫是由于大脑里黏液过多而致的。希腊人把山羊的行为比做癫痫患者的行为。那位作者向他的读者保证，如果切开一只山羊的头，就会发现它的大脑过度潮湿，而且有一股恶臭。我们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否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做过，或者多长时间做一次。没有一位早期医学著述的作者曾经解剖过人类或动物的尸体，就连希波克拉底学派的成员在他们的论文中也很少利用已知的牺牲等动物解剖。其部分原因无疑是他们并不认为整个四足哺乳动物的肢体与人体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疾病，因为它明白无误地在人体上表现出来。对症状的研究和了解被认为是医学知识的基石，而不是标准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



子宫护身符。在最流行的神秘护符中，子宫护身符被描绘成一个颠倒的罐子，底部上了锁。这把锁是否意味着预防怀孕，阻止精子入内？或者是否意味着防止流产，把胎儿锁在里面？或者也许是为了减少扩张了的子宫出血？目前不能确定。它的功能或许取决于佩戴者的愿望。上锁的子宫伴随着一个或更多的携带象征丰饶的羊角的人物，这一事实多半表明这样的护身符被认为比纯粹的医疗更加有效。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虽然没有解剖过人体，却开创了系统的动物解剖实践，他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只有通过考察真实动物体的内部结构，才能理解动物形态，深入认识大自然本身的构造和秩序。再者，对天体的研究和认识虽说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直接地感知动物的这一事实，则使有关动物的知识更为可靠。

生命的存在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辨——特别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把它们视为物质的最好样本。然而，他对生物学研究也有着强烈的兴趣。他一生中积累了关于数百种动物的行为、生命循环和生理结构的大批记录。在观察的基础上，他在动物的分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把动物从最低等（如海参）到最复杂（如人类）按等级进行了排序。他还证明在所有动物的结构中运行着一个系统。例如，一些动物有肠子却没有膀胱，但是没有一种动物有膀胱



公元15世纪的一幅小画，画的是尼古拉·奥莱斯姆(Nicole Oresme)正在写他的《巡天概要》，该书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论文《论天地》一书的评注。他前面竖着一个浑天仪。欧多克斯的同心球天体运行系统最终遭到拒斥，人们支持包括本轮与非同心圆的天体理论，因为这一理论能够更恰当地解释更多的天文现象。但人们仍然相信每个天体都按圆形轨道围绕静止不动的地球运行。月亮标志那个离地球最近的圆，恒星标志天球的外部界限。2世纪的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1]利用一个复杂装置来确定在圆形轨道上运行的天体的相对位置，这一装置被称做浑天星盘——一个带有许多框架的天球仪，圆环（拉丁文为armilla）标志天体在球体内的运行路线。由于柏拉图关于天体肯定依循统一的圆圈运行的理论（欧多克斯首先将这一理论付诸实际应用），所以在尼古拉斯·哥白尼（Copernicus Nicolaus）确立了日心说之后，浑天仪仍被人们继续使用。

却没肠子。再比如，缺乏上排前齿的动物都有数个胃。我们把许多类似的共性归结于具有共同祖先的动物，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物种都是由大自然以最适合物种自身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所以，骆驼、羊、鹿等动物缺乏上排齿，却有数个胃，这使它们能更好地消化自然界向他们提供的多刺木本食物。

亚里士多德的观察不是没有错误，他犯的许多错误在我们看来显然是可以避

(1) 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建立了地心宇宙体系，即托勒密体系学说，著有《天文学大成》(13卷)、《地理学指南》(8卷) 等。——译者注

免的，是无根据的理论想像的产物，而不是经验性观察的结果。例如，他提出哺乳动物的心脏有三个心室，这一观点似乎来自他的信仰，即生命的原理在于心脏，应当有一个单一的中心点。当然，人的期望对于观察的扭曲即使在今天也是科学研究的一大危险。承认亚里士多德犯了这些错并不是要贬低他在自己的自然史中收集、整理资料的科学成就。

天文学

天文学可以说是在公元前4世纪末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第二门科学。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年轻人欧多克斯（Eudoxus）在天文学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他能够解释星星、行星、太阳、月亮围绕地球的明显的运行，说明这些天体不同的运行速度，预测一年四季中这些天体相对位置的变化以及行星明显的周期性的往返运动。基于地球是一个固定的中心和天体按圆形轨道运行的信念（继承柏拉图的看法），他取得了更出色的成就。他运用复杂的数学、几何计算建立起一个天体运行的同心球系统：外层是恒星天球，中心是固定的地球，所有天球都以不同的速度但又彼此统一地运行。他解释说五个已知行星各自的运行是由于他假定的每一行星所具有的四个同心球所致，而太阳和月亮只有三个，因为他不必解释任何往返运动。

希腊人在随后的一些时期里，在医学、天文学方面做出了更加出色的贡献。但是这些学科的基本目的和方法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确立。亚里士多德之后，在一些领域中的探索，一般认为像在今天的哲学领域（认识论、本体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的探索，仍在继续发展。主要学术带头人有伊壁鸠鲁（Epicurus）、芝诺和斯多葛学派以及“学园派”的继承人等革新者。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对今天的哲学仍然具有强烈影响。A. N.怀特海德（A. N. Whitehead）曾说：“欧洲的哲学传统……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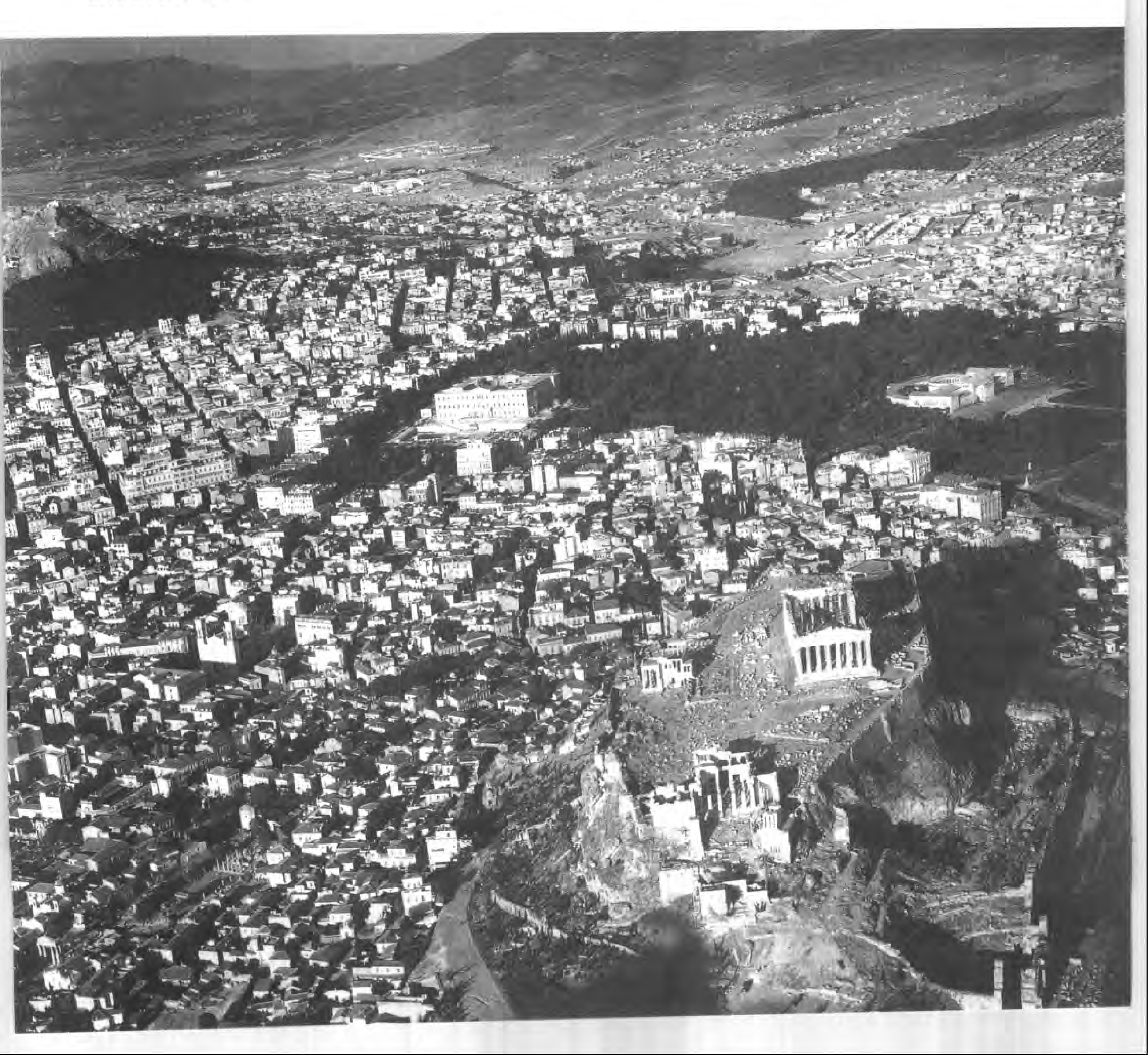
当然，希腊哲学包含的内容比这里列举的要广泛得多，其中一些内容（如伦理学，或者甚至政治理论），比起古希腊人关于世界“到底”是什么的思考来说，似乎与我们自己关注的问题更息息相关。但是，对于最早的希腊思想家来说，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真实情况的知识，就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如果不理解他们有关“何为真实”的认识，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哲学流派。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曾评论道：“只有从古希腊传承下来的文明才拥有较最初步的科学更多的东西。”这一点最终可以追溯到早期希腊人关于真实本质的理论。虽然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提出的因果律、非物质性和目的等概念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但是他的假设，即他所看到的此岸世界的某些东西能够帮助他（人类的一员）理解宇宙，而这种假设孕育了西方的科学方法。

第十二章　宗教与神话

在古代遗留的所有建筑中，没有哪个建筑比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更能让人回想起希腊过去的辉煌。雄伟壮丽的雅典娜神庙印在成百万张明信片上，吸引着观赏者进入那个用明快的大理石建造而成的、清晰可辨的完美世界（见第254页）。神庙上的雕刻装饰增添了画面的魅力，这些雕刻中有许多已被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拆走运往英国，至今还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成为争讼的对象。一些雕刻再现了朝气蓬勃、文明开化的拉皮忒族英雄（出自帖撒利的希腊人）战胜野蛮落后的敌人、半人半马怪物的场景；浮雕带则刻画了雅典社会的各个群体——

从空中俯瞰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赫然耸立，这是献给城邦的守护神——雅典娜的神庙，女神着处女（帕特诺斯，Parthenos）装束。



年轻的骑兵、老人、手捧祭器的少女排列成整齐的游行队伍，既在歌颂女神雅典娜，又在颂扬女神佑护的理想化的雅典社会。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雅典娜神庙可能引起极为不同的反应。帕特农神庙建于雅典对它的隶属城邦实施越来越强的帝国主义控制时期，这些城邦缴纳的贡金与船只，是推动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进行的庞大公共工程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此外，帕特农神庙上展现的只是雅典城邦的理想形象，它实际上远不是所有人的乐园。就神庙本身来说，基本上是由奴隶建造的。雅典名义上奉行民主体制，但事实上只有自由的男性成年公民才能参与公共决策。妇女和有居住权的外邦人在泛雅典娜节的盛典上确实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当百牲祭的烟雾散尽后，他们就得回归他们在雅典社会中被普遍默认的边缘角色（见第四、第五章）。

想起帕特农神庙必然会提出一些有关希腊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如权力、人们的自我印象、不同群体的相对社会地位等问题。宗教与社会问题之间存在这样紧密的联系绝不是巧合。希腊人的宗教深深扎根于他们的社会，以至于其他宗教传统中"教堂"与"国家"分离的思想，在古希腊的条件下全然没有意义。青铜时代的文明或克里特岛的米诺文明也同样如此，那里所谓的"王宫"既是国家的管理中心，也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驱使我们追问能否找到一个独立存在的"希腊宗教"。我们现在所描述的宗教行为和态度在当时到底有多么普遍？

神的世界

古希腊众神祇具有神人同形同性的特点，属于多神的世界。主要的男神和女神有宙斯、赫拉、阿尔忒米丝、赫尔墨斯、阿芙罗狄忒和阿波罗等，他们各自都有自己掌管的特殊领域。如阿芙罗狄忒司肉欲之欢，雅典娜司技艺，赫尔墨斯则往来于神的不同领域之间……他们的这些职能还进一步反映在他们的外号中，如赫尔墨斯有多种职能，被称为"门神赫尔墨斯"、"亡灵引路者赫尔墨斯"。除了众多的主要神祇外，一些地位较低却又至关重要的神也得到崇奉，如生育女神厄里提亚（Eileithyia）、北风神波瑞阿斯(Boreas)，还有拟人化的神如欲望之神希墨罗斯（Himeros）、胜利女神尼克（Nike），众多的英雄也受到顶礼膜拜。他们像神一样强大，不同的是他们会死亡，对他们的祭拜也以他们的墓地为中心。

总体来看，众神与众英雄共同构成了一个既非完全和谐又非杂乱无章的开放世界，这里的力量既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与希腊社会信仰多元化这一基本特征相一致，希腊各地的宗教世界的结构与特征各不相同。

在宗教节日里，人们通过宗教祭仪来表达对这些超人的崇敬，祭祀活动而不是虔诚的信仰乃是希腊宗教的根基。宗教节庆赋予生活新的节奏。城邦的历法各有不同，但是各处都以众神之名或节日名来给月份命名（如赫拉依奥斯月来自赫拉，赫斯提亚奥斯月来自女灶神赫斯提亚，泰斯摩弗里昂月来自德米忒尔节）。

一些宗教仪式的准备时间也比历法中的一年要长。例如，希腊各地的运动员为了迎接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在奥林匹亚圣域内争夺荣誉，需要长年累月的训练。无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在宗教仪式中也被戏剧化了。婴儿出生当天要按照仪式被抱着绕炉灶走几圈，以表示敬奉赫斯提亚。婚姻与死亡也被打上了宗教仪



这个所谓的卢多维希宝座（“Ludovisi throne”，原来大概是一个祭坛的一部分）描绘了阿芙罗狄忒从海洋浪花里的诞生。根据神话，天神乌拉诺斯被他的儿子克洛诺斯阉割，然后他的生殖器被扔进大海，阿芙罗狄忒就由这个生殖器变化而来。这件凶残的事情发生时，乌拉诺斯正与大地女神盖亚媾和，阿芙罗狄忒因此成了性爱的化身。

式的印记。还有其他宗教仪式也赋予希腊人生活的节奏，例如花月节（the Anthesteria），即在春天向狄奥尼索斯表示敬意的节庆。它代表着幼童生命中的一个值得纪念的转折点。节庆以开启新酒拉开序幕，同时举行一个仪式，大家一起喝酒，包括第一次喝酒的三岁孩童，每人获得一小壶酒。在一些没能参加第一次花月节便过早夭折的婴儿墓中发现了这种小酒壶，令人感到心酸。

但凡希腊文明延伸到的地方，在各种场所都发现了庆祝节日的圣所：市中心（雅典卫城、科林斯的阿波罗圣殿）；重要居民中心以外的地区，但处于邻邦控制之下（阿哥斯附近的赫拉神殿）；城邦内部吸引各地许多朝圣者的地方（奥林匹亚、德尔斐）等等。

祭坛几乎总是一个圣所内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心。也许还存在其他神圣的特征，如泉水或洞穴。但通常最令人敬畏的是神庙，即神祇居住之地。在希腊文化中，几乎没有任何视觉艺术能与这些令人惊叹的神庙建筑相提并论。例如阿卡狄亚的巴塞神庙、意大利南部的帕斯图姆神庙或西西里岛中南部的阿格林根图姆神庙。每一座神庙都是伟大的艺术才能、无数的艰辛劳动与庞大的财力资源的产物。然而，并非只有这些宏伟壮观的圣所才能说明希腊人的宗教信仰。考古学家已经发掘了大量普通希腊人向当地神祇贡奉的祭品，有的是为了感谢神祇的赐福，有的是为将来祈求神灵赐福。意大利南部出土的一件青铜斧上刻着这样的铭文：“我是献给这片平原上的赫拉的财产，屠夫凯尼斯科斯把我当作他交纳的十一税。”

节庆与圣所奠定了生活的结构，但它们与众神的相互作用远远超出了节庆的



在花月节上，年幼的孩童可以得到一个小酒壶。这个酒壶上画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幼童坐在一个便壶上。右边是个手推车，孩子手上拿着另一个玩具，也许是个拨浪鼓。事实上，希腊古典时代的婴儿在婴儿期与围产期死亡率非常高，一岁前的存活率大概不超过新生儿的三分之一。出于对这种高死亡率的敬畏，为新生儿取名在出生后一般需推迟一段日子才进行。一些这样的小酒壶与未长到花月节的年龄前就夭折的幼儿埋在一起。

时间及圣所的空间。男人、女人不管做什么，他们的行为都与一个或多个神祇的影响范围有关。如果一个人认为通奸比婚姻的忠贞重要，那么他大概就会选择偏爱帕里斯和海伦的爱神阿芙罗狄忒而不是天后赫拉。把残酷的战争魔鬼放出瓶来，无疑是跟从了战神阿瑞斯的脚步。盗贼和那些希望避开盗贼的人，都向赫尔墨斯祈祷。在几乎目力所及之处，敬神与不敬神之间对立的界限看来都是模糊的。在三个有趣的领域，“宗教”与其他事务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法律、战争与医学。

法 律

任何人出现在法庭上或就任公职时都要经过一个标准程序，即向众神发誓约束自己。德摩斯提尼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雅典法庭的陪审员在行使这一义务之前必须发誓：“向宙斯、波塞冬和德墨忒耳发誓，如果他在任何一点上违背了这个誓言，就会使自己和他的家族招致毁灭。但他也祈求如果他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要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誓言明确地将众神作为潜在的报复者，从而把它们带进形形色色的人类活动中，否则的话，这些活动——从国内争执到国际条约——就无所顾忌了。

现代旅行者看到的希腊圣所空无一物，在古代却放满了奉献物。这些奉献加强了崇拜者与神之间的互惠关系。奉献礼品的理由无非是“你以前帮助了我，所以现在我将此物奉献给你”或“我现在将此物献给你，将来你要帮助我”（见第247~249页）。我们不知道这个手里提着一只狐狸的牧羊人青铜小雕像（出土于阿卡狄亚的李凯乌姆山附近）是哪种奉献物。他的帽子与斗篷是牧羊人典型的衣物，但是他在此扮演的角色似乎是一个猎人（见第200上的场景）。

战 争

宗教以各种方式作用于战争。军队的指挥官往往认为自己是在效仿众神或英雄前辈的做法。斯巴达国王阿哥西劳斯率军远征小亚细亚之前，希望效仿在特洛伊战争开始时的阿伽门农，在奥里斯祭神。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不同时期分别把自己当成阿基琉斯、赫拉克勒斯和狄奥尼索斯（按神性逐渐增多的顺序）。

如果说神话在战争中扮演了角色，宗教仪式也是如此。远征或开战前不祭祀是难以想像的。献祭并不能保证胜利，但是不献祭却必然导致失败。忽视不祥的预兆也是不智之举。当亚历山大不顾预言家的建议举兵攻打西徐亚人时，他立刻腹泻不止，原先健康的身体也无法承受。因此神明对作战活

动的预兆是战争实践中一个永恒的因素。不过，对于机动与谈判总还是留有余地。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中，斯巴达统帅借助直接向赫拉祈祷，成功地避免了一系列不利的牺牲。在后来的一次军事危机中，在亚洲率领万人雇佣军的将领之一色诺芬日日祭神，直到获得适当的神助（公元前401年）[①]。

医　学

在今天的医学从业者中间，对于医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性”活动，众说纷纭。希腊人早就有过类似的争论。希波克拉底在他的论文《论神圣的疾病》（*On the Sacred Disease*）中，有一段用来批评与他不同的观点——认为某些疾病的发作是由神所致：“他们认为不同的神是不同疾病的起因，如果病人像山羊一样，出现哮喘或伴有右边身体的抽搐，他们就说是众神之母造成的。如果病人高声喊叫，看起来像马，则应归咎于波塞冬。如果病人大小便失禁……则应归因于厄诺狄亚（Enodia，女神赫卡忒的一个别名）……”由此看来疾病的诊治显然要



有一种情况通常会导致人们向神献祭，这就是摆脱病痛（无论是已经恢复健康还是祈求健康）的希望。希腊的许多圣所都制作人体器官的替代祭品，也许是因为这些器官使病人痛苦不堪。图中这件大理石浮雕是在治病救人的英雄安菲阿劳斯（Amphiaraus）的神殿发现的，神殿位于彼奥提亚的奥罗甫斯。患者“静卧”在神殿里，等待进入梦乡、期望着奇迹般地治愈他的病痛的好梦来临。中心右侧是做完献祭的人——阿西努斯（Archinus），他躺在诊治台上。象征英雄治疗力量的一条蛇正在舔病人的肩膀。左边是阿西努斯梦中的情景——英雄正在为他治疗。最右边的人物可能还是阿西努斯，这次他的角色是祭拜者。

① 公元前401年，波斯王室发生权力之争，坐镇小亚细亚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率部进军巴比伦，试图推翻其兄阿塔薛西斯的王位。随他远征的还有大批希腊雇佣兵。但在巴比伦附近的会战中，小居鲁士战死，万名希腊雇佣兵失去雇主，决定由波斯腹地撤回希腊。在撤退途中，雅典贵族青年色诺芬被推举为将领之一。这支部队历经艰险，最终抵达黑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后来色诺芬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部著名回忆录《长征记》。——译者注

献 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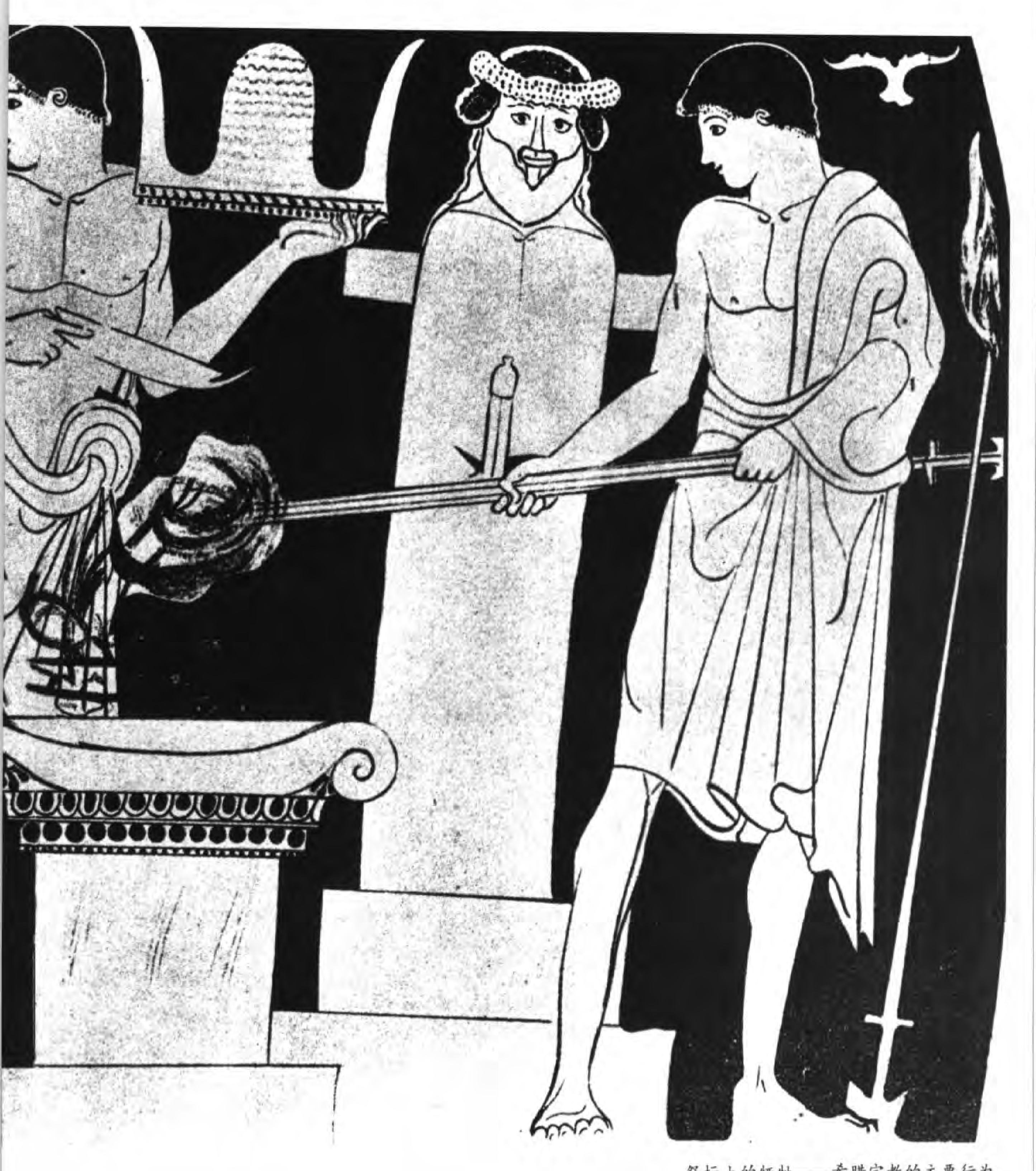
希腊宗教的核心内容是仪式化的屠宰、烹制与分食某种动物。牺牲几乎都是家养的，从廉价的家禽、山羊或猪到价格较高的公牛，种类多样。选择哪种牺牲要取决于为某位特定的神祇或场合所制定的宗教戒律，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祭拜者的献祭方式。在这幅瓶画中，可以看到祭仪的许多必需物品。赫尔墨斯神借助凸显男性性能力的雕像显现出来。画中央是祭坛，上面正烤着肉（右边斜靠着一杆烧肉铁叉）。左边有个人在倒奠酒，他让酒滴滴落在火上。左边第二个年轻人托着一个篮子，在屠宰牺牲前，篮子里装着谷物，篮子下藏着屠宰刀。

这幅图表现的恰好是某一刻的情景。实际上，献祭这出戏有精心设计的情节。一开场，祭司、牺牲、参加者等重要角色都要列队入场，围聚在祭坛四围。然后随着仪式进入最重要的阶段，悬念加强（由于一个把戏）：洁净的水洒在牺牲的头上，使它点头"同意"接下来的事。随后将牺牲迅即击昏，用刀子捅进它的喉咙。当鲜血喷溅在祭坛上时，妇女们发出祭仪特有的尖叫，标志祭仪的高潮。结局包括一些颇为细致的过程——切开牺牲、烤熟、分吃；分配食物时通过抽签或根据参加者相对地位的高低来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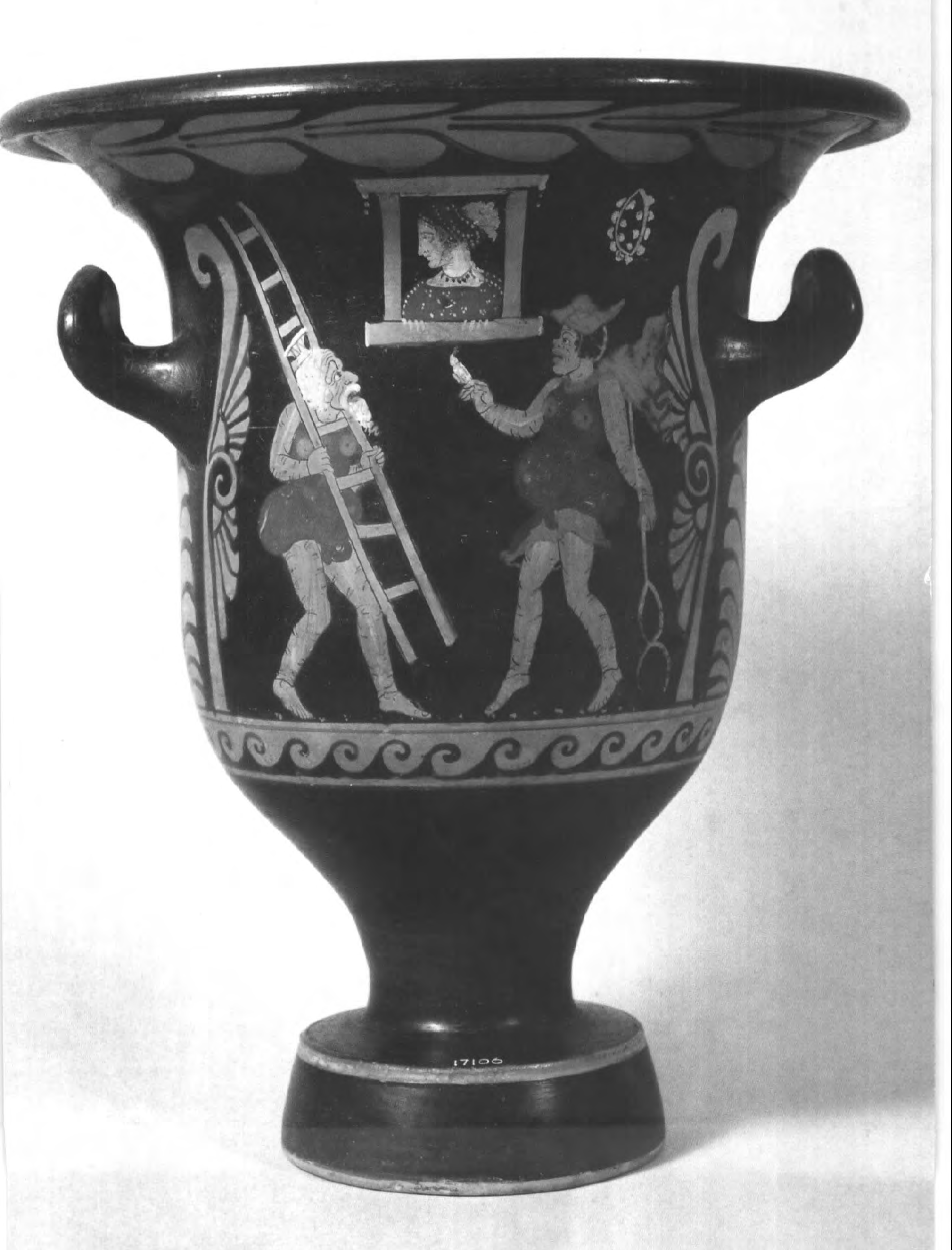
鉴于希腊神话具有阐释与探究的功能，因此，人们讲述一些故事以认识献祭活动也就毫不奇怪了。古风时代的诗人赫希俄德认为宗教仪式起源于人类与神明之间出现鸿沟的那一刻。很久很久以前，泰坦家族的普罗米修斯曾想欺骗宙斯，他摆出两份宰杀的公牛肉，分给凡人与神明。一份是美味的肉与内脏，上面罩着毫无吸引力的公牛肚子；另一份是一堆骨头，遮盖着一层迷人的肥肉。与神话喜爱采用的双关性一致，宙斯一方面看穿了这场把戏，另一方面仍然做了"错误"的选择。从此以后，牺牲虽被用来纪念神明，但却滋养了人类。

无论是祭仪还是用来解释祭仪的神话，都包含着社会的划分。每次祭祀，总是包括特定的人或群体，而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对那些参加的人来说，所分得的份额有大有小，质量有优有劣。祭祀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区分：家畜与野兽之间的差别。家畜可以用于献祭，而野生动物按规定则不行。在神话中，神与人之间泾渭分明。献祭对于社会群体的自我界定也有一定的作用。一些社会宗教团体与他们的公民同胞在信仰方面并不吻合。例如，俄耳甫斯（Orpheus）教派与毕达哥拉斯教派的成员，有时就是通过祭祀活动来弥合他们之间的差异的，前者是传说中的歌手俄耳甫斯创办的[1]，后者是由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创立的。他们都拒绝用动物进行血祭这种主要的宗教仪式，从而对自我边缘化做出了最终的说明。

(1) 传说中的诗人与歌手，善弹琴。——译者注



祭坛上的牺牲——希腊宗教的主要行为，在一只调酒碗上得到了体现。


17100

求助于宗教。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大多数希腊人可能这样想——许多神话讲到个人违背神意，招致神明的肆意惩罚，使他们发疯、失明、失聪，但并非所有人都将神作为解释病因的一种方法。人们觉得如果众神能带来疾病，也就能治愈疾病，这一点合情合理，因此许多地方为治愈疾病的神明大兴土木，修建圣所。最著名的无疑是位于厄庇达鲁斯（Epidaurus）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神殿[①]，一直到5世纪都吸引着病人。在这个古代的卢尔德(Lourdes)[②]，病人躺在一个特殊的封闭之处，祈求神灵赐予他可以治愈病症的好梦。

人们在想像神灵的时候，采用的语调十分宽泛，最强烈时是一种深深的敬畏，著名的例子是《伊利亚特》中荷马对阿波罗震怒的描述，震怒的原因是他的祭司受到了羞辱，诗中写道：

> 他这样向神祈祷，福波斯·阿波罗听到了他的声音，
> 他从奥林波斯山顶大步走下，他的心中充满怒气，
> 他的肩上挎着弓箭和盖着的箭袋。
> 这位尊神愤怒地行走，肩上的箭发出碰撞的响声。
> 他的到来犹如黑夜降临，
> 然后他在离船舶有段距离的对面坐下，射出一箭。
> 银弓发出可怕的声音。
> 他首先射向骡子和绕圈跑着的猎犬，
> 然后正对人群射出一支势不可挡的利箭，击中了他们。
> 到处燃起焚尸的火焰，无休止地燃烧。

然而，在其他语境中，采用的是一种充分欢快的语调。荷马将跛足的、戴绿帽子的赫淮斯托斯神当作嘲讽的对象。但正是雅典喜剧，恣情肆意地将众神作为笑料。在阿里斯托芬的《蛙》剧中，酒神狄奥尼索斯被描绘成具有各种人性弱点的神，尤其是他那彻头彻尾的怯懦。然而《蛙》剧却是在庆祝狄奥尼索斯神的一个节日——列奈亚节上演的。在这个节庆日子里，人们同时向酒神的祭司表示敬意。如果我们把神视为完美无缺，这种现象就显得荒诞不经了。希腊人在神灵与完美之间不划等号，赋予众神以喜剧的一面并没有削弱他们的权威，因为这种喜剧的方面正是神明存在的一种显示。那么，是什么才有可能构成对神明的亵渎呢?

正如这只出自意大利南部的陶瓶描绘的那样，宙斯求爱的冒险故事使得它们成为喜剧表现的内容。右边的是赫尔墨斯，通过他戴的帽子和手持的权杖可以识别出来。宙斯扛着梯子意在接近他爱慕的对象（可能是赫拉克勒斯的母亲阿尔克墨涅），她就在上面的窗户里。这幅画的风格被认为是意大利南部一种滑稽剧的特征的翻版，但是也许更可能是保留了公元前5世纪阿里斯托芬和他的同代人创作的雅典喜剧的痕迹。众所周知，那些雅典喜剧曾在意大利南部上演过。

公民与其他人

苏格拉底之死与渎神罪的缺失

“苏格拉底的错在于他腐蚀年轻人，也因为他拒绝承认城邦信奉的神，而是引入其他邪恶之神”（引自柏拉图的《申辩篇》）。以这一指控给这位雅典哲学家定罪

① 传说是阿波罗的儿子，希腊神话中的医药和医术之神，它不但能治病，还能使人起死回生，这违背了宙斯制定的自然规律，最后被宙斯用雷电击死。——译者注

② 卢尔德是法国西南部的一座小城，在比利牛斯山脚下，为天主教圣地。作者在这里使用卢尔德一词显然有比喻之意，指厄庇达鲁斯的医神庙为古代圣地。——译者注

并将他判处死刑（见第284页与第332页），招致了迄今仍未平息的争议。为什么卷土重来的民主政权最终判处他死刑？是因为他的一些学生曾经卷入名声扫地的寡头统治和亲斯巴达的三十僭主统治，还是因为遭到斯巴达灾难性打击的雅典城邦已经被莫名的恐惧吓破了胆，感到了宗教不敬的威胁？还是因为苏格拉底认为神对奢侈的献祭（仅对那个献祭者公正）不感兴趣的主张损害了传统的宗教祭礼？也许所有三种因素都起了作用。有一点是明确的：苏格拉底没有因冒犯全希腊的禁忌——“渎神”而被处死，因为那时还没有这种禁忌。当一位更早的哲学家——阿纳克萨哥拉斯——被驱逐出雅典时，他认为太阳神赫利奥斯只是一块炽热的石头。他的这种非正统思想并没有妨碍他的母邦兰普撒科斯（Lampsacus）礼遇有加地迎接他回国。苏格拉底丢掉性命只是由于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特殊的政治形势。

太阳神赫利奥斯。他与罗德斯岛有密切的关系。根据抒情诗人品达讲述的一则神话，赫利奥斯甚至在罗德斯岛从海里升起之前就将这里选为自己的特殊栖身之所。正如这枚罗德斯钱币显示的，赫利奥斯成为那些尊崇他的社会的象征。因此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最后一场，他起到了关键作用（见第235页）。

宗教参与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说明城邦对于宗教事务具有决定性的控制权。事实上，城邦并不是宗教活动的惟一主宰，有些崇拜与家族相关，其他的则与某个具体的家庭或宗族相关。但是一般而言，国家拥有最终发言权。男女祭司获得职位并不是因为他（她）们属于一个职业化的群体，而是因为他们受命于公民集体。正如在城邦的其他事务上一样，一个陌生人（xenos）往往不可能被任命获得这样的职位，而且至少有可能被剥夺了参与寄住国的某些宗教活动的权利。城邦和宗教是很难分开的，正如许多货币上所反映的那样，城邦的主神或英雄代表着一个城邦。

然而，参与国民崇拜活动的并不完全局限于全权公民（politai）——享有公民权的成年男性自由民。如在厄琉西斯秘仪中，不仅享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可以参加，妇女、奴隶乃至一些非希腊人均可参加，只要他们能懂希腊语。某些节庆仅限妇女参加，如希腊世界许多地区举行的祭祀德墨忒耳的播种节。在花月节上，无公民权的奴隶与不满18岁、未成为公民的男孩都有权参加祭酒活动。在克罗尼亚节上，主要活动是地位颠倒的狂欢节，奴隶和主人被暂时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甚至颠倒了各自的角色。

尽管如此，宗教崇拜活动往往标示出各种社会差别。例如，非希腊人被排除在特洛弗尼俄斯和安菲阿劳斯（Trophonius and Amphiaraus）的神托所之外，而在德尔斐，却准许他们进入。但是，在雅典的泛雅典娜节的游行中，有居住权的外国人扮演荣誉的角色，持有特殊的供品——这是一种象征的方式，象征这些外国人虽然处于所在国的公民集体之外，却又是这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米科诺斯岛（Mykonos）庆祝德墨忒耳的节日上，外国妇女必须被正式接纳后才获准参加，但是这些约束却不适用于女性公民。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关于宗教排外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妇女不仅不能



绘制这只阿提卡白底杯（见第267页）内壁画的画家，生动地描绘了一支妇女歌队在一个女子用风管伴奏下，围着圆圈跳舞。祭坛上的火焰（顶上）表明正在举行祭祀。祭台的右边是个篮子，里面显然放着羊毛线，大概有人摆在篮子上当作奉献物。羊毛加工是妇女的“正当”职责，整个画面表现出宗教与社会的和谐。

参加竞赛，甚至不能观看比赛。如有妇女敢擅闯赛场，按规定她将被推下附近的悬崖。然而，也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大型妇女运动会。在奥林匹亚，每隔四年举行一场对赫拉表示崇敬的体育盛会，由16位妇女组成的团体负责组织，主要赛事是处女之间的赛跑。遗憾的是，我们掌握的有关赫拉赛事的史料，与崇敬宙斯而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丰富史料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希腊青年及其启蒙教育

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宗教崇拜在希腊社会中的作用，把注意力集中在三个社会集团上不无裨益。这三个集团都以不同方式与城邦的中心保持着距离，它们是年轻人、妇女与奴隶。

研究古希腊的史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婚姻与生育是抚养女孩的一对孪生目标，而对男孩的教育目的则在于使他们成为公民，尤其是武士。至少在宗教领域，这种一般原则是根深蒂固的。

整个希腊都有年轻妇女参加歌队和唱歌跳舞的习俗（见第五章和第九章）。其中的一些歌曲是公元前7世纪流传下来的，它们证实了古风时代所重视的价值标

准与三个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年轻女子的价值标准极其吻合，亦即“美貌、身材姣好、自制、勤勉，不吝啬”。在某些地方还有另外一个传统，一小群年轻女孩结伴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去侍奉女性神祇，如布劳隆（Brauron）的阿尔忒米丝神、科林斯的赫拉神。这段时间，她们必须从事纺织之类的工作，显然是在为将来扮演人妻的角色做准备。另一个习俗是强制这些女孩剪短头发，这象征着她们具有暂时的边缘身份（类似于其他边缘人，如奴隶、职业送葬人），作为她们日后重返社会为人妻、为人母的前奏。因为这些女孩通常出身高贵，也就是说，她们并不构成某个特定年龄群的所有人，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也许会发生，即在一定时期里，一种入会的仪式会适用于某个年龄组的所有成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入会仪式逐渐“淡化”，只包括极少数经过挑选的贵族女孩。

启蒙教育在男孩的抚养过程中也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在公元前4世纪，克里特岛的青年必须先在“男人之家”（andreia）侍候贵族成年男子一段时间，然后被分组成“队”，活动集中于学会如何搏斗。最后，在“脱衣”节里（the“Undressing” festival），这些年轻人扔掉他们在训练中穿的破衣烂衫，换上象征成年的真正衣着。

希腊其他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各种成年仪式。比如在斯巴达，年轻人要经历一段时期的“秘密服役”（krupteia），其间他们的行为几乎与后来众望所归、驰骋疆场的重装士兵形象截然相反。据说，鼓励他们使用阴谋诡计，夜间成群结队地在乡间游荡，恐吓依附居民——美塞尼亚的希洛特人。雅典青年则在成年前有一段时期要戍守边疆，然后才能重返公民生活的中心，以重装步兵的身份发誓效忠于城邦。这些军队组织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一个被排斥和重新吸纳的有限度的阶段来实现最终目标——使年轻人成为勇士。这是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在其他许多文化中都看到的一种模式。在希腊实际生活中，仪式和节庆标志着这种过渡的每个阶段。

希腊宗教中妇女的角色

对于一个妇女在公共生活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社会来说，这一点恐怕是令人费解的，即妇女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却十分突出。有众多女性神祇（赫拉、雅典娜、阿芙罗狄忒、德墨忒耳……）和神话故事中的女主角（美狄亚、安提戈涅、克吕泰涅斯特拉、佩涅洛普……）以及许多“纯女性”的节日（见第106～107页）。我们该如何解释妇女在宗教事务中的这种独特的“可见性”呢?

当然，某些女性宗教职责与妇女在社会中通常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矛盾，相反是对其角色的确认。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性在丧葬仪式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流行的观念——社会的连续性主要与妇女有关——完全一致。通过向死者表达敬意，对过去的纪念延续不断。还有一些其他例子，如播种节，尽管在各地有不同的庆祝仪式，但其特点是一种戏剧化的过程，从节制（禁欲、禁食）到恢复正常饮食和庆祝人的繁殖。而且有一种祭祀活动似乎与通常置于女性自由之上的那些限制极不协调，这就是狄奥尼索斯崇拜。

大量瓶画描绘了处于一种明显的迷乱乃至几近癫狂的妇女，这些狂放不拘的女子通常是与酒神——快乐之神（ekstasis，意思是“忘乎所以”）相伴。此类形象

所表现的行为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Bacchace*)或《酒神的崇拜者》中得到深刻的描绘。剧中，一群底比斯贵族妇女由于对狄奥尼索斯神不敬，招致酒神将她们陷入迷狂。在底比斯相邻的西萨隆(Cithaeron)山，当底比斯国王彭托斯(Pentheus)被他母亲阿高厄(Agaue)率领的一群疯狂的妇女撕得粉碎时，这场狂暴的放纵达到了高潮。这个故事提出一个有关神话与祭祀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因为欧里庇得斯的叙事悲剧与许多希腊城邦确定的某个祭祀活动有诸多联系，其他人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在公元2世纪的《希腊纪实》(*Periegesis*)一书中，波桑尼阿斯描述了一群妇女为了向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表示敬意，在漂浮

由于狄奥尼索斯在她体内发力，这位癫狂女子变得几乎和自然界融为一体。这幅图(在白底杯内部)描绘的一个癫狂女子用一条盘绕着的蛇扎头发，身披一张在脖子处扣了个结的豹皮，手抓另一只豹的一条后腿。在她的另一只手上，有狄奥尼索斯的权杖，杖的一头缠绕着酒神的圣物常春藤。



于帕纳索斯山顶上方的云上疯跑。

另一个展现狄奥尼索斯与妇女之间关系的节日是阿格里奥尼亚（Agrionia，agrios的意思是“疯狂的”）。正如在彼奥提亚的奥科美诺斯（Orchomenus）城所庆祝的节日那样，节庆中包含一位男子对妇女们的追逐仪式。还有一个极其类似的神话谈到同一个城邦中的米尼阿德丝（Minyads）[①]，她们由于拒绝狄奥尼索斯崇拜而陷入迷狂，最终成为杀婴者。由于希腊神话往往揭示与之相伴随的仪式活动的潜在含义，所以关于彭托斯和米尼阿德丝的神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都描绘了杀害她们自己后代的母亲，这是对妇女的社会角色的最终否定。

这些仪式活动与神话叙述如何联系呢？关键的不同是在神话故事中，杀婴后的妇女全都失去了人性：米尼阿德丝变成了鸟或蝙蝠，而那些参加登山仪式的妇女则回到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直到两年后再次参加这个节日。这类仪式活动有效地将妇女们从家庭中释放出来，但是这只是暂时的释放。如果它们对妇女日常生活的认知有更持久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是我们无法确知的。

宗教与奴隶

希腊没有“奴隶的宗教”。奴隶有时可能参加主人家里的祭祀活动，也获准参与某些公共祭仪，如厄琉西斯秘仪、花月节和克罗尼亚节（见第311页）。他们可以去神庙寻求庇护，后来神庙也成为宣布他们获得释放的场所。他们可以像自由民一样祈祷和诅咒（事实上，由于奴隶没有权利，因而特别喜欢这类祈祷）。但是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说明奴隶从属于他们主人的宗教。鉴于奴隶在希腊一般是主人的财产（斯巴达是个例外，见下文），这一点并不奇怪。

没有什么和妇女经历的悖论具有可比性。妇女既属于城邦又不属于城邦，而奴隶则完全不属于城邦。神话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一般来说，希腊神话热衷于探讨宗教经验中的模糊性与对立性，但是极少论及奴隶的地位——尽管神话中的奴隶有卑贱者也有高贵者。悲剧特别强调自由民变为奴隶所引起的怜悯与恐惧，正如欧里庇得斯在《特洛伊妇女》中用这样的笔触描写那些寡妇与遗孤少女。但是奴隶制只是戏剧情节中的一个既定成分，一种功用，并没有被当作道德或社会问题来加以考察。

斯巴达似乎是个主要的例外，那里的社会状况与希腊的大部分地方有着本质差别。在那里，由希洛特人构成的奴隶人口的团结一致达到了明显威胁的程度。他们是依附性的当地希腊人，却又是在“真正的”斯巴达控制下的潜在的（有时是实际上的）反叛力量。有时他们真的采取了行动。法国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居厄特（Pierre Vidal-Naquet）曾经指出，在神话传统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在理论上允许“奴隶统治”的故事，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传说在意大利南部的塔林敦城就是由斯巴达妇女和奴隶结合之后留下的后裔建立的。这个神话通过奇想清晰地揭示了斯巴达现实政治形势中的一种潜在可能性。在雅典，由于国情与斯巴达有相当差异，这种可能性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神话世界中也难以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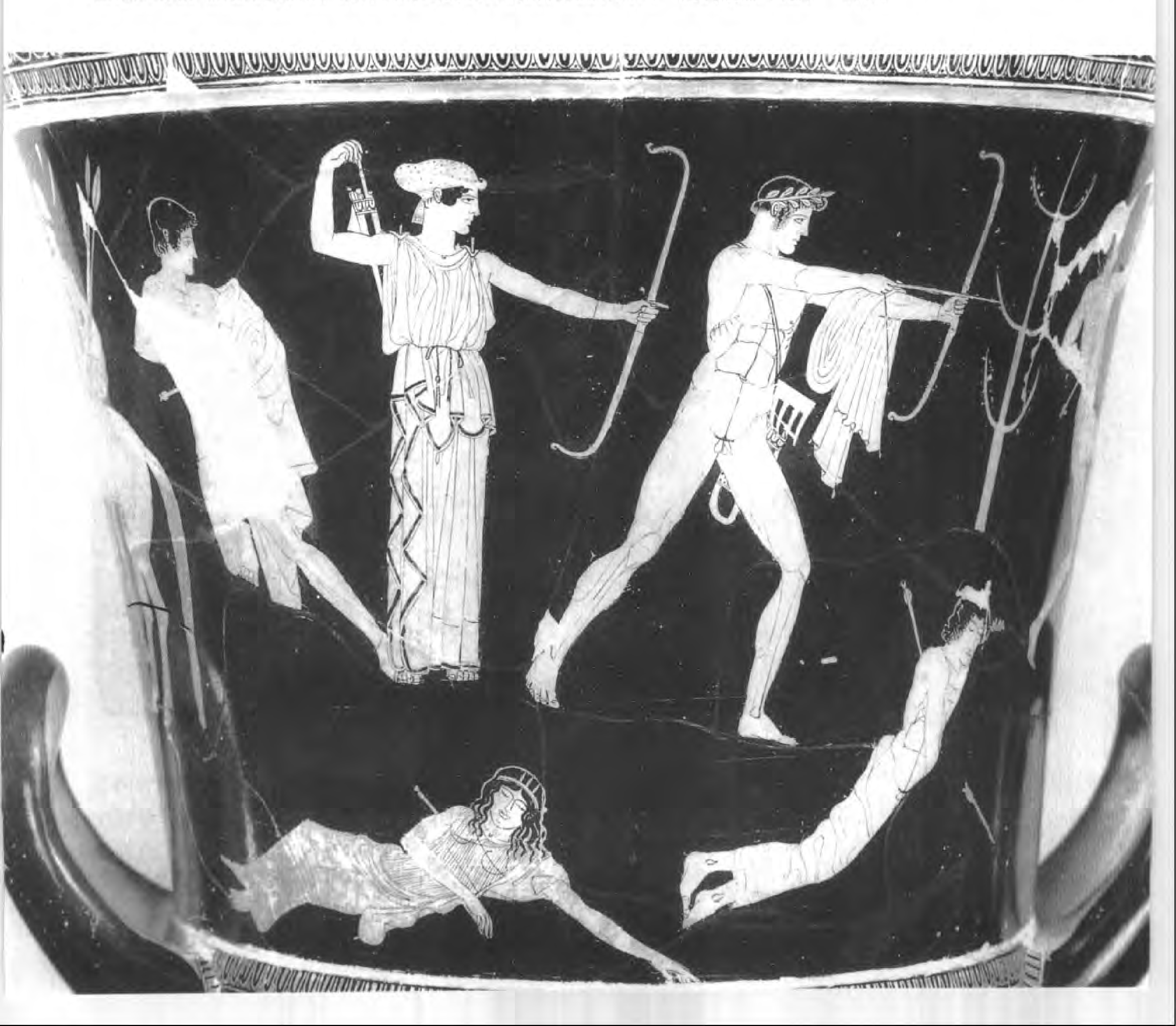
① 神话传说中的奥科美那国王米尼阿斯的女儿们。——译者注

神话与神性

尽管希腊人没有与基督教的《圣经》相似的经书，没有可以阐释的至理箴言，但却无与伦比。对于神事的叙述在信奉这两种宗教的文化中的作用简直有天壤之别。基督教通过细说圣哲与殉道者的生平，讲述那些载入启示录的故事，而希腊神与英雄的故事则具有可变与开放的特征，因而等于否定了他们。希腊神话由复杂的生活经历——既有日常生活的经验，又有宗教仪式的体验——编织而成，神话对世界的描述往往是彼此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话是在不同的语境中讲述的：由保姆和母亲为孩子们讲述，由史诗、悲剧、抒情诗、喜剧诗人为他们的观众讲述，由画家、雕刻家为他们的资助者及参观者讲述。随着语境的变化，信息也发生变化。例如，狄奥尼索斯是以冷酷的复仇者还是怯懦的小丑身份出现，需视故事是悲剧（见第312页）还是喜剧（见第309页）而定。尽管有如此的多样性，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共性。

首先，希腊故事中没有魔鬼。的确，有些神也许令人厌恶，正如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悲剧《欧默尼德斯》的开头对复仇女神们所描述的那样，“她们肮脏不堪，

尼俄柏（Niobe）轻率地炫耀自己子女众多，而嘲笑阿波罗和阿尔忒米丝的母亲莱托（Leto）只有两个子女。在这件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的红图彩绘双耳喷口杯上，莱托的两个孩子用弓箭射杀了尼俄柏的所有子女，证明自己比他们强。



赫拉克勒斯具有反对目无法纪与丑恶行径，保护人类的一面。右图中他正与狄俄墨得斯（Diomedes）的一匹吃人牝马搏斗。这匹牝马嘴边还咬着它最后吃的人头和一只手臂。但是赫拉克勒斯也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其中之一就是在疯狂当中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下图）。图中他正要把自己的儿子投入临时用家具烧着的火堆中。





令人厌恶地酣睡，眼中流淌出污秽的分泌物……”她们也许是毁灭者，就像阿芙罗狄忒惩罚朴实的猎手希波里托斯（Hippolytus）一样，使他的继母菲德拉（Phaedra）爱上了他。这件事导致前者痛苦地死去，后者自杀身亡。但是众神并



当一位凡人娶一位女神时，有时会遇到意料不到的事。在这幅图上，尽管那只狮子和一些蛇已经跃起保护她，珀琉斯还是试图紧紧地抱住忒提斯。

不是邪恶，他们代表的力量对世界的运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这些力量有时是以人们觉得残忍或不解的方式发挥作用。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一个悖论。众神作为道德秩序的仲裁者，一旦人类有了根本的过失，众神就会采取行动。因此当利卡昂（Lycaon，狼人）邀请众神赴宴，并用一个孩子的肉宴请他们时，宙斯遂将他逐出人类，把它变成了狼。但是众神不仅仅主宰道德秩序，也主宰着与道德无关的万事万物。实际上众神自己也干了各种“不道德”之事：克洛诺斯阉割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宙斯推翻了他的父亲克洛诺斯，赫尔墨斯偷了他弟弟阿波罗的牛群，阿瑞斯与阿芙罗狄忒通奸，给赫淮斯托斯戴上了绿帽子……

英雄们也有同样矛盾的行为，一方面他们保护人类，维护道德，如赫拉克勒斯在服苦役时根除了威胁文明生活的野兽，从邪恶的僭主里库斯（Lycus，另一个狼人）的魔爪中救出了全家；另一方面，他也越界和违反道德准则，如赫拉使他发狂，杀死了自己的妻儿。这个悖论的解决方法并不难找：在希腊人信仰中，众神与英雄们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检验适当的人类行为的限度，这种检验有时借助强迫执行准则的方式，有时通过打破准则的方式。

希腊神话中那些超人的天性，构成了另一个悖论，即他们一部分像人类，另一部分与人类格格不入。女神忒提斯（Theti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派里昂山与凡人英雄珀琉斯（Peleus）举行了壮观的婚礼，结婚庆典因奥林波斯神都应邀出席而大放光彩，后来生了儿子阿基琉斯。这位无可匹敌的英雄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整部《伊利亚特》中最动人的细节之一。由于两人都已经预见到阿基琉斯的早逝，因此更令人心酸。忒提斯一再感觉到阿基琉斯的痛苦，反复用温柔的话语安慰他，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一再出现这样的慈爱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极富有人情味。然而忒提斯绝不是个普通的母亲，而是个神女，是海洋的一位重要神祇涅柔斯（Nereus）的女儿。据大约属于早期罗马帝国的神话作家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说，当珀琉斯向她求婚时，她为了逃避他的求婚，把自己“时而变成火，时而变成水，时而变成兽”。在希腊神话中，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众神的这种双重天性——既像人类，又与人类不一致。

这种双重性的结果是人类难以解读神的意志。人们如何确定这些令人惴惴不安、莫测高深的神意呢？尝试超越凡人局限的最普通的方法就是祈求神谕。德尔

会说话的橡树发出的神谕

在与世隔绝的、遥远的希腊西北山区，托马洛斯山下的一个宽阔的山谷中，坐落着多多纳（Dodona）——古代最著名的一个发布神谕的遗址。这个美丽的地方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吸引着朝拜者。他们朝拜的对象是宙斯和他的配偶狄俄涅的神庙，主要是朝拜一棵橡树。求问神谕者通过人称“鸽子”的占卜者或女祭司的斡旋得到神谕。橡树“说话”时，神就降下神谕。橡树发布神谕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橡树叶子的沙沙声、在枝叶间筑巢的鸽子的咕咕声或鸽子的飞动声、风吹过一组环绕橡树的青铜锅时发出的嗡嗡声……

多亏了希腊考古学家的努力，尤其是索提里奥斯·达卡里斯（Sotirios Dakaris）最近的工作，我们才有绝妙的机会看到围绕这座圣殿举行的宗教活动。这个圣地已经出土了数千根铅条，或叫做简，上面铭刻着求问神谕者提出的问题。铅条被卷在一起，做上标记以便识别，然后交给神灵的人类代言人。这些代言人后来会给出回答，但决不泄漏原来求问的内容。有些问题是求问公共事务，例如，纷争不断、四分五裂的科西拉（现在的科福岛）人民求问，他们该向哪位神明或英雄献祭或祷告，“以便彼此达成互惠的协议”。但是，大多数问题都是求问个人之事，如婚姻、生育、健康、个人财产——这些事促使人们往往必须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来到多多那。例如，有个叫特拉希布洛斯的人想知道他该向哪位神献祭他的视力才能恢复。有个叫阿基斯的人对自己丢失的毛毯和枕头感到困惑：是不是有人偷了它们？还有更私人的问题，一个求问者焦虑不安地问：“我是安尼拉刚生的那个孩子的父亲吗？”这些问询是个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危机的产物，使我们瞬间贴近了希腊人，窥见了古希腊的许多宗教实践和宗教看法，而这些实践与看法本来与我们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



“多多纳人求问宙斯和狄俄涅，是否因为某个人的不纯洁而降下严冬？”公元前4世纪的求问。

斐的阿波罗神庙在这方面最有威望，还有一些神庙也很有名，如多多纳的宙斯与狄俄涅的神庙。

但是，神谕不会准确无误地引领人类预知未来，因为神谕必须通过凡人（祭司）加以解释。对神示的灾难性误解已成为希腊传统的一部分。这在历史和神话故事里都有详细描述，至今两方面的记述还清晰可见。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了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得到的那条决定其命运的神谕：如果你攻打波斯人，你将摧毁一个伟大的帝国。他做到了，但毁灭的却是自己的国家。悲剧的情节经常以晦涩难懂的神谕为基础，这让戏剧家能够展示人与神在知识方面的鸿沟。任何一位英雄的命运都没有俄狄浦斯的命运那样著名。他从德尔斐阿波罗的女祭司那里得知自己日后将杀父娶母，于是竭尽全力避免这个预言成真，结果还是应验了预言。然而，克洛伊索斯与俄狄浦斯这类戏剧性的故事证明，希腊传统倾向于选择和强调人们经验的一些方面，这些经验的若干方面出自人与神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神谕与现代世界热衷的占星术相比，并没有起到更多（或更少）的恐吓和误导作用。与占星术的预言一样，它们反映了现实世界人们的实际需要。



求问多多纳神谕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焦虑，许多求问与没有子嗣有关。在这根出自公元前500年左右的筒上刻着一个叫赫尔蒙的人想知道他该向哪位神祇祷告，以便他的妻子克莱塔依娅生下有用的孩子。这根铅筒用科林斯字母写成，用的是右行左行交互书写的书法（boustrophedon），“像头牛在耕地”，即第一行是由左至右写，第二行是由右至左写，第三行再由左至右写，依此类推。

巫 术

"我的魔力在那里？把精细的深红色羊毛缚在碗上，就能用咒语困住待我不善的爱人……明天我就去提马格托斯的角斗学校看他，指责他如此对待我，但是现在我要用火咒困住他……为我喝彩吧，令人生畏的赫卡忒(Hecate)[1]，请最终帮助我，让我的这些药像吉尔克(Circe)[2]、美狄亚、金发的帕里米德的药一样有效力。"

在这首希腊化时期的诗歌《田园诗第二首》中，诗人泰奥克利托斯（Theocritus）探讨了女子西迈塔的情感，她使用的巫术往往被认为属于希腊文明的阴暗面。"巫术"这一术语与它的近亲"迷信"有时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方式加以使用，与具有更高价值的"宗教"与"科学"相对。然而，就希腊而言，如果认为巫术是个完全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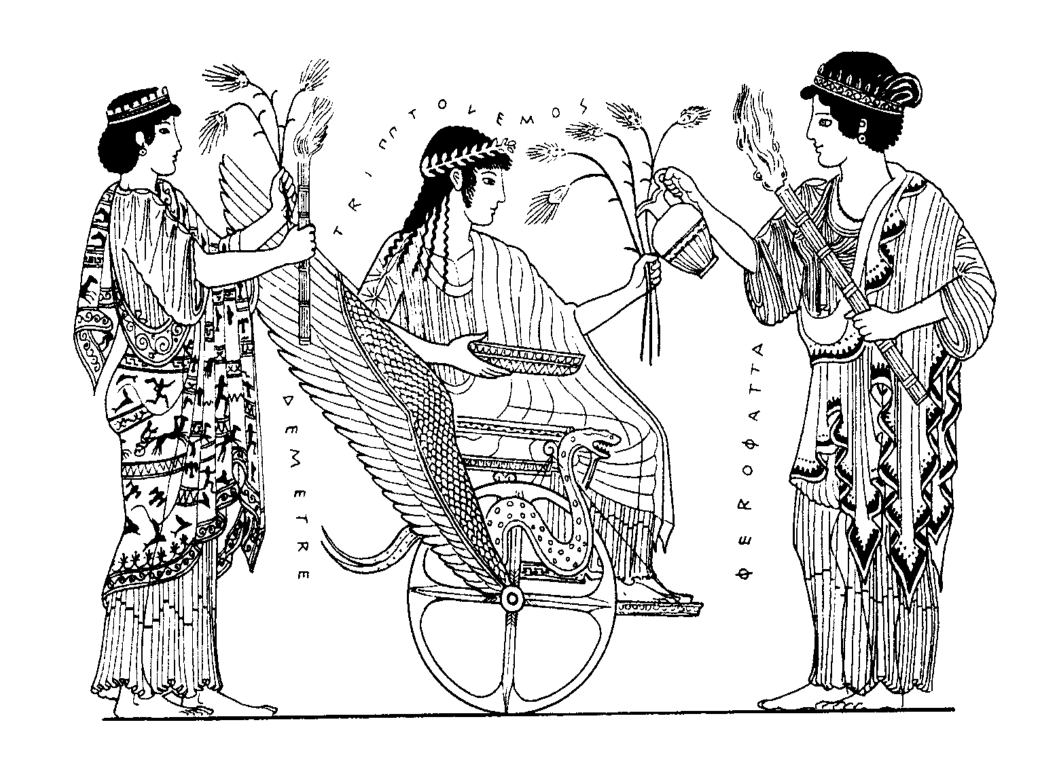


的领域，那恐怕会造成很大的误解。在希腊生活中，针对竞争的情势，产生出许多自我保护、自我强调的策略，与广为流行的伦理——"帮助朋友，打击敌人"相辅相成。某些这样的策略利用了"巫术"概念非常适用的一些程序，如防止疾病的护身符、咒语简、爱情护符、引神现身的咒语……这些策略远不是与众神灵进行协商的一种充分清晰的方式，而仅被看做是一般宗教活动的延伸。西迈塔向赫卡忒的祈祷可与更早期的诗人萨福向阿芙罗狄忒的祈祷相提并论，都是在一种想像中的相思病状态下发出的。"请将我从爱的痛楚中拯救出来，"萨福一边追忆着女神以前在类似的情感危机时的承诺，一边祈求，"这次我得说服谁来爱你，萨福？……即使她离开了你，很快她还将追求你；尽管她拒绝你的赠礼，但她很快会爱上你，即使违背她自己的意愿。"

巫术过程决不只属于不够体面的人、受压迫的人和妇女。在雅典的陶工居住区的一座坟墓中发现一个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制造的铅质玩偶，约六厘米高，有自己的小棺材。玩偶的双手被缚在背后，右腿上刻着名字"穆尼希马科斯"。棺材上刻着一排名字，其中包括穆尼希马科斯。其名后面刻着这样的话："其他人都是他的xyndikos（一场法律诉讼中的同伴）或证人。"这类物件一般放在坟墓中陪葬，也许是因为人们相信死者的幽灵是诅咒的代言人，这位死者也许能将诅咒传送给冥界众神，或许再由代言人使诅咒生效。在这里，诅咒者无疑是与穆尼希马科斯对簿公堂的一个公民——妇女没有资格参加案件的公开审理（见第107～108页）。恰恰在这个时期，确有一个名叫穆尼希马科斯的人卷入一场法律诉讼，演说家吕西亚斯[3]曾为此案写过法庭演说辞。这也许纯属巧合，但是无论如何，它至少是希腊日常生活与巫术世界之间缺乏分界的有用的象征。

(1) 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黑夜与冥界之神。——译者注
(2)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巫师。——译者注
(3) 吕西亚斯（公元前445？～前380？），雅典演说家，三十僭主统治时期出逃，民主政治恢复后返回雅典，开始为诉讼当事人写发言稿，写有《为跛子辩护》等。

铅质小玩偶（上页）以及刻在盛放它的容器上的话（左图），都是诅咒用的，使用的铅产自劳里昂。



在厄琉西斯举行的秘仪，对德墨忒耳和她的女儿珀尔塞福涅表示敬意，主要内容是复活。在这幅描绘在红图彩绘陶瓶上的画中，作者通过把谷物带给人类的英雄——特里普托里莫斯(Triptolemus)来表现自然界万物生长的复苏。他坐在带翼双轮车上，德墨忒耳与菲里法塔(德墨忒耳女儿的别名)分站两边。

诠释神谕

每一代人都按自己的想像评论希腊人，这样的假设在宗教仪式和神话学的诠释中尤为突出。例如，在解读希腊宗教时，始终有一种若明若暗的倾向，就是把希腊人视为已经隐约预见到基督教真理的人。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诗人克林忒斯（Cleanthes）写的《宙斯颂诗》一直被看做是一神教的先驱："所以我赞美你，并将永远歌颂你的神力。围绕地球旋转的整个宇宙遵从你的指引，心甘情愿地服从你的统治……"以厄琉西斯教实行的仪式活动为例，"秘教"由于认真关注人们死后灵魂的命运问题，因此在某些人看来是更高意义或更高精神层面上的异教。但是，这种有所选择的处理方法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对希腊人来说，有时"高"与"下"的宗教行为是共存的。他们在试图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时，奉献动物牺牲与"心灵"祷告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加入所谓"更高"的厄琉西斯秘教的人，同样会施行"迷信的"巫术。大多数希腊宗教的研究者已不把古希腊人当作偶尔显示出某些更美好东西的异教徒，而是致力于探讨古代仪式与神话彼此之间是怎样结合的以及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它们是怎样结合的。

当然，这种处理方法包含着它自己的假定。要强调边缘社会群体的作用，得借用当代史学家研究宗教的共同观点，简单来说就是史学家的观点。他们对宗教现象起源的兴趣小于对它们的相互联系的兴趣，其依循的处理方法是从更广阔的共时的观点来考察希腊宗教，这种方法在今天绝不少见。要考察宗教是如何建立起一种各种意义——这些意义有助于崇拜者、信奉者、讲述神话者应对人生在世的焦虑、愉快和困惑——的创始方式的，这是理解希腊宗教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尽管决不是惟一的方法。这种方法毕竟有个很重要的长处，就是能够说明向雅典娜祈祷或者惧怕阿波罗的愤怒，曾一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后记：希腊的遗产

古典主义

萨摩色雷斯的有翼胜利女神像（出自“大神殿”）。这是今天希腊化的最具影响力的象征之一，由于在巴黎罗浮宫举行了著名展览而闻名于世。它沿袭了希腊胜利女神像雕刻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但是，展现女神飞降在一艘战舰上的动作，用一块巨大的石头仿造一艘真舰大小的石舰以及赋予女神如此的优雅与力量，这些都是真正的希腊化时代的艺术成就。

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古代”这个词主要指那些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不仅有卓越的含义，还有范式和典范的意思。“古典时代”这个术语产生于17世纪早期。在用于古希腊时，这个术语最初主要是指希腊的艺术和建筑，但是经典规范这一概念首先出现于希腊本身。

在公元前4世纪30年代的雅典，著名政治家吕库古（Lycurgus）说服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幸存下来的三位早已去世的雅典悲剧作家的剧本应由官方复制，并保存在国家的公共档案当中。他用这种方法使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三位经典作家的身份得以确立，流芳百世。从古至今，这些著作具有经久不衰的作用与影响，为所有的希腊和拉丁文本赢得了“古典学”的头衔。

当然，将一个时代定义为“古典时代”，也使我们步入一个很大的圈套，意味着以后的时代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衰退或走下坡路了，而这竟然真成了在它之后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30年）的命运。希腊化时代这个术语是19世纪德国学者约翰·古斯塔夫·德罗金（Johann Gustav Droysen）首创的，他想表述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别，一种是纯希腊文明的文明，另一种是希腊文明与非希腊的东方文明的融合，后者归因于亚历山大大王的征服。



德罗金与他的许多后继者不同，他没有消极地看待希腊与东方的这种融合，相反，他将希腊化时代看做世界第一个真正普遍意义的宗教——基督教传播的必要前提。他认为，如果不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希腊化，基督教的福音也许仍然局限于它在地中海东部的发源地。但是，由于第一批基督教徒已经希腊化，因此希腊文的福音得以在说希腊语的广大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此外，至公元1世纪，地中海东部世界已被纳入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分，因此，圣·保罗（St Paul）担当了至关重要的福音布道者的重任。他是希腊化的犹太人，来自塔索斯，即现今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地区。同时他也是个身陷囹圄、向恺撒恳求获得合理审判权的罗马公民。这样的双重身份方便了他在全国各地的奔走及布道。

那些并不赞同德罗金关于历史先定论下的救世主观点的学者，对希腊化时代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而且悲观得多。他们认为在这一时代，无论在政治与政体上还是在视觉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按古典希腊的标准有所降低。他们还认为连希腊化时代和公元早

期几个世纪的希腊人肯定都这么看，因为他们自己似乎都怀念古典时代，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当然，所有这些解释都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所谓原创性，正如第一次做一件事一样，是指清楚地知道在人们的遗产和影响之外做出了某种全新的东西。

从纸草纸到印刷

古希腊人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上写作、绘画或简单地写写画画，其中以木头、石蜡、陶器、铅、石头、青铜与纸草纸为主。对于个人的日常使用来说，碎陶片可能是最普通的材料，尽管饱学之士和具有一般读写能力的人在希腊人中的比例可能从来就不太高。将表面用蜡覆盖的木板对折，拴在一起，可用于更私人化的交流。我们现在所谓的"纸"(Paper)这个词，源自表示一种书写材料的希腊词，指市场上奢侈的商品——纸草纸(Papyrus)。

图中，阿基米德[1](Archimedes)正在横穿扁平的大地。大地浮在水面上，正如泰勒斯所认为的那样。这是关于这位伟大的叙拉古科学家（公元前3世纪）的数学著作版本中的一张插图，于1503年在威尼斯印刷。

(1)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年），古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发明家，发明阿基米德原理和杠杆定律。——译者注

埃及一直是纸草的主要产地，在古代几乎是惟一的产地。将纸草茎秆切成狭条，弄干，然后粘连起来，光面朝外，用一种羽茎笔蘸墨水书写。上埃及（埃及南部）异常干燥的气候条件使大量古代纸草纸文本得以幸存。这些文本被学者们分成两大类：文学文本与录记文本。

偶尔，埃及以外的地方也有纸草纸文本幸存。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出自希腊北部的德尔维尼(Derveni)文本，包含非典型的奥菲士教派的纸草纸宗教文本。在从希腊宗教范式衍生出来的宗教中，奥菲士教徒拒绝用动物血祭。但不幸的是，这些幸存的文本过于少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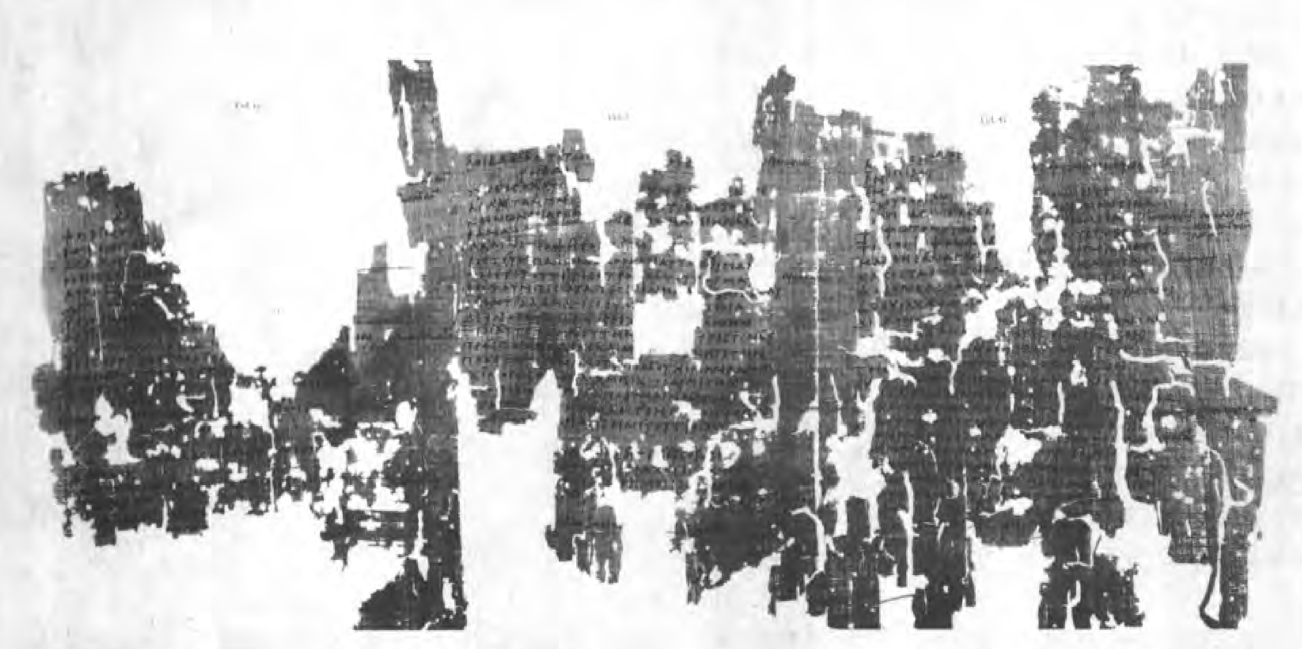
再一件不错的事情是在埃·卡努姆(Ai Khanum)发现的出自一份文学纸草纸文本的一个印迹。这里起先可能是宫廷图书馆所在地，位于希腊世界或希腊化世界最东头。埃·卡努姆（意为"月亮女人"）也许就是古代粟特的亚历山大城。这份纸草纸原件似乎包含一个公元前3世纪早期精心誊写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本。这个文本出现于亚里士多德死后三十多年后，他自己在雅典拥有的大图书馆最终被移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然而，由于博物馆与图书馆位于潮湿而又屡遭破坏的亚历山大城区，致使原先的纸草纸文本被毁，这是我们遭受的最大损失之一。

纸草纸文本一般以卷轴形式呈现，我们的"volume"（卷）一词就来自拉丁语"volumen"。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纸草纸文卷长达22英尺。在2世纪至4世纪的基督教时代，卷轴开始让位给手抄本，即把纸草纸页像书一样装订在一起。这似乎是基督教时代的一项独特革新。

在古文献的传承过程中，纸草纸与印刷之间的联系出现于古代后期和中世纪的手稿中。这些手稿抄写在羊皮纸(Parchment，一种对"帕加马出产的纸"的误称)上，由寺院或王室的抄写室誊抄，因此这类手稿的制作在人力和物力上的费用都极为高昂，这是在选择抄写古代文本时需认真考虑的因素。从13世纪开始，阿拉伯商人使西方人开始关注中国的一大发明——纸，人们广泛用纸

文学与批评

希腊文学史通常被认为是从荷马开始（大约公元前8世纪末）的一脉相承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它是希腊文本传统的延续的话就更准确了。作为文学的文本思想也有其历史，仅仅是从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开始的。据说欧里庇得斯







（上图）自埃及奥克希林库斯(Oxyrhynchus)出土的公元2世纪的纸草纸文献，写有索福克勒斯的羊人剧《追踪者》的部分内容，托尼·哈里森(Tony Harrison)据此创作了他的《奥克希林库斯的追踪者》(*The Trackers of Oxyrhynchus*)。

（左图）这些10世纪的彩图装点了公元前1世纪创作的一个文本，这是塞浦路斯岛希提昂(Citium)的医生阿波罗尼奥斯(Appolonius)关于希波克拉底的论文《论关节》(*On Joints*)的评述。

来抄写希腊手稿。

在西方于15世纪期间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前，中国早就发明了这项技术。在德国人古登堡(Gutenberg)[1]排印圣经获得突破的半个世纪中，意大利的印刷工匠，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们的需求驱动下，开始印刷古典希腊和拉丁文作家的文本。

(1) 古登堡（1398～1468年），德国金匠，发明活字印刷术，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浇铸铅合金活字、印刷机及印刷油墨，排印过《42行圣经》等书。——译者注



拉奥孔（Laocoon）和他的儿子们。大概在公元1世纪早期，三位罗德斯人——哈格桑德罗斯（Hagesandros）、波利多罗斯（Polydorus）和阿提诺多罗斯（Athenodorus），根据公元前200年左右的某个雕像或不止一个雕像原作摹制而成。拉奥孔是特洛伊城的一个祭司，试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中希腊人的木马计。他和他的儿子们（按照维吉尔[1]的《埃涅阿斯记》的说法是两个儿子）的群像塑在一个祭坛上，被敌视特洛伊的神灵们派来的海中巨蟒缠绕。普林尼（见第241页）曾描述过提图斯（Titus）[2]宫殿里的拉奥孔群像。1506年，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3]亲眼看见这件雕刻作品在罗马被发掘出来，非常符合普林尼的描述。

(1) 维吉尔（约公元前70～前19年），古罗马诗人，作品有《牧歌》十首，《农事诗》四卷，代表作为史诗《埃涅阿斯纪》，其诗作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译者注

(2) 提图斯（39～81年），古罗马皇帝，79年至81年在位，曾任执政官，与父皇韦伯芗（Vespasian）共执朝政，镇压犹太人起义，夷平耶路撒冷（70年），即位后所建凯旋门至今犹存。——译者注

(3) 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主要作品有雕像《大卫》、《摩西》、壁画《最后的审判》及建筑设计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等。——译者注

似乎很例外地有个私人图书馆，里面有纸草纸文本卷。阿里斯托芬可能也有一个图书馆，除非他有极强的记忆力，这种记忆力即使根据以口头文化为主的、很高程度的记忆标准来看也是惊人的。但纸草纸很贵，“书籍”（纸草纸卷）是颇为少见的。在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的亚里士多德时代，情况仍然如此，尽管他和他的前辈——伊索克拉特、柏拉图一样，不仅需要供个人使用的文本，而且他的学校也要以此作为教学辅助材料（见第289页）。

在希腊化时代，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收藏对象与吕克昂学园的相反，从原文收藏转向了文学收藏。传统认为，他的藏书被转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这是附属于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字面上的意思是“缪斯的神殿”）的王室图书馆。博物馆是公元前3世纪早期由托勒密一世（见第23～24页）建立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收藏的文本与涌入埃及首都的大批其他文本，不管是否是征集来的，都被编目分类，由时任图书管理员的诗人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①和文献校勘家阿

① 卡利马科斯（约公元前305～前240年），古希腊学者，亚历山大里亚诗人，创作了许多散文和诗歌作品，以长诗《起源》最为著名，但作品大多失传。——译者注

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1]等学者将它们定义为两大类，即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学和文学批评。

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决不只是对文学感兴趣。事实上，在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奠定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所有主要分支学科的基础——从文学到天文学、从医学到史学。塞勒尼的博学之士埃拉托色尼[2]可谓那个时代的学术热情和创造力的最好说明。他有个绰号叫"β"[3]，因为他在任何领域、任何学科都名列第二。他的成就包括非常精确地估算出地球的周长，质疑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他说：让我看看那个缝补国王伊奥拉斯（Aeolus）用来装住所有风的口袋的补鞋匠，然后我才会相信《奥德赛》的不折不扣的真实性！这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哲学流派，严格意义上的怀疑论是希腊化时代对哲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安康那的西里阿克（Cyriac of Ancona）临摹的舞女图，原作在公元前4世纪的萨摩色雷斯大神殿门口的一块雕石上，尽管他误以为这些女子是缪斯女神（见第352页），但至少传达了原作的精髓。

罗马的到来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接受埃拉托色尼对"诗人荷马"的那种鲁莽的怀疑态度，更不用说罗马人了，他们是希腊文化（包括希腊化时期的文化）的第一批真正的鉴赏家。在对希腊语世界进行军事与外交征服的过程中，罗马人显示出获取希腊文化及其艺术品的激情。如何更好地挪用古希腊文化而不致使自己成为荷马的神话谱系传统的一个附庸呢？毕竟，罗马人难道不是荷马笔下的埃涅阿斯的直系后裔吗？在荷马笔下，埃涅阿斯是阿芙罗狄忒的儿子啊，到了罗马人那里，阿芙罗狄忒成了维纳斯（Venus）。

古物学家老普林尼记录了罗马尊崇希腊艺术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老普林尼死于过度强烈的科学好奇心，他在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时由于离得过近而被烟雾熏倒，享年79岁。他著有一部《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其中就有幸存下来的最早的有关古代雕刻和绘画的参考指南。他在书中宣称"描绘特洛伊城的阿波罗的祭司——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大理石群雕比任何一幅绘画或青铜雕像都胜一筹。"三个雕刻家都是希腊人，来自罗德斯岛，但是老普林尼指的是在后来的罗马皇帝提图斯（79～81年在位）的宫殿中发现的那组雕像。

除了委派希腊艺术家进行创作之外，将希腊带进罗马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希腊艺术品占为己有。公元前146年，希腊的征服者卢基乌斯·穆米乌斯对希腊艺术

① 阿里斯塔克斯（约公元前217～前145年），古希腊语法家和文献校勘家，当过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以校订和研究荷马史诗而闻名。——译者注

② 埃拉托色尼（约公元前276～前194年），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首次测量出地球周长和黄赤交角，并编制了星辰表。——译者注

③ 希腊字母表中的第二个字母，发音为Beta。——译者注

品进行大肆劫掠，因而臭名昭著。但在他看来，掠夺战利品也许是正当行为。体现罗马人情趣的另一种方式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高度发达的古典时代的一块希腊大理石山墙构件从它所在的原址移到阿波罗·索西阿努斯神庙。此庙建在罗马的坎普斯·马尔提乌斯（the Campus Martius）[①]，于公元前20年代在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时期建成。

奥古斯都实际上曾用希腊文字写过回忆录，在占他帝国一半的希腊语地区，人们以传统的希腊化方式将他当作神一样的国王崇拜。但是在罗马，他很小心地使自己与希腊保持距离，尤其是避免自己被奉为神明。通过维吉尔的史诗和其他方式，奥古斯都公开鼓励对一些神明的祭祀活动。他认为罗马和他自己之所以能如此幸运地摆脱长达几十年的内战，要归功于那些神明。这些神明中主要有马尔斯（Mars）和维纳斯（Venus）（他宣称她是他的女始祖）以及阿波罗。阿波罗曾

① 拉丁文意为"马尔斯之地"，是一处位于罗马北部的平原，曾作为罗马公民大会（森都里亚大会）的会址。——译者注



罗马统治下的希腊

我们把希腊文化的保存主要归功于罗马人和罗马帝国。贺拉斯（Horace）[(1)]将罗马文化的希腊化形容为"被俘虏的希腊俘虏了她的凶猛征服者，将艺术带到了乡村拉提乌姆"[(2)]。但是，按照维吉尔的说法，朱庇特亲自教会了罗马人应该"赦免那些已经臣服的人，与那些不屈服的抗击者作战"。换句话说，由于希腊人对成为罗马帝国的臣民不感兴趣，所以罗马对希腊高度发达的文化的吸收伴有对希腊人民无数的野蛮暴行和大肆劫掠。

希腊雕像受到罗马征服者的特别注意。然而幸存下来的雕像，通常多半不是用青铜制作的希腊原作，而是罗马的大理石复制品，往往不止一件。尽管偶尔会有被劫掠的雕像原件传给我们，但是没有哪件比得上公元前5世纪制作的，超过真人大小的两尊青铜雕像更蔚为壮观。它们是从卡拉布里亚的里亚斯附近的海中打捞出来的，时间仅仅在几十年前。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幸运的，当时，装载它们的船只在从希腊驶往罗马的途中失事了。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杰作出自菲迪亚斯之手，原来是雅典人为纪念他们在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向德尔斐奉献的物品的一部分。不管真实与否，菲迪亚斯一定会对现代人对它们的应用感到吃惊。在发现里亚斯雕像之后不久，其中一尊青铜作品即被刊载在一本意大利的色情漫画杂志上（见右页上图），的确应"禁止未成年人阅读"。

对于希腊文学也是这样，一般说来，罗马人满心希望创作他们自己的、堪与希腊文学齐名的多种流派的作品，某些人还说

极为罕见和精美的里阿斯青铜雕像之一。（左图）关于这一雕像的更不寻常的图画之一（右上图）。

经帮助奥古斯都打赢了那场对安东尼（Antony）和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的决定性的亚克兴战役。在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第4卷中，据说迦太基女王狄多（Dido）[①]有意召回克莱奥帕特拉。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宣传资料中，这位希腊－马其顿女王被描写成野蛮、衰落的东方的化身。与之相反，他自己则是那个虔诚的、完全罗马化的埃涅阿斯的再生。

拜占庭或新罗马

随着330年确立君士坦丁堡为第二首都，罗马帝国的重心东移，而罗马和意大利都相对陷入衰落。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天主教与东正教分裂以及后来在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残部。这使东西方之间竖起

① 迦太基的建国者及女王，拉丁史诗中说她落入埃涅阿斯的情网，因埃涅阿斯与她分手而绝望自杀。——译者注

要超越希腊文学。但是，剧场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方面，尽管罗马人羡慕它、模仿它，但他们自己的剧场发展却很缓慢。希腊戏剧，尤其是喜剧，在公元前4世纪时传入意大利，在公元前3世纪传入罗马，但是这并没有使意大利本土流行的哑剧和闹剧显得黯淡。演戏仍然是不太体面的一种职业，法律禁止罗马公民从事演艺业。因此，当看到罗马皇帝尼禄似乎自贬身份像希腊式的演员那样演戏时，因循守旧的罗马人既震惊又愤怒。而作为他的顾问之一，塞内加（Seneca）[(3)]更能接受悲剧创作，而难以接受参加悲剧的演出。

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一座永久性的剧院才在帝国首都建立起来，这无疑是罗马对希腊戏剧文化持怀疑态度的标志。然而，在那之前不久，一位罗马官员采用通常的做法，在硬币上铸上了包含他的名字——他的姓氏穆萨（Musa）——的一语双关的图案，他很有想像力地在他发行的硬币上刻画上了描述悲喜剧中的缪斯女神的面具。



穆萨银币



(1)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写诗歌颂奥古斯都的统治，作品有《讽刺诗集》、《歌集》、《书札》等。——译者注

(2) 罗马所在地是拉提乌姆平原，又译作“拉丁平原”。——译者注

(3) 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年），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尼禄的老师，因受谋杀尼禄案的牵连而自杀。哲学著作有《论天命》、《论忿怒》、《论幸福》等，悲剧有《美狄亚》、《奥狄浦斯》等九部。——译者注

了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希腊则处在东方一边。因此，15世纪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最初并不是古希腊文明的重现，而是罗马文化与文明的再现。不过也有例外。

文艺复兴

15世纪上半叶，安康那的意大利商人西里阿克把30年的大好时光用来周游意大利、希腊和东地中海。他对古希腊古物写生（见第327页），抄录古希腊铭文，从而为文艺复兴认识古希腊的物质文明提供了惟一有意义的概览。不过，他并不只是依样画葫芦似的记录所见所闻，例如，他绘制的帕特农神庙西侧前的轮廓和柱子的比例就一点都不真实。他根据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偏颇观点描述了山墙上的雕刻。当然，当他参观萨摩色雷斯的大神殿（即带翼的胜利女神的原生地）时，他的描绘按我们的观点来说要好得多了。

科　学

依据现代人对艺术与科学的区别，前面有关希腊遗产的影响主要来自艺术。然而古希腊人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文艺复兴时期或启蒙运动时期的杰出知识分子也一样。当然古希腊的科学和现代的科学有着诸多深刻的分歧。我们的物理学（physics）一词实际上来自古希腊的physis一词，意思是本质。但是，举例来说，认为顶夸克（top quark）的发现，即现代物质结构理论预言存在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亚原子粒子的发现，是古希腊人提出的科学质询项目的完成，这一观点恐怕是有问题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延续性存在。如果科学只是试图发现、解释经验世界的现象和规律，认为自然规律在时空范围内是统一的，那么古希腊“对本质的探询”（historia physeos）实际上就是科学。古希腊人对自然界的看法，比如德谟克利特的自然世界观，确实预示了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早期西方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非宗教的科学观。从古希腊的诗性语言中合理地衍生了许多我们当今使用的科学术语。例如，正如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在《周期表》一书中指出的，乙醇（ethyl）、甲醇（methyl）这类词的词尾-yl就产生于希腊词“hyle”（物质）一词。

反古典运动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及现代早期的思想家都对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思想家具有感激之情。无疑，并非只有约翰·洛克（John Locke）一个人认为古典时期的教育还不够完善：

当我想到人们为一点拉丁语和希腊语制造出这么多麻烦，花费这么多年的时间，徒劳地吵吵嚷嚷、忙忙碌碌，我就忍不住想，孩子们的父母们仍然生活在对

教师的教鞭的惧怕之中。他们将它看做惟一的教具，在他们看来，这一两门语言就能决定一切。

17世纪，在宗教与政治明显分道扬镳的同时，人们开始否定共有的古典传统的极端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看此时有关民主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及现代早期的主要思想家往往赞成共和政体的自由，或无论如何赞同摆脱专制统治的自由。但是，他们怎么看也不能算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许多人宁可要一种专制，即使它对他们并不怎么仁政，也不要民众来统治。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是一位这样的思想家。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首次将修昔底德的作品直接从希腊语译成英语，而不是通过拉丁译本。他在临终前宣称，正是修昔底德教他懂得，比起将权力交给一群乌合之众来说，由一个人来统治是多么明智啊！

另一方面，1644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对英国议会做了一次名为《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的演讲，这也许是当时人们在公共政治演说中所听到的拥护充分自由的古希腊民主思想的一篇演讲辞了。扉页上的引文出自欧里庇得斯的《恳求的妇女》（*The Suppliant Women*）的译本：

> 只有天生自由的人在公众面前
> 可以自由地演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 如果他能够也愿意自由地演讲，便能赢得崇高的赞誉，
> 相反，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意的话，也能保持他的沉默。
> 在一个国家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公正的事情呢？



马可·奥里略（Marcus Aurelius）的半身雕像是18世纪哲学跋涉的成就之一。他是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尽管是罗马皇帝，但他曾用希腊文撰写了斯多葛主义的《沉思录》（字面上是《自省录》）。



在詹姆斯·“雅典人”·斯图尔特（James “Athenian” Stuart）（1713～1788年）1751年至1753年间绘制的这幅卫城的前景图中，矗立着风塔，这是一个公元前1世纪制作的钟，今天还在那里，但已停摆。18世纪60年代，斯图尔特为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林奇菲尔德勋爵的祖产设计了一栋耗资巨大的建筑，设法把这幅图的复制品结合进去。它也经历住了时间的考验。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于1787年创作的《苏格拉底之死》。在《斐多篇》中，柏拉图通过斐多之口说出下面的话，苏格拉底饮毒时斐多在场：

不久狱卒……进来站在他（苏格拉底）旁边说："苏格拉底，如果你也像别人一样，在我执行当局的命令让他们喝下毒药时对我发怒或诅咒我，我都不会怪罪于你。我知道你是所有到这里来的人中最高尚、最温和、最善良的人。事实上，我敢保证你不会对我发怒，而是对其他人发怒，因为你明白这不是我的错。所以，现在你知道我的差事了，我就和你告别了，怎样容易忍受就怎样做吧。"那个狱卒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转身走开了。

后来，当苏格拉底把杯子举到嘴边，喝尽那剂致命的毒芹液时，斐多说道：

……在此之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一直在忍住悲痛，但是现在当我们看到他一口口地喝，把毒药喝尽，我们再也控制不住了。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哗哗地流了下来，只好掩面而泣。但我不是为了他哭，而是为我自己的苦运——为我失去这样一位朋友而哭泣。克里托(Crito)甚至在我之前就止不住哭起来，站起身走了出去，我也跟着出去了。阿波罗多洛（Apollodorus）一直在哭，而此刻更是号啕痛哭起来，使我们大家都控制不住了，只有苏格拉底一个人处之泰然。

启蒙运动

在18世纪的欧洲和美国的启蒙运动中，"哲学家"(philosopher)这个词的使用有点类似最初的希腊语含义——智者（指它获得贬义色彩之前），意味着有智慧、有文化的人，或在比较狭义的意义上指知识分子。哲学的演化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活动。

随着18世纪的发展，对于有教养的年轻绅士来说，到古典文化发源地旅行越来越成了必要的事——第一站是罗马，接下来去的地方或不太经常去（不是出于其他原因，而仅是出于务实的考虑）的地方是希腊和爱琴海诸岛。

这种旅行产生的最引人注目和最持久的结果也许是人们对古典建筑产生的热情，这体现在新古典主义的发展之中。苏格兰人詹姆斯·斯图尔特对促进"希腊复兴"的贡献最大，"雅典人"·斯图尔特因此而得名。他和尼古拉斯·芮维特(Nicholas Revett)在1751年至1753年间共同构思、创作了后来出版的《雅典古迹》一书，有些说法认为出版的时间要晚得多。在他们造访希腊的同时，北欧与较晚兴起的北美对古典的兴趣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由罗马转向希腊。德国人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①]是这次运动的艺术批评先锋，尽管他几乎从未真正踏足希腊，也从未对罗马的希腊雕刻复制品发表过任何看法。

然而，对希腊的这种新兴趣绝不是公正无私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要搜求古典艺术品，而斯图尔特和芮维特的主要目的则是为英国的新古典建筑提供可用的模本。事实上，斯图尔特自己就被授权设计了一些古物的复制品。

除了建筑，新古典运动还对绘画和雕刻感兴趣。绘画包括陶制品，如在约西

①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1717~1768年），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艺术新古典主义的奠基者，其名著有《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和《古代艺术史》。——译者注

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的那座著名的“埃特鲁里亚”工厂制作的陶器，人们当时认为在埃特鲁里亚发现的雅典陶瓶都是埃特鲁里亚的地方产品。拿破仑的宫廷画家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2]也许是法国最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拿破仑皇帝欣赏古典主义，自诩为亚历山大大王或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但是大卫也是擅长表现希腊题材的画家，《苏格拉底之死》（见第284页）是他最著名、最具感染力的作品之一。诚如1776年吉本（Gibbon）[3]评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4]时所说，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位哲学家的死亡。

浪漫主义

休谟是在爱丁堡——“北方的雅典”去世的，现在，安托尼奥·卡诺瓦在1815年至1819年间创作的第二尊“美惠三女神”，每半年在爱丁堡公开展出一次。温克尔曼坚持认为希腊最辉煌时期，即古典时代的雕刻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卡诺瓦的艺术天赋与高超技艺使他能够创造出非同凡响的希腊化时期的雕像摹制品。

正当人们制造这些仿制品的时候，出自一座真正的希腊神庙的雕刻作品以及有关它们争讼不休的命运，也在此时决定了。1801年，埃尔金勋爵七世从雅典卫城移走了这些雕刻，它们被称做埃尔金大理石雕和帕特农大理石雕。1816年，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们最终以3.5万英镑买下了它们。当时是为了筹集一位国王的赎金，尽管埃尔金将它们运到英国的费用是这一款项的两倍。拜伦（在他的《密涅瓦[5]的诅咒》与及其他诗歌中）对这种劫掠行径表达了亲希腊人士的极度愤慨：

> 是的，正是密涅瓦自己；但是，多大的变化啊！
> 自从她全副武装在特洛伊人的土地上漫游！
> ……
> “人啊！”——她这样说——“那因耻辱而羞红的脸
> 宣布，你们不列颠人，曾经是一个高贵的名字，
> 最强大的民族，最自由的国度，
> 现在人们对你的尊敬正在消退，尤其是我。
> 然而帕拉斯才是你主要的敌人。
> 你知道被憎恨的原因吗？——看看四周吧。



安托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1]在1815年至1819年间创作的《美惠三女神》雕像。雕像原来立在英格兰的詹姆斯·怀阿维尔神庙中（位于沃本·阿贝），后来被拿出来出售，在全世界引起轰动。1995年，一个私人慈善团体“为了国家（英国）而拯救”，耗资近800万英镑将它们留在了英国。在这个世纪层出不穷的现代艺术运动中遭受了长时间冷遇之后，卡诺瓦完美的古典主义重新获得公众和市场的青睐。卡诺瓦，第一批新古典主义者中的一员，在伦敦致力于厄尔金大理石雕的研究。

① 约西亚·韦奇伍德（1730～1795年），英国著名陶器工匠和制造商，自建工厂，设计并制造米黄色陶器、黑陶器等销行世界各地。——译者注

② 雅克·路易斯·大卫（1748～1825年），法国古典主义画家，画风严谨，技法精湛，曾任拿破仑宫廷首席画师，代表作有《荷拉斯兄弟之誓》、《马拉之死》等。

③ 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年），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记述从2世纪起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为止的历史。——译者注

④ 大卫·休谟（1711～1776年），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认为知觉是认识的惟一对象，否认感觉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智研究》等。——译者注

⑤ 密涅瓦（Minerva）是罗马人崇拜的司智慧、艺术、发明和武艺的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译者注

(1) 安托尼奥·卡诺瓦（1757～1822年），意大利雕塑家，新古典主义倡导者之一，塑有教皇墓碑、拿破仑半身像及拿破仑之妹博尔盖瑟的半裸体雕像等。——译者注



伦敦雅典娜神庙俱乐部。雅典娜神庙俱乐部委员会为迎接埃尔金大理石雕刻的到来，对俱乐部建筑外部装饰了韦奇伍德风格的帕特农浮雕带。



布拉姆·鲍威尔（Hiram Power）的作品《希腊奴隶》（作于1843年）。希拉姆·鲍威尔于1843年创作的这尊极具美感的裸体女性《希腊奴隶》大理石雕像，对伊丽莎白·巴莱特·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而言，它体现了"冰冷的完美"，但对我们大家来说，它将更像是几乎没有任何升华的窥阴癖的某种东西带到了我们眼前。

看哪！这里，尽管战争绵延，战火肆虐，

但我看到独裁政权接二连三地垮台。

尽管逃脱了突厥人和哥特人的蹂躏

但你们的国家却派来了比他们更恶劣的掠夺者。"

……

她停顿了一会儿，于是我嗫嚅回答，

以熄灭她眼中燃起的复仇火焰：

"朱庇特的女儿啊！我，一个真正的不列颠人，

以受伤的不列颠的名义，但愿这样的事从未发生。

不要对英格兰蹙眉，雅典娜！英格兰没有这样的人，

绝对没有！你的劫掠者是个苏格兰人。

至于这些大理石雕究竟应该安置在哪里，至今仍是热烈争讼的问题。

(1) 勃朗宁（1806~1861年），英国女诗人，罗伯特·勃朗宁之妻，婚后移居意大利，支持佛罗伦萨独立运动，代表作有《孩子们的哭声》、爱情诗《葡萄牙十四行诗集》。——译者注

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一味抄袭、剽窃希腊文化，这给他们带来一些文化上的问题。一方面，希腊无论在文学和视觉艺术上，还是在政治与教育上永远是参考依据和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开古希腊文化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基督教文化不相吻合的某些内容。首当其冲的是希腊的性文化，特别是同性恋，引起人们的广泛争议。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用一种远离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表现假定的现实生活的场景。

再者，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一些人对希腊人的欣赏，确切地说，意味着他们对恣意放纵的性态度和性行为的首肯。例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①]的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出版于1890年，正是在这一年，英文术语“同性恋”首次得到记载）可视为对希腊男性同性恋的一种标志性探索。奥伯雷·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②]的生动绘画则提供了丰富的异性性行为的图像。

奥伯雷·比尔兹利作为制图员，他的画技很少用于戏剧，而是较多地体现在一系列绘画中。这些画的创作灵感来自阿里斯托芬的剧本《吕西斯忒拉忒》。受伦纳德·斯密特斯（Leonard Smithers）的委托，这些画出现于伦纳德·斯密特斯于1896年限量出版的该剧剧本中。

现代主义：革命与反动

王尔德和比尔兹利以合作编排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Salome）[③]而闻名于世。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描绘受传统抑制或忽视的那些人类行为或社会道德观念。就这点而言，至少他们二人是有共同之处的，后来出现了艺术的革命者，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④]。据说，他给20世纪的绘画带来了四种自成一体的变革。人们往往认为这些变革与了无生气、陈腐僵化的学究式古典主义相对抗。然而，即使是毕加索也无法扼杀古典主义，就连他自己也不能完全避免使用古典式的雕像表达最深刻的个人、职业或政治情感，或自己在诸多情感中的挣扎。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法西斯与极权主义肆虐的黑夜中，牛头人身怪物米诺塔占据了他的心房。

没有泰坦巨人普罗米修斯的努力——他为了人类的利益，不得不用欺骗的手段从宙斯那里为人类盗走天火——就不可能有技术的进步，也不可能铸造青铜雕像。在19世纪，普罗米修斯对激进的左派思想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其中有雪莱

① 王尔德（1854～1900年），爱尔兰作家、诗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的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喜剧《认真的重要》、《少奶奶的扇子》和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肖像》等。——译者注

② 奥伯雷·比尔兹利（1872～1898年），英国插图画家，画风受新艺术曲线风格和日本木刻的粗犷特点影响，代表作有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的插图。——译者注

③ 莎乐美是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人物。——译者注

④ 毕加索（1881～1973年），西班牙画家、雕刻家，立体主义画派主要代表，1904年定居于巴黎，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其作品对西方现代艺术有深远影响，代表作有油画《格尔尼卡》、宣传画《和平鸽》等。——译者注



纳什维尔的帕特农神庙。这座刻意仿造的帕特农神庙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如一份旅游广告所说，它"恰好是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美国音乐城的一座建筑"。但是，人们对这类复制是否合适却看法不一。

和卡尔·马克思。然而现在，马克思已成为工业领袖们公认的偶像。

另一个对古典希腊成就所做的现代的机械模仿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即对帕特农神庙的仿造。里卡多·伯菲尔（Ricardo Bofill）最新设计的新的巴塞罗那国家剧院尽管非同一般，但是它所体现的新古典主义却激起嘘声一片，同时使西班牙的先锋派后现代主义得以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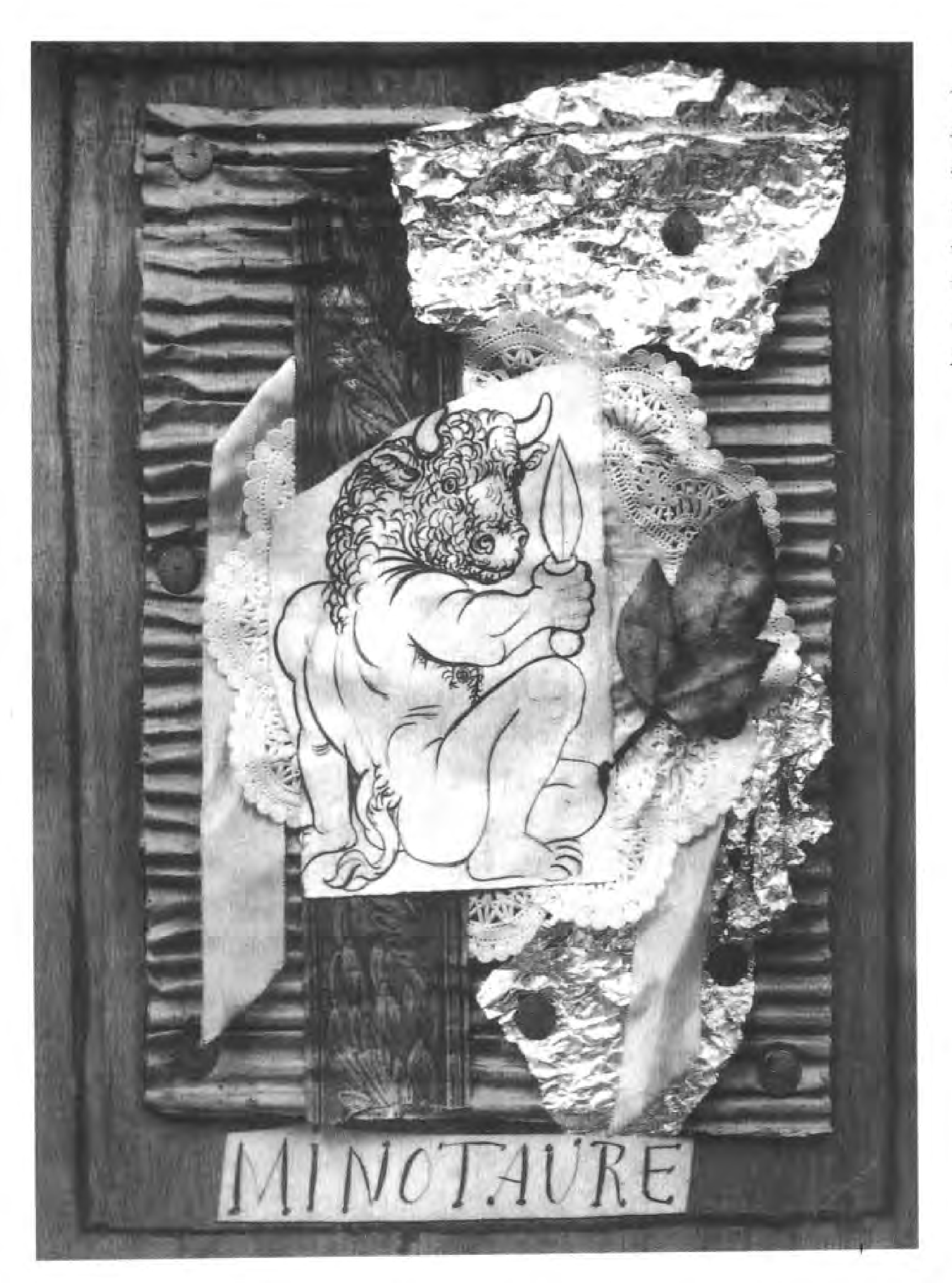
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大楼外面，竖立着一座手持火种的普罗米修斯青铜雕像。这里借用他的形象作为技术进步的明确象征，而在其他诠释中，这位泰坦神被人类用来质疑神对地球上的生命的统治。

后现代主义？

他们的同胞弗朗西斯·托雷斯（Francese Torres）的作品也许远不对他们的胃口，托雷斯以一种较波菲尔（Bofill）更隐晦、更庄重的方式回到过去的古典。例如，托雷斯向一个标以"重写历史"的展览会提交了一件名为"奥依科诺莫斯"（Oikonomos）[①]的作品。这是一件双道视频装置，中央是出自阿尔特米西姆的宙斯或波塞冬（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青铜像。

"奥依科诺莫斯"说明，对艺术家而言，根据其他话语来审视自身文化的话语

① 古希腊文原意为家政管理，西文"经济"（Economy）便源出于此。——译者注



毕加索的作品《米诺塔》，作于1933年。作为一位西班牙人，毕加索对人性中的兽性象征——公牛有着特殊的兴趣，因此他很自然地被阿尔伯特·斯吉拉的《米诺塔》杂志选作创刊封面的插图画家。这幅图面世于1933年，正是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同一年。

的可能性是多么丰富多彩。藉此，它尖锐地提醒我们，古典希腊传统如果要继续传承下去的话，就不能成为固定不变和静止不动的东西，必须不断地创新。正如当代作家朱安·戈提索罗（Juan Goytisolo）所主张的那样，“多视角、多元经验”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身文化的原初成分和特征，以及合理地确认当代社会时尚所包含的创作者的个性化原则”。

这样一种多文化的相对主义，而不是僵化的学究式的古典主义——仅仅迷恋于最古老的、已经死去的白人欧洲男性及其成就。这种相对主义应当是所有珍视、热爱古代希腊的人们的追求目标。

参考指南

人 物

阿基琉斯(Achilles)：凡人珀琉斯和神忒提斯的儿子。他因受辱于阿伽门农而产生的愤怒构成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主题。

埃涅阿斯(Aeneas)：特洛伊英雄，安吉塞斯(Anchises)和阿芙罗狄忒(维吉尔笔下的维纳斯)的儿子。特洛伊陷落后，他救出父亲并成为罗马的建立者，因而闻名。

埃俄罗斯(Aeolus)：风神。埃俄罗斯将风装进一只口袋，送给从特洛伊返航的奥德修斯，但却被他那些好妒的水手将众风放走。

埃斯奇尼斯(Aeschines)：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提尼的主要政敌，因在公元前330年控告德摩斯提尼的一个同僚败诉而退出政治舞台。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约公元前525年至456年，悲剧作家，据说写有90部剧作，只有7部传世(如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是他写的话，只有6部)。

伊索(Aesop)：驰名于公元前6世纪，曾是萨摩斯岛的一个奴隶。“他的”寓言中，没有一则确切可信。

阿伽门农(Agamemnon)：传说中的迈锡尼国王，远征特洛伊的希腊军队统帅。他被其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及其情人埃癸斯托斯谋杀的故事，构成埃斯库罗斯于公元前458年创作的《奥瑞斯提亚(Oresteia)》三部曲第一部的主题。

阿伽宋(Agathon)：约公元前447年至前400年，雅典悲剧作家。柏拉图的《宴饮篇》谈到一次聚会，庆祝他作为悲剧诗人于公元前416年在莱奈亚节首次获得成功。

阿高厄(Agave)：彭托斯的母亲，在参加酒神节狂欢时把彭托斯撕成碎块。欧里庇得斯把这个恐怖的情节写入悲剧《酒神的伴侣》。

阿哥西劳斯二世(Agesilaus II)：约公元前400年至前360年的斯巴达国王，曾是希腊大陆最具权势的人物之一，但是他导致了斯巴达的衰落。

阿尔开俄斯(Alcaeus)：闻名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列斯波斯岛的密提林抒情诗人，活跃于国内的政治舞台。

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约公元前450年至前404年，受伯里克利监护，是他最杰出而又最难驾驭的继任者。因变节而蒙羞，后恢复名誉，又第二次受辱，最后被谋杀。

阿尔西达马斯(Alcidamas)：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因主张“神没有让任何人当奴隶”而闻名，所以他支持美塞尼亚希洛特人的解放。

克罗敦的阿尔克密翁(Alcmaeon of Croton，意大利南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医生，开创性地提出智力存在于大脑中而不是心脏中的理论。

阿尔克曼(Alcman)：斯巴达抒情诗人，声名显赫期为公元前600年左右，最著名的成就是开创了少女之歌、歌队抒情诗的体裁，由将要嫁人的少女们演唱并进行比赛。

阿琉阿德家族(Aleuadae)：帖撒利的一个贵族家族，在波斯战争中背叛希腊，投靠波斯。

菲莱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Pherae)：帖撒利的僭主，公元前358年遇害，重振其先辈伊阿宋的功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亚历山大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生于公元前356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公元前336年至前323年在位。他继承父亲腓力的角色，完成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后来在巴比伦英年早逝，没能巩固新帝国的体制。

阿马西斯(Amasis)：公元前6世纪的埃及法老，采取亲希腊的政策。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国王冈比西斯征服(见冈比西斯)。

亚马逊人(Amazons)：神话中由女性勇士组成

的一族。其中有个叫潘泰希里亚的被阿基琉斯杀死，另一个希波里特的安提俄普是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之母。

安密阿那斯 (Ammianus)：公元4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用拉丁文写作，称颂异教皇帝朱利安。

克雷佐门尼的阿纳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 of Clazomenae)：约公元前500年至前428年，自然哲学家，认为太阳不是神，而是一块又红又热、比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得多的石块。他因这个主张成名，也因此臭名昭著。他可能因渎神而在雅典遭到控告。

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ander)：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米利都学派自然哲学家，与泰勒斯齐名，认为宇宙万物是个和谐的体系。

阿那克西美尼 (Anaximenes)：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米利都学派自然哲学家，可能是泰勒斯的学生。他认为气是宇宙的本原。

安德罗玛 (Andromache)：赫克托的妻子，她和她丈夫的故事是《伊利亚特》中的著名篇章。后被阿基琉斯的儿子皮洛斯俘虏，带到希腊为奴。

安塔尔基达斯 (Antalcidas)：公元前4世纪著名的斯巴达将军、外交家，是公元前386年与波斯和谈的代表。

安提柯一世／安提柯王朝 (Antigonus/Antigonid dynasty)：马其顿王朝，根据独眼的安提柯一世命名。亚历山大大王的帝国分裂后，他取得马其顿和希腊的统治权。

安提帕特 (Antipater)：马其顿贵族，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成为马其顿和希腊的摄政者。

安提丰 (Antiphon)：雅典寡头政治家、演说家、也许还是哲学家。策动公元前411年政变，但是因变节而被处死。

安提西尼 (Antisthenes)：生卒年代为公元前445年至360年，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后世所谓“犬儒学派”(来自希腊词“狗”)的创始人。

阿佩勒斯 (Apelles)：活跃期为公元前4世纪，最初是科罗枫人，后来在派拉给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王充当宫廷画师。

阿芙罗狄忒 (Aphrodite)：跛腿工匠神赫淮斯托斯的妻子，战神阿瑞斯的情人，主要司掌肉欲情爱。

阿波罗 (Apollo)：弓箭之神，又是司掌医药、音乐、智能之神，是阿尔忒米丝的亲兄弟。

阿波罗多罗斯 (Apollodorus)：公元1世纪至2世纪使用笔名写作的作家，编纂希腊神话概述。

息提昂姆的阿波伦尼阿斯 (Apollonius of Citium)：生卒年代为约公元前90年至前15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医生，是现存希波克拉底《论关节》的评论的作者。

阿基拉斯 (Archelaus)：公元前413年至前399年的马其顿国王，统一了疆域，却遭到暗杀。

阿拉托斯 (Aratus)：生卒年代为公元前约315年至前240年以前，是欧多克斯的《菲诺美纳》的诗体译本的作者。

帕罗斯和塔索斯岛的阿尔基罗库斯(Archilochus of Paros and Thasos)：公元前7世纪初期的帕罗斯岛的抑扬格诗人，后来移居塔索斯，是充满激情的色情文学和政治讽刺诗的作者。

阿基米得 (Archimedes)：生卒年代为约公元前287年至前212年，著名的发明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保卫祖国叙拉古、抗击罗马人的战斗中牺牲。

阿瑞斯 (Ares)：战神，在《荷马史诗》中是与阿芙罗狄忒通奸的情人。对他的崇拜并不盛行。

阿里斯塔哥拉斯 (Aristagoras)：米利都的僭主，公元前505年至前496年在位。

阿里斯塔克斯 (Aristarchus)：萨摩斯岛上的天文学家。据记载，他在公元前280年观测夏至，因提出日心说而闻名于世。

亚里斯提德斯 (Aristides)：生卒年代为大约公元前525年至前467年，雅典将军，公元前478年或477年公正地估算贡金，仁慈地对待提洛同盟(见术语表)中的雅典盟邦，因而得名。

阿里斯托芬 (Aristophanes)：生卒年代为大约公元前445年至前385年，创作了40多部喜剧，11部传世，既是早期政治喜剧大师，又是中期喜剧风格的创始人。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生卒年为公元前384年至前322年，最初是斯塔吉拉人，其父为马其顿王国的建立者腓力的宫廷医生。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王的老师，约公元前335年建立了自己的吕克昂学园。约撰有500部著作，现存30部，主要是生物学、动物学和政治学论著。

阿尔忒米丝（Artemis）：野生世界的狩猎女神，也是司掌青少年从孩子变为成人的女神。她是永恒的处女，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姊妹。

哈利卡纳苏的阿尔忒弥西亚（Artemisia of Halicarnassus）：希腊女王，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中站在薛西斯一边，显示了杰出的才能。她的同胞希罗多德生动地描述过她。

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人们把他既当做英雄又当做神崇拜，是康复之神，特别是通过梦境治疗疾病。

阿斯帕希娅（Aspasia）：米利都人，苏格拉底的朋友，伯里克利的情妇。公元前451年或450年，伯里克利自己制定的雅典公民法禁止两人结婚。阿斯帕希娅因此出名。

雅典娜（Athena）：宙斯的女儿，她的出生方式非同寻常——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里出世。她是工艺的保护者和智慧女神，还是具有男性尚武特质的处女神。

阿托萨（Atossa）：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王的女儿，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的妻子。

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年至公元14年在世，第一位罗马皇帝。他将希腊纳入罗马版图，并名之为“阿凯亚”。

巴科斯（Bacchus）：狄奥尼索斯的拉丁文别名。

巴基里德斯（Bacchylides）：约公元前510年至前450年在世，开俄斯人，西蒙尼德斯的亲戚，是写作胜利颂诗和酒神颂歌的抒情诗人。

比敦（Biton）：神话或传说中的两兄弟之一（亦可参见“克勒俄比斯”）。他与他的兄弟拉车，护送担任女祭司的母亲到大约八公里之外的神庙，在睡梦中死去。传说可能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

波瑞阿斯（Boreas）：北风神，受人们崇拜（如在雅典）。

伯拉西达（Brasidas）：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斯巴达将军，从雅典的控制下夺得安菲玻里城而成名，公元前422年与克里昂在该城作战时被杀。

卡里阿斯（Callias）：雅典政治家、外交家，拥有巨额财富，客蒙的妻兄，但是与伯里克利合作，在约公元前450年和前445年分别与波斯、斯巴达顺利进行了和谈。

卡利克拉底（Callicrates）：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师之一，也参与建造了雅典卫城的尼克神庙。

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最初是塞勒尼的学者、诗人，编制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皇家图书馆的第一份目录，著有八百多部著作，提出谚语“一本厚书是一口深井”，享有盛誉。

卡利斯提尼斯（Callisthenes）：约公元前380年至前327年，奥林图斯人（公元前348年被腓力毁灭），是亚里士多德的亲戚和合著者，亚历山大大王的史官，后因有背叛的嫌疑而被亚历山大杀害。

冈比西斯（Cambyses）：公元前530年至前522年的波斯帝国国王，在将埃及纳入波斯帝国版图后暴卒。

凯克罗普斯（Cecrops）：传说中的雅典国王，历史上的雅典人认为他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

凯菲索多图斯（Cephisodotus）：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勒斯的父亲。

兰普撒科斯的卡戎（Charon of Lampsacus）：公元前5世纪的史学家，其著作大多散佚。他还制作了斯巴达官员的名表。

基隆（Chilon）：公元前6世纪中期斯巴达民选产生的检察官，有时还名列“希腊七贤”之列。

西塞罗（Cicero）：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特别擅长写信。他的主要通信对象阿提库斯住在希腊。

客蒙（Cimon）：约公元前510年至前450年。他的父亲是马拉松的米尔提亚德斯，雅典政治家、将军。主要政绩是推动提洛同盟的早期发展，在对波斯和斯巴达的政策上与伯里克利相左。他主张进攻波斯，安抚斯巴达。

安科纳的吉里阿科·德·皮兹科里／吉里阿科斯（Ciriaco de'Pizzicolli/Cyriacus of Ancona）：1391年至1452年在世，商人、人文主义者，是第一个将古希腊视觉艺术和文化带进文艺复兴的人。

克利安西斯（Cleanthes）：接替芝诺成为斯多葛派哲学领袖，现存一首《宙斯颂诗》。

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i) 西具昂人，僭主，约公元前600年至前570年在位。(ii) 雅典人，约公元前565年至前505年在世，是西具昂的克里斯

提尼的外孙，公元前508年或507年，参与创建雅典民主政治，因此获得赞誉。

克勒俄比斯（Cleobis）：比敦的兄弟（见比敦）。

克里奥美尼（Cleomenes）：斯巴达国王，约公元前520年至前490在位，希罗多德的《历史》中的中心人物。

克里昂（Cleon）：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死后，他成为雅典政治领袖。也许是由于他使得修昔底德遭放逐，因而受到修昔底德强烈的谴责。阿里斯托芬在他的作品中对他进行了无情的奚落（特别是在公元前424年创作的《骑士》中）。公元前422年，他死于战争。

克莱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年至前30年，著名的克赖奥帕特拉七世，希腊－马其顿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继亚历山大征服之后统治埃及。公元前31年，她和安东尼在亚克兴被屋大维/奥古斯都打败，自杀身死。

克里奥丰（Cleophon）：公元前5世纪后期杰出的雅典民主派政治家，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快结束时被杀害。

科莱奥斯（Colaeus）：公元前6世纪的萨摩斯商人，在西班牙逃亡当中赚了一大笔钱，因而得名。

科浓（Conon）：约公元前450年至前389年，雅典舰队统帅，公元前405年在伊哥斯波塔米溃败后逃往塞浦路斯的欧阿哥拉斯。公元前394年，率波斯舰队在奈达斯打败斯巴达，重振威名。

克拉提努斯（Cratinus）：雅典喜剧诗人，是较阿里斯托芬年长的同代人，也是他的竞争对手。公元前423年，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瓶》击败了阿里斯托芬的最后一部作品《云》。

克莱希拉斯（Cresilas）：大约公元前450年至前420年在世，出自克里特岛西顿尼亚的青铜雕刻家。其最有名的作品是伯里克利戴头盔的半身像，也在德尔斐工作过。

克里提亚斯（Critias）：生卒年为大约公元前460年至前403年，柏拉图的亲戚，但比他年长，是由三十僭主组成的亲斯巴达派的领袖，用诗歌和颂辞两种文体写作赞颂斯巴达。

克洛伊索斯（Croesus）：谚语"像克洛伊索斯那样富有"中提到的富有的吕底亚国王，约公元前560年至前546在位，亲希腊的统治者，征服了希腊诸邦，包括拥有富丽堂皇的阿尔忒弥丝神庙的以弗所，后被居鲁士打败。

基伦（Cylon）：一心想当雅典的独裁者，公元前650年，尽管有其岳父特阿真尼的支持，政变还是失败。

库普塞洛斯/库普塞洛丝王朝（Cypselus/Cypselid dynasty）：科林斯的僭政王朝。约公元前650年由库普塞洛斯建立（参见佩利安德）。

安科纳的吉里阿克（Cyriac of Ancona）：参见吉里阿科·德·皮兹科里条。

吉尔诺斯（Cyrnus）：可能是个虚构的人物，提奥格尼斯创作的许多同性恋诗歌的收信人(见提奥格尼斯)。

居鲁士二世（Cyrus II）：波斯帝国的著名国王，约公元前559年至前530在位，是阿契美尼王朝开国君主，解放了巴比伦的犹太人。

大流士一世（Darius I）：波斯帝国国王，约公元前520年至前486在位，是阿契美尼王朝的第二位奠基人，公元前499年至前494年间镇压了伊奥尼亚人起义。但在公元前490年，他的军队在马拉松败给希腊。

雅克·路易·戴维（David，Jacques Louis）：1748年至1845年，古典派画家，以创作古典派的画作（如《苏格拉底之死》）和仿古典风格的画作驰名。

德墨忒耳（Demeter）：地母女神，12位奥林匹亚神之一，特别司掌妇女的生育。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年至前385年，阿布提拉人，写有伦理学、数学、音乐多部著作，但是最著名的是提出物质世界的"原子论"。

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年至前322年，雅典政治家、法庭雄辩家，带领雅典人和希腊人抵抗马其顿的腓力和亚历山大，最终失败。

雅典的德克希里奥斯（Dexileos of Athens）：年轻的骑士，出生于公元前414年，公元前4世纪90年代末在科林斯附近被杀。

狄多（Dido）：传说中的迦太基女王。她试图阻止埃涅阿斯离开她去建立罗马，以失败告终。

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60年至前30年在世，西西里岛的希腊"通史"学家（"通"意味着希腊人把已知的希腊世界视为整

个人类世界）。他是“历史丛书”的编辑，从早期希腊开始，利用了埃弗鲁斯的作品。

西诺普的狄奥格尼斯（Diogenes of Sinope）：约公元前400年至前325年，犬儒主义者，因不合习俗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如露天睡在一个巨大的储物陶罐里，当众手淫。

狄俄涅（Dione）：在多多那被认为是宙斯的妻子，或是宙斯的女性变体，在希腊西北部受到崇拜。

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叙拉古僭主，公元前405年至前367年在位，使希腊的西西里岛摆脱了迦太基的统治。柏拉图的资助者，雅典悲剧比赛的冠军。

狄奥尼索斯（Dionysus）：迷狂（特别是通过酒和戏剧所达到的状态）之神。

德拉古（Draco）：约公元前620年在世，创立了最早的雅典法律。后来人们认为他是“用血写的”法律，即坚持对所有或大多数有犯罪行为的人判处死罪，失去了公正性。

厄里提亚（Eileithyia）：生育女神，人们祈求她减轻分娩时的痛苦。

埃尔金勋爵（Elgin，Lord）：生卒年代为1766年至1814年，派往奥斯曼帝国皇帝那里的使臣。人们对他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他将许多帕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像偷出，有人认为他是将那些大理石雕像转移到了安全之处。

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公元前492年至前432年，西西里岛的阿克累加斯人，创作了两首六韵步诗，在《论自然》中首次提出万物是由火、水、土、气四大元素形成的理论，著有宗教诗《涤罪》。

埃帕米浓达（Epaminondas）：公元前362年去世，底比斯将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在公元前371年和前362年两次击败斯巴达，为美塞尼和麦加洛波利斯奠定了基础。

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公元前461年被暗杀，客蒙的政敌。公元前461和前462年雅典民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该改革由伯里克利坚持并发展下去。

库麦的埃弗鲁斯（Ephorus of Cyme）：公元前4世纪，特洛伊战争后的希腊通史史学家，可能是伊索克拉特的学生。

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年至前270年，伊壁鸠鲁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主张平静是人生最大的美德，是出生于萨摩斯的雅典人。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5年至前195年，跟卡利马科斯一样，出生于塞勒尼，在亚历山大里亚成名，是多才多艺的编年学家、文学批评家、地理学家。

厄瑞克修斯（Erechtheus）：神话中的雅典国王，后来成为英雄，在厄瑞克修姆庙等处受到崇拜。

埃利娜（Erinna）：公元前4世纪的女诗人，出生地不详，最著名的作品是300行的《纺纱杆》。

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居住在意大利中部、台伯河和阿诺河之间，起源不详。在罗马崛起之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欧哥拉斯（Euagoras）：约公元前435年至前374年或373年，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国王，收留了科农，抵抗波斯，被授予雅典荣誉公民的称号。

欧几里德（Euclid）：活跃期是公元前295年，数学家、天文学家，著有平面几何、数论、体积测定的《几何原本》13卷（今天仍然是数学的基本著作）。

欧多克斯（Eudoxus）：约公元前400年至前347年，奈达斯人，见多识广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他提出的天体运动理论最为著名。

尤希迈罗斯（Euhemerus）：公元前3世纪在世，乌托邦小说家，认为希腊神是由人类统治者演化而成。

尤弗拉诺（Euphranor）：约公元前370年至前330年在世，画家、雕刻家，受命用历史绘画装饰雅典广场的宙斯柱廊。

尤弗罗尼俄斯（Euphronius）：全盛时期约为公元前515年至前480年，倡导红绘技艺的雅典陶瓶画家。在埃特鲁里亚发现了他的一幅作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意欲花100万美金购买。

优波里斯（Eupolis）：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喜剧诗人，也是阿里斯托芬的主要对手。公元前429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喜剧，至少有四次获胜，但只留下一些残篇。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5年至前406年，悲剧诗人。以欧里庇得斯为作者的剧本大约有80部，但流传下来的只有8部。他活着时受到喜剧诗人的百般嘲弄，死后却成为“希腊三大悲剧作

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死于马其顿首都派拉，在那里他曾经创作了《酒神的伴侣》。

盖伦 (Galen)：129年至约216年，帕加马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里的医生。著作很多，大多是极具影响力的医学作品，特别是有关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著作最为重要。

革隆 (Gelon)：公元前485年至前478年的叙拉古僭主，公元前480年在希米拉打败了迦太基的入侵。据说该战役和萨拉米斯之战发生在同一天。

爱德华·吉本 (Gibbon, Edward)：1737年至1794年，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1776年至1788年用英语写就的古代史著作六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哥尔吉亚斯 (Gorgias)：约公元前483年至前375年，西西里岛的林地尼人，四大“古代智者”之一，是颇具影响力的教师和演说家。公元前427年，他使雅典公民大会折服，

弗朗西斯科·圭奇阿尔狄尼 (Guicciardini, Francesco)：1483年至1540年，佛罗伦萨人，近代史学先驱（《意大利史》，1494年至1532年）。

哈摩狄阿斯 (Harmodius)：阿利斯托基吞的情人，大约公元前514年，两人杀死了雅典僭主希庇亚斯的兄弟，在雅典广场上首次竖立起两人的雕像，以表示正式的尊敬。

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 (Hecataeus of Miletus)：约公元前5世纪在世，政治家、历史地理学家，著有《大地环游记》。希罗多德从他那里获益匪浅。

赫卡忒 (Hecate)：冥界女神，擅长施魔法和巫术严惩恶行，也与神秘教派的入会仪式有关。人们往往在十字路口献祭她。

赫克托 (Hector)：普里阿姆和赫卡柏的长子，安德罗玛的丈夫。他的死亡和埋葬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高潮。

赫卡柏 (Hecuba)：赫克托之母，普里阿姆的妻子。特洛伊陷落后，被俘为奴，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赫卡柏》的主角。

赫利奥斯 (Helios)：太阳神，他的崇拜中心在罗德斯岛，除此以外，崇拜他的地区很少。

赫拉尼库斯 (Hellanicus)：活动于公元前5世纪的下半叶，列斯波斯岛的密提林人，史学家。他的作品受到修昔底德利用和滥用，撰写了第一部描写雅典当地历史的《阿提卡史》。

赫淮斯托斯 (Hephaestus)：跛腿的手工匠之神，其母亲赫拉未与男性媾和就怀了他。他创造了许多奇妙的自动装置，如阿基琉斯的盾牌和甲胄以及潘多拉之盒。

赫拉 (Hera)：宙斯的姐姐和妻子，司掌人类崇拜，特别是妇女的保护神、城邦（如阿哥斯）的佑助者。

赫拉克勒斯 (Heracles)：整个希腊的英雄，是宙斯和一个凡人女子阿尔克墨涅的儿子，以他的十二件苦役最为著名，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人。

赫拉克里德斯·朋提科斯 (Heraclides Ponticus)：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黑海沿岸赫拉克里亚人，曾在柏拉图的学园中学习过。公元前347年，他差点儿在竞赛中胜出而接替柏拉图的位置。

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大约公元前5世纪在世，出身于以弗所的一个贵族祭司之家，以其谜一般的隐遁而知名，是被人们引用次数最多的话语“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作者。

赫尔墨斯 (Hermes)：宙斯与水泽女神奈亚的儿子，作为信使之神来往于人界和神界，调停他们的矛盾。人们以一根直立的阴茎柱子来崇拜他。

阿塔奈奥斯的赫尔米亚斯 (Hermias of Atarneus)：死于公元前341年，阿塔奈奥斯的僭主，可能是个半希腊化的宦官，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妻子的前监护人。

希罗多德 (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至前425年，哈利加纳苏人，史学先驱，放逐时成了图利埃的公民。

赫希俄德 (Hesiod)：在世时间大约为公元前7世纪，教谕诗人，著有长诗《田功农时》和《神谱》。

赫斯提亚 (Hestia)：奥林匹斯山十二神祇之一，女灶神，发誓永远做处女。

海厄隆一世 (Hieron I)：叙拉古僭主，约公元前478年至467在位，接替盖伦，公元前474年在丘米击败埃特鲁里亚人，是西蒙尼德和品达的资助人。

卡迪亚的哈伊罗尼穆斯 (Hieronymus of Cardia)：约公元前364年至前260年在世。在亚历山大后继者发动的战争中，他是战士和行政管理人

员，记载了公元前323年至前272年间历史的史学家。

希帕库斯（Hipparchus）：活跃于公元前2世纪的下半叶，出生于尼西亚，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罗德斯岛。使希腊天文学从理论走向实际。仅存的一部著作是对欧多克斯和阿拉托斯作品的评论。

希庇亚斯（Hippias）：(i) 公元前527年至前510年的雅典僭主，接替了他父亲庇西特拉图的王位。(ii) 埃利斯人，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古代智者、博学之士，比如他确定了公元前776年第一次举办的四年一度的奥运会的日期。

科斯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约公元前460年至前380年，医学之父，归于他名下的著作有60部，包括《希波克拉底文集》。

希波达弥亚（Hippodamia）：传说中的比萨（靠近奥林匹亚）国王的女儿。珀罗普斯作弊击败了她的父亲取得了赛车的胜利，最后娶了她。

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米利都人，城镇规划者、乌托邦政治哲学家，重新设计了派里厄斯城，又按矩形的"希波达弥亚"计划设计了罗德斯新城。

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提修斯和一个亚马逊妇女的儿子。他把自己献给了处女神阿尔忒弥丝，拒绝了他的继母费德拉的狂热的追求，导致了自己的死亡。这个情节被欧里庇得斯写成了悲剧。

荷马（Homer）：许多伊奥尼亚城邦都声称是荷马的故乡。关于"盲人荷马"是否活跃于公元前8世纪、联系和发展口头文化传统，进而产生两部冠以自己名字的不朽的史诗，这都不能确定。

希柏波罗斯（Hyperbolus）：克里昂之后最有影响、最受人们爱戴的雅典统治者，大约在公元前417年被陶片放逐，公元前411年在放逐地萨摩斯被杀。

希波里德斯（Hyperides）：公元前390年至前322年，雅典演说家，柏拉图和伊索克拉特的学生，在政治上一贯反对马其顿统治。

伊比库斯（Ibycus）：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人，生于利吉姆，是波利克拉底宫廷的抒情诗人。

伊克提努斯（Ictinus）：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师之一。其知名作品还有厄琉西斯的人教大厅和巴塞的阿波罗神庙。

伊希斯（Isis）：埃及女神，是"生命之屋的庇护神"。希腊时代以来，特别是人们认为她可以救赎死后的灵魂之后，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她展开了热情的尊崇。

伊索克拉特（Isocrates）：公元前436年至前338年，演讲辞撰稿人，保守的政论作家，创立了雅典的第一所高等研究学院。特别注重修辞学，他的学生可能包括希波里德斯、埃弗鲁斯、泰奥庞普斯等人。

伊阿宋（Jason）：约公元前380年至前370年的菲莱僭主，有一小段时期是希腊最强大的统治者。他的方法后来被马其顿国王腓力所采用。

克洛诺斯（Kronos）：泰坦神，宙斯和赫拉的父亲，瑞亚的丈夫。他的儿子残忍地阉割并推翻了他，当了主神。

拉埃尔特斯（Laertes）：奥德修斯的父亲，为了让儿子统治伊大卡而退隐。

拉奥孔（Laocoön）：特洛伊王子和祭司，反对将希腊人的木马搬进特洛伊城，后连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海中巨蛇杀死。现存梵蒂冈的著名的拉奥孔群像展现了这一幕。

拉皮忒族（Lapiths）：居住在帖撒利的希腊人。神话中说，在国王庇里托俄斯的婚礼上和半人半马怪进行了可怕的战斗。

莱奥尼达斯一世（Leonidas I）：斯巴达国王，公元前480年，在温泉关战役中壮烈牺牲。

琉希玻斯（Leucippus）：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据说来自厄利亚（意大利南部），作为物质原子论的创始人与德谟克利特齐名。

李维（Livy）：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9年至公元17年，著有《罗马史》144卷。人们认为他确切地记录了公元前753年到公元9年罗马帝国和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罗马史》中只有35卷遗留下来。

卢奇安（Lucian）：大约公元120年出生于幼发拉底河的萨摩萨塔，创作作品近八十部，多采用将喜剧和哲学糅合在一起的文学对话体裁。

吕库古（Lycurgus）：(i) 斯巴达人，可能是神话中的著名立法者，确立了斯巴达的所有军事、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他的法律都未成文。(ii) 雅典人，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90年至前324年，演说家、政治家、财政家，在公元前4世纪30年代至20年代扭转了雅典的财政状况。

莱山得（Lysander）：公元前395年战死于哈利

阿特斯，斯巴达海军统帅，斯巴达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关键人物，但在战后政策上与受人爱戴的前任国王阿哥西劳斯二世意见不合。

吕西亚斯（Lysias）：约公元前459年至前380年，叙拉古血统，侨居雅典的外邦人，讲演辞撰写人、演说家，著有约200篇演讲稿，只留下35篇。

吕西波斯（Lysippus）：公元前4世纪在世，西具昂人，极为多产的雕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亚历山大大王的雕像。

玛吉（Magi）：米底人的神职人员。

马尔多尼乌斯（Mardonius）：大流士一世的侄儿和女婿。

莫索勒斯（Mausolus）：希腊化的卡里亚（以哈利卡纳苏斯为基础）的副总督，任职于公元前377年至前353年或352年。他的姐姐和遗孀在此地为他修建了巨大陵墓，由杰出的希腊雕刻家加以装饰。

美狄亚（Medea）：赫利奥斯的孙女，科尔奇斯（现在的格鲁吉亚）国王的女儿。她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却被他遗弃，通过杀害他们的两个儿子对伊阿宋实施报复（欧里庇得斯悲剧中有相应的叙述）。

米底人（Medes）：与波斯人有亲缘关系，常常与波斯人混淆在一起，尽管他们的语言和宗教信仰明显不同。

麦里苏斯（Melissus）：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海军统帅，公元前441年带领萨摩斯反叛雅典，是巴门尼德的追随者。

米南德（Menander）：约公元前342年至前292年，新喜剧的首要作家，以超现实主义的文风闻名，是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学生。

墨涅拉奥斯（Menelaus）：阿伽门农之弟，私奔到特洛伊的海伦的前夫。他和海伦死后一起被葬在斯巴达附近，并举行了仪式。

麦敦（Meton）：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天文学家，计算了19年的月象周期，早在公元前432年6月27日就观测到了夏至。

米孔（Micon）：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雅典画家、雕刻家，参加创作了雅典的彩绘柱廊，创作了奥林匹亚的胜利女神雕像，女儿也是画家。

米尔提亚德斯（Miltiades）：约公元前550年至前489年，雅典将军，马拉松战役中采用了他的战略。但在这之前是色雷斯半岛以及波斯属国的僭主。

穆尼西克勒斯（Mnesicles）：在公元前436年至前432年，设计建造了雅典卫城的大理石柱廊。

鲁基乌斯·穆米乌斯（Mummius，Lucius）：罗马执政官，公元前146年镇压了希腊亚该亚同盟的叛乱，结束了希腊人对罗马统治的抵抗，劫掠了科林斯，用船将许多艺术品运到罗马和意大利各地。

缪斯（Muses）：九位女神，分别庇护史诗、历史、笛子吹奏、歌队舞蹈、抒情诗、悲剧、喜剧、颂歌和天文学等艺术。

米隆（Myron）：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青铜雕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掷铁饼者》（现仅存罗马时期的复制品）。

涅库斯（Nearchus）：活跃于公元前334年至约前312年，亚历山大孩提时代的同伴和后来的海军统帅。他在公元前326年顺着印度河的航海记录后来被阿里安（公元2世纪）借用。

涅柔斯（Nereus）：古代海神，蓬托斯（“大海”）的儿子。赫希俄德和品达都曾赞颂他的公正，与赫拉克勒斯较量时被制服。

聂斯托尔（Nestor）：派罗斯的老国王，参加对特洛伊的远征，不仅提出一些可行的良好建议，还留下了一些趣闻逸事。

尼西阿斯（Nicias）：(i) 约公元前470年至前413年在世，极为富有的雅典政治家、将军，拥有众多奴隶。他曾反对阿尔基比亚德斯提议的西西里远征计划，在该战役中兵败被杀；(ii) 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画家，明暗对照法大师。

奥德修斯（Odysseus）：《奥德赛》中的主角，拉埃尔特斯的儿子，佩涅洛普的丈夫，以足智多谋而闻名。在他二十年的漂泊中，经历了无数的历险，最后安全回到自己的王国伊大卡。

俄狄浦斯（Oedipus）：神话中的底比斯国王的儿子，杀了自己的父亲，又因为用聪明才智解开斯芬克斯的谜语，娶了自己的母亲，生育了儿女。他们也是他自己的兄弟姐妹。

奥尔格奥尼斯（Orgeones）：为一个特别的神或英雄举行仪式并献身的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

乌拉诺斯（Ouranos）：“天空”的化身，该亚（希腊语“地”）的丈夫，后来被他们的儿子克洛诺斯阉割。

奥克西林科斯的历史学家（Oxyrhynchus Historian）：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雅典史学家，续写修昔底德未写完的历史，身份不详（也许是克拉提帕斯人），在上埃及的奥克西林科斯发现的纸草纸上有他的作品遗存。

帕奈提俄斯（Panaetius）：约公元前185年至前109年，斯多葛派哲学家，罗得斯岛人，在罗马富有影响力，之后在公元前129年成为雅典斯多葛派的领袖。

潘多拉（Pandora）：既是人间的女神又是第一个女人，按照宙斯的意志由赫淮斯托斯创造，用以惩罚世人。

帕波西勒努斯（Papposilenus）：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父亲，虚构的半人半兽的雄性生物，狄奥尼修斯的随从。

巴门尼德（Parmenides）：大约出生于515年，埃利亚人，属于埃利亚学派，著有用六韵步诗体写成的“一元论”长篇哲学著作。

帕尔哈希俄斯（Parrhasius）：活跃在大约公元前430年至前390年，以弗所人，后来成了雅典人，画家，写有绘画专著。

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阿基琉斯的亲密朋友，无意中打死一玩伴，于是同阿基琉斯的父亲珀琉斯一起逃走，寻求庇护。由于阿波罗的介人，在特洛伊被杀。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斯巴达摄政者，公元前479年指挥希腊军队在普拉提亚获胜。大约在公元前470年被怀疑叛国而被饿死。

马格尼西亚的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of Magnesia）：活跃于2世纪的60年代至70年代，宗教旅行家、古物收藏家，著有《希腊指南》十卷，记录了希腊古典时期的许多知识和史实。

珀琉斯（Peleus）：女神忒提斯的凡人丈夫，阿基琉斯的父亲。许多男女神祇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派洛皮达斯（Pelopidas）：约公元前410年至前364年，底比斯政治家、军队指挥官，特别是“圣队”的指挥官，与埃帕米浓达合作密切。

佩罗普斯（Pelops）：“佩罗普斯”是地名“伯罗奔尼撒（半岛）”一词的来源，因此这里又叫做“佩罗普斯之岛”。阿特柔斯之父，在奥林匹亚被当做英雄受到崇拜，后被他的父亲坦塔罗斯剁成碎块，用来宴请众神。

彭托斯（Pentheus）：阿高厄的儿子，卡德摩斯的外孙，底比斯国王，在酒神的狂歌中被他母亲撕得粉碎。

佩利安德（Periander）：科林斯僭主，约公元前625年至前585年在位，继承其父亲吉普塞劳斯的王位。在后世人眼里，他既是一个道德败坏的统治者，又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至前429年在世，雅典民主政治家、财政专家、军事领袖。大约在公元前450年至前430年间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与雅典帝国的建筑计划联系紧密。

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德墨忒耳和宙斯的女儿，也称做“大女神”（意思是“女儿”、“女孩”），被她的邪恶叔叔哈得斯劫到冥国。

佩尔塞斯（Perses）：赫希俄德的弟弟。赫希俄德的长诗《田功农时》原来就是教诲他的诗歌。

费德拉（Phaedra）：克里特公主，嫁给了提修斯，希波吕托斯的继母。她对继子萌发了乱伦的情爱，导致了悲剧性的后果。

菲顿（Pheidon）：阿哥斯的国王或僭主，活动时期可能是公元前8世纪中期或7世纪早期，因进行军事和币制的革新而著名。

菲迪亚斯（Phidias）：约公元前490年至前430年在世，雅典雕刻家，创作时使用青铜、大理石和木头，再用黄金和象牙修饰。塑造了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和雅典的雅典娜神像，也许还主持帕特农神庙所有的雕塑工程。他是伯里克利的合作者，因被指控盗窃了用于制作雅典娜神像的黄金而受辱。

菲拉蒙（Philammon）：阿波罗的儿子，神话中的音乐家、诗人，与在德尔斐为纪念阿波罗而举行的披提亚赛会有关。

科斯的菲里塔斯（Philetas of Cos）：约公元前330年至前280年，科斯人，有重要影响的学者诗人。

腓力二世（Philip II）：公元前359年至前336年在位的马其顿国王，征服了希腊大部分地区，原本准备进军波斯，但在女儿的婚礼上被杀。

菲里斯托斯（Philistus）：约公元前430年至前356年，叙拉古人，狄奥尼修斯一世的拥护者，著《西

西里史》13卷，风格类似修昔底德。

菲洛克拉底（Philocrates）：雅典政治家、外交家，公元前346年与马其顿签订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和约，但德摩斯提尼很快就说服雅典拒绝谈和。

福基翁（Phocion）：公元前402年或401年至前318年，雅典保守政治家，曾45次当选将军，但最终因赞同马其顿胁迫下的寡头政治而被判处服毒自杀。

福里尼科斯（Phrynichus）：活跃期为大约公元前510年至前476年，雅典悲剧的先驱。公元前493年因作品《米利都的俘虏》勾起雅典人的悲伤而被处以罚款。

品达（Pindar）：约公元前538年至前445年在世，底比斯颂诗诗人，著有四卷胜利颂诗，都是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德尔斐的披提亚运动会、地峡运动会和尼米亚运动会的获胜者所作。

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活跃在大约公元前560年至前527年，三次成为雅典僭主。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公元前545年至前527年，其间大力推行公共建设，促进以雅典为中心的文化和宗教事业。

柏拉图（Plato）：生卒年代为大约公元前427年至前347年，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信徒，约公元前385年建立了学园。他的所有著名对话体作品都保存了下来，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冠以他的名字的伪作。

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约公元23年至79年在世，博学之士，著有史学著作和现存的37卷《自然史》，死于维苏威火山的喷发。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年至120年在世，喀罗尼亚人，著有200多篇作品，其中有78篇文章组成的《道德论》和50篇传记组成的《名人传》（大多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记）流传下来。

波鲁斯（Polus）：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哥尔吉亚斯的学生，柏拉图《哥尔吉亚斯》中的主要人物。

麦加洛波利斯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 of Megalopolis）：约公元前200年至前120年在世，史学家，其作品40卷，叙述了罗马从崛起到成为巨大帝国之间的历史。

波吕克力托斯（Polyclitus）：活跃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阿哥斯人，雕刻家，米隆的朋友、学生，最著名的作品是《荷矛者》。

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约公元前535年至前522年的萨摩斯僭主，因密谋反对波斯统治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是艺术家、手艺人、诗人和工程师的赞助人。

波里格诺图斯（Polygnotus）：全盛时期为公元前480年至前450年，塔索斯人，画家，以在雅典（特别是彩绘廊柱）和得尔斐的作品知名，但无一传世。

波里派德斯（Polypaides）（原书无释文——译者注）

波塞冬（Poseidon）：奥林匹亚十二神祇之一，海神、地震之神、马的庇护神，在文学作品中以迫害奥德修斯而闻名。

普拉克西特勒斯（Praxiteles）：活跃期为公元前370年至前330年，雅典青铜和大理石雕刻家，主要因创作了第一个阿弗罗狄忒裸体祭祀雕像以及与妓女弗里涅通奸而声名狼藉。

普里阿姆（Priam）：赫卡柏的丈夫，特洛伊遭毁灭时的国王。他有50个儿子，其中包括赫克托和帕里斯。

普罗科匹乌斯（Procopius）：活动时期为公元6世纪上半叶，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期（527年至565年）的史学家，其著作包括低级趣味的《秘史》。

普罗狄科斯（Prodicus）：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开俄斯人，“古代智者”，对语言学特别感兴趣。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泰坦神之一，曾用献祭用的动物的骨头和肥肉宴请戏弄众神，而让人类吃肉，因此宙斯收回了火以惩罚人类。普罗米修斯又为人类把火偷了回去，所以宙斯让潘多拉去祸害人类。

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约公元前490年至前420年在世，阿布提拉人，“古代智者”，至少写了两部著作，包括《论神》，并在其绪论中阐述了不可知论。他也许在政治上崇尚民主，公元前444年或443年为新兴城邦条立爱制定了第一部宪法。

托勒密一世（Ptolemy I）：约公元前367年或366年至前283年或282年，埃及托勒密王国和王朝的创建人，是亚历山大大王的“继承者”，在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并著有自谦的历史。

皮尔隆（Pyrrhon）：约公元前365年至前275年，埃利斯人，哲学怀疑学派创始人。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活跃在公元前6世纪30年代，原来是萨摩斯人，被放逐时在克罗顿（意大利南部）定居，毕达哥拉斯教派创始人，反对动物血祭，潜心钻研数论和天文学。

皮西亚斯 (Pytheas)：活跃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马萨利亚人，考察了北欧的水域，并完成了环绕不列颠岛的航行。

里维特·尼古拉斯 (Revett, Nicholas)：参见詹姆斯·斯图尔特。

撒路斯特 (Sallust)：约公元前86年至前35年，罗马政治家、史学家，注重探讨共和国时代后期的道德沦丧问题。

萨福 (Sappho)：活跃期为公元前7世纪后期，列斯波斯岛的伊勒苏斯人，诗人，也许还是教师。她的同性恋抒情诗为我们创造了"女同性恋者(Lesbian)"一词。

斯科帕斯 (Scopas)：公元前370年至前330年在世，盛产大理石的帕罗斯岛人，以其雕刻作品富有表现力而著名，曾参与建造莫索勒斯陵墓。

塞琉古 (Seleucus/Seleucids)：希腊王朝，是绰号为"征服者"的塞琉古一世于大约公元前358年至前281年在安条克建立的，公元前64年被庞培所灭。

西蒙尼德斯 (Semonides)：公元前7世纪在世，萨摩斯人，后来成为阿莫哥斯人，诗人，写有萨摩斯岛地方史和抨击女人的长篇讽刺诗。

七贤 (Seven Sages)：有各种组成，包括斯巴达的基隆以及梭伦和泰勒斯等。

西蒙尼得斯 (Simonides)：约公元前556年至前468年在世，开俄斯岛人，巴基里德斯的亲戚，颂诗诗人，以其警句最为著名，例如，为马拉松战役牺牲的雅典士兵颂歌和为温泉关战役牺牲的斯巴达士兵颂歌。

苏格拉底 (Socrates)：公元前469年至前399年在世，雅典哲学家，宣扬非正统的伦理和宗教观点，持反对民主的政治观。公元前423年，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讽刺。公元前399年，因其不敬神而被判罪，从未就他所教授的内容写过一个字。

梭伦 (Solon)：最活跃期是公元前594年，雅典诗人、政治家，当选执政官，解决了严峻的危机，通过了取代德拉古法大多数条款的法律。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约公元前496年至前406年在世，雅典著名悲剧作家，偶尔参政，一生共写了123部剧本，传世剧作只有7部（最后一部作品《克罗诺斯的俄狄浦斯》在他死后才出版）。

索斯特拉托斯 (Sostratus)：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亚历山大里亚著名的外科医生，其动物学著作仅比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稍稍逊色。

斯派尤西普斯 (Speusippus)：约公元前407年至前330年在世，柏拉图的亲戚，公元前347年接替柏拉图成为学园领袖。

斯泰斯科鲁斯 (Stesichrus)：约公元前630年至前553年在世，抒情诗人，原来是意大利南部人，但大半生都在西西里的希米拉度过。

詹姆斯·斯图尔特 (Stuart, James)：1713年至1788年，英国建筑师，绰号"雅典人斯图尔特"，与尼古拉斯·里维特合著的《雅典古迹》(1762年至1814年）体现了精确的制图及测量技巧。

塔西陀 (Tacitus)：约55年至120年，罗马政治家、史学家，曾将公元14年至96年间进行专制统治的罗马皇帝批驳得体无完肤，因此闻名。

泰勒斯 (Thales)：约公元前625年至前547年，米利都人，自然哲学家，"希腊七贤"之一，据说曾预测过公元前585年的一次日食。

特阿真尼 (Theagene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7世纪末期，尼加拉的僭主，雅典人基伦的岳父。

铁米斯托克里 (Themistocles)：约公元前524年至前459年，雅典海军统帅、政治家，希腊抗击波斯（前480年至前479年）的军中灵魂，为雅典海军力量奠定了基础。他约在公元前471年遭流放，晚年投奔波斯帝国皇帝，受其赏识。

提奥格尼斯 (Theognis)：可能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挽歌作家，政治上倾向于保守，许多挽歌的对象是一个叫奇尔诺斯的人。

泰奥弗拉斯托斯 (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1年至前287年，原来是伊勒苏斯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后接替亚里士多德担任学园领袖，建立了系统的植物学，撰写了法律和习俗文集，并著有《品格论》。

泰奥菲拉克特·西蒙卡塔 (Theophylact Simocatta)：7世纪上半叶在世，埃及希腊史学者，活

动于拜占庭皇帝莫里斯的统治时期（582～602年）。

泰奥庞普斯（Theopompu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4世纪，开俄斯人，史学家，观念保守，脾气暴戾。其著作包括根据马其顿国王腓力一世的事迹创作的58卷本的《腓力皮卡》。

特拉门尼（Theramenes）：公元前404年或403年被处死，雅典寡头政治家，参与公元前411年与公元前404年的政变。

特斯皮斯（Thespis）：活动时期为公元前6世纪，雅典演员、剧作家，开创了雅典悲剧体裁（因此有了“特斯皮斯悲剧”一说），因而闻名。

忒提斯（Thetis）：海中神女，涅柔斯的女儿，珀琉斯的妻子，阿基琉斯的母亲。

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死于公元前389年，雅典民主政治家、海军统帅，率军抵抗“三十僭主”统治。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55年至前400年，史学家、将军，公元前424年因未能保住安非波里而遭放逐，著有未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前431年至前411年）。

提迈奥斯（Timaeus）：约公元前356年至前260年在世，西西里的塔罗明尼昂人，但在雅典写了至少有38卷的《历史》，将希腊史与罗马史结合在一起，也是第一个用奥林匹亚纪年（四年为周期）来记录时间的人。

提摩勒翁（Timoleon）：约公元前365年至前334年，科林斯人，在西西里因推翻叙拉古僭政、击败迦太基军队而赫赫有名。

提图斯（Titus）：罗马皇帝（79年至81年），韦伯芗的儿子，因与犹太人贝丽奈西的绯闻而臭名昭著。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年至公元19年，原来是曼图阿人，麦克那斯的幕僚。在麦克那斯的资助下，他创作了爱国主义的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以此赞美奥古斯都统治下的黄金年代。

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Winckelmann, Johanne Joachim）：1717年至1768年，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1764年在研究罗马复制品的基础上出版了具有开创性的希腊艺术的研究著作。

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公元前570年至前478年，原来是克罗枫人，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西西里度过。他是哲学家、诗人，兴趣广泛，包括伦理学、自然、神学等。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8年至前354年，雅典人，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信徒，思想保守，是个走运的士兵，撰写了历史、伦理学著作、人物传记、爱情故事和技术论文。

薛西斯（Xerxes）：公元前486年至前465年的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的儿子。他在有生之年没有完成对希腊的征服。

扎琉库斯（Zaleucus）：活跃于公元前7世纪，意大利洛克利的立法者，因最早记录自己制定的法律而闻名于世。

芝诺（Zeno）：(i) 埃利亚人，约公元前490年至前454年，哲学家，提出一系列悖论，维护巴门尼德的学说。(ii) 息提昂姆人，约公元前333年至前262年，哲学家，祖先是腓尼基人，雅典斯多葛学派（这一学派是根据彩绘柱廊来命名的）创始人。

宙斯（Zeus）：希腊万神殿的主神，奥林匹亚众神的父亲和统治者，最初是天神，有主宰一切的力量。

宙克西斯（Zeuxis）：活跃于公元前430年至前390年，南意大利赫拉克里亚人，后来成了雅典人和派拉人，因其所画的一幅厄洛斯而闻名。公元前425年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剧作《阿卡奈人》中提到了这幅画。

术语表

卫城(acropolis):古希腊城市用于据守的高城,堡垒。

阿哥盖(agoge):指斯巴达的国家教育。

阿哥拉(agora):城市中心,市场。

希腊字母(alphabet, Greek):从腓尼基人那里借来,加入元音字母,可能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

安菲克提奥尼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主要以希腊中部诸邦为代表,负责监督、保护德尔斐神庙和披提亚运动会。

双耳细颈椭圆陶罐(amphora):双耳的储物罐或运输用罐,由陶土或青铜制作,特别是用于盛油或酒。

瓦檐饰(antefix):庙宇屋顶正面的赤陶装饰。

阿菲泰洛依(Aphetairoi):克里特的一类社会下层人。

阿波巴特斯(apobates):全身披挂重甲,在竞技比赛中从战车上跳上跳下的选手。

古风时代(Archaic period):传统上认为是约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500年或前480年。

阿尔克(arche):见寡头政治(oligarchy)。

执政官(archon):城邦官员。

贵族制(Aristocracy):所谓的杰出人士(aristoi)的统治(kratos)。

贵族(aristoi):见贵族(aristocracy)。

阿提克(Attic):雅典人的形容词形式,在手稿、方言或指代地域时使用。

阿提卡(Attica):雅典的本土,约1000平方英里或2400平方公里。

BCE, CE:公元前,公元。

黑图彩绘(black-figure):瓶画技艺,即用黑色颜料在红色基底上绘制图案。

布莱(boule):议事会。

青铜时代(Bronze Age):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

历法(Calendar):见历月(months)。

女像柱(caryatid):支撑神庙的柱子,头顶篮子做柱头的年轻女子。

半人马(Centaurs):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生物,一般认为他们好色、凶暴、嗜酒。不过养育阿基琉斯的喀戎是个例外,他是富有智慧的半人马。

卡尔西迪同盟(Chalcidian Confederacy):卡尔西迪诸邦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卡尔西的首府为奥林图斯。

科拉(chora):农村、一个城邦的农区(见城邦polis)。

歌队指挥(choregus):雅典的戏剧经办人,按要求必须资助节庆戏剧歌队演出的富裕公民。

歌队(chorus):由歌手、舞蹈者组成的歌舞队(例如,雅典的悲剧歌队由12人组成)。

黄金象牙雕像(chryselephantine):特别珍贵的雕像,用木头做芯,外包象牙和黄金,如菲迪亚斯制作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像和雅典的雅典娜神像。

古典时代(classical period):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500或480年至公元前323或300年。

钱币(coinage):大部分希腊城邦都有自己的钱币,通常用银制作,零钱用青铜制成;币值由其中包含的金属的价值决定,所以钱币单位(如斯塔特、明那、塔兰特)也是重量单位。

喜剧(comedy):唱歌与狂欢,在公元前486年的大酒神节上正式成为戏剧形式(见大酒神节Great Dionysia)。

宗教崇拜(cult):对神祇(无论男女神)、英雄(半神的人)或其他超自然现象(如人格化的恐惧)的崇拜。

黑暗时代(Dark Age):希腊青铜时代和古风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表现为物质匮乏,约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800年。

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由雅典主导的帝国

联盟，公元前478年至前404年，原本是为了抵抗波斯，但为雅典利用，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用来打击斯巴达。

德莫(deme)：雅典和阿提卡的宗教区、行政区、村落。

民主制（democracy)：字面意思是平民或人民拥有最高统治权（见demos)。

德莫斯（Demos)：人民，全体公民，普通人。

陪审团（Dicasterion)：公民法庭，陪审团。

狄奥尔科斯(diolkos)：穿过科林斯地峡的石头古道，约公元前600年佩利安德统治时期建成，以便在科林斯和萨罗尼湾之间拖拽船只或运输货物。

酒神颂歌（dithyramb)：由歌队演唱的纪念狄奥尼修斯的宗教歌曲。

多利安人（Dorians)：希腊人的一个民族分支，像伊奥尼亚人一样是根据方言和一些特别的习俗来划分的。

多利安石柱（Doric Order)：神庙的建筑柱式，主要根据柱子和柱头（垫子形）的形式来区分，如伊奥尼亚柱式。

德拉克马（drachma)：货币单位，字面意思是“一把”，含6个奥波尔（见奥波尔 obol)。

东希腊(East Greece)：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至罗德斯岛对岸为止的西部阿齐兹沿岸的希腊世界的一种简便称呼。

埃克莱西亚(ecclesia)：公民大会，公民的主要政治集会。

厄琉西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为向德墨忒耳和珀尔塞福涅表示敬意，在阿提卡的厄琉西斯举行的仪式，由城邦掌控。

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伊壁鸠鲁创建的哲学教义和生活方式，主张人的最大美德是思想上的平静。

埃皮克勒罗斯（epikleros)：父亲的独生女，没有活着的兄弟，将自己父亲的财产全数转到女婿名下，即自己的丈夫名下。

埃特奈(ethne)：由“族群”(如埃托利亚人）组成的政治组织，比城邦松散，不像城邦那样集权。

盖诺斯（genos)：世袭团体，公民共同体。

粒化处理（granulation)：把微小的贵重金属颗粒放置在珠宝表面的修饰技术。

大酒神节（Great Dionysia)：为崇敬埃琉忒莱的狄奥尼索斯，每年在雅典举行的宗教节庆。节庆中有酒神颂歌、悲剧、喜剧和羊人剧等表演。

希腊（Hellas)：希腊人对整个希腊语世界的称呼，更多的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并非是实际上的。

希腊人（Hellenes)：希腊人对自己的称呼。

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传统上认为是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30年克赖奥帕特拉去世之间的历史阶段。

希洛特人（helot)：希腊本土的奴隶，如斯巴达的臣民。

高等妓女（hetaera)：索价高的妓女，交际花，通常是自由民。

重装步兵（hoplite)：希腊重装步兵团。

傲慢（hubris)：以险恶用心伤害他人地位的行为。

伊奥尼亚人(Ionians)：见多里安人(Dorians)。

伊奥尼亚柱式(Ionic Order)：神庙建筑的柱式，柱子上有与众不同的涡旋形柱头，柱底有柱基。

伊索诺米亚（Isonomia)：法律面前地位和权利平等。

普遍和平条约(Koine Eirene)：“普遍和平”，是指所有希腊人，无论他们是否参加起誓（公元前386年第一次举行)，在原则上都应遵守该和平条约。

巨爵(krater)：用陶土或青铜制成的调酒碗，尤其用于宴饮。

基里克斯陶杯(kylix)：用陶土或金属制成的高脚酒杯。

拉凯戴梦（Lacedaemon)：(i）斯巴达城邦的官方名称。(ii)斯巴达的领土，约3000平方英里或8000平方公里。

科林斯同盟（League of Corinth)：希腊大陆大部和希腊岛国（斯巴达除外）结成的政治军事同盟，由马其顿国王腓力在公元前338年建立。

社会捐献（liturgy)：对歌队（见歌队指挥choregus）或雅典的三列桨船（trireme）的资助。

逻格斯（logos)：词语、演说、推理、描述。

外邦人(metic)：享有时间长短不一的居住权的外侨，拥有某些权利，但远远不及公民。

排间档饰(metopes):和三联浅槽饰一起构成多利斯柱式上的雕带(见第244~245页)。

明那(mina):货币单位,1明那等于100德拉克马(复数形式为mnai)。

历月(months):希腊诸邦都形成自己的阴阳历,尽管有些城邦共同使用一些月份名称(如Heraios)。

迈锡尼时代(Mycenean Period):对希腊大陆的青铜时代晚期的别称,约公元前1600年至前1100年。

米斯泰(mystai):新入会的人,如厄琉西斯秘教中(见厄琉西斯秘教)。

海中神女(Nereids):海中神女,根据涅柔斯命名(见人物)。

奥波尔(obol):货币单位,是从obelos变来的,"一锹的深度"。一个德拉克马相当于6奥波尔(见德拉克马drachma)。

奥伊科斯或家庭(oikos):家庭,包括财产和家庭成员。

旧喜剧(Old Comedy):适于应用的最佳定义为: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创作的喜剧,代表人物为克拉提努斯、优波里斯和阿里斯托芬。

寡头制(oligarchy):少数有钱人的统治。

寡头(oligoi):见寡头政治。

奥林匹亚(Olympia):奥林波斯的宙斯圣所,举行四年一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原址。

四年周期(Olympiad):根据两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之间四年时间间隔的一种时间计算方法。

奥菲士教(Orphism):一套奇怪的宗教信仰和行为,由奥菲士所创,为非主流教派所信仰,有它自己的教义。

陶片放逐法(ostracism):通过计算刻在陶片上的"候选人"名的数量决定,"当选者"要被逐出雅典10年。

同类城邦互动(peer polity interaction):一种现代思想,指城市(城邦)之间力求通过彼此促进和仿效,保持同步的过程。

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佩普罗斯的岛屿",通过科林斯地峡与希腊主体大陆相连的陆地板块。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雅典和斯巴达及其各自的同盟国之间进行的战争,由公元前431年延续至公元前404年,其间时断时续。

弗里阿克斯(phlyax):公元前4世纪在意大利南部发展起来的一种闹剧,当地瓶画往往对此加以表现。

胞族(phratry):字面意思是"手足之情或同胞之爱",社会宗教团体。

菲莱或部落(phyle):"部落",通常是人为建立的政治单位。

普拉提亚(Plataea):位于阿提卡边界的彼奥提亚小镇,公元前479年,希波战争中希腊在陆地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役原址。

波利斯(polis):城邦(国家),城市(城区中心),也见"同类城邦互动"。

波里泰依亚或政制(politeia):公民权,宪制(例如民主制)。

陶片(potsherd):(也写作pot shard)在考古遗址出土的陶瓷碎片,希腊语写作"ostrakon",据此产生了"陶片放逐"。

颂诗歌手(praise-singers):职业诗人,专门谱写颂诗庆祝大赛的胜利(如品达)。

雅典卫城入口(Propylaea):雅典卫城巨大的大理石入口,公元前5世纪30年代建造,由穆尼西克勒斯设计。

原始阿提卡陶器(protoattic):公元前7世纪雅典黑图彩绘出现以前的雅典瓶画风格。

原始科林斯陶器(protocorinthian):公元前8世纪晚期至公元前7世纪,在科林斯黑图彩绘出现以前的科林斯瓶画风格。

披提亚(Pythia):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预言女祭司。

红图彩绘(red-figure):一种瓶画风格,其中形象用红色陶土和釉"绘出",然后用黑色颜料填出背景。

圣队(Sacred Band):150对同性恋男子共300人组成的精锐底比斯步兵团队,于公元前378年建立。

总督(satrap):波斯总督。

萨提(satyr):神话中狄奥尼索斯的马人、羊人等熟悉形象(见"人物")。

羊人剧（satyr–drama）：用羊人组成歌队的幽默剧，雅典悲剧家把它们作为悲剧三部曲演出后的余兴。

第二次智者运动（Second Sophistic）：与某些古代权威有关的现代术语，指大约公元60年至230年间倡导以希腊演说家的雄辩为特征的活动。

南意大利（South Italy）：那不勒斯海湾以南地区，拉丁语里也被称做"大希腊"，自公元前8世纪中期就被希腊人征服。

赛跑场（stade）：见stadion。

赛跑场（stadion）：一圈跑道，约二百米。

斯塔西斯（stasis）：指各自为政，内讧，内战。

斯塔特（stater）：货币单位，1个斯塔特等于2德拉克马。

石碑（stele）：带有标记的石质平板，上面刻有铭文和浮雕。

音节表（syllabary）：标注的最小单位是音节而不是独立字母的表（线形文字B）。

村镇联合（synoecism）："各家集合在一起"（见oikos，奥伊科斯或家庭），因此是将村镇统一以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团体。

塔兰特（talent）：重量和货币单位，最先在巴比伦使用；1塔兰特等于6000德拉克马。

底比斯（Thebes）：彼奥提亚人的首要城邦。

温泉关（Thermopylae）：战争遗址，公元前480年在该地，斯巴达领导希腊人英勇抵抗波斯的陆上入侵，最终以失败告终。

日佣级（thetes）：一般指雇佣劳动力，但在雅典特指四大经济阶层（公民的划分标准）中最低阶层的人。

三十僭主（Thirty Tyrants）：公元前404年至前403年，雅典各派系中自立为王的寡头。

三联浅槽饰（triglyphs）：见排间档饰（metopes）。

三列桨舰（trireme）：三层桨的划桨战舰。

僭主（tyrant）：非法的、通过篡权和武力镇压夺权的绝对统治者。

白底（white–ground）：瓶画风格，底色漆成白色，然后在上面绘制色彩鲜明的红色或黑色图案。

年 表

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	米诺文明
约公元前1600年	迈锡尼时代（至约公元前1150年）
约公元前1400年	克诺索斯的毁灭
约公元前1250年	特洛伊的毁灭
约公元前1100年	黑暗时代（至约公元前900或800年）
约公元前1050年	向小亚细亚迁徙（至约公元前800或700年）
	多里安人的迁徙
公元前776年	（传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立
约公元前750年	希腊字母
	优卑亚人殖民伊斯基亚和库麦
约公元前735年至公元前715年	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
约公元前700年	荷马
	赫希俄德
约公元前700年	引入重装步兵战法
约公元前620年	雅典的德拉古法
约公元前600年	三列桨舰的改进
	铸币的发明
	米利都的泰勒斯
公元前594年	雅典的梭伦立法
约公元前550年	阿契美尼王族的波斯帝国建立（至公元前330年）
约公元前546年	波斯的居鲁士打败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
公元前545年	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及其儿子的僭主政治（至公元前510年）
公元前508年	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实行民主改革
约公元前505年	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建立（至约公元前366年）
公元前499年	伊奥尼亚人和其他人举行反波斯起义（至公元前494年）
公元前490年	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	第二次波斯入侵（至公元前479年）
公元前478年	雅典建立提洛同盟（至公元前404年）
公元前462年	雅典的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的民主改革
公元前460年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至公元前446年）
约公元前449年	卡里阿斯和约
公元前447年	帕特农神庙开始修建（公元前432年竣工）
公元前446年	斯巴达和雅典订立的“三十年休战协议”（实际上到公元前431年终止）
公元前431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至公元前404年，时续间断）

公元前421年	尼西亚斯和平（至公元前414年）
公元前418年	曼提尼亚战役
公元前415年	雅典的西西里远征（至公元前413年）
公元前404年	斯巴达建立霸权（至公元前371年）
公元前401年	“万人远征”亚细亚（至公元前400年）
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之死
公元前395年	科林斯战争（至公元前386年）
公元前386年	“国王的和平”
约公元前385年	柏拉图建立学园
公元前378年	雅典建立“第二海上同盟”（至公元前338年）
公元前371年	底比斯军队在留克特拉打败斯巴达军队
	底比斯成为希腊霸主(至公元前362年)
公元前362年	第二次曼提尼亚战役
	第一次普遍和平（？）
公元前359年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加冕（至公元前336年）
公元前346年	菲洛克拉底和约
公元前338年	科罗尼亚之战
	科林斯同盟的建立
公元前336年	亚历山大大王即位（至公元前323年）
公元前335年	亚历山大大王命令毁灭底比斯
约公元前335年	亚里士多德建立吕克昂学园
公元前334年	亚历山大入侵波斯帝国（至公元前323年）
公元前331年	亚历山大里亚的建立
	高加米拉之战
公元前323年	希腊人反抗马其顿（至公元前322年）
公元前322年	德摩斯提尼和亚里士多德之死
	雅典民主制终结
公元前301年	伊普索斯战役
	希腊安提柯王朝的建立者安提柯之死
约公元前300年	芝诺创建斯多葛哲学学派
公元前283年	埃及托勒密王朝（至公元前31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建立者托勒密一世之死
公元前281年	亚细亚的塞琉古王朝的建立者塞琉古一世被暗杀
公元前280年	亚该亚同盟的重新建立
公元前263年	尤梅尼斯一世继承帕加马王国国王斐里泰鲁斯的统治权
公元前244年	斯巴达国王阿基斯四世（至公元前241年）
公元前238年	阿塔卢斯一世为争夺小亚细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至公元前227年)
公元前235年	斯巴达国王克利奥蒙尼三世（至公元前222年）
公元前224年	安提柯三世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希腊联盟
公元前223年	安提奥库斯三世继承塞琉古三世的王位（至公元前187年）

公元前222年	塞拉西亚战役
公元前221年	腓力五世继承安提柯三世的王位（至公元前179年）
公元前215年	腓力五世和迦太基的汉尼拔结盟
公元前211年	埃托利亚与罗马结盟引起第一次马其顿战争（至公元前205年）
公元前200年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至公元前197年）
公元前196年	罗马宣布希腊独立
公元前194年	罗马军队撤出希腊
公元前192年	罗马对安提奥库斯三世的叙利亚战争（至公元前188年）
公元前171年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至公元前168年）
公元前168年	皮德纳役，结束了安提柯王朝
公元前148年	马其顿成为罗马的行省
公元前147年	亚该亚同盟崛起反抗罗马（至公元前146年）
公元前146年	科林斯被洗劫，罗马成为亚该亚的保护国
公元前31年	亚克兴战役
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	屋大维／奥古斯都的统治时期
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
公元1453年	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手

情节概要

《阿尔克斯提丝》(*Alcestis*)

公元前438年欧里庇得斯著，不是悲剧，而是替代通常上演的羊人剧的通俗剧。阿尔克斯提丝是帖撒利的菲莱（Pherae）国国王阿德墨托斯（Admetus）的妻子。阿波罗推迟了阿德墨托斯的死期，条件是别人替他去死。阿尔克斯提丝甘愿替夫赴死。恰好此时赫拉克勒斯到来，他从哈得斯手中救出阿尔克斯提丝，把她送还给经受磨炼后的丈夫。

《远征记》(*Anabasis*)

色诺芬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早、中期。公元前401年，作者参加年轻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招募的雇佣军，此时小居鲁士觊觎王位，企图推翻他的哥哥、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后来小居鲁士在战斗中被杀，雇佣军头领也遭暗害。包括色诺芬在内的大约一万名战士在新首领的率领下设法从亚细亚中部逃回希腊。《远征记》又可称为《返乡记》，生动有趣地记述了这一冒险历程。

《安提戈涅》(*Antigone*)

索福克勒斯著，可能上演于公元前441年。安提戈涅是已故的俄狄浦斯的女儿，又是他的妹妹。她拒绝执行底比斯新国王——她的舅舅克里翁的命令，坚持为被克里翁宣布为叛国者的哥哥波吕涅克斯收尸。克里翁发现后宣布将安提戈涅监禁直至死亡，她的未婚夫——克里翁的儿子为此自杀，随后其妻子也自杀身亡。

《申辩篇》(*Apology*)

柏拉图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初。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为亵渎神灵、蛊惑青年被判处死刑。由于苏格拉底并没有为自己的辩护演讲做充分准备，因此他最杰出的学生——柏拉图在他死后代他辩护。他的另一位学生色诺芬也为他作了辩护。但这两部作品相差甚远，也许色诺芬的作品比柏拉图的作品更接近历史真实。

《阿卡奈人》(*Acharnians*)

阿里斯托芬著，上演于公元前425年。这是阿里斯托芬流传下来的11部喜剧剧本中最早的一部，是他的几部“和平”剧之一。剧中的主角名叫狄开奥波利斯（Dicaeopolis），意为“正义的城邦”，他违背雅典人不肯与斯巴达媾和的主张，私下召集希望享受和平之乐、主要是喜爱酒、色之乐的雅典人，同他一起与斯巴达签订和约，这件事大约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七年。

《酒神的伴侣》(*Bacchae*)

欧里庇得斯著，上演于公元前406年。在欧里庇得斯一百多部剧本中这是最后上演的剧目，写于他自我流放于马其顿宫廷这一时期，直到死后才公开上演。底比斯国王彭托斯（Pentheus）拒不承认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力量，他的观念影响了许多底比斯妇女，包括国王的母亲阿高厄（Agave）。彭托斯被说服去旷野见识女酒神信徒们的狂欢活动，但被信徒们发现后撕成碎片。当阿高厄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已经太迟了，因为彭托斯已经来不及向酒神那原始质朴的力量妥协了。

《云》(*Clouds*)

阿里斯托芬著，上演于公元前423年。这部剧的第一次上演并不成功（这种剧通常只演一次），阿里斯托芬对这次失败非常失望，大约五年后他对该剧进行了重新修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重新创作的剧本。它主要针对智者派所提倡的新式教育，这些智者大都来自雅典之外。为了使剧本具有本土气息，阿里斯托芬不公正地把苏格拉底作为智者派的典型。任何人只要付给足够的钱，都可以到这个被歪曲的苏格拉底开

办的思想诊所（Thinkery）中接受教育，学会如何把坏的、弱的论辩修饰得好而有力，具有不朽的高度和深度。剧中的歌队由云神组成，苏格拉底及其信徒对这些新神的崇拜超过了那些旧神，剧本由此得名。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剧本的结尾是思想诊所遭火焚烧。

《古怪老人》(*Dyscolus*)

米南德著，上演于公元前316年。故事讲述了一位脾气古怪的雅典老人，名叫克涅蒙（Cnemon，“古怪老人”)，他宁愿住在罕无人烟的乡村，也不愿住在城里，享受雅典的城市文明，该剧由此得名。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他惟一的女儿，一位名叫索斯特拉托斯的年轻人追求她，但克涅蒙不愿意失去女儿的服侍。后来克涅蒙掉到井中，索斯特拉托斯救了他，终于使克涅蒙同意了他的求婚。

《厄勒克特拉》(*Electra*)

欧里庇得斯著，上演于公元前420年。索福克勒斯也写过同名剧本，大约于公元前414年至411年上演。这两部流传下来的悲剧都以阿伽门农和克吕泰墨斯特拉的长女伊勒克特拉来取名。欧里庇得斯创造性地把伊勒克特拉写成一位出生高贵但家境贫困的农夫的妻子，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帮助她的丈夫劳动。两部剧的另一个不同是，在欧里庇得斯笔下，伊勒克特拉的哥哥奥瑞斯特斯一回来就认出了她，而索福克勒斯则把这种相认安排在倒数第三场，使之成为全局的关键。但两部戏中，姐弟俩都密谋杀死曾经杀害他们父亲的母亲，为父亲报仇。

《伦理学》和《政治学》(*Ethics* and *Politics*)

亚里士多德著，约写于公元前4世纪30年代。目前有三部属于亚里士多德的标题为“伦理学”的著作流传下来，但最重要的是《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nics)。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把这部作品写给他的儿子尼各马科。该书是《政治学》一书的准备。在这部《伦理学》中他试图为人类发现至高无上的“善”，他认为这个至善就是实行城邦政治美德所获得的幸福生活。在《政治学》中他认为这种生活存在且只存在于城邦或希腊式国家中，因为这是人的预先注定的命运。除了哲学思想之外，《政治学》还包括大量具体的历史材料，这是他和他的学生在吕克昂学园中为进一步研究而进行的调查所获得的成果。

《妇女公民大会》(*Ecclesiazusae*)

阿里斯托芬著，约上演于公元前392年，是阿里斯托芬三部现存的“妇女剧”中的最后--部。在这部剧中，一群雅典公民的妻子成功地瞒过了由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把城邦的大权转到妇女手中。新的政策不仅是女性主义的，同时也是社群主义的，即所有的利益都由全体成员分享，就连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也不例外。他们被按照年龄和美丑的不同被强制分派给想要占有他们的女性。这种奇思怪想甚至荒诞无稽的情节，也许歪曲地反映了某种女性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也许弥漫在公元前4世纪90年代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的雅典大萧条中。

《蛙》(*Frogs*)

阿里斯托芬著，上演于公元前405年。“蛙”的歌队唱出著名的副歌“brek-ek-ek koax koax”，相对于故事主要情节和主要歌队(由厄琉西斯密教信徒组成)，只是可有可无的陪衬。雅典正处于危机之中，谁能拯救她？上演这部喜剧的莱奈亚节的庇护人狄奥尼索斯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下到地府带回一个悲剧诗人，因为传统认为诗人是向公众传授智慧的教师。在听取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争论后，狄奥尼索斯凭借自己的智慧决定，选择年纪更大、也更为传统的埃斯库罗斯。

《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

欧里庇得斯著，上演于公元前428年，是欧里庇得斯第二次使用希波吕托斯神话素材。希波吕托斯是提修斯（Theseus）和亚马逊妇女（Amazon）的儿子，菲德拉（Phaedra）的继子。他热爱纯洁和狩猎，也因此献身于女神阿尔忒米丝。菲德拉对希波吕托斯产生了邪恶的性欲冲动，这个念头被她的女仆人告知了希波吕托斯。遭到希波吕托斯拒绝后，菲德拉自杀。提修斯完全混淆了黑白，对他的儿子发出了可怕的诅咒，最后希波吕托斯被海神波塞冬从大海深处派

来的怪兽杀死。但在临死之前，希波吕托斯告诉了提修斯真相，父子实现了和解。

《伊里亚特》(*Iliad*)

荷马著，可能创作于约公元前700年。《伊里亚特》是口传史诗数百年发展的自然结果。无论是不是有荷马这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作者，它的光彩之处都在于它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即那位天下无敌却又劫数难逃的阿基琉斯的愤怒。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受特洛伊国王普里阿姆之子帕里斯的诱惑而与他私奔，于是希腊人远征特洛伊，试图夺回海伦。希腊的军队由希腊最强大的国王、墨涅拉奥斯的哥哥迈锡尼统治者阿伽门农率领。阿基琉斯眼见自己合法分得的战利品、漂亮的布里塞伊斯被阿伽门农骗走，怒不可遏，躲在帐篷中拒不出战，最后稍作让步，但也只是允许他的密友帕特洛科洛斯穿着他的盔甲假冒自己出战。但是帕特洛科洛斯的死，改变了他的想法。他穿上由工匠神赫淮斯托斯新打造的华丽的铠甲回到战场，杀死了特洛伊的主要将领、普里阿姆的另一个儿子赫克托。故事的高潮不是特洛伊的陷落，而是阿基琉斯把赫克托的尸体归还给他悲伤不已的老父亲普里阿姆，这是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最伟大的和解。

《吕西斯忒拉忒》(*Lysistrata*)

阿里斯托芬著，上演于公元前411年。这是第一部以女主角命名的喜剧，与《地母节的妇女》(Thesmophoriazusae)同年上演。利西斯特拉塔这个虚构的名字也许是雅典一个真实的女祭司利西马克(Lysimache)的谐音字，就像《阿卡奈人》中的迪卡伊奥波里斯一样。她希望与斯巴达缔结和平，但作为一个妇女她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她联合雅典妇女发动抵制性生活的“罢工”，同时也联合斯巴达妇女罢工。这个计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使男人们真正缔结和平，利西斯特拉塔和她的伙伴还占领了雅典卫城，控制了存放在帕特农神庙中的战争宝箱。戏剧的结尾是丈夫和妻子、雅典和斯巴达实现了和解，大家欢呼雀跃庆祝和平。

《美狄亚》(*Medea*)

欧里庇得斯著，上演于公元前431年。欧里庇得斯在24年前他的第一部剧本中就描写过美狄亚，但在这部剧本中，他做了权威性的也是最新颖的处理。美狄亚并非希腊公主，而是来自黑海东岸的女巫。在伊阿宋求取金羊毛的过程中，她给予了关键性的帮助，并同他一起回到了希腊。后来伊阿宋娶科林斯公主并抛弃了她。在恐怖的报复中，她杀死了她与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孩子，这是欧里庇得斯对这个故事改编的第一步。更奇特的是欧里庇得斯在剧本结尾让美狄亚逃到空中，成为真正的神。

《奥德赛》(*Odyssey*)

荷马著，可能写于约公元前700年。与《伊里亚特》一样，这也是口传史诗长期发展的结果。本书叙述的焦点集中于一位英雄，使得情节更连贯，感染力更强。奥德修斯从特洛伊返回伊大卡注定要花费十年的时间，与希腊人攻陷特洛伊一样长。故事并不是按次序依次讲述，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回忆和倒叙组成。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冒险，与之相对的是他的妻子佩涅洛普，坚定却又同样充满智慧地拒绝了108位求婚者的求婚。最后，奥德修斯与他忠诚的儿子铁雷马库斯和牧猪奴攸迈欧斯一起，对求婚者进行了可怕的报复。

《家政论》(*Oeconomicus*)

色诺芬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这个题目的意思大概是“关于庄园管理的论述”，也可能是“庄园管理者”的意思。研究对象是阿提卡的一处大地产(oikos)，在田野、家内都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书中苏格拉底主要与一位叫伊斯科马库斯(Ischomachus)的人进行对话。在对话中，他们阐明了在这种庄园里理想的经济和道德行为。事实上，这些内容只对少部分富裕的希腊人有用。

《奥瑞斯提亚》(*Oresteia*)

埃斯库罗斯著，上演于公元前458年。这是一部完整的三联剧，有着统一的主题，即奥瑞斯特斯对他的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实施复仇，因为她是杀害其父阿伽门农的凶手。阿伽门农当时刚从特洛伊回到家中就被杀害。在第一部剧《阿伽门农》中，阿伽门农被

他的像男人般坚强的妻子克吕泰墨斯特拉杀死；在第二部《奠酒人》中，奥瑞斯特斯在他的姐姐伊勒克特拉的帮助下完成了复仇；在第三部《欧默尼德斯》中，奥瑞斯特斯被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到处追逐，因为厄里倪厄斯的职责就是要报复杀亲者。最后奥瑞斯特斯逃离了阿哥斯，来到雅典。在这里他在新组建的、由雅典娜主持的战神山会议上接受审判。阿波罗为奥瑞斯特斯辩护，陪审团犹豫不决。此时雅典娜站在奥瑞斯特斯的一边，使之免除了惩罚。与此同时，失败了的厄里倪厄斯被驯化为欧默尼德斯(Eumenides)，即“好心肠的人”，此后在雅典受到人们的崇拜。

《斐顿篇》(*Phaedrus*)

柏拉图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在这部苏格拉底的对话集中，苏格拉底与斐顿围绕“爱”和“修辞”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和辩驳。与其他作品不同，两人的对话被精心地安排在雅典及其近郊的风景中进行，并且没有第三方的叙述者，这与其他contextually顺承式的对话录也大不相同。

《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

柏拉图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早期。“美德可以教会么？”这是书中苏格拉底向阿布提拉的普罗塔哥拉斯提出的问题。后者是一名杰出的智者，也是一名教师，负责教育雅典社会上层的子女，同时收取不菲的费用。毫无疑问，普罗塔哥拉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苏格拉底试图证明普罗塔哥拉斯所传授的只是技能和技巧，首先是诡辩式的辩论伎俩(我们现在所用的“诡辩”一词就来自于希腊文中的“智者”)。

《理想国》(*Republic*)[①]

柏拉图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初期。形式上这仍是苏格拉底的对话体作品，但它是迄今这类对话中最复杂、最精致的一部。有时也称该书为《论正义》，它的希腊书名是*politeia*。作品描写了苏格拉底向若干假想中的对话者(包括柏拉图的两个哥哥)提问，如“什么是正义？”本书最终的目标是伦理学，但因为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希腊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密不可分(参阅上文的词条“伦理学与政治学”)，所以苏格拉底首先研究城邦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正义”，然后才研究存在于个人灵魂之中的正义。这个研究得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除非真正(柏拉图式的)的哲学家成为国家首脑，或者国家首脑成为(柏拉图式的)哲学家，否则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将无法实现。这篇对话的假设与方法和它的乌托邦式的结论同样重要，但我们应该把它与《法律篇》对照阅读。在后者中，柏拉图变得更为现实和实用。他把法律和道德的框架作为新的理想之邦的基础(这个新邦被想像性地建在克里特岛上)。

《宴饮篇》(*Symposium*)

柏拉图著，写于公元前4世纪初。公元前416年，雅典悲剧作家阿伽松在拉尼亚(Lanea)节上首次获奖。这篇对话的背景是为了庆祝胜利，阿伽松邀请了几位密友举行宴会(或者说是酒会)，其中包括苏格拉底。与其说这篇对话从理论上探讨了人类爱情的全部问题，不如说它讨论的是性欲的方方面面。《宴饮篇》实际上不全是一场对话，而更像是一出戏剧表演。在众多的轻松愉快的故事中它特别记述了阿里斯托芬的一场演讲。阿里斯托芬试图通过一个充满魅力的神话，说明为什么有的人更倾向于同性恋而不是异性恋。后来喝得酩酊大醉的阿尔基比亚德斯不期而至，打乱了演讲。书中还有一位可敬而又富有智慧的妇女迪奥提玛(Diotima)做了极具感染力的演讲。因为当时的宴饮活动实际上不允许她这样的妇女参加，所以她的出现表明这场宴饮是人为的、虚构的。

《神谱》(*Theogony*)

赫希俄德作于大约公元前700年。赫希俄德是彼奥提亚(Boeotia)阿斯克拉(Ascra)人，他用《荷马史诗》的六音步格律写了两部传世的长诗：《神谱》和《田功农时》(见下文)。在前一部作品中它利用希腊和东方国家的神话资源，力图对现实世界的由来作出解释，是一部希腊式的“创世纪”。他的巨大成功不仅表现在其作品的长期流传，更表现在希罗多德称他

① 英文Republic是对古希腊文Politeia的译名，与古希腊文原义不符，参见本附录该词条。中文意译“理想国”相对较为准确。——译者注

(与荷马一起)"为希腊人勾画了神的世界,并赋予众神各自的名号、职位和权力"。

《地母节的妇女》(*Thesmophorizusae*)

阿里斯托芬著,上演于公元前411年。这是阿里斯托芬的第二部"妇女剧",可能是在公元前411年的酒神节上上演的。地母节是以纪念地母神德墨忒耳的名义而专为雅典结过婚的妇女举行的节日。剧中节日的组织者们讨论如何对欧里庇得斯实施报复,因为他的悲剧揭露了她们性生活的实情:她们既酗酒又纵欲。后来欧里庇得斯的一位亲戚男扮女装潜入狂欢群体,被发现后给关了起来,直到欧里庇得斯被迫宣布不再诬蔑妇女们的高贵的性生活。

《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

欧里庇得斯著,上演于公元前415年。这是以特洛伊为主体的三联剧中惟一保存下来的一部。该剧演唱从头到尾都使用同样的强拍,歌队演员扮演特洛伊的普通妇女。她们和著名人物赫卡柏、安德罗玛、卡珊德拉一样,即将作为女俘用船运往希腊。与那些希腊征服者相比,海伦似乎被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特洛伊妇女而颇受作者同情。和《伊里亚特》中的描写不同,该剧对妇女命运的描写完全是站在妇女自己的立场上进行的,这使得当时现场的部分观众惴惴不安,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刚刚参与了对弥洛斯妇女的奴役。

《马蜂》(*Wasps*)

阿里斯托芬著,上演于公元前422年。剧中,歌队扮演者由普通雅典公民组成的"公民法庭"陪审团。他们陶醉于攻击被告,竭力证明其有罪并尽可能判他们死刑。其中一个假想的典型人物就是菲洛克勒翁(Philocleon)。这是一个戏剧化的反面角色,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喜爱克勒翁"[①],阿里斯托芬设计这个名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嘲讽当时的民主派领袖。整个剧情表现的是菲洛克勒翁的儿子布得吕克勒翁(Bdelycleon)如何成功地治愈他父亲的审判狂热症。[②]

① 菲勒克勒翁(Philocleon)一词由"喜爱"(philo-)和克勒翁(cleon)组成,"克勒翁"是希腊文学中的国王常用的名字。

②布得吕克勒翁(Bdelycleon)的希腊文意思是"憎恨克勒翁的人"。

《田功农时》(*Works and Days*)

赫希俄德著,可能写于公元前700年左右。这首六音步诗的名字来自该诗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一种农民的历书,其中详细列举了农民在一年四季内该做和不该做的事。第一部分是写给他的无赖兄弟佩尔塞斯的道德教谕诗,警告他和他的贵族资助人。第二部分的分析基本是对的,事情控制不好,结局如二所假设。无论他们现在看起来多么富有,神终将对他们施以惩罚。在这部分中,赫希俄德阐述了他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著名论断,他用神话语言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不断堕落的五个阶段: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令人沮丧的现时代,即黑铁时代。

参考书目

General Works

Parker, R *Miasm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reprinted with new preface 1996).

Parker, R *Athenian Religion: a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Browning, R(ed.)*The Greek World. Classical, Byzantine and Modern*.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85.

Burn, AR *Pelican History of Greece*. Harmondsworth: Penguin, latest reprint 1996.

Cartledge, P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revised edition 1997, 2nd edition 2002).

Dover, KJ *The Greeks*. London: BBC Books 1980.

Etienne, R & F *The Search for Ancient Greece*.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2.

Lévêoue, P *Ancient Greece. Utopia and Reality*.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4.

Levi, P *Atlas of the Greek World*. Oxford & Amsterdam: Phaidon 1980.

Morris, IM(ed.)*Classical Greece. Ancient Histories and Modern Archae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ART I:
THE WORLD OF GREECE
Chapter 1: ***History and Tradition***

Cartledge, P *The Greeks. A Portrait of Self and Oth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revised edition 1997, 2nd edition 2002).

Crawford, M(ed.)*Sources for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Finley, MI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

Finley, MI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2nd ed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6.

Fornara, CW *The Nature of History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Grant, *M The Ancient Historia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70/1995.

Loraux, N *The Invention of Athens. 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81].

Thomas, R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Thomas, R *Herodotus in Context: Ethnography, 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Vidal-Naquet, P *The Black Hunter. Forms of Thought and Forms of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2: ***Environment***

Cherry, JF, Davis, JL & Mantzourani, E *Landscape Archaeology as Long-term History: Northern Keos in the Cycladic Islands*. Los Angeles: UCLA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1992.

Foxhall, L 'Greece Ancient and Modern-Subsistence and Survival' *History Today* 36(1986)35-43.

Gallant, TW *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Domestic Econom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Garnsey, P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Responses to Risk and Cri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Isager, S & Skydsgaard, J-E *Ancient Greek Agri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Jameson, MH, Runnels, CN & van Andel, TH *A Greek Countryside: the Southern Argolid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Kardulias, PN(ed.) *Beyond the Site: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Aegean Area*.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Murray, O & Price, S(eds) *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lexa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Osborne, R *Classical Landscape with Figures*. London: George Philip 1987.

Rackham, O'Ancient Landscapes'. In O Murray & S Price(eds) *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lexander, 85–111*.

Rackham, O 'Observations on the Historical Ecology of Boeotia',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78 (1983) 291–351.

Snodgrass, AM 'Survey Archaeology and the Rural Landscape of the Greek city'. In O Murray & S Price (eds) *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lexander*, 113–36.

van Andel, TH & Runnels, CN *Beyond the Acropolis: A Rural Greek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Wells, B (ed.) Agri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 Stockholm: Paul strõms Fõrlag 1993.

Chapter 3: *Peoples: Who were the Greeks?*

Bernal, M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2 vols(of 4).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Press 1987–91.

Boardman, J *The Greeks Overseas. Their Early Colonies and Trade*.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9.

Chadwick, J *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1990.

Chadwick, J *The Myceneae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Graham, AJ *Colony and Mother City in Ancient* Gree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hicago: Ares 1964/1983.

Dickinson, O *Mycenaean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cDonald, WA & Thomas, CG *Progress into the Past. The Rediscovery of Bronze Age Gree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Vermeule, ET *Greece in the Bronze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1972.

INTERMEZZO: *HISTORICAL OUTLINE*

Andrewes, A *The Greeks*. London: Hutchinson 1967=*Greek Societ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Austin MM, *The Hellenistic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urn, AR *The Lyric Age of Greece*. London: Arnold 1960/1978.

Davies, JK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2nd edn Glasgow: Fontana 1993.

Dillon, M & Garland, J *Ancient Greece. Soc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Death of Socrat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Green, P A *Concise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to the close of the Classical Era*.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74.

Green, P *From Alexander to Actium. The Hellenistic Age*.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1993.

Harding, P *From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Battle of Ipsu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Murray, O *Early Greece* 2nd edn Glasgow: Fontana 1993.

Powell, *A Athens and Sparta. 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nd edn 2001.

Powell, A(ed.) *The Greek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Snodgrass, AM *Archaic Greece. The Age of Experiment*. London: Dent &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Walbank, FW *The Hellenistic World* 2nd edn Glasgow: Fontana 1992.

PART Ⅱ: THE LIFE OF GREECE

Chapter 4: Rich and Poor

Cohen, D *Law Violence and Community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nnor, WR *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reprint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2 with new preface]

Davies, JK *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 New York: Arno 1981.

Dover, KJ *Greek Popular Morality in the Time of Plato and Aristotle.* Oxford: Blackwell 1974.

Hunter, VJ *Policing Athens: Social Control in the Attic Lawsuits 420-320 B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Morris, I *Death Ritual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Murray, O & Price, S (eds) *The Greek City from Homer to Aristot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Ober, J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Osborne, R *Demos: the Discovery of Classical Attik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Ostwald, M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Rule of Law.* Berkeley & Lond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Rich, J & Wallace-Hadrill, *A(eds)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Ste. Croix, GEM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Duckwort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corr. impression 1983].

Whitehead, D *The Demes of Attica, 508/7-ca. 250 B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5: *Women, Children and Men*

Blundell, S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ameron, A & Kuhrt, *A(eds)Images of Women in Antiquity* 2nd ed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Cantarella, E *Pandora's Daughters: the Role and Status of Women in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duBois, P *Centaurs and Amazons: Women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duBois, P *Sowing the Body: Psychoanalysis and Ancien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Fantham, E et al. *Women in the Classical World.*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Foley, HP(ed.), *Reflections of Women in Antiquity.* New York, London & Paris: Gordon & Breach 1981.

Garland, R *The Greek Way of Life,* London & Ithaca: Duckworth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Golden, M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Classical Athens.*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Greene, E(trans. modified), 'Sappho, Foucault, and Women's Erotics'. *Arethusa*(1996).

Halperin, DM, Winkler, JJ & Zeitlin, FI(eds), *Before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Hawley, R & Levick, BM(eds), *Women in Antiquity: New Assessmen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Humphreys, SC *The Family, Women and Death* 2nd ed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Just, R *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Keuls, E *The Reign of the Phallus: Sexual Politics in Ancient Athens,* revised ed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Konstan, D(ed.) *Documenting Gender: Women and Men in Non-literary Texts* (special issue of *Helios* 19), 1993.

Peradotto, J & Sullivan, JP(eds) *Women in the Ancient World: the Arethusa Pape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1984.

Pomeroy, SB *Goddesses, Whores, Wives, and Slaves: Wome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New York: Schocken 1975.

Pomeroy, SB(ed.) *Women's History & Ancient History*. Chapel Hill &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Rabinowitz, NS & Richlin, A (eds)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Classic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3.

Reeder, ED (ed.) *Pandora: Women in Classical Greece*. Baltimore & Princeton: Walters Art Galler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chmitt-Pantel, P(cd.)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West I: From Ancient Goddesses to Christian Saints*. Cambridge, MA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ealey, R *Women and Law in Classical Greece*. Chapel Hill &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Snyder, JM *The Woman and the Lyre: Women Writers in Classical Greece and Rome*.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Bristol: Classical Press 1989.

Winkler, JJ *The Constraints of Desire: the Anthropology of Sex and Gender in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0.

Zeitlin, F *Playing the Other: Gender 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Chapter 6: *Power and the State*

Bruit-Zaidman, L & Schmitt-Pantel, P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 trans. P. Cart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Camp, JM *The Athenian Agora. Excavations in the Heart of Classical Athens*.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86.

Cartledge, P *Sparta and Lakonia. 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 BC*. London, Henley & Boston: Routledge 2nd edn 2001.

Cartledge, P & Spawforth, *A Hellenistic and Roman Sparta. A Tale of Two Cities*. London & Nes York: Routledge 1989.

Ehrenberg, V *The Greek State* 2nd edn London: Methuen 1969.

Finley, MI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2nd ed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

Finley, MI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Forrest, WG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 800–400 BC*. London: Hutchinson 1966.

Hansen, MH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lackwell 1991, 1999.

Jones, *AHM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lackwell 1957/1978.

Lintott, AW *Violence, Civil Strife and Revolu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 750–330 BC*.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2.

MacDowell, DM *The Law in Classical Athens*.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78.

Moore, JM (ed.)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 2nd ed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Sinclair, RK *Democr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de Ste. Croix, GEM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Duckworth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corr. impression 1983).

Chapter 7: *War and Peace*

Cargill, J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 empire or free alliance?*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Garnsey, P & Whittaker, CR (eds)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Hanson, VD *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 Pisa: Giardini 1983, 1998.

Hanson, VD *The Western Way of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00.

Hanson, VD *The Other Greeks. The Family Farm and the Agrarian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Hanson, VD(ed.)Hoplites. *The Classical Greek Battle Experi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Lazenby, JF *The Spartan Army*.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85.

Meiggs, R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ich, J & Shipley, G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Greek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Ryder, TTB *Koine Eire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Snodgrass, AM *Arms and Armour of the Greeks*.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67/1981.

de Ste. Croix, GEM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Duckworth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ter 8: *Work and Leisure*

Burford, *A Land and Labor in the Greek World*.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1993.

Dover, KJ *Greek Homosexuality*. London: Duckworth 1978; 2nd ed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Finley, MI *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0;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Fisher, NRE *Slavery in Classical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1993.

Gallant, TW *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Garlan, Y *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Garnsey, P, Hopkins, K, & Whittaker, CR (eds)*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3.

Garnsey, P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Hanson, VD The Other Greeks: *The Family Farm and the Agrarian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Kyle, DG *Athletics in Ancient Athens*. Leiden: EJ Brill 1987.

Lissarrague, F *Aesthetics of the Greek Banque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Millet, P *Lending and Borrowing in Ancient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urray, O(ed.)*Sympotica. A Symposium on the Sympo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Osborne, R *Classical Landscape with Figures: The Ancient Greek City and its Countryside*. London: George Philip 1987.

von Reden, S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1995.

Sallares, R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Duckworth 1991.

Whitehead, D *The Ideology of the Athenian Metic*. Cambridg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77.

Whittaker, CR (ed). *Pastoral Econom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8.

Wood, EM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8.

Chapter 9: *Literature and Performance*

Gardiner, EN *Athletics of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30.

Harris, HA *Greek Athletes and Athletics* 2nd edn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 1966.

Neils, J(ed). *Goddess and Polis: The Panathenaic Festival in Ancient Ath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oliakoff, M *Combat Sports in the Ancie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zachou-Alexandri, O *Mind and Body: Athletic Contests in Ancient Greece*. *Athens*: Ekdotiki Athenon 1989.

Kennedy, G *The Art of Persuasion in Gree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Vickers, B *In Defence of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orthington, I(ed).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4.

Walsh, GB *The Varieties of Enchantment: Early Greek Views on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oetry*. Chapel Hill, NC &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Barron, JP & Easterling, PE(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Literature: Greek Literature*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Comotti, G *Music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West, ML *Ancient Greek Mus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artledge, P *Aristophanes and his Theatre of the Absurd*. reprint Bristol & London: Duckworth 1999.

Csapo, E & Slater, WJ *The Context of Ancient Dram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Easterling, PE(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reek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reen, JR *Theatre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4.

Taplin, O *Comic Angels and other Approaches to Greek Drama Through Vase-Paint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Zeitlin, FI *Playing the Other: Gender and Society in Classical Greek Literatur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Chapter 10: *Visual Arts*

Amyx, DA *Corinthian Vase-painting of the Archaic Peri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Brommer, F *The Sculptures of the Parthenon*.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9.

Cook, RM *Greek Painted Pottery* 3rd edn London: Routledge 1997.

Coulton, JJ *Ancient Greek Architects at W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1988.

Dinsmoor, WB The Architecture of Ancient Greece 3rd edn London: Bell 1950.

Hurwit, JM *The Art and Culture of Early Greece, 1100-480B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Jenkins, I *The Parthenon Frieze*.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4.

Lawrence, AW *Greek Architecture* 4th ed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Mark, I *The Sanctuary of Athena Nike in Athens: Architectural Stages and Chro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ollitt, JJ *The Art of Ancient Greece: Sources and Documen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1990.

Robertson, CM *A History of Greek Ar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Robertson, CM *The Art of Vase-Painting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parkes, BA *Greek Potte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Spivey, N & Rasmussen, T(eds) *Looking at Greek Va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Stewart, A *Greek Sulpture: an Explo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Chapter 11: *Philosophy and Science*

Fraenkel, H *Early Greek Poetry and Philosophy*. English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75

Guthrie, WKC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6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80.

Robinson, JM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Boston, MA: M. I. T. Press 1968.

Kirk, GS, Raven, JE &Malcolm Schofield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Kerferd, G *The Sophistic Mov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Santas, GS Socrates: *Philosophy in Plato's Early Dialogues*. London: Routledge 1979.

Annas, J *An Introduction to Plato's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rior, WJ *Unity and Development in Plato's Metaphysics*. London: Routledge 1985.

Shorey, P *What Plato Sai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

Vlastos G, (ed.)Plato: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I: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 II: Ethics,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of Art and Relig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Ackrill, JL *Aristotle the Philosoph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Grene, D *A Portrait of Aristotl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Lloyd, GER 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Lloyd, GER *Early Greek Science, Thales to Aristotl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1.

Lloyd, GER *Science, Folklore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the Life Sciences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Chapter 12: *Religion and Myth*

Bremmer, J *Greek Relig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ruit–Zaidman, L & Schmitt–Pantel, P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 ed. P. Cart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Burkert, W *Greek Religion: Archaic and Classical*. Oxford: Blackwell 1985 [1977].

Buxton, R *Imaginary Gree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arpenter, TH *Art and Myth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1.

Easterling, PE & Muir, JV(eds) *Greek Relig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dmunds, L(ed.) *Approaches to Greek My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Faraone, CA & Obbink, D(eds) *Magika Hiera*.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ordon, R(ed.) *Myth, Religion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Graf, F *Greek Myth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Lloyd, GER *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Mikalson, JD *Athenian Popular Relig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Versnel, HS(ed.) *Faith, Hope and Worship*. Leiden: Brill 1981.

Versnel, HS(ed.) *Inconsistencies in Greek and Roman Religion*. 2 vols. Leiden: Brill 1990–93.

Vidal–Naquet, P *The Black Hunter*.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83.]

EPILOGUE

Clarke, G(ed.) *Rediscovering Hellenism. The Hellenic Inheritance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Dover, KJ (ed.) *Perceptions of the Ancient Greeks*. Oxford: Blackwell 1992.

Finley, MI(ed.)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Haskell, F & Penney, N *Taste and the Antique. The Lure of Classical Sculpture 1500–1900*.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enkyns, R *The Victorians and Ancient Greece*. Oxford: Blackwell 1980.

Rawson, ED *The Spartan Tradition in European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1991.

Reid, JD *The Oxford Guide to Classical Mythology in the Arts*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Richard, CJ *The Founders and the Class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Roberts, JT *Athens on Trial. The Antidemocratic Tradition in Western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plin, O *Greek Fire*. London: Channel 4 Books 1989.

Tsigakou, F–M *The Rediscovery of Greece. Travellers and Painters of the Romantic Era*. London &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81.

Turner, FM *The Greek Experience in Victorian Brita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作者传略

苏珊E·阿尔科克（Susan E. Alcock）

苏珊E·阿尔科克是密歇根大学古典研究系古典考古学和古典学教授，她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地表考古学和帝国考古学。她最近参加的现场考古工作是担任希腊西南部的墨塞尼亚皮洛斯地区考古项目的副指挥。阿尔科克教授新近获得约翰·D和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授予的麦克阿瑟研究金。

凯林W·阿拉法特（Karim W. Arafat）

凯林·阿拉法特博士是伦敦皇家学院古典时期考古学的高级讲师，著作有《古典宙斯：艺术和文学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波桑尼阿斯的希腊：古代艺术家和罗马统治者》（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他参加了在希腊、阿尔巴尼亚和俄罗斯的发掘工作，目前正准备有关伊斯特摩亚的波塞冬圣所出土的古风时代的陶器的著述。

理查德·巴克斯顿（Richard Buxton）

理查德·巴克斯顿是布里斯托尔大学希腊语言与文学教授，自1973年以来他一直在那里任教。他曾在剑桥皇家学院接受教育，随后去了巴黎高等研究学院继续学习。他一直致力于研究、出版各种古迹文化，特别强调古代希腊社会和它所产生的文学和神话之间的关系。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几种语言出版（包括希腊文译本和日文译本），除此以外，他的主要出版物有《希腊悲剧中的说教》（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索福克勒斯》（牛津大学出版社，新版1995年）和《想像中的希腊》（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他还编辑了《从神话到理性？希腊思想发展研究》（牛津出版社，1999年）及《牛津版希腊宗教读本》（牛津出版社，2000年）。

保罗·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

保罗·卡特里奇是希腊史教授、古典学系主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研究员。在牛津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他担任古代史核心课题专著系列的合编人（剑桥）和古典Inter/Faces的合编者（达克沃思），也是《对话》（希腊中心、伦敦皇家学院）、《城邦》、《政治思想史》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出版的著作包括最近出版的《希腊人：文明的熔炉》（BBC环球出版公司，2001年）、和《斯巴达人反省》（达克沃思／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目前，他正着手研究自荷马到普鲁塔克的希腊政治思想、古代希腊社会经济史。

莱斯利·狄恩·琼斯（Lesley Dean-Jones）

莱斯利·狄恩·琼斯是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古典学系古希腊文学副教授，专门研究古代医学和古代女性，她的第一本书《古典希腊科学中的女性身体》是199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她也是一些有关希腊医学、历史、哲学论文的作者。她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古典学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1989年至1990年，她获得美国学术学会理事会的研究员资助，1990年成为位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

尼克·费希尔（Nick Fisher）

尼克·费希尔是加的夫大学古代史教授，已经出版了《埃斯奇涅斯的<反提马尔库斯>，介绍、翻译和注释》（牛津，2001年），《狂妄——古希腊荣誉与耻辱价值观研究》（阿瑞斯和菲利普斯，1992年），《古典时期雅典的奴隶制》（达克沃思，1993年），《古典时期雅典的社会价值观》（登特，1976年）以及大量有关希腊政治与社会历史的文章。

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

伊迪丝·霍尔是达勒姆大学希腊文化史的客座教授，也是牛津大学希腊罗马戏剧表演档案馆的共同创立者和副馆长。他的著作有《发现蛮族人：希腊人通过悲剧自我定义》（牛津，1989年）、《戏剧表演中的美狄亚，1500年至2000年》（和斐奥纳·麦金托什、奥利弗·塔普林合著，牛津，2000年）以及《希腊罗

马演员》(与P·E·伊斯特林合著，剑桥，2002年)。

玛丽琳·A·卡兹 (Marilyn A. Katz)

玛丽琳·A·卡兹是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的韦斯利大学古典研究教授，写了许多有关史诗、古希腊史学、古希腊性文化及古希腊妇女的文章。她撰写的著作《佩涅洛佩的传闻：荷马的〈奥德赛〉的含义与不确定性》于1991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她正在撰写《古代雅典的妇女和意识形态》及《古希腊的妇女和城邦》。

凯瑟琳·A·摩尔根 (Catherine A. Morgan)

凯瑟琳·摩尔根博士是伦敦皇家学院古典考古学高级讲师，撰写了《运动员与神谕：公元前8世纪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的转变》(剑桥，1990年)，另一本书《迈锡尼的建立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伊斯特米亚圣所》即将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她也参加了在希腊、阿尔巴尼亚和俄罗斯的考古发掘工作。

致 谢

ixt, 242, 348, Archivi Alinari; ixb, The Earl of Pembroke and the Trustees of the Wilton House Trust; xiii, 46*t*, 109,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Vienna; xv, 2, 3, 10, 38, 41, 43, 58–59, 71, 72, 152, 191, 221, 229, 304, 322, 338, 340, 350, Ancient Art & Architectrue Collection; xvii, 162, Ny Carlsberg Glyptotek; xvi, Dave Bartruff/Corbis–Bettmann; xviii, reproduced by courtesy of the Trustees, 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 xil, courtesy of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xir, courtesy of the Hyde Collection; xx–1, 20, 217,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Malibu, California; 5, from Petworth House, National Trust; 6, 65*b*, 66, 67*t*, 82, 111, 130, 132–133*t*, 147, 166, 183, 198l, 266, 267, 270, 330, 344, 351l©British Museum, London; 7, Museo Etrusco, Vaticano; 8, Graeco–Roman Museum of Alexandria; 15, ©Geospace/Science Photo Library; 16, 17*t*, 21, 22, 23, Susan Alcock; 17*b*, 250, Museum of Classical Archaeology, Cambridge; 18–19, Denver Art Museum Collection/photo: Lloyd Rule; 25, courtesy of Harold Koster; 27, courtesy of the Halieis Excavation Publication Committee; 28, photo by Otto Nelson; 31, Manchester City Art Galleries/J. W. Waterhouse: *Hylas and the Nymphs*, 1997; 33, Daniel Schwartz photography/Lookat Photos; 36–37, Bildarchiv Foto Marburg; 42, Hulton Getty Picture Collection; 44, 316,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47*t*, Sofia,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47*b*,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 1997/photo: Ingrid Geske–Heiden; 48, Cairo Museum; 49*r*, William E. Nickerson Fund, 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49*l*,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letcher Fund, 1932(32. 11. 1)photograph by Schecter Lee; 50, Manolis Andronicos; 51*t*,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Thessaloniki (photo: Archaeological Receipts Fund); 51*b*, courtesy of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Thessaloniki; 52, 143, ©The Manchester museum/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54–55, 69, 91, 184–185, 210, 230–231, 323, Michael Holford; 57,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 Archives; 62, 171*t*, Cliché, E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 (© EFA, Emile SERAF); 65*t*, 157, 254, 342–343,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Athen; 67*b*, 245, Soprintendenza Archeologica per L'Etruria Meridionale; 68, Henri Stierlin; 74–75, 123, 339,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1997/photo: Ingrid Geske–Heiden,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Antikensammlung; 79, Rheinisches Landesmuseum Trier; 80, Thera Museum; 81, 190, 203, Hirmer Fotoarchiv; 83, 262, Francis Bartlett Collection, 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86–87, 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Hamburg, Inv. no. 1984. 488(photo: Angelika Paul); 88, courtesy of Archaeological Receipts Fund, Athens; 89,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Istanbul; 90, 195,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 1997/photo: Ingrid Geske; 94, ©Sonia Halliday Photographs; 95, Martin von Wagner Museum, Universität Würzburg/photo: K. Oehrlein; 98–99, 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 Hamburg, Inv. no. 1981. 173(photo: Maria Thrun); *100*,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06(06. 1117); 101, 337, Musée du Louvre/©Photo RMN-Hervé Lewandowski; 102, H. L. Pierce Fund, 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00. 330); 103, Makron, Greek, Attic, Kylix(redfigure), about 480 BCE, wheel-thrown, slipdecorated earthenware, Ht. 411/32 in. (11cm) (1972. 55), The Toledo Museum of Art, Toledo Ohio, Purchased with funds from the Libbey, Endowment, Gift of Edward Drummond Libbey; 104,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Antikensammlung/photo: Eva-Maria Borgwaldt; 106,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ogers Rund, 1906(06. 1021. 144); 108, William Francis Warden Fund, 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63. 1246); 113, Alison Franz photo/Photographic Archives,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118, Berni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inv. 12227; 119, 131, 148, 315*b*, Musée du Louvre/©Photo RMN; 12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urchase, Walter C. Baker Gift, 1956(56. 11. 1); 126, 171*b*, 324,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 1997/photo: Johannes Laurentius, 1990,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rubesitz Antikensammlung; 128,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44 (44. 11. 1); 133*b*,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letcher Fund, 1931(36. 11. 4); 134-135 (detail of vase), 265,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letcher Fund, 1931(31. 11. 10); 136, Bequest of David M. Robinson, ©President and Fellows, Harvard College,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1960. 342); 137, courtesy of Antoine Vivenel Museum Collection, Compiègne (no. 1090); 144, 180-181, 260-261, 257*l*, 325,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photo: Archaeological Receipts Fund); 145, 150*b*, 153, 154, 163, 269,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Agora Excavations; 146, 306-307, Scala(Museo Nazionale Napoli); 150*t*, 256, Ashmolean Museum, Oxford; 156, Mansell Collection; 159, Archaeological Receipts Fund (Sparta Museum); 165, City of Bristol Muscum and Art Gallery/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167, Cliché Muée du Chãtillonnais-Chãtillon-sur-Seine/photo: Christian Labeaune; 170, Scala; 175, ©The Trustees of the 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 1997; 176-177, 182, 209, 219, 235, 334, Staatlichc Antikensammlungen und Glyptothek, München; 178, Paul Lipke/Trireme Trust; 186-187*b*,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30(30. 11. 12); 169,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ift of Norbert Schimmel Trust, 1989(1989. 281. 71); 188, -206-207,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 1997; 198*r*, 227, courtesy of Rijksmuseum van Oudheden; 199, 353*t*, reproduction by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s of the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 197, Scala(Museo Mandralisca Cefalu); 200, 228, 345, Musée du Louvre/photo: ©RMN; 202,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abinet des Mé-dailles); 204, National Museum, Copenhagen,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v. no. Chr Ⅷ 967/photo: Kit Weiss; 208, courtesy of John Ellis Jones; 215-216, National Museum, Copenhagen, Dc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v. 13536/photo: Kit Weiss; 222, 244, ©Donald Cooper/Photostage; 226, Museo delle Terme, Roma/Scala; 236, Christie's Images; 238, National Museum, Copenhagen,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v. no. Chr Ⅷ 316/photo: Kit Weiss; 239, National Museum, Copenhagen,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v. no. Chr Ⅷ 13817/photo: Kit Weiss; 241,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Malibu, California. Photo provided courtesy of Bruce White; 243, Martin von Wagner Museum, Universität Wrzburg, photo: K. Dehrlein; 247,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97, Leonard C. Hanna, Jr. Fund, 1991. 1; 248, Henry Lillie Pierce Fund, 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251, 252, 253, 257*r*, 268, 274, 275, Karim Arafat; 265,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letcher Fund, 1931(31. 11. 10); 273, Paris,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278-279, by permission of Birmingham Museums and Art Gallery; 280, National Museum, Copenhagen, Department of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Antiquities, inv. no. 3888; 281,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Corinth Excavations; 282, 283,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letcher Fund, 1938(38. 11. 2); 286, Foto: Antonio Trigo Archivo Fotográfico. Museo Arqueo18. 11. 2); Eastern 287, courtesy of Ecole Suisse d'Archéologie en Grèce; 288,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E. D. Clarke 39, fol. 113*r*; 289, by courtesy of the papyrology Collection, Graduate Librar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91, Musei Vaticani Archivo Fotografico; 293, Bulloz/Museo Capitolino, Rome; 298, Archivi Alinari/Museo Capitolino, Rome; 299,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 1997/photo: Jürgen Liepe, 1992; 302-303, Galleria degli Uffizi, Florence/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305, ©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Berlin, 1997,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Antike-nsammlung; 310-311, Vatican Museum and Art Galleries, Vatican City/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313, Professor Ann Ellis Hans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ee also 'The Medical Writers' Woman' pp 309-338 in DM Halperin, JJ Winkler & FI Zeitlin(eds)*Before Sexu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experienc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1990 & A Hanson 'Uterine Amulets and Greek Uterine Medicine'*Medicina nei secoli* 7. 2, 281-99, 1995; 315*t*, photoi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 Athens; 319, Edimedia/Bibliothèque Nationale; 320, Aerofilms; 326, Museo Gregoriano Etrusco Vaticano/Scala; 331, Edwin E. Jack Fund, courtesy,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328-329, Museo Nazionale, Naples; 338*t*, Hermitage Museum, Leningrad; 338*b*, Museo Arqueologico, Madrid(11094); 341, courtesy of Ioannina Museum; 346 Ann Ronan at Image Select; 347*t*, Papyrus 2068/by permiss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347*b*, Firenze, Bibliotheca Medicea Laurenziana, MS. Laur. Plut. 74. 7, fol. 198v and fol. 203v; 351*r* ©Edifumato, Milan; 349,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MS. Lat. misc. d. 85, fols. 137v-138r; 353*b*,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The British Architectural Library; 354,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Catharine Lorillard Wolfe Collection, Wolfe Fund, 1931(31. 45), photo©1995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355, 357*t*, courtesy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356,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istorical Monuments of England (RCHME); 356*b*, Private Collection/photo: Bridgeman Art Library, London; 358*l*, Tick Ahearn, New York; 357*b*, courtesy of Lofthouse Enterprises, Hitchin, Herts; 358*r*, Pablo Picasso, Maquette for the cover of *Minotaure*. Paris(May 1933). Collage of pencil on paper, corrugated cardboard, silver foil, ribbon, wallpaper painted with gold paint and gouache, paper doily, burnt linen, leaves, tacks, and charcoal on wood, 19 1/8 x 16 1/8" (48. 5 x 41. 0cm).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Gift of Mr and Mrs Alexandre P. Rosenberg. Photograph©1997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Succession Picasso/DACS 1997.

索 引

A

B

E

F

G

H

J

K

L

N

O

P

T

译后记

古希腊人有句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的或别人的历史，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历史之所以值得人类反复去思考，去玩味，去复制，去总结，是因为现实对历史的不断需要。由于现实是从历史脱胎而来，同历史始终保持着继承和变异的联系，所以如果不了解人类的过去，就失去了认识现实的起点，至于合理预测未来和选择正确的行动就更无从谈起了。

人们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每天都在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积累来处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认识，我们连一个简单的概念（如马克思主义、巴以冲突、911事件等等）都无法理解。假设有一天人类失去了所有已经积累的历史认识，一切从零开始，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所以归根结底，历史学是为现实服务的，是人类为了自觉地认识自己从何处来，现在在何处，将来应当往何处去而形成的一门学问。世界各国都把历史作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必修课程，其原因便在于此。

对于历史，人们通常认为近现代史最有用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现实具有直接联系，不首先了解国史，或者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现实的中国。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自从晚清以降，中国就逐渐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融会到了一起，到了今天则可以说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现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几乎每一种变化，都同世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仅以日常生活习俗而言，现代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加消遣等每一个环节，都打有外来文化的烙印。若往大处着眼，不了解世界历史的外因，那么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事业就成为不可思议的现象。再如，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最终成为执政党有着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但要很好地解释这种合理性和必然性，至少要追溯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甚至要追溯到工业革命。这样一来，世界近现代史就同中国近现代史一样，对当代中国人便是十分重要的了。由于近现代史同现实的紧密关系，因此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或社会科学的管理部门都把近现代史研究放到历史学的优先地位。

但这不等于说厚今就一定薄古，古代史无足轻重。这是因为历史发展有连续性，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昨天是前天的继续。所以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中国，认识昨天的中国，又需认识古代中国。同样，认识今天的中国需要认识昨天的世界，认识昨天的世界又需要认识前天的世界。只要人们的认识要求一旦进入寻求原因的层面，思考的时空范围就必然要向前扩展。比如要认识今天西方世界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制度，像宪制政府、言论自由、个人权利、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个人财产所有权、科学探索的理念等等，就很自然地要追本溯源到两千多年前的希腊文明。

现代西方文明是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希腊的政治学理论，与中国的典章制度研究不同，它用比较方法研究政府如何运作，政治体制的类型和不同政体的优劣。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均是古希腊人留下的思想遗产。

古希腊人不仅开创了世俗哲学，而且拟定了哲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和知识范畴。比如形而上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知识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对古希腊人来说，哲学意味着热爱智慧，而智慧不是感性认识，而是关于事物的原因和原理的知识。换句话说，超越感觉、透过现象发现事物之间联系与本质的思维活动或脑力劳动，才属于智慧层面的哲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的哲学涵盖了人类的一切知识学科。

古希腊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是西方文学的开创者，他们的神话、诗歌、戏剧、美术作品至今仍是西方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古希腊人的数学，特别是进入抽象领域的几何学以及物理学、天文学、医学等学科，奠定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基础。希腊是一个产生出西方哲学之父、历史之父、医学之父等等众多学术之父的国度。

甚至西方人开朗、奔放、竞争、热爱生活的性情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古希腊。戏剧比赛、文化节之类不用说了。古希腊人是古代世界最大的玩主，整个民族一起玩。这是其他古代文明民族所罕见的现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典型代表。比赛项目是奥林匹克基本比赛项目的源头。比如短跑、中长跑、跳远、铁饼、标枪、摔跤、拳击、赛车（当时是马车）、火炬接力、健美比赛等等。至于其他娱乐形式，狂欢游行，戏剧大赛，节庆仪典都是经常性的，所以古代世界惟有古希腊人以及后来效仿古希腊人的罗马人，才在城市中有那么多的公共空间，才使广场、剧场、体育场、体育馆成为一座城市的必要组成部分。

当然，古希腊文明同任何文明一样，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或阴暗的一面，如大规模对奴隶的役使，对妇女权利的剥夺，希腊中心论以及对异族人的压迫等等。这些负面遗产也不同程度地被近现代西方人所继承，成为他们不时自我反省的反面教材。

有鉴于此，这本普及性的古希腊史著作便有了现实的意义，这就是有助于我们比较深入地认识西方世界，也有助于认识我们自己的过去。因为认识自己总是在与他人比较当中实现的，知彼方能知己。

本书主编卡特里奇是当代研究古希腊史的著名学者，他力求改变一般史书按时间顺序依次展开的写法，用平行的专题对读者展示古希腊世界的主要方面，这有利于认识古希腊历史的某个单个环节，却不易使读者产生清晰的总体印象。为了避免这种缺陷，编者把本书分成两部分：较小的第一部分介绍古希腊历史的基本线索和地理人文的大致情况。较大的第二部分从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战争、经济生产、思想文化角度，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一点。至于效果是否好于传统按时序来写的史书，还需读者自己判断。

翻译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业，尽管本书译者在主观上想把书译到精确的地步，但由于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的局限，一个译本错误百出是常见的现象。笔者接触外语和从事翻译的时间越长，越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个译本肯定存在着不少缺陷，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本书作者在卷首特别提到了英国诗人雪莱，笔者顺势在这里借用雪莱的诗文作为结尾，以说明西方知识分子对古希腊文明的敬意：

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都根源于希腊。若不是希腊—罗马征服者，或者说若不是我们祖先的统治者用武力传播了它的光辉，我们也许仍然是未开化之人和盲目的崇拜者。

本书索引由张继华翻译，在此表示感谢。

郭小凌

2004年8月9日于北师大